第三卷・1956-1957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思考與選擇

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

沈志華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第三卷・1956-1957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思考與選擇

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

沈志華 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

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
(1956-1957)

沈志華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目录

總序：
世紀視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導言

一 中共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主要任務的認識

二 中共對社會主義同盟及中蘇關係的估計

第一章 早春時分：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一 知識分子問題：中共的希望及其面對的矛盾

1 毛澤東籌劃經濟建設高潮

2 知識分子問題的提出

3 會議的籌備與調查研究

4 各地調查的反映及迴避的問題

5 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及思想變化

二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與知識界的最初反應

1 中共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及其新政策

2 知識分子政策調整的局限

3 知識分子的雙重反應

三 吹向知識界的春風：新政策的實施

1 知識分子新政策在全國的實施

2 中國第一份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

第二章 以蘇為鑑：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的最初反應

一 蘇共二十大的新方針

1 蘇共二十大綱領：對外政策

2 蘇共二十大綱領：對內政策

3 秘密報告與批判個人崇拜的由來

二 中共中央與非斯大林化

1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衝擊波

2 中共中央迅速傳達秘密報告

3 毛澤東如何看待斯大林問題

4 中蘇兩黨並無任何重大分歧

三 毛澤東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考

1 毛澤東號召「全面學習蘇聯」

2 中國人對蘇聯式道路的反思

3 論「十大關係」及其歷史局限

第三章 毛周分歧：批右傾保守與反急躁冒進

一 反右傾保守與「多快好省」

1「進入社會主義」的喜與憂

2 經濟建設上反右傾保守主義

3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

4 計劃指標的修改和膨脹

二 從反「右傾保守」到反「急躁冒進」

1 周恩來等人的隱憂和警告

2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分歧明朗化

3「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方針的提出

4 人大一屆三次會議的基調

5《人民日報》6月20日社論

三 繼續反冒進與削減計劃指標

1 不斷反覆的二五計劃草案

2 莫斯科的決定性意見

3 壓縮1957年的計劃指標

第四章　擴大民主：「雙百」方針和兩個「萬歲」

一「雙百」方針的由來和知識界的反應

1「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

2 陸定一談「自由」及其限度

3 知識界的最初反映

4 如何開展「百家爭鳴」

二 新聞改革與學術界的活躍

1 嘗試改進新聞工作

2 為「爭鳴」開道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

3 逐漸活躍起來的學術界

三 沐浴春風的文藝界

1 作協理事會與文藝政策鬆動

2 戲曲領域的「百花齊放」

3 文藝界對教條主義現象的批評

4 抨擊官僚主義對文學創作的干預

四 民主黨派的春天

1 民主黨派還需要存在嗎？

2 民主黨派可以監督共產黨嗎？

3 民主黨派的響應和政治訴求

4 主動請民主黨派辦報紙

5 被擱置的中央統戰部指示

五 民主的擴大及其限度

1「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

2 專政也可以「寬一些」

3 自由和民主的限度

第五章 八大路線：給國人帶來的希望和思考
一 八大的籌備和召開
1 八大的籌備與主要文件的形成
2 預備會議的「三大工程」
3 八大的召開及其特點
4 八大選舉的中央領導機構
二 八大的路線和成果
1 政治報告與政治決議「懸案」
2 積極穩妥的經濟建設方針
3 改進計劃經濟體制的初步設想
4 對國家民主和法制的呼籲
三 黨內民主和個人崇拜問題
1 執政黨面臨的主要危險
2 關於群眾路線和黨外監督
3 實行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崇拜
4 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
第六章 多事之秋：波匈事件及中國的作用和反應
一 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
1 危機前中國、蘇聯、東歐的三角關係
2 波蘭危機：中共第一次當面指責蘇聯
3 匈牙利危機：毛澤東提出的主導性意見
二 中共高層對波匈事件的思考和討論
1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不同聲音
2〈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三 波匈事件在中國社會引起的反響
1 社會反應及「少數人鬧事」

2 中共採取的讓步和安撫措施

3 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

第七章 發動整風：毛澤東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一 毛澤東決心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1 黨內整風的最初倡議

2 準備開展整風運動

二 開展黨內整風運動的指導思想

1 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講話

2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講話

3 根本對立的黨內外反應

三 毛澤東南巡講話和整風再動員

1 黨內對整風運動的不同理解

2 毛澤東在南方的整風再動員

3 中共中央決定提前開展整風

第八章 引蛇出洞：黨內整風轉為反右派運動

一 變化：毛澤東在開門整風中的警覺

1 毛澤東廣泛邀請非黨人士提意見

2 民主黨派座談會與知識界的鳴放

3 毛澤東感到事情開始發生變化

二 陰謀：在「引蛇出洞」策略下的事態發展

1 毛澤東親自策劃的「陽謀」

2 受到鼓勵的社會大鳴大放

3 學運風潮與社會不安定因素

三 反擊：毛澤東決心變黨內整風為全面反右

1 毛澤東感到了真正的威脅

2 尋找階級鬥爭的新突破口

第九章 聚而殲之：階級鬥爭再次成為焦點

一 全面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1 反右群眾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2 青島會議與批判溫情主義

3 群眾反右鬥爭面面觀

二 在反右旗幟下開展的全民整風運動

1 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任務

2 反右與全民整風運動

3 他們是這樣成為右派分子的

三 階級鬥爭再次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1 對八大政治路線的徹底背離

2 對右派分子處理的原則和結果

第十章 東風吹來：毛澤東在莫斯科指點江山

一 中蘇同盟的蜜月及其隱憂

1 蘇聯對華經濟援助

2 毛澤東為赫魯曉夫雪中送炭

3 赫魯曉夫對毛澤東投桃報李

4 中蘇同盟內部的隱憂

二 爲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和團結

1 中共主張開會解決問題

2 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3 毛澤東即席發言語驚四座

三 毛澤東決心發動經濟大躍進

1 莫斯科會議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計劃和安排

2 毛澤東再次提出在經濟建設方針上反右傾

後記

附錄

大事記

1956年

1957年

參考文獻

一 檔案

二 文獻

三 著作

四 論文

五 回憶錄和口述史料

六 報刊

索引

總序：世紀視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金觀濤

經過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終於分批出版、與讀者見面了。對我來說，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於史實、觀點開放的中國當代史視為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

把當代中國人經歷的驚心動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我們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經歷了苦難，又見證了啟蒙時期思想的風雨雷霆，這一切理應成為不可磨滅的歷史。然而我深知這一工作又是多麼困難。

首先，作者必須掌握盡可能完備的史料，特別是檔案文獻。近年來，出版了大量回憶錄和口述歷史資料，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與中共高層決策有關的檔案至今尚未完全開放，為寫作帶來困難。在歷史學家的寫作中，除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為複雜和重要的，是對史料的辨偽和確定其在決策過程中起過的作用，只有少數長期關注該領域的專家才具備這種能力。十分幸運的是，本套書的撰寫正是依靠了這批有深厚檔案功底、又長期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專家。他們足跡遍及全國各省及市縣檔案資料館，搜集整理檔案並對史料辨偽。史料之豐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書的重要特色。

歷史研究者的目標是追求歷史的真實，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搜集史料、整理檔案只是第一步。歷史學家在研究和寫作中都會有這樣一種體會：如果不能做到對歷史場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內心重演歷史事件展開過程以及理會當時支配事件展開的普遍觀念，就無法接近歷史的真實。本套書以1949年至1981年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論述主線，這二十餘年正是毛澤東思想支配中國的時期，發生了世界歷史上獨特的令人很難理解的現象，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由於本套書的作者都是中國近幾十年巨變的親歷者，完全了解這些事件發生時的社會氛圍，這就使他們具備了某種比西方史家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優勢。當然，作者要發揮這種優勢，僅僅停留在感性階段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從某一種意識形態中走出來、盡可能價值中立地審視過去，達到反思的高度，以獲得超越的視野。開始注意到支配社會行動的普遍觀念與重大社會事件的互動，特別是這些事件是如何從中央決策到地方、再到基層展開的，是本套書的另一特色。由於各卷作者是獨立寫作，分批出版，雖然現在對全套書作出整體評價尚為時過早，但是，我可以不無

自豪地說，中國人終於開始為不尋常的二十世紀中國撰寫大型歷史著作了。

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設主編，以便各位作者在寫作時有更大的自由，並表達多元的價值。由此帶來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統一風格，使十卷著作組成連續的整體。我們的解決辦法是在動筆之前充分討論各卷內容，每年舉行一到兩次工作會議，切磋寫作中碰到的問題。至今，我仍不能忘懷一次又一次的國史寫作討論會。窗外是北國的寒冬，大家聚集在不大的會議室中不分晝夜地討論，最後形成會議紀要。這一場景使我想起1970年代末青年時代和朋友的徹夜長談。很多時候，大家就某一觀點，細節甚至是提法，進行無休止的辯論。使我十分感動的是，無論在討論中發生多大的爭論，甚至是立場和價值上的分歧，最後都能在忠於歷史事實之上得到統一。根據時段，本書大約以兩三年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兩位作者撰寫，而其它作者都把自己對該時段的見解和史料提供給該卷作者，整個寫作過程中表現出一種今日中國學術界罕見的真誠合作精神。在此意義上講，這套書是整個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組織編寫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這套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沈志華和李丹慧夫婦，從確定撰寫計劃到尋找適當的作者以及整體工作的協調，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組織者。其次，我要感謝青峰和先後在《二十一世紀》編輯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強先生、林立偉先生、張志偉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張素芬小姐。他們在青峰的帶領下，以巨大的熱忱和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投入編輯出版工作，否則，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編輯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還要感謝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本書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熱情周到的服務。最後，我要感謝方正兄，該書從醞釀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雖已退休數年，但仍念念不忘這套書的出版，認為它對香港中文大學有着重要性。在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錕教授任中大校長時期那種注重中國研究在當今世界意義的「中大精神」。

這套書出版之時，我也到達退休年齡，將開始人生的新階段。我想指出的是，由於可以看到的檔案和其它種種限制，這套書只寫到1981年。如果不談此後發生的波瀾壯闊的80年代啟蒙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1989年震驚世界的事件，我們仍無法理解今日中國和世界。在這一意義上，僅僅由前十卷組成的二十一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不完備的，寫史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從來就有忠於事實和敢言的歷史傳統，但很少有史家為當代寫史，故這套書的出版是一種新現象。它說明中國歷史學家已走出僅僅用春秋筆法褒貶益損，並展示了一種可能性，這就是歷史反思意識已經產生，並開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後繼者。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學

導言

1956—1957年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是不尋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點是這兩年的反差極大。或許可以這樣說，在中國，1956年春光灑滿大地，1957年陰霾籠罩天空。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國人曾寄予無限希望，而中共雖經歷思考，最終卻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

所謂希望，是說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後，中共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積極動員和團結社會各階層，全力投入經濟發展，目標是在不遠的將來，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經濟繁榮、國力富強、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共領導人這一代社會精英提出的宏偉理想和奮鬥目標，國人充滿了希望和期待。

所謂思考，是說當中國宣布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針對在蘇聯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質疑和批判，特別是揭露了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斯大林在創建這種社會主義時所犯的種種錯誤。蘇共中央的創舉令很多共產黨人深思：社會主義的道路究竟應該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蘇聯模式是不是正確的或唯一的社會主義樣板？蘇共提出的問題更使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考慮，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怎樣避免蘇聯已經犯過的錯誤，開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社會主義道路？

所謂選擇，是說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動社會主義世界的風浪剛剛停息，1957年夏天一場鋪天蓋地的反右派運動，又把整個中國社會推向了「內亂」。中共重新祭起「階級鬥爭的法寶」，使人們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爭鬥。其結果，「百花齊放」變成一花獨放，「長期共存」變得名存實亡。知識分子消極了，民主黨派沉默了，肯於思考、熱心報國的人群失望了，全國上下萬馬齊喑。為了鞏固政權，中共最後決定還是回到階級鬥爭的道路上，並以此作為執政黨今後的行動綱領，中國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體制由此確定了未來發展的基礎。

為甚麼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會轉變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為甚麼中共八大在1956年確定了擴大民主、加強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設的方針路線，到1957年卻反其道而行之；為甚麼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種種弊端，到頭來還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為甚麼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卻做出了失敗的選擇，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本書試

圖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獻史料，描述這一歷史過程。

筆者的思考和寫作，追尋了兩條並行的線索：其一，中共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主要任務的認識；其二，中共對社會主義同盟特別是中蘇關係的估計。作為一個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執政黨，這是中共在1956至1957年所面臨的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這種認識和估計的結果，構成了他們制定對內和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決定了他們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最終選擇。

一 中共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主要任務的認識

社會主義社會原本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人類社會發展境界的一個大體設想，後來經列寧和斯大林的實踐，逐步形成了所謂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所有共產黨人便以此為奮鬥目標。因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國家政權以後，按照共產主義的理念，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不過，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共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鞏固政權，這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毛澤東讀《甲申三百年祭》對李自成敗落的思考，以及同黃炎培關於國家興亡周期律的討論，充分表明他對政權得而復失這一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在新政權立足未穩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高級幹部內心考慮問題的思路，根本上還是受到中國傳統社會改朝換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慣性。中共是靠「槍桿子」打天下的，這種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必然依賴同樣的手段坐天下，即採取革命的方式鞏固政權，改造社會。藉助朝鮮戰爭的特殊環境，通過武力鎮壓和群眾運動的強制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鞏固新政權的幾個主要任務：清除反動勢力、變更所有制和改造社會及人們的思想。

到1956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所有制性質變了——官僚買辦經濟、地主經濟和資本家經濟已不復存在，社會成份變了——暗藏的特務和反革命消滅了，地主、資本家，富農沒有了，也就是說，國內的敵對勢力基本不存在了。這時，不僅工人、農民真心擁護共產黨，就是大多數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也對共產黨人心悅誠服，認為他們的確是中國社會的精英和棟樑。鞏固政權的任務已經完成，那麼進入社會主義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大規模開展經濟建設。這一點，中共領導人是十分清楚的。他們連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針，甚至考慮採取某種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調動一切社會積極因素，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奮鬥。

在這個基礎上，中共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

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中共的現時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認識到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必須從革命轉向建設，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線的一個重大變化，也是中共對自身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即取得執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認識。

然而，這種認識似乎還是下意識的和模糊的。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中共的思路沒有沿着正確的方向深入下去。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風波，特別是匈牙利動亂的後果，給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敲響了警鐘，使他們看到，已經取得勝利的政權還是有可能喪失的。這種危險的國際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和國外的反動勢力，他們企圖與國內的反革命力量相呼應，最終推翻共產黨政權；國內根源則在於執政黨沾染的脫離群眾的作風及其所採取的錯誤的方針政策，由此引發了人民大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其中，最令毛澤東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後者。在中國，經過鎮反、肅反和一系列改造運動，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還有一些殘餘力量，也不會翻起大浪。因此，今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解決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如何克服執政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問題。於是，毛澤東向黨和政府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課題，同時決定開展整風運動，採用民主的和開放的方式，袪除一些共產黨幹部執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風和舊弊陋習。

在毛澤東看來，既然反動勢力已經基本清除，知識分子也表示臣服了，就不會再有人對中共的執政地位提出挑戰。同時，在中共幹部中，貪圖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現象日益嚴重，僅靠黨內思想教育已經不能解決問題。於是，他決定發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並且親自在黨內外進行廣泛的宣傳和鼓動工作。包括許多共產黨員在內的一批熱心於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有識之士確實被發動起來了，他們仗義執言，針砭時弊，大膽說出了許多過去不敢講而共產黨又不愛聽的話。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評的矛頭竟然指向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並公然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方式提出質疑。看來，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想要翻天的還大有人在。毛澤東決定進行反擊，而這個決定又恰恰迎合了黨內基層幹部對整風運動中諸多言論和做法的不滿情緒。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很快就在全國鋪開了，革命的暴風驟雨再次降臨中國大地。

在這個背景下，八大的政治路線遭到否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在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經過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最後得到解決。把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本來就是中共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的工具。所以，反右派鬥爭很快取得了完全勝利。此後，毛澤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經濟建設方面，並且提出了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不過，這次開始的經濟建設高潮，藉助反右派的東風，繼續採取了群眾運動的革命方式。至於階級鬥爭，到「大躍進」失敗之後便轉入了黨內，後來就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

二 中共對社會主義同盟及中蘇關係的估計

50至60年代中國的發展，與蘇聯有着極其密切和不可分割的聯繫。

中國與蘇聯建立同盟關係以及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意義，對於蘇聯來說，主要是一個安全問題，斯大林考慮的是利用中國作屏障，解除來自東方的美國威脅。對於共產黨的中國來說，鞏固政權，組織社會，發展經濟，這一切都需要依靠蘇聯的幫助。況且，就長期形成的政治理念和當時的國際環境而言，在主觀意識中，中共除了向蘇聯「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外，沒有別的選擇。

毛澤東作出與蘇聯結盟的決定，還有一個邏輯——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而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個榜樣，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以俄為師」。中共長期在農村和山溝裏堅持武裝鬥爭，沒有管理城市和國家的經驗，更不知道如何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所以，只能學習蘇聯。1952年底，國內外局勢剛剛穩定下來，毛澤東便主張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並提出了「全面學習蘇聯」的口號。不過，斯大林並不認為中國可以立即走上蘇聯的道路。在斯大林看來，中國要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差得很遠：你那裏剛剛把土地分給農民，怎麼實行全盤集體化？你連起碼的工業基礎都沒有，怎麼實行計劃經濟？斯大林一再告誡毛澤東，不要急於向蘇聯學習，向社會主義過渡要慢慢來。

斯大林去世以後，莫斯科新領導層一方面開始着手處理在斯大林時代積重難返的種種社會危機，一方面在赫魯曉夫的主持下調整對華方針，向中國提供全面的援助。大批蘇聯專家的到來和一五計劃的實施，使得中國從國家機構的設置、經濟體制的建立、各種管理制度的形成，直到各大城市的規劃以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大量照搬蘇聯的經驗。但是，正在中國仿照蘇聯模式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大廈的時候，蘇共召開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方針。同時，毛澤東也感覺到

蘇聯模式存在着弊病，提出「十大關係」問題，開始考慮走適合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儘管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思考都沒有觸及到當時社會主義所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層面的根本問題，但這種思考無疑已經蘊含了未來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基礎。

1956至1957年中蘇關係正處於蜜月時期，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相互支持，取長補短。總體說來，蘇聯在經濟上援助中國：從一五計劃的執行、工業化基礎的建立直到核武器的研製，赫魯曉夫向中國提供了巨大幫助：中國在政治上支持蘇聯：從平息蘇共二十大給社會主義思想陣地帶來的衝擊，消除波匈事件在社會主義陣營造成的震動，直到在六月事件和朱可夫事件中堅定地支持赫魯曉夫，毛澤東也為蘇聯提供了巨大支持。儘管他們之間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毛澤東不滿意蘇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做法，不同意蘇共把和平過渡作為外交政策的總方針，而赫魯曉夫則認為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多有不妥，對中共帶頭指責蘇聯的大國和大黨主義也暗中不滿。但這些都是枝節問題，用毛澤東的話說，是十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加強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團結，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以共同對付和戰勝美帝國主義，這是他們一致的和首要的目標。莫斯科會議就是中蘇合作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經典之作。

然而，隨着形勢發展，在這一時期中蘇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卻逐步出現了一種隱患，即他們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正在悄悄發生變化。中國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敢於出兵朝鮮與美國對陣，又在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的國際風波中鎮定自若，指揮有方，使得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共產黨對中共刮目相看，由衷欽佩。更何況斯大林去世以後，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無論講革命資歷和理論水平，還是講政治經驗和領袖魅力，毛澤東都愈來愈顯示出其超人的地位，遠非赫魯曉夫之輩所能相比。於是，隨着赫魯曉夫和蘇共屢次陷入在兩代領導人交替過程中出現的政治危機，在中國黨內漸漸形成了一種中共應取代蘇共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看法，毛澤東本人也在言行舉止中流露出這種情緒。這一點，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表露得最為明顯。

不過，恰恰在1957年底，蘇共的劣勢已經走出低谷。赫魯曉夫本人在政治鬥爭中的勝利鞏固了他在國內的絕對權力，東歐危機的解除使蘇聯恢復了傳統上對那個地區的影響和控制，特別是蘇聯的經濟發展也在這時顯示出輝煌的成就：農業獲得戰後少有的大豐收，連續兩顆人造衛星上天，核動力潛艇試航成功。這一切都讓赫魯曉夫感到驕傲，使他更堅信改善與西方的關係，集中精力解決經濟發展問題這一方針的正確性，也使他看到了通過和平競賽戰勝資本主義的光明前途。為此，他在莫斯科會議上洋洋得意地提出了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口號。然而，毛澤東

在此看到的卻是「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是社會主義將要很快埋葬和取代資本主義的國際潮流，因此，他認為有必要採取更為激進的革命路線，鼓勵和支持世界各國進步力量，與帝國主義進行最後的鬥爭。顯然，蘇共二十大的路線已經不再適合新的形勢需要，如果赫魯曉夫不能及時修改蘇共的指導思想，那麼中共就必須站出來，挑起領導世界革命的重擔。

毛澤東感到，中國要在社會主義陣營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經濟實力，他早就憋着勁要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不過，毛澤東對蘇聯的經濟建設模式的認識，並沒有超出蘇共二十大文件指出的範圍，所謂避免或少走蘇聯的彎路，也不是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本身有所質疑。毛澤東所要求的只是在經濟發展速度上超過蘇聯，其方法就是中共所熟悉的大搞群眾運動。這種單靠高指標、高速度搞經濟建設的方針在1956年下半年遭到周恩來等經濟工作領導人的抵制，也受到蘇聯專家意見的制約，被作為「冒進」反下去了。到1957年情況就不同了，反右派運動以後已沒有誰敢站出來唱對台戲，蘇聯專家的意見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澤東就要大張旗鼓地開始經濟躍進了。超英趕美變成了趕超蘇聯，以後的事情就是要看，到底是中國學習蘇聯，還是蘇共服從中共了。

這就是本書所敘述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路。

這裏所謂「思考與選擇」，主要指的是中共的思考和選擇，因為顯而易見，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裏，都是共產黨一黨執政。自然，中共的思考和選擇決定着中國的命運。從決策的角度看，在以往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對於國家的大政方針，人民大眾可以思考，卻沒有權利選擇。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從人心向背的角度看，一個社會的發展，最終是要人民選擇的。況且，有些時候，作為執政黨，他們還是願意並感到需要傾聽人民的聲音的，至少中共是這樣。所以，本書對1956—1957年歷史的考察，也同時關注到中國民眾和社會對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思考和反應。

如今，站在二十一世紀的角度來看1956至1957年這段歷史，令人不勝感慨。在中國，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及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國家棟樑，都是經過大浪淘沙的社會精英。他們有善良的願望和偉大的抱負，一心想把中國領上一條走向理想王國的康莊大道。然而，他們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剛剛邁出第一步便停止了，或者說當時他們進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探索。由於歷史的局限，其中包括自身思想認識的限制和客觀環境的制約，由暴風驟雨般革命時代造就的絕大多數中國領導人，習慣於以那個時代的方式來思考問題，習慣於用那個時代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們很難否定自我，很難放棄傳統的鬥爭思維和革命

方式，很難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現代社會。

這裏還需要強調的是，過去研究者常用「轉折」這個概念給1957年的中國歷史定位，似乎1956年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1957年又轉向了另一條錯誤的道路。筆者以為，這個定位不夠準確。首先，1956年中共主要還是在思考，八大所確定的路線也只是展示了一個前景，至多是剛剛開始起步。其次，1957年中共的選擇並非突發奇想，而是與1956年以前的傳統思維和習慣以及1956年的思考有着內在的聯繫。應該說，到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蘇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針，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各國）歷史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歷史確實提供了一個機會。社會主義道路究竟走向何方，這時需要並有可能進行認真的思考和比較，中共領導人也確實開始了探索。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國社會的騷動，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因真心參與共產黨整風而提出的尖銳意見，中共難以承受，終於在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所以，這裏不是轉折，而是稍有停頓和觀望，便沿着中共傳統的和熟悉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了。

就共和國的發展道路而言，真正的轉折出現在80年代。說句史學研究者一般不大講的話，如果——中國共產黨在1957年沒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並且支持、參與蘇聯和東歐的改革，繼續廣開言路，擴大民主，招賢納士，改弦易轍，那麼——就有可能在社會主義世界看到各國獨立自主多元發展、不同模式競爭前進的局面，就有可能在50年代的中國出現人們在80年代才看到的「轉折」。

至於本書所使用的文獻史料，有如下幾點值得提一下。

第一，廣泛引用已出版的檔案文獻。

從目前中國的檔案管理制度看，一般學者是無法進入中央檔案館的。因此，也就很難通過查閱和疏理高層檔案文件，特別是各種會議記錄，了解中共的決策過程。不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研究機構編輯，出版了大量文獻及年譜、大事記等史料集，其來源主要是中央檔案館。這是研究共和國歷史必不可少的基本資料。筆者在引用這些文獻時注意到：（1）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文獻中，註釋特別重要，其中使用了大量檔案資料，極有價值。有的文獻本身只有幾個字，註釋卻長達幾頁；（2）不少文獻在發表前進行過修改，在編輯時又做了刪節，有的有說明，有的沒有說明，稍不小心就可能誤入歧途。因此，筆者盡量找到原始文件進行比較；（3）在引用重要文獻時，需要對比不同時期出版的不同版本，因其中不僅註釋，甚至正文都可能有差別；（4）筆者能夠看到的中共文獻並不完全，需要時必得靠其他史料補充之。

第二，盡量挖掘地方檔案館的有用資料。

過去，學者對中國的檔案開放政策多有抱怨，感到難以進行歷史研究。目前情況已經有所改觀，例如，有外交部檔案館引領，部委一級的檔案正在考慮解密。特別是近幾年，各省市檔案館均已開放，原則上可以任研究者查閱。地方檔案內容極其豐富，涉及社會生活各方各面、各行各業，雖缺乏中央決策的內容，但是從中央與地方、高層與基層互動的角度觀察，對於決策的結果及執行情況，卻有十分詳細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各級黨政機構貫徹中央決策的方式和辦法，社會基層對國家各項政策方針的反應，不同群體在歷次運動中的表現，在這裏是應有盡有。只要研究者肯花時間，肯下工夫，就能夠觀察到整個社會乃至每個細胞的動向。

第三，大量轉引過去公開的和內部的報刊資料。

轉引當年報刊雜誌資料的重要作用無需贅言，筆者在疏理史料時就是逐日對照《人民日報》，從而解決了大量問題。這裏主要談一份極有史料價值的內部刊物——新華社《參考消息》編輯部編輯發行的《內部參考》。這份刊物當年是僅供中共高級幹部閱讀的，其中報道的國內外重要新聞，一般都是公開報紙甚至《參考消息》上都不予刊載的。除了對國外情況的報道外，《內部參考》大量刊登了國內各地區的民情，既有各級黨政軍和社會團體的工作情況，也有社會各階層情緒和反應。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前，這份刊物提供的信息不僅數量極大，而且內容真實，是了解社會基層活動的絕佳材料。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所幸《內部參考》現在已經成為史料，在海外一些圖書館或資料室都有收藏，並可以大量複印。

第四，謹慎使用回憶錄和口述史料。

目前中國出版的大量回憶錄以及作者對當事人的採訪記錄，是當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在歷史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本人找到對歷史的感覺，而歷史事件發生時的場景、氣氛和當事人的感受，卻往往無法見諸於檔案文獻的白紙黑字。所以，這種感覺在呆板的檔案文獻中是很難找到的，這就需要依賴當事人的敘述進行彌補。毛澤東過去還有個習慣，他本人召集的一些重要會議，包括政治局會議，不允許做記錄。所幸是為工作需要有時與會者可以做個人記錄，這些材料也是查閱檔案無法替代的——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是吳冷西的回憶錄。但是，回憶和口述史料也有一個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或受到個人情感和立場的干擾，當事人所述情況是不準確的，甚至是錯誤的。有些人寫回憶錄，有條件核對檔案記載，又有平常心態，這比較讓人放心。但很多人是單憑自己的記憶或好惡，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時

特別謹慎，最好是與相關的文獻史料進行比較和鑑別。

第五，充分利用俄國解密的檔案文件。

近年來俄國檔案解密和利用的情況已為眾所周知，其重要性對於研究50至60年代中國的歷史尤其值得注意。這不僅在於中國此期的發展與蘇聯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受蘇聯影響甚大，而且在於中國檔案資料的缺陷往往可以從俄國檔案中得到彌補。且不說斯大林在世時，中蘇兩黨會談時，不許中方當場做記錄，就是後來有了記錄，中國目前公布的也是極少數。例如，在筆者收集的俄國檔案中，有關1949至1952年劉少奇的談話記錄和電報共十七件，而目前中國出版的《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四卷本只收入了二至三件。再有，對比中蘇雙方的記錄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時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大量使用俄國檔案研究中國史，或許也可以看作是本書在史料引用方面的特點之一。

第一章

早春時分：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1956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儘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國大地已經顯示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這裏說的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動態。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就像一枝報春花，預告了中共領導人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充滿理想和信心的藍圖。

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當然是要解決知識分子問題。不過，在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問題向來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對於執政者來說，也是一個難題。中國的歷代君王通過確立儒家學說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規範了知識分子的思維，又通過科舉制度把他們納入官僚體制，使其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近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逐步影響了中國社會，加上科學的發展，其結果使大部分知識分子游離於政府和統治者。共產黨掌握政權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何使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俯首聽命，為新社會服務。經過1950—1955年幾番思想教育和改造運動，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或者主動地或者被動地，大部分表示了歸順的意願。但是，他們的情緒受到壓抑，內心並不滿意。[1]當新政權馬上要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以實現富國強國的宏偉目標時，這種狀況自然令中共領導人感到擔憂。於是，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就不得不提到議事日程上。本章圍繞1956年初中共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前提、過程和結果，講述並分析中共領導層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變化和政策調整，以及這次調整的效果和知識分子的反應。[2]

[1]近年來關於50年代初期共產黨改造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頗多，如謝瑩：〈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始末〉，《黨的文獻》，1997年第5期；王文：〈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共黨史資料》，總第六十六輯，1998年；楊鳳城：〈1949—1956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翟志成：〈馮友蘭的抉擇及其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台灣），第20期，2002年；黎漢基：〈金岳霖的思想改造〉，《新史學》（台灣），第13卷第1期，2002年3月；王善中：〈論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黨史研究資料》，2003年第2期；王先俊：〈建國初期的社會變遷與黨對思想文化的整合〉，《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還可參見黃一兵：〈馬哈伊斯基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左」傾錯誤之緣起〉，《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蘇利軍：〈西方關於新中國思想改造運動的研究述評〉，《黨史研究資料》，2003年第4期。

[2]有關這次會議，早有專題檔案文獻發表，如〈一九五六年知識分子會議文獻選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等，相關的研究見熊華源：〈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會議——1956年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情況介紹〉，《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廖心文：〈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糾「左」的艱辛路程〉，《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4期。涉及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研究，還有一些整體性描述的論著值得注意，如何曉明：《百年憂患——知識分子命運與中國現代化進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龔育之：〈周恩來和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3年第3期。

一 知識分子問題：中共的希望及其面對的矛盾

要了解1956年初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背景，必須清楚毛澤東正在籌劃的一個新的宏偉藍圖，這就是在三大改造即將提前結束的形勢下，如何推動大規模建設高潮的到來，在中國提前實現工業化，提前建成社會主義。

1 毛澤東籌劃經濟建設高潮

1955年下半年農業合作化高潮興起以後，毛澤東就提出：「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1]毛澤東所說的「根本變化」，是指「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經在他的把握之中，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全力投入經濟建設了。因此，還在1955年秋冬，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就開始從改造轉向建設。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的「一化三改」任務，實際上也就是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的任務。然而，所有制改造任務即將提前完成，而工業化任務卻遠未實現。無論毛澤東對迅猛到來的社會主義高潮多麼欣喜，有一點卻是清醒的：中國仍舊「一窮二白」，經濟落後，文化落後。不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中國就算不上建成社會主義。他希望同樣運用反對「右傾保守」的方法，推動一場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經濟文化建設的高潮。

毛澤東加快發展的思想，還有他國際戰略方面的考慮。毛澤東的眼光不只局限於中國，而是在全球，要在世界上謀得強國地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謀求更大的發言權。李慎之回憶說，1956年剛開始，毛澤東就指示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雖然新華社的人參不透毛的心思，「但是深信毛主席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圖大略則是沒有疑問的」。[2]中國是人口大國，經濟小國，一向被人瞧不起。這種狀況確實令毛澤東和許多中國領導人不安。還在1955年，毛澤東就表露出要趕上並超過美國的宏願。是年10月29日，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說：

> 我們的目的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們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李富春同志作過報告，不是說趕上美國不要一百年嗎？這個看法我也贊成。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現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吹起來牛皮很大，歷史有幾千年，地大物博，人口眾

> 多，但是一年才生產二百幾十萬噸鋼，現在才開始造汽車，產量還很少，實在不像樣子。所以，全國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黨派在內，都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我們在整個世界上應該有這個職責。世界上四個人中間就有我們一個人，這麼不爭氣，那不行，我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3]

趕超美國，是毛澤東這段時間不斷重複的話題。50年代中期出現的較為緩和的國際局勢，也強化了毛澤東搶時間搞建設的想法。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朝鮮停戰以後，蘇聯新領導人開始推行與西方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東西方冷戰白熱化的局勢得到某種緩和。這也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機會，突破美國的封鎖和遏制，爭取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來從事經濟建設。1954年中國出席了解決朝鮮和東南亞問題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中國推動了萬隆亞非會議的召開，都顯示出國際局勢的轉機。[4]特別是1955年6月召開的日內瓦四國首腦會議，使中國領導人看到了東西方和平共處和以協商方式來解決國際糾紛的可能性。[5]1956年伊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表達了這種認識：1955年是國際和平力量和反殖民主義力量「廣泛前進的一年」，「要求尊重各國的獨立和主權，要求加強國際合作和以協商方式來解決國際糾紛」，已成為當代各國人民要求實行和平共處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6]和平環境在客觀上保證了中國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於經濟建設，同時，毛澤東對這種和平環境延續時間的估計，又成為他提出加速發展、實現躍進方針的依據之一。

毛澤東一向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他關心的是能否在兩次戰爭之間爭取一個較長的和平時期。在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初次見到斯大林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和平能夠保持多久，他甚至認為只要有三至五年的時間，中國就能恢復經濟和穩定局勢。斯大林告訴他，十五至二十年不會發生戰爭。[7]然而，斯大林話音未落，在中國的東北部邊境便爆發了一場戰爭，中國的經濟恢復和建設不得不拖延下來。[8]五年過去後，毛澤東考慮的還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和平時間，加快建設速度。

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充滿信心地說：「目前國際環境是對我們有利的，有利於我們完成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有十二年的時間即可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9]11月24日，毛在中共中央會議上又說：「帝國主義不曉得那天打仗」，我們要用「兩個五年計劃就把這些事情辦好，或者不要兩個五年計劃，五年到七年（少則五年，多則七年）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改造，此外還有工業、重工業、輕工業都加速一點發展」。[10]11月30日和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講到：「我國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的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的時期，再加上

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可以設想，如果我們不快建設，農業未合作化，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戰爭）打起來，我們的困難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辦。」[11]總之，必須利用有限的休戰時期加快自己的建設步伐，為可能到來的戰爭作好物質準備，而且是以一個強國的面貌和地位應付戰爭。長期以來，毛澤東的這種戰爭觀以及對國際形勢的認識，一直影響着他對經濟建設方針的構想。

2 知識分子問題的提出

知識分子問題的提出，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全面規劃」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國家，要加快經濟建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進步，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參與。毛澤東清醒地知道，「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12]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凸顯出來。然而，當時的狀況是：一方面現有的知識人才遠不能滿足大規模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大批知識分子不能充分發揮其專長。在一連串的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批判胡風和肅反運動後，知識界普遍驚恐不安，情緒消沉，而經過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儘管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表示歸順共產黨，卻始終沒有得到政治上的信任。顯然，這種狀況對即將展開的大規模建設極為不利。於是，由周恩來動議並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中共中央決定通過調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動員知識界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

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動議，來自於周恩來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早在1955年初，周恩來就有過要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想法，[13]但這個想法顯然是與即將開展的批判胡風和肅反運動背道而馳的。直到肅反運動的高潮告一段落，問題才提上了日程。[14]問題的提出與李維漢的努力有直接關係。據當時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聯繫民主黨派工作的于剛回憶：1955年下半年，李維漢決定把知識分子問題作為統戰部近期工作的重點，推動民主黨派，主要是中國民主同盟，去摸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因為民盟同高級知識分子的聯繫最密切。李維漢把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請來商議，「費孝通先生態度很積極」。於是，在費孝通的串聯下，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搞調查，獲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統戰部，整理歸納出六個方面的問題，簡稱為「六不」，即一是估計不足，包括對他們的政治進步和業務水平都估計不足；二是信任不夠，如他們應該看的資料不讓他們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當，該用的，有的沒有用或用非所長；

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幫助不夠。于剛回憶說：「材料整理完後，我們就按這六個方面的問題向李老作了匯報，接着李老就向總理面談了。」[15]過了幾天，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章伯鈞在11月9日也向周恩來反映說，農業合作化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了，這兩翼配合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主體都前進了，那麼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應該討論一下。[16]

李維漢和章伯鈞反映的情況，為周恩來正式向毛澤東提出知識分子問題提供了依據。11月22日，周恩來向回到北京的毛澤東作了匯報，並表露了他本人對知識分子受到傷害的憂慮：「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它危及中國的進步。」為此，周恩來提出打算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表示：「我們應該先在黨內很好地討論，提出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天，毛澤東即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有關方面負責人開會進行商議。會議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同時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由周恩來負責，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徐冰、張際春、安子文、周揚、胡喬木、錢俊瑞等參加，下設辦公室，開始會議的籌備工作。[17]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向到會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布置各地開展調查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工作，要求各地在黨中央開會之前先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並像中央那樣成立研究知識分子問題領導小組。周恩來說，「因為建設就需要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要進一步讓高級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服務，要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他說，對知識分子要堅持用而不疑，給予信任。信任的中心問題，就是我們要尊重這些知識分子。光是口頭尊重不行，還要重視他們的知識，尤其要向他們學習，使他們能夠心情舒暢地運用其知識。周恩來提出，要吸收四十至五十歲的知識分子入黨，提高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周還說，對其中有特殊貢獻者還可以更高，有的甚至可以超過國家副主席和主席，這件事將由中央親自抓。[18]毛澤東在講話中表示同意周的意見：「這個問題要抓起來搞」，有幾個星期就搞清楚了。[19]

為甚麼在這時中共高層普遍感到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性，決定立即召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為甚麼解決知識分子問題不能像一般工作那樣由中央做出決議，下發通知，而必須首先在黨內進行討論？這顯然與中共面臨的緊迫形勢有關，同時也與中共黨內對知識分子的普遍認識密切相關。

早在中共剛剛掌握政權時，一些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就意識到缺

少知識分子是一個嚴重問題。[20]現在要全面開始經濟建設，問題就更加凸現出來。六年以來，中國的科技事業和專業人才培養取得了一些進展。[21]到1955年底，據統計，在科研、工程技術、教育、衛生、文藝五個方面工作的知識分子，共有384萬人，包括高級知識分子10萬人，其中共產黨員僅佔7%。[22]全國高等學校畢業生累計21.79萬人，就當時規定的標準而言，這些人被看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後備軍」。[23]但這遠遠不能滿足各行業建設的需要。按全國人口計算，當時中國平均每一萬人中只有五個高校畢業生，而波蘭有五十個，蘇聯有八十六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更多。[24]因此，一五計劃時期，中國各方面的建設都不得不仰仗於蘇聯專家。筆者曾作過研究和推算，1949年8月到1954年10月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訪華之前，來中國的蘇聯專家和顧問大約有五千多人。[25]薄一波回憶說，當時「不僅對一些重大的複雜的技術問題，甚至連某些一般性的問題，也還解決不了，還需要依靠蘇聯等國專家的幫助」。[26]對於從「一張白紙」起家的中國工業化來說，蘇聯專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這種凡事依賴蘇聯專家的狀況，無論如何是毛澤東等人不能滿意的。[27]因此，中共急切地希望培養中國自己的高級專家隊伍，希望現有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有學術地位和專門技術的高級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多的貢獻」。[28]照薄一波的話說，「至少需要培養一二百萬這樣的高級專家」。[29]

客觀上，經濟建設需要知識分子。但是，長期以來，在中共黨內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不僅中下層幹部，就是在高層領導人眼裏，也大都把知識分子看作「異類」。有學者考證，作為《毛澤東選集》開篇文章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是經過大量刪節的，所刪去的就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分析。在那裏，毛澤東稱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當時此文影響極大，致使部分北伐軍竟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30]還有研究者考察過，在紅軍的時候，「『知識分子』一度是一個不中聽的罵人的話」。[31]這就難怪在中共幹部對知識分子的稱謂中，往往習慣性地冠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頭銜。新的政權建立了，但對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是不能信任的。據最近披露的一份俄國檔案記載：

> 同陳雲對工業戰線的資產階級專家不滿一樣，郭沫若也對國民黨留下的專家表示憂慮。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蘇聯大使講過：「這裏有二十多所高校。這些大學的學生絕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孩子。高校學生中不僅沒有工農子弟，甚至連富農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還對羅申（N. Roshchin）說：「最糟糕的是科學院的狀況，這裏聚集了不少舊的保守分子和反動分子。」[32]

領導幹部中的這種認識和情緒，顯然與毛澤東有直接關係。

毛澤東在感情上與知識分子相當隔膜。毛澤東從來不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主體的一個部分，他的一個非常典型的說法就是著名的「皮毛」論。[33]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有兩個部分，或者依附於資產階級，那就歸入反革命範疇，或者依附於無產階級，那就歸入革命範疇。至於在共產黨執政時期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的看法存在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他認為知識分子階層的大多數在政治上難以信任；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革命和建設都離不開知識分子。因此，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就是強迫皮毛相附，即採取改造與使用的兩手：通過思想改造使知識分子認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為新政權所用。

近年來流行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來源於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成功知識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34]這種看法能否解釋毛澤東睥睨一切知識權威的個性和心態，是值得懷疑的。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與其說來源於他早年受傷害的心理陰影，不如說來源於中國革命走過的獨特道路以及由此強化的毛澤東的民粹主義思想。在毛看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工農，知識分子只有通過思想和感情的痛苦轉變，實現與工農相結合，才能對中國革命有所貢獻。而知識分子就其多數來說，由於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態度，基本上是依附於地主資產階級的，甚至是依附於舊政權的一群人，要實現這種轉變是不容易的。新政權建立以後，毛澤東把知識分子看作他整合意識形態的主要障礙，更有其制度性原因。對於建立在意識形態整合基礎上的新政權來說，自由派知識分子自然成為意識形態整合的主要對象，最不能相容的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和懷疑態度。[35]毛的看法自然在中共黨內產生了廣泛影響。正是出於這種憂慮和擔心，中共在建國後發動了一系列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

從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武訓傳》，批判梁漱溟的資產階級思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判胡風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直到在知識分子中開展肅反運動，都是為了解決知識分子的思想順從和政治忠誠問題。1955年1月8日，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Pavel F. Iudin）會談時，明白無誤地說明了他的意圖。毛說：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同馬克思主義缺乏聯繫。他們頭腦裏有一大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還處在資產階級思想，尤其是從美國人那裏繼承而來的思想的影響之下」。中共中央制定了計劃，用一年的時間，「準備在科學、藝術、文學整個基本方向上，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和樹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鬥爭」。毛澤東還表示了這樣的決心：「我們一定要使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在黨員的心目中和人民群眾、非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名聲掃地，即使不能做到徹底，至少也得使

其極大地名聲掃地。」[36]

無論實際效果如何，在毛澤東看來，到1955年底，他的目標基本上是達到了。經過改造，多數知識分子已經俯首稱臣。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馮友蘭說：「現在，我們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接受了黨的團結、教育和改造，得到了很大的進步。」看到新中國的成就，「我們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同其他勞動人民一樣，都是歡欣鼓舞，願意努力工作，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添上一分力量」。他保證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以接受黨的領導為莫大的光榮。」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發出的號召也足以令中共領導人滿意了：「每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都應當以共產黨員的標準來努力要求自己，積極爭取做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37]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當建設高潮來臨的時候，毛澤東才認為有必要也有條件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毛澤東認為，現在農業取得了主動，資本主義工商業取得了主動，但知識分子問題「還沒有主動」。[38]顯然，中共領導人首先希望進行黨內討論，統一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然後通過改變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政治待遇和工作條件，爭取他們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洪流。

問題之所以由周恩來提出，並非偶然。除了掌管經濟工作的職責所在，由於其出身、修養和秉賦，以及在上海和重慶工作時期同黨外民主人士和知識界的密切交往，周恩來對中國知識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溝通，並與許多高層文化名人建立了良好的個人友誼。還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周恩來就千方百計延攬滯留國外的高級知識分子回國。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他又號召在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回國參加建設。[39]從1952年下半年起，朝鮮戰爭還處於邊談邊打的僵持階段，周恩來便以極大精力投入研究和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搞五年計劃，哪一方面都需要有足夠數量和質量的專業人員參加，使他更強烈地感受到中國建設人才的嚴重匱乏。」[40]1954至1955年，周多次出國參加重要國際會議或訪問，親眼目睹世界範圍內科學技術正在突飛猛進地發展，給人類的物質生活以及整個社會生活帶來巨大變化。由此，周恩來更深切地意識到掌握現代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強調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各項建設，正在愈來愈多地需要知識分子的參加」，「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41]

知識分子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上了的中共的議事日程。

3 會議的籌備與調查研究

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成立後，周恩來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來籌備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說，知識分子問題是他正在考慮的三個問題之一。[42]十人小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來就邀請中國科學院、建築工程設計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醫學院、中國戲劇學院的有關人員座談，了解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中知識分子的現狀。又請了各門學科的第一流科學家談話，核實情況。[43]周恩來要求，各省、市、自治區，特別是北京、上海、天津、瀋陽、廣州、武漢、重慶等大城市，全面調查六年來知識分子的變化情況，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時要求中央各辦、各部委和直屬機構指定專人來研究這個問題。11月25日，周恩來召集全國政協常委會議，動員民盟、民革、九三學社、民進、民建等民主黨派搜集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材料。[44]11月30日，周起草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提綱，並審定了一份〈關於收集知識分子問題材料的題目單〉，其中包括政治和業務狀況的估計、對知識分子的信任等十二個方面的問題。[45]1956年1月10日中央十人小組發出通知，對各地區、各部門上報中央的調查材料提出了具體要求，即應有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構、衛生部門、文化藝術界、工程技術部門、中小學校六個方面，每一個方面都要有好、中、差三類典型，並且要包括幾年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貫徹執行情況、對知識分子隊伍所發生變化做出基本估計和提出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具體意見等三項基本內容。[46]

對於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發展需求來說，中共領導人關注的似乎主要是十萬高級知識分子的使用問題。當時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一般是指具有大學畢業程度，具有幾年工作經驗，能夠獨立工作的知識分子」，如「高等學校中講師以上的教師，研究機構中助理研究員以上的研究人員」。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專門發出了〈關於收集高級知識分子統計數字辦法的規定〉，明確指出「此次調查統計僅僅限於高級知識分子」。[47]

由於有毛澤東的首肯和過問，知識分子問題引起了各地和中央各部門的重視，在全黨上下形成了檢討知識分子工作問題的氛圍。12月1日，張聞天在外交部全體幹部會上作報告，專門談了「大知識分子問題」，他提出：「我們對大知識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對到過美國、英國的就不夠信任，肅反運動一來對他們就更加警惕。」他還說，大知識分子人數很少，十分可貴，如使用不當就是浪費。一些人就是入不了黨，看戲的時候他們坐後面，首長坐前面，對他們尊重不夠。應該尊重知識分子，不要對有技術的人總是看不順眼，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不能強求一致。[48]中央統戰部在召開對資改造座談會期間，也專門討論了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李維漢指出，知識分子屬於腦力勞動者，以自己勞動收入為生活來源，同資產階級有根本的區別。應當同志式地幫助他

們，充分發揮他們的知識專長為社會主義服務。他提出，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經過長期耐心細緻的工作，決不能採取簡單粗暴、強制的辦法。在學術思想批判中，要鼓勵自由辯論，允許批評反批評，允許保留個人的意見，不要急於作結論。李維漢還強調，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是對立的思想體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義思想的專家學者作為「思想敵人」對待。[49]這些都表明，黨的職能機構開始把重點從改造知識分子轉到了使用和培養知識分子上來。

1955年12月16日，中央十人小組將〈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下發徵求意見，其中明確地寫道：

> 目前，黨外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較之全國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傾向，卻是對於他們的政治變化估計不足，不按照他們的實際工作和政治立場把他們看作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的親密聯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因而同他們之間存在着某種程度的隔閡。……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的艱巨任務，每一項工作愈來愈多地依靠科學、文化和技術，也就是愈來愈多地依靠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參加。我們必須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使我國的科學文化技術盡可能迅速地脫離落後狀態，趕上世界先進的水平。[50]

這個文件強調了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培養，至於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則相應放寬了政策。毛澤東修改文件時在「進一步地進行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一句後，加寫了「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此外，草案說，對於只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不應該將他們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而應該採取嚴肅批評和耐心教育的方針，使他們逐步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毛澤東在此處又加了一段話：「對於這種人，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51]由此看出，毛澤東此時對解決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問題，表現出了足夠的自信和耐心。

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組一鼓作氣起草了十一個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專題報告：〈關於科學家研究工作條件問題的情況和意見〉、〈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關於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問題的報告〉、〈關於高級知識分子的理論教育工作規劃（1956—1967）的初步意見〉、〈關於解決在黨外科學家、教授、醫生、作家、藝術家中一部分人社會活動過多和兼職過多問題的意見〉、〈關於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情況的報告〉、〈關於科學家研究工作條件問題〉、〈關於高等學校未開課教師的情況和處理意見〉、〈關於城市失業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等。與此同時，周恩來在

大會的主題發言〈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也準備好了。1956年1月中旬，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籌備工作基本就緒，準備提交大會的文件有周恩來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和十一個專題報告。[52]周恩來還要求有關部門研究蘇聯、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科技發展狀況，並同中國科學技術的現狀進行比較，提出改變落後面貌的方針和辦法。[53]準備提交大會的還有一些地方和部門上報中央的調查報告。[54]

根據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小組，於1955年底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並向中央提交了調查研究報告。雖然目前研究者還看不到這些報告，但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從1955年12月底到1956年1月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召開前後，陸續刊登了新華社駐各地分社發出的電訊，充分反映了山西、江蘇、湖南、廣西、雲南、陝西、北京、上海、青海等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重慶、武漢、哈爾濱等重點城市知識分子狀況和黨的知識分子工作的情況。[55]筆者還在上海市檔案館看到兩份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調查報告，在吉林省檔案館看到地方領導人在省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總結發言。這些報道或報告為研究者了解當時中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以及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材料都是在〈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下發後寫出來的，對於知識分子的基本判斷沒有超出中央的口徑，檢查知識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偏向」，也基本上限於「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六個方面。

4 各地調查的反映及迴避的問題

各地檢查知識分子工作都立足於這樣一個基本的政治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共中央12月16日指示的影響，即認為經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黨外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北京市委報告說：經過思想改造，「北京市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和思想面貌，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們的絕大多數「都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56]吉林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1955年12月25日在省委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發言中說，「全省高級知識分子的隊伍面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後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1699名高級知識分子中，進步分子大體上要佔40%左右，中間分子大約佔35%左右，落後分子大約佔20%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動分子一般不超出5%到10%。[57]來自重慶市的報告說，重慶2460多名高級知識分子中，「積極分子和中間分子佔絕大多數」。重慶大學講師以上的人員114

人，其中進步分子54人，佔47.4%；中間分子43人，佔37.7%；落後分子12人，佔15.5%；壞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僅佔4.4%。[58]雲南省的估計比較悲觀，認為全省高級知識分子中，進步的佔20—30%，中間的佔30—40%，落後的仍佔20—30%，反革命分子約佔5%。[59]江蘇省的估計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約佔50%，中間的約佔35%，落後的（包括少數反革命分子在內）約佔15%。[60]這些數據是否準確、可靠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進行政治排隊的做法本身，就說明中共在整體上是把高級知識分子視為異己力量的。不過，有一點是與以往不同的：各地的分析都承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進步，積極分子和中間分子增多，落後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為減少。正是基於這種估計，各級黨委的關注點，開始從警惕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轉向檢查自己在知識分子工作中的「缺點和偏向」。

各地反映出來的問題，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信任問題，即所謂「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從各地反映的情況看出，儘管高級知識分子大多或主動或被動地表示了對新制度的順從，仍然難以取得中共各級黨組織的信任。普遍反映，幹部對知識分子建國以來政治上思想上的進步「估計不足」。一些人以「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的思想一成不變地看待知識分子。[61]上海的材料反映，對知識分子中政治歷史和社會關係的問題，常常不加分析地與反革命問題混淆在一起，對「落後表現與反革命表現常常區別不清」，「運動中打擊面過寬」，「可以不傷感情的人也傷了感情」。「三反」時，華東紡織管理局的技術人員「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被不同程度鬥爭過」。[62]不僅對高級知識分子不信任，對中、小知識分子包括農村中小學教師，也同樣如此，甚至更為嚴重。如江蘇省第三次農村宣傳工作會議反映，「一般幹部都認為知識分子是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出身，歷史複雜，不可信任」；「邳縣有二百多小學教師無選舉權」；有些地方談到知識分子時「先問成份」，如是地主、富農，則「罪加一等」。[63]

這種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共對知識分子總體估計的影響外，也來自工農出身的中共幹部對知識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幹部中，對知識分子普遍存在雙重心理：一是輕視，二是害怕。江蘇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國家留過學的老教授、研究員、工程師等看作是「資產階級的樣子，官僚主義的架子」，工程師是「簽簽到，批批號，到期拿鈔票」的人；一方面又「認為知識分子難領導、難相處」，「不敢對知識分子做報告，不敢和高級知識分子接觸」。南通縣宣傳部長說：到學校去工作有顧慮，「感到沒話講」。陝

西流傳的一個說法十分典型：許多黨員負責人認為，高級知識分子是「看起來不順眼，用起來不順手」。[64]

中共幹部的不信任，使知識分子，包括積極靠近黨的知識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華東紡織管理局總工程師室一級機電總工程師陸芙塘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裏話：「我們和領導之間，總有一條鴻溝，雖寬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黨，（但）好像黨有些不願伸手的樣子。」紡織一廠一個技術人員說得更直接一些：「我們和領導同志之間是面和心不和，見面都很客氣，但從來沒有深談過。」華東紡織管理局的調查報告認為，「這些話相當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們黨的領導者和技術人員之間的一般關係」。[65]重慶市反映，不少高級知識分子認為「領導上把自己當外人看」，「組織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為普遍，「好像只幫黨的忙似的」。陝西省的高級知識分子普遍認為：「黨員是『畏友』不是『密友』。」廣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則說：「在新時代裏，知識分子像一個新嫁娘，又喜歡，又害怕，想驕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麼多，找缺點的人畢竟多，給予同情關懷的人畢竟少，這樣三天下廚打爛碗的機會也畢竟多一些了。」[66]中共與高級知識分子的真實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各地反映的另一個情況是，在高級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的問題上，中共各級組織普遍採取了關門主義的政策。北京市高級知識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許多是國內外著名的學者、教授、工程師、醫師、作家、藝術家，僅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就有153人。新政權建立後，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產黨，在全國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樣存在着關門主義的傾向，不少人雖「再三申請入黨，也沒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學，只發展了極少數的教授入黨，且以種種原因使他們四、五年不能轉正。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慶市西南師範學院和西南農學院曾有16位教授寫了入黨申請書，不少老教授表示「以餘年獻給黨」，卻始終沒有得到黨組織的青睞，不少單位沒有發展一個黨員。全市八所大專學校的259名教授中，只發展了一個黨員。陝西省八所高等學校、南京市九所高等學校幾年來沒有吸收一個教授入黨，湖南則全省沒有吸收一名教授，河南省也只發展了一名教授。江蘇有些縣委組織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時公然宣布「在教師中不建黨」。這種關門主義使許多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很受挫折，難怪哈爾濱市有高級知識分子說，「捧着豬頭進不了廟」。[67]

二是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問題，即所謂「安排不妥、使用不當」。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響到對知識分子的使用。高級知識分子用非所學，專業知識和技術專長得不到發揮的現象不是個別的。據薄一波表示，中共中央專門組織人員進行調查，寫出了許多有關的專題報告。如

一位擅長水墨花鳥畫教學的著名畫家、教授，所在美術學院卻不讓他開課，而派他到圖書館去寫書籤，到陶瓷科去畫瓷碗，後來幹脆由工會安派他去給教職員工買戲票。上海第一重工業局業務處有二十三名工程師，其中十六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學術上有建樹的甾體化學家，卻被分配做應用化學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種田」之感。有些科學家、教授的社會活動過多，如著名科學家錢三強當時很少有時間從事科研工作，內心十分苦悶；協和醫學院婦產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職多達十三項，嚴重影響她的醫療、教學和研究工作。更不可思議的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失業現象，據北京、天津、廣州等128個城市統計，失業的高級知識分子竟有3005人。[68]這種現象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業或用非所學的情況如：廣東大埔縣有一個留學比利時的工程師得不到工作安置；佛山市重修「祖廟」時，雕塑家布柏生被分配在建築工會裏當雜工；海豐縣有九個大學生當了售貨員；佛山市共有二十四名大學程度以上的知識分子，其中有十四人失業。海南地區有的部門分配大學生做記賬、收發或掛號工作。馬祖銘曾在北京大學做過中文教授，江蘇徐州地委卻分配他在工農幹部學校教初小的語文，結果學員們在上課時聽不懂，就批評他：「大學教授連初小都教不好」。蘇州市把做過大學教授的沈維鈞，分配在園林管理處做辦事員。兼職或社會活動過多的情況如：江南水泥廠的工程師張陽谷，一個星期參加了二十九個大小會議；南京大學校長潘菽，身兼十一職，經常在外面跑；南京師範學院院長陳鶴琴，身兼十六職，一個學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校工作；南京農學院院長金善寶，過去身兼十八職，現在兼十三職，別人都說他是「會議校長」。而西北醫學院院長侯宗濂，兼職竟達二十四個，一年有七、八個月在外面開會。有的老教授因為科學研究時間太少，心情十分苦悶。天津棉紡二廠的技術幹部的技術工作時間僅佔二至三成，有時一個人一天開五、六個會，有的車間主任四天不下車間，光開會。[69]如此等等。

這種高級知識分子用非所學甚至失業的狀況，是對奇缺的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還有一種令人不能容忍的隱形浪費現象，就是許多知識分子雖在其位，卻不能謀其事。武漢市反映，「在工廠內部，有的工程師可以參加畫圈，但不能下現場。在學校中有的可以在課堂上教課，但不能到工廠實習，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學裏系主任不如系秘書（黨團員）有權」。哈爾濱市反映，「在學校中，有些非黨系主任的意見，黨員幹部說『沒接到黨的通知』就不執行」。有的工廠「高等技術人員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往往不研究，不採納，一律認為是不願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山西省的材料說，太原礦山機器廠科研人員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對技術問題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進行表決」。[70]

三是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涉及這個問題的材料不太多，反映的情況也不盡相同。有的省市認為在這方面問題不大，如重慶市反映，多數高級知識分子對生活待遇沒有大的意見，他們認為，「國家的錢的確用到建設上去了，一般黨、政負責同志和工作人員生活也是艱苦樸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來年，已經算不錯了」。天津有些高級知識分子也認為，生活待遇「比抗日戰爭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給制幹部就沒話可說了」。但這很有可能是不真實或不全面的反映，因為在同一篇報道中還談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難的，「雖有意見，但不敢公開講」。有些省市則反映出強烈的不滿情緒，所提意見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沒有正常的晉級制度，一是待遇差別不合理。江蘇省有些人對六年來不晉級「很不高興」。太原鋼鐵廠三十二個工程師中只有兩人升了級，二十多個一級技術員沒有一人升級。安徽、河南等省都反映，缺乏工程技術人員的技術標準和妥善的晉級制度，很多人長期得不到晉級。此外，武漢的工程師、教授普遍反映，在工資待遇上地區之間和工程之間的差別很大，東北、上海同一級別的工程師、教授的待遇比武漢高許多。相對於高級知識分子，中、小知識分子，特別是小學教師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蘇江都縣灣頭區58個小學教師，只有一個中心小學的校長月薪拿36.3元（比國家機關二十四級幹部待遇還低），其餘有3人拿32元（相當於二十五級幹部待遇）；22人拿26元（相當於二十六級勤雜人員待遇）；還有21人只拿20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有時甚至靠借高利貸度日。他們自嘲：「光榮愉快偉大的嘴，悲觀失望痙攣的心。」[71]

仔細翻閱和對比這些材料不難發現，儘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檢查知識分子工作中的問題，但都迴避了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對知識分子造成的傷痛，以及知識分子最為珍重的學術思想自由的問題。就目前筆者所見，只有江蘇省的兩份材料謹慎地提到了知識分子在以往政治運動中承受的打擊及其後果的問題。如有些單位在肅反運動中，打擊面太寬，產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禍從口出」，不敢講話，不敢與人往來；蘇北師範專科學校在肅反中對教師採取「普遍地大膽懷疑的態度」，結果是「不講不鬥，愈講愈鬥」，打擊面擴大到14.8%。「很多縣初步排隊，中、小學教師中有問題的達百分之四、五、六十，凡是過去自覺交代的材料都當做罪行，認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72]其他省市的材料則一概迴避了這個問題，有的報道甚至以贊同的口氣談到，在肅反運動中，「高級知識分子中的重點對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73]這種現象是不難理解的，在中共幹部的理念中，承認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極大進步，正是以完全肯定以往針對知識分子的一系列改造運動為前提的，而把這種進步看作是

這些運動的積極成果。況且，即使是經歷了如此深刻的改造，按照各地黨委的估算，在知識分子中仍然有20%左右的落後分子，5%左右的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區（如雲南）估計，這兩種知識分子竟達到25—35%！[74]如果按照一般估計的比例來計算，那麼在全國十萬名高級知識分子中，就有二萬個落後分子，五千個敵對分子。這個結果是否符合實際狀況暫且不論，就憑這種思維模式，大概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知識分子政策、解決知識分子的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儘管意識到知識分子工作存在嚴重問題，但中共並沒有忘記對「反動」知識分子的警惕。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前夕，1955年12月21日，毛澤東仍然對尤金大談階級鬥爭問題：「自然，必須戰勝階級敵人的反抗行動。整個1955年和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裏，將鎮壓大約二百萬名敵對分子。這個數字不包括1955年在對城市機關和社會組織進行清查時揭露出來的那些反革命分子。」[75]看來，雖然需要重用知識分子，但中共並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12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召開知識分子工作幹部會議的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省委書記富振聲在談到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時指出，承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是不是就認為高級知識分子中在政治立場、思想觀點上都沒有問題了呢？就可以忽視對高級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任務呢？不是的」。因為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指示（草案）〉中的說法，「必須看到，不但中間分子，就是進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也還有程度不同的資產階級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還必須對他們進行長期的艱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上的鬥爭，以便繼續幫助他們改造自己，逐步地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分子」。所以，省委強調：

> 我們要反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右傾保守主義，但也不能否認過去「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的進步所起的重大作用；過去的成績是主要的，不能因為過去工作中有某些缺點，就否定一切。……肅反中，許多單位檢查，鬥爭面過寬，重點對象大大超過了中央指示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數字。各單位應立即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進行複查，重新排隊，端正政策；但同時在具體單位，又要根據中央指示草案中規定的界限，實事求是地加以區分，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漏網。工礦企業的專案小組，按中央規定，應吸收黨員工程師參加，不應吸收非黨知識分子參加。各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關、工廠礦山、基建單位必須按中央指示，認真領導肅反鬥爭，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76]

這種態度和立場，預定了即將開始調整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時也決定了已經進行的知識分子問題調查的內容。總之，以往對知識分子的打擊以及由此給他們造成的痛苦，是中共幹部和知識分子本身都不

願或不敢啟口的。至於知識分子追求的學術思想上的自由問題，更是人們絕口不談的——大概高級知識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計中共幹部也不會給予理解。無論如何，這次大規模調查反映了不少情況，但與知識分子的真實思想狀況還是有相當距離的。

5 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及思想變化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談到中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時說：「知識分子和國家政權的關係，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爭執不休的的問題。我們只要回憶一下西方經驗是如何複雜和多種多樣，就不難看出在中國情況同樣是複雜和多樣化。如果我們不能看出這一點，那只不過是由於我們的無知罷了。」[77]的確，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的關係在任何國家都是糾纏不清的，而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尤其如此。

中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為數不多，大體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區參加地下黨，成為黨內知識分子。這是一小部分，且後來大都脫離了知識界，走上了各種領導崗位。另一部分是自由知識分子，佔多數，他們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據統計，在1956年初十萬高級知識分子中，黨外知識分子佔93%，建國後增加的數字約佔35%。[78]在新舊政權交替之際，多數高級知識分子選擇了留在祖國大陸。1948年當選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八十一人，留在大陸或新中國建立初期回到大陸的六十人，佔院士總數的74%；去美國的十二人，佔15%；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的僅有九人，佔11%。[79]既然留在大陸，按周恩來的話說，「除了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一道，並沒有甚麼別的出路」。[80]當然，他們作出如此選擇，並不只是因為故土難離。從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不管他們的階級出身、政治信仰和所受教育多麼複雜，多麼不同，總體來說有一個共同的傳統，就是愛國。雖然不見得認同共產主義，甚至心存疑懼，但他們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腐敗，卻是實情。

因此，多數人選擇了歸順中共新政權，希望有為國家效力的機會。許多滯留海外抱有科學救國理想的知識分子對新中國心往神馳，感到報國有門了。他們衝破西方國家的重重阻力，放棄在海外優裕的生活和學術條件，毅然歸國。1950年2月，數學家華羅庚在回國途中發出〈致中國全體留學生的公開信〉，信中說：「朋友們：『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

發展而奮鬥！」1950至1953年，約有二千名留學生回國，成為發展新中國科技事業的骨幹力量。[81]至1955年11月，回國的海外高級知識分子多達1536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有1041人，許多人後來成為中國各類科學研究的奠基人或學術界泰斗，如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吳階平、汪德昭、鄧稼先、吳仲華等。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後，於1952年被任命為地質部長。著名導彈專家錢學森的回國更是破除了艱難險阻。錢本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決心歸國，投身祖國的建設事業，但遭到美國政府強行阻撓。1955年6月，錢學森通過外國朋友請求中國政府幫助他回國。周恩來立刻指示在日內瓦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通知美方說中國將提前釋放十一名美國戰俘（飛行員），要求美國政府取消對錢等歸國的限制。同年10月，錢學森歸國，周恩來立即委託他組織力量開始導彈研製工作。[82]

中共掌握政權初期，人民解放軍秋毫無犯，中共幹部清明廉潔，國家高層領導人禮賢下士，給人一種欣欣向榮的感覺。許多原來心存疑懼的知識分子，似乎在一夜之間轉變了看法。他們對解放軍進城和新中國成立，表現出高度的熱情。中華民族多年來追求獨立和統一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國家重建即將展開，在知識分子心中燃起了希望。許多人為自己在新政權的建立中了無尺寸之功而產生愧疚感，甚或罪惡感。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季羨林教授的回憶感人肺腑且很具代表性：

> 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
>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甚麼事呢？我做出了甚麼貢獻呢？......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豈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
>
>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83]

進城之初，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相當寬厚。原本在大專院校教書的，仍然教他的書，原來在機關單位任職的，也續任其職，一切維持原狀；失業知識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顧。中共還把知識分子分別編入自然科學工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聞工

作者等協會。其中比較特殊的是文學藝術界的社會團體。參加文藝界聯合會及其下如作家協會這種團體，不但不用繳納會費，反而像進入政府機關一樣，有固定薪資可領，作品也有該團體的刊物可供發表，甚至一年半載沒有創作，也用不着擔心飢寒凍餒。[84]一份關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收入變遷的研究表明，北洋政府時期，教授薪俸相當於中央政府部門的科長；南京政府時期，教授薪俸相當於一等縣長、省政府秘書科長、省轄市政府局長等；新政權建立後，教授工資相當於中央副部長級。[85]這說明，相對於政府官員來說，中共執政後給予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是較高的。台灣學者陳永發認為，中共通過「包下來」的政策，成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氣響亮的知識分子深感知遇之恩。陳永發舉例說，民主同盟的羅隆基投奔中共以後，享受四級幹部的待遇，只是獨身生活，卻擁有一個秘書，一個廚師、一個司機、一個護士、一個保姆、兩個警衛，外加一部汽車，以及前北大校長的私人四合院住宅一棟。這種優渥的待遇，加上官位和職務，決非國民黨時期「貧窮化」以後的羅隆基所能想象的。難怪羅隆基對中共政權感恩戴德，對毛澤東尤其感激涕零。重慶時代因為反蔣而遭囚禁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於1951年被中共延攬為北京大學的校長，他也有同樣的感覺。[86]

自然，中共如此優待高級知識分子，是要為我所用，所以，抓緊對他們的改造也是必然的。對於建國之初中共發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知識界究竟是被迫承受還是主動反省？陳永發的估計看來是比較客觀的：大概在運動之初，主動反省成份多於被動承受。正是由於愧疚和感恩的情結，許多高級知識分子承認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願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較溫和的思想改造要求。還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學家朱光潛率先在《人民日報》發表自我檢討，隨後費孝通和馮友蘭等人，也都紛紛自我批判，公開宣布與舊的自我及舊的社會一刀兩斷，並決心按照新社會的需要重新創造自我。[87]1951年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實際上就是由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首先在北大師生中發起的。當時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自發組成「教師學習會」，並通過馬寅初邀請周恩來到校講演。9月29日，周恩來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師聽取報告。周的謙虛謹慎、諄諄善誘，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歷程，「說的是那麼真摯，那麼中肯」，使「聽者莫不感動」。[88]正如陳永發說：「知識分子因為心中的愧疚而承認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們對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與其說是抗拒，毋寧說是歡迎。」[89]

然而，接下來的群眾運動卻無法使人心悅誠服、感恩戴德。有學者

認為，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帶給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知識分子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90]不過，真正的傷害還在後頭：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批判「紅學家」俞平伯，這一系列的政治圍攻，使知識界感到的壓力與日俱增。毛澤東要使資產階級思想「名聲掃地」，事實上也就是使知識分子「名聲掃地」。批判胡風和肅反運動把這種政治攻勢推向了高潮。

1955年2月，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公開批判演變成政治上、組織上的「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思想改造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了。胡風本人於同年5月18日被逮捕，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2100餘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後正式定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有78人。[91]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公布以後，高級知識分子普遍持懷疑態度。南開大學中文系老教授孟志蓀說：過去我一直認為胡風是反蔣的，算是進步分子。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李何林仍不承認胡風是反黨分子，說胡風過去是反蔣的、進步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公布後，清華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部分教授、學生提出很多疑問，如胡風是否與帝國主義或國民黨有聯繫？是否托派？與蔣介石反革命集團有何區別？今天黨這樣強大，胡風為甚麼還敢這樣？既然是反革命為甚麼過去還受國民黨迫害？為甚麼還有這樣多的黨員跟他走？[92]

接着，在全國開展肅反運動，形成一片肅殺氣氛。中共認為，「利用胡風事件，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來進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是正確的」，運動的發展也是「健康的」。其成效是，僅僅兩個多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還發現了為數甚多的小集團。[93]根據中宣部長陸定一後來向蘇聯通報的情況，在中共中央劃定的範圍內，工人、職員、現役軍人、科學工作者、大學生，一直到鄉一級的所有幹部，都屬於肅反審查之列，擬定全國總共審查1200萬人。審查於1955年6月開始，到9月中旬時，已經「仔細審查了」222萬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萬人，揭露出11000個集團和派別。[94]

這裏，最受「關注」的是「五百萬知識分子和幹部」。不但一般知識分子必須參加肅反，大學和中專的學生也必須參加坦白檢舉運動。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歷史、社會關係比較複雜，受審查、被牽連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共中央的規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95]

這在運動中實際上成了各部門、各地區必須達到的最低目標，而實際人數則遠遠超出了這個比例。據1956年1月各地向中央匯報的數字，

在參加肅反運動人員中被鬥爭的人，在山西為5.5%，河北6.4%，貴州7.5%，雲南9.6%，廣西14.1%，有的專區（福建龍溪）內定的鬥爭對象則高達30.9%。特別是對高級知識分子的鬥爭面更大，如河北省20.9%的教授，20.97%的工程師，都被列為重點鬥爭對象。這個比例，在貴州省工業廳工程師中竟高達58%。[96]

即使那些「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學者也不能倖免，按照陸定一的通報，在對學術機關進行清查的過程中，擬定受審的著名學者就有250名。不過，「對這些人的審查將通過特殊方法進行」，不讓他們參加鬥爭大會。他們還有用，「對他們應該容忍」。[97]

這些運動未必能打碎知識分子埋在心底的獨立人格和批判意識，但他們不得不表示屈服。確如費正清所說：「現代心理學家能夠闡明，困苦的生活、長期的不安全感和緊張情緒，加上持久的心力交瘁和反覆的思想灌輸，會怎樣摧毀一個人的內在個性和產生種種壓力，對此，大多數人只有屈服於權威，至少暫時接受新的態度和觀念，此外別無出路。」[98]

這時，知識分子已經顧不上為胡風抱不平，而輪到自己擔驚受怕了。事實上，不只是被重點審查的對象，所有知識分子都為之驚悚。他們從舊社會來，總有「複雜」的社會關係和說不清楚的「歷史問題」，許多人「心驚膽跳」，「畏罪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99]季羡林回憶說，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時，「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起來，甘願作輪下之鬼」。[100]過了近三十年，作家巴金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還說：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101]肅反運動給知識分子帶來的恐懼，可想而知。

1955年秋天以後，聲討胡風和肅反運動最狂暴的階段過去了。然而，「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志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受到嚴重挫傷」。[102]他們不理解共產黨為甚麼要把知識分子作為主要打擊對象，為甚麼思想改造要採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種孫後來回憶說，肅反以後，「最令人傷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學間幾乎不敢來往，像一盤散沙，沒有黏性」。董渭川教授也談到：「肅反過後，使有些人有了顧慮，愈是相熟的人，見了面，除掉談談天氣之外，國事、校事一概『三緘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辮子，說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103]肅反運動也打擊了知識分子鑽研業務的積極性。肅反後期，批判「單純業務觀點」，強調「突出政治」，許多「只問業務、不問政治」的著名學者受到批評，被迫公開檢討。在如此

惡劣的環境中，不僅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領域內的知識分子也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之中。文藝界是最脆弱、最敏感的領域，大批判後的蕭條表現在文藝上也就最顯著。在反胡風的鬥爭中，又揭出所謂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問題，更增加了文藝界的緊張氣氛。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擱筆不寫，解放區來的作家也屢受批判，文藝作品不但數量少，而且題材狹窄，主題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畫公式化，作家「只能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斷現象，敷衍成一篇小說」。文藝批評家們更陷入動輒挨批的境地，有的人「處處擔心，唯恐『失足』」，表現出「可驚的慎重」。人們「失去了對社會、對文學事業的責任心」，連《文藝報》的「戰鬥」特色也在消退，而這樣的問題，「從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後期開始萌芽，最近四個月才比較突出」。[104]

這些材料說明，批判胡風和肅反運動確實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性的疑慮、壓抑和恐懼，他們對此極為不滿。肅反運動的擴大化後來成為1957年人們「鳴放」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明證。然而，在1955年底中共各級組織作知識分子問題調查時，卻幾乎沒有一人反映這個問題。究其原因，中共幹部的認識局限是一個問題，更主要的恐怕是沒有人敢於表露自己的內心世界。許多人抱定了不說話的態度，昆明市教育界人士的心態在當時是很正常的：「共產黨對我們的辦法是三年一大整，一年一小整。」他們估計共產黨到1958年又會大整一次，因此訂了個人的三年計劃，「三年內不發牢騷，不出風頭，不暴露思想」。[105]沒有真實的和客觀的信息為依據，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效果必然會大打折扣。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22。

[2]李慎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118。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500。

[4]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最近解密了大批有關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的檔案文件，使研究者有可能對上述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5]儘管中國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蘇聯事先就日內瓦會談可能涉及的相關問題與中國進行了協商，見洛馬金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1955年7月15，18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п.11, д.394, л.274-276, 291-292。關於這次會議的最新研究，見ГоръковЮ.А. Беседы Г.К. Жукова и д. Эйзенхауэра на женевском совещании 1955г.//Новая и иове-йшщ 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no.5。

[6]《人民日報》，1956年1月2日。

[7]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9-17.

[8]筆者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研究，參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9]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指示，1955年10月11日。

[10]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會議上的講話（速記草

稿），1955年11月24日（以下簡稱毛澤東1955年11月24日講話）。

[11]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77—77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521—522。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2。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37。

[14]肅反運動從1955年夏天到1958年底共分四個階段進行，1955年夏秋的第一階段是高潮。對運動進行總結時，中共注意到肅反中出現了「鬥爭面過寬」和「處理上有偏嚴現象」的問題。參見各省市、中央直屬機關、軍事系統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簡報（之一），1956年1月22日，陝西省檔案館，123-40-43，頁19—21。

[15]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6—237。

[16]周恩來在政協一屆十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5年11月4日；《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7。

[17]《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7。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19—520。

[19]毛澤東1955年11月24日講話。

[20]參見羅申與陳雲談話備忘錄，1949年10月28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58-62。

[21]據統計，包括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衛生、文學藝術等各條戰線上的高級知識分子，1949年僅有6萬多人，1955年增加到10萬多人。有些部門科技幹部增加得相當快，如地質工作人員從解放初期的160多人增加到497人。解放初期全國的科研機構（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內），總共才40個左右，研究人員只有650多人。到1955年，全國科研機構發展到380多個，研究人員增加到9000多人，學科門類也有所增多。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98—499、502。

[2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10。在10萬多高級知識分子中，講師以上的教育人員31000多，主治醫師以上的衛生人員約有25000多，助理研究員以上的科學研究人員約有3000多，工程師以上的工程技術人員31000多，高級的文化藝術人員6000多，其他專家約有5000人。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2月1日。

[23]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64。

[2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00。

[25]此後，根據中方的要求，蘇聯派到中國的專家和顧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1954年10月到1960年間，總計達13000多人次。參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頁408—409。

[2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02—503。

[27]從1956年開始，一些中共領導人就對大量使用蘇聯專家表現出擔心和不滿，並有意減少聘用蘇聯專家的數量。進一步的分析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頁253—279。

[28]《人民日報》，1955年12月4日。

[2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00。

[30]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頁39。

[31]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153。

[32]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88, д.19, л.63-65.

[33]毛澤東關於「皮毛」理論最經典的論述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52—454。

[34]王來棣說：「毛澤東從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從未上過大學，為謀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學就任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僅8元（那時北大教授的月薪為200至300元）。這段工作經歷讓毛感到自尊心深受傷害。」「這種屈辱感轉化成了對成功的知識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參見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頁41—42。而這一觀點首先來自

謝泳的研究。參見謝泳：《逝去的年代》，頁191—193。

[35]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有關論述頗多，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676—1681，1683—1695。

[36]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п393, д.9, л.24-30.

[37]《人民日報》，1956年1月15、20日。

[38]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20日（以下簡稱毛澤東1956年1月20日講話）。

[39]據教育部統計，截至1950年8月30日，尚在國外的留學生有5541人，其中美國有3500人，日本有1200人，英國有443人。李四光、華羅庚、趙忠堯、老舍、錢學森就是這個群體的傑出代表。參見于風政：《改造》，頁10。

[40]《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3。

[41]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60。

[4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24。其他兩個問題是政府的組織形式和工資問題。

[43]《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8。

[4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22—523。

[45]《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23。

[46]熊華源：〈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會議〉，《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頁15。

[4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23。

[48]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1003—1004。

[49]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10。

[50]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9—240。

[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76。

[52]《周恩來傳（1949—1976）》，頁242；熊華源：〈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會議〉，頁15—16。

[53]《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9。

[54]謝泳曾在舊書攤上見到過一些散落的有關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簡報，其中就有各地匯報的情況報告，他還購買了一本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考資料（第二輯）》（1956年1月）。知道筆者正在研究這個問題，他便慷慨相贈，筆者謹在此表示感謝。

[55]《內部參考》，1955年12月29日、31日；1956年1月10日、11日、13日、16日、21日、25日、31日。《內部參考》在1949年創刊，1964年停刊。當時只供中共高級幹部閱讀，現已成為史料，在一些海外圖書館可以看到。筆者引用的相關資料，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查閱和複印的。

[56]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938。

[57]吉林省檔案館，1-11/1-1955.55，頁57—70。

[58]《內部參考》，1956年1月10日，頁28—30。

[59]《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頁45—47。

[60]《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頁38—41。

[61]《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頁38—41。

[62]上海市檔案館，A22-2-516，頁219—224。

[63]《內部參考》，1955年12月29日，頁284—290。

[64]《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頁38—41、43—45；1955年12月29日，頁284—

290。

[65]上海市檔案館，A22-2-516，頁219—224。

[66]《內部參考》，1956年1月10日，頁28—30；1月11日，頁43—45、49。

[67]《內部參考》，1955年12月29日；1956年1月10日、11日、21日。

[6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01—503。

[69]《內部參考》，1956年1月10日、11日、16日。

[70]《內部參考》，1956年1月10日；1955年12月31日。

[71]《內部參考》，1956年1月10日、11日、21日；1955年12月31日。

[72]《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頁38—41；1955年12月21日，頁284—290。

[73]《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頁47—49。

[74]《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頁45—47。

[75]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д.9, л.13-14轉引自Кулц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НДВРАН, 2000, с.149 。

[76]吉林省檔案館，1-11/1-1955.55，頁11—19。

[77]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頁341。

[78]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10；《人民日報》，1956年2月1日。

[79]于風政：《改造》，頁6—7。

[80]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62。

[81]于風政：《改造》，頁10—11。

[82]《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5。

[83]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245—247。

[8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78—79；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661。

[85]馬嘶：〈中國知識分子的收入變遷〉，《中外書摘》，2003年第12期，頁81。

[86]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661。關於「包下來」的說法，參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156—157；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62。

[87]《人民日報》，1949年11月27日、1950年1月3日、1月22日、10月11日、12月2日。

[88]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頁230—232。周的報告見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59—71。

[89]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658—659。

[90]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見思想評論網站（www.sinaliberal.com）。

[91]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答覆報告〉（1980年9月29日），轉引自李輝：《胡風集團案件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頁3；劉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222。

[92]《內部參考》，1955年6月6日，頁55、56。

[93]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上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頁388—393。

[94]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д.9, п393, л.195-197，轉引自Кулц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с.148-149。

[95]羅瑞卿在各省市委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56年7月5日，陝西省檔案館，123-40-15，頁78—87。

[96]陝西省檔案館，123-40-43，頁19—21。

[97]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д.9, п393, л.195-197,轉引自Кулк. Совеско-ки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с.148-149.

[98]費正清（John K. Fainbank）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第四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277。

[99]中央十人小組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承認，在肅反中自殺死人的情況比較嚴重。陝西省檔案绾，123-40-1，頁128—132。

[100]季羡林：《牛棚雜憶》，頁249。

[101]《文匯月刊》，1986年10月。轉引自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頁37。

[102]于風政《改造》，頁429—430。

[103]《師大教學》，第114、123期，轉引自于風政：《改造》，頁429。

[104]《文藝報》，1955年第4、3、23號，轉引自于風政：《改造》，頁430。

[105]《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頁45—47。

二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與知識界的最初反應

1956年1月14至20日，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二十七個省轄市市委書記或副書記，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負責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國家機關各部門、全國性群眾團體的黨員負責人；全國重要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關、設計院、廠礦、醫院、文藝團體和軍事機關的黨員負責人。開幕式由劉少奇主持，以後由周恩來主持。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主題報告。1月16至20日，會議展開討論，大會發言者前後達六十一人之多（另有二十九人印發了發言稿）。周恩來的報告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和十一個專題報告也是討論的主要議題。大會最後一天，陸定一、陳伯達、李富春、彭真、陳雲先後發言，毛澤東到會作重要講話，最後由周恩來作結論。這是一次黨內會議，其規模之龐大，規格之隆重，為建國以來所罕見。楊尚昆日記記載：「從去年下半年起，中央連續開了幾個大會，以這次大會的人最多、方面最廣。」[1]足見中共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堅定決心。

1 中共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及其新政策

中共中央知識分子政策調整的基本精神，主要體現在周恩來作的報告中。這個報告是由周恩來主持、胡喬木執筆寫成的。1955年11月30日，周恩來自己起草了一份提綱，12月17日、19日，兩次約胡喬木談報告的起草問題。1956年1月上旬，胡喬木寫出報告初稿。1月6日、9日、10日，周恩來召集十人領導小組會議進行了三天的討論修改。1月12日、13日，周恩來動筆修改並增寫一些內容，如強調「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應該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培養出大批的堅決為社會主義奮鬥的紅色專家」，提出「隨着洶湧澎湃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而來的，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等等。[2]目前沒有材料可以證明毛澤東是否看過這個報告稿，或者有甚麼具體意見。毛當時關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農業發展綱要草案。1月8日和9日，周恩來先後收到毛澤東兩封來信，都是關於討論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並要求「發給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到會各同志」。按常規，周的報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到通過才能提交大會，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為此證明。查《周恩來年譜》和《劉少奇年譜》以及其他文獻，都沒有

發現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過這份報告及其他有關的會議文件，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3]顯然，報告貫穿了周恩來本人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基本想法，但它畢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見，因此其中必然會協調黨內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各種不同看法。

周恩來的報告，坦言當前面臨的一個矛盾，即各類專業人才的匱乏。報告認為，當前知識分子的力量，在各個方面「都不足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急速發展的需要，而我們目前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現象，特別是一部分同志對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更在相當程度上妨礙知識分子現有力量的充分發揮」。他明確地指出，這次會議的目的正是為了「加強領導，克服缺點，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4]報告把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確立在三個基點上：

第一，指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中國必須急起直追。報告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講科學工作。中國由於朝鮮戰爭而處於被封鎖的狀態，但這並不意味中國領導人昧於世界的發展。像周恩來這樣與西方有直接接觸的領導人，對於世界科技發展之迅速，中國與此差距之大，有深刻的認識和感觸。他提醒代表們說：「世界科學技術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面很遠。」周不僅強調「現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飛猛進」，而且具體地列舉了當今科學技術在各個領域的發展狀況。他指出，「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類面臨着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其意義「遠遠超過蒸氣和電的出現而產生的工業革命」。這說明，當時中國領導人對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時代意義有準確的估計。周恩來以異常緊迫的心情呼籲：「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長的時間裏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我們黨和全國知識界、全國人民的一個偉大的戰鬥任務。」他說：「只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條件同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一起，無論在和平競賽中或者在敵人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戰勝帝國主義國家。」這就是說，誰想在當今世界的經濟、政治、軍事的劇烈競爭中取得主動和勝利，就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如此明確、尖銳和深刻地提出問題，在中共建國以後還是第一次。

第二，承認1949年以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進步，其階級屬性發生了重大變化。報告確認，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這裏，周恩來提出了兩條依據：一是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識界的面貌

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前者是一個事實陳述，知識分子被「包下來」，也就自然成為拿國家工資，為國家服務的「工作人員」，這似乎沒有甚麽爭議。後者則是一個大膽的政治性判斷，這在黨內是有不同看法的。為了證明這個判斷，周恩來用相當的篇幅來說明知識分子何以發生了「根本變化」，還試圖用一些統計數據來說服全黨。這就是，目前「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擁護社會主義、積極為人民服務的進步分子約佔百分之四十左右；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夠完成任務，但是在政治上不夠積極的中間分子也約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兩部分合佔百分之八十左右。在這百分之八十左右之外，缺乏政治覺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的落後分子約佔百分之十幾，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約佔百分之幾。」從報告的邏輯看，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變化是對其進行思想改造的結果。

第三，批評中共黨內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要傾向是宗派主義。周恩來指出，黨內對待知識分子存在麻痹遷就和宗派主義兩種傾向，但後者是主要傾向。其主要表現為：低估了知識分子的巨大進步，低估了他們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作用，「不認識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對怎樣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進一步改造知識分子，擴大知識分子隊伍、提高知識分子的業務能力等迫切問題，漠不關心。周強調說，「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多、快、好、省地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周恩來特別提到當時普遍存在的「生產依靠工人，技術依靠蘇聯專家」，「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後反正不能馬上改變，反正需要蘇聯的援助」的想法。他批評說，這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賴思想」，必須首先打破。他說，我們需要蘇聯的援助，但如果沒有全面規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結果是一輩子不能脫離依賴和模仿的狀態」。我們必須「作出全面規劃」，「盡可能迅速地趕上蘇聯水平」。要發展科技，必須培養和使用自己的知識分子。周恩來說：「隨着洶湧澎湃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而來的，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黨一定能夠領導知識分子在科學文化事業中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

針對當前面臨的問題，周恩來在報告中提出了「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力量」的三項措施：第一，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第二，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第三，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必須保證他們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時）用在自

己的業務上。周恩來還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關心知識分子，積極吸收知識分子入黨，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確定和修改升級制度，擬定關於學位、學銜、發明創造和優秀著作獎勵等制度。

對於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工作，周恩來在會上作了分工：在國務院內準備設立一個中國專家局，負責需要中央統一解決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門不能減少他們直接處理的責任；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處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質的問題仍由各有關部門直接負責，中央宣傳部負責統一監督；在知識分子中吸收黨員的工作則由中央組織部負責。

周恩來關於趕超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的緊迫感，關於打破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賴思想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的思想。1月20日，即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到會講話。毛說，有兩種領導方法：一種使得我們的事業進行得比較慢一些，比較差一些；另外一種使得我們的事業進行得快一些，好一些。黨中央和各部的任務，都是要促進社會主義，不能是妨礙社會主義，應該是「促進部」，而不應該是「促退部」。所以，要反對右傾保守，各項事業要辦得「又多，又好，又快，又省」。要在科學技術方面有計劃地趕過外國。先接近，後趕過。毛再次提出趕超美國的問題，並說了一段鼓舞人心的話：

> 考察起來，還是我們這個國家有條件，地方大，人口多，就是這兩個條件。位置也不壞，中國這個國家應該搞成世界上第一個文化、科學、技術、工業各方面更好的一個國家。你這個位置、氣候也好，這麼長的海岸線，又聽說你們這個人吹的牛皮很大呀，甚麼勤勞、勇敢呀！幾十年，百把年以後不能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那你就不行呀。現在有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加上努力，為甚麼不可以呀？

毛澤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知識分子問題的，並批評了黨內存在的一種情緒：「老子打了一輩子仗，沒有你也行！」毛說，現在我們是革甚麼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文化，文化很低，無知，愚蠢，要革這個命，要技術革命，沒有你也行呀，沒有他們就不行了，這個很清楚，單是我們這些老粗那就不行。為此，毛澤東要求對黨員進行廣泛教育。還說，要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造出大批的知識分子和高級知識分子。[5]

周恩來也認為必須重用知識分子，不過，在談到改變知識分子政策的根據時，他似乎更強調的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階級屬性已經改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對他們的政策理應改變。這就比毛澤東進了一步，毛在講話中更看重的是科學技術要發展，國家要富強，必須依靠知識分子，因此對他們的政策只能改變。前者突出的是合理性，後者強調的是功利性。[6]高層領導人這種認識上的差異自然會

對大會參加者產生影響。這次工作會議規模很大，發言人也很多，但會議的效果卻有限。楊尚昆認為：這次會議比「以前幾次都較亂」，「發言不算很精彩，好的內容不多」。[7]大會發言反映出不同傾向，說明黨內的認識並不統一，這就預示了後來知識分子政策整體調整的局限性。

2 知識分子政策調整的局限

從認為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範疇，到承認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一味強調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承認黨內存在着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宗派主義傾向，反映了執政黨認識的重大轉變和提高。周恩來在報告中比較突出的就是這一點。然而，毛澤東的看法更具影響力，在黨內也更有代表性。從整體上看，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着眼於如何爭取知識分子為我所用，因而具有明顯的功利色彩。陸定一在發言中說得十分明白：「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為了使我國變成為先進的國家，而來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的。」[8]出現這種現象並非偶然。

首先，會議沒有就中國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在黨內達成共識。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對於中共和知識分子兩方面來說，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按照中共黨史專家龔育之的說法，「就有把知識分子視為社會主義革命對象」的危險。[9]其實，這裏不是可能性，而是必然性的問題。試想，知識分子掌握着中國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的知識和技術，而這種資源（或曰知識產權）卻不像資本家和地主的生產資料那樣可以剝奪，那麼，從理念上講，共產黨人要實現社會公有化，就必然把「異己」的知識分子本身作為革命對象。執政黨不把知識分子當作「自己人」，甚至還要作為革命對象，其結果無異於是在「自毀長城」。周恩來並非沒有看到問題的癥結，他的報告也試圖解決這個矛盾。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在談到知識分子的總體狀況時，報告認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但在具體分析知識分子狀況時，報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後分子佔百分之十幾，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約佔百分之幾，更何況還有百分之四十「在政治上不夠積極」的中間分子。這與「絕大多數」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總體判斷，在傾向上明顯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來這樣講是考慮到了黨內多數人的估計。這也從一個角度證實了龔育之的說法：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判斷，是周恩來在修改報告稿時自己加寫的。[10]

目前沒有材料可以說明毛澤東本人是否贊同「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提法，但黨內在這個問題上存有分歧，

則是當事人的明確感受。[11]還有其他文字材料可以佐證。當時高等教育部為準備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編寫了一份〈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重點分析的就是兩種類型的「中間分子」和「反動分子」。作為「中間分子」，點了北大教授王瑤、傅鷹的名，並描述了他們複雜的歷史背景和搖擺的思想狀態。作為「一般是政治歷史複雜並一貫散布反動言論」的反動教授，特別列舉了錢鍾書的各種「反動言論」，說他「在解放前與美國間諜特務李克關係密切，和清華大學所揭發的特務沈學泉關係也密切，曾見過『蔣匪』並為之翻譯《中國之命運》，還在上海美軍俱樂部演講一次。在解放後一貫地散布反蘇反共和污衊毛主席的反動言論；1952年他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他污衊毛選文字不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時，他說：『共產黨和蘇聯一夥，國民黨和美國一夥，一個樣子沒有區別。』他還說：『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鄉下餓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時還不如』；當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材料時，他說：『胡風問題是宗派主義問題，他與周揚有矛盾，最後把胡風搞下去了。』等等反動言論」。[12]這份材料表明，黨內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判斷仍然有相當的保留。或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在會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定稿的〈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裏，關於「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提法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13]雖然兩種提法精神大體一致，但顯然增加了很大的限制——「絕大多數」變成「基本隊伍」，「工人階級」變成「勞動人民」。同時也透露出一個信息：要全黨接受周恩來的提法是有困難和阻力的。值得注意的是，會議過後半年，毛澤東就提出，還是把知識分子「歸到小資產階級範疇比較合適」。[14]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劉少奇則提到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15]到1957年3月，毛澤東就明確指出：「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16]

其次，會議沒有反思和總結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的過火現象，更沒有觸及知識分子關心的肅反問題。客觀地看，當時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感情壓抑，情緒低落，主要並不是甚麼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問題（其實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並不低），而是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的挫傷。因此，中共要真正解開他們的思想疙瘩，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要對執政後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進行反思和總結，切實消除其負面影響。但是，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沒有這樣做，反而繼續肯定新政權建立後所有政治運動的正確性。關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周恩來的報告雖然主要傾向是承認「用粗暴的方法對待科學家和科學問題的現象，最近還有發現」，並指出思想改造應主要通過社會實踐和業務實踐

以及一般的理論學習這樣「三條道路」來實現，但不得不緊接着指出，在政治上「不可能沒有相當的鬥爭」，思想上「也不可能沒有尖銳的鬥爭」。報告僅僅指出了黨內「一部分同志對於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這一現象，而對產生「宗派主義情緒」的根源卻未作進一步分析。至於關於知識分子同黨之間存在「某種隔膜」的原因，雖然指出來自「我們的同志」與知識分子兩方面，但對前者，只以「沒有去接近他們，了解他們」一筆帶過，而着重指出的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採取了保留態度甚至反對態度」，且列舉其表現達九條之多。[17]

陸定一在大會發言中更是不加區別地對發生在1955年的一系列批判大加肯定，如在文藝方面批判胡風、陳企霞、丁玲、俞平伯；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批判胡適、杜威、梁漱溟；在衛生工作中批判賀誠、王斌；在自然科學方面批判「反動的生物學家胡先驌」；在建築學方面批判「梁思成的復古主度形式主義」等，對肅反運動更是不容置疑。陸定一認為，「這些工作，都是為社會主義革命鋪平道路，是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僅如此，在他看來，「經過鬥爭，文藝教育和科學事業是欣欣向榮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團結是增強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成長了而不是被壓制了」，文藝界「出現了新的氣象」，「從前所謂『創作枯萎』的悲觀論調已經破產」了。[18]還有中央政治局最後定稿的〈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除了批評黨內存在宗派主義傾向以外，同時也批評了「缺乏革命的警惕性」的遷就麻痹傾向。在提出要對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作適當的安排」的同時，還強調要「繼續改造他們」，繼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純潔知識分子的隊伍」。[19]

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這種對意識形態工作絲毫不作反思的態度，使得這次會議沒有真正把握知識分子的思想脈搏，「沒有觸及知識分子所苦悶、所焦慮、所痛心、所希望解決的迫切問題」。[20]

最後，會議也沒有觸及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問題。學術自由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而知識分子更把對社會的發言權視為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中，不僅知識分子對社會的發言權逐漸喪失，代之以對自身的不斷反省、改造，而且在純學術領域中自由討論的環境也遭到毀壞。對於這種現象，周恩來的報告基本上沒有觸及，倒是陸定一的發言談到了學術上自由討論的問題。作為宣傳部長，陸定一試圖劃清政治問題、思想問題與學術問題三者之間的界限。他在發言中指出，政治問題、思想問題都不能放過，但兩者之間也應有所區別，「對於沒有政治問題，但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要堅決進行思想鬥爭，但要採取和風細雨的辦法（包括等待）」。至於「學術性質的問題、藝術性

質問題、技術性質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採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樹立（同縱容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發展嚴格區別開來）」。「為了發展自由討論，又必須與黨內黨外各種各樣的宗派主義門戶之間進行適當的鬥爭」。陸定一認為，「我們這樣做，就不會在政治問題、思想問題上成為『瞎子』，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成為『蓋子』」。[21]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否能夠以及怎樣才能劃分清楚，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這都是一個應該解決而從未解決的問題。對於這樣一個既重要又敏感的問題，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沒有、可能也沒想進行討論。周恩來1月20日的總結發言，以及2月24日最後修訂的中共中央的指示，都沒有涉及這個問題。與此相關聯，也許應該注意到，周恩來的報告及整個會議似乎主要在強調自然科學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而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分子則較少提及。

知識分子本來是具有愛國主義情感和立場的社會主體的一部分，卻偏偏要把他們看成是依附於某個階級的「毛」，非經過一番「脫胎換骨」甚至「急風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為國家社稷貢獻自己的知識，這種從本質上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決定了中共這次調整知識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徹底的。正因為如此，當1957年知識分子受到黨的鼓勵和動員，又一次表現出獨立思考的本性時，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鐘擺立即就擺回了1955年，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3 知識分子的雙重反應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努力向黨外和高級知識分子傳達會議精神。中央和各地都動員輿論進行了大量宣傳，以造成聲勢。1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月30日至2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全國政協二屆二次全體會議。這實際上是一次擴大了的政協會議，除原有545位委員外，增加了119位新委員，還邀請了626位各界人士列席，參加會議的共計1290人。[22]到會委員和列席人員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其中有很多是「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受到批判的梁漱溟、梁思成及舊派學者陳寅恪等。劉少奇和一批國務院領導人出席了開幕式。邀請這麼多人與會，顯然是為了展示統一戰線「更加廣泛」、「更加強大」和空前未有的「團結」。中共中央希望通過這次會議，把有關知識分子的新政策盡可能廣泛地傳達到黨外，並在民主黨派和黨外高級知識分子中展開討論，以達到全面動員的目的。[23]

這次會議雖然是全面討論中國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及其提出的新任務，但在實際進程中着重討論的是關於知識分子問題。除周恩來的政治報告外，郭沫若也就此作了專題報告。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是以雙重身份來回應中共中央新政策的，一方面他是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代言人，一方面他又是高級知識分子的代言人。如此，他便可以更多地強調知識分子自身應該承擔的「使命」。報告向知識分子提出了五條要求：貢獻力量，擴大隊伍，提高水平，自我教育，加強團結。郭沫若指出，黨和政府已經給了知識分子以各種工作機會，現在「至少一半，還要依靠知識分子自己的努力」。因而，他號召知識分子要每天「反省自己」。郭還強調，知識分子與領導的關係「不夠密切」，問題的「另一面依然在於知識分子自己」。在輕描淡寫地談到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精神上的震撼後，郭沫若說：「無論怎樣的微風細雨，總不免要吹動頭髮，打濕衣裳。如果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連微風細雨的批評都不能接受，那就證明他還沒有進行自我批評的決心。」[24]為了營造氛圍，在僅一周時間的大會討論中，安排了235人作「響應性」發言，其中有政協委員，有特邀列席代表。全部代表發言由新華社發通稿，從2月3日至13日，《人民日報》每天以幾個版面，全文刊登了226篇大會發言（含聯合發言），其中包括梁漱溟、梁思成的發言。2月6日發表的梁漱溟發言達四千餘字，2月9日再發消息，「補加一段」，以顯示對其發言的尊重。[25]

中共動員知識分子為國家建設出力的心情不可謂不急切，那麽知識分子的反應和心態如何？在仔細閱讀並揣摩這些發言後，筆者感到，此時知識分子的心態仍然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然是謹言慎行，另一方面又因有機會為國效力，表現出相當的熱情和期待。

從1月12日（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召開前一天）開始，《人民日報》陸續發表了石景山鋼鐵廠總工程師安朝俊、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主任季羨林、協和醫學院外科主任吳英愷、北大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同濟大學副教務長吳之瀚、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張維、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中科院物理學數學化學學部常務委員葛廷燧、鐵道部鐵道研究所所長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發表，顯然是為配合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造輿論的。然而，也不能把它們完全看作是應景之作。這些文章對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坦誠地提出了一些批評和建議。他們最為關注的問題，仍然是對知識分子政治思想狀況的認識和評價問題。季羨林認為，從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無論其背景如何，「一般都非常愛國」，「他們現在對黨有無限的信任，無限的敬仰」，他們的政治覺悟的進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誰也「不願意成為懶漢，坐享其成」。他批評說，一些人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是不夠正確的」，這對知

識分子的進步「沒有好處」。茅以升說，知識分子「都毫不例外地信任黨，擁護黨」，年老的知識分子都在進步，「都想成為勞動知識分子」。馮友蘭也說，「我敢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以接受黨的領導為莫大的光榮」。[26]在知識分子看來，如同季、馮、茅所說，他們「絕大多數」、「毫不例外」地信任黨，擁護黨。而中共的估計是，還有百分之四十的中間分子、百分之十幾的落後分子和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動分子。在這裏可以明顯地看出，即使是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作出的新估計，與知識分子的自我政治判斷仍然存在重大的差異。季、馮、茅等人的文章事實上在為知識分子辯護。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黨與非黨人士的關係問題。茅以升認為，黨與非黨人士之間有「尊而不親」的現象。吳之瀚進一步指出，造成這種隔閡的原因，在於黨員對群眾的進步「重視不夠」，「估計不足」。黨員幹部對教學「一知半解」，或者「強不知以為知」，處理問題不同系主任商量。吳之瀚還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生硬粗暴做法提出了批評。他說，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由於領導運動的個別幹部對於思想的發展規律認識不夠，未能多採取以理服人的方式而過於生硬粗暴，使少數知識分子產生了一些消極情緒，造成一定的損失」。吳英愷則含蓄地提出，政治運動造成了對業務和技術工作的消極影響。茅以升還批評了學習蘇聯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以及把蘇聯專家的結論「當做金科玉律」，老工程師們把所有英美書籍束之高閣的現象。馮友蘭則對加強科研和教育工作，改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和物質待遇提出了具體建議。[27]

相比之下，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這種批評建議就少得多了。何思源的發言以他到四川考察得來的情況，批評在某些地區、單位和幹部中「甚至以一種關門主義傾向對待知識分子」。年紀較大的知識分子，因歷史比較複雜，「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使這些人抬不起頭來」，「甚至在業務上也對知識分子加以懷疑」。羅隆基提到，在社會科學領域，由於安排和使用遇到了困難，六年來極少數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閒散在社會，因而，有比較多的苦悶，有人產生了「不如歸去」的想法。他還說，「現在還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28]

不過，即使這種針對局部問題提出的批評，在二百多篇發言中也是鳳毛麟角。這表明此時知識分子對中共重大政策的言論是很謹慎的，是有顧慮的。由於中共沒有對過去的政治運動作出檢討性總結，知識分子即使心存疑問和不滿也不敢表露出來，更不可能對中共知識分子政策提出總體性評價。至於反胡風和肅反運動，這在當時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就在這次政協會議上，董必武還作了肅反專題報告。報告全面肯定

肅反，提出要「繼續堅決地、深入地進行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29]因此，會上根本就沒有人敢於觸及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相反，會上的發言大多在作自我批評和檢討。梁漱溟檢討自己「抗拒批評」，「不堪造就」，「深深抱恨自己過去是太辜負主席愛厚之意了！」梁思成批判自己在都市規劃和建築設計上「一貫地與黨對抗」，積極傳播「錯誤理論」，「使得建築界中颳起了一陣烏煙瘴氣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歪風」種種。[30]這些明顯地自我上綱的做法，很難說反映了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態度。許多發言都集中於反躬自省，檢討知識分子頭腦中還存在着「虛偽的個人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自私自利」、「驕傲自大」、「自以為是」的思想作風，強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因為正如李四光所說：「只有繼續不斷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後於時代。」[31]

當然，也不能作出這樣的判斷：知識分子的整體對中共新政策無動於衷。否則，怎麼理解知識分子公開表達的「興奮」、「激動」、「欣喜」、「愉快」、「光榮」、「榮幸」、「幸福」呢？無論怎麼說，這已經超出了「響應性」發言必須表現的熱度。許多從各地來京的知識分子為被邀為座上賓而感到受寵若驚，也是真實的。至少有兩件事讓知識分子表現出熱情來：

一是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自建國以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打敗美國，國威大震；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有出色表演；現在經濟建設全面鋪開，國家眼看一天天強大起來，知識分子為這一切感到揚眉吐氣。季羨林的文章表達了這種心境。他說：對一個舊知識分子來說，接受天翻地覆的偉大的變革，有許多「苦難」，「恐怕比唐僧的八十一難還要加上一難」。但知識分子沒有「垂頭喪氣」、「愁眉苦臉」。「根據我的體驗和觀察，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簡直是愈來愈高興，愈來愈年輕，愈來愈容光煥發，愈來愈精神抖擻。我們都彷彿吃了返老還童的仙丹，身體裏面時時產生着新的力量。」他自我解釋說：「這是甚麼原因呢？我看這原因並不複雜。我上面說過，多數的舊知識分子都是愛國的，他們渴望自己的國家強盛起來。這種希望在過去一直沒能實現。然而今天，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國家強大起來，「自己也可以揚一下眉，吐一口氣」了。[32]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表達了同樣的心境。馮友蘭說：眼看祖國幾年之間，一躍而為世界強國，「真是如旭日方升，光芒萬丈」，我們都是歡欣鼓舞，願「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添上一分力量。」陳垣為他的老友、清華大學副校長劉仙洲光榮入黨而振奮不已，奔走相告。他說：「共產黨是不拒絕任何人的……每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都應當以共產黨員的標準來努力要求自己」，希望黨「加強對知識分子的領

導，不能使任何一個愛國的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向隅」。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的宏偉藍圖，燃起了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錢學森說：「我到處看到祖國在突飛猛進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這使我萬分地興奮」，「我更為這個偉大的任務（十二年迎頭趕上世界科學水平）所鼓舞」。華羅庚說：「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能夠生長在這毛澤東時代是無上的幸福，無上的光榮。因為就在這一代，我們將親眼看到我國的科學事業將從落後的狀態飛躍地進入世界水平。」一些人開始規劃自己的研究計劃。如歷史學家顧頡剛建議，要組織力量搜集整理中國「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他滿懷信心地說：史料整理「在十二年的規劃裏必然被列為一個重要的部門」，「我們大有工作可做」。[33]

二是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表現出來的中共改善知識分子境遇的誠意，使許多人儘管心中疑懼難消，卻也不得不爲之動容。建國幾年來，知識分子在新社會處於被改造的地位，因而處處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覺。這次會議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盟」，號召「向科學進軍」。這使不少知識分子感動和興奮，激發出主人翁感和參與熱忱。民盟中央委員黃琪翔說：「當我們看到了周恩來主席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後，每個人都不能不為黨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和深切關懷而受到深深感動。」章伯鈞也提到：「在黨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之前，為了深入了解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中國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聯工作，向黨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見和要求。在這次周恩來主席的報告中，我們看到所有的正確意見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決，更叫我們感動的是報告中還有關於黨對知識分子工作的檢查批評。」[34]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當時民主黨派歡欣鼓舞，從大學教授到小學教師都認為：隨着新時期來臨，新民主主義各項政策不再適用，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至少是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中）會有更大的發言權，知識分子甚至有權參與新綱領的制定。」[35]

[1]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28。

[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38。

[3]或許毛澤東當時的興奮點不在於此，或許他對報告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見，這個問題只能等待相關的檔案文獻披露出來才能回答。

[4]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161。以下所引周恩來的報告見《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58—189。

[5]毛澤東1956年1月20日講話。

[6]其實，周恩來早就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提出了知識分子應屬工人階級範疇這個問題。在1949年7月6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周恩來指出：「文藝工作者是精神勞動者，廣義地說來是工人階級的一員。」參見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349。此後，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其中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判定就更為明確了：「把知識分子看做一種單獨的成份是不對的」，「凡受僱於國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機關、企業、學校等，為其中辦事人員，

取得工資以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人，稱為職員。職員為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而凡受僱於上述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工程師、教授、專家等，「稱為高級職員，其階級成份與一般職員相同。」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185。但不久之後開展了一系列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其結果之一，就是在黨內和社會上，知識分子又被冠以「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頭銜了。如此看來，周恩來在報告中把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改變作為思想改造的結果，很可能是為了找到一個更容易被黨內接受的說法。

[7]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228。

[8]《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166。

[9]龔育之：〈周恩來和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4。

[10]龔育之：〈周恩來和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頁4。

[11]龔育之說：「前些年，我曾問胡喬木，為甚麼八大報告沒有重申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報告的新結論？喬木也記不大清楚，但他記得，知識分子會議時已有不同意見。」參見〈周恩來和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頁5。

[12]《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考資料》，第二輯，頁52。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133—134。

[1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02。

[15]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42。

[16]《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73。

[17]這九條錯誤是：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之間不分敵我；不滿意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戀資本主義甚至留戀封建主義；反對蘇聯，不願意學習蘇聯；拒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詆譭馬克思列寧主義；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輕視勞動人民出身的幹部，不願意同工人農民和工農幹部接近；不願意看見新生力量的生長，認為進步分子是投機；不但常常在知識分子和黨之間製造糾紛和對立，而且也在知識分子中間製造糾紛和對立；妄自尊大，自以為天下第一，不能夠接受任何人的領導和任何人的批評；否認人民的利益、社會的利益，看一切問題都從個人的利益出發，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贊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對。參見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75—176。

[18]《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166。

[1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135、136。

[20]于風政：《改造》，頁434。

[21]《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168。

[22]《人民日報》，1956年1月31日。

[23]《人民日報》，1956年2月8日、9日。

[24]《人民日報》，1956年2月1日。

[25]《人民日報》，1956年2月3日至13日。

[26]《人民日報》，1956年1月13日、22日、15日。

[27]《人民日報》，1956年1月22、16、14、15日。

[28]《人民日報》，1956年2月6、11日。

[29]《人民日報》，1956年2月1日。

[30]《人民日報》，1956年2月8、4日。

[31]《人民日報》，1956年2月5日。

[32]《人民日報》，1956年1月13日。

[33]《人民日報》，1956年1月15、20日，2月3、6、8日。

[34]《人民日報》，1956年2月5、4日。

[35]金觀濤、劉青峯：〈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香港），1997年4月號，頁27。

三 吹向知識界的春風：新政策的實施

儘管對知識分子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和利用知識分子則是共識，因此，中共推行知識分子新政策的決心仍然很大。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中共中央為此採取了一系列步驟。2月24日政治局通過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強調，由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日益顯出科學幹部、技術幹部和一般文化幹部的重要性，同時也日益顯出知識分子不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遠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黨「進一步地把知識分子問題放在全黨和國家的各個工作部門的議事日程上」，「全面規劃，加強領導」。還要求向全體黨員傳達這一指示，檢查工作和提出改進意見，及時向中央作報告。[1]

1 知識分子新政策在全國的實施

4、5月間，中共中央先後轉發了組織部〈關於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計劃的報告〉、〈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情況的報告〉、統戰部〈關於解決高級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會活動過多和兼職過多問題的意見〉等文件。5月，國務院成立了專家局，專門管理高級知識分子幹部，負責督促、檢查各部門對於專家和其他高級知識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貫徹執行情況，負責解決需要統一處理的有關專家和其他高級知識分子的問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別成立了相關辦事機構。7月20日，國務院轉發了由研究改善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小組提出的〈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問題的情況和意見〉及關於這個文件的〈通知〉，就有關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的十四個問題（圖書、資料、情報、學術交流、儀器、試劑、實驗用土地、研究經費、工作室、助手、工作時間等），分別提出了具體的改進意見和措施。除規定由新成立的專家局「負責研究有關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問題」外，還開列了一個很長的應由相關單位辦理的有關事項目錄，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內作出工作進展情況的報告。[2]

貫穿於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為中共地方各級黨委緊跟中央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結束後，各地紛紛召開會議傳達貫徹，制定自己的知識分子工作綱要。中共上海市委於1956年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識分子工作綱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級黨組織在3月底以前對知識分子工作作

一次全面的檢查，切實解決全市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及建黨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隨後，又制定了兩年（1956—1957）知識分子工作綱要草案，4月提交市政協全體會議討論。[3]根據中共上呼下應的慣例，不僅省一級，地縣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黨組也都制定了自己的知識分子工作綱要。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識分子工作領導小組於2月22日發出〈佛山知識分子工作規劃（1956—1957）〉，中共北京建築工程委員會也於同一時間制定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規劃〉。[4]

在社會輿論方面，「全國大小報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絕跡，代之而起的是對知識分子重要作用的宣傳，對著名知識分子近況的報道」。[5]

中央和各地改善知識分子境遇的做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善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4月1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改善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對當地的科學家、教授、工程師、醫師、文學家、藝術家的工作條件作一次檢查，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一是迅速解決高級知識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難；二是積極地解決所缺房屋、所需實驗用土地和基本建設的地皮等問題；三是切實改善圖書、文物、檔案和各種資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狀況。[6]在1956年的工資改革中，提高了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待遇。上海市的規定更加具體，如要求市衛生局半年內首先改善三千餘名學術地位較高的高級知識分子的醫療條件；市房管局先撥出宿舍房屋五百戶，分配給著名學者、專家、作家、藝術家居住；市工聯利用已有工人休養所擴大高級知識分子的休養名額；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負責解決年老體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專家」的交通問題；市合作總社做好高級知識分子各種副食品的供應工作，等等。[7]

各地在改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醫科大學都為教授們專闢了閱覽室。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館準備補訂二百種外文期刊和三千種外文書籍。北京大學的教學輔助人員將增加110人，即增加一倍。復旦大學各系配備了科研秘書，並且準備給老科學家配備助手和增加實驗室人員。許多高等學校還採取許多辦法改善教師的生活條件。清華大學實行「優待通用證」的辦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優待通用證」到校醫室看病、到食堂吃飯和到消費合作社買東西，都可以受到優先和其他照顧。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對教師吃飯、理髮、看病、購買東西等也訂出照顧辦法。中國醫科大學為教授和部分講師增加了住宅面積。東北藥學院在食堂給教授和講師設立了專席，等等。[8]中國科學院圖書經費也由原來的80萬元增為546萬元，增

訂的書刊中有資本主義國家期刊二千種。正式成立了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搜集、研究並傳播國內外科學發展的情況與最新成就。[9]這種努力，羅隆基在6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發言中給予了充分評價。他說：「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四個多月來，在解決高級知識分子問題上做了許多具體工作，有了很顯著的成績」。「時間不夠」、圖書資料缺乏、配備助手等問題都逐步得到解決。他特別提到：「最近國務院改革工資的決定實施以後，對知識分子，特別對科學技術工作者們的工資都將有較多的提高。」[10]

第二，解決知識分子失業和使用不當問題。據各地調查，社會上有不少高級知識分子沒有就業。如北京市5月以前調查，具有大學程度而沒有就業的就有2321人，其中大學畢業的1482人，大學肄業的771人，其他68人。就學科劃分而言，研究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有375人，社會科學和語文、教育的有1349人，其他科系的597人。同時，還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用非所學，使用不當。為解決這個問題，各地紛紛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員委員會。北京市走得快一些，截至7月底，已確定錄用317人，還有1508人準備錄用。[11]8月11日，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國家技術委員會、國務院專家局等五個機關，根據國務院的指示發布聯合通告，向社會招聘科學研究人員、高等和中等學校教學和教育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翻譯人員。招聘對象首先是社會上還沒有就業的高級知識分子，其次是安排不當的在職專家。8月12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充分發揮我國知識界的潛在力量〉。招聘工作開始後，僅北京市在兩周內便有1500多人報名應聘，其中應聘科研人員、翻譯人員、高等學校教員的有700多人。各地進展大體相同，如遼寧省截至10月上旬，有3000多名社會知識分子報名申請就業，招聘工作委員會發出了1500多份應聘書。此項工作延至1957年5月，經國務院批准結束。[12]與此同時，對一些用非所學的專家的工作也作了調整。

第三，大力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中共把吸收知識分子入黨，視為爭取知識分子「進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徑。〈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要求徹底糾正「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4月，中共中央批准下達由中央組織部制定的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計劃，提出到1962年，高級知識分子黨員應佔高級知識分子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13]《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號召做好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工作。針對黨內的質疑，社論指出，決不能因為他們出身於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政治經歷和社會關係複雜，就不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社論甚至認為，在思想作風上有一些比較嚴重的缺點，也要熱情地幫助他們，「把他們逐步地提高到共產黨員的水平」。[14]根據中央的精神，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識分子中建黨的計劃。上海市規定，全市在1956、

1957兩年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新黨員11%左右，在一般知識分子中發展新黨員7%左右，並要求年內完成上述建黨指標的50%。[15]北京市委規劃得更加具體：在今後兩年內發展的黨員，教授100人（約佔其總人數8%），講師170人（10%），工程師125人（9%），西醫主治醫師以上人員50人（13%），作家、藝術家、著名演員25人（8%）。總之，「到1957年底，高級知識分子中黨員人數將達到23%左右」。[16]

「從3月開始，全國颳起了一陣競相發展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旋風。用多快的速度、發展多少高級知識分子入黨，似乎成了緊跟中央的一個標誌，有些地方黨委甚至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黨程序。」[17]官方媒體不斷報道各地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消息。到「七一」前夕，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知識分子入黨，僅上海、北京兩地，幾個月內就有三百多名高級知識分子入黨。著名的物理學家鄧稼先、謝希德，植物病理學家戴芳瀾，古脊椎動物學家楊鍾健，內分泌學家朱憲彝，小麥良種培育者趙洪璋，翻譯家曹靖華，電影導演蔡楚生、張駿祥，北京中醫趙錫武等，都是這個時候入黨的。[18]1956年上半年，中共各級組織共接收了2592名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知識分子黨員達到125萬人，佔1700多萬中共黨員總數的11.7%。[19]

第四，培養和擴大知識分子隊伍。中共知識分子政策有兩個着眼點，一是充分使用現有知識分子，一是大力培養新生力量，以迅速擴大知識分子隊伍。在中共中央擬定的培養高級知識分子的規劃中，希望在十二年內至少培養出一百多萬高級知識分子。[20]提出「必須培養出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足以獨立地解決我國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國防、衛生事業和其他各個部門的技術問題的專家」。同時必須「培養出一定數量的接近現代先進水平的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生物學家和其他理論科學家」。[21]中共所以特別重視高級知識分子，就在於他們肩負着雙重使命：一是貢獻自己的知識和技術，一是為國家培養新專家。因此，需要盡快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為他們配助手。郭沫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報告中殷切地提出：「我們希望所有的高級知識分子，在擴大知識分子的隊伍上，作到最緊張的努力，把潛在力量進一步發揮出來。」他提出「培養專家要用帶徒弟即個別指導的方式」，並把科學院每位導師所帶研究生從五個增加到十個，這樣科學院十二年內培養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10500多名增加一倍。錢學森心情更加急切，他甚至仔細算過，「一個老師十二年後就能培養出八十九個副博士」。[22]

除了自己加緊培養，中共還從兩個途徑擴大高級知識分子隊伍：一是委託蘇聯代為培養，一是繼續爭取仍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建國以後，中國就開始派留學生赴蘇聯學習，主要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技

術。據報道，截至1956年上半年，有1300多名中國留蘇學生完成學業，已有300多名回國，其餘的人也將於最近陸續回國。[23]此後，中國繼續向蘇聯派遣留學生。1956年4月，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專門就在蘇聯為中國培養科技幹部事宜作出決議，「允許蘇聯科學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國專家進入研究生班學習，接收20名中國科學院科研人員以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24]同時，中共繼續不遺餘力爭取滯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回國。據當時官方摸底，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大約有七千人，他們大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具有專門知識，不少人已經是科學家和高級技術人員。2月22日，周恩來審閱批准了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組〈關於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學生回國問題的報告〉。隨後，中共中央轉發這個報告並作出批示，確定「普遍爭取而又以在美國的留學生為重點」的方針，要求各有關部門都必須動員起來，「在大約三年時間內把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可以回國的留學生基本上爭取回國，今年要求爭取一千人」。[25]

不過，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共高層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存在分歧，基層黨員幹部的思想也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因此，所謂知識分子新政策的推廣和執行無疑是受到阻礙的。會議過後幾個月，中央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的調查發現，在一些黨員幹部中，「宗派主義思想尚未徹底克服，因而在貫徹知識分子工作中還存在着抵觸情緒」，「對知識分子盲目地排斥不信任」的現象繼續存在，「有的甚至產生悲觀失望的消極情緒，認為自己文化低，不懂技術，今後吃不開」。在所調查的單位中，有關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兼職過多、用非所長和生活待遇（主要是住房）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調查報告指出，有些部門和地區，知識分子工作「一陣風颳過之後，顯得有些沉寂和自流現象」，進展很慢。[26]

2 中國第一份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

中共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催生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簡稱「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制定。

關於制定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問題，最早是由蘇聯顧問提出來的。1955年1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柯夫達（V.A.Kovda）草擬了〈關於規劃和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性的科學研究工作的一些辦法〉，建議中方組織規劃全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編制科學發展遠景規劃，以解決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和十五年規劃中提出的最重要問題。2月12日和4月7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和郭沫若先後向周恩來和陳毅報告了柯夫達的建議，提出組建「全國科學研究工作規劃委員會」。[27]4月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科學院黨組的報告。劉少奇在總結時認為，柯夫達的建議很重要，值得重視，並責成計委、科學院和有關部門提出如何實現這些建議的意見，再提交中央討論解決。[28]9月15日，中國科學院第三十九次院常務會議討論並通過〈關於制定中國科學院十五年發展遠景計劃的指示〉。1956年1月23日至2月11日，在蘇聯顧問拉扎連柯（B. R. Lazarenko，柯夫達的繼任）的幫助下，三個學部和學術秘書處組織了360名科學家，擬訂出科學院遠景規劃初稿，從而為國家制定科技發展遠景規劃打下了基礎。[29]

1月5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提出了制定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動議。他在寫給國務院各有關辦公室和各個黨組書記的信中提出，要像規劃工業建設中的156項那樣來確定迅速發展中國主要學科和重大專題的科學技術研究項目，並提出了制定科學技術規劃的初步思路和要求，以及項目、人才、國際合作計劃、其他重要措施等四項內容。[30]1月14日，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宣布，國務院已經委託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會同各有關部門，在三個月內制定出從1956年到1967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31]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把這項工作提上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議事議程，對於規劃的制定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會議一結束，周恩來就調國務院地方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張勁夫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書記。張勁夫回憶道：「調我去科學院時，周總理找我談話。他說：你一到，就要馬上抓科學技術發展規劃。」[32]隨即成立了由范長江、張勁夫、劉傑、周光春、張國堅、李登、薛暮橋、劉皚風、于光遠、武衡組成的十人小組，負責主持規劃的制定。[33]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成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陳毅任主任，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李四光任副主任，張勁夫任秘書長。[34]

科學規劃的制定自然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實際上，蘇聯專家和學者的意見也確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月10日，周恩來致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N. A. Bulganin）說，中國科學家正在擬制科學發展的長期規劃，「希望蘇聯科學家在這個工作中給予他們直接的幫助」。按照拉扎連柯的建議，周恩來提出擬請機械數學、電子學、半導體物理、自動控制與遠程操縱、無線電工學等十六門學科的科學家來中國短期講學和幫助進行擬制規劃的工作，因為「這十六門學科都是中國科學界的主要的空白點或薄弱環節」。3月22日，尤金通知周恩來，蘇聯政府同意派出十六位學者來中國。[35]3月29日，蘇聯科學家代表團一行十八人來到中國。代表團中有七名院士，三名通訊院士，其餘也都是所長、主任一級的科學博士。這些專家不僅水平很高，而且都是中國急需的。如一些新技術學科的規劃，包括力學、電工、電子學、電真空學、精密機械、計算技術、水聲學、半導體、自動控制、噴氣發動機

等，就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制定的。拉扎連柯一再表示，蘇聯可以把從理論到工藝方法的科技成果都傳授給中國。蘇聯有關方面指示，只要中方提出要求，蘇聯可以提供任何援助，包括可以派比已議定的名額多幾倍的人員到蘇聯學習，可以從蘇聯得到所有的科學情報等。[36]

事實上，以不同形式參與過中國科學規劃的制定和修改的蘇聯科學家遠不止科學代表團和在華專家。根據俄國資料，「1956年，約有六百名蘇聯學者（其中六十人在中國工作長達二至三個月）和近五百個蘇聯科學和設計機關、學院參與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十二年規劃的制定和修改」。蘇聯學者和專家對遠景規劃草案及其具體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闡述，寫出的俄文報告長達15000頁。中國還經常派科學代表團和專家學者去蘇聯，「僅1956年一年，中國學者就參加了十五次蘇聯科學院召開的會議」。[37]對於蘇聯的幫助，郭沫若在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發言稱讚說：「這在中蘇兩國科學家之間的創造性的合作上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紀程碑。」[38]

激發科學家的主人翁感和熱忱，莫過於讓他們有機會參與新綱領的制定。如果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制定過程，還只是邀請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參與討論，那麼，科學發展規劃則是中共幹部與各類科學家緊密合作，集思廣益的成果。5月26日，周恩來在懷仁堂舉行盛大酒會，招待參加規劃編制工作的三百多名科學家。6月14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接見科學家，成為科學界津津樂道的一件科學盛事。[39]

經過半年多的時間（比原計劃延長三個月），在中國23個單位、787名科學家的參與和蘇聯專家學者的幫助下，終於編制出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規劃的方針是「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方法是既「密切結合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又對基礎理論研究予以重視，並盡可能地參考世界科學最新水平和發展趨勢。整個規劃確定了五十七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並從中綜合提出了十二個重點項目。8月下旬，陳毅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召集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擴大會議，對自然科學方面的科學規劃工作做了總結性的討論。科學規劃文件包括〈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和四個附件，共六百餘萬字。會議共召開五次，每次有四十至五十人參加，二十九位科學家和有關負責幹部在會上發了言，着重討論了〈綱要（草案）〉中一些主要的有爭論的問題。〈規劃〉確定了中國經濟建設所需要的57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和616個中心問題，並指出了各門學科的發展方向，對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畫出了輪廓，並作出了初步的安排。[40]〈規劃〉還確定了六大「緊急措施」，當時公布的有四項：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和遠距離操縱技術。還有兩項絕密任

務：原子彈和導彈。這六項緊急措施，構成了當時中國發展尖端科技的關鍵性措施。[41]

10月29日，陳毅、李富春和聶榮臻（已任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書記）向周恩來遞交了關於科學規劃工作的報告。11月15日周恩來批示，可以原則批准，經討論和審議後再提請中央批准。12月20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將〈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發給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人民委員會徵求意見，同時向中共中央提出報告，希望批轉國務院各部委和各地方黨委，以示重視。2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將〈綱要（修正草案）〉作為「國家的重要規劃文件」，要求各部門、各地區注意研究和匯報。[42]

這個科學遠景規劃，大大推動了「向科學進軍」的進程。張勁夫回憶這段往事時感慨地說：「有了科學規劃，就有了奮鬥目標。」[43]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在人大一屆四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1956—1967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已經制定，並且已經作為試行草案，付諸實施。」[44]這份規劃遠不如農業規劃那樣好高騖遠，原定十二年完成的科學發展規劃的主要任務，大都提前五年，到1962年就完成了。在這六年中，全國科研機構（國防系統除外）由381個增加到1296個，專門從事研究的科技人員從6.2萬人增加到近20萬人。從科研成果看，規劃任務的實現，解決了二五計劃和三五計劃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批科技問題，填補了科學研究中一些重大空白，加強了某些重要的基礎學科，發展了大批新興科學技術。如李四光領導的地質科學隊伍，揭示了中國原油儲藏的廣闊前景，並相繼發現了大慶、大港、勝利等大油田，使中國在1963年基本實現石油自給，甩掉了「貧油國」的帽子。又如在原子能和火箭技術重大突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由於實行了尋求蘇聯援助和自力更生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中蘇交惡、蘇聯拒絕援助的情況下，中國科學家依然在很短的時間內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1964年10月）和發射了自行設計製造的導彈（1966年10月）。[45]

1956年的初春，中國的科學事業的確有一個良好的有希望的開端。恰在此時，從莫斯科傳來的一聲驚雷——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進一步啟發和推動了中共領導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

[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132、146—147。

[2]《周恩來傳（1949—1976）》，頁250—251；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四卷，1991（未刊），頁61—62。

[3]上海市檔案館，A22-2-515，頁2—6；《人民日報》，1956年5月23日。

[4]參見佛山市圖書館網站（www.fislib.com.cn）；北京黨建網站（www.bjdj.gov.cn）。

[5]于風政：《改造》，頁442。

[6]《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316—317。

[7]上海市檔案館，A22-2-515，頁2—6。

[8]《人民日報》，1956年3月14日。

[9]錢臨照、谷羽主編：《中國科學院》，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69。

[10]《人民日報》，1956年8月12日。

[11]《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

[12]154《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頁1476；《人民日報》，1956年8月12日。

[1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146。

[14]《人民日報》，1956年3月21日。

[15]上海市檔案館，A22-2-515，頁2—6。

[16]《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6）》，頁13—17。

[17]于風政：《改造》，頁442。

[18]《人民日報》，1956年7月1日；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頁352—353。

[19]《人民日報》，1956年9月14日。

[20]《人民日報》，1956年1月31日。

[2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141—142。

[22]《人民日報》，1956年1月31日、2月3日。

[23]《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

[24]ЦХСД,4,оп.16,д.42, р.3273, л.28-31.

[2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53—554；《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頁1389。

[26]吉林省檔案館，1-12/1，頁79—83。

[27]中國科學院檔案處檔案，案卷55-2-99，頁7—13、4—6。轉引自張柏春、張久春、姚芳：〈中蘇科學技術合作中的技術轉移〉，《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79。

[28]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頁41—42；張柏春，張久春，姚芳：〈中蘇科學技術合作中的技術轉移〉，頁79—80。

[29]張柏春、張久春、姚芳：〈中蘇科學技術合作中的技術轉移〉，頁80。

[30]張柏春、姚芳、張久春、蔣龍：《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170—171。

[31]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84。

[32]《周恩來傳（1949—1976）》，頁251—252。

[33]《中國科學院》，上冊，頁71。

[3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09—510。1956年11月，陳毅調任外交部長，改由聶榮臻任主任。

[35]《周恩來年譜》，上卷，頁547—548。

[36]張柏春、張久春、姚芳：〈中蘇科學技術合作中的技術轉移〉，頁80—82。

[37]Фцламов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и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и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No.65, с.19, 18.

[38]《人民日報》，1956年6月19日。

[39]《周恩來傳（1949—1976）》，頁252。

[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428—435。

[41]《周恩來傳（1949—1976）》，頁253—254。

[42]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頁425—435。修正草案全文見頁436—540。

[43]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頁254。

[4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頁426—427。

[4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14—516。在提前五年基本完成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的基礎上，中央科學小組和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共同負責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頁427。

第二章

以蘇為鑑：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的最初反應

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及赫魯曉夫所做的秘密報告，無疑是戰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具震撼力和最令人感興趣的歷史事件，會議提出的社會主義新綱領，特別是對斯大林的批判，震動了全世界，其結果引起了一系列有關各國社會主義道路如何發展的深刻問題。將近半個世紀以來，當年並肩作戰的社會主義各國卻領略了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和結局，儘管研究者的出發點、思路和結論可能存在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蘇聯共產黨在1956年前後提出的問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蘇共二十大及其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歷史課題。[1]

從社會發展道路的角度觀察，蘇共二十大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意義究竟何在？毛澤東和中共對此的最初反應和思考又是甚麼？[2]在以往中國史學界一度佔有主導地位的看法是：蘇共在二十大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此持基本否定的立場。因此，蘇共二十大成為中蘇兩黨分裂的歷史轉折點，並由此引發了毛澤東對蘇聯發展道路的思考，從此就開始探索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然而，近十年來披露的歷史檔案文獻告訴人們，事實並非如此。

[1]關於蘇共二十大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影響，始終是中國學者關注的問題，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兩個：中蘇關係史和中國現代史。從中蘇關係史方面進行研究的相關成果主要體現在李丹慧主编的論文集《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應該說是代表了前些年中國學者的研究水平。從中國現代史方面進行研究的成果相對來說多一些，其重點集中在中共對蘇聯經濟發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探索。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董志凱：〈毛澤東在「八大」前後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設想〉，《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真：〈50年代中期我國對蘇聯建設模式的突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武力：〈論八大對蘇聯工業化模式認識的深化及其歷史局限〉，《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6期；孔寒冰：〈蘇聯經濟模式是如何在中國確立起來的〉，《俄羅斯研究》，2000年第1期；刑和明：〈1956年中共對蘇聯模式認識的轉變及啟示〉，《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12期；林蘊暉：〈20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轉之原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林蘊暉：〈蘇共二十大與毛澤東走自己的路〉，《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1期。對個人崇拜問題的專門研究不多，只有石仲泉的《毛澤東的艱辛開拓》（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等少數著作論及。西方學者從中國史的角度對此進行研究的代表作，應屬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1979年出版的專著。中譯本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最初」的概念，是把考察的時間限定在1956年10月以前。理由是，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對二十大及其本質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若不做這種區分，就很難看清中共對斯大林和蘇聯道路問題反應和思考的變化軌跡，以及中蘇分歧的緣由。

一 蘇共二十大的新方針

對於蘇共二十大的評價無疑是最有爭議的歷史話題之一，而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當屬中蘇論戰時中共中央的看法。在1963年9月6日發表的〈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一文中，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做了全面評述。文章首先斷言，中蘇兩黨的「分歧是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因為在這次會議上，蘇共「開始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章接着指出，雙方的分歧或蘇共的錯誤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即「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通過所謂『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關於斯大林問題，文章認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而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衛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文章認為，赫魯曉夫提出的由於世界形勢發生變化現在有可能「通過議會的道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錯誤論點，「實質上是公開地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學說，公開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1]這種似乎已經蓋棺定論的說法至今沒有在中國官方史學中得到修正。[2]

觀點正確與否暫且不論，僅就內容而言，把蘇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歸結為「全盤否定斯大林」和「和平過渡」理論，既不準確，也不完整，因而很難對其實質做出正確和全面的判斷。而對這個問題如何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中共的選擇和中國後來的發展道路所做出的價值判斷。因此，這裏有必要首先對二十大的主要內容及其實質進行概括。現在所有相關的歷史文件幾乎都已經公開，總括起來看，蘇共二十大是從國際、國內和黨內三個方面提出了一些確與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針、路線或綱領性意見。

1 蘇共二十大綱領：對外政策

在對外政策方面，蘇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這樣一套總方針和總路線。

蘇聯對外政策新理論的前提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當前時代的特點是帝國主義作為「無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經瓦解，而社會主義已經越出一國範圍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

度並存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由於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僅有道義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質的手段來阻止侵略」。於是，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斷雖然繼續有效，但「戰爭並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為在核武器時代，未來的世界「不是和平共處，就是歷史上最具有毀滅性的戰爭」，「沒有第三條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看到，「歷史已經把這兩個體系和平共處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事實上，兩個制度和平共處的原則「日益廣泛地獲得國際上的承認」，它不僅是中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則」。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戰爭的威脅和保衛全世界的和平」。同樣，由於國際形勢的根本變化，「在各個國家和民族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前景」。

依照列寧關於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觀點，蘇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會主義方針改造社會的蘇維埃形式以外，還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還特別提到中國實行私營工商業的和平改造並逐步使其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的政策，認為中國「正在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許多獨特的貢獻」。因此，不應該「把暴力和內戰看成是改造社會的唯一途徑」。從理論上講，「這種過渡實質上就是一種社會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因而，任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和社會關係的變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輕有重，然而都是各國人民進行的革命。人民奪取政權和生產資料所有制從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就是歷史上最大的變革」。在右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愈來愈多地遭到破產的情況下，工人階級可以團結其他愛國力量通過議會鬥爭改變政權的性質，而在反動勢力仍然強大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則只能伴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革命鬥爭」。重要的是，「無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如何，具有決定意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首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沒有這種領導就不可能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至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之間的鬥爭，在這種形勢下，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是通過武裝干涉內政的辦法，而是取決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性的優越性這樣一個事實」，即通過和平競賽的方式。「在和平競賽中，社會主義必將勝利」，但不是通過「革命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於它是優越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因此它能夠保證人類達到比資本主義所能達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

大會通過的決議全面肯定了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提出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理論，認為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是「一些根本的、帶有原則性的、有關現代國際局勢發展的問

題，在目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3]

今天看來，蘇共中央在幾十年前提出的這一整套方針和路線，是極具時代精神和歷史意義的，正如許多俄國學者現在認為的那樣，「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成果首先是制定了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處的方針，而這個方針是與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本人牢固地聯繫在一起的」。[4]當然，這種具有內在邏輯的新思維並非橫空出世，而是對時局認識逐步成熟的結果。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新的國際局勢就已經顯示出來。由於戰時合作而形成的國際關係重組，以聯合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等為標誌的統一的國際體系相繼建立，以及資本主義自我調節功能趨向成熟，為修正蘇聯傳統的對外政策創造了國際環境和基本條件。雅爾塔體系區別於凡爾賽體系的根本標誌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國認同的國際體系和平等的遊戲規則，而莫斯科也是這種體系和規則的倡導人和締造者。因此，斯大林陸續地、不自覺地從戰略上改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觀念。從戰爭後期到戰後初期，解散共產國際這個對蘇聯外交已經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資本主義世界的諒解；強調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合作，表明蘇聯已經感受到其可以對世界命運發揮主體作用；推動歐洲各國及中國通過選舉成立共產黨與其他各黨的聯合政府，說明蘇聯已經開始在某種程度上認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經驗；最後，放棄世界革命的主張——如在伊朗、希臘和中國表現的那樣，不再是推翻舊世界，而是要改造舊社會。所有這些政策的本質及其歸宿就是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向社會主義社會和平過渡。然而，因意識形態對立而產生的東西方之間的猜疑和敵對，因美蘇各自的過度反應而採取的過激措施，以及由此所產生的互動作用，終於使冷戰思維成為雙方政策的出發點，同美國一樣，蘇聯也很快就回到了戰前發展的老路。斯大林不僅在國內繼續高唱軍事共產主義的「凱歌」，進一步鞏固標榜為蘇聯模式的經濟制度，加緊對社會的控制和鎮壓，而且重新調整了對外政策和安全戰略，在東歐各國推行蘇聯體制並建立起類似共產國際的情報局組織。歐洲的緊張局勢隨着柏林危機的爆發而加劇，朝鮮戰爭則把蘇聯與西方的對抗從歐洲擴展到亞洲，並推至極限。

斯大林的去世為蘇聯改變傳統政策提供了機會。及時地勸說中國接受美國條件、結束朝鮮戰爭是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意圖的第一次顯示，也是克里姆林宮新主人集體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嘗試。[5]1954年3月12日，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在對選民演說時宣稱，朝鮮停戰是國際緊張局勢走向緩和的標誌，「蘇聯政府堅持進一步緩解國際緊張局勢，堅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堅決反對冷戰政策，因為這個政策是一個準備發動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政策，而在擁有現代武器

的條件下，這樣一場戰爭將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毀滅」。蘇聯主張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經濟競賽」。[6]這種表述不僅在觀點上，甚至在話語上，已經與斯大林所堅持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學說大相逕庭了。由於黨內繼承權的鬥爭，馬林科夫公開發表的驚人言論受到指責，並成為其被罷黜的理由之一。[7]但實際上，這個理論框架和思維邏輯是蘇聯新領導人普遍接受的。

蘇聯提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新方針，一方面是基於世界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一方面也是對核武器發展及其後果有了明確認識的結果。[8]於是，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前兩年的時間裏，莫斯科採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以實現與西方的緩和：提出蘇聯作為新成員加入北約的要求，採取主動措施改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贊同奧地利中立並同意從那裏撤退蘇聯佔領軍，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發動的起義採取冷漠態度，積極推動與日本關係正常化的外交談判，主動提出裁減軍隊並單獨實現裁軍，向美國建議簽署蘇美友好與合作條約，如此等等。[9]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團會議研究二十大工作總結報告草稿時，最集中討論的就是議會道路、和平共處、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經過一番爭論，所有人一致贊同報告的宗旨——和平，會議的結論是：「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尋求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但不是經過戰爭。」[10]儘管蘇聯的舉動在美國沒有立即看到積極反應，但在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卻是「深入人心」的。[11]確如美國情報專家分析的，「蘇共二十大的整個旋律給人的印象是，蘇聯領導人似乎確信，只有和平才是世界共產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12]無論如何，50年代「被合情合理地認為是東西方緩和的第一時期」。[13]這是蘇共中央提出的「三和路線」的結果，也是二十大試圖改變國內政策、加快經濟發展的前提。

2 蘇共二十大綱領：對內政策

在對內政策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經濟管理體制的方針和措施，這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一）在繼續保證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前提下，「迅速發展消費品的生產」。

（二）把不斷提高生產技術作為「頭等重要的任務」。「必須堅決地、有計劃地在工業和運輸業中採用最新的科學成就、技術和先進經驗，使現有設備現代化，改善和改進勞動和生產組織，更廣泛地在工業中實行專業化和協作，以便在這一基礎上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

（三）加強「生產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線是加快東部地區的開發，今後十年到十五年間，在那裏建立起採煤和電力生產的最大基地、第三個大冶金基地及新的機器製造中心。

（四）在所採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消滅農業的落後現象和消除由此產生的工農業發展之間不均衡的現象」，為此需要在農業中實行可以發揮集體農莊莊員創造性和積極性的新的計劃制度；在增加農產品的生產中，加強對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的物質鼓勵；從城市和工業中心派遣人員到農村，加強集體農莊的領導幹部和專門人才隊伍；進一步加強農業的技術裝備，增加機器拖拉機站的領導人員和工程技術幹部；增加國家對發展農業的撥款；繼續集中力量大力發展穀物業，開墾荒地和擴大玉米播種面積。

（五）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為此，除進一步提高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以及集體農民的收入外，還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社會措施，如實行七小時（特殊行業六小時）工作制或每周五天工作制；在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將住宅建設增加一倍；國家為老年人建立房屋和設置相應的養老金；實行免費教育；普遍設立託兒所和幼兒園，以及其他改善保健和國民教育事業的種種措施。

（六）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其主要內容有：「同官僚主義的集中化作無情的鬥爭，充分確立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維護和加強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把中央所屬的大量工業企業轉交給地方機關管理」；加強地方蘇維埃和企業的自主權利；「吸引工人群眾廣泛參加擬定和審查經濟計劃的工作、更加積極地參與決定生產管理的問題」等。

（七）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改進國家機關工作，加強蘇維埃法制。建立黨和政府對國家保安機關和其他權力機構的監督，完全恢復並且加強檢察機構的監察權力。[14]

可以看出，與對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對內政策顯得缺乏系統性和過於表面化，根本沒有觸及蘇聯經濟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給人的感覺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實際情況恐怕也確實如此，二十大提出的國內問題，只是蘇聯新領導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認識到的問題，或者是已經有所認識但不敢坦白講出的問題。

1917年的革命導致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俄國的政權，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和他的戰友們開始在一片貧窮落後的土地上建構自己理想中的社會。囿於歷史的條件和戰爭的環境，布爾什維克選擇了軍事共產主義的發展模式，並準備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國內戰爭結束後，為了鞏固革命政權，列寧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這是當時歷史環境為蘇聯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轉型（或曰改革）的機會。但是，由於嚴

酷的黨內鬥爭，以及共產主義傳統理論的束縛，斯大林拋棄了「新經濟政策」的發展道路，在蘇聯建立起一套以集權統治為標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發展模式。[15]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經暴露出來，政治動盪不安，經濟畸形發展，生活貧窮落後。是戰爭掩蓋了蘇聯的社會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為它的軍事共產主義（戰時經濟）性質恰恰適合了戰爭的環境和需要。但戰爭也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數百萬穿著軍裝的蘇聯工人和農民随着戰線推進走出國門後才發現，他們生活其間的「社會主義天堂」簡直無法同「資本主義地獄」相比，甚至戰敗的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於戰勝的蘇聯人的生活水平。人們開始抱怨，社會開始思考。然而，斯大林卻陷入了一種理論誤區，他認為蘇聯在戰爭中顯示的力量和取得的勝利證明了他所創造的社會制度，特別是經濟體制的正確性和優越性——1946年2月斯大林在選民大會上的演說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6]再加上冷戰爆發和國際關係趨向緊張，剛剛開啟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關閉，鐵幕再次降臨俄羅斯大地，黨內和社會生活又悄悄地籠罩在政治清洗和鎮壓的烏雲之中：一切都恢復到了戰前的狀態。[17]

俄國學者說的不錯，1953年的蘇維埃國家確實已經處於社會大爆炸的前夕。[18]人們不僅要在恐懼和驚慌中煎熬，還要忍受物質生活的貧乏。以食品為例，讓人難以置信的是，社會主義搞了三十多年，直到1952年，蘇聯人均消費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製品、魚類及水產品）甚至還低於（麵粉、大米、肉類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19]造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輕工業和農業生產嚴重落後。統計資料顯示，按1926—1927年不變價格計算，與1945年相比，儘管消費資料產品的增長率（169%）要大大高於生產資料產品（57%），但是到1950年，在工業總產值（2400億盧布）中，生產資料產品（1620億盧布）仍佔67.5%，而消費資料產品（780億盧布）僅佔32.5%。[20]至於農業，問題就更加嚴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後的主要生產指標幾乎都低於十月革命前。如穀物總產量（按1939年以後疆界計算），1913年為8600萬噸，1953年為8250萬噸，1946—1950年平均為6480萬噸。穀物單位面積產量也是如此，1913年為8.2公担/公頃，1953年為7.8公担/公頃，1946—1950年平均為6.7公担/公頃。穀物出口量差得就更遠了，1913年出口910萬噸，到1953年只有310萬噸。與美國農業相比，也能看出同樣的問題。1949—1953年蘇聯平均穀物產量8090萬噸，僅為美國同期產量（13350萬噸）的60%。[21]

斯大林的逝世給那些一向視沙皇為神明的俄羅斯人帶來了由衷的悲傷，也使許多善於思考的人們產生了希望。這種思考首先是從直接承擔着社會責任的黨和國家的高層開始的——他們感受到了改變國內政策的

必要性。蘇聯領導人正是從加快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生產開始對斯大林的經濟政策進行調整的。馬林科夫在1953年蘇聯最高蘇維埃八月會議上關於必須優先生產日常生活消費品的講話和赫魯曉夫在1953年蘇共中央九月全會上提出農業改革綱要，可以被看作是經濟政策「解凍」的第一個信號，是修正蘇聯傳統經濟模式的初步嘗試。雖然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之間的政治較量正在暗中進行，但必須改變經濟政策以解決社會生活急需的，問題則是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共識。增加日用品生產，發展居民住宅建設，擴大商業銷售網點，降低農業稅收標準，加速開墾荒地，所有這些措施，無論最初是誰提出的，其結果都是為二十大進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針提供了思想準備和政策準備。[22]不過同時必須指出，蘇共中央當時的認識是很有限的，並沒有從根本上對在蘇聯佔統治地位的經濟理論和發展模式提出挑戰。可以對此做出註解的是，1955年1月馬林科夫被解除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導經濟界「在蘇聯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上宣揚明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23]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二十大提出的對國內政策（主要是經濟政策）的改革才局限於一些治標不治本、治表不治裏的零星措施。這裏的原因主要在於當時人們的認識能力和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超越被斯大林註釋和僵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或曰斯大林主義）的程度，而不在於對斯大林本人的畏懼，否則就無法解釋蘇共領導人在黨內民主問題上對斯大林的點名批判了。

3 秘密報告與批判個人崇拜的由來

就共產黨的建設而言，除了加強組織和思想工作等一般號召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實現黨內民主、加強集體領導及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批判的目標是斯大林。

問題是赫魯曉夫在工作報告中首先提出的：在黨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盡力加強列寧主義的集體領導原則」，蘇共中央嚴厲地「譴責個人崇拜」，因為它「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個人崇拜的危害在於「使得某一個領袖變成英雄和創造奇跡的人」，同時卻「縮小黨和群眾的作用」，「貶低他們的創造性的努力」，並曾使黨的工作「發生嚴重的缺點」。[24]不過，這個問題在大會上並沒有佔據突出地位。儘管全體代表通過的決議指出，「中央委員會反對個人崇拜是完全正確的」，[25]但是從整個會議發言的情況看，關於個人崇拜的問題還沒有引起全黨幹部的注意。有人統計過，在大會上發言的共126人，直接提到「個人崇拜」問題的只有8人，其中6人是蘇共中央主席團

成員。[26]而在所有公開發言中，點名批評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揚（Anastas　Mikoyan）一人。按照米高揚的說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對資本主義經濟狀況的分析「未必能對我們有所幫助，未必是正確的」；實際上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則沒有全面、正確地反映黨的歷史。[27]目前還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米高揚何以會有如此驚人之舉——幾十年來在蘇聯第一次公開點名批評斯大林，以至許多外國共產黨代表當時認為他與赫魯曉夫或其他蘇聯領導人在評價斯大林的問題上意見分歧。[28]不過人們很快就了解到，赫魯曉夫的看法不僅與米高揚沒有分歧，而且很可能還對他輕描淡寫的批評方式感到不滿。如果不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斯大林的問題確實不會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和震動。

2月25日上午，赫魯曉夫在一次只有蘇聯代表參加的秘密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講演。[29]在這個冗長和充滿激情的秘密報告中，作為個人崇拜現象的嚴重後果，赫魯曉夫列舉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間、衛國戰爭時期和戰後黨內政治生活中的種種錯誤。這些內容已經有太多的論著講述，可以說是人所共知。[30]聯繫到中共對斯大林問題的反應，這裏要強調說明的只有兩點：

第一，報告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赫魯曉夫一開始就聲明，「這篇報告的任務，並不是要對斯大林的生平與活動作出全面的評價」，「斯大林在準備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內戰爭、爭取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已是盡人皆知」。最後又談到，「斯大林是最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而且他的邏輯、力量和意志對幹部、對黨的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毫無疑問，過去斯大林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對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功勞」。此外，報告對斯大林的批評僅僅集中在大清洗及軍事指揮錯誤等少數幾個問題上，而對於斯大林其他許許多多的錯誤，如對黨內反對派的無情鎮壓、推行全盤集體化的嚴重後果、消滅富農的殘酷政策、對內實行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對外實行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以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蠻橫專斷和老子作風（毛澤東對此最為憤恨）等等，報告或者根本沒有涉及，或者是以贊同的口氣提到的。

第二，報告在談到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時，僅僅將其歸結為斯大林的個人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態心理」，經常性的「濫用權力」和「恣意妄為」，「最肆無忌憚的專橫」作風，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等，而沒有深刻地分析產生個人崇拜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根源，更沒有從制度層面闡述斯大林問題的要害——高度集權的官僚和獨裁體制。很顯然，既然在這種政治體制裏沒有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司法獨立和民主選舉，也就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個人專權和個人崇

拜現象，而在報告中提倡的所謂「黨內民主制度」、「社會主義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譚而已。赫魯曉夫甚至認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是「從捍衛工人階級利益、勞動人民利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利益的立場出發」的，「真正的悲劇」就在這裏。如此推理的結論自然是好心辦壞事：動機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問題。

如此看來，當時赫魯曉夫及蘇共中央對個人崇拜現象的認識水平，顯然還停留在非常膚淺的層面。即使這樣，在全黨面前提出斯大林問題也是極富冒險性的，因為從本質上講，批判斯大林無疑就意味着蘇聯共產黨及其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自我否定。那麼蘇共中央為甚麼要提出這個問題，問題又是怎樣提出的？實際情況並不像赫魯曉夫本人回憶和一些研究者認定的那樣，似乎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秘密報告只是在代表大會期間由赫魯曉夫個人突然提出來的。[31]同國際和國內問題一樣，二十大在黨內提出斯大林問題也有一個逐步成熟的歷史過程，而且得到了高層絕大多數領導人的認同。

對斯大林產生恐懼感的首先是他身邊的人，特別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時候，克里姆林宮已經處於一種人人自危、難以容忍的緊張狀態。通過1952年10月召開的十九大，斯大林把與自己同輩的「老近衛軍」全部趕出了新的領導核心。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受到秘密監視，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妻子被捕入獄。黨和國家的大事實際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別墅的晚宴上決定的，而能夠被召來出席晚宴的只有貝利亞（Lavrentiy Beria）、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少數第二代領導人。即使是他們幾人也整日戰戰兢兢，不知哪一天就會被從晚宴邀請名單中除名。就在這個時候，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然中風倒下。雖然導致斯大林最後死亡的真實原因目前仍無定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黨的高層領導人中，幾乎沒有一個人願意看到斯大林能夠重新站起來。在斯大林昏迷和彌留之際召開的蘇共中央、部長會議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以及會議作出的對黨和國家進行機構及人事調整的決議，充分證明了黨內領導人想要擺脫斯大林陰影的心態。[32]在斯大林去世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上便通過了關於「實行集體領導」的決定，並且達成共識：今後在黨的領導層中，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擔任可以凌駕於中央主席團其他委員之上的職務。[33]應該說，蘇聯領導層的「非斯大林化」實際上早在斯大林剛剛倒下時就開始了，儘管步履蹣跚並充滿了自相矛盾。

最先針對斯大林採取個人行動的是貝利亞。斯大林去世才一個星期，3月13日，內務部長貝利亞就命令成立若干偵查小組，負責重新審理包括著名的「醫生案件」在內的一些重大案件，而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組織的大規模政治鎮壓的重要內容。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醫生

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團還通過決議，赞成貝利亞採取措施揭露過去國家安全機構製造冤假錯案的罪行，「消除由於破壞蘇聯法律所造成的後果」。爾後，根據貝利亞的倡議，在5月9日主席團會議上通過了關於在節日期間禁止遊行隊伍抬舉領導人畫像的決議，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並由此談到了個人崇拜的危害性。[34]雖然這些措施沒有直接聯繫到斯大林，但是其邏輯的指向是清楚的。6月22日貝利亞的被捕當然不是因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過處理貝利亞事件卻為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提供了一個討論斯大林問題的機會。

有學者認為逮捕和處決貝利亞「實際上導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現了恢復斯大林化的現象」。[35]實際情況未必如此。7月中央全會形成的決議承認，蘇聯無論是在「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領域」和「共產主義教育」方面，還是在遵守「列寧制定的黨的準則」和「黨的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原則」方面，都存在着嚴重錯誤。特別是在黨的政治生活中，「積累了許多極其不正常的現象」。例如，一再推遲十九大的召開，連續幾年不召集中央全會，主席團「長時間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國家和經濟建設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的決議往往也沒有按黨章規定那樣事先在黨的領導機關集體研究討論」。決議還特別指出了「另一種不正常現象」，即「近幾年來的宣傳工作」「走上了宣揚個人崇拜的邪路，從而貶低了黨的領導核心和整個黨的作用」。[36]很明顯，這是在不點名地批評斯大林。令人感興趣的是，除了向黨內傳達會議精神外，蘇共中央還安排了三次會議，分別向中共、東歐各黨及意共和法共介紹情況，而在這裏，斯大林遭到了點名批評。據參加會議的意共代表帶回的材料，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報會。莫洛托夫在宣讀全會文件後進行的長篇解釋性講話中，列舉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錯誤。通過許多具體事例，莫洛托夫描繪出一個頭腦簡單、性情粗暴、處事偏執、權欲熏心，甚至還有些瘋癲的最高統治者的形象。蘇聯領導人要改變斯大林生前的一些做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強調他只是在講述一個偉人的錯誤，並把這些錯誤歸結為斯大林晚年的「病態」。莫洛托夫最後告誡說，為了避免重犯「個人崇拜」的錯誤，「應該堅持集體領導」。[37]顯然，此時個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還是沒有直接與斯大林的名字聯繫起來。同全會的精神一樣，在輿論宣傳上，所有的指責都是針對貝利亞的。蘇共領導人這樣做，很可能是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接受能力。儘管在黨內討論會上也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個人崇拜具體講是對誰的崇拜？宣傳個人崇拜的具體表現是甚麼？但是在社會上，民眾仍然像神一樣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年，各種報刊雜誌繼續連篇累牘、一如既往地頌揚和讚美斯大林。特別是1954年12月斯大林誕辰七十五周年時，各地關於斯大林的展覽、集會、頒獎等紀念活動

達到了高潮。[38]在這樣的氛圍中，1955年1月被罷免的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責他違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針和政策，並騙取了「偉大領袖」的信任。不過，中央全會決議的最後還是沒有忘記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39]

當赫魯曉夫的政治對手紛紛落馬以後，召開蘇共二十大的問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魯曉夫提議十個月後召開蘇共二十大，其議程是常規性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這項建議，其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要在會議上提出斯大林問題。[40]然而，在為二十大準備材料的過程中，一個無法迴避的重要問題浮現出來，這就是關於30年代大規模政治鎮壓的問題。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後不久已經開始，並成立了以莫洛托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只是進展緩慢。而黨的代表大會不僅要對一系列歷史問題做出結論，還要給千百萬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鎮壓、迫害和牽連的人及其家屬一個交代。於是，國家安全機關積極地開展了對在1936—1939年期間被判罪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案件的重新審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陰謀偽造的假案和通過粗暴手段製造的冤案，揭發材料如潮水般湧來。1955年3月14日蘇聯副總檢察長薩林（D.E.Salin）向蘇共中央報告，蘇聯檢察院特別案件處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份，共審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於在原審判中「粗暴地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而由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案件達7727件。此外，根據被判刑人員及其家屬的申訴書正在進行核查的案件還有一萬多件，而尚未處理的申訴書則有三萬多份。[41]

主席團不得不着手對這些案件進行認真研究，為無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關於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應該對這些冤假錯案承擔責任的各種申報材料已經堆積如山。同時，得到平反的人開始從監獄、集中營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42]在這種情況下，11月5日舉行的主席團會議做出決定：在即將來臨的斯大林誕辰時，不再像往常那樣召開隆重的集會進行慶祝，而僅在報刊上刊登一個消息。[43]由於社會的壓力，必須進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團會議上，根據赫魯曉夫的建議，成立了以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恩列斯研究院院長波斯佩洛夫（P.N.Pospelov）為首的新的專門委員會。會上還宣讀了當事人沙圖諾夫斯卡婭（O.G.Shatunovskaya）給米高揚的信，信中講述了有關調查謀殺基洛夫（C.M.Kirov）案件的情況：在列寧格勒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辦公室，兇手尼古拉耶夫（L.V.Nikolaev）當着斯大林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亞戈達（G.G.Yagoda）的面，講出他的背後指使者就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工作人員，然而卻遭到一頓毒打。受到震動的主席團成員要求繼續調查。[44]

一個月以後，問題暴露出來了。在1956年2月1日的主席團會議上，

蘇共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尖銳地談到斯大林和個人崇拜問題，並且引起了領導層內部的爭論。這一天，蘇聯國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偵察員羅多斯（B.V.Rodos）從監獄被帶到主席國會議，他被要求如實地回答所有主席團成員的問話。與之交談後，多數人都不再懷疑：鎮壓和刑訊都是斯大林本人親自設計、親自領導的消滅異己的活動。米高揚、波斯佩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謝羅夫（I.A.Serov）還談到了一些具體事實，表明斯大林確曾直接領導了大規模的恐怖活動，甚至規定了各地逮捕人員的名額。中央書記阿里斯托夫（Aristov）提出了一個尖銳而直率的問題：「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說出真相？」對此，赫魯曉夫提議將這些事實真相補充到二十大工作總結報告裏。別爾烏辛（M.G.Pervukhin）、布爾加寧（N.A.Bulganin）、米高揚贊同他的建議。莫洛托夫雖然也同意說出事實真相，但他堅持在報告裏必須指出「斯大林是偉大的領導人」和「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者」。在隨後的發言中，米高揚、薩布羅夫（M.Z.Saburov）、馬林科夫、別爾烏辛、布爾加寧、蘇斯洛夫（M.Suslov）明確表示支持赫魯曉夫的建議，認為「有責任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上向黨說明這一切」，「個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應該向黨說明全部真相，說明斯大林是甚麼樣的人」。只有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L.Kaganovich）支持莫洛托夫，儘管他們也同意「黨應該了解真相」。伏羅希洛夫建議，因事關重大，「應該考慮周全」，「一步一步地來」。莫洛托夫堅持認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領導下，社會主義取得了勝利」。至於那些「可恥的事情」，「在代表大會之前我們未必來得及搞清楚」。最後，赫魯曉夫總結說：「為了黨的利益應該做出決定」，必須認識到，「斯大林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但使用了殘酷野蠻的手段。斯大林毀滅了黨，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泯滅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聖的東西，而讓所有的人都屈從於他個人的意志。」因此，赫魯曉夫提出，雖然「在代表大會上不談恐怖手段的問題」，但「應該確定一個方針——把斯大林置於應有的地位」，以後在宣傳畫和文學作品中，「只宣傳馬克思和列寧」，並「加強對個人崇拜的批判」。[45]兩天以後，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從官方公開的政治語匯中消失了。在2月3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為紀念伏羅希洛夫七十五歲生日而發布授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命令中，只稱其為「偉大列寧的忠實學生」，而在以往的標準用語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46]

問題並沒有就此結束，莫洛托夫認為大會前未必能夠搞清楚的事情，沒過幾天就有了明確答案。2月9日，主席團討論了波斯佩洛夫委員會提交的一份長達七十頁的詳細報告，這份報告所列舉的大量事實證明，所有這些反黨、反蘇和反革命案件都是偵查機關捏造的，而且是採用各種非法手段逼供的結果。令人震驚的還有如下統計數字：1935—

1940年，因被指控從事反蘇維埃活動而遭到逮捕的蘇聯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處決的有688503人，鎮壓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處決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全國所有地區和部門，「在絕大多數共和國、邊疆區和州，黨和蘇維埃機關的領導人幾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之中，有98人被逮捕並無一例外地被槍決，在1966名擁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大會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槍決。報告提出的充分證據表明，不僅大規模鎮壓運動是斯大林直接推動的，其中許多重大案件還是他親自過問和決定的，甚至採取「對社會主義法制最粗暴無恥的破壞」的酷刑和「最野蠻拷打」的方式進行審訊，也曾經兩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勵。報告最後總結說：「這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惡果，而這種『個人崇拜』無限度地、無止境地讚美和誇大了斯大林的作用。」[47]

所有看到報告的人都震驚了，米高揚後來回憶說：「事實是如此地令人恐怖，當他（波斯佩洛夫）匯報時，特別是講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裏噙着淚水，聲音也顫抖了。大家都驚呆了，雖然我們也知道很多情況，但委員會所匯報的一切，我們當然是不了解的。而現在，這一切都經過了核查並被文件所證實。」[48]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些材料，主席團會議再次出現了嚴重分歧的場面。赫魯曉夫首先表態：應該有勇氣向代表大會說明真相，需要考慮的是怎樣講，由誰來講，但不講是不誠實的。赫魯曉夫建議委託波斯佩洛夫起草報告，重點是講個人崇拜問題，還提議將列寧表示要與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遺囑」等未公開的歷史文件分發給大會代表。同2月1日的會議一樣，莫洛托夫立即站出來表示反對，他堅持認為斯大林是列寧的繼承人，而且領導蘇聯實現了工業化。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傾向於莫洛托夫的立場，雖然同意向大會說明真相，但強調要「保持冷靜」，「謹慎行事」。其他所有人則明確支持赫魯曉夫的意見，反對莫洛托夫的立場。關於個人崇拜，阿里斯托夫的話很有哲理：斯大林時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騙人民的年代」，「人們想把他變成神，最後卻得到了一個魔鬼」。薩布羅夫也指出，斯大林的問題「不是缺點」，「而是犯罪」。赫魯曉夫最後總結說，關於在代表大會上說明事實真相，已經沒有分歧，差別是細微的，並強調不必害怕，也不要「猶豫不決」，而應該「徹底揭露」個人崇拜問題。至於由誰來報告，赫魯曉夫建議提交中央全會討論。[49]會議通過了在2月13日下午召開中央全會和讓二十大代表了解未發表的列寧文件的決議。[50]

2月13日首先召開的主席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如下決議：委託赫魯曉夫召集中央全會；向中央全會提交議案，說明主席團認為必須在代表

大會的秘密會議上做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並確定赫魯曉夫為報告人。[51]赫魯曉夫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所做的說明很簡單，沒有涉及任何具體內容，只是提到「為了使代表們正確地理解出現在個人崇拜和集體領導問題上的重大轉折，為了使他們能夠掌握更多的具體材料，應該做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會議一致通過了主席團的議案。[52]這就是說，在大會召開之前已經確定，由赫魯曉夫本人在一次秘密會議上做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只是，中央委員並不了解報告的具體內容，報告的文本或提綱也沒有提交會議討論。原因很簡單：報告文稿還沒有形成。直到大會召開了幾天以後，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們起草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初稿，其主要內容是關於30年代實行政治鎮壓的大量具體事實。赫魯曉夫顯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記員口授了一些需要補充的內容。在這份口授記錄中，不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對黨內領導人實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詞也顯得更加尖銳和激烈。[53]隨後在這兩個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礎上，整理出最後的文本，並分發給主席團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徵求意見。在2月22日臨時召集的主席團會議上，決定了宣讀秘密報告的時間——24日大會選舉結束以後。25日以前，報告的最後文本終於準備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蘇斯洛夫、謝皮洛夫（D.T.Shepilov）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動都不大，主要集中在報告的結尾部分，赫魯曉夫補充的部分事例被刪掉了。最後文本吸收並綜合了這些意見。[54]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就是這樣出籠的。[55]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問題，絕不是某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是時代前進的體現，社會發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黨內活動和社會趨向預示了改革的基礎，包括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在內蘇共新領導人的措施反映了變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論前提是客觀存在的。第二，對斯大林的崇拜是蘇聯社會變革的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並不是個人或小集團謀求權力的工具（儘管不排除在黨內鬥爭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為鋪墊改變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歷史冤案的社會浪潮不過是為赫魯曉夫提供了一個機會。蘇聯要擺脫危機，必須破除個人崇拜的羅網。這是蘇共中央集體的決定，分歧只在於問題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第三，囿於認識能力和傳統思想，二十大並沒有從社會變革的層面提出改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任務，而僅限於政策性調整和某些具體措施的實施。赫魯曉夫正是利用傳統力量擊敗了政治對手，而他本人也受到傳統勢力的束縛。赫魯曉夫並非要、也沒有全面否定斯大林。第四，無論如何，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新一代蘇聯領導人雖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畢竟開始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

了。更準確地說，二十大為共產黨國家提供了一種改弦易轍的可能性，一個擺脫斯大林模式束縛的歷史機會。然而，赫魯曉夫的驚人之舉在共產黨世界引起的反應卻是複雜的，其命運也是難以預測的。

[1]人民出版社编：《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55—63。

[2]特別是關於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說法，仍為官方所使用。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59—360。由此，很多學者認為二十大引起的中蘇分歧標誌着中蘇關係出現了嚴重分裂，「成為中蘇關係史上第一個歷史轉折點」。如見孫其明：《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239—240。

[3]以上論述參見赫魯曉夫關於蘇共中央工作總結的報告，米高揚在大會上的發言，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大會上的發言，蘇共中央關於工作總結報告的決議，分別刊登於1956年2月18，22，23，26日《人民日報》。1956年1月3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對二十大總結報告的文稿進行了深入討論，並集中在對外政策問題上。只有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提出不同意見，而多數人完全支持報告的觀點和結論，並批評了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的看法。卡岡諾維奇最後表示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莫洛托夫沒有表態。詳見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43-51об., Ацлермохер К.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ю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Х Х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ЗН,2002, с.88-93。

[4]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НСС, 2002, с.15.

[5]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可參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相關的檔案文獻見沈志華編：〈關於朝鮮停戰的俄國檔案選编〉，〈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4期，頁150—175。

[6]Правда, 13 Марта 1954г.

[7]Рейман М.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М.Маленков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 No.1, с.31.

[8]1954年4月1日，蘇聯有關部門向赫魯曉夫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報告了一些蘇聯著名物理學家的看法：熱核武器的出現已經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大規模使用核武器將導致交戰雙方的毀滅，人類正面臨着毀滅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脅等。TsKhSD{當代文獻保管中心}，f.5,op.3,d.126.II.39-41，轉引自Y.Smirnov and V.Zubok, "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4,Fall 1994,14-15。可參見蘇聯著名核物理學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給赫魯曉夫的信件，載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六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465—488。

[9]參見 V. Mastny,"The Soviet Union and Ше Origins of the Warsaw Pact in 1955", N. E. Rosenfeldt, B. Jensen, and E. Kulavig ed., Mechanisms of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243-254；Csaba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WIHP Working Paper, No.16, 1996； Matthew Evangelista, "Why Keep Such an Army?-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 CWIHP Working Pape, No.19,1997；Обинкина Е. О. Совете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и война в Алжире 1954-1962г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МИДРФ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No.1, с.19-24； Катаонова Е.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955-1956гг.） // ПроблемЬ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3, No.5, с.121-132； ФурсенкоЬА.А.（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мд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с.69-71, 906-908，及《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六卷，頁587—608。

[10]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с.88-95.

[11]Афиани В.Ю., И ванов И. 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уэц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ЦХСД, 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rter for Scholars CWIHP Workroom ；〔南）韋利科·米丘諾維奇（Veljko Micunvic著，達洲等譯：《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北京：三聯書店，1980），頁27—28。

[12]MF2524607-0807, 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大學圖書館縮微膠卷檔案。

[13]Csaba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14]以上論述見赫魯曉夫關於蘇共中央工作總結的報告，米高揚在大會上的發言，馬林科夫在大會上的發言，布爾加寧關於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指示的報告，分別刊登於1956年2月18、22、23、25日《人民日報》。

[15]關於斯大林模式的研究，著述頗豐，在中國學者的論著中，筆者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有姜長斌主編：《斯大林政治評傳（1879—195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譯出版社，1999）。至於對蘇聯新經濟政策的研究，可參見沈志華：《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16]參見中共中央编譯局编譯：《斯大林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441—454。

[17]關於戦後蘇聯社會狀況的詳細史料，可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三十卷，也參見俄國學者的論著：ЯыжшсовA. fi. Советск 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евских рефор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No.2. c.33-43； Наумов В. Н.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II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No.4, c.29-30； 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 （1949-1953）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9, No.3, No.4, No.6；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18]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c.29.

[19]《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三卷，頁694。

[20]РГАЭ, ф.4372, оп.96, д.693, л.161-162，轉引自 Сыл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л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 ЮССПЭН, 1996, c.201.百分比為筆者計算所得。

[21]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匯编》（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頁35、41、135—137，164—165。

[22]關於1953年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爭先提出經濟改革措施的情況，詳見Зубкова Е. 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4, c.109-111； 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6, c.8-11.

[23]蘇共中央決議指出，馬林科夫在1953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九月會議上的發言「將重工業的發展速度與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發展速度對立起來，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作為重要的結論，他還提出了加快輕工業發展的口號。因此，某些可憐的經濟學家抓住馬林科夫同志的這個錯誤講話，在蘇聯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上宣揚明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要求優先發展輕工業，並不是偶然的」。參見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 пленума, c.31.

[24]《人民日報》，1956年2月18日。

[25]《人民日報》，1956年2月26日。

[26]尼古拉·津科維奇著，郅友昌等譯：《權力與爭鬥》（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203—204；Пыжиков А. 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 II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No.4,c.51.在蘇聯領導人中，只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在發言時沒有提及個人崇拜問題。參見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 1998, No.2,c.110-111.

[27]《人民日報》，1956年2月22日。著名歷史學家潘克拉托娃在發言中也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提出了批評。參見《內部參考》，1956年2月23日，頁235—237。

[28]如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參見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9, No.1, c.6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17—18。

[29]幾乎所有的中文論著都說秘密報告的時間是在24—25日夜間，不知根據何在。而在俄國檔案的記載中，24日晚間進行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選舉，由布爾加寧主持和赫魯曉夫報告的秘密會議是在25日上午舉行的。РГАНИ，ф.1,оп.2.д.17, л.89-90,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50-251； 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 С.111-113.

[30]直到1989年，蘇聯才在復刊的《蘇共中央通報》（第3期）上首次發表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文本。參見Язвестияи ЦК КЛСС, No.3，1989,C.128-170。這個文本就是當時在蘇聯各級黨團組織中傳達用的印刷小冊子，與赫魯曉夫1956年2月25日在秘密會議上宣讀的報告有些區別。3月1日赫魯曉夫對宣讀的報告文本的修改，主要是補充了部分即席發揮的內容，對引用文獻做了技術性加工，增加了反映會場效果的內容（如全場起立，鼓掌等），以及少量的文字修訂。參見Айлелад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42-44。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以前在蘇聯民間流通的有關秘密報告的俄文版本，大都是從國外英文本轉譯的。參見裘實编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三種俄文版本〉，《蘇聯問題研究資料》，1987年第2期，頁82—83。關於這個報告公開出版的中文本至少已經有三個。1988年2月東方出版社出版了《赫魯曉夫回憶錄》，同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拉齊奇所著《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事件始末》，這兩本書作為附錄收入的報告文本都是譯自西方久已流傳的1956年美國國務院發表的英文本，而199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麥德維杰夫著《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所附的報告文本，則譯自蘇聯1989年首次公布的俄文本。經過核對，筆者發現俄文本與英文本的內容和文字幾乎也是完全一致的。俄國學者從文本來源考證得出的結論與此相同。參見Айлерлохг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30。儘管如前所說，這個文本與赫魯曉夫宣讀的報告有些差別，但並不影響人們對報告實質和基本內容的了解。更令人感興趣的是，據新華社當時查對，美聯社和合眾社播發的報告原文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3月16日印發的那本文件。除個別用詞外，「段落和文字都相同」。參見《內部參考》，1956年6月9日，頁229。本章使用的秘密報告引文，均出自《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一書的附錄，以下所引不再註明出處。

[31]關於這種說法，可見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頁500—511；拉齊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事件始末》，頁4—8；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頁60；津科維奇：《權力與爭鬥》，頁210。

[32]有關史料見Медведева Ж.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0, No.1； Пихоя О внут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Рейман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六卷，頁370—377，以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33]Наумов В. 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No.5, с.19.

[34]《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六卷，頁380—409 ； ЦХСД, фД оп.10, д.22, л.3,од. 20, л.11, Наумов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с.20-22,27-28.

[35]Рейман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 пленума, с.29-30.

[36]《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八卷，頁47—72。這裏根據原文對譯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見Наулов В.,Сuгацев Ю.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9, с.265-273.

[37]R. J. Service, "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Soviet Studies, Vol.33. No.2 （April 1981）, 240-242.代表中共出席通報會議的是高崗，但可惜至今沒有看到中方有關這次會議的任何史料。

[38]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 л.20,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47-49.

[39]Рейман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го（1955г.） пленума, с.30-32.

[40]РГАНИ,ф.1, оп,2, д.1, л.7, 4-5, Айиерлшдг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167-168.

[41]Артизов А. ит. б. составители, Реабили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 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2, Февраль 1956-начало 8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МФД, 2003, с. 196, 201.

[42]Наул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с.27；麥德維杰夫：《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 頁 62—63。

[43]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33-34； д.388, дд.61-62, Аймермахер，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169-172.參見Наулов, Хрущев н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с.27.

[44]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30-35,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с.79,171-172, 912；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9, с.200.

[45]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52-54, Айлелад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175-177.參見Наумов В. Л.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На ХХ съезде КПСС //

Hoeas и Новейщав, ucroptus, 1996, No.4, c.156-157.

[46]Правда, 4 февраля 1956г.

[47]АПРФ,ф.3, оп.24,д.489,л.23-91, Айлелад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185-230.根據90年代初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披露的數字，1930—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和處刑的3778234人，其中處決了786098人。已經查出的被鎮壓者的墳場約有100個。參見姜長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評傳》，頁546。關於蘇聯大清洗的最新研究，參見鄭異凡：〈論斯大林鎮壓問題研究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和馬龍閃：〈蘇聯「大清洗」受迫害人數再考察〉，皆收於《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至於具體人數，這恐怕與中國當年右派的人數統計一樣，很難說得十分準確。不過，如果有人以為只要把受害者人數減少一些，就可以改變「大清洗」和斯大林罪行的性質，那實在是太可笑了。原蘇共中央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A.N. Yakovlev）說得好：無論如何，斯大林殺死的共產黨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獨裁者所殺死的加起來還多，提醒這一點對當今斯大林分子是有益的。參見〔 俄〕亞·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譯：《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頁321。

[48]АЛРФ, ф.39, оп.3, д.120, л.115-116,轉引自 //дуемое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с.157.

[49]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56-62об, Айлелад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34-237.

[50]РГАНИ. Ф.1, оп.2, д.182, л.1； ф.3, оп.10, д.223, л.25, Айлелад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38.

[51]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64-66； ф.1, оп.2, д.1, л.64,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39-240.

[52]РГАНИ. ф.2, оп.1, д.184, л.6-8, Аймерлахг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41-243.

[53]АНРФ, ф.52, оп.1, д.169, л.1-28об, 29-63,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120-133,134-150。參見Наул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с.163-164.有學者認為，秘密報告是赫魯曉夫私下秘密完成的。參見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э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шев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эета,21 1996г.，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54]參見 Аксюиин Ю.В., Пыжиков А. В. О л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X X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и 2002, No.2, с.114； 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с.163-164, 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е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 No.2, с.15。各種修改文本似乎尚未發表，但在關於二十大的文件匯编中收入了有關目錄，見Аймерлахг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119。

[55]據俄國學者考證，赫魯曉夫作報告時有一些即席發揮的內容，在會後整理並傳達的小冊子裏，只有少數保留了下來，同時還對引文做了技術性加工，基本上就是會前準備的和目前人們看到的那個報告文本。參見Акюшин,Яыжико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заб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с.116；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с.165-166。

二 中共中央與非斯大林化

儘管斯大林已經去世，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還在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還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蘇聯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作用和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共產主義世界是緊隨蘇共之後的第二大黨，特別是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表現，令所有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和民眾肅然起敬，欽佩不已。因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的立場和態度，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1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衝擊波

首先對二十大作出反應的當然是出席大會的蘇聯代表，反應最強烈的當然是斯大林問題。據會議參加者證明，如往常一樣，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受到普遍贊同，人們繼續對黨歌功頌德。但對斯大林問題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在大會討論的過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揚關於個人崇拜的發言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支持。還在會議期間，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某地方組織負責人就發來電報稱：「我不同意米高揚的右傾講話，這一講話是對活在整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輝形象的一種褻瀆，並且將會為整個資產階級所欣然接受。」[1]人們作出如此反應，顯然是不了解米高揚發言的背景。因此，當赫魯曉夫作為中央第一書言己宣讀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時，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了從未經歷過的意外和震驚，會場的氣氛異常壓抑和緊張，甚至有人當場暈倒。[2]這種局面本該使蘇共領導人意識到處理斯大林問題應當特別慎重，但蘇共中央的做法卻是，從黨內到黨外，從國內到國外，不斷擴大秘密報告傳播的範圍，以致最後引火焚身。

在1956年2月19日赫魯曉夫對報告的補充提綱中，強調指出的是，關於個人崇拜問題不能超出黨的代表大會的範圍。[3]但是在2月25日的秘密會議上，知情者的範圍已經擴大到代表大會以外，會議同意將秘密報告及其決議「寄發給各級黨組織」。[4]不久，傳達範圍又進一步擴大到黨外。3月5日主席團做出決議，「讓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以及工人、職員和集體農莊莊員中無黨派積極分子」了解報告的內容，並決定取消下發材料上的「絕密」標誌。[5]3月7日，根據主席團的決議，將赫魯曉夫於3月1日提交給主席團的、經過校訂的報告文本寄發給各級黨組織，以便向下傳達。[6]據當時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幹部報

告，「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傳達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傳達到了基層組織」，而各種流言傳播得更快。[7]3月24日和28日，蘇共中央聯絡部建議，對於各民主國家，可以向黨團中央及各地區和部門主管幹部，以及在蘇聯學習和工作的黨員和預備黨員介紹和宣講秘密報告。[8]就在3月28日這一天，《真理報》發表了編輯部文章〈為甚麼個人崇拜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地指出所謂批判個人崇拜，就是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9]於是，秘密報告不再秘密，斯大林問題的衝擊波在秘密報告那顆炸彈爆炸後一個月產生了最大的震盪力。

幾乎沒有人懷疑，積極推動將斯大林問題從黨內高層擴展到基層和一般民眾乃至國外的，正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本人。[10]赫魯曉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擊政治對手，為個人爭奪統治地位，[11]還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擾，為進一步改變傳統政策打開通道，亦或純粹為形勢所迫而身不由己，[12]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斷。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斯大林問題如此迅速而無限制地擴散和傳播，用長遠的歷史眼光看，是引發了人們的思考——社會主義道路是不是還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13]不過，從現實的角度觀察，蘇共的做法也確實造成了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陣營極大的思想混亂，其結果反而給繼續推行改革政策帶來了諸多困難和阻力。

受到最大衝擊的自然是蘇聯社會本身。目前披露的豐富檔案文獻顯示，在廣泛的討論中，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疑問和意見，有些是十分尖銳和激烈的。很多人認為斯大林身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是「國家的罪人」，「沒有資格葬在列寧墓裏」。更極端的意見認為，三十年來的蘇聯社會是「高度獨裁的專制國家」，還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應取締蘇聯共產黨，燒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所有著作。[14]但更多的人認為，把一切罪過都推給斯大林一個人「是不公平的」，秘密報告是「對斯大林的誹謗」，「一切都是胡說八道」，「斯大林將永遠活在歷史上，永遠活在整個進步人類的心中」。[15]儘管觀察者和研究者對當時蘇聯社會的主流傾向有不同的判斷，但明顯的是，斯大林問題在如此廣泛的層面展開討論，其結果的主要特徵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會的分裂和混亂。[16]這一現象最突出的表現就是3月7—9日在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第比利斯市發生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在這次布爾什維克掌權以來發生的最大一次自發性示威遊行中，對批判斯大林強烈不滿的人群與軍警發生衝突，造成數百人傷亡，大批人被判處一至十年的徒刑。[17]

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反應同樣十分強烈。在剛剛被納入陣營的南斯拉夫可以聽到一派讚揚聲，而在西歐和美國共產黨卻出現了嚴重分裂的局

面。東歐各國的情況比較複雜，東德領導人迫不及待地公開發表文章讚揚和吹捧蘇共的新精神，阿爾巴尼亞表面上贊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則表示了不滿和否定的傾向，在波蘭和匈牙利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頭喪氣，其他幾個國家則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18]至於亞洲國家各黨，則採取了比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鮮、越南和印尼共產黨內，都嚴格限制了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傳達和討論。[19]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多洛雷斯·伊巴露麗（Dolores Ibarruri）當時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憶說：得知蘇聯領導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實後，我們感到異常壓抑和沉重，似乎還是茫然無知好些。[20]究其原因，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斯大林問題的提出，而是提出問題的方式。對這一點，新華社駐莫斯科記者當時的觀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蘇共在沒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組織準備的情況，貿然拋出斯大林問題，而且傳達的範圍太廣，速度太快，事後又缺乏解釋和教育工作。[21]恐怕這才是造成混亂局面的主要根源。[22]

總之，蘇共二十大所面臨的局面是，長期以來的殘酷鎮壓手段和瘋狂造神運動已經使斯大林成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任何理論創新和政策調整都會遇重重阻力，更不用說要改變斯大林體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為個人崇拜的病毒已經滲透到蘇聯社會的骨髓和細胞，所以任何細小的手術都必須謹慎從事，否則就會引起整個功能紊亂。這種混亂的局面，加上輿論壓力和黨內本來就存在的意見分歧，蘇共在召開二十大後不久便採取了相對保守的方針，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凍的步伐。

4月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做出決議，解散蘇聯科學院熱力工程實驗室黨組織，將部分黨員開除出黨，並對黨員進行重新登記。其理由是在黨的會議上有人對二十大總結報告進行惡意攻擊，聲稱蘇聯社會是不民主的社會，而該黨組織不僅沒有奮起譴責這些言論，甚至還為部分發言者鼓掌。[23]同日《真理報》發表文章，強調「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政策始終是列寧主義的政策」。[24]同時，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黨的領導人不斷發表講話，批評各種「打着譴責個人崇拜的旗號企圖懷疑黨的正確方針政策」的人。[25]為政治鎮壓犧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極大限制，不僅拒絕重新審理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治案件，甚至對許多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雖然給予了法律上的平反，卻沒有恢復他們的黨籍，因為他們曾經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辯護。[26]

6月30日蘇共中央「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雖然保留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主要觀點，但口氣已緩和了許多，並特意強調「如果從過去存在個人崇拜的事實中作出蘇聯的社會制度有了甚麼改變的結論，或是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本質中尋找這種崇拜的根源，那就是嚴重

的錯誤」。[27]接着很多人因發表超出二十大規定的討論範圍的言論而被扣上反蘇反共的罪名關進監獄。[28]筆者對50年代由蘇聯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反蘇鼓動和宣傳案件」的數量進行統計對比的結果，特別能說明問題。1953年是最高峰，為1229件，1954年猛降到151件，1955年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29]難怪在蘇聯有人認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舊的軌道上去了」。[30]應該說，這種狀況的出現與中共的態度和立場不無關係。

2 中共中央迅速傳達秘密報告

與蘇聯相比，中國當時所處的環境和面臨的問題不同，因此，觀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場也就有很大的區別。總體的發展曲線是，蘇共在二十大提出的非斯大林化方針並不堅定，而且在黨內外的壓力下日益趨向保守，直到1961年10月的蘇共二十二大才真正開始推行非斯大林化運動。中共立場的變化歷程恰好相反，一開始基本上是贊同二十大的路線，波匈事件後有了新的思考，到1960年與蘇聯分歧公開化以後，才提出了一整套與蘇共二十大對立的方針政策。無論如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的最初反應並非像後來中蘇論戰時所說的那樣，從一開始就持反對和否定態度，而是有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

二十大召開後，《人民日報》陸續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揚發言在內的蘇共公開發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則詳細報道了西方報紙對和平共處方針和米高揚發言的評論，以及蘇聯為大批30年代政治鎮壓受害者平反的消息。[31]這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十分強烈的反響。通過《內部參考》的報道可以看出，各地幹部、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驚和迷惑」，出現了「各種混亂思想」和「種種揣測」，甚至有人懷疑是翻譯時出現了錯誤。議論主要集中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和議會道路等一些理論問題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給予明確解釋和指導。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4月上旬。[32]

實際上，對於蘇共在斯大林評價方面發生變化的跡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覺和了解，並且持一種認同的態度。[33]當然，在斯大林問題上，蘇共也並非有意對中國搞「突然襲擊」。鑑於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地位不斷提高，赫魯曉夫擔任黨的第一書記後，特別重視發展與中共的關係。還在二十大召開之前，蘇聯黨和國家的所有領導人不僅分別會見中共代表團，而且還暗示要在大會上批判斯大林。如2月6日赫魯曉夫接見中共代表團團長朱德和大使劉曉時，就大談斯大林在農業問題上的錯誤。代表團急電請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會議。接到中央「照常參加」的電示後，代表團經研究一致決定，對批判斯大林的問題

不表態，不發言，採取迴避政策。[34]很可能是出於這個原因，朱德在大會發表的賀詞中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讀的毛澤東的賀詞則提到蘇共是「斯大林及其親密的戰友所共同培育的」。[35]會議期間，赫魯曉夫在19日宴會上又主動表示，會後將同中共代表團談斯大林問題。對此，中共代表團確定的方針是「對斯大林的功過不表示意見」，但同意「提倡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性」。[36]於是，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赫魯曉夫的工作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以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總結了蘇聯的歷史性成就，「規劃了蘇聯人民繼續前進的道路，同時也指明了各國人民爭取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方向」。[37]

關於中共中央何時以及如何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文本的情況，中國史料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據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在大會期間就交給中共代表團一份秘密報告。[38]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吳冷西的說法是，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秘密報告的內容，只唸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後來，新華社是根據3月10日《紐約時報》刊登的報告文本連夜組織翻譯並印發中央領導人的。[39]這裏也有記憶的錯誤——《紐約時報》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報告文本的，而新華社翻譯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關報告內容的傳言和消息。李、吳對研究中蘇關係無疑是重要的當事人，但他們當時都不在莫斯科，對二十大並未身歷其境。

據陪同朱德參加二十大的翻譯趙仲元回憶，秘密會議召開之前，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A. D. Ponomarev）就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情況，並解釋說對中共並沒有保密的問題，但蘇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團參加秘密會議，因此也不便單獨邀請中共代表團。報告的第二天（2月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謝爾巴科夫（L. A. Shcherbakov）便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俄文本交給了中共代表團，趙仲元等人連夜將報告譯成了中文。[40]匈牙利代表團團長拉科西（Rakosi）回憶說，他也是2月26日看到報告文本的。[41]不過，俄國檔案記載的情況是，2月27日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將報告和決議文本（共印製三十份）交給了參加大會但未被邀請出席秘密會議的十三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並要求「離開莫斯科之前應將材料交回」。[42]27日和28日蘇共中央邀請中共代表團舉行會談，主要內容就是通報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赫魯曉夫反覆強調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意義，認為不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黨的生活準則和社會主義法制就不能恢復，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發展」。[43]

3月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專門印製150份報告文本，並通過蘇聯駐外使館寄給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44]於是，3月3日鄧小平等從

蘇聯回到北京時便帶回一份報告文本。[45]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書面報告鄧小平：蘇共中央交來一份經赫魯曉夫本人校對過的秘密報告的正本，並告文本不必退還，用後可以燒掉。[46]另據薄一波回憶，米高揚4月6日訪華時也帶來一份秘密報告文本。[47]

總之，到3月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已經了解到秘密報告的具體內容，而且先於西方得到了報告文本。不過，中共中央對此並沒有及時作出任何公開反應，也沒有在黨內立即答覆基層黨政組織的各種猜測和疑問。在3月10日蘇聯報刊保密檢查總局匯報外國報刊對二十大反應情況的報告中，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態度只是一些猜測。[48]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澤東和中共對斯大林問題如何反應的美國情報專家也是一無所獲。[49]

在對赫魯曉夫的報告保持沉默的同時，中共在得到秘密報告文本後，卻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讓人們了解蘇聯批判斯大林的具體內容。與朝鮮勞動黨和越南共產黨的做法不同，中共沒有刻意控制秘密報告的傳播範圍，不僅在廣大黨員中照本宣科地口頭傳達了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而且將譯文印成小三十六開的冊子，只在刊頭上印有「內部刊物，注意保存」兩行字，隨《參考資料》（供高級幹部閱讀）發放。同時，《參考消息》（供一般幹部訂閱）上也大量刊登各國對二十大和斯大林問題的反應。這些內部刊物雖然發行範圍有限，但並非機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書店甚至公開出售刊有秘密報告的美共英文報紙《工人日報》，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競相購買，以致搶購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來毛澤東「並不反對讓這個報告的內容從各種渠道泄漏出去」。[50]這至少說明了毛澤東當時的一種心態：並不擔心非斯大林化會在中國引起甚麼嚴重後果，甚至還以贊同和欣賞的眼光看待之。

3 毛澤東如何看待斯大林問題

關於毛澤東在斯大林問題上的最初看法，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即黨內會議的討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間的談話。這三者之間還是有些不同的：公開表態最為謹慎，內部討論就開放一些，而私下談話最為自由。由於目前中國相關的檔案文獻尚未開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吳冷西回憶錄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黨內討論，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公開表態，以及俄國的檔案文獻——毛澤東與蘇聯大使尤金的數次談話。

還在蘇共二十大召開期間，2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便議論了蘇聯問題。3月3日中共代表團成員鄧小平、譚震林回到北京的當天，毛澤東就在中南海懷仁堂休息室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康生、聶榮臻、

劉瀾濤等人開會，由鄧小平匯報參加蘇共二十大的情況。[51]此後（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連續舉行高層會議，集中討論了斯大林問題。毛澤東在這幾次會議上所表述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52]

（一）雖然中共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兩篇社論（2月19日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和2月28日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表示支持蘇共二十大，但一開始就有保留意見，主要是對「和平過渡」問題有不同看法，只是沒有表露出來。當時對斯大林的問題因不了解情況，沒有表態。

（二）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毛澤東認為值得「認真研究」，首先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所謂揭蓋子，就是破除了對蘇聯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國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思考和辦事了。所謂捅婁子，就是指蘇共對斯大林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人物」進行批判，事前沒有同其他各國黨商量，搞「突然襲擊」，大家都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三）揭露和指責斯大林在對待中國及中國革命問題上所犯的一系列錯誤，說出了「他六年來一直藏在心裏的話」，特別着重講了斯大林四次整中共的錯誤和他本人訪蘇期間不愉快的經歷。但是涉及到對斯大林的評價，認為應該三七開，正確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

（四）實現共產主義的空前偉大和空前艱巨的事業，因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是第一個搞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要盡量少犯錯誤，避免犯大錯誤，因此必須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反對片面性。

（五）面對國際風浪，中共應該表態，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態，分析斯大林的錯誤，表明對共產主義前景的信心。在討論即將發表的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澤東強調指出，從蘇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中共其他領導人在會議上的發言，大都是在毛澤東所談看法的基礎上繼續闡發。鄧小平和王稼祥認為秘密報告雜亂無章，沒有找到蘇聯所犯錯誤的根源，指出，「個人崇拜是錯誤的結果，而不是錯誤的原因」。周恩來和張聞天列舉了斯大林時期蘇聯在國內政策方面的許多教訓，特別是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大國沙文主義錯誤。劉少奇也有大量發言，認為赫魯曉夫是「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而沒有對其錯誤進行分析。他歸納了斯大林在肅反擴大化、蘇德戰爭、農業問題和指導國際共運四個方面的錯誤後指出，斯大林的錯誤主要是思想方法問題，是主觀

脫離客觀。最後大家一致認為秘密報告泄露出去影響很壞，同意用公開發表文章的方式，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的立場，同時正面分析斯大林的錯誤，補救秘密報告的失誤。

所謂公開表態，就是指經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和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53]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的思想混亂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觀點和立場，扭轉一些兄弟黨悲觀失望的情緒，而這個任務本來應該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蘇聯黨來完成。[54]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對於斯大林問題的「全面分析」來教育和指導中國黨內外廣大幹部和群眾，解除他們中間的種種疑問和揣測。[55]顯然，文章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必須解決的歷史性問題，而這個問題，是蘇聯共產黨提出但無法自己解決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蘇共二十大的歷史功績，特別是揭露個人崇拜問題的勇氣，接着便對斯大林問題展開了全面討論。在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討論的基礎上，文章突出強調的有以下幾點：

（一）蘇聯是「一個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能夠設想它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呢？」「無產階級專政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強調集中，就會出現錯誤，這是「完全能夠理解的」。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個人崇拜的錯誤在所難免。

（二）斯大林在後期工作中「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統統歸結為個人崇拜，從根本上說還是主觀不符合客觀，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是思想方法問題」。是因為他的驕傲和不謹慎，「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這就是說，斯大林錯誤的根源不在於個人崇拜而是思想認識問題。

（三）「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是千百萬人的一種習慣勢力」，因此必須與之進行長期的鬥爭，即使是在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種矛盾和鬥爭也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說，個人崇拜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獨有的現象。

（四）吸取個人崇拜的教訓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內，必須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這是被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這就是說，對書本上的東西和蘇聯的經驗是需要分析和鑑別的。

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認識的確前進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層。不過，有些研究者似乎過分誇大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與蘇共方針的區別。很多人注意到，《真理報》在

轉載該文時刪掉了有關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小生產思想殘餘的段落。[56]這或許可以證明蘇聯領導人對中共中央的某些理論

觀點一時還無法理解和接受，但並不能說明他們在總體認識上存在分歧。如果進一步考察，首先應該看到，除捷共、阿共、日共、越共和朝鮮勞動黨的報紙全文轉載外，其他各國共產黨的報紙刊登的都是摘要或有所刪節。[57]顯然，這並不說明他們就一定不同意文中的看法。其次，從普遍的反映看，無論是蘇聯還是其他各國共產黨，對中共的文章是一遍讚揚。[58]雖然開始可能有一些看法不同，但中共中央的本意完全是為了幫助蘇共。這一點，赫魯曉夫心裏是明白的。很能說明問題的是，蘇共中央在6月30日〈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中，特意引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來說明中共「擁護和支持我們黨所採取的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措施」。[59]同時，為了給黨員幹部提供學習材料，《真理報》出版社還將這篇文章進行全文準確校對後，印成小冊子，發行了二十萬冊。[60]

如果說在理論探討方面中共更多地想顯示比蘇共高明的方面，那麼在與蘇聯人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則着重強調中蘇兩黨一致的方面。

在3月31日與尤金進行的三個小時「情緒極佳」的談話中，毛澤東列舉了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雖然在原則上承認斯大林對中國問題的路線是「基本正確」的，但就斯大林的所作所為而言，幾乎沒有正確的地方。毛澤東指出，「在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成為共產國際實際上的領導人，他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出大量不正確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人要依靠國民黨，服從國民黨。後來，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話，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在抗日戰爭中，王明總是以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名義為掩護，搞投降主義活動。共產國際只是在最後一段不長的工作時期才轉變了看法，但毛澤東認為這是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功勞。毛澤東特別講到，共產國際解散後斯大林仍然錯誤地估計中國的形勢和革命發展的可能性。他堅持主張中共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為此，斯大林以「俄共（布）」名義發來秘密電報，堅決要求毛澤東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國共決戰的關鍵時刻，斯大林卻懷疑中國的革命力量，堅決主張同蔣介石講和。中國革命已經勝利以後，斯大林對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態度。毛澤東帶有幾分氣憤地說，更有甚者，當時有許多議論，說甚麼中國共產黨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甚麼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接着，毛澤東又大談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強烈批評斯大林對中國所犯的大國主義錯誤。同樣，在蘇聯國內問題上，毛澤東雖然在總體上認為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優秀的、忠實的革命家」，但對於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具體錯誤沒有提出任何否定

意見，反而對其進行總結，並歸納為七個問題。看過以上談話記錄，給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問題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說法並無多大區別。當尤金指出，「斯大林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近似神化的個人崇拜」時，毛澤東表示同意，並說，「斯大林的錯誤是由小到大逐漸累積的」。毛澤東還說，蘇共二十大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於蘇聯共產黨主動提出了所有這些問題，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許多問題。[61]

4月6日毛澤東、劉少奇會見來訪的米高揚，蘇聯代表團此行的主要任務是簽訂蘇聯援助中國再建五十五項重點工程的協定。會見中，米高揚通報了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的有關情況。毛澤東感謝蘇聯的援助，並表示也將一如既往地盡力支持蘇聯。談到斯大林問題，毛澤東說，中蘇之間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斯大林功大於過，對他要作具體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計。但我們一致的地方遠遠超過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團結對敵。[62]

在5月2日與尤金的輕鬆談話中，毛澤東繼續批評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首先表示歡迎和完全贊同蘇聯對英國採取的寬容立場，而斯大林「過去錯誤地把英國同美國一樣看待，把英國也看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敵人」。接着，毛澤東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國和印度問題上的錯誤政策。毛澤東還認為，「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在於沒有採取任何接近社會民主黨的措施，由於這個過錯，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的隔閡愈來愈深」。毛澤東稱讚「蘇共中央勇敢而尖銳地提出斯大林的錯誤問題」，同時又指出，評價斯大林的作用，應採取辯證的態度，拋棄斯大林所有消極和錯誤的東西，捍衛他所有積極和正確的東西。毛澤東又一次說到，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犯過許多錯誤，對於這些錯誤，毛澤東說他「可以寫一本書」，只是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對共同事業不利」。最後，毛澤東再次着重強調了二十大決議的重要性和尖銳批評斯大林的及時性，由於消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在「我們可以徹底討論所有問題了」。說到中蘇兩黨的看法，毛澤東笑着說：「我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63]

至少在蘇聯人看來，直到是年9月召開八大，中共對蘇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問題總體上還是給予高度評價的。[64]毛澤東在中共八大致開幕詞時講到：蘇共二十大「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並斷言蘇共的工作「將有極其偉大的發展」。劉少奇所作並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八大政治報告評價蘇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僅「提出許多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的政策方針，而且對於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爭取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鬥爭，也發生了重大的影響」。[65]鄧小平在八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則指

出，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對個人神化嚴重惡果的揭露。[66]

4 中蘇兩黨並無任何重大分歧

對這些材料進行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則問題上，中蘇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重大分歧。

首先，在批判斯大林的問題上，中蘇沒有根本分歧。對於蘇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傾向，毛澤東是心花怒放、舉雙手贊成的。其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在革命問題上，斯大林長期以來指揮和訓導中國共產黨，懷疑和壓制毛澤東本人，現在這個「蓋子」被蘇聯人自己搬開了，中國人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毛澤東也有機會一吐積壓心中多年的怨氣了。[67]按毛澤東本人的話說就是「氣不平，理不順，就要出氣，就要講道理」。[68]毛澤東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好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讓我們大家更容易、更正確地認識了個人崇拜？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69]的確，毛澤東不僅在中國領導層內部，在蘇聯人面前，而且反覆向中共廣大幹部數落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罪狀」，這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人們加深了對批判斯大林的理解。當時黨內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不僅蘇聯人批判斯大林，毛澤東對斯大林也是滿腹怨言。[70]

第二，在建設問題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效仿的榜樣，特別是對於毫無管理國家經驗的中共來說，只能「照搬」蘇聯的經驗和做法。蘇聯有的，中國也應該有，蘇聯沒有的，中國也不能有，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71]關鍵的問題倒不在於蘇聯的做法正確與否，而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不能總是屈居莫斯科門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這個「緊箍咒」也被蘇共自己解除了，各國共產黨終於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72]在毛澤東看來，中共不僅在革命問題上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也會走到蘇聯的前面。因此，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非斯大林化傾向無疑是為中共打開了通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寶座的大門，毛澤東沒有理由不暗自高興。[73]

至於中共一再強調的對斯大林應該「三七開」，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當時多少有些「放空炮」，因為如前所說，無論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是3月28日《真理報》的文章，都沒有對斯大林進行

全面批判和否定，到6月30日決議的說法，就更加往回縮了。後來中蘇論戰時中共公開指責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能看作是針對蘇共二十二大路線而言的，與蘇共二十大應該沒有關係。[74]

其次，所謂中共在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對外方針上與蘇共二十大路線存在根本分歧，也是中蘇論戰時流傳下來的一個神話。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在理論體系和政策方針上都是一個整體，而自朝鮮戰爭結束以後，從日內瓦會議到萬隆會議，中國在對外政策方面實行的實際上正是這樣一種理論和方針。1956年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和平共處思想的偉大勝利〉稱：「和平共處思想」是「指引國際形勢發展的方向的偉大動力」，日內瓦精神和萬隆精神「已成為當代各國人民要求實行和平共處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不久後，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講到台灣政策時又指出：「除了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還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並強調「努力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75]如果說有甚麼區別的話，那麼應該注意的是，當時蘇聯強調的是全面緩和，而中國，特別是毛澤東，更注重的是與周邊國家的和平相處。至於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心裏確實是有些不滿意的，也曾假他人之手表露過這種情緒，[76]因為武裝奪取政權畢竟是中共自認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為世界無產階級提供的寶貴經驗。[77]但是，無論在任何場合，當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沒有提出這個問題。[78]據參加「九評」寫作班子的朱庭光回憶，「和平過渡作為一個策略問題，毛主席也沒有說完全不能講」，只是到1957年莫斯科會議才提出有保留意見。[79]

應該說，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所謂「三和路線」在中共高層是得到了廣泛共鳴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張聞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務會議上指出：「戰爭必不可免的論點是需要修改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形式的多樣性，是已經存在着的現實。例如，應該容許南斯拉夫採取自己的過渡方式。至於通過議會鬥爭是否能夠過渡到社會主義，也不能說一定不能。在理論問題上，要打破教條主義對我們的束縛，理論要用實踐來檢驗，不能認為斯大林講過的話就不能修改。」「在黨內生活中強調集體領導是對的。斯大林的功績不能否認，也沒有否認；但是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缺點的，集體領導不夠，會造成許多不良後果。」[80]

周恩來也多次談到和平共處的問題。如在3月4日一次專業會議上，周恩來作報告說：國際國內形勢都有利於我們的和平建設。國際緊張局勢更會趨向於和緩。戰爭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這個估計是正確的。當世界形勢發生這樣大變化，和平更加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戰爭是可以制止的。正是為了爭取和平，制止戰爭，就更需要加強我們的力量，利

用有利於和平建設的條件，加快加緊地建設，包括國防建設。在5月3日國務院幹部會議上周恩來又說，在國際關係上，「要和平共處，要用和平方法競賽，比誰的制度優越，比誰的制度好，讓人民來選擇」。[81]此後不久，《人民日報》又以「促進和平共處的一個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趨向的發展」等為題，連續刊登文章和消息。[82]

就是毛澤東本人當時也是接受這種思想的。他在親自起草的八大開幕詞中寫道：「為了建設還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們認為是可能的。當然，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只要世界上的壟斷資本主義存在一天，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方面。但是還有另一方面，即制約戰爭的因素現在已經強大起來，並且還會繼續增加。」[83]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除了毛澤東內心對和平過渡的提法不滿外，中蘇之間的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

最後，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也確有不滿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關個人崇拜的問題上。如上所述，毛澤東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是認為蘇共批判斯大林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

所謂「內容上」的錯誤，就是說不能原則地、一般地反對個人崇拜。毛澤東在10月31日會見波蘭大使基里洛克（S. Kiryluk）時指出，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提出本質的問題」，「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84]不久後他更明確地指出，個人崇拜有正確和不正確之分，正確的個人崇拜必須堅持，「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85]顯然，批判具體的（如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原則上否定個人崇拜。說到底，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和未來世界革命的領袖，是需要個人崇拜的。

所謂「方法上」的錯誤，並不是指蘇共過早地提出了斯大林問題，主要也不是說傳達個人崇拜問題的範圍過於擴大了，而是指責蘇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沒有事先同中共商量並取得同意。關於這個問題，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時向陪同他的蘇共中央工作人員指出的，後來蘇聯駐中國外交官也聽到了類似的指責。[86]在中共高層討論時，「大家議論紛紛」，也反覆提到這個問題。[87]在毛澤東看來，正是因為蘇共中央採取這種「突然襲擊」的方式，使各國共產黨沒有做好準備，才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混亂。

此外，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從道德層面上提出了問題，批評「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

[88]毛澤東後來又說，「你從前那麼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麼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這些人既「不講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缺乏革命道德」。[89]

毛澤東反覆強調對個人崇拜要有正確認識，其矛頭所指，大概主要不是莫斯科，而是國內的反個人崇拜情緒。的確，中國民眾受到蘇聯影響而提出的問題是令人擔憂的。《內部參考》大量報道了中國廣大的基層幹部和群眾對蘇共批判個人崇拜的反應和聯想。河北省機關黨員幹部提出：「要說過去歌頌斯大林是個人崇拜，那麼我們還編了東方紅歌頌毛主席，那也能說是個人崇拜？」天津市幹部提出：「今後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鞍山市幹部、職工討論時有人說：「甚麼是個人崇拜？中國對毛主席來說是否也是個人崇拜呢？」湖南高等學校教師則直接提出了中國黨是否也存在個人崇拜或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現象的問題。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開發表以後，這方面的反映仍然不斷。黑龍江省機關幹部中有些人提出：歌頌毛主席的東方紅民歌，在農業合作化中提出的聽毛主席的話，走社會主義的路，以及以前講的在毛澤東時代、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毛主席萬歲等等，是否算個人崇拜？長春市幹部中也有人認為，中共也有個人崇拜的現象，如開會時只給毛主席致敬電，不給黨中央致敬電，電影裏只提毛澤東軍事思想，不提黨的軍事思想，農業發展綱要中只說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議：「我們國家對黨的領袖也應注意」，「不應強調喊毛主席萬歲」。[90]

或許正是擔心這種情緒匯入整個共產黨世界的迷惘和混亂當中，中共中央在4月12日專門發出通知，禁止主動與外國人談斯大林問題，即使被問到，也「應避免深談多談」，盡量「支吾過去」。[91]更令人擔憂的是重慶市機關幹部討論時提出的問題：「是否共產黨內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馬、恩死後，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寧死後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揚等人的攻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的人說：「人生在世叫萬歲，死後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實在令人寒心。」[92]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深思百年之後的事情。不過也應該注意到，毛澤東的這種不滿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很少公開表露出來，因為批判個人崇拜畢竟是在共產黨世界取得了共識的。

總之，蘇共二十大沒有造成中蘇在理論和路線上的分歧，因而也就不會成為中蘇關係破裂的起點。如果談到二十大對中蘇關係發展有甚麼

不利影響的話，應該強調的是，蘇共在二十大公開進行「自我批評」，揭露斯大林的錯誤，無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動搖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其結果必然導致緊隨蘇聯之後的中國共產黨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蘇共歷史悠久，經驗豐富，但就領袖魅力而言，赫魯曉夫則完全不能同毛澤東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來的應該是毛澤東！

[1]ЦХСД, ф.1, оп.2, д.81, л.228 ，轉引自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с. 147。

[2]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 с.113-114； 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с.48.

[3]АПРФ, ф.52, оп.1, д.196, л.29-63,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134-150.

[4]麥德維杰夫：《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頁259 ； РГАНИ, ф.1, оп.2, д.17, л.89-9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50-251.

[5]РГАНИ,ф.3,оп.14,д.4,л.66,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53.

[6]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43-44.

[7]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01。

[8]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81, л.81-82, 83-83об,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646-647, 654-655.

[9]《人民日報》，1956年3月30日。

[10]〔俄〕謝·赫魯曉夫（Sergei Khrushchev）著，郭家申等譯：《導彈與危機——兒子眼中的赫魯曉夫》（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97—99；〔蘇〕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Fedor M.Burlatskii）著，趙敏善等譯：《一個高級顧問的回憶——赫魯曉夫和他的時代》（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44—45。

[11]参见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с.30-31。

[12]關於國內外共產黨員強烈要求知道內情的材料，參見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0-21, 623-624； 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с.60。

[13]無論是在蘇共黨內還是年輕的一代中，新的思潮和不同政見就是從此開始出現的。詳見Пыжиков А.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 "оттепели"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3, No.6；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8-9.

[14]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 с.114-118； Пыжиков А. XX Съезд 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0, No.8, с.78-81.第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托洛茨基的親屬致信蘇共二十大主席團，請求為托洛茨基及其他在20年代受到鎮壓的反對派成員恢復名譽。РГАНИ, фЛ, оп.2, д.14, л.48, 68,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609, 610.

[15]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с.6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559- 573；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 с.119.

[16]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 с.119；吉林省档案館，1-12/1-1956.101 ；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1。

[17]關於第比利斯事件的檔案資料，參見Фурсенлг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с.929-93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Н. С.Хрущева, с.257-265。由於事發突然， 3月7日到達第比利斯訪問的朱德也不得不取消原定計劃，提前離開。參見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18—19。

[18]詳細材料參見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2, 28-29, 31-32, 611-612, 613-621, 625, 704-705； 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ыщ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ины"（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1995, с.222-224； Мусатов В. 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l, с.4-6； 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год 1956-й // ИРИРАИ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щ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242-248； Волков В. 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8, с.28-30, 35-40, 85-87； 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Н. С. Хрущев, 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No.2, c.12，以及《內部參考》，1956年3月16日，頁223 ； 3月20日，頁340—341 ；3 月 21 日，頁 426—427 ； 5 月 8 日，頁 494—497。

[19]АВПРФ, ф.079, оп.11, л.13, д.5, л.84-95； Аи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7, 30.

[20]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X X съезде с. 114.

[21]《內部參考》，1956年4月8日，頁385—390。

[22]周恩來在7月8日接見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維奇時曾表示過這樣的看法：中國共產黨認為，從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利益着想，把這個問題放在黨內解決更為有利。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1997，頁596—597。

[23]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3, л.20,76-79,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88-290； 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с.31.

[24]Правда, 5 Апреля 1956г.

[25]Пыжико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иости, с.52.

[26]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с.31.

[27]РГАНИ, ф.3, оп.14, д.39, л.1, 30-34,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352-368, 中譯文見《人民日報》，1956年7月6日。

[28]詳見Пыжиков X 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82.

[29]1958年以後則迅速下降。Козлова В. А., Мироненко С. В., Эделъман О. В. Россия X 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й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м каталог, март 1953-1991., москва, 1999.

[30]〔俄〕格·阿·阿爾巴托夫（G.A. Arbatov）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頁54—62。

[31]《內部參考»，1956年2月20日。

[32]《內部參考》，1956年2月25日至4月4日。

[33]中國駐蘇使館早在1953年12月25日就報告了蘇聯在宣傳工作中反對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情況，而張聞天大使則在1954年3月27日給中共中央提供了一份材料，題目是：〈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484—485。

[34]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17；趙仲元：〈1956年隨朱德參加蘇共二十大〉，《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2期，頁86—87。師哲也回憶了一些赫魯曉夫在會前的談話內容。參見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95。另見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頁87。

[35]《人民日報》，1956年2月9日。

[36]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430。

[37]《人民日報》，1956年2月19日。

[38]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頁87。

[39]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3—5。

[40]趙仲元：〈1956年隨朱德參加蘇共二十大〉，頁89。

[41]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9，No. 1, с.11-12.

[42]РГАНИ, ф.1, оп.2, д. 18, л.116,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52-253, 42.

[43]《王稼祥年譜》，頁430；趙仲元：〈1956年隨朱德參加蘇共二十大〉，頁89。

[44]РГАНИ, ф.1, оп.2, д.18, Л.188, 190-210,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43-44.

[45]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1998），頁15。劉曉的回憶也說，蘇共中央把秘密報告複本分送給各兄弟黨，也送了一份給中共代表團，還特地給他送了一份，封面印上了劉曉的名字。參見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14。

[46]《王稼祥年譜》，頁431。

[4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72。有人以為，是米高揚正式將秘密報告帶給中共中央的（孫其明：《中蘇關係始末》，頁242），顯然是搞錯了。

[48]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38, л.107-124,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613-621.

[49]《內部參考»，1956年3月20日，頁320—322。

[50]李慎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117；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頁4—5；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52。據韋君宜回憶，她本人就聽過兩次關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達。參見韋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百年潮》，1998年第2期，頁25—26。

[5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96。

[52]這些會議同以前的多次中共高層會議一樣，都沒有留下文字資料。所幸吳冷西作為新華社社長列席了這些會議，並留有筆記（很可能是唯一的記錄）。目前研究者關於這些會議討論內容的描述，基本上都是根據吳的回憶。不過，筆者做過考證（參見沈志華：〈中國在1956年10月危機處理中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由於毛澤東召集會議大多是在夜晚到凌晨，而吳的記錄大概都是事後整理的，所以會議召開的日期往往向後錯一日。以下關於會議的內容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頁3—24，而會議的日期可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496—497。

[53]見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毛澤東的修改部分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59—67。

[54]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9—20。

[55]文章發表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便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黨委立即在黨團員中和黨外人士中，廣泛地進行切實的學習和討論，並且隨時將學習的情形和討論中的問題報中央宣傳部」。參見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00，頁43—46。

[56]Правдаэ,7 Апреля 1956г.

[57]如波蘭《人民論壇》報就刪節了關於蘇聯歷史作用的內容。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96, л.163, 186-190,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692-695.關於各國共產黨報紙轉載或摘要刊登的情況，可參見《內部參考》，1956年4月20日，頁415—421。

[58]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01；《內部參考》，1956年4月20日，頁415—421；吳冷西：《十年論戰》，頁31—32。

[59]РГАНИ, ф.3, оп.14, д.39, л.30-34,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692-695.352-368.中文見1956年7月6日《人民日報》。

[60]《人民日報》1956年7月6日。

[61]ЦХСД, ф.5, оп.30, д. 163, л.88-89,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No.5, с.101-111 .

[62]吳冷西：《十年論戰》，頁3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3。

[63]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д.410, л.9, с. 124-130.

[64]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Новое время, No.2-3, 1993, с.38-39.

[6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204，138。

[66]中共中央辦公聽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92。

[67]米高揚與毛澤東談話後就有這種感覺。參見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6。

[68]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頁609—612。

[69]АПРФ, ф.3, оп.65, д.589, л.173-179.

[70]黎之：《文壇風雲錄》，頁54—56；韋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頁25—26。

[71]毛澤東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如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的講話。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65—371。

[72]在一次討論會上，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不無興奮地說：「這個報告（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引者）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產黨員自由思想了。」韋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頁25—26。

[73]斯大林逝世的訃告廣播後不久，蘇共中央工作人員瓦西里·西季赫梅諾夫曾聽一位在中國黨內地位很高的幹部說：「鑑於斯大林的逝世，國際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就應當是毛澤東了。」參見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с.38。

[74]中共領導人一開始的說法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毛澤東在1956年12月19—20日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修改稿時又說「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6、74。公開使用「全盤否定」的說法，大概是在1963年9月發表的與蘇共論戰的文章中。參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頁57。

[75]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1月2日、1月31日。

[76]蘇聯《新時代》雜誌1956年第28期和32期先後發表了經濟學博士魯賓斯坦的〈論不發達國家的非資本主義道路〉和〈再論不發達國家的非資本主義道路〉兩篇論文，論述了印度總理尼赫魯關於在印度通過和平方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張。印共總書記高士認為此說不符合印度的實際情況，於是在印度《新世紀》月刊（1956年第10期）發表了〈論印度的發展道路〉一文進行批評。1957年1月3日毛澤東看過高士的文章後批示：可以刊登在中國的《世界知識》雜誌。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286。

[77]這裏有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1454年3月29日，英國共產黨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們在翻譯《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準備刪去〈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的第一、二兩節。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覆信同意了英共的意見。毛澤東在審閱覆信時指出，中宣部和英共都犯了錯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530—532）。值得注意的是，被刪去的兩節文字所論述的核心思想恰恰是：「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參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506—512。

[78]毛澤東再次在黨內談到「議會道路」問題是在11月15日八屆二中全會上，中共第一次提出對「和平過渡」方針的不同看法是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而公開發表分歧意見則是在1963年9月中蘇大論戰期間。參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22；РГАНИ, ф.3, ол.12, д.1008, л.28-28об.,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с.280-281, 1022；《毛澤東傳（1949—1976）》，頁744；楊尚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11：《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頁55。

[79]李丹慧、沈志華2000年12月1日採訪朱庭光記錄，朱庭光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處處長。

[80]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1013；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631。

[8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54、579、648；中卷，頁84—85:《黨的文獻》，1993年第1期，頁12。

[82]《人民日報》，1956年7月2日、7日。

[83]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528—530。

[84]轉引自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98。

[85]吉林省檔案館，1/1-14/68,頁6—16。

[86]Сидихмено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с.38； РГАНИ, ф. 5, ол.28, д.409, л.108； оп.49, оп.128, л.36,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27-28.

[87]吳冷西：《十年論戰》，頁4—5。

[8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02。

[89]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34。

[90]《內部參考》，1956年3月7日，頁55—56；2月28日，頁293—295；3月13日，頁

150—151；3月20日，頁369—370；3月23日，頁557—558；4月10日，頁221—222；4月18日，頁394—396。

[91]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01。

[92]《內部參考》，1956年3月9日，頁81—83。

三 毛澤東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考

二十世紀是整個人類社會向現代文明過渡的時期，然而，各個國家和地區走向現代化有不同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道路是一種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一種選擇。蘇聯、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先後選擇或認同了社會主義道路，有其歷史的合理性。這條道路（或發展模式）與西方國家的選擇有很大區別，但同樣，這也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甚至沒有指出過）的道路。唯其如此，才需要人們不斷摸索，不斷修正，也就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進行改革。應該說，斯大林的去世和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一個自我完善和自我調整的歷史機遇。但是，由於認識的局限和環境的制約，蘇聯人和中國人都未能及時拋棄或改造已經僵化了的斯大林體制。

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提出要走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但是，毛澤東所說的「以蘇為鑑走自己的路」究竟是甚麼含義，卻是應該認真考慮和分析的。這裏至少有三個問題必須搞清楚。第一，毛澤東講的以蘇為鑑，實際上是指以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做法為借鑑，而這一點恰恰是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方針。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共和蘇共是在同時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毛澤東講的蘇聯出現的問題和教訓，實際上指的都是以往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法和措施，而不是指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在這一點，中共和蘇共從各自的經驗體會出發，其認識大體在同一程度，即都沒有從根本上懷疑斯大林所創立的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第三，毛澤東提出走自己的路，實際上並沒有設想把中國引上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而只是在原來的道路上走得快一些，只是要趕到蘇聯的前頭。或許這樣的分析，可以給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後的思考一個正確的和準確的定位，可以看清楚直到毛澤東逝世前中國所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質。

1 毛澤東號召「全面學習蘇聯」

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武裝鬥爭和農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進行經濟建設的經驗則嚴重缺乏。還在中共剛剛控制了東北幾個大城市的時候，就把恢復解放區經濟生活的希望寄託在蘇聯人身上。[1]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劉少奇帶領中共代表團在蘇聯訪問了兩個多月，走訪和參觀了所有的黨政機構，全面學習蘇聯的管理和建設經驗。[2]毛澤東則向全黨說：「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甚

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3]但這不是沒有阻力的。由於歷史的原因，建國之初中國民眾對蘇聯並無好感，很多人不贊成中共提出的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個說法：「毛主席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惜剛站起來又倒下了。」新華社記者報告說，雖然目前沒有人公開反蘇，但「不必親蘇」的說法還是很普遍的。[4]於是，中共開展了大規模的中蘇友好活動，並通過在全國各地普遍組織的「中蘇友好協會」，在廣大民眾當中開展強大的思想教育運動。[5]當時中國大地流行的一句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很能說明中共的宣傳效果。[6]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到1952年下半年完成了經濟恢復工作。[7]

斯大林去世之時，正是中國經濟恢復時期結束，剛剛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之際。然而，如何按照嚴格而周密的計劃搞現代工業，中國人還是不知從何入手。毛澤東後來承認：「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8]沒有辦法，只能學蘇聯，而且必須要他本人出面進行動員，這大概是毛澤東心情不好的主要原因。從那時的社會思想狀況來看，主要是在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當中，崇美、親美和輕視蘇聯、懷疑蘇聯的思想情緒仍然很嚴重，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應該在美國與蘇聯之間採取中立政策和自力更生，而不應該「一邊倒」。[9]如此狀況，怎麼能進行以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為核心的工業建設？問題的嚴重性使得毛澤東不得不出來講話。

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專門講了關於學習蘇聯的問題。他強調：

> 我們要進行偉大的五年計劃建設，工作很艱苦，經驗又不夠，因此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工人群眾、農民群眾，他們中間都有一些人是有抵觸的。他們應該懂得，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先進經驗和優秀文化的。……我們現在學習蘇聯，廣泛地學習他們各個部門的先進經驗，請他們的顧問來，派我們的留學生去。應該採取甚麼態度呢？應該採取真心真意的態度，把他們所有的長處都學來，不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一切我們用得着的，统统應該虛心地學習。對於那些在這個問題上因不了解而產生抵觸情緒的人，應該說服他們。就是說，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10]

9月9日中共中央又專門下發了一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發

揮蘇聯專家作用的幾項規定〉，強調「正確地學習與運用蘇聯先進經驗，是勝利完成我國各項建設任務的一個重要因素」。[11]於是，就在蘇聯新領導人開始考慮改變斯大林生前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時，毛澤東卻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全面學習蘇聯」的高潮。

向蘇聯學習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比如聘請大量蘇聯顧問和專家來華，[12]派遣各行各業的大批幹部、技術人員及學生到蘇聯實習、考察，[13]大規模引進和翻譯蘇聯的各類書籍、資料，[14]以及開展其他宣傳教育活動等等。不過，關鍵的問題在於教育領導幹部。毛澤東曉得，作為「學生」，要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首要的和重要的是讓各級領導幹部接受「先生」的一套體制和經驗，而他向廣大幹部介紹和灌輸的蘇聯式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就是也只能是斯大林的理論和模式。

毛澤東一向主張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他所推崇的這種結合的典範就是後來在蘇聯被認為是個人崇拜代表作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5]早在1941年5月，毛澤東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強調，對於全黨「在職幹部的教育和幹部學校的教育」來說，《簡明教程》應該成為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心材料，因為在毛澤東的眼裏，這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16]既然《簡明教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蘇聯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唯一和完全的典範，那麼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有效、最簡捷的方法就是學習斯大林主義。中國共產黨不僅依靠這個「典型」勝利地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還要指望這個「典型」來指引社會主義革命。於是，《簡明教程》中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就成為中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核心內容。例如，「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必須是發展重工業」；「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就是「自己節約的道路」，「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不有相當的限度」，如此等等。[17]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幹部理論教育的指示，其中規定，「為了適應全黨在進入經濟建設時期的需要」，在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時間內，全黨幹部理論學習的高級組和中級組都要學習《簡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部分著作，目的是使「全黨主要幹部都能有系統地了解蘇聯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以便在我國經濟建設過程中根據我國具體條件正確地利用蘇聯的經驗」。〈指示〉還詳細規定了學習的時間、進度、方法以及領導責任和考試辦法。[18]

在毛澤東看來，能夠指引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另一部經典就是斯大

林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作為對蘇聯經濟發展規律的總結，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觀點，如由於統一的世界市場瓦解而造成的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正在日益加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依然存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只是在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之間存在的特種商品生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僅是「合理地組織生產力」，更重要的是不斷變更生產關係；國家必須把農業的基本生產工具（機器、拖拉機）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決不能交給集體農莊；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須將集體農莊的剩餘產品從商品流通領域中排擠出去，逐步縮小商品流通領域的範圍，如此等等。[19]195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指示，認為這一著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對於我國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有巨大指導意義」，所以必須立即組織全黨高級幹部進行學習。中共中央規定，各單位負責人應親自動員、布置和領導這次學習，制定學習計劃，指示學習要點，檢查學習狀況，解答學習疑難。[20]

這兩次學習活動立即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各機關幹部中普遍開展起來，如商業部黨組強調領導《簡明教程》的學習是「黨支部的中心任務之一，各局、處、公司的黨員領導幹部必須親身參加學習的領導工作」，並先後召開了九次支部負責人聯席會議，又分別作了四次「較為全面地系統地結合商業工作的專題報告」。[21]中央財經委為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專門成立了以陳雲、薄一波、曾山等為正副主任的學習委員會，確定每星期三、六下午為集中學習時間，在此時間內不得請假、遲到、早退、辦公、打電話、傳遞信件。[22]

2 中國人對蘇聯式道路的反思

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毛澤東所推崇並要全黨學習的這兩本斯大林的著作，恰恰是米高揚在二十大發言中點名批評斯大林時指出的兩本著作。這不是偶然的巧合。道理很簡單，《簡明教程》通俗易懂、簡明扼要，適合中共幹部的文化水平；《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重點是總結蘇聯戰後經濟恢復時期的經驗和理論，而中國1949—1953年也正好處於恢復和開創的階段。[23]總之，如同《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所說，「蘇聯過去所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榜樣」。[24]那麼，同樣可以說，蘇聯所犯過的錯誤，也是中國今天要吸取的教訓。不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中國在某些方面所犯的錯誤甚至比蘇聯還要嚴重。例如，在工業投資比例方面，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的結果，製造生產資料工業的投資佔85.9%，製造消費資料工業的投資佔14.1%，而在

中國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前者佔88.8%，後者只佔11.2%。從1953—1955年的執行情況看，二者比例為7.8:1，比蘇聯一五計劃的比例（6:1）又擴大了許多。[25]再如，被指責為急躁狂熱的斯大林全盤集體化運動從1929年11月至1933年底，進行了整整四年。[26]而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從1955年7月毛澤東發出號召到1956年3月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只用了八個月，即使從1953年底宣布過渡時期總路線算起，也不過兩年多。[27]何況斯大林改造的只有2500萬農戶，而毛澤東面對的則是1.1億農戶。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完全是實用主義地看待蘇聯的經驗。當黨內有人根據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冒進的教訓，對毛澤東號召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提出不同意見時，等待他們的指責正是「利用蘇聯的這項經驗來為他們的爬行思想作掩護」。毛澤東的理解是，「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短期內基本實現農業集體化「是完全可能的」。[28]

然而，就在中國全面學習蘇聯的運動方興未艾的時候，蘇聯人開始反省了。原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還有不少的缺陷和弊端，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深思。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指責和批判，雖然最初令人感到意外，但無論是東歐各黨還是中共領導人，很快就從中領悟到，蘇聯黨和政府承認自己犯有錯誤就意味着各國可以開始走自己的道路了。至少在毛澤東看來，全面學習蘇聯的方針應該放棄了。有些研究者強調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之前就開始考慮「以蘇為鑑」的問題了，

似乎中國人對斯大林模式中存在的錯誤比蘇聯人認識得還要早。[29]其實如前所述，早在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領導人就已經考慮改變以往的一些做法，二十大不過是公開地、全面地提出這些問題罷了。如果說此前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確實提出了如何向蘇聯學習的問題，那麼並不是看到了蘇聯模式有甚麼問題，而只是對斯大林時期的某些經濟政策有意見，[30]對蘇聯軍事顧問的某些具體做法表示不滿，對全國各個領域出現照搬蘇聯經驗、依賴蘇聯專家的普遍現象表示擔憂。[31]

1955年5月蘇聯召開工業者會議，揭發和批評了各工業部門在採用新技術和發揮企業潛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回國後認為，「戰後蘇聯工業有很大的發展，但在某些方面，特別是近一兩年來，似乎過分地強調了日用必需品的生產，相對放鬆了重工業」。[32]8月10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次會議的幾個文件，並在通知中強調，蘇共中央批評工業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是為了更進一步提高蘇聯工業的威力和水平，這並不妨礙「繼續堅持學習蘇聯在技術上的先進成就和管理工業的先進經驗」。[33]儘管也曾有人對一五計劃「建設規模是否過大」、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重「是否適當」表示懷疑，但中共領導人對此並不以為然。[34]此外，國務院在11月14日關於檢查專家工作的

通知中提醒各部門，在發揮專家作用方面要注意結合實際情況，對專家的建議應「結合本部門的具體情況加以執行」，「使專家的活動和本部門業務的中心工作結合起來」。[35]劉少奇從12月7日開始聽取中共中央、國務院三十七個部委局負責人的匯報，所做指示和插話都是針對具體工作中的不妥之處，很少涉及蘇聯問題，唯一一次提到「不要單純學蘇聯的經驗」，也是因為在糧食徵購方面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公糧制度。[36]這些情況說明，在蘇共二十大之前，中共中央的認識還沒有到「以蘇為鑑」的程度。

應該承認，中國領導人開始關注自己正在模仿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還是由於蘇聯的引領。1956年1月7日在莫斯科出席華沙條約國會議的李富春用電話報告了會議情況：在談到經濟問題時，蘇共代表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各國存在的問題是，工業雖有成就，但農業生產落後，許多國家尚未達戰前水平；各國新五年計劃規定的重工業發展太快，輕工業太慢，而重工業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指望出口，但出口又無保證，投資規模過大，使國民收入中資金積累部分增加太快，而工資增加太慢等。[37]這無疑是對中國領導人敲起了警鐘。不久以後，這些問題便更系統地反映在赫魯曉夫的工作報告中。

就在蘇共二十大召開的當天，毛澤東也開始聽取各部門的匯報，做調查研究工作。正像薄一波回憶的，從這時起，「匯報中同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相關聯的事也多了起來，『以蘇聯為鑑戒』的思想更加明確了」。其中提出的帶全局性的問題主要有：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問題（在二五計劃草案的工業投資中，重工業佔91.5%，輕工業佔8.5%），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沿海地區發展滯後），國防工業與民用工業的關係問題（國防工業建設規模過大），國家、集體、個人的職責權利分配問題（職工和農民生活水平落後於生產發展），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發揮地方積極性不夠）等。[38]顯然，儘管毛澤東對十大關係的思考和總結，無疑與他2月14日開始並歷時四十一天的座談和調查有密切關係，這些問題也都是結合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提出的，[39]但是很明顯也受到了蘇共二十大的啟發、影響和鼓勵。筆者同意麥克法夸爾的看法：十大關係的後半部分很可能就是為應對蘇共二十大而考慮的措施。[40]周恩來曾經歸納說，毛澤東的思考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也是鑑於蘇聯共產黨批判斯大林的錯誤而取得的經驗教訓。[41]因此可以說，1956年初，中共和蘇共在共同思考斯大林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3 論「十大關係」及其歷史局限

然而，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的思考，都沒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沒有從改變或改革制度的層面思索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從80年代至今中國的經驗看，否定斯大林模式必須過兩道關口，即經濟體制的市場關和政治體制的民主關，而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當時的思考都在這兩道關口面前止步了。蘇共二十大的觀點如前所述，而毛澤東當時對「以蘇為鑑」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他1956年4月25日發表的「論十大關係」報告。[42]兩相比較，蘇聯使館當時的結論是：在毛澤東提出的十項方針中，最重要的幾項同蘇共二十大的決議緊密相關，尤其是在強調關注提高人民群眾福利和進一步發揚民主問題等方面。[43]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

「十大關係」的前五條專門講經濟關係的調整問題，這包括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適當調整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以支持內地工業；適當降低國防建設比重，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的利益，更多地解決工人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給地方以正當的權利和獨立性，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44]與蘇共二十大的報告進行對比就會發現，中蘇雙方在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明顯具有趨同性。1957年毛澤東對蘇共處理馬林科夫等「反黨集團」立場的支持，突出表現了他同赫魯曉夫改革思路的一致性。毛澤東在聽了米高揚關於「反黨集團」成員反對、阻礙改革的情況通報後，指責莫洛托夫非常頑固、守舊，明確表示支持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勢力。[45]不過，當時中蘇雙方都沒有提出放棄或改變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問題。

從中國方面看，到中共八大時思考有了深入，在政治報告、大會發言及決議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某些方面觸及到制度層面的問題。特別是陳雲的發言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的概念，陳雲的解釋是：在工商業生產經營方面，國家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的計劃性方面，工業生產按國家計劃進行是主體，根據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市場方面，國家市場是主體，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是補充。[46]此後，隨着中共八大路線的貫徹執行，私營經濟和自由市場有了一定發展。11月11日《大公報》發表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管大同的長篇文章〈開放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的重大意義〉，文章提出「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的組成部分，它與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在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不過，這已經超出了毛澤東的思想範圍。[47]不久，以大規模群眾運動衝擊計劃經濟的綜合平衡體制的嘗試失敗後，中國便日趨走向「一大二公」，進一步排斥了商品經濟的因素。[48]蘇聯的改

革探索雖然緩慢但並沒有停止，到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已經提出了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係的經濟綱領，利別爾曼（Liberman）建議在計劃經濟中引入利潤、獎金等市場經濟的概念，更將這種思考在理論層面推向深入。[49]這些恰恰是被中共視為修正主義綱領而堅決予以批判的。不過，這都是後話了。總體看來，1956年蘇共和中共對改革經濟體制的設想，無論是理論和措施，都沒有超出20年代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範圍和水平。[50]

在政治制度方面，毛澤東的談話似乎比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更加「自由化」。在二十年後才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當然已經見不到當年那些令人激動和感動的話語了，不過，看看有心人在聽傳達時所做的親筆記錄，還是能讓讀者感受到毛澤東講話時的心情和神態：「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甚至的是反革命的力量」；「人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要有紀律性，也要有無紀律；要有集體主義，也要有自由主義」；「中央成立一個體制小組，專門研究如何劃分權力」；「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只反對它的帝國主義」；「蘇聯只有一個黨，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類似的話，毛澤東在其他場合也講過，如「我們有蔣介石，我國有小腳，別人要照像，讓他們照，衣服穿得不好，不要怕難看。在外國人面前扯謊，總有一天會揭穿的」；「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監督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51]毛澤東能如此講話，一方面大概與他聽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的心情有關，像胡喬木講述的：「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52]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了他的自信。新中國建立後短短的幾年，經歷了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肅清了，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都歸順了，私營工商業者也順利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53]

不過，這一切仍然都是在斯大林政治模式框架內的思考，所謂民主，也只是相對集中而言的一種統治手段，並非指能夠保持社會穩定發展的政治制度。沒有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司法獨立和民主選舉等最基本的制度保證，一旦情況變化（像1957年的反右運動），共產黨的所有許諾都會煙消雲散。歸根結底還是毛澤東1954年8月在修改〈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草稿）〉時所強調的一句話：「我們所走的道路就是蘇聯走過的道路，這在我們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蘇聯的道

路是按照歷史發展規律為人類社會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開這條路不走是不可能的。」[54]

所謂走自己的路，毛澤東在1960年6月的解釋是：「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並認為這條路線反映了中國的「客觀經濟規律」。[55]此時中蘇分歧已經公開化，毛澤東自然不便再提蘇聯的道路。但是從現代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軌道與蘇聯的確沒有多少差別。不要說人民公社的形式是蘇聯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已經遭遇過的失敗嘗試，就連「大躍進」的口號和方式，也是蘇聯在30年代創造的。[56]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在內心是承認的，他在1956年1月的知識分子會議上就說過，合作化俄國人在幾十年前就搞了，中國在理論和觀點上沒有甚麼新東西，只是在細節和形式方面做得比較完全。[57]9月23日又對德國統一社會黨主席烏布利希（Ulbrich）說：各國建設社會主義，「方向是一個，內容是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58]直到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的說法還是：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我們自己的經濟路線從此開始，跟蘇聯基本道路相同，具體道路有所不同。[59]因此，中國的道路實際上就是蘇聯的道路，所追求的只是走法不同，其目的無非是要走得快一些。

毛澤東有一種大國情結和責任感，既為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和歷史而驕傲，也為中國對人類的貢獻太少而慚愧，他一生致力於把中國變成一個富強的國家，一個「真正的大國」[60]。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有兩個追趕對象——蘇聯和美國。早在1953年10月斯大林去世才半年，毛澤東就提出蘇聯「建設了三十六年才有現在的成績」，「我們建設起來比蘇聯還要快些」。1955年10月又說：「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並預言達到這個目標要五十年或七十五年。1956年8月再次講到要在五十至六十年內趕上美國，否則「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61]不過，趕超美國的目標太遙遠，現實的目標是蘇聯，而且中國是具備這個條件的。

1956年2月25日重工業部在參加蘇聯工業會議回國後給毛澤東的匯報提綱中指出，中國鋼產量1955年實際完成279.8噸，1956年計劃產量為447萬噸，相當於蘇聯1928年的水平。「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工業的增長的速度要快得多，這是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了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國的工業化的速度，是否能夠爭取比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更快一些。」重工業部認為，只要提高年度鋼產量，整個工業的增長率就會高於蘇聯，因此充滿信心地回答說：「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今後中國幾個五年計劃的發展速度，有可能超過蘇聯同樣的幾個五年計劃的發展速度。」[62]這無疑給毛澤東以極大的鼓舞和刺激。於

是，他在聽取三十四個部委匯報時插話：我們工業的發展速度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所束縛，我們的速度可以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63]蘇聯1936年宣布實現工業化時的鋼產量是1800萬噸，我們1967年爭取達到3600萬噸。[64]

毛澤東後來回顧他在1956年春天的想法時說，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65]毛澤東在1957年2月的一個講話提綱中又提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可以和蘇聯有些不同。雖然重工業還是優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蘇聯那樣（二十一年內增加1400萬噸鋼）工業化速度反而快些？[66]這裏顯然為後來的「大躍進」和大煉鋼鐵埋下了伏筆。同時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鑑」的方針，從根本上講，就是不願意跟在別人後面爬行，就是要超到蘇聯的前面去。或許正是由於這種指導思想，毛澤東在1956年12月修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第六稿時，幹脆刪去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學習蘇聯經驗的結果」一句。[67]

最後還應該指出，毛澤東所提倡和追求的經濟建設方式與斯大林經濟模式之間的差別，即他本人所說的「具體道路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運作方式上：斯大林依賴的是技術官僚集團以及由他們建立的嚴密的計劃體制，毛澤東依賴的是人民大眾和他本人不斷發動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毛澤東一再強調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只有打破平衡才能發展，就是針對蘇聯那個計劃體制來的。後來，毛澤東不僅頻繁地以個人「建議」和政治運動干擾歷次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執行，甚至自己在國務院之外組建「小計劃委員會」。因此，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確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然而，無論是蘇聯的計劃經濟，還是中國的群眾運動，其本質都是集中制，體現的都是長官意志或領袖意志，歸根結底都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儘管中國的經濟體制因其計劃程度低下而比較容易引起變革，但實踐證明，它給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的災難，絲毫不亞於蘇聯的計劃經濟。

總之，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的論述與蘇聯的改革措施及蘇共二十大的總結報告相比較，沒有更多的新東西。中國經濟建設採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時期，特別是戰後恢復時期蘇聯的經驗，所以毛澤東認為需要引為借鑑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這正是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新領導人已經考慮並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問題。再者，同蘇共領導人一樣，在毛澤東看來，斯大林模式的原則沒有錯，只是方法有問題。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中共八大繼續探索而產生的思想火花，很輕易地就在突然爆發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運動中熄滅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1956年毛澤東所謂的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從本質上講還是沒有擺脫斯

大林所指引的蘇聯道路，只是要通過採用那些自己熟悉的方法（如群眾運動）比蘇聯走得更快些。在這方面，蘇共二十大關於六五計劃報告提出的經濟增長數字無疑對毛澤東是一個刺激，中國需要鼓足幹勁才能超過蘇聯。然而，毛澤東的想法卻遇到了阻力——中共黨內正在興起一股「反冒進」的潮流。

[1]詳見沈志華：〈對中蘇同盟經濟背景的歷史考察〉，《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建國前夕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部分俄國檔案〉，《黨的文獻》，2002年第1期、第2期。

[2]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23—27。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418。

[4]《內部參考》，1951年12月18日，頁78—80。

[5]台灣學者余敏玲對「中蘇友好協會」的歷史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中蘇友協是中共在民間開展對蘇友好教育運動的有力渠道。參見余敏玲：〈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響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0期，2003年6月，頁99—140。

[6]美國學者黛波拉·凱佩爾的《紅色工廠夢》一書詳細描述了當時在中共宣傳中的蘇聯形象。參見Deborah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9-11。

[7]關於這一時期蘇聯對中國經濟援助的詳細情況，參見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0）。

[8]《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117。

[9]參見《內部參考》，1951年12月18日，頁78—80；12月27日，頁128—129；1952年6月14日，頁156—158；9月8日，頁346—349；11月1日，頁11—12；11月24日，頁296—297。

[10]《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263—264。

[11]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綜合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頁878—880；吉林省檔案館，1/1-9/1952，頁5—6。

[12]筆者對此有專門研究，參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

[13]1950—1960年蘇聯共接受38000多名中國公民前去學習或實習，1949—1966年蘇聯的學院和研究機構共培養中國大學生、研究生和實習生11000多人。參見Фыатое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 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 No. 65, с.53。

[14]到1953年底，翻譯出版俄文書籍5183種，佔全部翻譯書籍種類的87.1%，其中僅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就有108種，印行1200多萬冊，還有蘇聯高等學校和專科學校的教材277種。參見《人民日報》，1954年5月20日。另有材料說，在1954—1957年全國出版的書籍中，譯自俄文的竟佔38%—45%。參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謝生亮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10。

[15]這部著作（參見由中共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中譯本）雖然署名「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但實際上是斯大林本人主持編寫的，書中充滿了對斯大林的吹捧和歌功頌德。斯大林在世時，蘇聯對《簡明教程》的推崇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作為蘇聯科學院院長和《蘇聯大百科全書）主編的瓦維洛夫在主持全書第二版修訂工作時，竟然代表全體主編提出，在「聯共（布）」詞條中全文刊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三卷，頁394。

[16]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760—761。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693—734。

[1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頁141—146。

[19]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斯大林文選（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571—662。

[20]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594。

[21]《人民日報》，1954年6月26日。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54—155；吉林省檔案館，1-4/4-1953. 15，頁36—38。

[23]經過詳細的考察，美國學者黛波拉有一個重大發現：這一時期，中國翻譯、出版最多的是有關蘇聯四五計劃期間經濟政治體制、社會改革和工業發展狀況的書籍，幾乎所有的中國文章和雜誌都通過引用四五計劃來詳細論述1949—1953年蘇聯的經驗和創新。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有意識地進行研究並努力吸收」的就是戰後恢復時期的斯大林模式。Deborah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5-6, 11.

[24]《人民日報》，1954年3月3日。

[25]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固定資產投資與建築業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頁270—271、273—274。

[26]筆者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參見《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第九章。

[27]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頁274—279。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251。

[29]王文滋：〈胡繩晚年論社會主義模式〉，《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1期，頁62。

[30]如毛澤東在1955年7月26日聽取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匯報農業合作化的情況時，就分析了蘇聯集體化造成減產、死牛，農業生產到現在還沒有達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訓，並一再叮囑，搞合作化要接受蘇聯集體化的教訓，要比蘇聯的集體農莊搞得更好。參見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54—156。

[31]詳見《蘇聯專家在中國》，第三章第四、五節。不過，正如筆者在書中指出的，盲目學習蘇聯的問題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與蘇聯無關。周恩來在1957年7月4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曾說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不靠他不行，不搬他們的經驗也不行。如有教條，錯誤在我們，不在別人，責任不在他人，我們不能抓住一點，忘記了全面，以後寫文章、作報告都要注意。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57。

[32]吉林省檔案館，1-11/1-1955. 139，頁2—8。

[33]《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綜合卷》，頁605—606。

[3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頁305—310。

[35]遼寧省檔案館，ZE1-2-67，頁31。

[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47—36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84—787。

[37]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22—223；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КПСС, с.86-87, 916-917。

[3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72—485；《黨的文獻》，2004年1期，頁24—2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8。

[39]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67—468，528；《毛澤東傳（1949—1976）》，頁472—480。

[40]參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頁90。

[4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3。

[42]該報告當時只在黨內高中級幹部中進行過傳達，1965年底根據劉少奇的建議，印發到縣、團級以上黨委。1975年又在鄧小平的建議下再次整理成文，並經毛澤東親自審定。1976年12月26日公開發表，其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參見汪裕堯執筆：〈關於「論十大關係」的產生整理和發表〉，《文獻和研究》，1982年第8期，頁18—19。

[43]ЦХСД,ф.5,оп.28,д.407,р.5174,л.129-147.

[4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267—277。

[45]轉引自李丹慧：〈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係的演變〉，載李丹慧主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頁318—319。

[46]《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336。

[4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頁386—396。

[48]《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第七章。

[49]詳見劉克明、金揮主編：《蘇聯政治經濟體制七十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499—505。

[50]關於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詳見沈志華：《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的道路》，第一，三章。當時，真正在二十大和十大關係報告啟發下提出市場經濟問題的，在中國確有一人，他就是經濟學家顧準。1956年9月，顧準開始寫作〈試論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發表於《經濟研究》，1957年第3期），他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觀點。然而，這篇文章竟成為罪狀伴隨他度過了半生坎坷。參見羅銀勝：《顧準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頁352。

[51]李慎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頁120—122；《黨的文獻》2004年第1期，頁24—25。

[52]這段話是李慎之親耳所聞，參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頁122。

[5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288。

[5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548。

[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213。

[56]參見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期。早在30年代蘇聯大搞工業化時期，普遍使用的口號就是「大躍進」（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中央編譯局的著名蘇聯史專家鄭異凡在50年代就讀於列寧格勒大學，他告訴筆者：在工業化時期，蘇聯人最熟悉的口號之一就是「大躍進」。

[57]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6.102，頁1—7。

[58]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頁539—540。

[59]吉林省檔案館，1/1-14/68，頁11—16。

[60]《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24、156—157、325—326。

[6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369；《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500；《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296。

[6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遍（1953—1957）·綜合卷》，頁605—615。

[6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8。

[64]《黨的文獻》，2004年第1期，頁26。

[65]鄧力群編輯和整理：《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頁715。

[6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314。

[6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285。

第三章

毛周分歧：批右傾保守與反急躁冒進

1956年，中共高層在如何指導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要求高速度推進工業化的激進的發展，一種是主張積極而又穩妥的發展。前者號召批右傾保守，首倡人是毛澤東；後者提出反急躁冒進，主導人是周恩來。

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迅速到來，這極大地增強了毛澤東的自信。他的注意力開始從改造轉向建設，並醞釀推動一次工業化建設的高潮，辦法仍然是發動他慣用的反對右傾保守的鬥爭。毛澤東採用「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督促各地和各部門提出經濟發展的遠景規劃。由於反右傾保守造成的逼人形勢及合作化高潮引發的盲目自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的頭腦普遍熱起來，各部委、各省市紛紛制定出自己的近期計劃和遠景規劃，指標大幅攀升，建國後第一次經濟建設的「躍進」由此發軔。

對於毛澤東提出的加快發展的新方針，中共高層開始都是表示贊同的。然而，經濟運行中很快出現的緊張局面，引起周恩來、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財經領導人的嚴重憂慮，他們與毛澤東在發展速度問題上的分歧加大了，周恩來甚至為是否追加投資與毛澤東發生了直接爭執。6月初，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會議，贊同周恩來等人的意見，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隨後，「反冒進」成為當年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進而又成為中共八大和向八大提交的二五計劃建議的基調。年初由毛澤東親自提出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多、快、好、省」的口號，實際上被擱置不提，主張積極而又穩妥的發展思路在黨內佔了上風。

關於1956年冒進和反冒進的問題，中國學者早有專門研究，雖成果不多，但基本情況都講到了，後來又有幾部傳記和經濟史著作增加了一些新的史料及內在原因的分析。[1]本章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根據新史料進一步梳理事情的來龍去脈和邏輯關係，突出了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分歧，同時增加了一些細節描寫，如在周恩來壓縮二五計劃指標的過程中，如何借助了蘇聯的意見。

[1]較早的專題研究論文有熊華源：〈論周恩來在反冒進中的探索〉，《黨的文獻》，1988年第2期；史唯：〈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林蘊暉等人所著《凱歌行進的時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也有專門章節討論這個問題。後來對此過程比較詳細論述可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林蘊暉：《中國20世紀全史》，第七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一 反右傾保守與「多快好省」

1956年新年伊始，社會主義高潮便迅猛發展起來。1月15日，北京市公私合營的工人、店員、資本家、農業合作社農民、手工業合作社社員及各界人士共二十萬人集合在天安門廣場上，鑼鼓喧天，鞭炮震耳！下午3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以及參加知識分子大會的一千多位代表都來到天安門，參加北京市慶祝公私合營全部完成、手工業改造全部完成、郊區農民全部轉入高級合作化的勝利大會。[1]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了北京市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喜報。北京市市長彭真欣然宣布：「我們的首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了！」繼北京之後，天津、上海、西安、瀋陽、南京、重慶、廣州等118個大中城市，先後宣布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全部完成。其中最具劃時代意義的是，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資本主義工商業最集中的上海市，也於1月21日宣布全市全部批准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上海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2]

1「進入社會主義」的喜與憂

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國有化，是中共建國的基本目標之一，但原來的設想並非一蹴而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後，中共領導人的頭腦還是冷靜的。1954年9月劉少奇做關於憲法的報告時說：「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並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來逐步實現。我們將讓資本家們有一個必要的時間在國家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下逐步接受改造。」[3]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說，中國情況複雜，經濟落後，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可能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4]同年10月27日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談話時還強調，「社會主義改造是三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還有個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後，總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5]

農業合作化的成功促進了工商業改造的步伐。還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認識到「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6]如何將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個體農民平穩地引導到合作化的道路上，這確實讓中共領導人感到心中無數。當年蘇聯推行全盤集體化，從1929年開始到1936年完成，用了七年時間，而且引起了農民的強烈反抗。國家不得不使用暴力鎮壓，甚至動用了飛機、大炮，結果近二百萬戶富農被剝奪或驅逐到邊遠地區，死者近千萬。[7]強制性集體化造成的農業生產下降一直延續到戰後，以

至蘇聯1953年的穀物產量還低於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8]南斯拉夫在40年代末執行集體化方針，也導致農民的全面反抗，後來不得不解散合作社。[9]但令人驚奇的是，中國的合作化速度不僅比蘇聯快，而且農業生產連年增長，社會秩序穩定。這難道不值得高興嗎？

1956年1月，由毛澤東主持編輯並親自撰寫序言和大量按語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出版了。原先毛澤東準備發一條出版消息，當秘書田家英將擬好的稿子送給他時，毛澤東卻咯咯一笑說：「這個消息沒有用了，已經過時了。」他對田家英說，他很高興，1949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跟隨田家英一起協助毛澤東編輯《高潮》一書的逄先知寫道：「這個話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心態。對毛來說，全國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準備的，而農業合作化的勝利來得這樣快，這樣順利，卻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認為，改造五億人口的個體農民是最艱難的事業，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和做許多細緻的工作才能完成。誰知道，這麼困難的問題，經過一、二次會議，作一篇報告，就如此順利地解決了，那末，還有甚麼比這個更困難的問題不能解決呢？」[10]農業合作化的勝利，助長了毛澤東對個人意志的自信，他開始把眼光轉向工業。

1955年11月16—24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召開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工作會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改造進程大大提前。劉少奇在會議上的說法是「在兩三年之內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搞出一個頭緒來，公私合營要基本上完成」，同時強調「要有一個全面規劃，不要一股風，應該很有計劃、很有步驟地來進行這個工作」。[11]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到會講話，再次號召全黨要消除顧慮，加快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步伐，並批評領導機關的思想嚴重落後於實際。[12]會後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傳達、討論和學習〈決議（草案）〉，並在1956年1月中以前提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規劃和進一步的措施。[13]12月5日劉少奇在中央座談會上傳達毛澤東的講話說，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到1957年公私合營達到90%。手工業合作化不積極，太慢了，也要求他們到1957年達到70%—80%。[14]於是，上有所好，下必趨之，各地區領導人相互攀比，爭先恐後。很快，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也進入了群眾運動的洪流。[15]

原來設想十五年實現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後來壓縮到兩三年，結果僅用一兩月就完成了。形勢發展之快，多少有些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他後來說：「公私合營走得很快，這是沒有預料到的。誰料得到？現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麼快。」[16]毛澤東無法掩飾內心的興奮和喜悅，在他看來，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116年」前赴後繼奮鬥的目標，

今天終於成為了現實。[17]

與毛澤東的心情有所不同，當全國敲鑼打鼓慶祝進入社會主義之時，在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等人的感覺卻不太輕鬆。

對於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周恩來隱約地表露出有些憂慮。1956年2月6日，他在全國政協二屆十七次常委會上提出：「為了慎重起見，我們過渡時期還是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長一點沒有壞處。有這樣一種說法，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這值得考慮，因為要完全進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會主義就要消滅剝削和貧困，照列寧說的還要消滅愚昧，還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現在國家只是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否則，如果只是消滅了剝削，但貧困和愚昧都還存在，就宣布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人們會失望地感覺到，「哦，原來社會主義就是樣？！」。[18]在2月8日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在談到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時，進一步指出：「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他提醒說：「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對於毛澤東1月25日所說「大約再有三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周恩來也作了限制性的解釋。他說，「這只是講大體上完成」，「不論從地區或部門看，都還會有不少尾巴」，「條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緊」。因此，他強調說：「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甚麼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19]顯然，周恩來對於全國歡呼「進入社會主義」持相當謹慎的態度。

國務院副總理陳雲作為中央十人小組組長，直接主持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陳雲當然也認為所有私人工商業最終都要國有化，但他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一直持比較謹慎的態度。據陳雲的秘書薛暮橋回憶，有一次，陳雲在批閱薛暮橋起草的文件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時間長着呢，何必這樣匆匆忙忙地去限制他們。」[20]在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召開的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座談會上，陳雲根據過去的經驗，提出了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安排和方法，主張採取按行業統籌安排生產、進行企業合併和改組、組織全行業專業公司、適當安排資方人員等措施，關鍵是「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要有一個全面規劃，要計算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能力，定出改造的速度和步驟，在工商界和工人中進行教育」。[21]11月16日，陳雲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會議上做報告，更加詳細地提出了試行改造的步驟和方法，又增加了推廣定息、保留招牌等具體措施。儘管承認社會主義改造出現了「新情況」，陳雲仍然強調，改造過程中一定會出現

很多困難，因此必須「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應該分期分批，不要一聲號令，就立刻全面鋪開」。最後，陳雲提出，中央將在1956年3月根據各地和各部門的匯報，「提出一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初步規劃」。[22]1956年1月出現的公私合營高潮，的確使陳雲等主事者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儘管認可了北京市採取的「先收編後改組，先承認公私合營，然後再做其他工作」的辦法，但他還是強調，這僅僅是全行業公私合營工作的開始，不過是順序的顛倒。[23]在陳雲看來，改造進度太快，必定會帶來許多新的問題，這引起了他很多思考。[24]

2 經濟建設上反右傾保守主義

如果說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中共高層只是有人隱約感到憂慮的話，那麼在隨後出現的工業化高潮中，分歧意見就在多數主管財經工作的領導人中漸漸明確地顯露出來。

在提出提前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的同時，毛澤東已經在思考如何加快經濟建設步伐的問題了。1956年初的一天，毛澤東突然問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甚麼？」田家英被這突如其來的問話卡住了，一時語塞，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勢。[25]毛澤東永遠是一個革命家，永遠要走在時間的前面，在一個任務即將完成而尚未完成之際，他馬上就會提出新的任務，使人們不敢鬆懈。這種做法，毛澤東常稱之為「趁熱打鐵」、「不斷革命」。

其實，毛澤東早已有了下一個目標，這就是運用反對「右傾保守」的方法，在全國推動一場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經濟文化建設高潮。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毛澤東認為，農業合作化高潮「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在這篇〈序言〉中，毛澤東還寫道：

> 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也不是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按行業實行全面公私合營的速度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已經解決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也會容易解決的。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這裏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方面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综合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在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都應當加以批判和

克服，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26]

毛澤東已經不滿於按常規走路。事實上，在寫〈序言〉之前，毛澤東關於加快建設速度的思想就已經形成。1955年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會議上，毛澤東批評說，在黨內，「特別是領導機關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實際。……這種落後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毛澤東認為，這就是右傾，而「右，是我們很突出的一個東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級黨委都是值得注意的」。[27]11月30日、12月1日，毛澤東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加快各項工作的速度，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各項工作中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加快建設速度，並且提出，黨的八大的準備工作應以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為中心。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澤東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認為：「我們的有利條件是：一、有二十二年根據地工作的經驗，經過四次革命戰爭……。二、現在有了偉大的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三、有六億人口，地大物博，物產豐富。我們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會主義。」毛澤東還說：「這不是急躁冒進，而是實際與可能的要求，是穩步前進。」針對國家計委強調平衡發展的說法，毛澤東講起了辯證法：「客觀事物，不平衡是經常的，平衡是暫時的，不斷平衡，不斷衝破，這就是我們前進的規律。衝破了平衡是好事，不要怕。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就恰恰要犯錯誤。」最後，毛澤東又告誡說：「搞工業的同志不要驕傲，要加油，否則就有出現兩翼走在前面而主體跟不上的可能。特別是重工業千萬不可驕傲，因為我們既無經驗又未搞好，工業體系還未建設起來。有人說：『可不可以讓農業等一下工業，不要走得那麼快。』這種說法是右的。不能叫農民等，而是工業要趕上去。」[28]

毛澤東關於加快發展速度的想法在黨內的傳達並向社會公開透露，對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機關發生了重大影響。

1955年12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集了中央座談會，布置召開八大的籌備事宜。在京中央委員、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負責人122人參加了座談會。劉少奇說，今天開會主要傳達主席提出的在我們工作中反對保守主義的問題。他說，在今春黨代會議上，主席曾講：「反『左』反右，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保守主義。」在六中全會上，又集中地批評了農業生產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錯誤。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會議上，再次指出黨內領導思想如何與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問題，我們的領導思想總是落後於實際情況，如對農業合作化、肅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問題等，都抱有右

傾思想。會議確定以反對右傾保守主義作為八大籌備的指導思想。劉少奇還說，過去我們曾反對急躁冒進，貪多、貪大、貪快，這也是對的。但是，那時在反的過程中出了毛病，把幹部的積極性和群眾的積極性都反掉了。主席說：「把掃盲也反掉了」。結果正氣不伸，邪氣上漲，幹部、群眾沒有氣了。主席說：「這樣的問題中央可以早提出來，但沒有早提出來，是失職的。」要站在群眾的前頭，不要做群眾的尾巴；要鼓勵群眾，不要潑冷水。領導群眾不左、不右，老老實實地向前走，這就叫做穩步前進。另一條是按常規前進，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的同志卻正在走着這條路。毛主席講要我們發現問題，鼓勵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早完成計劃。如果這樣做，不是大約而是可能超額和很好地在十五年以前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劉少奇最後說：「準備明年9月召開八大，中心問題就是這些。」他希望各部門都要反對保守主義，加強全面工作規劃，「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29]

此前，已在農業合作化方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面反對右傾保守，現在又提出在各條經濟建設戰線反對右傾保守，「提早完成計劃」，這使大家的壓力陡然增加。首先是主管經濟工作的周恩來感到有壓力，就在不久前，他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需要十五年的時間。11月15日，周恩來在會見日本擁護憲法國民聯合訪華團成員時還說：「相信有三個五年計劃就可以基本上實現工業化」，以後再逐步提高，趕上工業發達國家。[30]現在，毛澤東批評中央失職，國務院自然難脫其咎。於是，周恩來當即在中央座談會上做起檢查：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對盲目冒進是對的，但又帶來了副作用，必須打破這個副作用」。周恩來多少有些自嘲地說：「我對毛主席指示的體會可以用一副對聯來反映，上聯：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下聯：主觀的努力落後於客觀的需要。新大陸早就存在，而我們發現得太晚了。」[31]事實上，周恩來這時確是處於被動跟進狀態中的。

12月21日，周恩來和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二十一次全體會議，不得不以反對保守主義的精神重新進行全面規劃。周恩來說，農業合作化運動以來，各項工作都受到了推動。毛主席從外地視察回來，提出了發展農業的十七條辦法，這是一個推動力量。政府的各項工作都受到了推動，變化很大，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並且改變了五年計劃和遠景計劃中的一些指標。周接着提出，財經、貿易、農林、水利、文教、政法部門，都要有全面規劃；各省、縣、區、鄉也要全面規劃。我們的發展速度加快了，不能再搖搖擺擺，而要大步前進。五年計劃有幾種生產指標要修改。過去說，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後，鋼產量達到1800萬噸，

現在改為2400萬噸；煤增加到3億噸；糧食達到10000億斤。周恩來要求，各部門都要考慮，需要擴大多少，於1月15日前提出來。文教、衛生、政法也要提出計劃。我們原來設想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現在有可能加快這個速度，提前完成」。[32]不過，周恩來很快就察覺到這種號召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新中國正在蒸蒸日上，人們對未來前景充滿了美好的期待，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十分高漲。所以，對於一般幹部和黨內大多數人來說，聽到毛澤東的談話，大都感到倍受鼓舞。像顧準這樣素以冷靜著稱的經濟學家，也為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建設而歡欣。他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昨天聽了12月5日中央會議的傳達，「八大的中心是反保守主義，這樣速度問題就提到議程上來，過去許多難解決的矛盾，就會逐步解決了」。12月18日的日記又記道：「細細想來，三個文件，六中全會，工商業改造，與最近關於工業方面的傳達，確實將開闢一個新紀元。」[33]

3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

既然是計劃經濟，推動建設高潮的辦法當然就是督促政府各部門制定高指標的經濟計劃和遠景發展規劃。

早在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了「全面規劃」的任務。當談到在全黨開展一次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大辯論時，毛澤東提出，這是由農業合作化方針問題引起的，牽涉到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衛生各個部門的工作，還牽涉到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軍隊和外交，總之，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和總路線規定的任務相適應，都要有全面規劃」。[34]其中，毛澤東首先盯住的是農業發展規劃。

11月，毛澤東先後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十五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們座談，展望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發展的遠景，共同歸納出十七條。毛澤東對農村有着特殊的興趣，他創立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親手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高潮，現在又要從農村開始規劃未來，並試圖以農村發展的戰略目標來推動全局，加快各方面的建設速度。從杭州回到北京後，毛澤東在11月24日的中共中央關於對資改造問題會議上，談到了十七條的產生過程。他說：「這回在杭州找了九個省的省委書記談了一次（華東、中南九個省，有兩個省沒有邀，一個福建，一個廣西），在天津邀了六個省區（華北三個，東北三個，熱河沒有邀）的書記又談了一次，談的結果，我們談出這麼十七條。這十七條，我想跟在

座的人，所有中央的同志跟各地方的同志都有關係。」毛澤東還說，過去我們認為城市先進，農業落後，「現在是鄉下壓城裏了」，重工業部、交通部、林業部、衛生機關、水利部、輕工業等部門「一天天壓力來了」，宣傳部、教育部、文化部「現在也都要忙起來」，「要壓一下，加一點壓力」，「形勢是來了，這是不可避免的」。[35]

為這份農業發展綱要的擬定，毛澤東付出了很大的熱情和精力。「農業十七條」提出後，毛澤東組織了一個大範圍的討論。1955年12月21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的通知，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通知〉就農業合作化進度、地主和富農入社、合作社領導成份、增產的條件、全面長期計劃、興修水利等內容，請各省委準備意見，在1956年1月3日前上報中央。〈通知〉指出，「農業十七條」將在1956年1月10日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加以確定，以便納入1956年的計劃，認真開始實行」。[36]1956年1月4至9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書言己會議，並召陳毅、譚震林、羅瑞卿、陳伯達、廖魯言等人參加，繼續討論農業規劃。「農業十七條」內容不斷增加，1月4日，從十七條增加到二十二條，1月7日，增加到三十八條，1月8日擴充到四十條，最後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初稿。期間，毛澤東親筆修改有三十六處。1月8日凌晨，毛澤東致信周恩來，將擬就的農業發展綱要初稿（當時只有三十八條）發回北京，要求周恩來召集政治局會議，邀請在京中央委員和若干負責同志參加，對草案初稿加以修改。通過後，發給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到會者徵求意見，再加修改後，即可「發給各地黨委，直至支部，徵求意見」。1月9日，毛澤東再次給周恩來寫信，說綱要又有修改，已增至四十條，上午即派機要秘書送回北京。同時，由於參加杭州會議的各省書記「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馬上印發給下級黨委」，毛澤東決定，綱要草案可經政治局或書記處「大略談一下」，然後決定「是否可以讓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達各級黨委（黨外人士不在內）徵求意見和安排工作」。毛澤東還告知，他擬連夜回京，以便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綱要草案，並作為定稿「正式下達」。接到毛澤東的信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月9日、11日連續召開會議討論。1月17日、23日，回京後的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共中央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討論。[37]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綱要修正稿，正式下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專區（自治州）、縣（自治縣）、區、鄉（民族鄉）的黨委徵求意見。1月25日，毛澤東召集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許多科學家、教授被邀請列席最高國務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社會主

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的重要講話，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在會上作了關於綱要草案的說明。1月26日，《人民日報》全文公開發表了這份綱要草案及廖魯言的說明。[38]

這是新中國的第一個長期發展藍圖，其目的首先是要為走進合作社以後的中國農民規劃出一個美好未來。藍圖描繪了實現合作化以後的農村狀況：對鰥寡孤獨者實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燒、保教、保葬），增加農作物產量，發展畜牧業，興修水利，推廣新式農具，逐步實現機械化，推廣良種，改良土壤，消滅蟲病害，開墾荒地，綠化荒山，改善民居，消滅流行病，除四害，掃除文盲，普及農村廣播網和電話網，建成全國地方道路網，保護婦女兒童等等。同時，綱要還提出了一系列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具體指標，如在七到十二年內基本消滅危害牲畜最嚴重的病疫；基本上消滅危害農作物最嚴重的蟲害；基本上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旱災和水土沖刷的災害；基本上消滅「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要求在三年至五年內推廣雙輪雙鏵犁600萬部和相應數量的播種機、中耕器、噴霧器、噴粉器、收割機、脫粒機、鍘草機等。在十二年內擴大復種面積，五嶺以南地區達到230%，長江以南地區達到200%，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達到160%，長城以南地區達到120%。在十二年內國營農場的耕地面積由1955年的1336萬畝增加到14000萬畝。在五到七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七年或者十二年內普及小學義務教育，基本上普及農村文化網，基本上普及農村廣播網，完成鄉和大型合作社的電話網，基本上建成全國地方道路網，基本上建成水文的和氣象的台站網等等。[39]這個綱領，從經濟、文化到社會生活，描繪了一幅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景象，使人一新耳目，心往神馳。這當中不僅體現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宏圖大略，也溶入了不少熱衷於中國鄉村建設的知識分子的動人理想。

從上面所引的數字可以看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已經顯露了後來「大躍進」的先兆。發展綱要的「中心」是要求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農作物的產量，這特別體現為以下一組增長指標：在十二年內，糧食每畝平均產量，在黃河以北地區由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區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皮棉）每畝平均產量按照各地情況，由1955年的35斤（全國平均數）分別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綱要還規定糧食、棉花每年以8%和10%的速度增長，十二年內年總產量分別增加1.5倍和2倍。廖魯言在關於綱要草案的說明中擔保說：「只要這項中心要求做到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提出的提高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項要求，就將毫無疑問地隨着生產的發展而逐步實現。」[40]

然而，恰恰是這個中心指標大大超出了現實的可能性。[41]廖魯言在經毛澤東審定的草案說明中規定，到1967年，糧食年產10000億斤，棉花年產1億擔。而在公開發表時，將這兩個資料改成分別比1955年產量增長1.5倍和2倍。[42]也許感到太沒有把握，還有一些指標在最後定稿時刪去了。如初稿中要求十二年內開荒5.5億畝，省內和省外移民1000萬戶。在向社會公布時，已經沒有這些數字了。此外，國營農場的目標，即耕地面積2.4億畝，也減少到1.4億畝，減少了整整1億畝。[43]這些被修改或刪節的經濟指標，大多是熱情所至，沒有經過任何科學論證，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其實，不實際、不科學的指標還有不少，如急切在全國推廣不成熟的改良農具雙輪雙鏵犁，把益鳥麻雀歸為「四害」消滅等等。不過，對這些問題當時並沒有提出疑義。更重要而被忽略的問題是如何落實保證這些宏偉目標的措施。廖魯言說得很輕鬆：「這個綱要主要是依靠農民自己，運用五萬萬農民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實現的。」他說，「國家所花的錢不可能太多」，如果一切都由國家投資來舉辦，其結果或者是推遲這些事業的興辦，或者是縮減工業投資而推遲工業化。[44]國家不可能為農業大量投資，這的確是現實。然而，完全依靠農民自己實現這些藍圖，就能行得通嗎？

毛澤東雖然對農業問題有特別的興趣，但他的本意不止於此。他是要以「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來促工業和其他部門，要求各行業、各部門都要有長遠規劃。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全面規劃」的任務，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因此，「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45]

4 計劃指標的修改和膨脹

反「右傾保守思想」成為1956年初指導各項工作的基本方針，當時是受到黨內一致擁護的。對於毛澤東提出的加快經濟發展的新方針，劉少奇、周恩來等其他中共領導人開始都是積極贊同的。除了認同毛澤東的權威和希望迅速擺脫國家貧窮落後的面貌外，這裏有一個共產黨人的基本理念問題。大家都相信這樣一個道理：生產關係的變革一定會大大促進生產力的提高，相信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高潮，必定推動經濟發展高潮的到來。1956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講到：「社會主義改造的重大勝利，又給我們提供了

加快社會主義工業化速度的有利條件。我們早先所需要解決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問題，工業化資金積累問題，工業的市場問題，工業更有計劃地發展問題等等，都將得到更好的解決。在這種形勢下，我國自然不應該再拘守原來的工業化規模和速度，而是要適當地把它擴大和加速了。」[46]這種看法在當時中共領導層中無疑是完全可以達成共識的。

在客觀上，1956年加快發展速度也有一些經濟背景，主要是1955年年度計劃執行中出了問題。由於受1954年農業自然災害的影響，工業原料不足，1955年的經濟發展速度比前幾年大幅度下降，工農業總產值僅增長5%。到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只剩下兩年時間，而基本建設計劃投資額僅完成了61%。此外，由於缺乏經驗，估計不足，在制定和實施1955年度計劃時，不適當地削減了某些非生產性（校舍和職工宿舍等）建設項目，使投資總額由原來的97.9億元調減為91.7億元。結果原來安排收支平衡的預算，結餘資金18.1億元，鋼材、木材、水泥等物資也有較多的結餘。這就使1955年計劃顯得有些保守，且導致一五計劃難以如期完成。又由於當時沒有認識到保留必要儲備的重要性，一度決定鋼材出口，水泥減產，木材和部分器材減價出售。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兩年後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到這件事時，依然耿耿於懷。他說：「就這樣一件事情講，我看是幼稚的，眼光短淺的。」[47]周恩來為此多次作檢查，認為自己的確保守了一些，「主觀努力落後於客觀的需要」，「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又承認「我們開始沒有重視物資儲備工作，是個錯誤」。[48]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也積極行動起來。後來被毛澤東大加讚賞並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方針的口號——「多、快、好、省」，就是首先由周恩來、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提出的。時任國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回憶說：「據我了解，『多快好省』的提出過程是這樣的：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總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過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後來補充了一個『省』字。」[49]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也曾提到：「1956年春季，毛主席提出了多快好省，當時我在口頭上贊成、是擁護的；並且在毛主席開始提出『多、快、好』的時候，我還加了個『省』字，毛主席也同意了。」[50]據現在看到的材料，首先完整地使用「多、快、好、省」的提法，是1955年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國農具工作者會議上作的報告，報告的題目就叫：〈改善企業管理，掌握新技術，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國重工業的生產而奮鬥〉。[51]此後，「多快好省」的方針逐漸宣傳開來。

對於經濟建設而言，「多快好省」的要求，即希望以快速度、高質量、小成本來取得多成果，當然是一個理想的方針，而且周恩來等人當

初提出這個口號的用意，很可能就是為了以「好」和「省」去制約「多」和「快」。但在實際宣傳和執行中，由於主旋律是反右傾保守，由於熱火朝天的社會氛圍，人們注重的只是「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只講數量、速度，不講質量、成本。於是，這一方針後來事實上成為高速甚至超速實現工業化的代名詞。1956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標題是〈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這篇由毛澤東親自審閱並肯定「寫得很好」的社論，明確地把反對「右傾保守」的口號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並列提出，從標題到內容，充滿了形勢逼人的氣息。[52]

農業發展綱要提出後，各部委，各省、市都開始積極行動起來，紛紛制定自己的具體措施和遠景規劃。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1956年1月1日的日記中記道：「毛主席在去年12月提出了反對保守思想的問題後，社會主義工業交通運輸等方面根據這種精神作了傳達，新的高漲也已出現了，五年計劃很可能在四年內就完成！現在黨中央提出了極為響亮的口號：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我們的事業！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各工業、教育、文化部門正積極地訂立具體措施。」[53]

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開會，討論編制十五年遠景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輪廓的問題，各部匯報了自己的設想。[54]按照各部匯報，1967年，全國糧食產量6000億斤，棉花產量5600萬擔，鋼產量1800萬噸，煤炭產量28000萬噸，工農業產值平均年增長速度：一五計劃期間8.6%，二五計劃期間9.9%，三五計劃期間10.1%，十五年平均年增長9.5%。10月5日，國家計委彙總報告中央。[55]這個設想，特別是糧食產量的增長速度，已經很高了。國家計委向中央彙總報告各部長期計劃設想時，附加了國家計委綜合局對1967年生產糧食6000億斤的論證。綜合局認為，「糧食產量從1952年3278億斤增長到1967年的6000億斤，增長83%，每年平均遞增4.1%；單產由176.3斤增至260.7斤，增長47.9%，每年平均遞增2.64%。這種增長水平超過目前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水平而居世界第一位」。據綜合局提供的資料，蘇聯從1928年到1950年的二十二年間，糧食總產量平均每年遞增2.4%，美國、英國從1913年到1952年的三十九年間平均每年遞增0.9%和1.3%，日本從1927年到1952年的二十五年間平均每年遞增1.8%。[56]然而，毛澤東對這個設想仍然不滿意。他從農業入手親自抓發展速度。按照「農業十七條」規定的平均單產和規劃後的耕地面積計算，1967年糧食產量不是6000億斤，而是10632.8億斤，超出主管部門原設想近80%；棉花產量不是5600萬擔，而是12000萬擔，超出原設想的一倍多。[57]農業指標的大幅度提高，推動了各個領域規劃指標的攀升。

反右傾保守造成了逼人形勢，各級領導人的頭腦也開始普遍發熱。早在1955年11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農業十七條」傳達下去後，許多省、市領導人就開始動起來了。11月，山西、江西、山東率先提出，1956年就將完成1957年的指標；隨後，其他省、市在12月提出了同樣的口號。浙江省委更加激進，提出要總結畝產「千斤糧、萬斤薯、百斤棉」的增產經驗加以推廣。[58]各地加強了在農業生產上反右傾保守思想的宣傳，從省、縣直至農業合作社，都在提高自己的增產目標。如山東省許多農業合作社提出的增產目標「不是百分之幾，而是百分之十幾甚至幾十」。[59]

頭腦發熱的不只是地方負責人，還有中央的各業務部門，急速修改、提高的也不只是農業指標，還有各種工業指標。1956年初，國務院各部門召開了二十一個專業會議，紛紛要求把十五年遠景設想中規定十二年或八年的任務，提前在五年甚至三年內完成。1月14日，國家計委彙總報告中央、國務院。遠景規劃對1967年所要達到的目標做了大幅度修改：糧食9500億斤（加上大豆實為10000億斤），棉花1億擔，鋼2400萬噸，原煤33000萬噸。與1955年夏北戴河匯報的指標相比，糧食增加3500億斤，棉花增加4400萬擔，鋼增加600萬噸，原煤增加5000萬噸。不少部門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實現的指標，提早五年，改為1962年實現。1月15日，正在蘇聯訪問的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託，向蘇共中央通報了二五計劃和十五年遠景計劃。通報的1967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指標為4679億元，比北戴河匯報時的彙總數字提高了43.1%，糧食指標10000億斤，棉花指標1.2億擔。[60]

如果說遠景規劃中的高指標還只是造成了一種「躍進」的氣氛，那麼，1956年年度計劃的修改則直接影響到當年的經濟工作。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國家計委提出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即基本建設投資112.7億元，比1955年的預計完成數增長30.4%，比一五計劃中規定的1956年投資額增長12.4%。這已經是十分驚人的增長，但由於反右傾保守的壓力和追求高速發展的熱情，各省市、部門還紛紛要求追加投資。據國家計委1956年1月5日報告，各省市、部門要求的投資總額已達153億元，後來又增加到180億、200多億元，比1955年預計完成數增加了一倍以上。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限額以上基本建設項目694個，其中建成項目455個；1956年初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基建會議將建設項目追加到745個，建成項目追加到477個；幾個月以後，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800個，建成項目追加到500多個。於是，便出現了周恩來所說的「各方面千軍萬馬，奔騰而來」的混亂局面。[61]

[1]《人民日報》，1956年1月16日；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28。

[2]《人民日報》，1956年1月22日。

[3]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52。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90。

[5]《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488。

[6]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414。

[7]參見沈志華：《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341—358、373—433。有關蘇聯集體化運動的大量俄國檔案文件，可見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四、六、十二、十五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8]蘇聯的穀物總產量（按1939年以後疆界計算），1913年為8600萬噸，1953年為8250萬噸，1946—1950年平均為6480萬噸。參見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匯編》（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頁135—137、164—165。

[9]詳見沈志華：《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10]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24。

[11]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176、182。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82—78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79。

[13]吉林省檔案館，1-11/1-1955.161，頁102—104。

[14]《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9。

[15]各地改造的具體情況參見《內部參考》，1955年12月10日、15日、20日、21日、23日，及1956年1月7日、13日、24日；上海市檔案館，B163-2-279，頁1—11，C48-1-113，頁11—15。上海攀比北京的例子最為典型。195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北京市的報告，稱讚北京「具有敏銳的感覺」，並支持他們打破常規的做法。參見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6）》（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45—46。14日，中共上海市委便召集了工商界上層人士座談會，市委書記陳丕顯在會上通報說，北京的公私合營工作已經衝破了原有計劃，也衝破了上海的計劃。會後，上海市工商界臨時代表會議便作出決議，要求市區兩級工商聯、同業公會積極展開宣傳教育工作，爭取在1月20日前完成全市公私合營的申請準備工作。沒想到15日北京就宣布進入了社會主義，上海市長曹荻秋在第二天立即發表公開講話，宣布上海將在六天內完成全市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參見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頁589—590，604—605。

[16]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57—458。

[17]李慎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118—119。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44；熊華源：〈論周恩來在反冒進中的探索〉，頁9—10。

[19]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90—191。毛澤東的講話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2。

[20]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11。

[21]《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271—272。

[22]陳雲：《陳雲文選（1949—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80—292。

[23]《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285、287—288。

[24]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頁222。關於陳雲的思考，詳見《陳雲文選（1949—

1956）》，頁293—306。

[25]《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25。

[26]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23—224。

[27]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會議上的講話（速記草稿），1955年11月24日（以下簡稱毛澤東1955年11月24日講話）。

[28]以上毛澤東的講話是1955年12月5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傳達的，參見《劉少奇傳》，頁777—779；《周恩來傳（1949—1976）》，頁258。另見《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8—9。

[29]《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8—10。

[30]熊華源：〈論周恩來在反冒進中的探索〉，頁9—10。

[31]《周恩來傳（1949—1976）》，頁259。

[3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29；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三卷，1991（未刊），頁242—243。

[33]《顧準中央黨校日記》，未刊稿。轉引自羅銀勝：《顧準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頁330、335。

[3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95。

[35]毛澤東1955年11月24日的講話。

[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78—481。

[3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37。

[38]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頁7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41—542；《人民日報》，1956年1月26日。

[39]《人民日報》，1956年1月26日。

[40]《人民日報》，1956年1月26日。

[41]到1996年，中國的糧食和棉花產量才分別達到9800億斤、8400萬擔。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頁1218。

[4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6—527。

[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7—19。

[44]《人民日報》，1956年1月26日。

[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2。

[46]《人民日報》，1956年1月22日

[47]《李富春傳》，頁337—33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4—525。

[48]轉引自熊華源：〈論周恩來在反冒進中的探索〉，頁9；《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三卷，頁313。

[4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6。

[50]轉引自《李富春傳》，頁477。

[51]《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頁76。

[5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頁576。

[53]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216—217。

[54]十五年遠景規劃是指1953—1967年，此時已過三年，故有時也稱十二年遠景規劃。

[5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3。

[5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9。

[5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4。

[58]《人民日報》，1955年11月28日、12月13日、12月14日、1956年1月16日。

[59]《人民日報》，1956年1月12日。

[6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1、527—528。

[6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1—532。

二 從反「右傾保守」到反「急躁冒進」

周恩來對冒進的疑慮，是在遇到具體問題時逐步形成的。現在看到的周恩來最早提出防止「冒進」問題，是他在1月20日中共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結束時作的總結講話，那時國務院剛剛接到國家計委關於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和十五年遠景規劃的綜合報告。在這次講話中，周強調說：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他說：「這一次我們在國務院召集的計劃和財政會議，主要解決這個問題。」[1]

毛澤東在當天會議的講話中，也談到了實事求是的問題。在提到開荒5.5億畝的問題時，鑑於陳雲等人都提出了不同意見，毛澤東總結說，各部門訂計劃指標，要放在可行的基礎之上。本來做得到的，本來應該辦的，不去辦，這就叫右傾保守；沒有充分根據的，行不通的也去辦，那叫盲目性，叫「左」傾冒險。毛澤東承認現在有些人「頭腦不那麼清醒了」，沒有實事求是，但同時指出，在全黨，在目前，這「恐怕也還不是一個主要的傾向」。而主要傾向，毛澤東明確說，那就是右傾保守，「這個右傾保守現在是相當地存在在各方面」。通觀全篇講話，毛澤東的主旨還是反對「右傾保守」。在講話一開始，毛就尖銳地提出了領導方法的問題，他說：「有兩種領導方法：一種使得我們的事業進行得比較慢一些，比較差一些；另外一種使得我們的事業進行得快一些，好一些。」那麼是應該促進還是應該促退呢？毛澤東選擇了前者，還點名批評農村工作部是「促退部」。他要求政府和黨的各工作部門都「應該是使事業促進」，如果黨和政府的各部門不能促進，「就喪失了它這個職能」。講到最後，毛澤東又一次感慨中國的落後。他意氣風發地說，中國人口多，地方大，現在又有了社會主義新制度，「應該搞成世界上第一個文化、科學、技術、工業各方面更好的一個國家」。甚麼美國，那麼一點東西，一萬萬噸鋼，幾百個氫彈，不大算數，中國要超過它。[2]

1 周恩來等人的隱憂和警告

與毛澤東在原則上批評盲目性的說法不同，周恩來提醒防止「盲目冒進」是有具體所指的。1956年初，由於各地區、各部門都要求追加投資，已經出現了物資供應緊張的局面。1月13日，國家計委向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發出〈1956年國家統一分配物資平衡情況簡報〉，認為

1956年物資供需不平衡狀況可能會比以前更加嚴重。國家統一分配的8類235種產品，除煤炭、木材、鹼等少數產品基本平衡或有少量多餘外，大部分是緊張或不足的。其中突出的缺口有：鋼材75萬噸、鍍鋅鋼板5.5萬噸、大口徑無縫鋼管4萬噸、金屬切削機牀3569台、鑽探機1509台。簡報說，形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基本建設規模安排過大，必然引起對生產資料需求的增長超過生產的增長，其結果導致物資供應的緊張狀況。[1]這時正在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和全國財政會議，指導方針就是反「右傾保守」。會議期間，代表們情緒高漲，頭腦發熱。受到這種情緒的感染，在1月25日毛澤東召集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李富春匯報了經國家計委修改和調整的二五計劃指標和十五年遠景規劃控制數字，其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為：到1962年（二五計劃期末），鋼1200萬噸，煤2.4億噸，原油800萬噸，發電量500億度，化肥450萬噸；到1967年，鋼2400萬噸，煤3.3億噸，原油2000萬噸，發電量1100億度，化肥1000萬噸。[2]這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他看出有冒進的苗頭，想「壓一壓」。

1月30日，周恩來發出了不同聲音。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周恩來隻字未提在當時全國叫得很響的一個口號——「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樣做明顯地表露出與毛澤東的不同思路，因為「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口號是毛澤東提出的，而且是一個多月前劉少奇剛剛在中央座談會上傳達的。[3]一些會議代表看到〈政治報告〉有意迴避這個問題，就此提出疑問。周恩來在閉幕會上解釋說：講提早完成工業化應慎重。工業化比三大改造困難得多，要實事求是，不要沒有根據地提，要區別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報告〉中只說加快速度，而不說提前完成工業化。大家要認識到，工業化是需要時間和知識的。[4]

2月6日，在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時，周恩來也談到，我們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可能還需要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謹慎一點好，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把握。同一天，周恩來又召集李富春和財政部長李先念、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財政部副部長金明等開會。周在談話時態度明確地指出：反右傾保守，轟轟烈烈，這是社會主義的喜事，但也帶來一個缺點，不小心謹慎辦事，有冒進、急躁傾向。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要鼓勵，不能潑冷水，但各部門搞計劃要實事求是，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沒有根據地亂提計劃。各部門專業會議打的計劃都很大，計委、財政部要壓一壓。[5]

2月8日，在主持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時，周恩來再次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口氣更加堅決：「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

成。」還說：「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考慮到當時的主流氣氛，周恩來又補充說：「當然反右傾保守是主要的，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6]毛澤東一再告誡「不要潑冷水」，周恩來提出「用冷水洗洗」，兩種不同的思路已經顯現。[7]

由於周恩來的堅決主張，全國計劃會議開始考慮壓縮計劃指標。2月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上李富春指出，在工業高潮中發生了一些新的問題，一個是有些省市和廠礦領導人在新形勢下顯得被動，一個是盲目擴建廠房、增加工人。李富春提出，在完成計劃方面要均衡地發展，不要單純地追求快。地方工業要防止盲目性。今年基本建設投資需砍掉6%，從現在起對各部門不再增加新的基建項目。[8]會議同意李富春的意見，要求對各項主要指標盡可能壓縮下來，其中決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削減6%，全國基建投資由170多億元削減到147億元，雙輪雙鏵犁的產量也由500萬部削減到350萬部。[9]

會後，國家計委根據會議精神開始修訂計劃和綱要草案。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規定，1956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為1260億元，工業總產值為653億元，基本建設總投資為147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5.9%、19.7%和68.1%。[10]遠景計劃綱要草案（第三修改稿）規定，到1957年、1962年、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將由1952年的827億元分別增長到1471億元、3114億元、5469億元，十五年共增長5.6倍，每年遞增13.4%（二五計劃期間每年遞增16.2%）。其中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到657億元、1848億元、3522億元，十五年共增長12倍，每年遞增18.7%（二五計劃期間每年遞增23%）。糧食總產量分別增長到4350億斤、6400億斤、9500億斤，十五年共增長1.9倍，每年遞增7.4%（二五計劃期間每年遞增8.2%）。[11]後來周恩來坦然承認，1956年2月召開的財政、計劃會議就是「促退會議」。[12]不過，從上引數字對比的結果看，除了1956年基建投資規模有所壓縮外，其他指標變化不大。「促退」在這時還只是周恩來的願望。

應該說，周恩來並沒有直接對毛澤東所提倡的新方針提出置疑，1月30日的〈政治報告〉也沒有從總體上抵制反「右傾保守」的指導思想，報告畢竟是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和毛澤東審閱的，而不是周恩來的個人發言。〈政治報告〉迴避了「提早實現工業化」的口號，但在基調上依然主張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報告說，目前中國「處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中」，「全國人民奔向社會主義，到處出現一片歡欣鼓舞的景象」，社會主義改造的規模和速度，「為社會主義工業的加速發展

和國民經濟的新的高漲提供了有利條件」。報告雖然提出要同時防止犯「右傾保守的錯誤」和「盲目冒進的錯誤」，卻並沒有列舉「盲目冒進」的具體事例，而是着重批評了「保守主義的潮流」。報告指出：還有不少企業的生產狀況是很落後的。這些企業的領導人員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潮流中也修改了一些定額，看來似乎已經是先進的了，但是只要「同真正先進的定額比較一下，就知道他們仍然是很保守的」。「看到旁的企業跑到前面去了，並不向這些先進的企業學習，反而忙於替自己尋找辯護落後的藉口」。各部門領導者「要向這種安於落後的人們展開批評，不要採取妥協態度，不要讓他們佔先進生產者的便宜，而要利用先進者的榜樣，促使落後者脫離落後狀態」。「只有這樣，領導者才證明他不是右傾保守主義者，不是右傾保守主義者的保護者，才正確地盡了政府給他的領導的責任。」[13]顯然，周恩來沒有，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對反右傾保守的方針提出異議，而只是委婉地表露了對已經出現的冒進苗頭的擔心。

正因為反「右傾保守」風頭正勁，2月的「促退會」並沒有真正實現促退。2月22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報送的〈關於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說，計劃草案「是在國民經濟全面高漲的新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保守主義，計劃既要積極又要可靠的指示和提前完成五年計劃的精神編制的」。1956年的計劃指標再次修改為：工業總產值535.7億元，農業總產值606.8億元，基建投資總額147.35億元。對於這樣的指標，國家計委在報告中直截了當地指出：要完成1956年的計劃任務，「是十分繁重和緊張的」，「特別是設備和建築材料的供應同需要還有相當的差額，資金、技術力量和人民負擔能力也有限度」。[14]2月24日、28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上通過了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儘管經過了一系列會議討論、協調，計劃草案只是對個別指標作了象徵性的壓縮，與上年相比，增長速度還是驚人的：工業總產值增長19.7%；基本建設總額增長70.6%；農業總產值增長9.3%，其中糧食增長8.4%，棉花增長17%。無可奈何的周恩來，只能要求各部門平衡物資，挖掘潛力，節約材料。3月25日該草案由國務院下達全國。[15]

2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分歧明朗化

進入4月以後，周恩來等領導人與毛澤東之間，在發展速度問題上的分歧明顯地加大了。一方面，毛澤東主張進一步追加預算，一些地方和部門也在爭投資。另一方面，財經領導人感受到經濟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難以支撐高投資，必須壓縮預定計劃。毛周之間的矛盾開始明朗

化。

從2月到4月，毛澤東聽取了三十四個部委的匯報，對經濟建設問題進行調查研究。這時，正值蘇共二十大召開，蘇共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時期的問題，其中包括經濟建設方面的一系列弊端。毛澤東由此提出「以蘇為鑑」的口號，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想要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並確實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如打破對蘇聯經驗的迷信，就是一個合理的命題。但是毛澤東從這裏引申，卻提出了在建設速度上也必須超過蘇聯的要求。薄一波後來回憶說，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的插話，提出了一些「過急過快」和「不切實際」的要求。例如，說我們工業的發展速度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所束縛，我們的速度可以超過蘇聯。[16]在談到工業發展速度可以超過蘇聯時，毛澤東還提出了「一空二白」（發表時改成了「一窮二白」）的論點，他說：「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也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富了不行。」[17]這個多少有些奇異的論據，來源於毛澤東獨特的辯證法思想，儘管「帶有認識上的一些片面性」，卻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主持財經工作的領導人不能這麼浪漫，他們必須每天面對現實，處理複雜而又具體的任務。4月上旬，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嚴峻形勢。如同周恩來所說，由於「基本建設的規模定得大了一些」，國民經濟各部門又出現了「齊頭並進和急於求成的傾向」，「結果，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且造成國民經濟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18]1956年基本建設比上年增長62%，而以生產資料為主要產品的重工業產值只增長了40%，結果雖然動用了70萬噸庫存鋼材，鋼材仍然供不應求，其他建材和若干機械設備也供不應求，結果使建設工作中出現不少停工待料和窩工現象，僅1956年4月份，因建築材料和設備供應不足而未能如期開工的項目即佔同期應開工項目的20%。此外，在原材料分配時，為保證重點建設的需要，對於一般為市場服務的生產（即主要為生活消費資料）則照顧不夠，分配減少，使這類生產受到限制，產品品種和數量不能滿足社會需要，造成市場供應緊張。如1955年供給輕工業市場的鋼材佔當年鋼材供應量的23.2%，而1956年則降為18.7%，但是1956年因農業投入和職工工資總額大增，以鋼鐵為原料的農具和消費品的需求也大增，結果1956年出現手工業者到處抬價搶購廢銅鐵現象。[19]薄一波回憶說，那時，下面普遍要求增加生產，而上面卻不敢將物資緊張情況向下交代，工作十分被動。[20]

為扭轉被動局面，國務院開始採取應急措施：「動員生產，約束基建」。4月1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國家計委〈關於

1956年基本建設計劃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資的補充報告〉。薄一波、陳雲、周恩來等人都主張「降溫」。薄一波說：年度計劃不能和長遠計劃分開，現在各部門總想把長遠計劃完成的期限盡量往前趕，而沒有考慮到實際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教訓，應該使大家頭腦冷下來。陳雲說：生產與基建的關係，首先決定於生產、材料，不是決定於財力。材料的來源首先決定於國內的生產，而不是進口。計劃應該按比例發展，如基建超過了生產就不行。以後訂計劃應首先進行物資平衡，然後再進行財力平衡。周恩來贊成他們的意見，他說：「搞計劃必須注意實事求是」，「搞生產要聯繫到平衡」，甚至提出了「一定要為平衡而奮鬥」的口號。周恩來指定薄一波和張璽負責平衡工作。根據多次平衡測算的結果，會上確定1956年物資供應計劃按鋼材442萬噸、水泥647萬噸方案執行。[21]

4月14日，國務院為此下達通知指出，「1956年度物資供應情況是很緊張的，鋼材和水泥的供應情況尤為嚴重」。通知要求，全國投資總額仍維持147.3億元的規模，各部門要求新增加的3.5億元建設項目作為「第一批預備項目」。通知告誡各地區、各部門：「必須使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同計劃的全面平衡相結合，特別是同物資供應計劃結合」，否則「就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停工、窩工現象，並且會使我們的計劃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險」。國務院還要求：「從現在開始，各部門、各地方應該迅速組織力量深入實地檢查，進一步摸清生產和基本建設情況，並作好準備工作，在今年5月下旬再把1956年度計劃中需要修正的某些重要指標修正一次，使1956年度計劃放在更積極和更可靠的基礎上，以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所規定的建設和生產任務。」[22]

然而，毛澤東提出的擺脫困難局面的主張卻與周恩來完全不同，他要求國務院繼續增加基建投資，以解決物資平衡的問題。為是否追加投資，周恩來與毛澤東發生了當面爭執。這是周恩來一生中為數不多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毛澤東發生正面衝突。毛澤東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再追加二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再三說明增加基建投資會帶來一系列困難，與會大多數人也不贊成追加投資。但是，毛澤東仍堅持己見。胡喬木後來回憶說：「4月下旬，毛主席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預算，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23]

5月初，毛澤東離京南下去了廣州。一天，毛澤東突發奇想，要到

長江裏去游泳。他不顧羅瑞卿的勸阻，5月30日先從廣州到長沙，游了湘江。然後到武漢，在長江中流擊水。[24]這時，武漢長江大橋正在修建之中。毛澤東為即將到來的建設高潮，為自己心中的發展遠景宏圖而激動，填下一首〈水調歌頭·長江〉，詞曰：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25]

周恩來何嘗不想生產多一些，發展快一些。為了摸清鋼鐵生產的潛力，4至5月，周恩來親自到幾個鋼鐵基地作實地調查。4月14日，周恩來乘火車到鞍山、撫順、天津視察鋼鐵工業，18日飛回北京。19日，約重工業部副部長呂東同上海鋼鐵廠和重慶大渡口鋼鐵廠廠長商談增產事宜。5月6日，又飛往太原視察全國唯一能生產矽鋼的太原鋼鐵廠，次日飛抵唐山，視察唐山鋼鐵廠。通過實地考察，周恩來了解到各地鋼廠不僅不能增加產量，有的甚至對完成現有的生產指標都感到沒有把握。[26]

經過調查研究，周恩來心裏更有底了，進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對冒進問題上，並且公開講出了不同意見。5月1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1日，周恩來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首先得承認今年的計劃搞得不十分妥帖，國務院有責任」。3月份下達的基本建設投資指標太高，「不可能完成」，「生產方面冒進少點」，但也「肯定完不成，因此要好好計算一下」。[27]當然，並非周恩來一人有這樣的舉動，劉少奇和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也都是贊成他的意見。這時，在京的中共領導人對經濟形勢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1956年的計劃「冒了」。因此，周恩來等人從擔心和防止冒進轉到了反對和糾正冒進，提出了改變方針的問題。

3「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方針的提出

1956年5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會議，討論為人大三次會議起草文件——主要是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的問題。會議提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與會者還一致主張寫一篇反急躁冒進的社論，劉少奇提議由中央宣傳部完成這項任務。[28]當時，毛澤東正在南方游泳，未參加這次

中央會議。

6月3日，財政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初稿。報告稿是在周恩來指導下進行的，體現了他從年初以來一再提醒的防止冒進的思想。報告寫道：

> 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着重全面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面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增加生產，而只能招致損失。[29]

6月4日，根據周恩來、陳雲的建議，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討論預算報告初稿，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維漢、胡喬木等出席會議。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介紹了半年來經濟建設急躁冒進所帶來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問題，提出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本建設投資的意見。會議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決定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立即下馬，並據此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30]

6月5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落實中央會議的精神，討論如何削減仍然不切實際的1956年預算。周恩來說：這個報告，「內容本身就有問題，如果說可靠，自己都不大相信。」「各部發言時如果一定要提出這個數字，人大代表問起來，如何答覆？因此，預算數字一定要減一減。」談到具體問題，周恩來說：各省市反映稅收打的太高，過去還能努力爭取完成，今年就沒勁了。「既然認識到不可靠，就應該削減。昨天黨中央開會決定了這個精神。今天在會上討論，把數字減下來。」周恩來最後明確指出，「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31]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贊成周恩來的意見。李先念在會上說，稅收從1953年以來就沒有完成，去年打了100億，實收87億。今年工商稅102億，「這麼大的任務，很難完成」。李先念指出，即使削減預算，「仍要動用上年結餘」，「預算仍然很緊」。因此他認為：「現在下馬比年底再下馬好」。薄一波也支持周恩來的看法，認為這個預算「拿出去確實不好」。薄一波特別講到，去年基建完成原計劃的80多億，今年計劃是147億。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完成。基本建設不僅要有錢，而且必須有原材料。原材料缺口大，當然完不成了。他與李先念一樣，主張有些基建「非下馬不可」，「半路改正錯誤總比到年底完不成改正好」。[32]

具體如何削減，周恩來說，「同意將富春和一波同志的辦法相結合，預算一律削減5%。」按照周的本意，基建投資「不能平均都砍

5%，有的可以多砍，有的不能砍」。薄一波感到為難，「這時減誰的誰也不願意，因為大家都已按147億的盤子鋪開攤子了」。他和李先念兩人的意見是：「只好『剃一次平頭』，大家都減5%。」薄一波回憶說：「我們知道『推平頭』不好，可是實在找不出別的辦法。周總理同意這個意見。」[33]會議最後決定：1956年預算收入在原定303億元中減少5.86億元，支出在原定317億元中減少10億元。預算中基本建設用款控制數由147億元減為140億元，削減出來的7億元列為預備費。[34]於是，預算報告初稿再次提交中共中央討論。

6月10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了預算報告初稿。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陳雲、彭德懷、彭真等三十人（毛澤東仍未回京）。會議基本通過了預算報告初稿。會後，胡喬木受劉少奇的委託，根據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對預算報告進行修改。修改稿將原稿涉及指導方針的一段話改為：

> 在當前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着重全面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面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35]

可以看出，經過政治局討論後的修改稿，明顯增加了反對冒進的份量。兩天後，周恩來在他和陳雲共同主持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說：「從去年反保守到現在」，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迎來了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實際的主觀主義的要求，帶來了急躁冒進」。「去年十二月以後冒進就冒頭了」，現在「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冒進了！」周恩來雖然認為預算「打得還是緊張」，但基本滿意。他說，向人大會議提出的這個報告「可以以此檢查和推動政府的工作」。[36]

4 人大一屆三次會議的基調

就在國務院會議召開的時候，毛澤東已經回到北京。6月12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開會，討論第八次最高國務會議的有關問題。[37]關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討論修改1956年預算報告的情況，毛澤東是何時知曉，又作何反應，目前無從考察。但顯而易見，國務院削減1956年預算的做法與毛澤東4月提出追加投資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後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激烈態度，可以證明，他是極為不滿的。實際上，毛澤東在這一期間也在積極地進行調查研究。繼2至4月聽取中央各部委的匯報之後，毛澤東在5月

下旬開始收集和聽取地方各省市、委的匯報，匯報內容涉及工業、交通、商業、農業乃至失業問題、少數民族問題等十幾個題目。毛澤東特別強調，匯報的問題重點在經濟工作，而以工業「為主要的重點」，只要這個問題準備好了，即可匯報一次。毛澤東為此還親自代中央起草了關於各省市委向中央匯報的「通知」和「補充通知」。[38]可見，毛澤東並非不關注經濟發展速度的問題，他在此時之所以沒有對國務院的主張明確表態，或者是因為具體情況還不甚清楚，或者是因為不願直接否定中央多數人通過的新方針。但無論如何，毛澤東的心情是不愉快的。[39]

6月15日，毛澤東出席了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開幕式，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人大會議從6月15日到30日，開了十六天。議程有四項：審查和批准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討論和通過〈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討論和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補選全國人大常委。這一屆人大會議，沒有政府工作報告和國民經濟計劃報告。會上提出的報告主要有：李先念的〈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廖魯言的〈關於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的說明；彭真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其他還有周恩來關於國際形勢、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的發言；李富春關於一五計劃執行情況的發言；陳雲關於工商業改造問題和工商關係問題的兩次發言；鄧子恢關於農業合作化的發言；郭沫若關於科學遠景規劃的發言；張鼎丞關於鎮壓反革命和處理在押日本戰犯問題的發言；羅瑞卿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發言等。還有幾位民主黨派部長就各自的部門工作做了發言，如交通部長章伯鈞、文化部長沈雁冰、糧食部長章乃器。森林工業部長羅隆基的發言沒有談業務工作，而是就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發表了意見。[40]

在所有這些發言中，財政部長李先念作的預算報告是大會的主要文件，而這份文件的主題和基調就是反冒進。報告雖然提到，1956年「全國人民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空前地高漲」，1956年的預算「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的要求編制的」。但同時強調，要完成這個預算「還必須進行緊張的努力」。除了前引那段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指導思想的話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沒有強調毛澤東年初着力推行的兩個東西：一個是「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個是「多快好省」的方針。報告提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各項建設事業」時，增加了「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的限制詞。其他涉及到這個口號的幾處，也是着眼於糾正急躁冒進的偏差。報告說：目前在工業生產方面，「特別需要注意糾正一部分企業片面地追求『多』和『快』，而沒有同樣地着重『好』和『省』的傾向。許多廠礦雖然超額完成了產量計劃，卻沒有完

成質量計劃和利潤計劃」。「由於片面地追求『多』和『快』，生產中的安全在許多企業中也受到忽視，人身事故和設備事故比去年同一時期有了增加」。「在基本建設的工作中，也存在着片面地追求多、快，而忽視好、省和安全的傾向」。至於「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報告中只有一處提及，而且是從負面提出問題的。報告說：「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曾經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提出過多的要求，希望它們把全國農業生產發展綱要草案中擬定要在十二年內進行的種種好事，在兩三年內都辦完，因而使合作社投資過多，負擔過重。這是錯誤的，必須加以糾正。」[41]

第二天（6月16日），尚未經過大會討論，《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就全文發表了這個預算報告，由此可以看出主管財經工作的領導人此時的急迫心情。儘管這種多少有些違反程序的做法受到許多代表的批評，[42]但預算報告及其提出的方針，在會上似乎並沒有遇到阻力。除李先念外，其他財經領導人在會上的發言，也都貫穿着反冒進的思想。如薄一波以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主任、國家經委主任的名義發言，在分析重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計劃方面「存在不少缺點」時說，「上述問題的產生，是由於在計劃工作中，當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之後又產生了急躁冒進的情緒」。他強調說：「從這裏得到的教訓是，今後在編制計劃時，必須對於我國現有的生產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長程度進行認真的研究，同時經過反覆的平衡計算，從而恰當確定各部門的比例關係。」[43]鄧子恢以國務院副總理兼第七辦公室主任的名義發言，指出在農業合作化和農業工作中存在着急躁冒進傾向的種種表現。[44]李富春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名義發言，也談到「在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特別是在組織農業生產的發展上曾經發生過某些急躁冒進的偏向」。[45]交通部長章伯鈞的發言則進一步指出：「必須通過法律、法令、規章、制度和計劃，來體現既要反對保守思想，又要防止急躁冒進的方針，這才不會使下面感覺到今天一陣風，明天另外一陣風，有些無所適從。」[46]陳雲的發言沒有直接談到反冒進問題，但他關於對資改造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事實上也涉及到指導思想。還有一個現象，會上的發言很少有人提到毛澤東不久前發表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唯獨一個例外，是在李富春談到二五計劃編制問題時涉及到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的三個問題：一是關於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問題；二是關於沿海和內地的關係問題；三是關於增加國家積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關係問題。[47]大會關於預算報告的決議指出：「在執行1956年國家預算過程中，必須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必須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產。」決議甚至指出這是一個「總的方

針」。[48]這說明，「既反保守又反冒進」（主旨就是反冒進）的方針事實上已經取代了反右傾保守和「多、快、好、省」的方針。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社論〈讀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凸顯了大會反冒進的主題。這篇社論提醒讀者，預算報告「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反對保守主義的同時，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口號」，並且指出這是總結了過去半年中執行國民經濟計劃的經驗得來的結論。社論具體列舉了在不同領域急躁冒進傾向的種種表現。在農業工作中，「許多農業合作社的增產計劃過大，而且片面地着重糧棉而忽視副業，生產和非生產的投資都過多，一部分合作社的規模過大，對社員的干涉過多，要求過高，對社員收入的增加和女社員的健康注意不夠」。在基本建設工作中，「許多建設部門的計劃過大，超過了材料和設備供應的限度，而準備工作又單純地偏重了施工力量，許多建設部門在工程中片面地要求多和快，而忽視好、省和安全」。在生產企業中，「一部分生產企業的產品計劃沒有詳細研究原材料的來源和用戶的實際需要，許多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也是片面地追求多和快，忽視好、省和安全」。「在其他方面，例如商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某些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社論解釋說，這種急躁冒進的傾向並不符合於反保守主義的正確的要求，「急躁冒進的結果必然招致損失，妨礙國民經濟計劃和財政收支計劃的實現」。社論還號召全國各級組織和幹部，都要認真重視這個問題，「在實際工作中正確地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49]

5《人民日報》6月20日社論

至於毛澤東對李先念的預算報告以及其他會議發言作何感想，目前尚無史料可以說明，可以看到的文字只是6月22日他在廖魯言關於農業合作社示範章程的信上的一行批示，內容與此無關，涉及的只是土地補償的問題。[50]唯一能夠讓人們察覺到毛澤東當時可能就對反冒進這種提法不滿的，就是他對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態度。其實，6月16日的社論已經強調了反冒進的主題，據薄一波分析，那篇社論「可能由於題目不鮮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51]6月20日的社論則題目鮮明：〈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這篇社論出台的背景。[52]

如前所述，還在5月政治局會議討論1956年國家預算方案時，劉少奇就提議中宣部寫一篇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問題的社論。這篇社論原來是由《人民日報》編輯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討論時，陸定一認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便請示了劉少奇，劉要他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親自組織起草。6月1日，陸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講話

透露：「反對右傾保守，現在已高唱入雲，有必要再提一個反對急躁冒進。中央要我們寫篇社論把兩個主義反一反。」隨後，陸定一將起草的任務交給了宣傳處，宣傳處處長秦川讓副處長王宗一起草。6月10日，陸定一收到社論初稿後作了幾處修改，主要是刪去了頌揚反保守主義的幾句話，刪掉的這段話是：「正是由於反對了保守主義，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才能得到充分發揚，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才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獲得了極其迅速的發展。」陸又在「農村的掃盲工作也是最突出的例子」這句話中的「也是」後面，加了「急躁冒進的」五個字。6月12日，社論稿報送劉少奇處。

劉少奇收到初稿後又作了四處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語氣，以揭示冒進的危害性的。如社論稿寫道：「在最近一個時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些」，劉少奇將「急了些」的「些」字圈掉，並在這句話的後面增寫了「有些計劃定得太高了」九個字。社論稿寫道：「沒有充分考慮到實際的可能性。這是在反保守主義後所發生的一種新情況。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劉少奇在「注意」的前面加上了「嚴重」二字。社論稿指出：「掃盲工作是應當積極地進行的，但我們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些」，劉少奇又把「些」字刪掉了。社論稿在講完掃盲問題的急躁後指出：「在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方面也有一些類似的情況」，劉少奇把「一些」改為「不少」。最後，劉少奇審閱修改後批示：「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毛澤東收到此稿後，只批了三個字：「不看了。」這三個字包含了毛澤東極大的不滿情緒。[53]

胡喬木顯然沒有認真推敲「不看了」這三個字的含義，收到社論稿後，按照劉少奇等人的思路又針對農業和基建方面的問題，增寫了幾個關於急躁冒進的具體事例，如「由於片面的強調了糧、棉的增產，縮小了農村的副業生產，又由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投資過多，這樣就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雙輪雙鏵犁的計劃定的太高，沒有考慮到南方水田的條件，以致在南方許多地方大量積壓，就是一個例子。許多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也沒有切實研究建築材料和機器設備的供應，沒有對設計力量安裝力量作充分的準備，以致發生某些停工窩工的現象」。[54]

6月2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出了這篇社論。

社論的主旨一目了然。雖然指出當前工作中存在「右傾保守思想」和「急躁冒進偏向」兩方面的缺點，但社論認為自1955年下半年以來反右傾保守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急躁冒進是在反保守主義之後發生的新情況。最值得注意的是，社論詳細列舉了急躁冒進在各方面的表現：

就農村工作來說，全國農業發展纲要四十條本來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內分別加以實现的，但有些同志因為心急圖快，企圖在兩三年內即把這些事情做好。在制定增產計劃方面，在農業基本建設方面，在文化福利設施方面，都已表現出這樣一種偏向。由於片面地強調了糧、棉的增產，縮小了農村的副業生產，又由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投資過多，這樣就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村的掃盲工作也是急躁冒進的一個突出的例子。中央的要求本來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內基本上掃除城市和農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了某些省裏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了某些縣就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時間定得愈短。现在正值農忙時間，但有少教農村掃盲積極分子不管這一情況，佔用農民的休息時間來掃盲，使農民只好在課堂上打瞌睡。個別的地方甚至設立識字崗，攔路識字站，強迫農民識字。這些積極分子的熱情是好的，但是他們用錯了方法。他們這樣做的結果，除了造成農村緊張，妨礙農民生產，招致農民埋怨之外，並收不到好的效果。……

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方面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有些工業生產計劃在制定的時候，沒有充分考慮材料的來源和供銷的平衡問題，計劃訂得不切實際，使計劃的執行發生很大困難。雙輪雙鏵犁的生產計劃定得過高，沒有考慮到南方水田的條件，以致在南方許多地方大量積壓，就是一個例子。許多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也沒有切實研究建築材料和機器設備的供應，沒有對設計力量安裝力量作充分的準備，以致發生某些停工窩工的現象。有些工礦和基本建設工地在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中，不恰當地強調一切「打破常規」，結果使事故增加，影響到工人的安全，也影響到工人的情緒。有些地方在基本建設的節約問題上做得過火，結果廠房和宿舍建築起來，質量太壞，並且不合用。

社論不僅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了反保守主義，而且指向了「上面」。社論指出，「四十條」一出來，各個系統都不願說自己右傾保守，爭先恐後用過高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要求很急。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層層加重，下面必然受不了。在反保守主義以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針和頒布「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後，許多人「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談到問題的根源，社論說：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問題，是因為它不但在下面，而且首先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社論強調指出，對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針要有一個正確的了解，不要「片面化、絕對化」，「不能只注意多和快，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為貪多圖快而造成浪費，也不能因為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視工作的質量和安全」。社論還特意指出：「執行四十條的問題也是這樣」。[55]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篇社論的矛頭所向，都是針對反右傾保守和「農業四十條」的，而這恰恰是毛澤東的得意之作，是他親自提倡和發動的。特別是胡喬木在社論中加寫的雙輪雙鏵犁的例子和陸定一修改時所突出的掃盲例子，都直接涉及到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並投以極大熱情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在毛澤東看來，這篇社論簡直就是批判他本人的。[56]然而，毛澤東當時卻難以發作。[57]因為，急躁冒進的傾向和經濟建設一片混亂的局面是客觀事實，且被中央多數領導人所認同，而在農村進行掃盲和推廣雙輪雙鏵犁這兩件事又是急躁冒進最為典型的表現。

在全國完成掃盲工作，綱要規定的時間是「五年到七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做出專門的決定，要求從1956年開始，「二年到三年掃除機關幹部中的文盲；三年和五年掃除工廠、礦山、企業職工中的文盲95%左右；五年或者七年基本上掃除農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58]在貫徹綱要的過程中，從省、市到基層又層層加碼，一再縮短消滅文盲的時間，「到某些省裏變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縣裏又變成了三年和二年，到某些農村就變得更短」。薄一波後來回憶說：「現在看來，不僅將五年到七年任意縮短是冒進，綱要關於五年到七年的規定本身也是冒進的。在我們這樣貧窮落後的大國，要指日消滅文盲，談何容易！」[59]

不顧客觀需要，硬性在全國大力推廣雙輪雙鏵犁，一方面打亂了計劃平衡，造成物資供應困難，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極大的浪費。綱要規定：「在三年到五年內，推廣雙輪雙鏵犁六百萬部」。在急於求成的氣氛下，最初設想1956年一年就要生產500萬部。後因鋼材供應緊張，改為生產350萬部，推銷270萬部。後來再減為生產250萬部，銷售230萬部。4月1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省市迅速召集會議，再「切切實實地」核實一下各地的需求量。[60]此外，推廣這種新式農具，不只是數量要求過急的問題，更麻煩的是根本不適應南方水田使用。陳雲首先發現並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對周恩來說，在南方的水田，尤其是淤泥田中很難使用。在一些地方，硬性銷售給農民的雙輪雙鏵犁，只好「掛起來」。[61]5月15日和18日，周恩來兩次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再討論生產雙輪雙鏵犁問題。確定1956年生產控制在200萬部到250萬部之間。推銷的方針是：適應和保證農民的生產需要，決不勉強攤派。對已經銷售給農民的，不能使用而掛起來的雙輪雙鏵犁，應該允許農民退回。[62]這大概就是為甚麼胡喬木在修改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時，特別加寫雙輪雙鏵犁例子的緣故。

實際情況表明，硬性推廣雙輪雙鏵犁不只是冒進，簡直就是幼稚和荒唐。由於不少地方「不顧當地條件，逐級分配下去」，「強迫攤派，

引起農民不滿」。結果農民紛紛要求退貨，預計收回15萬部。據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反映，該省九成以上的雙輪雙鏵犁沒有用。周恩來估計，收回來的可能不只15萬部。在7月3日討論二五計劃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周恩來說：「雙輪雙鏵犁的生產可以停一下，撥一部分鋼材給商業部用。我摸了五個月了，現在敢下命令了。」[63]7月18日，周恩來再次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雙輪雙鏵犁的產銷問題。根據計算，全年至多能銷售140至150萬部，因此，國務院決定把生產計劃，從200至250萬部減到175萬部以下。針對強迫攤派引起農民不滿的情況，國務院7月26日批轉農業部等四部門的有關報告時，要求各地「採取自由買賣，現款交易的辦法」，「嚴禁強迫攤派，一律不准賒銷，寧可積壓」。凡要求退貨的都可退貨。[64]到10月底，生產出170多萬部，只銷出80萬部，還退回15萬部，「沒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掛在牆上不能使用的『掛犁』」。[65]

這個例子還說明，到7月以後，反冒進已經進入實施階段。

[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2。

[2]毛澤東1956年1月20日講話。

[1]《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頁80。

[2]《李富春傳》，頁479—480。

[3]參見《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8—9。

[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42。

[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44—545。

[6]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90—191。

[7]此時，劉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來的態度。在2月17日聽取交通部匯報時，劉少奇指出：「現在有些人腦子熱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沒有條件做到，急躁冒進也要防止。」轉引自聞言實：〈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的調查研究與《論十大關係》的發表〉，《黨的文獻》，2006年第1期，頁26。

[8]《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三卷，頁282。

[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47。

[10]《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283。

[11]《周恩來年譜》，上卷，頁550。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因1953—1955年糧食總產量每年只增長了3.9%，所以要達到9500億斤的指標，1956—1967年每年遞增必須提高到8.2%。

[12]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编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四卷，1991（未刊），頁103。

[13]《人民日報》，1956年2月1日。

[1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83。

[15]《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三卷，頁28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52—553。

[16]薄一波在此處加註：蘇聯前三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產值年均增長速度分別是19.2%、17.1%和13.2%，我國工業產值在一五計劃期間的年均增長速度是18%，已經夠快了。

[1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8。

[18]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19。

[19]《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頁339。

[2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3。

[2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3—56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3；《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三卷，頁313。

[22]《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頁3—4。

[23]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頁269。

[24]黃瑤、張明哲编：《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356—357；邸延生：《歷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頁635—640。

[25]1956年12月4日，毛澤東將詞抄錄給黃炎培，12月5日又抄錄給周世釗，將「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改為「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12月16日再給黃炎培信，將「逝者如斯乎」改為「逝者如斯夫」。1957年《詩刊》1月號發表時，題目改為〈水調歌頭·游泳〉。參見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515，51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256—259、268。

[2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5、574；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357。

[27]《黨的文獻》，1988年第2期，頁6。

[2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4；《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68；《劉少奇傳》，頁790；張秋雲、鄭淑蘭：〈一篇反冒進社論的由來〉，《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頁11。熊華源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5月召開的幾次中央會議都是研究政治問題的，不可能提出經濟建設方針的問題。參見熊華源：〈關於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提出的時間〉，《黨的文獻》，1992年第4期，頁88—89。關於5月政治局會議，目前還沒有任何具體材料和詳細記載，究竟此次會議的內容和主題是甚麼，還有待中共檔案的開放。

[29]熊華源：〈關於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提出的時間〉，頁88—8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4。

[3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85；《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07—308；《周恩來傳（1949—1976）》，頁270。

[31]《黨的文獻》，1988年第2期，頁7—8；《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24。

[32]《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頁4—6。

[33]《黨的文獻》，1988年第2期，頁5—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5。

[3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24。

[35]《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08。

[3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87。

[37]《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09。

[38]匯報由中南幾省開始，計劃5月25日至6月10日由華東幾省，6月10日至7月底由西南、西北、華北，東北各省市向中央匯報。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16—119。

[39]據鄧力群回憶，毛澤東1957年7月5日在杭州對周恩來等人說：我過去一年心情受到壓抑，就是由於反冒進。毛又解釋說，計劃的執行過程中間，比如說1956年，發現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壓縮一點；向農民徵購多了，下一年少徵購一點；這種改動，這種調整是可以的。問題在甚麼地方呢？就是你們在進行這種指標調整的同時提出了個反冒進，這點上心情不舒暢。鄧力群談有關中共八大到廬山會議期間的一些重大事件，1998年4月16日。

[40]《人民日報》，1956年6月16日。

[41]《人民日報》，1956年6月16日。

[4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6—537。

[4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86。

[44]《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

[45]《人民日報》，1956年6月19日。

[46]《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

[47]《人民日報》，1956年6月19日。

[4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7。

[49]《人民日報》，1956年6月16日。

[5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25。

[5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7。

[52]毛澤東對此十分在意，他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曾談到這篇社論說：「文章把我撇開，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煩我，二可利用我打別人。」參見李銳：〈1958年那條「總路線」形成前後的黨內鬥爭〉，《炎黃春秋》，19966年第8期，頁17。

[53]在1958年南寧會議期間，1月17日李先念匯報時，毛澤東拿着《人民日報》關於反冒進的這篇社論，唸一段，批駁一段。他說：「這篇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評。社論提出的方針對社會主義建設不利，沒有想到造成這樣反冒進的空氣，挫傷了積極性。這是沒有料到的。」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772—773。

[54]以上所述社論稿的修改過程，參見張秋雲、鄭淑蘭：〈一篇反冒進社論的由來〉，頁11—12；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頁443—444。

[55]《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

[56]1958年1月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大批反冒進。在談到這篇社論時毛澤東說：「這是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又特別指出：「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甚麼要看？」參見李銳：〈1958年那條「總路線」形成前後的黨內鬥爭〉，頁17。

[57]毛澤東對這篇社論發作是在1958年1月，他把社論作為反冒進的材料，不但又仔細閱讀了一遍（有大量的下劃線），且做了許多批語，如「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既然使幹部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特別是在社論中的「又由於缺少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對實際情況了解不夠，心中無數，有盲目性，在這種情況下，處理事情當然就容易偏於一面，發生片面性」一句話旁，毛澤東劃了三道豎線，打了一個問號，又寫道：「尖銳地針對我」。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32—36。

[58]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编研部编：《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编（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頁1100。

[5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9。

[60]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综合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頁558。

[6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77。

[6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13。

[6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01、595。

[6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60、63。

[65]毛澤東後來也承認：「雙輪雙鏵犁在北方還可以，在南方是名聲很臭。這個東西對不對？現在看起來不對。」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38—539。

三 繼續反冒進與削減計劃指標

6月人大會議以後，周恩來立即把精力轉入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編制工作。這是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大一項重要的籌備工作。上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確定，在中共八大召開時，提出一個二五計劃的建議，並由周恩來就這個「建議」向八大作出報告。然而，由於指導思想的反覆，二五計劃的控制數字一直定不下來。6月以後，周恩來、李富春等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控制數字降下來，爭取向八大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二五計劃建議。

1 不斷反覆的二五計劃草案

關於二五計劃的研究，早在1955年就開始了。在這年8月國務院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各部委提出了二五計劃的各項指標。國家計委彙總後，於10月5日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2月初，李富春又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匯報。國家計委的初步設想是：到1962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2700億元，糧食產量達到4600億斤，棉花產量達到4300萬擔。也就是說，按照1957年的計劃數字，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農業總產值、糧食、棉花每年分別以9.9%、3.6%、5.6%的速度增長。李富春認為，這些預計數與後來實現的結果大體相符，其增長速度也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1]

然而，在年底開展反對右傾保守主義鬥爭以後，原定設想已經大大地「落後」於形勢。各部委不約而同地否定了北戴河會議提出的二五計劃指標，開始重新設計二五計劃方案，有的甚至就直接把三五計劃改成了二五計劃。如有關部委把1962年糧食指標從4600億斤增加到6400億斤；棉花指標從4300萬擔增加到7000萬擔；鋼產量則增加到1200萬噸。1956年1月14日，國家計委將各部修改後的二五計劃方案彙總報告中央。毛澤東召集三十四個部委匯報時，各部和計委都是按照修改後的指標匯報的。毛澤東對各部委修改後的方案比較滿意，但認為鋼產量指標還低，他主張到1962年把鋼搞到1500萬噸，「三五」期間再翻一番，搞到3000萬噸。[2]由於當時全國開展反保守主義鬥爭，計委1月方案仍然滿足不了上下各方面的要求，控制數字繼續提高。國家計委4月向中央的報告中提出，1962年鋼產量達到1400萬噸，煤達到2.45億噸，發電量達到550億度，化肥達到600萬噸。[3]4月18至24日，李富春用了六天時間向毛澤東匯報第二個五年計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

等人參加。[4]毛澤東沒有再提出不同意見。到了6月，儘管周恩來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但由於各地區和各部門熱情高漲,仍然要求增加投資和基建項目，致使二五計劃的主要指標居高難下，甚至還一再攀升。這使正在編制二五計劃的國家計委十分為難，感到財政收支、物資供應等方面「根本沒有法子平衡」。[5]6月4日，李富春給各部部長寫信，信中指出：

> 從最近再一次摸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情況看來，原來計委向中央綜合匯報中所列的各種基建，生產和事業指標，都已經很大、很高，而現在各部仍然在要求增加投資和基建事業項目，這是和國家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所能發掘的人力、物力、財力有矛盾的。我們認為，不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來向中央匯報的規模和速度，還需減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慮如何增加的問題，今日以後則要請各部注意研究如何減少的問題。如果各部不從這一方面做準備，則第二個五年計劃就難於制定，也難於進行平衡。[6]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李富春按照「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再次修訂二五計劃草案。國家計委準備調整和補充原計劃方案，即將財政撥款改為2900億元，建設項目要保證重點、削減次要、個別調整，以此作為二五計劃的第一方案。6月16日，李富春邀集國務院第二、四、六、七辦公室和國家建委、煤炭部、石油部、電力部、地質部負責人討論二五計劃草案的編制。他指出，計委在綜合平衡中，深深感到第一方案仍有偏高偏大之處，準備擬制一個第二方案。這個方案的財政撥款準備定在2500至2600億元左右，對基本建設規模和進度都準備作必要的壓縮和推遲。[7]但不久，國家計委函報周恩來稱，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財政收入和各種指標雖經削減，仍然偏高。[8]

儘管政治局和人大會議已經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但在全國上下頭腦發熱的狀態下，有關部門卻遲遲拿不出一個符合新方針的計劃草案，整個計劃編制工作陷入困境。八大召開在即，向八大提交的兩個文件（關於二五計劃建議和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的起草工作也無法確定基調。時間只剩一個多月，國家計委心急如焚，周恩來也很着急。[9]

周恩來、陳雲等人看到，要搞出一個切實可行的二五計劃方案，不能在已有的冒進方案上修修補補，必須推倒重來，但這首先要打通各部委負責人的思想。從7月3日起，周恩來連續三天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國家計委的第二方案。對於二五計劃最後方案的確定，這次是一個關鍵性、決策性的會議。

會議開始後，國家計委首先對二五計劃制定的背景和困難作了說

明：

> 自1955年8月開始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中間經過反對右傾保守的運動，因而雖然自今年年初起中央已經提出防止冒進、反對冒進，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盤子已經很大，很不易削減。雖然計委今年6月提出的第一方案，比各部方案減低很多，但是仍然偏高偏大，如財政收支2900億元，為第一個五年預計的2.1倍，其中基建投資為第一個五年預計的2.9倍。中央多次指示，長期計劃必須建立在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最近中央又具體指示國家計委，要按照2600億元左右的數字來編制第二個方案。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用了十天時間，提出了一個第二方案輪廓初步試算草案。但由於各部思想上有距離，國家計委內部思想上也跟不上，因而在編制過程中削減建設規模頗感不易。一具體到削減哪個部門的撥款或投資，削滅具體建設項目的時候，就削不下去了。我們請求中央對生產水平、財政框子、比例關係等幾個主要問題，給予原則指示，以便使得各部門的领導同志們思想認識一致起來，編制出一個各方面平衡銜接的方案。[10]

國家計委在說明中特別提到削減建設規模遇到了各部委的阻力，顯然是希望國務院領導人出面幫助解決問題。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赴蘇）等人在會上的發言，確實起到了說服作用。

周恩來首先嚴肅地提出：制定新方案的目的，「是為了貫徹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方針」。他接着指出：「第一方案冒進了」，第二方案確定糧食產量在1962年達到5500億斤，也是「很不可靠的，有虛假的」，「是危險的」，就是定為5300億斤「也值得考慮」。他說：這是因為，農業合作化後，雖然農業生產的「積極因素增加了，但消極因素並未減少」。我們還「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蟲災總要起作用」，農業生產在二五計劃期間也會有豐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糧食生產很難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增長，「搞這個假設不好」。周恩來提出了他首先強調修改農業指標的理由：「農業生產一算高了，農業稅、輕工業利潤、基本建設投資和財政預算等一系列數字都受到影響。這是一個根，而這個根是我們最不容易掌握的。」那樣假設的農業指標一旦不能實現，必然危及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完成。

在財政收支指標問題上，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認為：「二五」期間要求財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長，以實現五年累計2600億元的指標，「實際上達不到」，結果會使重點建設項目的資金「也保證不了」，因此這個指標「應該壓下來」。周恩來主張壓到2350億元，每年遞增12%。為了實現財政平衡，周恩來要求大家注意三個問題，即生產收入和基建開支要平衡；基建投資要有個限度；預算收支不平衡就只有減少國防和基建指標。

在工業生產指標問題上，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指出：設想到1967年鋼鐵產量達到2700—3000萬噸，「這是高的想法」。不能把鋼產量作為衡量工業化水平的唯一尺度，「我國工業化的關鍵不在於鋼能否達到這個數字，而在於我國的水平。（現在）英國、德國都沒有達到二千萬噸鋼，但國內甚麼機器都能生產，就是工業國」。對於中國來說，「更重要的，也是要各種機器都能製造，技術高，有發展的餘地」。因此，應該設想鋼鐵生產少一些，煤炭生產指標、基本建設投資等相應地「都可以少些」。

經過認真討論後，與會者一致同意繼續精打細算，按五年財政總收支2350—2400億元來安排，相應地減少主要工農業產量指標和基本建設投資，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搞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提出的二五計劃建議。[11]

7月4日、5日兩個晚上，毛澤東連續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關於二五計劃的基本數字和方針問題。會後，毛澤東把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留下談話，直到凌晨一點。[12]所談內容不詳，但看起來，毛澤東沒有再堅持己見。

這次會議是一個轉折點。經過充分的思想交流，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取得了一致認識。會後，周恩來親自主持編制二五計劃。他指示國家計委，應根據「一五」計劃已有的經驗，做好各項平衡工作，留有餘地，即要正確估計工農業生產增長速度和國民收入總額；在此基礎上安排積累和消費比例，妥善處理農、輕、重的比例關係，提出穩妥的投資總額，以此編制出可行的方案來。[13]整個7月間，周恩來同計委負責人薛暮橋、王光偉、陳先等反覆計算各項指標的可行性。王光偉回憶說，在編制工作中，周恩來「總是辯證地考慮問題」，各項數字「都要經過反覆平衡的」，對於重大項目從不自作主張，而是「全面考慮，集中各方意見」，特別是專家的意見，反覆平衡後才確定。周不僅過問每一個數字，而且經常在他的西花廳宿舍計算到深夜，「風雨無阻，夜夜如此，緊張工作約個把月」。[14]7月17日，周恩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並委託國家經委代國務院起草一個文件，其中強調：「搞生產必須要根據可能，建立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計算生產潛力，除人力條件外，還必須考慮到物資等其他條件。」[15]7月下旬，國家計委編制出一個新方案。8月3至16日，周恩來、陳雲在北戴河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查計委新方案，又對部分指標作了調整。同時，討論修改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稿。8月16日，周恩來前往北戴河毛澤東處商談二五計劃的建議的報告。8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二五計劃的建議。[16]對於周恩來而言，說服國務院各部門和各省市負責人接受新方案相對來講比較容易，但要扭轉毛澤東的思想，就不是那

麼簡單的事情了。就在周恩來絞盡腦汁考慮如何讓二五計劃的新方案和新方針得到毛澤東首肯的時候，李富春從莫斯科傳來了蘇聯國家計委和專家的意見。

2 莫斯科的決定性意見

二五計劃的建設規模，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取決於蘇聯對華援助的規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設計方案，供應物資和設備。中國的一五計劃就是依靠蘇聯專家的幫助制定的，一五計劃的工業化建設也是以蘇聯援建的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展開的。[17]二五計劃草案雖然是中國自主編制的，但依然離不開蘇聯的技術幫助和指導。特別是因為在二五計劃的工業項目中，許多骨幹工程還是蘇聯設計和指導實施的，這裏不僅有相當一部分是一五計劃期間開工而順延至二五計劃期間的，還有大量中國新增加的援助項目。因此，二五計劃的最終形成，必須考慮蘇聯的態度和意見。

1956年年初，蘇共中央邀請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蘇聯和東歐八黨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派李富春、張聞天、黃克誠三人前往。周恩來為此專門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信說，派遣「富春同志去，對商定我們遠景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規模和速度有好處」。1月4日，李富春一行出訪蘇聯，徵詢對中國遠景計劃和二五計劃的意見。同時還帶去兩項具體任務：一是提出了一個請求蘇聯和東歐國家援助的188項建設項目；二是請蘇聯幫助中國規劃原子能工業遠景計劃以及建立原子能工業的問題。行前，周恩來兩次致信李富春，指出這些都是作為「初步方案」向蘇聯和其他有關兄弟國家提出或者「試行提出」，「看他們如何反應」。他要求李富春「要從如何進行規劃上談出一個眉目」。[18]2月6日，李富春回國後向周恩來報告了莫斯科之行的情況，沒有提到蘇聯方面對二五計劃的意見。[19]

實際上，早在1956年1月，正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已經對二五計劃中存在的某些具體問題提出了傾向性意見。如在核編綜合財政計劃時，專家伊里因（Il'in）指出，按照蘇聯的經驗，基本建設的投資總額應由計委基本建設計劃局審核，各項費用由財政金融局審核。他特別提出，財政金融局應該主動些，「要估計到如果基本建設規模及其他支出計劃過大，以至於不勝任時，那不僅不能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認為，二五綜合財政計劃總的看來「存在着很大的財政差額」，應「嚴格地審核」。在莫斯科的蘇聯財政局局長杜齊諾夫（Dudinov）講得更為直接，他指出：財政計劃規定利潤收入1417億元，是一五計劃的三倍，「這個指標是偏高了的」。「重工業部

新企業投入生產的第一年利潤率為老企業的40%，第二年為70%，這種計算是有很大的假設性，因而不能將其運用到五年計劃中。」按照中國的計算方法，石油部二五計劃「利潤增加到八倍，而生產增加到五倍，這是不正確的」。此外，在財政計劃中沒有考慮作為國家後備部分的預留費用，在信貸計劃中只靠居民存款增加國民經濟的信貸基金而沒有考慮預算資金等。[20]

在莫斯科，蘇聯沒有對二五計劃草案提出總體性意見，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這個計劃的制定與蘇聯援助的新項目有直接關係，在項目談判沒有完成之前，很多具體指標無法確定，蘇聯國家計委第一副主席帕烏金（Pauzin）在發言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二是中國的二五計劃草案尚未完備。李富春回國後，3月29日國家計委辦公廳下發了一個文件說，在華蘇聯專家組的書面意見認為，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初步方案，其中缺少很多指標，還有不少指標將有重大變化」，因此只能就「任務、方針的提法和文件的結構提出我們的意見」。[21]

4月6至8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率領政府代表團來華。這次訪問主要是通報蘇共二十大的情況，同時也商談一些對華經濟援助問題。訪問期間，雙方簽訂了兩項協議：一是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55項新的工業企業協定，作為正在建設的156個項目的補充；二是關於修建從蘭州—土爾克斯坦—西伯利亞鐵路上的阿克斗站的鐵路和從1960年起組織這條鐵路聯運的協定。[22]這次接觸仍然沒有談到中國二五計劃的編制問題。5月，國家計委派人赴蘇，說明對年初提出的188項委託蘇方設計的建設項目的詳細情況，以為雙方正式會談做準備。[23]

6月18日李富春出國前與蘇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I.V.Arkhipov）談話，繼續徵求蘇聯方面的意見。這時，蘇聯專家提出了對二五計劃指示草案的初步意見。阿爾希波夫很委婉地指出：「五年計劃的生產和建設規模很大，在這個條件下，工業、農業和基本建設所採取的增長速度也是很高的。因此，希望對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的某些問題進一步加以研究，這兩個方面就是：尋求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各部分發展中的較正確的比例關係；使計劃在設備、原料資源和物力、財力方面有更可靠的保證。」總的講，「五年計劃各年的投資額分配得不夠平衡」，經過初步計算，蘇聯專家認為1958年和1959年的投資要達到規定的增長速度，「在水泥和鋼材方面恐怕沒有保證，所以更有必要削減」。「其他幾項指標的增長也不平衡」。阿爾希波夫還詳細列舉對各項指標的意見，其中特別指出，希望各種經濟作物的增長指標要從「現實性」出發；編制財政計劃時「希望將收入規定得高於支出」；「希望再檢查一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擬進行建設的鋼鐵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化學工業和其他部門的重大項目在原料資源、首先是地質儲量方面是否有保證」等

等。[24]

人大會議確定了經濟發展的新方針後，6月19日，李富春率中國政府經濟代表團再次訪蘇，繼續就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輪廓草案徵求蘇聯政府的意見，同時與蘇聯就中國二五計劃期間的援建項目進行談判。會談分兩個階段進行，首先由分組會談，交換意見，然後由蘇聯方面綜合對二五計劃輪廓草案提出初步意見，並對請求的援助項目作出初步答覆。

李富春帶去的是二五計劃輪廓草案的第一方案，在交換意見時，李富春解釋說，這個方案只是輪廓草案，還要再作修改，並提交中共八大會議審查，作為黨的建議通過。李富春誠懇地說明這次來是徵求「我們的老師」意見的，希望蘇方幫助把二五計劃編制好。蘇方在第一階段綜合小組會談中認為，這個輪廓草案是積極的，但是過於緊張，計劃的根據還不夠充分，在國民收入中積累的比例太高（佔26%），成本降低也太多，財政收入不可靠，物資平衡上缺口多，某些技術經濟指標定得太緊，實現計劃的物資保證也不夠充分。李富春帶去的中國請求蘇聯援助項目的方案中，原定在二五計劃期間委託蘇聯設計項目是236項。經過各專業小組的談判和協商，確定為217項。會談時，蘇聯方面各部的態度一般都是積極的，他們表示，可以承擔設計並供應設備的項目約佔項目總數的八成，其餘二成的項目，有些蘇方可能要轉請東歐各國給以援助，有些要由中方承擔總交貨人，而由蘇方給以技術援助，有些則建議由中方重複利用自己的設計。

8月17日，李富春同蘇聯國家計委主席巴伊巴科夫（N.K.Baibakov）和第一副主席帕烏金會談。帕烏金轉達了蘇聯方面對中國二五計劃草案的意見。帕烏金表示，對這個草案所規定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任務和基本道路沒有意見，但是感到這個計劃相當緊張，對草案規定「二五」時期積累率由「一五」時期的22%提高到26%，同時還要使居民收入增加三分之一表示懷疑；認為農業計劃要超額完成是困難的，特別在農業的收穫量方面；物資平衡方面有也很大差額，有些重要物資的平衡有赤字；基本建設投資比「一五」時期增加近兩倍，這樣的增長比例太大了。帕烏金建議減少基本建設的投資，並且首先從降低機器製造業的發展速度和投資着手，以緩和整個計劃的緊張情況。巴伊巴科夫主要談了對中國請求蘇聯援助的答覆，既表示要誠心誠意地援助中國，也解釋了蘇聯在這方面存在的一定困難。李富春表示，蘇方的意見有不少是有道理的，所提出的問題與中國黨前一階段已經發現的問題是一致或相近的。計劃指標過高，增長速度太快，基建投資過多，物資仍有缺口，這些問題此前中國黨已經在着手解決。現在由蘇聯方面提出來，對中國黨也有所裨益。尤其是蘇聯方面以自身的教訓提醒要注意農業問題，更有啟示作用。李富春表態說，除個別問題外，99%都同意

巴伊巴科夫和帕烏金的意見。[25]

對於中國二五計劃的宏大目標，蘇聯最高領導層也進行過討論。俄國解密檔案顯示，8月27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中國的二五計劃草案和蘇聯對中國的援建項目問題。根據會議記錄，多數人都認為中國的計劃是不現實的，蘇斯洛夫、卡岡諾維奇、別爾烏辛等人指出，中國提出的增長「速度過快了」，「中國人的出發點是過快的、不現實的工業化速度」，「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做的結論也過高了」。至於說到對中國的援助，許多人感到蘇聯的負擔過重。馬林科夫認為，蘇聯對於中國二五計劃所承擔的義務過多，應該進行修改，並向中國人解釋清楚。赫魯曉夫也說：「我們答應這些要求之後會出現甚麼樣情形，應該仔細計算清楚。過重的負擔會給我們自己的經濟造成損失。」會議批准了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委託巴伊巴科夫將這封信連同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對中國二五計劃指示草案的意見，一併交給李富春。信中指出，在這份文件中闡述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過快，而蘇聯方面的技術援助，尤其是在提供設備方面，多數項目要從1961年開始供應，有的可以從1960年開始供應。[26]看來，毛澤東設想的高速度發展計劃，不僅國務院主管人員和部門無法接受，而且已經超出了蘇聯提供援助的能力。

中共中央已定於8月下旬召開七屆七中全會，二五計劃和報告急待定稿，迫切需要了解蘇聯的意見和莫斯科商談的結果。8月10日，周恩來致電李富春，要求張璽提前回國。18日再電，要求李富春一行月底趕回，參加八大預備會議。22日，從莫斯科返回的張璽向周恩來匯報了中國政府經濟代表團同蘇聯政府談判的情況。[27]9月3日李富春回國，並帶回了9月1日蘇共中央正式給中共中央的覆信。[28]李富春後來報告說：這次談判，我們提出的項目，蘇共中央作了認真審查，盡最大努力也只能滿足我們半數的要求。因為我們要他們援助的項目很多，佔其國內生產的比例很大，原材料的供應能力不夠，有些設備，蘇聯自己也滿足不了國內需要。李富春頗為感慨地承認：通過這次談判感到，我們原來提的計劃和方案冒了。[29]

莫斯科的意見是有份量的，蘇聯畢竟是老師，有長期的計劃工作經驗，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學蘇聯的，前一個五年計劃也是在蘇聯協助下編制而成的。更為重要的是，既然確知不可能從蘇聯那裏得到期望得到的援助規模，二五計劃就只能作相應的壓縮。薄一波回憶說：「蘇聯的答覆，對周總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計劃草案被中央採納起了有利的作用。」[30]另一方面，蘇聯的答覆，還使中國不能不減少對蘇聯援助的依賴。李富春在後來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們要特別注意貫徹自力更生的方針，不能完全依賴外國。要加強我國

的新產品設計工作，充分利用原有的落後設備，先搞起來，逐步提高。在技術方面，要重點突破。」[31]

9月9日，周恩來經同張璽、薛暮橋等多次修改，形成〈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修正稿）〉。國務院最後敲定並提交中共中央的二五計劃方案規定，1962年糧食產量指標為5000億斤，棉花產量指標4800萬擔。這比1955年8月的最初設想略高，而比1956年初國家計委彙總上報的方案大為縮減。其中糧食指標減少1400億斤，棉花指標減少2200萬擔。薄一波認為，這個方案比較紮實。按照1957年糧食實際產量3820億斤，棉花3000萬擔計算，二五計劃期內年均增產糧食200多億斤，年均增產棉花360萬擔，在正常年景下是有可能實現的。如果按年初提出的指標，二五計劃期內糧食年均增長要達到500多億斤，棉花年均增長要達到800萬擔，「這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32]

經過如此的反覆和周折，國務院提交的二五計劃方案，終於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9月13日9時半，毛澤東對周恩來送交的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報告批示：「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11時又批示：「你的報告全文很好。」還特意在報告上加了一句：「對蘇聯和各國專家對我國幫助的功績提一二句為好。」[33]至此，〈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最後形成。[34]

不過，周恩來對「多、快、好、省」口號的刪除卻引起了毛澤東的內心不滿。在最初的報告修改稿中，周恩來保留了「多、快、好、省」的口號，只是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後面加了「又安全」三個字。如前所述，「多、快、好、省」口號的提出，本來意在強調「好」和「省」，以制約「多」和「快」。但實際執行的結果表明，這並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助長了急躁冒進的情緒。在起草和修改二五計劃建議和關於建議的報告時，如何對待這個口號是周恩來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經過再三斟酌，周恩來等人還是在建議報告稿的重要位置，刪掉了「以多、快、好、省、又安全的精神……」一語。毛澤東當時並沒有提出異議，但事實上「此事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後來，批判反冒進時，此事曾一再被提起」。[35]無論如何，此後一年多時間裏，「多、快、好、省」的方針雖偶爾被提到，[36]但已經不再響亮了。

3 壓縮1957年的計劃指標

周恩來等人關於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得到確認，並寫進了八大決議。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急躁冒進的情緒在黨內已經完全得到解決，問題主要反映在編制1957年年度計劃中，指標仍然

居高不下。八大會議結束後，周恩來、陳雲等不得不繼續反冒進，重點是壓縮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

1957年計劃的控制數字是國家經委從1956年7月開始編制的。當時各部門各地區向經委提出的基本建設投資指標彙總起來，高達243億元，比1956年的140億元還多103億元。經委主任薄一波認為，1956年的計劃已經冒了，1957年再冒這麼多，當然不行。但怎麼壓縮，經委一開始就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主張壓到150億元就可以了；一種意見認為150億元太高了，主張壓到100億元。薄一波提出了折中方案，拍板定為125億元。由於意見分歧較大，又相持不下，只好報周恩來和陳雲。[37]

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認為，急躁冒進情緒還未平息，還得繼續反冒進。周恩來對秘書范若愚說：這樣搞計劃不行，仍然是冒進。我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一講有關問題。為了尋找根據，周要范代他查找一下馬克思關於「人類始終只能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一段話的出處。周恩來認為發展速度應該再放慢一點，下決心要把基建投資壓到大大低於1956年投資額的程度。[38]

10月20日至11月9日，周恩來連續召開十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磋商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制數字。國家經委在〈關於1957年度計劃控制數字意見的報告〉中說，1956年是我國國民經濟趨於全面高漲的一年。1956年計劃的編制和執行，是在中央提出反對右傾保守主義，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下進行的。1956年的生產、基本建設和文化事業都取得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執行國民經濟計劃綜合平衡不夠，對預算控制不嚴，攤子鋪得太多，物力、財力分散過多，人員增加過多，人民生活福利方面的開支也多了些，以致在國民經濟中發生了若干嚴重不平衡現象，經濟生活出現了十分緊張的局面。為了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並為第二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發展打下較好的基礎，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必須把目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適當地加以解決，適當集中力量，保證重點建設。[39]

10月24日，針對還有人對急躁冒進的危害性估計不足的情況，周恩來在講話中強調：三大高潮一來，頭腦熱了，前進得快了。經濟建設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計劃帶了起來。因此，現在我們主要應該批「左」。在11月9日的總結中，周恩來更是援引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教訓來強調反冒進的重要性。他說：從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批判斯大林以來，暴露了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少問題。蘇聯發展重工業多，束緊腰帶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忽視人

民生活，農業發展緩慢，經過三十九年，產量僅高於沙皇時代的最高年產量。這種狀況蘇聯現在還沒有糾正過來，這是需要時間的。而且，這個建設方針影響了東歐國家。民主德國、波蘭、匈牙利發生的群眾鬧事事件，反映了執行這個方針的嚴重後果。因此，斯大林的經濟理論有值得懷疑之處。中心就是一條，搞重工業不要失掉人民，否則就沒有了基礎，就成了沙灘上的建築物。我們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礎上建立重工業，重工業要為人民服務，同時也注意輕工業和農業，使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結合起來，否則就要吃虧。周恩來尖銳地說：「對於高指標應該勇於抵抗，敢於修改，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指標一經確定就神聖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周還說，我們國家大，很落後，人口多，要建設又要注意人民生活。

現在的速度已經很了不起了。我們現在根據可能把原來設想的建設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錯誤。周恩來最後指出：從2月份到現在，國務院的會議每次都在下馬，總是下不好，生產速度、產品質量都受了影響。表面看來，收入和支出是平衡的，但實際上有20至30億元的赤字。總之，今年是冒了，明年的計劃必須採取退的方針。指標可能要退回到北戴河會議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40]

陳雲的想法與周恩來完全一致。10月23日，陳雲發言，他指出，我國的建設規模究竟應該多大，是個根本性的問題。前三年的建設基本上按計劃進行，今年規模大了。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決。11月9日的會議上，陳雲提出，寧願慢一點，慢個一年兩年，到三個五年計劃，每個五年計劃慢一年。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或許是擔心引起誤解，周恩來連忙解釋說：這裏不是「左」傾、右傾的問題。不像政治上，「左」了就盲動，右了就投降。[41]

會議期間，批准了國家經委〈關於1957年農業生產控制數字的報告〉。報告說，由於1956年農業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其他種種原因，全國糧食生產只能完成98%。根據1956年預計，對1957年農業生產初步安排是：糧食總產量計劃達到4000億斤左右，增加7.2%；大豆計劃總產量達到200億斤，增長17.6%。棉花總產量計劃達到3620萬擔，增加400多萬擔。[42]經過努力，國務院常務會議將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指標由各省市各部門彙總的243億元壓縮為111億元，比1956年的實際完成數還減少了20%。[43]

就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屆二中全會開幕。薄一波後來說，毛澤東把這次全會看成是反冒進的「集中表現」。[44]從現在已經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以周恩來為首主張穩妥可靠發展方針的中

共領導人所開展的反冒進，的確就集中表現在這次全會上。毛澤東對此頗有不滿，儘管他沒有立即發難。

開會的第一天，周恩來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重點提出了1957年應當實行「重點發展，適當收縮」的方針。結合波匈事件的教訓，周恩來說：「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個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談到經濟建設的方針，周恩來強調，要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們覺得八大的決議上寫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是恰當的。現在看，時間可能要長一點」。說到發展速度，「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以鋼鐵為例，「我們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定在2000萬到2500萬噸上，將來如果執行得好，有可能超過，但是現在不能定到3000萬噸」。周恩來特別指出：「要達到原來遠景規劃設想的生產指標，肯定時間要更長一些，有可能要四個五年計劃，或者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他還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只是一個建議，也是可以修改的。針對許多人存在的顧慮，周恩來鼓勵大家堅持從實際出發，把思想從原先已定下過的框框裏「解脫」出來。他說：「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後還得退下來。凡是不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45]在分組討論中，除對某些具體指標安排有意見外，大家都同意周恩來提出的「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46]

雖然表示同意「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也沒有反對把計劃指標減下來，但毛澤東內心是有不同意見的，這從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和插話就可以感覺出來。在11月15日的講話中，針對周恩來等人反覆講的保持計劃平衡，毛澤東繼續堅持他對計劃經濟的一貫看法，「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他警告說：「要保護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還特意提到「有些人曾經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搞了一個「促退委員會」。針對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提出的「我們工業建設的速度要放在一種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毛澤東說，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就說過「穩妥可靠」這個話，「我建議以後改為『充分可靠』」。[47]劉少奇在報告中還引用了前一天周恩來和陳雲關於左傾、右傾的談話，說到究竟是「左」傾一點好，還是右傾一點好？毛澤東立即敏感地插話說：看是甚麼右。劉少奇回答：是快慢的右。毛澤東說：這種右可以。[48]看來，毛澤東對於會議不再提反右傾保守是十分在意的。毛澤東還在11月13日的小組會議做過發言，共提出七條措施，除了在講到壓縮問題時提醒「必須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亂子」外，沒有對「保證重點，適當收

縮」的方針提出反對意見。後來毛澤東對此解釋說，他在八屆二中全會提出的七條只是個妥協方案，是築一條堤壩，用來擋水的，想擋一擋「反冒進」之水。[49]

1956年中共高層關於經濟建設方針的分歧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歷史現象，這一過程反映了幾個問題：第一，中共執掌政權初期，黨內的民主空氣還是比較濃厚的，不同的意見可以在各種層面反映出來，即使是與毛澤東本人的不同意見，而不像後來那樣，只是毛澤東的一言堂，大家有話不敢講。第二，無論是在社會主義改造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中共高層領導多數還保留着尊重客觀、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而不像後來那樣，一味地追求革命，浮誇、虛假之風盛行，唯我獨尊，目空一切。第三，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周恩來及其他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與毛澤東之間對於經濟建設方針的不同主張，就其所追求的目標而言，都是為了盡快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但就問題的實質來說，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僅僅是發展速度快慢的方法不同。周恩來等人的主張，實際上是在努力建立起計劃經濟的體制，維護和保障國民經濟在穩定、平衡的軌道上運行。毛澤東的主張則本質上是反計劃經濟體制的，是要打破平衡和四平八穩的狀態，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和威力，推動經濟發展。從歷史的角度看，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忽視或無視市場經濟的，而毛澤東這種後來又不斷重複的做法，一方面給經濟發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阻止了中國完整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

當然，毛澤東在1956年沒有公開反對周恩來等人提出的經濟建設方針，並不是認為他們的做法更適合計劃經濟的體制，而是因為在那個多事之秋，還有很多事情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比如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重建社會主義的民主。的確，毛澤東在推動起工業化的高潮之後，又開始考慮如何在中國擴大民主的問題了。

[1]《李富春傳》，頁474。

[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42—543；《李富春傳》，頁479—480。

[3]《李富春傳》，頁480。

[4]《毛澤東傳（1949—1976）》，頁481。

[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43。

[6]參見熊華源：〈關於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提出的時間〉，頁88—89。

[7]《李富春傳》，頁481—482。

[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94。

[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43。

[10]《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49。

[11]以上所述會議過程，參見國務院常務會議記錄，1956年7月3日、4日、5日。轉引自

《周恩來傳（1949—1976）》，頁276—277。另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94—59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43；《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14。6月27日，已到莫斯科的李富春也致信毛澤東和黨中央，建議降低第一方案的指標，放慢農業機械化的步驟，減少國防建設開支。參見《李富春傳》，頁487—488。

[12]《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14。

[13]薛暮橋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書面發言，1979年3月15日。

[14]王光偉：〈周總理與第一、二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載《懷念周恩來》編輯小組編：《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3、44。

[15]《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頁6。

[1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07、609、610。

[17]關於一五計劃中蘇聯援建項目的情況，可參見董志凱：〈156項的確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34。

[1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44—545。

[20]《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1期，頁18—22。

[21]《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1期，頁4、22。

[22]《人民日報》，1956年4月8日。

[2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76。

[24]《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1期，頁9—15。

[25]以上所述會談過程，參見《李富春傳》，頁484—487；閻明復：〈我隨李富春訪問蘇聯〉，《炎黃春秋》，2005年第4期，頁27。

[26]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5, л.24-27об.；Ф.3, оп.14, д.54, л.2-3, Фурсенко, Преэидиум ЦК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63-164, 959.

[2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08—609、613。

[2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44—545；《李富春傳》，頁488。

[29]1956年10月11日，李富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作「關於蘇聯援助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項目談判情況的報告」。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95。

[3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45。

[3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95。

[3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46。

[3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99。

[34]報告全文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167—221。

[3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47。

[36]如10月國家經委〈關於1957年度計劃控制數字意見的報告〉說：1956年計劃的編制和執行，是在中央提出反對右傾保守主義，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下進行的。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103。

[3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54—555。

[38]轉引自熊華源：〈論周恩來在反冒進中的探索〉，頁11。

[39]《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103。

[4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29—63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55—556；《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103。

[41]《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37—33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55—556。

[4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95。

[43]《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38。

[4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56。

[45]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29—237。

[4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58。

[47]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13—316。

[4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56。

[4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59—16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294。

第四章

擴大民主：「雙百」方針和兩個「萬歲」

同前幾年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相比，1956年的中國政治處於一種寬鬆的氣氛之中。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之後，毛澤東提出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又提出中共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又謂「兩個萬歲」）的方針。前者動員知識界解除顧慮，加入到學術爭鳴中來；後者鼓動民主黨派參與政治，並允許媒體報道批評言論和爭鳴文章。中國的政治生活一時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民主和自由氣氛。

在中國史學界，以「雙百」方針為課題的研究者為數不少，不但對事情的過程描述清楚，也有一些很深刻的見解。[1]關於中共同民主黨派的關係，特別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方針的專門研究，卻很少見到。[2]本章的關注點在於，繼1956年初調整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以後，中共擬進一步動員整個社會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中，尤其是受到蘇共二十大揭發和批判斯大林的錯誤的影響，毛澤東試圖在中國擴大民主和自由的基礎，創造一種新式的政治生活，一種顯得比蘇聯自由、開放的社會主義形象。為此，中共高層大力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兩個方針，並試圖將新方針貫徹到社會基層。但是，問題緊接着便出現了：第一，擴大民主的新方針在黨內遇到很大阻力，且很難在基層貫徹實施；第二，時隔不久，中共領導人就放棄了這些有助於推動政治改革的舉措，又回到了階級鬥爭的老路。這是為甚麼？或者，這些方針政策本身有甚麼先天不足？

[1]比較重要的論文有楊鳳城：〈對有關50年代中期「雙百方針」某些問題的歷史反思〉，《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夏杏珍：〈「雙百」方針的形成過程〉，《中共黨史資料》，總第58輯；王也揚的〈毛澤東關於「雙百」的思想及其變化〉，《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陳清泉：〈陸定一推行「雙百」方針始末〉，《炎黃春秋》，2000年第9期。最有份量的專著應屬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和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史著作中，大都會講到這個問題，但較少見詳細和深刻的分析。

一「雙百」方針的由來和知識界的反應

「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作為中國的成語，在民間流傳已久，而中共執政後借用來說明和概括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的方針，則是1956年的事情。至於這兩句口號的由來，已有研究者做過詳細考察：1951年4月，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3年8月中共中央責成宣傳部組織一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研究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因兩位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和范文瀾之間意見分歧，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陳伯達向委員會傳達了這個精神。同年10月，在中國科學院討論出版《歷史研究》雜誌時，陳伯達又說過：「辦刊物，必須百家爭鳴。……要百家爭鳴，這是一個方針問題。刊物要照這個方針去辦。」在此前後，中宣部曾約請史學家翦伯贊、邵循正、胡華合作撰寫一本《中國歷史概要》，請示毛澤東如何解決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等。毛澤東回答說：「把稿子印發給全國歷史學家討論，實行百家爭鳴。」1955年9月或10月，中宣部長陸定一向毛澤東請示關於中共黨史編寫問題的意見。毛澤東又回答說：「百家爭鳴」。[1]

1「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

由於有上述背景，不少人認為「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在50年代初就已經成為中共指導科學文化事業的方針了，至少也是在那個時候醞釀的。這種理解很難讓人接受：首先，這兩個口號是分別針對戲曲研究和歷史研究這樣兩個具體領域提出的，並非就整個科學文化工作而言；其次，這兩個口號當時並沒有作為全面的工作方針在黨內或社會上公開宣傳；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建國初期中共需要的是「輿論一律」，是用馬克思主義整合意識形態。無論如何，人們也很難把日緊一日的思想批判和思想改造運動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聯繫在一起。

然而到1956年初，情況確實發生了變化。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已經過去。一系列的階級鬥爭和思想改造運動在相當大程度上摧毀了知識分子獨立的價值體系。此刻，在中共看來，知識分子應該說已經大體改造好了，對此毛澤東充滿自信。同時，在即將來臨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中，必須讓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作用。在這種前提下，對知識界提出一個新的方針，給他們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寬鬆和自

由感，就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了。

在「雙百方針」提出的過程中，陸定一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初知識分子會議改善了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卻仍然難以使知識界完全放下精神負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會議基本沒有觸及學術自由的問題。只有陸定一在會上的發言談到，應當區別政治問題、思想問題與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不能放過」，學術問題則可以任其爭鳴，無礙大局。[2]然而，陸定一提出的問題沒有在會上討論。知識分子會議以後，在一次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陸定一又以醫學和生物學為例，談到了要給學術、藝術和技術研究以自由的想法。[3]陸定一明白，要想真正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必須營造一種學術上自由討論的環境。陸定一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有一個背景，就是他對蘇聯科學文化界盛行貼「政治標籤」的做法早有反感，並認為現在這種風氣已經傳到了中國，對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形成了直接的障礙。[4]

2月，在中南海頤年堂開會討論怎樣領導科學工作時，陸定一談到蘇聯在領導科學文化教育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提出要破除對蘇聯的迷信。陸定一主要講了三件事，一是在遺傳學領域，褒米丘林學派是社會主義學派、唯物主義學派，貶摩爾根學派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學派，不允許其在蘇聯存在和發展。我們不能這樣做。二是在醫學界有人認為，「中醫是封建醫，西醫是資本主義醫，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照這樣的認識，就應該反對中醫和西醫，用巴甫洛夫的醫來包治百病。三是郭沫若與范文瀾兩位歷史學家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為這是學術問題，要憑考古發掘出來的實物，由歷史學家自己去決定。陸定一認為，各門學科，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可以有學派的。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抬高另一個學派。這必然會窒息生機，使學術界死氣沉沉。實際上，這次會議已經決定了對科學工作採取「百家爭鳴」的方針。[5]

當然，中共對科學文化工作實行何種方針，歸根結底要看毛澤東的態度。這時，毛澤東是支持陸定一的主張的。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中山大學黨委反映，當時在中國講學的一位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了他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認為這有損於我黨負責同志威信。中宣部請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給蘇共有關方面。2月19日，毛澤東就這個材料寫信給劉少奇等人：「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甚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6]在這封信裏，

毛澤東表現出一種大度。

對毛澤東來說，提倡「雙百」方針還有一個直接的針對性，就是打破蘇聯迷信。建國之初，因為自己沒有經驗，只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拄着蘇聯的拐杖走路，在文化上也形成了「全盤蘇化」的氛圍。這使毛澤東「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毛澤東特別不滿意人們對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態度和依賴思想。赫魯曉夫揭開斯大林的「蓋子」，為毛澤東超越蘇聯提供了一個歷史機會。1956年3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討論斯大林問題。毛澤東強調說：「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國迷信還是外國迷信。」[7]毛澤東所謂外國迷信，當然首先是指對蘇聯的迷信。他要求「中宣部專門研究一下在科學研究和學術研究中對待蘇聯科學的教條主義態度問題」。[8]4月5日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批評「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着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對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9]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一個完整方針的提出，是在4月25至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毛澤東在會上作的「論十大關係」講話。在27、28日的兩天會議上，科學、文化問題成為議論的焦點。27日，陸定一作了長篇發言，毛澤東、周恩來、康生等人都有插話。陸定一發言的中心觀點是：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藝術和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對於後者要給予自由。他從中國著名生物學家胡先驌的一篇文章講起：「從前我們看重他的政治問題，因為他那個時候罵了蘇聯，所以我們就氣了。他講的問題是生物學界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在生物學界很有威望。」「他批評李森科的那個東西很好，那是屬於學術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要去干涉比較好。」接着，陸定一舉了幾個蘇聯在科學界貼政治標籤的事例。如在生物學方面說摩爾根、孟德爾是資產階級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會主義的；在物理學方面，說牛頓的物理學是封建的，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是資本主義的；在邏輯學方面，說形式邏輯是反對辯證法的，因而是資產階級的。（毛澤東插話：反了幾十年，不要形式邏輯，後頭學校裏又都教那個資產階級了。）後來又說數理邏輯是資產階級的。陸強調指出，「把那些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陸定一還談到了蘇聯這種做法對中國的影響。如有人提出「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學，魏爾嘯是資本主義醫學，中醫是封建醫學」；還有人說反對米丘林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是反革命。最後，陸定一把話題轉到文藝方面。他說：「文藝在蘇聯共產黨內是干涉最多的一個部門，無數的清規戒律」，「日丹諾夫有幾條，馬林科夫有幾條，這個有幾條，那個有幾

條，很多很多」。聯繫到中國，陸提出：不要搞甚麼反對公式主義這樣的事，不要搞反對，而是引導他，讓他學習，光反對不行。公式主義、自然主義，這都是藝術性質的問題。還說：「為甚麼只能去寫新人物呢？寫一寫老人物也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進步的文藝方向，但是人家寫點自然主義作品有甚麼關係？」陸的發言引起毛澤東的興趣，他也舉出電影《烏鴉與麻雀》為例說，「那是部很好的電影」，「我們電影局就是不許它演，這兩天可以找出來給大家看看」。還主張大家都去看崑劇《十五貫》。[10]

第二天（28日），文化、科學問題仍然成為會議的焦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一個完整的方針，正是陳伯達在這次會上首先概括提出，並被毛澤東接受的。陳伯達說：「昨天定一同志說得很多。毛主席給文學藝術界提出的百花齊放這個口號，現在看起來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中央組織歷史研究委員會、文字改革委員會，「要我參加委員會的工作。當時請問過主席關於學術界的路線和方針問題，主席提了一個『百家爭鳴』，我在歷史研究會傳達了這個口號。這是一個方針，即是說，在我們中國容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於一尊。我覺得在文化、科學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最後，毛澤東作總結講話。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11]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首次向黨外人士公開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他說：

> 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這個問題曾經談過。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後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在大的範圍內，讓杜威來爭鳴好不好？那不好嘛。讓胡適來爭鳴好不好呢？也不好。那麼說胡適要回來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願意回來，是可以回來的，讓我們批評過他以後再回來，就批評不着他了嘛，批評已經過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香港報紙、台灣報紙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許可？應該不許可，不許可有好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麼多的學說，那麼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

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12]

2 陸定一談「自由」及其限度

毛澤東的講話燃起了知識界的熱望，然而從毛的講話中，仍然無法了解這個方針的具體內容是甚麼？它的界限是甚麼？如何去貫徹執行？知識界都切盼中共中央能夠作出更具體的說明。這時，二百多位科學家正在北京起草科學規劃，李富春提議向他們講一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劉少奇指定陸定一去講。5月26日，陸定一應郭沫若之邀，在中南海懷仁堂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長篇報告。聽報告的不只是自然科學家，還有社會科學界、醫學界、文學藝術界的黨內外高級知識分子達兩千多人。陸定一的報告引起熱烈反響，報告會後收到來信七十二封，「有的是個人寫的，有的是集體寫的，有的對講稿提出了意見，有的發表了自己的感想」。這篇講話，以毛澤東的有關論述為依據，事先兩次經中宣部集體討論，又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作了修改，事後送毛澤東審閱修改，並批准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雖然陸定一開篇就申明，講話「是個人對這個政策的認識」，但從文稿形成的過程看，這個講話顯然代表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集體意見，是對毛澤東「雙百」方針的權威闡述。[13]

陸定一的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提出「雙百」方針，目的是繁榮文化和科學，「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的發展，必須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報告引起與會者共鳴的，大概就是其中強調「獨立思考」和「批評自由」的那些話。報告說：「我國在兩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方面曾經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成了我國過去歷史上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我國的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沒有自由討論，那末，學術的發展就會停滯。反過來說，有了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有了自由討論，學術就能迅速發展。」陸定一把「雙百」方針歸結為一系列「自由」：

> 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
> ……在人民內部，不但有宣傳唯物主義的自由，也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傳唯物主義或者是宣傳唯心主義，都是有自由的。兩者之間的辯論，也是自由的。
>
> ……中共中央曾經指示，必須堅決反對阻礙開展學術批評和討論的思想……批評和討論應當以研究工作為基礎，反對採取簡

單、粗暴的態度。應當採取自由討論的方法，反對採取行政命令的方法。應當容許被批評者進行反批評，而不是壓制這種反批評。應當容許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如此強調「自由」，在中共官方的話語中，過去是沒有過的，這讓人感到鼓舞。不過，報告關於「自由」的立論，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在甚麼範圍內的自由？二是給甚麼人的自由？三是在甚麼背景下的自由？

首先，報告所倡導的自由，指在文藝和學術問題範圍內的自由討論。陸定一認為，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之間是可以劃出一條界線來的。他指出，自然科學，包括醫學在內，是沒有階級性的，在某一種醫學、生物學或其他自然科學的學說上，貼上甚麼「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類的階級標籤是錯誤的。對於文學藝術工作，黨只要求「為工農兵服務」，至於創作方法、題材、藝術特徵、典型創造等問題，應該自由討論，容許各種不同的見解。「關於題材問題的清規戒律，只會把文藝工作窒息」。陸定一還批評說，一些黨員想把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壟斷起來，這「非常危險」。如此下去，哲學和社會科學事業會「死氣沉沉，停滯不前」。然而，陸定一並不否定文藝和科學的階級屬性或階級功用。他認為，「在階級社會裏，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畢竟要成為階級鬥爭的武器」。不僅在文學藝術領域，在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階級鬥爭也是比較明顯的」，即使自然科學領域也有「階級鬥爭的反映」。以為文藝和科學同政治無關，是一種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錯誤的；反之，把文藝和科學同政治完全等同起來，就會犯「左」的簡單化的錯誤。陸的立論還隱含一個前提：政治問題是不能「爭鳴」的，因為「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的直接的表現形式」。[14]

第二，報告提出了實行「雙百」方針的政治界線。陸定一說：「我們是主張不許反革命分子有自由的，我們主張對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實行專政。但是在人民內部，我們主張一定要有民主自由。這是一條政治界線：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我們主張隨着人民政權的鞏固而擴大這種自由。」報告提出，批評也有兩種：「一種是對敵人的批評，所謂『一棍子打死』的批評，或打擊式的批評」；「另外一種是對好人的批評，這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評。這種批評，必需顧全大局，採取多說道理，與人為善的態度」。對敵人專政，給人民自由，這就是中共為「雙百」方針預設的「一條政治界線」。仔細想想，這條界線看似清楚，其實很含糊——誰是敵人，誰是反革命，如何確定？

第三，報告說明，「雙百」方針是在一種特定條件下提出來的。一

是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剝削制度將被消滅，我國即將成為沒有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二是知識界的政治思想狀況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三是我們的敵人特別是國內的敵人已經大大削弱了；四是全國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強。陸說，「正是估計到這樣的情況」，中共中央現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這裏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雙百」方針的提出，並不是基於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是基於執政黨的形勢估計：社會和階級的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人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強」。特別是中國知識界思想狀況「有了根本的變化」，換言之，中國知識界已經臣服於新的權威。二是「雙百」方針的提出，也不是因為決策者意識到過去幾年的批判運動有過火行為。相反，陸的報告認為，批判胡適、胡風；批判梁漱溟；批判文藝界中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等等，這些鬥爭「是必要的」、「是正確的」。陸批評的矛頭主要指向蘇聯教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指向科學界、文化界內部的「宗派主義」和「門戶之見」，並未檢討中共的意識形態政策和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唯一含有檢討性的一段話是關於俞平伯批判的：「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藝工作中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對他在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加以批判是必要的，當時確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寫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則寫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過分激烈了一些。」這段話肯定批評本身「是必要的」，只是說有些文章「過分激烈了」。即使這樣，仍有人聽了不舒服，主張把它刪去。只是因為這段話在知識界反響很好才得以保留。[15]

3 知識界的最初反映

5至7月間，中共發動了對「雙百」方針的討論。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文學藝術、教育、學術刊物、圖書出版等領域的部分知識分子參加了討論。5月18日，九三學社率先召開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參加制定全國科學發展規劃的三十多位科學家。5月25、28日，《光明日報》接連兩次發表了首都部分科學家、大學教授對該報記者的談話，並發表社論，要求各民主黨派為推動百家爭鳴創造條件，消除「顧慮」，「克服各種消極因素，形成學術界的自由討論的空氣」。在中共的引導下，民主黨派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民盟、民革的中央和地方組織，各大學和科研單位，也都紛紛召開座談會。民主黨派中許多人表示，願意為學術爭鳴「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起一些推動作用」。6月11至13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討論，六百多位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參加，按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文學藝術等十幾個學科分組舉行座談會。中國作家協會也連續

召開會議，研究在文學領域如何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6至7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雙百」方針也是一個熱門話題。郭沫若的發言〈科學規劃和百家爭鳴〉、沈雁冰的發言〈文學藝術工作中的關鍵性問題〉和羅隆基的發言〈我對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的了解和意見〉，集中談到如何貫徹「雙百」方針。7月2至5日，全國三十一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刊物的編輯負責人會聚北京，討論在學術刊物中如何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高教部也召開了一系列討論「雙百」方針的會議，包括7月2日邀集部分來自高等學校的人大代表舉行座談會。《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對上述活動進行了大量報道和宣傳。[16]

知識界普遍地為「雙百」方針叫好。畢竟，「雙百」方針的提出為知識界展示了一種自由空間的前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長之撰文說：聽了陸定一的講話，「歡欣鼓舞，喜而不寐！」[17]許多舊知識分子甚至把它看作「福音」，美學家朱光潛後來這樣說：

> 在「百家爭鳴」的號召出來之前，有五六年的時間我沒有寫一篇學術性的文章，沒有讀一部像樣的美學書籍，或者是就美學裏的某個問題認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並非由於我不願，而是由於我不敢。……「百家爭鳴」的號召出來了，我就鬆了一大口氣。不但是我一個人如此，凡是我所認識的有唯心主義烙印的舊知識分子一見面談到這個「福音」，沒有一個不喜形於色的。[18]

受到毛澤東引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故事的鼓舞，許多人對新方針寄望甚高，希望通過百家爭鳴創造出比春秋戰國時代更加豐富、燦爛的文化成果。很多人希望它是一項長期的政策，而不是一場運動，「不要『一陣風』，吹過去了就沒了」。[19]

對於中共發出的「學習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的長處」的號召，科學界表示了更大的興趣。怎樣對待學習蘇聯和學習英美等國家的科學的問題，成為許多場合討論的一個話題。建國以後，政治、外交上向蘇聯「一邊倒」，學術上也是「一邊倒」。蘇聯學說一切都好，英美學說都被視為是「資產階級的」，甚至是「反動的」，這對舊知識分子精神上造成很大壓抑。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無疑為有西方學術背景的學者和學派爭得了一席之地，儘管大家都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否定學習蘇聯之嫌。在九三學社召集的科學家和教授座談會上，北大教務長周培源說：「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科學技術，絕對不是懷疑我們過去向蘇聯學習的成就。」北大教授黃子卿、南京大學教授陳開甲批評說，有些人把國家制度上的對立，哲學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對立運用到自然科學上來，一談起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就說不行，甚至不願了解資本主

義國家科學發展的現狀，這是非常錯誤的。[20]許多人對學術上的宗派主義表示了不滿，甚至憤懣。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林傳光說：前幾年在學習蘇聯先進科學理論方面就存在問題。比如在生物學方面，有的人不同意李森科的論點卻不敢提出，怕「犯政治錯誤」。清華大學教授張光斗說：以往在科學技術方面，不是「百家爭鳴」，而是根本沒有「鳴」過。「你是學蘇聯的，我是學英美的，不便爭論」。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冼更加憤慨：「只此一家，別無分店」，這是不好的。[21]

私下裏表達的不滿就更加強烈了。沈鈞儒6月視察天津時，那裏的高級知識分子向他反映了不少意見：過去學校領導執行政策片面，「一切都是蘇聯好」，其他國家都不行，而留美學生則罪該萬死，會說英文的就是崇美，帽子扣得很多。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介紹英文書籍？因此，大家只好客客氣氣，刻刻板板，八股最好，沒有毛病，脫離了各種公式，就說你思想有問題。這就影響了一部分人的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以致一本書一篇文章也出不來了。[22]

那時知識界的狀況恰如文學家秦牧所言：謹小慎微、人云亦云，沒有「爭鳴」的空氣；缺乏獨立思考，引經據典，附和權威；遇事看「氣候」，看大多數，看北京，等「定論」；心口不一，公開場合一種意見，私下裏一種意見；說話「留半句」，「讓三分」，吞吞吐吐，四平八穩，模棱兩可；不講原則，「唯唯諾諾、眼開眼閉、看風使舵」，如此等等。[23]

還有不少人對行政干預、壓制學術自由的種種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光明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指出：有些人「往往把學術問題的爭辯認為是簡單的是非問題，甚至把學術上的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不但不支持討論，反而妄加指摘或者給別人扣帽子，個別負有行政職務的人，甚至濫用行政命令來解決學術問題，粗暴地加以干涉。還有一些人受資產階級的權威思想的影響，習慣於使所有的意見定於一律」。[24]《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說：刊物、出版社、圖書館本來是傳播和保留各家的「鳴」聲的，但幾年來，文化界不知怎麽有了一條清規戒律，有人一被批評，刊物就不願發他的稿子，出版社就不願出他的著作，書店就不願賣他的書。有的圖書館幹脆抽去登記卡，列入禁書。於是，「被批評者沉默不語了，別人也不再理他了」。文章說：「如果這種風氣繼續下去，『百家爭鳴』的前途是略可想見的。」[25]另一篇署名文章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能不能貫徹，在相當的程度上要看文藝和學術的領導人有沒有大的度量。」[26]

不過，在說到形成這些「不良風氣」的原因時，多數人是有顧慮

的。他們謹慎地迴避了對中共政策的總體評價，只是把批評的矛頭指向政策執行者，或者強調學術界對黨的政策的誤解。如李長之舉歷史學中相繼出版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和尚鉞的《中國歷史綱要》為例，說中共中央並沒有限制爭鳴。之所以還「鳴」得不響，參加「鳴」的人不多，是因為有些人「不肯或不能或不習慣於獨立思考」，「迷信權威」。「看風向和盲從的人既多，就給某些人以限制『爭鳴』的感覺」。再就是擔任行政工作或編輯工作的個別人「圖省事」，「怕爭起來不好收拾」。[27]顯然，這是在為中共的政策開脫，而把責任歸咎於學術界本身。只有少數人含蓄地、間接地談到了幾年來政治運動的影響。朱冼說：「過去幾年來，中國學術上缺乏爭論的風氣。思想改造以前還稍好些，思想改造以後爭論就更少了。」「為甚麼不敢說，主要的是怕說得不對，會挨上『這是甚麼思想』的批評。」[28]政治學家趙寶煦說：「過分追求統一，強求一致的思想滲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造成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思考的重要原因。[29]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施蟄存指出，不適當地打擊知識分子的自尊心，造成了部分知識分子變成了「自卑自小」、「唯唯諾諾」的人，或變成了「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者」。[30]

在所有參與討論的知識分子中，羅隆基是少數大膽指出問題實質的人之一，他明確表達了一個看法：正是政治運動增加了知識界的「戒慎恐懼」，儘管他也強調，這只是「偶爾發生」的「某些偏差」。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言時，羅從黨與非黨關係的角度提出了問題，其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下面兩段話：

> 幾年來，三反、五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毫無疑問，基本上提高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加強了對知識分子的團結。但過去運動中偶爾發生了某些偏差亦增加了一部分舊知識分子的戒慎恐懼。甚至有的高級知識分子由於對黨的政策認識不清，體會不夠，竟把黨員個人的偏差，當成黨的政策，他於是顧慮種種，憂悶重重，對人、對事，少說話，不說話，怕說話，一方面既然是「三緘其口」，他方面就敬而遠之，這又不可避免地保存了隔膜……
>
> 中國現有的十萬個高級知識分子，極大部分是舊社會中長成的知識分子，他學術上的造詣愈高，他的舊知識的根底就愈深……他們有政治上的顧慮，怕戴帽子，怕犯政治錯誤，怕受批評打擊。他們有業務上的顧慮，舊知識不合時宜；新理論沒有頭緒。腦中空虛；心裏徬徨。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健康的。但事實畢竟是事實。[31]

對於「雙百」方針心存疑慮的也大有人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就指出：對中共提出的這個新方針，其實是「有爭論，有懷疑，有顧

慮」的。所謂顧慮，「主要是有人很害怕自己犯錯誤，特別是怕犯唯心主義的錯誤，怕變成政治問題」。所謂爭論，是有人擔心：如果「亂鳴」怎麼辦？如果唯心論大肆宣傳怎麼辦？所謂懷疑，是有人提出：這是不是一個策略，讓唯心論者自由宣傳一下，好「整」他們？[32]說到底，真正讓一些人心存餘悸的，是擔心百家爭鳴只是一個整人的「策略」。中共上海市委學校工作部為徵求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意見，曾訪問過九位教授，也在一些高校召開了座談會。教授們對學術上的「一邊倒」普遍有意見，但對展開自由討論也有很大顧慮，「主要是肅反以後學校內民主空氣不濃，教師們不敢多講話，害怕會因學術問題牽涉到政治問題。有些人怕現在要他們隨便講，以後又要整他們」。[33]顯然，人們還不敢相信中共的誠意，有這種顧慮的不在少數。所以，在歡迎之餘，知識界都希望為爭鳴劃出明確的界線。

4 如何開展「百家爭鳴」

羅隆基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說，從最近一次視察收集的反映中知道，全國高級知識分子是熱烈擁護百家爭鳴的，「不過對『百家爭鳴』實現的方法，對怎樣能夠開展『百家爭鳴』還有某些懷疑」。[34]在公開的討論中對此爭論不休，集中起來，分歧主要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一是百家爭鳴要不要有所限制？羅隆基把百家爭鳴比作管弦樂隊：「樂隊在為聽眾演奏的時候就必須有組織、有領導、有指揮，而後演奏出來才有和聲，有節奏。」郭沫若把百家爭鳴比作交響樂隊：「萬種樂器齊奏或疊奏，但總要按照一定的樂譜」，不能「一陣亂叫」或「亂打響器」。[35]他們的觀點引起普遍的反對，劉思慕直言：「郭院長的意見，有消極限制的一面，我是不敢苟同的。」馬哲民更坦白：「我很反對郭沫若院長的說法。」對於樂隊的比喻，費孝通說：「百家爭鳴不可能是同一個調子，目前要爭鳴，就一定有雜音。」沈志遠也說：「爭鳴時有辯論，有分歧，調子是雜亂的」，「百家爭鳴永遠不可能達到如交響樂那樣的和諧的地步」。范樸齋則說：在指揮旗下的演奏，等於事先安排的「百家爭鳴」，「這會阻礙百家的爭鳴」。宋雲彬說：「我的意見，凡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都可以承認它是一家之言，讓它有宣傳和辯論的自由。」[36]

二是百家爭鳴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個問題是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的討論會上首先提出來的。范文瀾認為，馬克思主義理應成為百家爭鳴的指導思想，而「不能作為一家之言對待」。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進而主張：百家爭鳴「首先要肯定馬克思主義是衡量百家之說的共同標準」。朱光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更加鮮明地

提出：「定於一是，這是百家爭鳴的最終目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非學會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不可」。王亞南、張光斗等持同樣的看法。[37]在會議討論中也有不同聲音，有人提出：「爭鳴不一定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應該自由發表各家的學說。」也有人說：決不應該先有一個定論，大家唱一個調子，那就實在算不得是「爭鳴」了。隨着討論在社會上的深入，這種聲音愈來愈大。北京、天津、瀋陽、重慶等地知識界「有不少人認為，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是對爭鳴的限制」。[38]

三是唯心主義是否有參與爭鳴的權利？在陸定一報告中明確提出來的這個問題，一開始就引起了人們的疑問：中共發動的對胡適唯心主義的政治批判餘熱未消，現在突然來個大轉彎，主張給予唯心主義宣傳的自由，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於是，人們的議論便集中在解釋中共提出這個主張的目的。有的認為，既然唯心主義在老專家中間存在，就應該讓它發表出來；有的認為，允許唯心主義宣傳，是為了便於批判，使它真正歸於消滅；有的認為，這樣做是為了通過競賽、比較，提高唯物主義的理論水平。也有一些看法比較深刻，如美學家蔡儀認為，許多東西，在某些場合下，一下子很難斷定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即使是唯心論也不是簡單的學說，並非沒有一點可取的地方，不能簡單地否定一切。[39]

四是在學校課堂上是不是可以百家爭鳴？這個問題在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集的討論會上就有不同意見。有的認為學校傳授的知識「要有定論」，中小學教材要統一，不能爭鳴，大學教學中也應教給學生較好的一家學說；有的則主張，大中學裏都應將各種學說告訴學生，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習慣；也有人主張，基礎課程統一，專業課可以介紹各家學說。在7月2日教育部召集的教育界人大代表座談會上，大學校長們意見也不一致，「有的認為可以，有的認為不可以，有的主張採用組織學術報告的方式」。天津大學副校長張國藩認為，百家爭鳴是可以體現在課堂上的，這表示教師在教學中能獨立思考，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很大作用。但多數人持謹慎態度，如華北地質學院副院長俞德淵、東北工學院院長靳樹梁、四川大學校長彭迪先、西南農學院副院長何文俊等認為，百家爭鳴是學術上的事，不應搬上課堂上來，拿到課堂上去的一定要有定論。各講一套，就把學生弄糊塗了。[40]經過幾個月的討論，逐步趨向於這樣一種認識：在大學課堂上可以介紹不同觀點，包括正在討論中的問題，教師也可以講自己的學術見解，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11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對教學中也要百家爭鳴的主張不必懷疑〉，似乎是對這個問題作了結論。[41]

上述討論和爭論，反映出知識界對「雙百」方針既歡迎又疑慮的複

雜心態：一方面想多一些保護屏障；另一方面又想爭得更大的自由空間。7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略論「百家爭鳴」〉，表達了執政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政策趨向。文章批評了對百家爭鳴進行限制的種種說法，指出：「鳴得好是一種合理的希望，但不必當作一種限制」；「爭鳴既不是齊唱，也不是合唱，因此必然會出現不和諧音。諸子百家應該自己創作樂曲，而不是按照樂隊指揮所指定的樂曲來演奏」；「成家的可以爭鳴，不成家的也可以爭鳴」；「既然要爭鳴，就不能絕對『不亂』」；「不同意見是可以拿到（高等學校的）課堂上中講授的」。文章關於馬克思主義在百家爭鳴中地位問題的表態，尤其引人注目：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國家活動和文化科學的指導思想，這是已經確定的。但是在學術問題上，在科學研究中，如果有人不採取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或得出了和馬克思主義不一致的結論，他仍然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或評判標準，那也要看各人自願」。文章還說，我們是主張辯證唯物主義的，但是也主張別人有懷疑和批評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由。如果規定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基礎或標準，那實際上是取締唯心主義者爭鳴的資格。文章從鼓勵爭論的宗旨出發，提出「這些不同的爭鳴都各有不同的基礎，不能強求一律」。[42]

[1]文嚴：〈「雙百」方針提出和貫徹的歷史考察〉，《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頁23—24；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4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86—487。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明權，陳伯達的兒子在整理其父遺稿時，還發現了一些重要史料，可以證明陳在這個問題上的歷史貢獻。參見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123—124、126—128。

[2]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究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165—168。

[3]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頁1124—1225。

[4]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陸定一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駐在莫斯科，親眼見到蘇共發動的對老哲學家德波林的政治批判，斯大林甚至以蘇共中央決議的形式給德波林戴上「孟什維克」唯心主義的帽子。在別的學科也有這種情況。比如在生物學界，由斯大林親自插手定論，把創立基因學說的孟德爾—摩爾根學派稱之為反動的「偽科學」。這使陸定一想起了中國歷史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情景，他回憶說：「當時我懷疑這樣的辦法難道是社會主義的辦法嗎？」參見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頁411—412。

[5]《陸定一文集》編輯組編：《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841—843。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0。

[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84。

[8]《毛澤東傳（1949—1976）》，頁488。

[9]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從毛澤東4月18日的一個批件中，更能看出毛打破蘇聯迷信的意圖。這份材料是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宣傳部長哈格爾的一個談話紀要，哈格爾批評德國宣傳蘇聯先進經驗和科學成就中存在的教條主義錯誤。毛澤東在批件中，要求中宣部邀

請科學院等有關機關負責人「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488。

[10]《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頁1123—1126。

[11]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頁490—491。

[12]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頁491—492。

[13]《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6月7日，陸定一將報告稿報送毛澤東審閱，同時附上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等給陸定一的五封來信。毛對報告稿作了「一點修改」。6月8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發表。」6月13日陸的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20—121。以下所引陸定一講話內容，均見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不再註明出處。

[14]把科學與政治分開，這是中共領導人共同的思路。5月1日，周恩來同中國科學院負責人談科學和政治的關係問題時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開。科學是科學，政治是政治，然後再把它結合起來。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70。

[15]1956年6月7日，陸定一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關於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提了意見，有的同志主張將這段刪去。但因為這一段的影響是好的，所以仍舊保留。」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20。

[16]參見《光明日報》，1956年5月25日、28日、6月14日；《人民日報》，1956年6月19日、29日、7月2日、9日、12日、17日、28日。

[17]《人民日報》，1956年7月5日。

[18]《文藝報》，1957年第1號。

[19]《光明日報》，1956年7月10日。

[20]《光明日報》，1956年5月21日。

[21]《光明日報》，1956年5月25日、28日。關於學習李森科有一個典型的例子：1952年在全國推行李森科的組織療法。李森科認為，某種動物的組織製冷後會發生變化，把他們注射或移植到病人身上，可以起到治療和強身的功效。由於查不到臨牀試驗文獻，受到醫務人員置疑。一位建國初從美國歸來的醫生要求停止使用，卻遭到上級領導的白眼。到1954年這位醫生訪蘇時，問到莫斯科一家大醫院的內科醫生，得到的回答是：組織療法早在兩年前就被禁用了，而那時在中國剛好是作為蘇聯先進經驗推廣的時候。參見Arthur W. Chung, Of Rats, Sparrows & Flies...: A Lifetime in China（Stockton: Heritage West Books,1995）, 172。

[22]《內部參考》，1956年6月23日，頁592—595。

[23]《文藝報》，1956年第18號。

[24]《光明日報》，1956年5月28日。

[25]《人民日報》，1956年7月5日。

[26]《人民日報》，1956年7月2日。

[27]《人民日報》，1956年7月5日。

[28]《光明日報》，1956年5月28日。

[29]《文藝報》，1956年第15號。

[30]《文匯報》，1956年11月23日。

[31]《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

[32]《人民日報》，1956年7月5日、21日。

[33]《內部參考》，1956年7月13日，頁323—324。

[34]《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

[35]《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7月1日。

[36]《光明日報》，1956年7月9日。

[37]《人民日報》，1956年7月10、11日。

[38]《光明日報》，1956年7月22日。

[39]《光明日報》，1956年6月14日。

[40]《光明日報》，1956年7月10日。

[41]參見于風政：《改造》，頁461—463。

[42]《人民日報》，1956年7月21日。

二 新聞改革與學術界的活躍

6月底，無論是中共還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對於新方針都還停留在學習、認識和討論的階段，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行動。為了消除人們的顧慮，讓「百家爭鳴」真正形成風氣，中共首先做出了表率。輿論宣傳素來是共產黨最重要的陣地，新聞報紙在當時又是最重要的宣傳形式，也許正因為如此，毛澤東首先提出對新聞工作進行改革，而且就拿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開刀。

1 嘗試改進新聞工作

從7月1日起，《人民日報》改版，由原來的一張四版擴大為兩張八版。據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胡喬木回憶，「當時有個指導思想，要打破陳規，辦得生動活潑，讓各種意見在報紙上發表，包括對黨的批評。毛主席不僅作了口頭指示，中央還有正式文件」。[1]這個指導思想反映在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中。過去在人們的印象中，《人民日報》是黨報，是一份政治報，具有指引方向和統一輿論的功能，報上的文章轉達的都是中共中央的聲音。這篇社論則承諾，改版後的《人民日報》，第一，擴大報道範圍：「生活裏的重要的、新的事物——無論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或者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窮鄉僻壤的，是直接有關於建設的，或者是並不直接有關於建設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並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報紙上多看到一些，我們也就應該多採集、多登載一些」；第二，開展自由討論：「黨的和人民的報紙有責任把社會的見解引向正確的道路，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應該採取簡單的、勉強的方法。首先，報紙的編輯部無論憑着甚麼名義，總不能設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擺出這樣一副神氣，活像對於任何問題可以隨時作出絕對正確的結論。」如果「我們發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觀點跟編輯部的有所不同，這些文章的作者的觀點彼此也不同，這種情形希望讀者認為是正常的」；第三，改進文風：過去發表的文章，「整個說來，生硬的、枯燥的、冗長的作品還是很多，空洞的、武斷的黨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現象也遠沒有絕跡」，以後要力求做到「有條理，有興味，議論風生，文情並茂」。擴大版面後的安排，第一版是要聞，第二、三版國內經濟，第四版國內政治，第五、六版是國際版，第七版是學術文化版，第八版是文學性副刊和廣告。可以看出，《人民日報》這次改版除了將擴大新聞篇幅外，主要是增加了國際新聞和學術、文化的內容。兩者竟然佔了四個版面，正好等

於新增版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社論關於《人民日報》的性質的提法：「《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財產」。[2]這可以認為是《人民日報》改版的宗旨。

8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轉發了《人民日報》編委會報告，在批語中進一步闡述這個指導思想：黨的各種報紙「應該發表黨的指示，同時盡量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為了便於今後的報紙上展開各種不同意見的討論，《人民日報》應該強調它是中央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今後《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除了少數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和少數的社論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而且可以允許一些作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我們共產黨人的見解相反的文章。這樣做就會使思想界更加活躍，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愈辯愈明。」[3]可見，《人民日報》改版，不只是擴大版面、增加篇幅，更主要是反映了編輯方針的調整，其核心是強調黨報也是「人民的報紙」，不僅要宣傳黨的指示，也要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鼓勵報刊形成批評空氣，甚至允許發表與黨的「見解相反」的文章。而且，不只是《人民日報》，要求「黨的各種報紙」也都應如此。

為了促進百家爭鳴，毛澤東還一再要求擴大《參考消息》的發行範圍。《參考消息》是新華社主辦的日報，每天選載世界各地通訊社、報刊上的最新信息，是幫助中共高層領導人了解外界的一個特別渠道，但閱讀面控制在極小的範圍，只印二千份。早在1956年3月毛澤東就提出，《參考消息》準備擴大發行到三十萬份，發到縣一級，黨內外都可以看。不要那麼多禁令，就是要我們的人見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5月1日毛澤東又說，《參考消息》要總結一下，可再行擴大，變成天下獨一無二的報紙。[4]195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從1957年3月1日起，《參考消息》以四開四版的日報形式出版，還屬內部讀物，但由各地郵局發行。改版後的《參考消息》，發行量由原來的二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5]此外，毛澤東還授意恢復剛剛停辦的《文匯報》，並將《光明日報》、《文匯報》交回給民主黨派主辦。[6]

這一時期，周恩來、劉少奇等人也對改進新聞工作表示關心。3月27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談到報紙工作。他說，《人民日報》錯了要進行自我批評，過去學《真理報》，錯了不能更正，黨報只能登結論，不能發表不同意見，不能爭論，這樣做不對，報紙可以活潑一些。[7]劉少奇也連續兩次找有關負責人談改進新聞工作，核心的思想是要求提高新聞的真實性，要適合讀者的需要。5月28日，劉少奇聽取新華通訊社社長吳冷西等人的匯報時，提出了五點意見，他要求新華社「要學習塔斯社，同時也要學習資產階級通訊社」。新華社的新聞必須是「客觀的、真實的、公正的、全面的」。批評現在的新聞報道「只講

好的，有片面性」。他要求新聞記者「要堅持真理，要有鬥爭性，頭上要長角」。6月19日，劉少奇再次召集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談新華社工作。他提出，新華社不要老是強調官方身份。新華社發的稿件既要反映本質又要生動活潑，多種多樣，適合讀者的需要。[8]周恩來、劉少奇連續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工作發表意見，這在過去是很少見的。

總之，蘇共二十大以後，為了避免蘇共執政的錯誤，建立民主生活制度，中共決策層在新聞宣傳方面確有一些新想法，即嘗試放寬輿論，擴大人民的知情範圍，發揮報刊輿論的批評和監督作用。

2 為「爭鳴」開道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

為推動學術界的爭鳴，8月10至25日在青島召開遺傳學座談會。中共高層選擇遺傳學領域為突破口推動「百家爭鳴」，就是因為這裏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最為盛行，而且受蘇聯的外來影響最大，所造成的後果也最為嚴重。

李森科在中國最熱烈的追隨者是北京農業大學校長樂天宇。他是一位1925年入黨的老幹部，曾在蘇聯學習米丘林學說。樂天宇回國後帶來了蘇聯的結論，並藉助於「一邊倒」的國策，無情地打壓中國的「摩爾根遺傳學派」，迫使北京農大教授、年青的遺傳學家李景均於1950年3月出走美國。這個事件震驚中外，引起中共高層的注意，樂天宇受到嚴厲批評，並被調離了北京農大。[9]然而，遺傳學的厄運並沒有由此轉機，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遺傳學家們都受到了批判。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了樂天宇的「學閥作風」，卻仍然要「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仍然斥傳統遺傳學為「唯心」、「反動」、「為資產階級服務」、「偽科學」，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10]從這年秋季起，遺傳學課程在各大學基本被取消，遺傳學研究完全停頓下來，以生物學取而代之。

直到1955年，李森科在蘇聯已遭到批評，但在中國仍然被視若神明。被西方稱為「中國植物分類學之父」的著名遺傳學家胡先驌1954年寫了一部《植物分類學簡編》，提出了多元新分類系統理論，並對李森科的物種見解進行了批評。該書於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立即遭到批評，蘇聯專家也提出「嚴重抗議」，說「這是對蘇聯政治的誣衊」。接着，在中科院紀念米丘林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上，胡先驌被批判，《簡編》一書也被銷毀。[11]用生物學家談家楨後來的話說，這時的中國遺傳學事業「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瀕臨夭折」的地步。[12]

1956年4月，李森科本人被迫辭去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被迫害致死的摩爾根學派科學家瓦維洛夫得以平反。[13]消息傳來，在中國科學界引起震動。正在這時，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4月18日，毛澤東聽說了生物學界強制推行李森科學派，打擊其他學派的情況後，指示中宣部要注意這個問題。[14]科學界不一定知道毛澤東關於要「注意」李森科教條主義的那封信，但陸定一的報告是聽了的。這使受壓已久的遺傳學界為之鼓舞，他們立即呼籲恢復摩爾根學派的合法地位。[15]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宣傳部同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部商量，決定共同召開一次遺傳學座談會。[16]

這次會議，是生物學界米丘林、李森科學派和孟德爾、摩爾根學派在學術會議上的首次接觸，談家楨、戴松恩、祖德明等130多位生物學家參加。在這次會議上，傳統遺傳學派的訴求得到了某種滿足。中宣部科學處處長于光遠在會議開始時講話，宣布全部摘掉過去強加給摩爾根學派的一切政治帽子。在會上，摩爾根學派第一次可以與米丘林學派面對面地展開討論，而且討論得相當熱烈。會議分出四個議題進行討論，先後召開了十四次座談會，共有五十六人發言。不久前受到嚴厲批判的胡先驌接受了竺可楨的道歉和邀請，並在會議上發言達八次之多。會後，摩爾根學派的科學家爭得了在教學、研究、出版方面與李森科學派同等的權利。[17]

然而，這次會議很難說已經使摩爾根學派得到了與米丘林學派「平起平坐」的地位，更不用說動搖米丘林學說。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童第周在開幕詞中指出，幾年來的問題，只是對「蘇聯的科學精神」和米丘林學說「體會不深」，而「主要根據李森科學說」，結果導致了偏差。言下之意，雖然李森科出了問題，蘇聯的科學精神和米丘林學說仍然是不能碰的。參加會議的遺傳學家們並不指望與對方一爭高下，只是要謀得一個合法地位。他們的發言，更像是在向米丘林主義者普及遺傳學的基本常識，而盡量迴避批評對方。由於遺傳學研究多年被禁止，自1949年起就已停止訂閱國外各種遺傳學雜誌，即使是遺傳學家們，對國際遺傳學的進展也大多不了解，很少有人提到遺傳學的最新進展。在會上，米丘林主義者幾乎一致地認為，遺傳學的發展，一天天接近米丘林學說。傳統遺傳學家們則大都持一種折衷的態度，如談家禎說的，要「走中間路線」。只有個別人對米丘林學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如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李競雄指出，米丘林學派「抹煞了一百多年來生物科學發展的事實，而回到一百多年前去了」。然而，李競雄被認為是「極端」分子受到批評。[18]

當局的既定方針，原本就是要在「百家爭鳴」的口號下讓兩家和平共處，並不是要做出誰是誰非的評判。于光遠的發言為會議定下了基

調：「遺傳學的兩個學派應該互相學習，互相補充。」童第周在閉幕詞中也說：「摩爾根學說的研究和米丘林學說的研究，都應當發展，都應當擴大它們的領域。」[19]當局的初衷，就在於通過遺傳學座談會為「百家爭鳴」樹立一個榜樣。從這個角度說，會議的目的是達到了。

3 逐漸活躍起來的學術界

1956年下半年，各個學術界漸次出現了「爭鳴」的氣象。除青島遺傳學座談會，還有幾次較有影響的會議。如7月上旬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三十一家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負責人座談會，8月下旬中國地理學會召開的第二次學術報告會，8月底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召開的貫徹「雙百」方針的座談會，以及9月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召開的會議。這些會議本身雖然沒有組織學術爭論，算不得是「爭鳴」，但要求創造百家爭鳴環境的願望，卻是普遍的、強烈的。

首先是要求改變對學術觀點扣政治帽子的做法。就學科領域而言，法學界的政治性極強，對此也顯得特別敏感。自1952年以來，法學界盛行照抄蘇聯法學的教條主義，簡單否定資產階級法學理論，導致中國法學研究長期裹足不前。8月底，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希望推動法學領域的百家爭鳴。秘書長吳德峰在會上直言：幾年來法學領域缺乏自由討論的風氣，大家存在顧慮，寫文章十分謹慎，司法改革後更加拘謹。對有分歧的問題不敢發表意見，「都怕受到公式化的批評」，「這種情況只會造成學術上的沉悶空氣，只會助長學術武斷和八股濫調的滋長」。錢端升教授指出，法學界亂扣帽子的勁頭還很大，有些青年同志常常抓住經典著作上的一兩句話，就給人扣上「資產階級的、封建殘餘的觀點」的大帽子。法學的階級性、政策性特別強，它最容易引起扣帽子，展開爭鳴，必須衝破這個障礙。嚴景耀教授說，許多教師的講稿，離開經典著作的話再不敢說甚麼，對資產階級法學理論，除了罵它反動、虛偽以外，很少說出甚麼道理。北京政法學院副教務長雷潔瓊、北京司法局副局長樓彥邦提出，法學界有割裂歷史的問題，老一輩法學工作者不受重視的問題很突出。北京政法學院教務長劉昂等人對照抄經典著作和蘇聯教材，不敢獨立思考的風氣提出了批評。如果說法學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那麼，經濟地理學本來是可以與政治拉開距離的。然而，事實上，在整個經濟學領域，經濟地理學卻成為受教條主義嚴重干擾的「重災區」。建國以後，不僅經濟地理學被批判為「地理決定論」，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也成了問題。在8月20至25日召開的中國經濟地理學第二次學術報告會上，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成為會上熱烈討論的話題。與會者一致主張，經濟地理學應有獨立的研究對

象和領域，不贊成把生產關係或生產力作為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20]

其次是呼籲放寬對報刊出版的限制。「雙百」方針提出以後，期刊和出版工作受到了各方面的特別重視，因為報紙、期刊和出版是知識分子發表作品，表達意見的主要渠道和園地。有人提出，報刊「可以為各種學派各種不同的學術意見提供充分的爭鳴的陣地」。[21]還有人指出，「『百家』在現代是怎樣的『鳴』法，很顯然，是出版」。[22]7月2至5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負責人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等十五個高校學報負責人和《哲學研究》、《經濟研究》、《歷史研究》等十六個學術雜誌和報紙副刊負責人參加了會議。與會人員認為，學術刊物是學術活動的主要園地，要在學術界實現「百家爭鳴」，首先就要在學術刊物上有充分的學術討論自由。他們紛紛指責過去幾年間學術刊物限制批評、亂扣帽子、不尊重作者的獨立見解、濫發教條主義文章等不良風氣，認為應當劃清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線，在學術爭論中不允許亂扣政治帽子，學術刊物可以發表唯心主義的文章，應鼓勵學術工作者撰寫闡述國家政策的文章和對執行政策中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的文章。[23]

再次是呼籲放寬對西方科學著作編譯出版的限制。學術界對編譯出版國外科學文獻方面向蘇聯「一邊倒」的傾向提出了嚴厲批評。有人作過統計，中國科學院五年中翻譯出版的外國科學著作108種，只有3種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著作。各專門學會出版的《譯報》、《科學文摘》幾乎成了「蘇聯譯報」。《物理譯報》、《生物譯報》、《植物病理學譯報》創刊後發表的文章398篇，僅有兩篇文章譯自德國的科學刊物，其餘全部譯自蘇聯刊物。《微生物學譯報》還規定，譯載蘇聯以外國家的科學論文，首先要有「批判能力」，譯後還需審查、「過關」。知識界對此一直持反對態度。1956年初就有人表示，要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是非，積極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期間，也有人發表文章，公開提出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著作也要譯載，沒有必要對每篇外國科學論文進行所謂的「批判」。要檢查編譯工作中的清規戒律，分清學術與政治的區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論文的區別。9月5日，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會上提出，要反對絕對正確、絕對錯誤的極端思想，使編譯工作充分反映中國和世界各國科學研究成果以及學術爭論；在選題上，不應以權威為標準，而應以科學價值為標準；不同思想體系的著作，只要有價值，也可以翻譯出版。有人進而提出，對世界著名科學家的重要著作，即使不對也不應妄加刪節。還有人提出，審稿制度是必要的，但審稿的目的是衡量學術水平，以確認是否達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出版標準，並不是排斥和

拒絕學術上的不同見解，更不是以政治標準決定是否「放行」。[24]雖然會上的討論偏重於自然科學方面，但對於放寬出版限制，推動西方科學成果的譯介，還是有相當的意義。

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邀請黨內外科學家和學術、藝術工作者六十餘人舉行座談會，陸定一在會上發表的意見，對前一階段有關如何開展爭鳴的討論做了總結。他提出了五點意見：一、除了繼續進行對馬克思主義的課程的教育外，有準備、有步驟地在高等學校高年級逐步開設資產階級學說課程。陸說，資產階級學說有唯心主義的，有唯物主義的，唯心主義也有許多派別，都可以開課。現在康德、黑格爾、羅素的哲學學說已經在北京大學開課，凱恩斯經濟學說也將在北京大學開課，還準備續開。對資產階級學說，在講課中能批判就批判，不能批判就介紹。二、請各國（包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第一流學者來中國講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可以請。陸說，中國科學要在十二年左右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首先就要向人家學一學。講幾個月、半年、一年都可以。三、關於出席各種國際學術會議，同時請科學院考慮是否中國也召集一些國際學術會議。四、關於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課程問題，既要講正面，也要講反面。社會主義運動經常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只講正確路線，不講不正確路線，就沒有對比，就不容易了解，就會陷入背誦教條的情況。陸說，想請人編一些書，譯一些書。有些書作為參考材料，放在圖書館，不出售。五、講歷史，也要講正面和反面。不僅要出版孫中山的選集和全集，也要出版蔣介石的選集和全集。講太平天國，就要講曾國藩，講國際問題也要講希特勒。反動的書，不公開出售，可以放在圖書館供人研究。陸定一最後說，上述這些辦法都是為了反對教條主義，刺激學術的發展。至於有人提出在「百家爭鳴」中要不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問題，應該這樣解決：如果是宗派主義的領導，那是錯誤的，那是本身就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這種「領導」當然不要；如果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來團結別人，幫助別人，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倡互相批評，互相幫助，這樣的領導是絕對需要的，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這種領導是必不可少的。會上，曾昭掄、潘梓年、錢端升、陳鳳桐、陳昌浩、王子野、鍾惠瀾、裴麗生、王芸生、錢偉長等發言，表示擁護上述五點意見。[25]這次會議進一步鼓勵了學術界的自由開放空氣。

確實，1956年下半年，學術界的沉悶空氣開始改變。哲學界關於真理的階級性、真理的標準、社會科學的階級性等問題的討論，史學界關於中國歷史分期的討論，民族學研究中若干問題的提出，生物學界關於麻雀是不是害鳥的爭論，中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關於中國數學史和天文學史方面的爭鳴，語法座談會關於語法的討論，考古工作會議關於進一

步開展考古工作的討論，以及教育界提出的對陶行知重新評價的問題，都是有社會影響的爭鳴。有研究者統計，1956年，全國性重要學術會議召開了五十多次，學術論文和學術報告超過二千篇，都是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26]

[1]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3。

[2]《人民日報》，1956年7月1日。

[3]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1949—196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311。

[4]劉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頁1403。

[5]《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頁1197—120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96。

[6]詳述見後。

[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1。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67、370。

[9]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頁412。

[10]《人民日報》，1952年6月29日。

[11]胡宗剛：《不該遺忘的胡先驌》（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頁152—153、164—166。

[12]《文匯報》，1998年9月22日。

[13]關於蘇聯批判李森科的過程，詳見B·伊薩科夫等：〈反李森科學派鬥爭的史料〉，《斯大林研究》，第二、三、四輯。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74—75。

[15]如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婁成後、吳仲賢先後發表文章或接受採訪，對否定摩爾根學派提出批評，要求把摩爾根學派正式列入教學計劃。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7月2日；《光明日報》，1956年7月19日。

[16]參見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頁430。

[17]參見于風政：《改造》，頁467—468；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頁431—433；胡宗剛：《不該遺忘的胡先驌》，頁167—168。胡著說，胡先驌發言達十一次。

[18]方舟子：〈從「絕不退卻」到「百家爭鳴」〉，《書屋》，2000年第11期，頁39—40。

[19]方舟子：〈從「絕不退卻」到「百家爭鳴」〉，頁40。

[20]《光明日報》，1956年9月1日；參見于風政：《改造》，頁469。

[21]《光明日報》，1956年6月13日。

[22]《人民日報》，1956年7月5日。

[23]《光明日報》、《人民日報》，1956年7月9日。

[24]《人民日報》，1956年9月7日；《改造》，頁470—471。

[25]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頁433—435。

[26]于風政：《改造》，頁472。

三 沐浴春風的文藝界

1956年的春風也吹到文藝界。就文學藝術家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性來說，或許文學藝術界的行動還更早一些。

1 作協理事會與文藝政策鬆動

1955年底，中共領導人開始關注知識分子問題，但當時關注的重點是學術界特別是自然科學界的知識分子，文藝界似乎還沒有納入領導人的視野之內。就在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發出的前一天，195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還批發了〈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要求文藝界「在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以後，必須進一步地對於這種現象（指『小集團活動』）進行批判和鬥爭」。「各地應本此方針，根據具體情況，對於文藝幹部中存在的類似的問題，有領導地開展批評和鬥爭，以整頓和純潔黨的文藝隊伍」。1956年初，文藝界仍然在批判丁玲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一本書主義」。[1]然而，受過「五四」洗禮的中國文藝界，歷來具有成為時代號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規模經濟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再次激發出文藝家們的政治熱情，他們希望成就文學藝術上的一番事業。中共知識分子會議鼓舞了他們，使他們感受到春天氣息的來臨。蘇聯「解凍文學」思潮的興起，也激發了中國作家。[2]他們開始對文藝界的沉悶和蕭條公開表達不滿。

為了推動文藝創作，2月27日至3月6日，召開了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擴大的第二次會議，主題是討論發展和繁榮文學的問題。出席會議的理事和代表二百多人，周揚、茅盾、康濯、劉白羽、老舍、陳荒煤等作報告，巴金等三十四人作大會發言，唐弢等作了書面發言。會議通過了「作家協會未來十二年的工作綱要」，決定成立作家協會書記處。會議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康生等中共領導人接見了會議代表，並與他們合影留念。劉少奇還專門約見周揚、劉白羽談文藝，周恩來則出席晚會並和作家談話，陳毅也到會作指示。《人民日報》在頭版發消息，同時刊登了會議報告和大部分會議發言。《文藝報》則發表了所有的報告和發言。3月25日，《人民日報》還專門配發社論，號召作家們「努力滿足人民的期望」。這次作家協會理事會可謂「盛況空前」！[3]

這次會議從上到下都對文學事業的落後狀態表示了不滿情緒。劉白羽關於文學創作的報告、陳荒煤關於電影劇本創作的報告、康濯關於反映農村生活的小說創作的報告都指出創作嚴重落後於現實。《人民日報》社論則說得更加明白：「我們文學事業的落後狀態是無可諱言的，我們還很少看到真正激動人心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優美藝術形式的文學創作。」相比之下，作為會議的主要文件，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周揚所作的報告，態度就不那麼明朗。他強調的重點是：文學藝術經過「思想戰線上的一系列的鬥爭，特別是批判和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取得了重大成績，文藝創作已經出現了「新氣象」，「正在走向旺盛與繁榮」。以此證明「文藝創作不但沒有像胡風所誣衊的那樣，『萎縮』、『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們正在茁壯地成長」，而「『萎縮』、『枯死』的只是一切反動的文藝而已」。說到「人們經常談論和慨歎文學藝術落後於生活的現象」時，周揚把這種狀況歸咎於「右傾保守主義」，說「在文學藝術工作上，也像在其他工作上一樣，右傾保守主義曾經是我們前進的最主要的障礙」。[4]這顯然是在響應毛澤東關於經濟建設方面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號召。在周揚看來，文學領域只要反對右傾保守，就可以「大踏步地前進」了。

在會上，只有少數發言觸及到文學落後狀態的真正原因。如茅盾的報告委婉地說到：一個時期「相當盛行的粗暴的文藝批評，也是嚴重地打擊青年作者的創作積極性的」。他說，近年來這種粗暴的批評比較少了，但真正有益的評論還是很少見到。唐弢的書面發言則尖銳地提出要「同庸俗社會學傾向作鬥爭」，即同文藝批評與文藝理論中機械地、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作鬥爭。[5]然而，周揚的報告沒有從領導的角度作一句自我批評。他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回顧了1954年以後的「思想鬥爭」特別是同胡風集團的鬥爭，甚至得出「革命文學史就是一部和各種反動的『理論』和『派別』作鬥爭的歷史」的結論，宣稱今後的任務是「繼續對文學上各種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進行堅決的鬥爭」。周揚雖然也批評了公式主義和自然主義，提出還要反對使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但他卻把一切問題的責任照舊歸之於作家。諸如青年作家缺乏經驗；有經驗的老作家又對新生活不夠熟悉；很多新題材作家不容易駕馭等等。會上的多數發言也都隨聲附和周揚的報告，絲毫不敢觸及文藝理論、文藝思想、文藝領導中存在的問題。[6]這表明經過胡風事件，文藝界仍然驚魂未定。會議提到的繁榮文學的辦法大都是技術性的。茅盾認為，現在的文學隊伍太小，作家協會會員只有五百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過一千多人。他和劉白羽都強調，要積極地培養青年作家，擴大文學隊伍。劉白羽還提出，要「在人民中發現天才」。當然，劉白羽還講到一些別的

話，如要擴大寫作的題材和體裁，要開展「自由討論」。他說：「作家選擇甚麼題材，這是完全自願的事情。」[7]這與周揚的報告還是有所不同的。

事實上，中共高層領導人對文藝現狀也很不滿。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表達過這樣的看法。特別是劉少奇，先後兩次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負責人談文藝問題，這在建國以後是少見的。[8]3月5日，劉少奇和陳毅接見周揚、劉白羽，談了他們對當時文藝工作的意見。劉少奇首先談到一些作家「沒有社會主義熱情」，「那怕是極個別的人，也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劉的談話，中心是講如何對待「政治上的干涉」問題。他承認「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錯了的」，還提出，「以後如果這種干涉是正式代表組織的意見，就應有一個正式決定，來一個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決定連同自己的意見寄到中央來，或是寄到文化部、宣傳部、作家協會，都可以。劉少奇說，對於作家，「不能不讓人家提意見，不讓人家講話」。負責同志講的話，也應該看作是讀者、觀眾的意見，尊重他們的意見是完全應該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們提的意見那樣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錯誤，那就要做出決定，有正式文件。沒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當作個別意見，可以不聽。」陳毅插話說：「作家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見解，獨立的風格。」劉對此表示「很同意」。[9]3月8日，劉少奇在聽取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陳克寒、劉芝明、夏衍等的匯報時，再次重申了他的這個意見。在談到文藝批評問題時，他說，「負責同志看戲，不許議論不行，議論了對人又有壓力，怎麼辦？」劉還提出，「若是隨便講幾句，不能算批評，可以不聽；如果是正式意見，那就講清楚。當然組織決議還是要聽的。既然是決議案，那就要服從」。「外行提意見應採取商量的態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10]顯然，劉少奇是看到了由於政治上過多干涉帶來的後果，特別是看到了「負責同志」的意見造成文藝家「無所適從」的局面。劉少奇希望通過把「組織決定」與「個人意見」加以區別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中共對於文藝政策的新精神開始在黨的系統進行貫徹。作協理事會之後，中宣部緊接着在3月8至14日召開了各省市宣傳部文藝處長會議。會議在強調加強黨對文藝工作領導、努力發展和繁榮創作的基礎上，要求對「文藝幹部特別是黨員負責幹部中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向黨鬧獨立性和驕傲自滿等思想傾向」，「採取適當的方法展開必要的批評」，但又特別指出，「在文學藝術的體裁、題材和風格上應當容許作家、藝術家有充分的自由，應當在文學藝術各部門都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的方針」，「不要只提倡寫某種題材而排斥其他題材」，「有關藝術的理論性的問題和對具體作品的評價，應容許不同意

見的討論」。會議最後強調，「黨委和宣傳部應加以領導，指導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不要不適當地加以干涉和束縛」。[11]

其實，周揚的內心也是矛盾的。作為主管文藝工作的黨內負責人，他也不願把文藝界搞得死氣沉沉，也希望中國的文藝事業蒸蒸日上。也許，「百花齊放」這句口號毛澤東還是從周揚那裏聽到的。[12]據當時中宣部的工作人員回憶，有一次談及創作中有種種條條框框的清規戒律時，周揚說：不要搞的真如胡風所說的像中世紀一樣。3月5日聽取了劉少奇關於文藝工作的談話，「周揚、劉白羽回來後很興奮，立即向代表們作了傳達」。[13]一位接近他的人回憶說，作為建國以後幾次政治運動在文藝界的忠實執行者，他不得不維護這些運動的正確性，但「周揚內心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就很難說」。當時有人私下裏對周揚的議論是：「在政治上他是『左』的，藝術上持着公正的見解。」[14]無論如何，周揚當時真正的內心思想可能是具有兩面性的，但從實際表現上看，他那個時期的主導思想與多數人理解的「雙百」方針恐怕還有很大距離。

2 戲曲領域的「百花齊放」

文藝「百花齊放」的局面首先出現在戲曲領域，這大概與戲曲是民間群眾娛樂的重要形式不無關係。中國的戲曲傳統極為豐富，據新中國成立時的統計，全國共有舊戲和曲藝300種以上，城市職業藝人超過25萬人，私營戲曲劇團在1700個以上，上演着5萬個劇目。中共執政以後，隨着一次次政治運動的開展，加上在戲曲改革和劇目整理時，根據的是毛澤東提出的政治三原則（政治上有益，政治上有害，政治上無害），導致清規戒律名目繁多，禁演劇目愈來愈廣，一些古老劇種無以存續，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況。[15]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出現以後，民間劇團國營化的壓力很大，許多私營劇團和民間藝人的生存也成了問題。[16]

1956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對這種狀況都表示出不滿意。如3月8日劉少奇與文化部負責人的談話，重點就是關於戲曲工作。他講到影響戲曲發展的兩個問題，一是劇團要不要全部國營？一是如何進行戲曲改革。他明確表示不贊成劇團全部國營。他說：「幾千個劇團都國營，會搞掉積極性。這不是促進，而是促退。該搞合作社，而搞了國營，這就是『左』。」他提出「要讓民間職業劇團再搞它一個時期」。劉也不贊成戲曲改革急於求成。他說：「我們的方針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強。」「百花齊放，就允許並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戲改不要大改，有害則改，無害不改。

有些老戲很有教育意義，不要亂去改。」劉少奇還表示了認同戲曲的娛樂功能的看法，他說：「看了折子戲，能得到休息，使人高興，就很好。」[17]

毛澤東、周恩來也表達了要放寬戲曲政策的意向。3月22日，周觀看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長安》。散場後，同劇院負責人和主要演員座談。針對戲劇界正在爭論的能否反映陰暗面問題，周表態說：「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頌德的東西，暴露和批判陰暗面的東西也應該演一些。」「我們應該批判壞的、歌頌好的。」「主流是歌頌光明的正當的事物，副的方面是批判和暴露壞的。」[18]周的這個思想尤其反映在他對改編古裝崑劇《十五貫》的高度讚賞上。正當中共中央醞釀「雙百」方針時，浙江出了一個崑曲《十五貫》。《十五貫》的改編演出，「轟動上海，也轟動了北京」，出現了「滿城爭說《十五貫》」的盛況。[19]許多中央領導人都看了這齣戲，毛澤東和周恩來還連看兩場。4月19日觀看浙江省崑蘇劇團演出的《十五貫》後，周恩來到後台看望劇團演職人員，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你們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十五貫》有豐富的人民性和相當高的藝術性。」4月25日周再看《十五貫》。毛澤東也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兩次，同樣給予高度肯定。在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十五貫》應該到處演」。5月17日，文化部和中國戲劇家協會專門舉行崑曲《十五貫》座談會。周恩來出席座談會並發表講話。[20]

一齣改編的古裝戲為甚麼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怎麼會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如此讚賞？從周恩來的兩次講話中看出，《十五貫》對於貫徹「雙百」方針，具有兩方面的象徵意義：一是為戲曲界百花齊放「樹立了一個榜樣」；一是具有批評官僚主義的隱喻意義。同時，《十五貫》也為處在自生自滅狀態的地方古老劇種找到了一條生存之路。4月19日，周恩來在接見《十五貫》演職人員時說：「我們不但要歌頌勞動人民，揭露反動的統治階級，也需要像《十五貫》這樣的戲。不要以為只有描寫了勞動人民才有人民性。歷史上的統治階級中也有一些比較進步的人物。人民在那個環境中，沒有辦法擺脫困難，有時就把希望寄託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眼光去看歷史上的事情。」「我們有的官僚主義者比戲中的巡撫還嚴重，這巡撫是我們的鏡子。」「況鍾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這是符合於唯物主義思想的。」談到戲曲改革，周說：百花齊放「要因地制宜。有的劇種一時還不適應演現代戲的，可以先多演些古裝戲、歷史戲。不要以為只有演現代戲才是進步的。崑曲的一些保留劇目和曲牌不要輕易改動，不要急，凡適合於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後再改」。

5月17日，周在崑曲《十五貫》座談會上講話，讚揚江浙崑曲和廣

東粵劇在「奮鬥不息」中求得生存的精神，「崑曲是江南蘭花，粵劇是南國紅豆，都應受到重視」。他讚揚《十五貫》是改編古典劇本的成功典型，切合歷史主義的要求，有豐富的人民性，相當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強烈的民族風格。《十五貫》的演出復活了崑曲，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樹立了良好榜樣」。周再次強調，《十五貫》「一針見血地諷刺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是成功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現在不是個別的。現代戲還沒有一個能這樣深刻地批判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21]

因為有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明確態度，6月1至15日，文化部召開了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周揚、劉芝明、錢俊瑞等在會上作報告。會議的主旨是打破「清規戒律」，擴大和豐富傳統戲曲的上演劇目。劉芝明的主報告承認，目前劇目工作的主要問題是：上演劇目貧乏、單調、質量不高，基本原因是劇目工作中受了許多清規戒律的影響。會議選擇爭論較多的《寧武關》、《四郎探母》等六齣戲進行討論。與會者提出兩條要求：一是要求發掘、整理劇目中應根據各個劇種的特點發揮其特長，按照它自己的發展趨向來促進其發展。二是要求放寬劇目的限制。凡是能起積極教育作用，能鼓舞人們精神向上，或能給人以美感上的享受和愉快的劇目，都應加以肯定。[22]會後，各地進行了挖掘傳統戲曲劇目的工作。據統計，到翌年春，全國共挖掘出51867個劇目，記錄了14632個，整理了4723個，上演了1052個。[23]在1956年至1957年春的一段時間內，戲曲演出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寬鬆環境。有些地方甚至將《殺子報》、《大劈棺》等二十六個禁演劇目「全部開禁上演」，以致有些研究者幾十年後仍然認為有些過分。[24]

3 文藝界對教條主義現象的批評

對文藝創作中的公式化傾向和文藝批評中的粗暴、武斷和專橫風氣，作家們早已感到不滿和憤慨。1956年初，這種情緒藉着蘇聯「解凍文學」之風逐漸地表露出來。

斯大林逝世後，一批在30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作家得到「平反」和恢復名譽，尤其是1954年12月召開的蘇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對文藝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化和「虛假」作風的質疑。[25]自30年代以來，蘇聯文藝界發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會在中國文藝界產生反響。同樣，蘇聯興起的「解凍文學」思潮，為中國文藝界衝擊教條主義樊籬提供了一個契機。1956年1月21日，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小說組圍繞蘇聯的三部小說，主要是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展開了討論。[26]《文藝報》1956年第3號發表了討論會的發言。

作家馬烽、康濯、郭小川、劉白羽等人的發言一致承認，中國的文學創作存在迴避鬥爭、不敢干預現實生活、不能真實地描寫生活的缺點。馬烽說，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過尖銳的思想鬥爭刻畫人物的，我們的多數作品卻是通過與自然災害的鬥爭表現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認這「是一條繞開生活中尖銳矛盾的狹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觸了社會矛盾，但多半限於很小範圍，批評幹部至多寫到區一級。康濯說，與尼古拉耶娃的小說相比，「我們創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之一，正是粉飾生活和迴避鬥爭」。劉白羽也承認，我們的文學作品的突出問題是「沒有真實地、按照歷史的發展來寫我們的現實生活」。參加討論的都是「領導作家」，他們共同承認文學界不敢「寫真實」這樣一個現實，本身就表明文化界已經普遍地對文藝現狀不滿，儘管劉白羽等人仍然把責任主要歸咎於作家本身。[27]

2月間，《文藝報》刊登了蘇聯《共產黨人》雜誌1955年第18期發表的題為〈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的專論，這篇專論對斯大林時期的文藝思想提出了挑戰。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上，把文藝作品中的「典型」歸結為「黨性」，把「典型問題」歸結為「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專論點名批評說：這是「煩瑣哲學的、錯誤的觀點」，是「冒充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專論強調，藝術認識與反映現實有其特殊的形式和規律，把典型問題僅僅規定為一定社會力量、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的體現，就會脫離藝術創作的生動實踐，導致公式化；典型不能等同於黨性，典型不能完全歸結於政治，否則就會使人們以反歷史的態度對待文學藝術；不能企圖從任何一個典型中找到黨性立場的表現；不能無條件地誇張現實生活中的正面現象，並認為只有如此才能體現社會的本質，否則就會抹殺真實的現實。于風政認為，「這篇文章簡直就像為中國文藝界而寫，它的主要觀點乃至一些語言，竟同胡風如出一轍」。[28]

隨後，作協創作委員會理論批評組就召開會議對《共產黨人》專論和「典型問題」展開了討論。專論所批評的現象與中國存在的問題頗有雷同，很自然在中國文藝界引起共鳴。而專論發出的「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來揭穿內容貧乏的教條和公式」的號召，鼓舞了中國文藝界的批評勇氣。4、5月間，《文藝報》第8、9、10號先後發表了張光年、林默涵、鍾惦棐、黃藥眠、陳涌、巴人、王愚、李幼蘇的發言或文章。張光年集中抨擊了「本質論」，指出，中國的文藝界「流行着一些大同小異的更加簡單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質論」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藝批評造成的。張光年說，文藝要反映社會本質，但完全不同於哲學社會科學，放棄典型的個性化要求，鼓勵千篇一律的描寫，就使文藝作品變成了公式、規律的圖解和政治論文。陳涌則集中批判了庸俗

社會學。他說，庸俗社會學並不比唯心論好一些，「庸俗社會學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否認文藝的特殊的性質和任務」，「用一般的社會學的公式生吞活剝地代替文藝的具體生動的實踐的研究」，儘管它表面看來「很革命」，「能夠迷惑人」。陳涌明確反對「千篇一律」地要求文藝為具體的工作服務，認為文藝為政治服務，主要表現在為國家的根本政策服務，不能像要求一般的宣傳教育一樣要求文學藝術，文藝應該「喚起人們的美感」，「反映人們美的需要，美的理想」。陳涌還公開批評周揚等人曾經一直宣傳和堅持的「趕任務」、「寫政策」的做法。但是，也有許多人內心並不同意專論的觀點，只是沒有勇氣公開講出來。例如林默涵的文章就是一個典型，他認為，專論沒有推翻「典型是社會力量的本質表現」的說法，「而只是指出了這種說法的片面性」。同時，他還在文章中一再掩蓋和割斷專論的觀點與胡風思想之間的聯繫，以免人們借機否定對胡風的批判。會上還有人提出，學習專論要「防止胡風反動思想復辟」，因為「作為胡風的文學理論的基礎的階級還存在，所以胡風的論調也就有可能借屍還魂」。[29]可見，專論的發表一方面使很多文藝工作者活躍起來，積極開展了思想理論上的爭鳴，一方面使文藝界的領導層陷於被動，他們不得不跟上蘇聯的腳步，又小心翼翼地維護着自己的陣地。

「雙百」方針明確提出以後，文藝界的情形出現了重要變化，領導層的態度也開始轉向和日漸明朗。在中國作協的多次會議上，茅盾、周揚、老舍、馮雪峰、吳祖湘、臧克家、秦兆陽等紛紛發表意見，指出了近幾年來文藝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題材範圍狹窄、單調，創作風格不夠多樣化，文藝批評缺乏自由討論的風氣等。他們要求在藝術創作上和學術探討上提倡獨立思考，鼓勵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發展。[30]文藝工作者在各種討論會、座談會上，在各地各種文學或非文學刊物上，紛紛對種種教條主義的粗暴批評方式表示了不滿甚至於憤怒。他們把文學藝術的落後歸罪於這種「刀斧手」式批評家，指責這些批評家「頂着堂而皇之的名義，把本來無罪或罪不至死的作品判成死刑，務求把被批評者一棍子打死」。[31]前幾年受到批判的蕭也牧也發表文章，訴說對他的不公正對待。侯金鏡的文章則尖銳指出：教條主義傾向在過去幾年已經成為「有很大影響、發生了很大危害性的一種思想潮流」，其表現之一，「就是向簡單化、庸俗化的極端上去發展，和武斷、粗暴的批評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種專橫的批評風氣，在文壇上高視闊步，四處衝擊」。他批評說，「有的文章幹脆拋開對作品的分析，直截了當地對作者的立場宣布可怕的判決」。這種風氣在全國泛濫成災，致使作家「無所措手足」，「戰戰兢兢」，「如履薄冰」。[32]

7、8月間的討論，開始廣泛觸及文藝理論和文藝方針中的教條主

義，焦點是怎樣理解「文藝為政治服務」。在中國作協的一系列會議上都談到了這個問題，如馮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藝作品題材狹窄、風格單調，文藝評論缺少自由討論風氣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過去對於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以及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條主義和片面性，以致使文藝創作的發展受到了限制」。[33]作協武漢分會一些作家的意見更為鮮明，他們認為，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理解的片面性和簡單化，是產生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根源。這主要表現在「忽視文學的特殊功能，機械地強調文藝為中心任務服務」等方面。他們還指出，「由於片面地簡單地理解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作品寫社會重大題材，寫工農兵生活，片面要求作品的主人公只能是先進的工人或農民，只能寫他們的先進事跡，把他們的生活僅僅限制在勞動和生產活動的狹窄範圍，排斥其他的生活題材，甚至是工人農民勞動生產以外生活方面的題材。同時也片面簡單地要求作品的政治教育意義，而忽視文學反映生活的豐富複雜的內容」。[34]

9月以後，討論涉及的問題更加廣泛，諸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典型問題，形象思維問題，美學問題，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作品的真實性、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關係，歌頌與暴露的關係，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係，如何理解和貫徹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如何認識文藝的特徵、按藝術規律辦事，如何促進文藝作品的體裁、題材、風格、手法的多樣化，如何改進文藝工作的領導方式等問題，都提出來討論。其中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周勃的〈論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陳涌的〈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巴人的〈論人情〉、劉紹棠的〈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鍾惦棐的〈電影的鑼鼓〉等文章，引起了廣泛的反響。[35]

秦兆陽、周勃、陳涌的文章都是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其中秦兆陽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其尖銳之處在於對中共主流文藝理論的兩個基石都提出了質疑：一個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一個是毛澤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原則。此前人們只是批評對斯大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神聖化，而秦的文章則否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提法的必要性。文章認為，堅持現實主義的總原則就行了，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現實主義的道路應當是廣闊的。文章進而指出，中國文藝界特有的教條主義，是兩種「庸俗思想」相結合的產物：一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造成的庸俗思想，一是中國特有的庸俗思想，這「就是對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釋」，而這又「主要表現在文藝與政治的

關係的理解上」。他肯定文藝應當為政治服務，但是反對要求所有作家和文學形式都為當前的每一個政治任務服務，反對「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作某種概念的傳聲筒」。他認為，用藝術去圖解政治只會產生概念化的東西。劉紹棠和《探水者》文學月刊一批青年作家則提出，要「運用文學這一戰鬥武器，突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錢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對文學中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的闡發，從另一個角度對文學創作中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傾向提出了批評。他們指出，文藝的中心對象是「人是生活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會現實」。他們批評有些作者「為要使作品為階級鬥爭服務，表現出無產階級的『道理』，就是不通過普通人的『人情』」，或者認為作品「有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階級立場」，他們認為，「不通人情而能……實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會有的」。鍾惦棐的文章主要從故事片的不景氣提出問題，批評「以行政方式領導創作的方法」。[36]

1956年下半年，文藝界對庸俗化、公式化、概念化和標語口號化等教條主義現象的聲討此伏彼起，愈來愈激烈。茅盾以肯定的口吻說到這種局面：「文藝創作問題的討論，最近幾個月來相當活躍，活躍的特徵，在於出現了不同意見，在於企圖對那些已經被認為作了結論的問題進行新的探索。」「這種探索的精神是可貴的，這標誌了向前邁進一步的開始。」[37]反對庸俗化、公式化、概念化和標語口號化，成了這個時期知識分子追求個性化和獨創性，爭取獨立話語權心聲的一種曲折表達。

4 抨擊官僚主義對文學創作的干預

「雙百」方針不僅引發了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上的爭鳴，也召喚出文學創作的繁榮。一年之內，新辦的文藝刊物近二十種之多，包括有全國影響的《詩刊》、《收穫》、《劇本》、《文學研究》等，《文藝報》也改為大型周報。「雙百」方針使一大批來自「五四」新文學傳統下的老作家再次受到鼓舞。許多早已擱筆的跨時代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汪靜之、徐玉諾、饒孟侃、陳夢家、孫大雨、穆旦、梁宗岱等人又相繼發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門出版了（或計劃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選。[38]最能顯示「雙百」效應的，也許是出現了一批揭露和抨擊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作品。這批文學創作主要是由一批新生代作家來承擔的，如青年作家王蒙、劉賓雁、宗璞、李國文、陸文夫、叢維熙和青年詩人流沙河、邵燕祥、公劉等。他們大都是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年輕知識分子，繼承了兩種對現實的批判話語傳

統：一種是革命的理想主義的批判話語，另一種是「五四」啟蒙主義傳統的批判話語。[39]

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李國文的《改選》等小說，可以視作革命理想主義的批判話語。理想化的教育培養了他們理想化的目光，他們用這種目光看待革命成功之後的現實，發現它並不像過去人們所描繪的那樣美好。於是，從理想主義出發，反映人民內部的複雜矛盾，揭露和批判官僚主義及其他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消極現象，批評政治經濟體制上存在着的弊端，其價值取向不是否定這種理想，而是努力於美好理想的實現。邵燕祥、公劉等對現實的批判就更多一些知識分子的話語立場。《賈桂香》等作品中所批判的官僚主義已經不是革命熱情衰退或者滿足於上傳下達，而是他們身上的封建觀念對人的幸福生活的破壞。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諷刺和象徵的詩歌形式，體現了同樣的現實批判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陸文夫的《小巷深處》、宗璞的《紅豆》等則涉及了社會主義文學不敢輕易描寫的愛情生活題材，揭示了人物豐富的情感世界。[40]

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在文壇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的一部作品。小說最初發表於《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發表時編輯部對其有所改動。[41]王蒙時年二十二歲，是具有八年黨齡的「少年布爾什維克」，北京共青團市委幹部。左翼文化是王蒙的基本思想傾向，但他對現實生活有敏銳的感覺，對剛剛展現魅力的新社會投出懷疑的目光。小說講述了一個對新中國和革命事業抱着單純而真誠的信仰的青年林震，來到中共北京市某區委會組織部工作後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劃了劉世吾、韓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義和蛻化變質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時，小說又企圖通過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林震的形象，展示出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這篇小說是王蒙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積極干預生活的一個嘗試。多年之後作者本人回顧說：「1956年『雙百』方針剛剛提出時便立見成效。那時候很快就出現了新的各種各樣的作品和新的藝術探索。我自己也是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創作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當時這個勇氣是被『雙百』方針鼓勵起來的。因為它為文學藝術家們創造了一種輕鬆自由的氣氛，它鼓勵了人們進行批評的勇氣。」[42]小說發表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從1956年12月起，《文藝學習》編輯部先後收到有關稿件1300多篇，編輯部連續四期發了二十五篇，《人民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延河》雜誌也先後發表討論文章。主要聲音是否定王蒙的，只有思想傾向一致的劉紹棠、邵燕祥、叢維熙、鄧友梅、劉賓雁、唐摯、王愚等人支持王蒙。[43]起初，討論大體還在學術範圍內，接下來的批評就「上綱上線」了。

1957年1月29日，中國作協黨組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王蒙這篇小說。據郭小川保留的記錄稿：對王蒙的小說，「最初，歌頌佔80%。現在，中間大，兩頭小」，歌頌者主要是大學生和青年作家。與會者中，侯金鏡、張光年對作品有肯定有批評，而林默涵、艾青、張天翼、康濯等人則基本上持否定態度。[44]在公開的批評中，李希凡、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說：「在典型環境的描寫上，由於作者過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經心地以我們現實中某些落後現象，堆積成影響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環境，而歪曲了社會現實的真實。」[45]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馬寒冰撰文認為，這是「一部不真實的作品」，是從「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這一文學範疇出發的。馬認為像小說描寫的這樣的區委會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這樣的區委會。[46]馬的出發點是為中共組織辯護，不承認中共內部特別是北京市存在這種官僚主義，即使有也不能寫成小說。這些批評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這一次毛站在王蒙一邊。他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批評共產黨工作中的缺點，部隊幾位同志就『圍剿』，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麼就沒有官僚主義」。[47]王蒙在當時是第一個受到毛澤東保護的人，「因此使許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都為之歡欣鼓舞」。[48]

[1]黎之：《文壇風雲錄》，頁44；李之璉：〈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載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4—5。

[2]關於蘇聯解凍文學興起的情況，可參見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八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89—109。

[3]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2月28日、3月3—7日、3月25日。

[4]《人民日報》，1956年3月25日。

[5]《人民日報》，1956年3月25、31日。

[6]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3月25日、31日；于風政：《改造》，頁446—448。

[7]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3月25日。為了動員和組織文學新軍，3月15日，作家協會主席團和團中央聯合召開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480多名青年文學創作者參加會議。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周恩來接見了全體青年作者。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分別作報告，許多老作家與會給以熱情輔導。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3月16日。

[8]黎之說：「就我的印象劉少奇很少對文學工作發表意見。」參見黎之：《文壇風雲錄》，頁51。

[9]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86—188。

[10]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189—193；《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62—363。

[11]《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頁1156—1161。

[12]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講到「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時說，「『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座中有人說：「是周揚提出來的」。參見《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頁20。

[13]黎之：〈回憶與思考〉，《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4期，頁106—107。

[14]潔泯：〈心曲萬千憶周揚〉，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256。

[15]《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頁147—149；周巍峙：〈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一位創始人〉，載《憶周揚》，頁121、125、143。

[16]《內部參考》，1956年1月20日，頁18—22；《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62。

[17]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189—193。

[1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0。

[19]《人民日報》，1956年5月18日。

[20]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92—199；《毛澤東傳（1949—1976）》，頁489—490。

[21]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92—199。

[22]《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頁1443。

[23]劉有寬：〈周揚對戲曲改革的貢獻〉，載《憶周揚》，頁344—345。

[24]如有人認為：有些地方「借『大膽放手，開放傳統劇目』之名，一股風地亂放劇目，好戲壞戲同上台，有的甚至將一些早已被拋棄、被禁演的宣揚封建迷信、兇殺恐怖、淫亂色情的壞戲如《殺子報》、《大劈棺》等二十六個劇目全部開禁上演。」參見陳其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頁28—29。

[25]有關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情況，可參見蕭洛霍夫在會上的講話（1954年12月21日）和謝皮洛夫給赫魯曉夫的報告（1954年12月22日），ЦХСД, Ф.5, оп.30, д.84, Л.78-91, 94, Источник, 1997, No.5, c.57-63。1955年1月14日的《人民日報》轉登了《真理報》為這次會議所發表的社論。

[26]蘇聯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描寫了一批響應黨的號召從城市到農村的青年人與官僚主義所進行的思想鬥爭。這部小說反映了蘇聯剛剛興起的以「干預生活」為中心的文藝思想。這在深受「無衝突論」、寫「理想」的英雄人物、寫本質等教條束縛之苦的中國文藝界引起了共鳴。參見于風政：《改造》，頁443。

[27]《文藝報》，1956年第3號，參見于風政：《改造》，頁443—444。

[28]于風政：《改造》，頁448—449。于著說，1956年2月的《人民日報》和《文藝報》都刊登了蘇聯的專論，但筆者查閱當年的《人民日報》時，並沒有發現這篇專論。不過，如果只是《文藝報》刊登了專論，那麼它在中國文藝界引起的波瀾，就更能說明下面指出的情況：不同人有不同的心態。

[29]于政風：《改造》，頁449—453。

[30]《中國當代文學史》，頁24。

[31]《文藝報》，1956年第19號。

[32]《文藝報》，1956年第18號。此時，陳企霞已經受到批判，而他批評《腹地》的文章發表在1950年。看來，侯金鏡等人選擇批評對象是有所考慮的，儘管陳的文章的確是開了「戰鬥性和尖銳批評」的風氣之先。

[33]見《文藝報》，1956年第14號。

[34]《長江文藝》，1956年9月號，頁7。

[35]參見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93—94。

[36]參見《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頁94—95。

[37]《人民文學》，1957年第5、6月號。

[38]《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頁93。

[39]參見李新宇：〈「早春天氣」裏的突圍之夢——五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知識分子話語〉，《黃河》，1998年第5期，頁143—144。

[40]《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頁94。

[41]小說原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經編輯部修改後發表時改名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參見郭鐵成：〈應尊重文學史的基本史實——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文藝爭鳴·評論》，2005年第4期，頁95—98。

[42]葦黎明：〈王蒙表示喜歡「雙百」希望文藝批評正常化〉，《新華文摘》，1986年第7期，頁156。

[43]謝泳：〈重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南方文壇》，2002年第6期，頁33。

[44]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十一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324—328。

[45]《新華半月刊》，1957年7月號，頁145。

[46]轉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12—13。

[47]黎之：《文壇風雲錄》，頁75。

[48]韋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百年潮》，1998年第2期，頁32。

四 民主黨派的春天

到1956年為止，中國的民主黨派保留了八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在中共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民主黨派與中共曾有過密切的合作關係。[1]中共掌握國家政權後，這些黨派是否還會長期存在？如何存在？在建國前後的一段時間內的確是徘徊在毛澤東腦子裏的一個問題。

1 民主黨派還需要存在嗎？

關於中共奪取政權前夕是否提出過在未來的政府中排除民主黨派的問題，由於俄國檔案的公布而引出了一樁「謎案」。俄國《遠東問題》雜誌1995年第2、3期刊登了中國學專家列多夫斯基（Ledovskii）的一篇文章〈米高揚秘密出使中國（1949年1—2月）〉，該文附錄了米高揚1960年9月22日向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交的關於這次使命的報告全文及詳細引文。米高揚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在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的電報中講到：「在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時期，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將應當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從而將極大地鞏固和加強中國革命。」在說明蘇共中央不同意這個觀點時，報告引述了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電中的答覆：

> 我們不同意這一看法。我們認為，中國所有的反對派政黨代表了中國民眾的中間階層，並反對國民黨集團，他們還將長期存在，並且中國共產黨要掌握領導權，也就是領導地位，就不得不吸收他們參與合作，共同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也許，有必要吸收這些黨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將政府本身宣布為聯合政府，以便最大限度地擴大這個政府在民眾中的基礎，並孤立帝國主義者及其國民黨走狗。

米高揚的結論是：「眾所周知，因為這一建議，中國共產黨改變了自己對待資產階級黨派的政策」。[2]

對米高揚報告中關於建國前夕中共對資產階級黨派立場的說法，許多中國學者不以為然。由於米高揚的說法與中共當時的實際做法以及中共在黨內文件中表述的對待資產階級黨派的立場完全不同，因此有人撰文對此提出質疑，甚至直接否認俄國檔案的真實性。[3]此後不久，列多

夫斯基將他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發現的這些電報的原文全文發表在《遠東問題》雜誌上。檔案原件證實米高揚報告並非虛言，就中共對民主黨派的立場而言，檔案全文與米高揚報告相比，還有兩處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毛澤東在去電中談到了讓民主黨派從政治舞台上消失的理由：「我們對待這類人的策略是對他們不抱很大希望，不指望利用他們為革命做事」；「隨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中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不存在了」；「在民主同盟的成員中有一些是同情我黨的，雖然其大多數領導人是動搖分子。他們在國民黨的壓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證明了中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中小資產階級認為「中國將會形成兩權鼎立的格局，那時，中國共產黨將統治中國的北部，而國民黨將統治中國的南部」，因此他們鼓吹「第三條道路」。第二，在斯大林的覆電中提到了毛澤東1948年3月15日的另一封電報，在這封電報中，毛澤東提到將「建立中國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政府」，對此，斯大林認為「是完全正確的」。[4]

綜合上述史料，關於俄國檔案真實性的問題已不復存在。但中共當時採取的立場的確不是要取消除共產黨外的其他一切黨派，而事實也不像米高揚所說，中共是在斯大林的建議下才改變對其他政黨的政策的。所以，這裏的矛盾並沒有因俄國檔案原件的公布而得以解決，也就是說：既然中共的立場是容許資產階級民主黨派長期存在，為甚麼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表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立場？這裏的關鍵問題在於，毛澤東並不反對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也沒有放棄聯合政府的主張，但他所追求的長期合作和聯合政府都只是一種形式，而核心內容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對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馬貴凡的解釋很有道理。他認為那時毛澤東考慮新中國實行一黨制是很自然的事情，理由有三：第一，1947年10月民主同盟的解散和中間黨派的消失，使毛澤東看到了在統一戰線的形式下實行一黨制的可能性；第二，毛澤東很欣賞南斯拉夫模式，即共產黨通過民族解放陣線實行幕後的一黨專政；第三，毛澤東所堅持的聯合政府的內涵有所變化，即他所強調的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5]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在毛澤東看來，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而新中國需要建立的正是這種制度。在1947年11月30日的電報中，毛澤東講的是問題的實質，而在1948年3月15日的電報中，毛澤東講的是問題的形式，斯大林大概是沒有理解這一點。

無論如何，毛澤東並沒有把民主黨派趕下政治舞台。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共把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大量納入新政權，組建了一個「聯合政府」。1949年9月第一屆中央政府成立時，民主黨派的任職在六個副主席中有三人（佔50%），五十六個政府委員中有二十三人（佔

40%），四個政務院副總理中有一人（25%），十五個政務委員中有九人（佔60%），三十個部委首長中有十一人（佔37%）。[6]就政府組成看，共產黨頗有一股招賢納士，廣攬人才的氣勢，周恩來甚至親自出面，請黃炎培等人士出山。[7]

對於組織這樣的聯合政府，中共內心是如何考慮的呢？1949年10月25日劉少奇對蘇聯大使羅申的解釋是：不久前成立的聯合政府使各民主黨派很滿意。中國共產黨佔據了這個政府中所有的領導崗位，可以很容易地監督各民主黨派的活動。說實在話，所有這些政黨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政黨，因為所有這些政黨在全中國的黨員總數只有三萬人，而中國共產黨有一百多萬黨員。但是，由於這些民主黨派的大多數代表着中國的資產階級，而政府又有意創造了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種種條件，中國共產黨估計，將來這些黨派會有一定程度的活躍。中國共產黨預計中國的聯合政府時期會持續十至十五年，十至十五年後，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就沒有了。[8]11月15日周恩來也對羅申談到：中國共產黨人擔當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擔，但參加政府的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也在積極地工作。如司法部長史良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還有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傅作義。但是也有一部分進入政府的所謂的「民主領袖」，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員。如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濟深和張瀾這樣的人物，還有像羅隆基這樣的「民主領袖」中的極右分子，暫時還受到我們的信任。周恩來強調，作為整體，進入聯合政府的各民主黨派，都能真誠地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因為所有這些黨都毫無保留地接受共同的統一戰線綱領，承認中共的領導，贊成國家的基本政治路線——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9]不久，劉少奇又談到：「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實質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因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加入民主黨派的代表同西歐的資產階級完全不同，中國的民主黨派同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也完全不同，所以中共應該同他們「實行真正的合作」，這種合作「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從時間上看，是個長期的問題」。[10]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會議也談到，「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現在我們需要採取這個策略」。[11]

這裏的邏輯是清楚的：中國的民主黨派擁護共產黨，而中國的發展又需要各民主黨派的幫助，因此與他們的真誠的團結合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既然民主黨派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社會主義的發展必然消滅資產階級，所以這種合作只能是策略的、暫時的。所謂「長期的問題」，不過十至十五年，也就是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結束。在此之前，中國不僅需要與民主黨派的合作，還需要從組織上幫助他們發展。中共確實是這樣做的。1950年底，登記的各民主黨派成員總計不到13000人。1951年1月，中共召開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專門討論

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問題。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說：去年說要鞏固，今年說要發展。中國人口四萬萬七千五百萬，所有民主黨派不到二萬人，今年發展一倍也不過四萬人，並不算多。就在這次統戰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協助各民主黨派發展黨員的建議〉，要求各大中城市在1951年協助民主黨派發展成員一至兩倍。到1953年初，民主黨派在國內黨員的總數為32000餘人，比1950年底翻了一番多。[12]不過，在這一過程中，中共的做法多少有些顯得過分「熱情」。如在組織發展上「幫助它們定計劃、開名單，並且代為進行動員和說服等」，甚至「參與它們內部的人事安排，幫助它們處理它們內部難於處理糾紛，幫助它們修改政治性的文件等」。[13]給人的感覺，建國後的民主黨派似乎是在共產黨的卵翼下發展起來的。[14]

相當一批中共幹部都有一種跟着毛澤東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在他們看來，老子打下的江山為甚麼要讓給別人坐？看到民主人士在政府擔任要職心裏不舒服，說甚麼「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15]這樣，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以後，中共黨內再次有人提出民主黨派是否要存在下去的問題。在1953年6至7月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指出，黨內出現了想利用普選的機會來排斥民主黨派的「錯誤傾向」，以至他不得不在會上明確宣布：「我們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導到社會主義。」[16]劉少奇的理由是，在中國的條件下，統一戰線的工作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的不可缺少的形式。如果要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就必須對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和政治代表進行團結、教育、改造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就必須通過統一戰線，即通過民主黨派去做。[17]於是，進入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後，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權機構中仍應佔有一席之地。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選出十三位副委員長，其中有民主人士八位，他們是：宋慶齡、李濟深、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福鼎。在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十一人，沒有民主人士，國務院部委首長三十六人，有十三位民主人士（佔36%）。[18]一屆人大以後，政協繼續被保留下來。1954年12月19日，毛澤東召集參加政協會議的部分黨內外人士座談，專門談到政協存在的理由及其性質。他說，有了人大，並不妨礙成立政協。政協不能搞成國家機關，但也不僅是人民團體，而且是「各黨派的協商機關，是黨派性的機關」。因此，在全國政協委員選舉時，有意識地安排少選中共黨員，使非中共人士當選409人，佔總數的73%。[19]除了全國政協外，各省、市及部分縣也分別成立了政協地方委員會。到1956年初，全國設立了358個地方委員會，其中屬於省、自治區和五十萬人口以上的市的有52個，

屬於縣（市）和市區的有306個，擬陸續設立的縣（市）級地方委員會將有二百幾十個。[20]與建國之初相比，民主黨派在政府中的份量大大減少，主要的位置都在人大和政協。這就是說，至少從表面形式上看，此時的民主黨派已經開始偏離權力中心。

如果說過渡時期中共的政策目標是要把民主黨派「引導到社會主義」，那麼進入社會主義以後，民主黨派又將何去何從呢？在中共的觀念中，「民主黨派的大多數代表着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實質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按照這個邏輯，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完成了，資產階級不存在了，民主黨派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是由於這種理念，在三大改造高潮當中，中共黨內對民主黨派的懷疑和抵觸情緒就開始出現，並不斷上升。據李維漢回憶，黨內不少人認為民主黨派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終結，「民主黨派可有可無，壽命不長了，最多不過維持三、五年也就完了」，統一戰線的工作應以鬥爭為主，「少統多戰」。因此，在工作上對民主黨派實行消極防範和控制代替，不敢放手讓他們獨立地開展活動，只喜歡同他們中的進步分子來往，不願同中間和落後的人接觸。特別是肅反運動開始以後，有些地方甚至企圖借機排斥本單位的民主黨派組織和民主人士。[21]民主黨派內部也有不少人感到自己可有可無。在1955年1月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民主黨派人士反映：「宣傳總路線以後，民主黨派成員中對民主黨派產生可有可無的思想。憲法公布後，雖有改變，但尚未完全解決。」上海有民主人士說：「民主黨派工作幹部認為自己好似錫箔店中做夥計，明知無前途，只好幹。」[22]

此時，中共領導人正在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掀起經濟建設的高潮。對於民主黨派，中共中央認為，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我黨必須動員一切積極因素」。民主黨派過去做了不少工作，現在又積極擁護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民主黨派「還應當同我黨一起繼續存在下去，並且繼續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23]作為統戰部長，李維漢考慮的更多，他甚至設想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的」政黨。1956年在1月25日中央統戰部在給中央的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應當肯定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黨派」，這些民主黨派今後可以根據可能和需要發展他們的組織。毛澤東閱後批示鄧小平：「覺得可用，請酌辦。」[24]1月28日，李維漢又把他主持起草的〈1956—1962年統一戰線工作方針（草案）〉（簡稱〈七年方針〉）報送中央。送審稿再次提出，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已經成了「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團體」。但這次周恩來提出了異議，他認為「這些提法不妥」。中央統戰部隨即取消了這種提法。[25]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央統戰部主持召開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2月28日，李維漢就統一戰線工作方針發表講話。會議通過的〈1956年到1962年統一戰線工作方針〉和〈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關於幫助民主黨派工作的意見〉等文件，這兩個文件由中共中央批轉全黨。[26]

這次會議關於民主黨派的政策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為民主黨派的政治角色重新定位。文件指出，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發展，使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使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政治立場和社會地位都「已經起了根本變化」，因此要求在統戰工作方針上有新的提法。儘管沒有再用「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的提法，但文件還是明確指出「各民主黨派已經基本上成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團體」。會議還着重批評了統一戰線工作存在着「關門傾向」和「右傾保守傾向」，這種傾向表現為對民主黨派和民主黨派人士發生的很大變化估計不足，沒有給以應有的信任。

第二，把教育工作提到「中心工作」的位置。中共領導人認為統一戰線內部仍將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但是今後這種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有可能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來處理，提出在統一戰線中把思想教育作為「中心工作」。從強調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鬥爭轉到以教育為中心，這可以看作中共統戰方針的重要改變，它直接來源於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提出的「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想法。為了落實以教育為中心的精神，中共中央決定，仿照中共高級黨校的辦法，設立社會主義學院作為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高級黨校」。[27]

3月27日，社會主義學院以全國政協常委會名義決定成立，毛澤東親自為學院命名。社會主義學院吸收和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職務或級別相當的民主人士（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入學，每期定為一年。[28]

3月2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宣傳部聯合制定下發〈關於幫助民主人士、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政治學習和理論學習的辦法〉。全國各地普遍舉辦了政治學校和工商界講習班，在全國政協和各級政協成立學習委員會，在中共各級黨委指導下，組織系統學習三門課程：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知識、企業改革的基本知識和當前重要的時事政策。目標是要使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資本家在思想上「實現『破資本主義，立社會主義』的變革」。[29]

看來，在李維漢的思想裏，也許仍然包含着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的長遠設想。

第三，有條件地支持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從1953年下半年起，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興起以後，各民主黨派在組織上就「很少發展甚至

沒有發展」。[30]到1955年，各民主黨派成員比1952年只增加幾千人，總數為39000人。[31]各民主黨派對這種狀況不滿，都有發展組織的要求。據李維漢說：「這成了他們的一個共同性的要求，不是少數上層人物的希望。他們的會員代表和地方組織都提出意見，我們要替國家作一點事，我們要有一點本錢，要增加一點本錢。」對此，李維漢的態度是：「應該贊成他們，讓他們去發展。」統戰部的文件則說：「各民主黨派有可能發展黨員的，應該加以贊助。」發展的重點是在大中城市「注意吸收一批中間的和比較落後的中上層分子，特別是散在社會上的舊中上層分子」。同時又提出，在民主黨派成員和民主人士中吸收進步分子加入共產黨，「以便從民主黨派內部密切黨與非黨的關係」。[32]

第四，要讓民主黨派人士有事可做。發揮政協、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作用，有計劃地進行政治協商工作，吸收民主人士參加和協助調整內部關係，共同組織政治學習，經過它們加強聯繫和教育散在社會上的數量不少的舊中上層分子，要求中共基層組織爭取民主黨派成員成為自己的助手，等等。

可見，李維漢主導的這次會議，其意義在於明確在社會主義高潮出現以後民主黨派為甚麼繼續存在下去，以及如何幫助民主黨派存在下去。至於「互相監督」，特別是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的思想，當時還沒有十分明確。從文獻中還可看出，李維漢的發言同中央最後認可的文件之間是有差別的。李維漢提出，必須承認民主黨派的組織獨立性。他認為，要使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不能靠下命令，而只能通過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與民主黨派平等協商的方式實現，同時必須尊重他們的組織獨立性和自己決定自己問題的權利。他說，及時掌握民主黨派的動態在政治上是需要的，但掌握的方式，不能靠少數人打聽小道消息，而是通過同民主人士交朋友。他說，對民主黨派的重大問題我們要過問、要研究，必要時要提出建議，但次要的問題他們可以有不同的處理辦法。[33]

李維漢並不是要放棄中共對民主黨派政治動態的控制，他只是認為這種政治掌控的方式應該改善。即使如此，這些內容也沒有在中央文件中得到體現。

2 民主黨派可以監督共產黨嗎？

關於民主黨派可以在中國長期存在的問題，毛澤東有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法。1956年4月19日聽取二五計劃匯報時，毛澤東提出了「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監督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34]在4月25日關於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提到「兩個萬歲」的思想。毛澤東解釋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35]儘管在中下層幹部中還存在不少疑問，但在中共高層決策圈，允許民主黨派長期存在已經達成共識。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在解釋「長期共存」的理由時，提出了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問題。[36]

以往說到允許民主黨派繼續存在的原因時，主要是從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角度考慮的。首先是要利用社會人才和賢能。各民主黨派的成員中包括一大批擁有現代科學技術的專家學者和企業的經營管理人才，據1955年統計，全國教授、副教授7499人，其中民主黨派成員2110人，佔28%，在全國高等學校正副校長、系主任以上的領導人員中，民主黨派成員佔三分之一左右。[37]其次，民主黨派成員具有各種社會影響，尤其在民族資產階級和各界知識分子中有着廣泛的聯繫。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民主黨派的中介作用不可替代，如中共中央知識分子會議的籌備，民盟就起了重要作用。最後，重視民主黨派目的還在於擴大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在實現這個目標中，不僅希望它們聯繫進步分子，更寄望於民主黨派在「社會落後層」的影響力，包括資產階級中的非「核心分子」，仍然存在有資產階級觀點「甚至在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以及包括從清代、北洋政府和國民黨舊軍政人員等「散在社會上的舊中上層分子」，希望民主黨派在對這一「社會落後層」的教育轉變中發揮其特有的作用。[38]

現在毛澤東的提法有了很大進步，就是強調民主黨派對執政黨的諮詢價值和對官僚主義作風的監督作用。這個想法顯然與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及蘇聯缺乏民主生活的教訓有關。在4月25日「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毛澤東特意提到：「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毛澤東是從「反對派」（或曰「在野」黨）的角度提出問題的，他說：

> 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雲、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
>
> ……
>
> 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雖然都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在「把革命進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對於鎮壓反革命，他們一直到現在還有意

見。他們說《共同纲領》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但是憲法起草出來了，他們又全都舉手贊成。……他們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常常由反對走到不反對。[39]

5月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時，甚至把問題提到政黨體制的高度。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缺點，就是單一政黨體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聽到不同意見，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陰暗面。「中央集權的政府，權太多了，很容易養成官僚主義，要時常警惕」。「一個黨，就是一鼻孔出氣，呼吸就不舒適，會使思想僵化，社會發展停滯起來」。周恩來還說：「在我們國家，民主黨派聯繫資產階級和上層知識分子，能聽到共產黨聽不到的意見，求大同，存小異，保持這個作用，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都有利。」[40]5月8日，周恩來接見新西蘭前工黨議員威爾遜時說：我們的各個黨派要繼續長期存在，我國各個政黨在憲法的原則上是相同的，但對許多問題的意見並不相同。沒有不同意見，沒有矛盾，就不能進步。我們要發現矛盾，解決矛盾，不斷進步。幾個黨互相監督，這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好處的。[41]

6月25日，李維漢在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作〈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言。在這篇事先經毛澤東、鄧小平審閱並同意的發言中，明確地把毛澤東關於「兩個萬歲」的思想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李維漢宣布：「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同存在，互相監督，首先是對共產黨起監督作用，是一個重大的方針。」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是共產黨的一條「固定不移」和「永遠不變」的原則。李維漢再次強調了尊重民主黨派政治自由和獨立性的問題。他說：「必須嚴格地尊重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在憲法賦予的權利義務範圍內的政治自由和組織獨立性，任何黨派和團體對其他黨派和團體的這種自由和獨立都沒有權利加以干涉。」[42]

在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會議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正式寫進了中共的決議。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也進一步明確了民主黨派的社會地位，他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成員將變成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的一部分，各民主黨派就將變成這部分勞動者的政黨」。關於「互相監督」的意義，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這些黨外的民主人士，能夠對於我們黨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能夠發現我們工作中的一些我們所沒有發現的錯誤和缺點，能夠對於我們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幫助。」「我們的任務就是繼續擴大同黨外人士的合作，使他們在我們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和在國家各方面的事務中，發生更大的作用。」李維漢的發言則具體地提出：「必須創造一切必要的條件，以便利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

人士對我們進行監督。」這些條件包括：組織定期的和不定期的視察；在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其他國家機關的會議上充分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各機關內部的共產黨組織同民主黨派組織和民主人士之間、各有關機關同有關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團體之間，進行座談和協商等，這些做法「應當形成制度」。[43]

不過，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中有一段話值得注意。他在談到「為了同官僚主義作有效的鬥爭」時，列舉了「加強對於國家工作的監督」的各個方面，其中包括黨（當然指共產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和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機關的監督，各級政府機關內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監督，以及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的監督。這裏沒有提到民主黨派。[44]當時正值共產黨大力提倡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具有綱領性的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卻閉口不談民主黨派對國家工作的監督，恐怕不是一時的疏忽。對此，民主黨派是有所察覺的。

3 民主黨派的響應和政治訴求

為了改進黨同非黨人士的關係，中共統戰系統從1956年3月開始，對黨與非黨人士的關係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長達一年時間的檢查。3月到5月，中央統戰部和全國政協秘書處黨組首先進行內部檢查，隨後發動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視察和檢查統戰工作，召開各種座談，聽取意見。5月21日，中央統戰部發出文件，要求全國各級統戰部門組織和推動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檢查統戰工作，「揭發和批評」統戰工作部門的缺點和毛病。在這一階段的檢查中，黨外人士提出意見最多的是，民主人士「坐冷板凳」和「不受尊重」之類的問題。諸如他們提出，雖然得到安排，不少人卻無事可做，或有職無權；統戰部門同進步分子聯繫多，同中間、落後分子接觸少，有時偏聽偏信，助長了宗派主義傾向；不尊重不同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以多數壓少數，堵塞言路；以領導者自居，只教育別人而不注意向黨外人士學習；同民主黨派進行民主協商少，尊重組織獨立性差，等等。這些意見主要涉及的是在具體工作中，中共幹部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關係問題，並沒有涉及民主黨派作為政黨同共產黨的關係問題。李維漢在6月全國人大的發言，也着重地批評中共黨內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作風」問題，強調要正確處理機關、學校和企業內部共產黨員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關係。[45]至於「互相監督」，特別是民主黨派如何對共產黨進行監督，尚未提出具體的辦法。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提出不久，全國政協即舉行工作會議，研究如何根據這個方針開展工作。會議建議常務委員會增加會議次

數，充實會議內容，除進行政治協商外，可以聽取國家有關部門、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本會各單位的工作報告。會議還決定設立地方工作委員會，以加強對地方政協工作的調查研究和經驗推廣。[46]全國統戰系統進行了第二階段的檢查工作，7月和10月，中央統戰部召開了兩次民主黨派高層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各省市中共統戰部也相應召開座談會，民革、民盟、民進、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民建、台盟等各民主黨派中央及其地方組織分別召開座談會，交換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意見。主要媒體加強了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宣傳，僅《人民日報》就先後發表了聶國青、陳其瑗、魯直、趙子懋、邵力子、熊克武、鄧初民、沈志遠、寧武等多位民主黨派人士的文章。[47]大多數民主人士對這一方針的公布「感到興奮」，「極為感動」，認為這將帶來「思想上的大解放」，是「民主黨派新生命的開始」。中共提出這一方針，「對民主黨派是一種榮譽，同時也加強了民主黨派的責任」。[48]在紛紛表示衷心擁護和堅決支持外，也有人提出了究竟如何實行監督的問題。如民進中央委員巫寶三說：貫徹這一方針，不僅要使這一方針被各方面認識，而且還要有具體措施，在中央和地方有政協和人民代表大會，便於交換意見，在各個單位也應有相當的組織形式或訂立一定的制度，保證互相監督經常進行。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儲安平說：怎樣來進行監督會更有效果？是否要用制度來保證？他希望有關方面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49]

也有人對中共的統戰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這主要是在統戰部7月和10月兩次座談會上以章乃器、章伯鈞為代表的發言。這些發言「廣泛涉及黨的領導、國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問題」。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有些人顧慮在黨內不能貫徹到底，有些人則認為只是一種宣傳策略，用以安定民主黨派的人心而已。關於對中共的監督問題，章伯鈞等人提出：第一，監督應有法律的保障，民主黨派對政府部門應有質詢權。第二，民主黨派可以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立類似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黨團」，每個黨派的「議會黨團」有權單獨向中外記者發表主張。第三，政府部門和政協對民主黨派提出的批評建議，應認真處理，不得敷衍應付。關於民主黨派的發展方針問題，章乃器批評統戰部1952年提出以「中小為基礎」的建議是團結中小資本家，排斥、打擊大資本家，是製造階級鬥爭。對過去達成協議的各民主黨派重點分工範圍，章伯鈞一再表示不滿，主張要打破「防區制」、「包幹制」。關於中共與資產階級的關係，章乃器尖銳批評統戰部有階級鬥爭簡單化、統戰工作庸俗化的傾向，指責部分黨員、進步分子懷疑和歪曲黨的和平改造方針，使工商業者受到無情打擊，並主張重新審查「三反」、「五反」的案件。關於黨與非黨的關係，羅隆基、章乃器等人提出，共產黨

員和非黨員不平等，黨外人士怕中共黨員，見到中共黨員唯唯諾諾，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座談中，普遍反映黨外人士有職無權，章乃器說他當糧食部長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不少人對某些黨員幹部驕傲自滿、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十分不滿，有的甚至說：「現在官氣之重，比國民黨還甚。」關於政協工作，有些人則感到安排政協委員只是政治待遇，平時無事可做，「政協成了座談的組織、舉手的機構」。章伯鈞主張中國應實行兩院制，使政協變成建議、監督、審核的機關，相當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上議院。他還提議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成立政治討論會，定期討論國家大事，向黨和政府提出政策方針的建議。[50]

顯然，這些意見，特別是章伯鈞的主張，已經超出了對共產黨監督的問題。所謂建立「兩院制」、「議會黨團」、「政治討論會」的建議和「質詢權」的要求，頗有引進西方「議會民主」的味道。看起來，至少章伯鈞本人對民主黨派在國家事務中只是充當政治陪襯的角色是極為不滿的。他的女兒章詒和回憶說：「1949年後的民主黨派應該做甚麼？這是新政權下民主人士思考議論的一個重要話題。」章伯鈞「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討論會上就主張政治監督，堅決反對把政治學習和教育改造作為民盟工作的重心。他說：『那樣的話，我們民盟就要變成教條主義者』」。[51]羅隆基在反右派運動時向民盟中央作交代說：「在中共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後，章伯鈞對我說，現在我們民主黨派大有可為。可以大做特做。」[52]章伯鈞可謂先行者，這些主張給李維漢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三十年後寫回憶錄時，他仍然認為當時民主黨派「有些人表露出向我們爭取更多政治權利的傾向」。不過，儘管李維漢對此是有所考慮，章伯鈞急於參與政治和政權的主張在統戰座談會上並沒有引起反響，「高級民主人士反映冷淡」，在當時也沒有造成甚麼影響。[53]

4 主動請民主黨派辦報紙

毛澤東特別重視報紙的作用，他認為報紙是一種「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是「反映和指導政治經濟工作的一種武器」。[54]所以，在推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和「互相監督」的方針時，毛澤東不但着手《人民日報》的改革，還考慮把《光明日報》、《文匯報》、《大公報》交還民主黨派主辦，通過這些報紙來推動中國擴大民主的進程。

1956年6月的一天，李維漢把章伯鈞、羅隆基、王芸生等人請到中央統戰部開會，告訴他們：中共中央打算重新考慮「大公」、「光明」、「文匯」三報的歸屬問題，請他們就三報重返民間的問題進行研

究和座談。章伯鈞和羅隆基的反應十分積極，李維漢在會上說：「既然要恢復『文匯』，那就把『教師報』改過來吧。」章伯鈞不贊成，說：「如果恢復，就恢復『文匯』的本來面目。」會後，羅隆基鼓動徐鑄成、浦熙修「主動出擊」，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匯報》復刊的打算。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對恢復這些報紙的「民營性質」極感興趣，在一次聚會上，章伯鈞興高采烈地對徐鑄成、儲安平、蕭乾等人說：「社會主義建設是要靠知識分子的。現在知識分子有些牢騷，《文匯報》要好好地搞搞百家爭鳴，《光明日報》也要改組，這兩家報紙要在新聞界放出一朵花來」，「非黨報紙應該有自己的見解，在國際方面，要多登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在國內方面，也不要和黨報一樣。」[55]《文匯報》是一些愛國報人於1938年1月在上海租界創辦起來，1956年4月「自動宣布停刊」。[56]《文匯報》一直擁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作者和讀者，為甚麼突然停刊呢？公開宣布的理由是，教育部要仿照蘇聯辦一張《教師報》，並將《文匯報》的全部人員上調北京參加《教師報》的工作。實際上是《文匯報》當時已經有些辦不下去了。據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後來說，這倒不是因為受到中央的壓力，而是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對黨外報紙「採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他們認為這樣性質的報紙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我國也不應該有」，因此要「改造和逐步消滅」。一個時期「《文匯報》和《新民報》被壓得氣都透不過來」。1955年調來一位中共黨員副總編輯，他對人說：「我到《文匯報》來的使命，是改造和消滅《文匯報》。」這話是有來頭的，正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認為上海的報紙太多，不便控制，主張《文匯報》停辦。此公來後，徐鑄成實際上就成了「可有可無的顧問」。報社內部「不僅黨群有矛盾，黨內也有矛盾，牆內有牆，牆外有溝，一般幹部對報紙前途都沒有信心，過一天算一天」，直到「自動宣布停刊」。[57]

然而，《文匯報》的停刊頗有些不合時宜。就在這時，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推動爭鳴，開闢發言之地，《文匯報》剛剛停刊就有人考慮它復刊的事了。《文匯報》復刊的主張，即使不是毛澤東首先想到，也一定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7月下旬，中宣部分管新聞工作的副部長張際春約見徐鑄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們中央已經決定《文匯報》復刊，要他們立即寫出復刊後的言論方針和復刊計劃，迅速送中共中央審批。徐鑄成提出了人事調動的要求，包括調回欽本立和一些得力的編輯、記者，調走那位黨員副總編輯和「秘書」。對此，張際春滿口答應。對復刊後的編輯方針，徐鑄成頗有躊躇，特別是如何宣傳「雙百」方針，心中無底，於是向《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討教。鄧拓說：我們「已千方百計鼓勵知識分子鳴放，但知識分子看來還有顧慮，不能暢所欲言。你們《文匯報》歷來就取得知識

分子的信任，你們要首先說服知識分子，拋開顧慮，想到甚麼說甚麼。廣大知識分子思想上的障礙消除了，他們才能盡其所長，為社會主義建設盡其力量。我看，這應是《文匯報》復刊後主要言論方針」。徐鑄成大體按照鄧拓的意見寫了〈文匯報言論方針計劃〉，送給張際春。張當面詳細看了一遍，對徐說：「很好，很好，你們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計劃着手籌備復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就批准了這個方案，批文中特別寫明「要讓徐鑄成同志有職有權」。徐鑄成等人因對上海主要負責人「早有些戒心」，提出把《文匯報》辦在北京，並由中宣部直接領導。但中宣部以「沒有直接領導一家報紙的先例」，而上海是《文匯報》的發祥地為由，動員他們還是早日決定搬回上海出版。10月1日，《文匯報》在上海復刊。羅隆基負責，徐鑄成任總編輯。[58] 《光明日報》最初由中國民主同盟創辦，1953年改為由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業者聯合會聯合主辦，也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1955年元旦，《光明日報》為推動文字改革，在首都各大報中率先改豎排版為橫排版。《光明日報》雖是民主黨派的機關報，實際是由中共黨組主持，中共黨員常芝青任總編輯。1956年6月，張際春託人向統戰部副部長于毅夫反映，一些民主人士對《光明日報》辦得很不滿意，是否我們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調出來，由前《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接任《光明日報》的總編輯，這樣我們可以更主動一些。此後，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到剛創刊的《教師報》報社拜訪，對徐鑄成說：「現在中央為貫徹長期共存的精神，決定把《光明日報》還給民盟，請章伯鈞任社長，原總編輯常芝青同志為中共老同志，中央決定撤出來，想請你擔任總編輯，讓我來徵求你的意見。」徐鑄成以他的班底都在《教師報》為理由，未予允諾。徐鑄成婉拒後，中宣部考慮的第二人選是儲安平，且由胡喬木親自登門邀請。胡一直很欣賞儲安平的才幹，在談話中，還特別提到他編的《觀察》很成功，聯繫了一大批知識分子。胡希望儲來主持《光明日報》，與這批舊朋友多聯絡，鼓勵大家多寫文章、多說話。胡還特別補充說，過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慮請些來幫忙。儲頗為感動，欣然受命。11月，儲收到章伯鈞的信，稱「各民主黨派公推」他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儲覆信表示接受。儲安平當時感覺，章伯鈞是受中共之託寫這封信的，因為他們之間「沒有私人淵源」。1957年1月，民盟中央接辦了原屬民盟北京市委編印的《爭鳴》月刊，千家駒任總編輯，並將學術性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實施「以言論政」的辦刊新方針。1957年4月1日，《光明日報》中共黨組撤消，儲安平接替胡愈之任總編輯，章伯鈞繼續兼任社長。[59]

章伯鈞、儲安平等人把辦報看作對共產黨實行監督的陣地。儲安平說過：「《光明日報》要成為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就要創造條件主動

組織，並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監督。」有人評論：「如果說羅隆基、徐鑄成、浦熙修辦的《文匯報》，是要從新聞領域去實踐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話，那麼，章伯鈞、儲安平主持的《光明日報》則是想從民主黨派機關報的角度，來貫徹和嘗試毛澤東所講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了。」[60]這個判斷大體反映了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民主黨派高層人士的真實想法。

5 被擱置的中央統戰部指示

對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在7月和10月統戰部座談會上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張，中共領導人當時並沒有感到不安，中央統戰部一方面把北京和各地民主黨派的批評和意見匯集成七款四十八條，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提出的絕大多數意見，都給予了正面回應，另一方面召開全國統戰部長會議，討論這些意見，進一步研究改進中共同民主黨派關係的問題。[61]

這次統戰會議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仍然是在說服中共黨內大多數人接受「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事實上，在毛澤東關於「兩個萬歲」的說法傳達下去後，黨內就有許多人表示「不理解」。在山西、雲南、甘肅等省機關討論毛澤東的報告時，「機關幹部議論最多，分歧最大的」就是「兩個萬歲」的問題，很多人「思想搞不通」，甚至有些民主人士也不理解。一些幹部認為，「這樣辦和理論原則抵觸，實際上也辦不到」。他們提出的理由是：一切政黨都是階級的產物，又是為階級利益服務的。階級消滅了政黨也就消亡了，這是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過的。這與現在的提法是否有矛盾。他們提出，假如剝削階級被消滅後，民主黨派仍然存在，那麼這些黨派算甚麼性質的組織？有的幹部認為，可以說民主人士萬歲，因為到共產主義社會還有黨和非黨聯盟，但民主黨派則是短命的。也有人說，萬歲只不過是思想認識而已。還有人提出改換名稱後可以萬歲，如民主同盟改為社會主義同盟。實際上民主黨派也不可能萬歲。因為現在民主黨派中老年人多，這批人死了，年青人不願加入，就自行消亡了。[62]中共八大宣布「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後，黨內外還是有人表示懷疑，他們提出：「在資產階級消滅以後，以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為基礎的民主黨派為甚麼還能繼續存在？」「這些黨派繼續存在下去究竟還有甚麼作用？」黨外有人懷疑「我黨提出的這個方針是不是一種手段？是不是真正要實現這個方針？」黨內有人「害怕民主黨派對我們實行監督，擔心這樣會不會削弱黨的領導，會不會惹出更多的麻煩，不好辦事？」[63]

針對這些思想情緒，會議認為，「還有必要依據八大文件向黨內外

作反覆的闡釋」。統戰部從理論上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提出了三條依據：一是承認民主黨派的歷史作用和政治上的進步，「沒有理由不讓它繼續存在下去」；二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逐漸向勞動人民轉化後，民主黨派還有它的社會基礎，就是「勞動人民的右翼」，「各民主黨派將成為這一部分勞動人民的政黨」；三是黨的工作不可能沒有缺點和錯誤，我們當然首先依靠黨內自我批評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監督，同時還要借助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批評和監督。[64]李維漢還引用周恩來的話說：「共產黨同民主黨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以此表達長期共存和合作的誠意。[65]

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中央統戰部起草了一份〈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作為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徵求意見。同時印發了〈中央統戰部關於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關於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中吸收共產黨員的補充規定（草稿）〉等文件。在這些文件中，對於民主黨派的作用問題，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係問題，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問題，在民主黨派中吸收共產黨員問題以及民主黨派的編制、經費、幹部調動、生活待遇和物質設備等問題作出了更加具體的規定。在中共同民主黨派的關係問題上，更加明確地規定了要尊重民主黨派的組織獨立性，強調中共同民主黨派是「平等的友黨關係」，應當尊重民主黨派「獨立平等的地位」；指出黨對民主黨派的政治領導必須保持和加強，但這「決不意味着我們黨有超越它們之上的權力，決不意味着可以把它們當作附屬的團體，決不意味着我們黨可以去命令、干涉或者控制它們」。文件特別批評了統戰部門一些人不尊重甚至不承認民主黨派的獨立平等地位，常常通過他們內部少數進步分子「把持控制」它們的內部事務，如修改它們的文件草稿，干預它們的人事安排，控制它們的組織發展，以及民主黨派的許多事務必須取得統戰部門的同意才能決定和實行等等。文件要求「徹底糾正」這種「錯誤作法」。關於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歸結為「參」、「代」、「監」、「改」四個方面，即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代表所聯繫的階級、階層的利益，反映其意見和要求；對於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起監督作用；進行自我教育和改造。關於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文件規定，應「由它們自己決定方針和步驟，在它們聯繫的社會基礎上自由發展」。統戰部門盡可能地給予幫助。與年初出台的〈七年方針〉相比，關於民主黨派發展的政策進一步放寬了。各民主黨派的發展是否仍然要有「重點分工」由各總部協商決定，協商的結果仍然保留重點分工，但不機械地劃分範圍；不再堅持中共曾經提出的發展對象以其所聯繫的階級、階層的中上層為主，發展地區以大、中城市為主的「建議」；不再限制其在鐵路系統和工礦、企業中以及在少數民族

地區發展黨員。當然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不是無限制的，民主黨派仍然不得在人民解放軍部隊、機關、學校和國防工業、外交、情報部門中發展黨員；已經取得民主黨派黨籍的只能「個別聯繫」，「不得從事黨派活動」。[66]

這個文件所闡明的觀點和政策措施，是希望從制度上保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實行。如果照此實行，民主黨派會有相當的發展並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這個文件只是一個「草案」，而且只是由中央統戰部下發各地統戰部門徵求意見，而不是由中共中央批轉全黨。它更多地反映了李維漢及其領導的中央統戰部的意見，但並沒有在黨內形成廣泛共識。後來由於反右派鬥爭興起，這個草案自然地被擱置起來，這些在李維漢看來是「正確的、積極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措施」，也沒有形成正式文件。[67]

[1]詳見李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黨的文獻》，1991年第1期，頁11—16。

[2]Лебовскuu А.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пb 1949r.),Пробдемы дап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No.2, c.97-111, No.3, c.95-105。中譯文參見《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

[3]筆者所見就有四篇，即田松年：〈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基本政策〉，《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薛銜天、王晶：〈關於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問題——評「米高揚訪華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沈正樂：〈米高揚「報告」中關於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想質疑〉，《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張士義：〈米高揚「報告」質疑〉，《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筆者1996年5月在莫斯科進行學術訪問時，曾就此請教過列多夫斯基先生，並希望他能出示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電報和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電的原始檔案。列多夫斯基答應盡力尋找。

[4]ЛебовсKuu А. Две теп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зДуна СИ.В. Стапиным // Пробпемы Дапbнего востоKa, 2000, No.6, 117-122。中譯文參見《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馬貴凡：〈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頁90—91。

[6]《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一卷，1991（未刊），頁1、6、11。

[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4—5。

[8]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37-43。

[9]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 81-95。

[10]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0, л.157-179。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75。

[12]劉延東主編：《當代中國的民主黨派》（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頁273—274。

[13]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226。

[14]對此，中共後來也頗感不是。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226。

[15]參見林祥庚：〈劉少奇與多黨合作制度〉，《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108—109。

[16]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124。轉引自林祥庚：〈劉少奇與多黨合作制度〉，頁109。

[17]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117—124。

[18]《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二卷，頁301。

[19]羅廣武編：《民主黨派大事年表》（北京：華文出版社，1998），頁39—40。

[20]《人民日報》，1956年1月31日。

[2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08—809。

[22]《內部參考》，1955年1月30日，頁372—378。

[23]《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39。

[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29—30。

[2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15。

[26]文件全文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203—209；《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220—227。以下對於這兩個文件的引文不再註明出處。

[27]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137。

[28]《當代中國的民主黨派》，頁275—276。

[29]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頁147；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17。

[30]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頁130。

[3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03。

[32]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頁129—130、148。

[33]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頁128—129。

[34]《黨的文獻》，2004年1期，頁24—25。

[3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94。

[36]筆者注意到，《毛澤東傳》所引4月19日談話時的用詞略有不同，不是「監督」，而是「看着」。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482。另據李維漢回憶，「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後來概括」出來的，並未出現在毛的4月25日講話中。參見《回憶與研究》，頁813—814。當然，這些差別並不影響對毛澤東談話本意的了解。

[37]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03—804。

[38]《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224—225。

[3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5。

[4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72；石仲泉：〈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前奏曲〉，《黨的文獻》，1988年第6期，頁35。

[4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74。

[42]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頁158—159；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18—819。

[43]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47—48、83—84、501、816。

[44]《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49—50。

[4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19；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頁161。

[46]江平主編：《當代中國的統一戰線》（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190。

[47]《人民日報》，1956年7月7日、8日、14日、17日、22日、26日、27日、30日、9月9日。

[48]《內部參考》，1956年7月25日，頁536—537；1956年8月2日，頁7—8；1956年8月9日，頁139—141。

[49]《人民日報》，1956年7月26日、30日。

[5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20—822。

[51]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42。

[52]《人民日報》，1957年7月6日。

[53]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21—824。

[5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15、1516。

[55]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32—33。

[56]由於不同原因，《文匯報》曾三次停刊。第一次是1939年5月被日本人停刊，抗日勝利後復刊；第二次是由於傾向於支持共產黨，1947年5月被國民黨勒令停刊，1949年上海解放之後復刊。最近一次停刊是1956年4月。參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頁310。

[57]徐鑄成：《親歷一九五七》（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2—3；徐鑄成：〈陽謀——1957年〉，《新華文摘》，1989年第2期，頁143；朱正：《1957年的夏季》，頁310—312。

[58]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390—393；徐鑄成：《親歷一九五七》，頁3—15；朱正：《1957年的夏季》，頁312—313。

[59]《徐鑄成回憶錄》，頁387—388；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34—40、79—80；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載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頁190—192。

[60]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42—43。

[6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22—824。

[62]《內部參考》，1956年5月28日，頁478—481；7月25日，頁536—537；8月2日，頁7—8。

[63]《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500、502。

[64]《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500—501。

[6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23。

[66]《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500—506；另見吉林省檔案館，1-5/5-1956.13，頁26—27、29—30。

[67]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23—824。

五 民主的擴大及其限度

1956年，中共政治上鬆動的所有舉措，包括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黨派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更大的主題，這就是在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以後，嘗試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以克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陰暗面，團結更多的人加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

1「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

中共所作的一系列政治上的調整，直接的目的就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戰略目標。然而，毛澤東等領導人關於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一些新想法的產生，則直接與蘇共二十大有關。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特別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錯誤的秘密報告，震動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對毛澤東帶來相當大的刺激。據李慎之回憶：「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傳出後不久，就聽到胡喬木講述毛主席心情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李慎之說：「這話，我們聽了都很感動，看來情況大致也確實如此。」[1]毛澤東的確有心為他塑造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開創一種上下團結一心、人人輕鬆愉快的政治環境。

從蘇聯的教訓中，中共領導人似乎覺察到了權力過分集中帶來的弊端，希望通過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來防範這些弊端。或許是基於「對立統一」的哲學理念，毛澤東把擴大民主理解為設立對立面「唱對台戲」。陳雲說：「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哪裏有『唱對台戲』的，哪裏有『反對派』，那裏的工作就搞得好，否則，工作就搞不好。他說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兩個萬歲』，就有這個意思。有民主人士監督我們，對工作有好處。如果革命勝利以後，長時期沒有『反對派』，只有一派人講話，聽不到不同的意見，那末，工作就會出毛病。」陳雲還說，在公私合營企業使用資方人員也有「唱對台戲」的意義。他說：「要把資本家請來當『反對派』，專門同我們『抬杠』；越『抬杠』，工作就可能做得越好。」[2]怎樣「唱對台戲」？中共領導人想到的主要有四條：一是在科學文化界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二是對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三是給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決斷權；四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作用。對於擴大民主而言，如果說前兩者主

要涉及的是思想領域和方針政策問題，那麼後兩者則牽涉到國家體制的變動。

1956年，試行行政體制改革，適當擴大地方管理權力，已經進入決策和實施程序。毛澤東在講十大關係時專門論述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他主張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毛的着眼點，主要在於提高效率，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事實上，並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覺察到中央高度集權帶來的問題，在毛講話之前，國務院已經在醞釀行政體制改革問題了。3月26日，正式成立國務院體制研究十人小組，研究國務院各部委的設置和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問題。從5月11日開始，國務院召開了持續幾個月的體制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各有關部門的人員，分財政、計劃、工業、事業、基建、政法、綜合七個組，討論行政體制改革問題。會議檢查了中央集權過多的現象，提出了關於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會議認為，在劃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職權時，應實行以下原則：（一）明確規定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定範圍的計劃、財政、企業、事業、物資、人事的管理權。（二）凡關係到國民經濟帶全局性、關鍵性的企業和事業，由中央管理。其他企業和事業，應盡可能交給地方管理。（三）企業和事業的管理，應該認真推行以中央為主、地方為輔或地方為主、中央為輔的雙重領導的管理方法。（四）中央管理的主要計劃和財務指標，由國務院統一下達，改變過去由各部門條條下達的辦法。（五）某些主要計劃指標和人員編制名額等，應給地方留一定的調整幅度和機動權。（六）改進體制要逐步實現，某些重大的改革，應該採取今年準備，明年試辦，到「二五」計劃期間全面實施的步驟，穩步進行。[3]

對於適當下放行政權力，地方政府是積極的，中央部門則存在不少疑慮和阻力。6月2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體制會議上講話就說到，「有些部門有這樣的顧慮，怕分權後分散力量，影響生產、基建、技術和計劃」。他解釋說，不要怕分權，「適當分權給地方就會更好地集權於中央」。他說：「社會生產力大發展不能光靠集權。蘇聯過去集權多了，地方權小了，這是一個經驗教訓，是一面鏡子。」[4]經過半年多的討論，形成〈國務院關於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10月30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轉發各地討論，改革的基本精神是「適當地擴大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決議草案提出：「當前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首要步驟，是先劃分中央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行政管理職權，並且對地方的行政管理權予以適當擴大，然後再逐步劃分省和縣、縣和鄉的行政管理職權。」[5]

在50年代，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是權力機構，實際上沒有任

何權力，被人們稱為「橡皮圖章」，最多也不過是國事「清談館」。從當時中共對國家體制的認識水平看，對人大進行制度上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人們所作的努力僅僅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作用，特別是把人大代表視察工作和人大常委會的信訪工作作為與人民直接接觸的渠道。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先後組織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進行了兩次聯合視察。這些視察除了使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感受了「祖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外，也確實發現了一些問題，提出了不少建議。如1955年冬季，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聯合視察高級知識分子情況，寫出近60萬字的書面報告。[6]一年內人大常委會收到代表來信121件，「有的反映了工作情況，有的對工作提出批評，有的提出了建議」。收到人民來信達6874件，接見人民來訪587次。來信中檢舉反革命分子的44件，檢舉國家機關幹部違法亂紀和官僚主義的1367件，不服法院判決的305件，對國家建設提出批評或者建議的1074件，反映政策執行情況的551件，要求解答有關法律法令問題的305件，要求就業的1714件，要求救濟和要求幫助解決就學、治病等問題的1514件。[7]可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視察工作和人大常委會的信訪工作，對於直接了解民情和實行對政府的監督，還是有意義的。

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就擴大民主、開闊言路進行了一些嘗試。一個是讓代表在大會上充分發言。這次會議有163位代表作大會發言，除了28位發言報告工作外，大多數代表都就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評和建議。一個是在小組會上「允許辯論」，這在人大會議上也是開了先例的。再一個先例就是政府對人大代表的質詢作出回應。周恩來在閉幕會上對代表們的批評意見一一作答，肯定「這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它的職權的表現」，他代表國務院「表示接受這些批評」。[8]會後，所有代表發言，「包括批評政府工作的發言，不管對的、部分對的甚至錯的」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這個舉動也是不同尋常的，「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點」。[9]這幾個先例，即會議辯論、政府應答質詢和公開會議發言等，確實使這次人大會議顯得生氣勃勃，不同凡響。更有意味的是，周恩來把這些做法視為對「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的借鑑，「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10]這並非周恩來失言，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似乎都考慮過這個問題。

1956年11月劉少奇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談到，在社會主義國家，國家領導人員有可能成為特殊的階層。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除了限制權力、加強監督等基本措施外，劉少奇還談到西方國家的一些具體做法，說：「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所採用的一些民主比我們現在的一些民主辦法甚至更進步一些，我們比那個時候不是更進步了，而且是更退步了。」

他甚至以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功成身退、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當校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當紅十字會長為例說：「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可以參考一下，也可以退為平民呢？」劉少奇認為，「資本主義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11]

毛澤東也對美國的政治制度表現出濃厚興趣。據鄧小平說，對於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做法，毛主席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12]鄧小平沒有說明毛澤東這段話是在甚麼場合說的，但類似的話毛澤東確實不止一次地說過。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做〈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權，立法權集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條也是學蘇聯的，因為起草憲法的時候，我曾經問過一些同志：是不是應該這麼寫，據說蘇聯是這樣，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但美國似乎不是這樣。美國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聯邦憲法打架，比如憲法上並沒有剝奪黑人權利這一條，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這一條。似乎財政和稅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統一。美國這個國家很發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發展起來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我們恨美國那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實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這麼一個發展的國家總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來，我們也要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13]

毛澤東甚至想到過學習西方兩黨制，成立兩個共產黨的派別。毛的秘書林克在10月31日的日記中記載：「毛主席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對人民專政，只是對反革命專政，隨着反革命被消滅，專政的武器也要逐漸縮小三千萬，縮小十分之九，則專政機關也縮小十分之九。但是這種機關還要存在，因國內還存在反革命，還會產生反革命，國外還會派進來。如何保證無產階級民主，是否可以搞兩個黨（共產黨）呢？這還很難設想。準備找四教授談談。」[14]看來，毛澤東當時還沒有立即搞兩黨制的念頭，後來是如何請教別人的也不得而知，但他在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爆發時談這番話，顯然是又一次把蘇聯的政治模式與西方的社會制度做了對比。

當然，在實際操作中，中共並沒有走得很遠，儘管他們把已經和正在進行的國家行政制度改革看作是擴大民主的重要舉措。在4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和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就改革國家行政體制發言，他認為在制度上的中心問題就是民主集中制。集權集得多也有好處，就是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搞起來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帶來了陰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視民主，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很容易生長出嚴重的官僚主義，把舊社會殘留下來的東

西保留下來，甚至更濃厚起來。[15]7月8日接見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維奇時周恩來又說，由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實現，已使國內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現在可以擴大民主了。[16]

7月21日，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系統地說明了他關於「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觀點。他說：「我們處在國際緊張局勢肯定地趨向和緩的時期中」，「世界戰爭推遲的可能性加大，便於我們爭取時機加速進行經濟建設」。國內殘餘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完全肅清，國外帝國主義還敵視我們，因此「專政應該繼續」。「但是，由於我們的專政更加鞏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更加強大了，所以我們的民主就應該更擴大，而不應該縮小。」他指出，專政的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鑑，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他指出，「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使民主擴大。」[17]

怎樣擴大民主？周恩來最看重的是兩條，一是發揮人大代表的監督作用，一是中央與地方的互相監督。周恩來說：現在還不具備普遍實行直接的、秘密的選舉的條件，但可以從另一方面來擴大民主，如使人大代表經常去接觸人民；人大可以允許辯論；要進一步使人大代表參加對政府工作的檢查，一直到公安、司法工作。他還說，中央與地方儘管是上下級關係，必要時也要唱「對台戲」，「互相影響，相互監督」，這樣做能夠推動我們的工作，減少官僚主義。[18]周恩來並沒有否定實行直接的秘密的選舉的制度，只是說現在還不具備條件。他希望通過加強人大制度實現擴大民主的目標。

2 專政也可以「寬一些」

1956年政治上的鬆動，還反映在中共年初提出的「今後對反革命分子實行寬一些的政策」。[19]1月26日，全文公開發表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首先透露了這彳重信息。綱要規定，不但可以允許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人社，就是反革命分子，除了有現行破壞活動和民憤極大的應逮捕法辦外，其他罪行輕微或有悔改表現的，也都可以允許入社，成為「社員」。[20]2月21日，董必武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肅反問題的報告，一方面肯定了1951年到1953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1955年肅反運動的成績，認為對於殘餘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動「絕不能夠麻痹大意，絕不能有任何右傾的傾向」；另一方面指出，在社會主義高潮面前，反革命分子「愈來愈走投無路」，出現了「紛紛向政府投案自首」的現象。他以具體事例說明，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和悔改就可以得到寬

大處理。[21]

2月20日至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召開第三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在鎮反和肅反運動中錯捕、錯殺的問題開始受到重視。最高人民法院的總結報告指出了「在辦案質量上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提出今後「應該少捕一些，少殺一點，捕的必須是少數非捕不可的人，殺的必須是極少數非殺不可的人；對於其他罪惡嚴重需要嚴懲的，判處長期徒刑或較長期徒刑」。這就是所謂的「少殺長判」政策。[22]3月15日至4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了第三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決定實行「少捕少判」的方針，同時大力開展政治攻勢，爭取更多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中央政法委副主任彭真在這兩個會上都發表了講話，核心問題是談「寬一些」的政策。他解釋說，政策的從寬從嚴是根據客觀形勢決定的，形勢需要從寬就從寬，形勢需要從嚴就從嚴。[23]

「寬一些」的政策在捕殺反革命的控制指數和數字上也得到體現。2月11日，公安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送了第七次全國公安會議制定的捕、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計劃，計劃規定：1956年全國逮捕60萬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犯罪分子，殺掉1.5萬到2萬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犯罪分子。要求各省市公安部門偵破各種反革命案件1.4萬件，偵破現有重大刑事案件1.6萬件，新發生的刑事案件要求偵破80%，1956年再組織60萬犯人投入勞改生產。3月10日，中共中央在批轉公安部1956年工作計劃時，責成公安部修訂計劃，要求全國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數字「必須大大地加以縮減」。[24]4月28日，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指出，「隨着全國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當前鎮壓反革命鬥爭的情況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需要「重新規定」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界限。文件大大放寬了對上述分子的界定和處理辦法，明令廢除1955年8月13日公安部擬定，經中共中央批准下達的〈關於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逮捕政策界限的規定〉。[25]同日，公安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送請示報告，決定逮捕數由60萬修訂為24萬到30萬名，殺人數控制在2400名到3000名以內。6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提出「1956年採取少捕和着重政治瓦解的措施」。[26]

中共最初提出「寬一些」政策，是基於這樣一種估計，即認為隨着社會主義高潮的出現，國家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資本家屈服和投降了，反革命勢力動搖和分化了。然而，蘇共二十大揭露出來的斯大林肅反「擴大化」錯誤，為這個問題注入了新因素。斯大林在肅反運動中大開殺戒的行為，不僅對蘇聯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思想衝擊，就是中共黨內外也不能不為之震驚。人們很自然地由斯大林的肅反聯想到中國的

鎮反和肅反。事實上，懷疑鎮反運動和肅反運動的聲音已經有所露頭。在6月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和公安部長羅瑞卿關於鎮壓反革命的發言都承認：「在鎮壓反革命鬥爭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而且在個別的地方在一定的時間內還是表現得比較嚴重的。」「捕了少數可捕可不捕的分子，甚至錯捕了個別完全不應該捕的人。」在各機關內部肅反中，在有的單位「發生過鬥爭面偏寬的現象，鬥爭了少數可以不鬥的人，甚至錯鬥了個別完全不應該鬥的人」。[27]張鼎丞、羅瑞卿的這些公開表態顯然是在回應來自黨外的批評。

毛澤東的反應也是很敏感的。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就提到：「應當肯定，1951年和1952年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是必須的。」「現在有人聽說斯大林殺錯了一些人，就說我們殺的那一批反革命也殺錯了，這是不對的。肯定過去根本上殺得對，在目前有實際意義。」至於肅反，他也認為，「在胡風問題出來以後，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儘管一再為中國的鎮反、肅反辯護和開脫，毛澤東還是藉着批判斯大林，提出了以後應「少捉少殺」的問題。他在講話中反覆拿斯大林的大清洗為例，說明必須記取的教訓：「斯大林不知道是怎麼想的，抓到一個就殺一個，結果犯了大錯誤。」「人的腦袋不像韭菜，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如果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鑑於中國的情況是「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毛澤東提出了今後處理反革命問題的兩條原則：一是「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二是機關、學校、部隊裏清查反革命，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28]

至於一些民主人士從司法程序上對鎮反和肅反提出的質疑，毛澤東同樣不以為然。據林克日記的記載，7月17日，毛澤東在談到鎮壓反革命問題時說：「民主黨派中許多人過去是反共的，或者自己就是反革命，如龍雲、傅作義、黃炎培、梁漱溟、張治中、劉文輝，或者他們的親友與反革命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實際上是不贊成殺反革命的，是同情反革命的。但是他們打出的旗幟是維護憲法，如黃紹竑，提出捕人四十八小時前應經監察委員會批准，否則違憲。」[29]但民主人士從「維護憲法」的角度提出對鎮反和肅反的看法，是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毛根本沒有理解，反而認為他們不過是「同情反革命」。這典型地體現了毛澤東「無法無天」的性格和輕視法制的觀念。說到司法問題，毛的基本思路仍然是依靠黨的政策行事，依靠黨委辦案。那些民主人士強調司法程序，與毛澤東的辦案思路從本質上講就是對立的。毛澤東的主張是：「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

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30]看來，無論是嚴厲打擊，還是寬大處理，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從法制的角度考慮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的態度就認真多了。7月7日，劉聽取張鼎丞、梁國斌匯報時就司法工作提出意見，除了重申毛澤東提出過的「少捕少殺」的原則以外，劉少奇特別地強調必須健全法制。他說，「如果再不健全法制，就容易出毛病了」。劉把健全法制主要歸結為「健全檢察機關」，發揮檢察機關的作用，並提出「不枉不縱」是檢察院的奮鬥目標，要求所有批捕的案件都必須由檢察機關「過一下印」，必須經過檢察院「這一關」。[31]另有材料說，劉少奇2月在與最高檢察院負責人的談話中，就強調按憲法辦事的重要性。他說：「在憲法公布以後，我們必須根據憲法條款處理事務。當案件是依據合法程序處理的時候，即使我們錯捕了人和錯判，這樣的錯誤也是合法的。」如果這次談話的時間準確，那麼可以說明，劉少奇對法制的重視並不是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但斯大林問題的暴露顯然強化了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5月30日，劉在與最高檢察院負責人的另一次談話中甚至提出了「必須保護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權利」問題。他說，人們對保護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權利不敢說，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必須承擔這個責任，目前檢察機關必須更多地致力於防止錯誤和作出錯誤決定。事實上，彭真等政法領導人都已經意識到，「如果我們不加強法制，那是很容易犯錯誤的」。[32]

無論如何，7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檢查肅反工作的指示〉，決定對反革命案件主動進行一次檢查。7月13至16日，召開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聯席會議，具體部署肅反檢查工作。7月15日周恩來到會講話，他指出，專政是需要的，但並不等於說我們的專政工作就沒有缺陷。拿甚麼來彌補呢？人民民主專政本身還有民主的一面。應該把民主的一面更加擴大，來彌補專政工作中的一些缺陷。他還提出，要吸收民主人士一起來檢查公安、司法工作，糾正工作中的偏差。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會議確定重點檢查冤案和錯案、積案、監獄和勞改隊以及執行法律程序等四個方面的情況。1956年下半年，各地（西藏除外）人民法院對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第一季度判處的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進行了普遍檢查或重點抽查，對查出的冤案、錯案分別作了平反或改判。[33]

對於此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問題，中共根據情況的變化，大大壓低了控制指標。8月，中共中央轉發肅反領導小組的一個文件說到，1955年的肅反，全國已經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38875人（軍隊除外），只佔參加運動人數的1.43%，「將來全部定案完畢，估計反革命分子的比例將要達到1.5%以上」。文件為1955年提出的5%的敵情估計作了辯護，說「有人看到，現在查出的反革命只佔2%左右，便認為中央

過去的提法不妥當，助長了『左』的偏向。這種看法我們認為是不對的。如果沒有這個規定，可以肯定『左』的偏向還要大」。但中共還是大幅度地調低了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控制指標，文件規定：「今後對於敵情的估計，我們認為應該將5%改變為2%左右」。1956年第二批肅反就是改為按2%左右的「估計」執行的。[34]截至1957年6月，據二十六個省、市的統計，這批肅反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37750人，佔參加運動總人數的0.45%，最高的雲南省為0.91%，最低的新疆只有0.13%，比第一批的定案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35]不過，從定案的程序看，儘管情況已有很大好轉，但依據的仍然是按預先設定的比例追查和清理「反革命」的傳統做法，真正的法制還沒有走上軌道。

3 自由和民主的限度

中國在1956年和1957年初展現出來的政治鬆動跡象和擴大民主的傾向，特別是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了極大反響。

受到鼓勵和刺激的主要是如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中的改革派領導人和包括蘇聯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一致贊同中共的新方針，認為這表明了一種民主化的傾向。蘇聯文藝界「極大多數同志認為陸定一同志的文章的觀點是正確的」。[36]「保加利亞文藝界人士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感興趣」，甚至有人認為在保加利亞也應該推行。[37]捷克黨報記者則幾次詢問中國同行，在中共八大會上為甚麼沒有關於百花齊放方針的專門報告，並想索取有關發言的外文本。[38]

波蘭各界對中共的這一政策「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並把「雙百」方針與波蘭正在興起的民主化運動聯繫在一起。蘇共二十大以後，「波蘭立刻出現了如狂風般的空前廣泛、空前熱烈而又空前深刻的全民性的政治、思想大討論」，在波蘭報刊和正式文件上都把這場大討論稱作「民主化的開端」。因此，當中共提出「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口號後，波蘭各界都「表示了極大的興趣」。新聞界的同行還一再追問中國記者，「中國黨在新聞政策上有甚麼新的指示」。波蘭黨認為，毛澤東說的「對反革命實行專政、對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這句話，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最正確的原則。[39]

匈牙利黨內支持改革的領導人和群眾則把中共視為自己的同志，據一位匈牙利外交官回憶，「1956年夏天，很多的反對派和匈牙利知識分子接受了這樣的真誠信念，即中國的口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共領導人意圖的真實反映。這種幻想導致在布達佩斯的大部分革命者希

望在起義中得到中國的支持。在布達佩斯的街道上，人們經常會談論那天的暴亂事件，最常聽到的話就是『中國人和我們站在一起』」。他評論說，中國的口號「對匈牙利事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40]

蘇聯領導人的反應則完全相反。由於秘密報告在國內外引起的巨大波瀾，以及東歐國家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的反蘇情緒和離心傾向不斷加強，迫使赫魯曉夫不得不節節後退。[41]在這個時候接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無異於引火燒身。對於陸定一的講話和其他詳細介紹「雙百」方針的文章，蘇聯報刊一直小心翼翼地沒有轉載。[42]據中國記者反映，蘇聯人普遍無法理解為甚麼要給唯心主義以宣傳的自由。他們認為百花都可以放，但有毒的花是不能放的；百花齊放在自然科學領域還可以，但在哲學、文學界不行；這個方針只是適合中國，不適合蘇聯和東歐。[43]多年以後，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的一份報告證實了當時蘇共領導人的真實想法：「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同志們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引起了我們深刻的懷疑。」這「意味着放棄黨領導文學、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原則」。[44]多數東歐國家領導層的態度與蘇聯相似，擔心國內因百花齊放出現混亂局面。如保共中央就認為，目前在保加利亞不宜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口號，「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混亂」，「發生無法控制的情況」。保文化部還為此專門作了兩個內部決定。[45]

顯然，無論贊同者還是反對者，都誤解了毛澤東提出這些新方針的本意。中共並無意在中國開展一場自由化或民主化的運動，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都是毛澤東發動群眾的一種手段工具。一方面，他希望以此動員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為工業化建設貢獻力量，另一方面他有意借助黨外的力量來衝擊黨內和國家官僚機構的沉悶空氣。然而，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從來沒有意圖讓知識分子或民主黨派來分享政治權力，從來沒有設想過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也決不是像蘇共指責的那樣要「放棄黨領導文學、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原則」。這裏的自由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對共產黨的領導絕對不容挑戰，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決不能有絲毫的背離。

毛澤東所以這樣做，是出於他對形勢的樂觀估計以及對他本人和共產黨領導權威的十足自信。在毛澤東看來，經過改造的中國知識分子已在掌握之中，不必害怕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自由發揮和學術討論中的自由爭鳴。這種「自由」不僅不會有政治上的風險，還可以收到活躍政治空氣、繁榮科學文化的實效。即使有人執意挑戰中共的意識形態，也完全可以通過辯論駁倒他。正如陸定一所說：「只有通過公開爭論，唯物主義才能最終戰勝唯心主義。」[46]至於民主黨派，在毛澤東看來，他

們人少勢弱，且已經俯首帖耳，根本不會對中共構成現實威脅。所實行的民主措施，也是在維護和鞏固共產黨領導的範圍之內，相信這些民主黨派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百花齊放和多黨共存，政治上還有一個明顯的目的：毛澤東要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樹立一種不同於斯大林和蘇聯的形象，表明共產黨領導科學文化事業完全可以有另一種方式，即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通過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實現自己的領導。

實際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並非基於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陸定一報告所講的在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本來是憲法已經規定的公民應當享有的言論自由。

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且規定：「國家供給必要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47]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其涵義遠比毛澤東、陸定一的解釋廣泛。它不只是知識界享有言論自由，而是所有公民都應當享有的自由；憲法也沒有限制這些自由不能越出科學文化領域的界限。然而，在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闡述「雙百」方針時，沒有任何人援引憲法的這些條文。這正好說明中國社會的人治特點，政策依然高於法律。正因為憲法在人們心目中視有若無，知識界才把「雙百」方針看作自己的「福音」。然而，依據憲法享有的自由，與「雙百」方針所賦予的自由有着重大不同。「雙百」方針既然是一種政策，一種手段，一種動員工具，執政者便可以收放自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之初，中共就預設了兩個界限：一是它只限於學術和文藝，與政治無關；一是它只給予人民自由，與反革命分子無關。這就使得參與爭鳴者隨時可能因為觸及政治禁區，或者被認為侵犯了政治而掉進陷阱，「人民」也就變成了「敵人」。

況且，在中共黨內，多數人對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不理解，抵觸情緒很大。他們習慣於獨攬權力，不願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習慣於輿論一律，不想讓別人議論紛紛，更害怕爭論；習慣於發號施令，不願意有人在旁邊評頭品足，礙手礙腳，更何況這種監督來自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於是，這兩個方針提出後，出現了黨外熱、黨內冷的現象。

總而言之，中共在1956年倡導的擴大民主的政策和方針是缺乏法律和理念根基的，既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只是由於對形勢的樂觀估計而提出來的，那麼一旦人們對形

勢的估計發生了變化，收起這些口號或者只說不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不過，在1956年的夏秋很少有人想到這一點，所以當中共八大把這些政策正式作為黨的路線方針宣布出來的時候，還是給激動的國人帶來了無限希望。

[1]李慎之：〈毛澤東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120—122。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439、441。

[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1、575；《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11、39；《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頁85。

[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9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39。

[5]《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頁1511。

[6]《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

[7]《人民日報》，1956年6月17日。

[8]《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44。

[9]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08。

[10]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08。

[11]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上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頁515—518。

[12]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33。

[13]這段話在公開出版時被刪去了。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88—489。

[14]林克：《林克日記（1955—1964）》（手稿），未刊，頁15。

[1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7、569。

[1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96。

[1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02—603。

[18]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07—209。

[19]何蘭階、魯明健主編：《當代中國的審判工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68。

[20]《人民日報》，1956年1月26日。

[21]《人民日報》，1956年2月1日。

[22]《當代中國的審判工作》，頁68—69。

[23]李士英主編：《當代中國的檢察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89。

[2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三卷，頁285。

[25]陝西省檔案館，123-40-2，頁7—10。

[26]《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三卷，頁327。

[27]《人民日報》，1956年6月23日、24日。

[28]《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6—3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89。

[29]林克：《林克日記（1955—1964）》（手稿），頁9—11。

[30]《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7。

[31]《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71—372頁；《人民日報》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45.8—1957.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頁528。

[32]轉引自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頁122、126。該書引用的劉少奇講話多是「文革」中刊印供批判用的，在目前中國正式出版的劉少奇文獻中均尚未披露。

[3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99—600，《當代中國的審判工作》，頁70—71。

[34]陝西省檔案館，123-40-1，頁128—132。

[35]陝西省檔案館，123-40-49，頁49—55。

[36]《內部參考》，1956年8月31日，頁492—494。

[37]《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頁1209—1210。

[38]《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日，頁21—22。

[39]《內部參考》，1956年10月12日，頁941—963。正因為如此，當10月19日蘇聯兵臨華沙城下時，波蘭人打出了「毛澤東支持我們」的大標語。詳見本書第六章。

[40]Janos Ra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The China Quarterly, No.43（Jul.-Sep.1970）,122。

[41]詳見本書第二章。

[42]陸定一和于光遠曾到蘇聯使館向尤金談到「雙百」方針的情況，尤金不以為然，還拿出一篇列寧的文章要陸定一學習。參見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頁429—430。

[43]《內部參考》，1956年12月17日，頁347—355。1957年中國反右派運動以後，蘇聯黨認為，是「『百花齊放』的理論導致了文化領域反社會主義傾向的活躍，導致了1957年中國資產階級右派公開的反革命進攻」。ЦХСД, ф.2, оп.1, д.415, л.56-91.

[44]ЦХСД, ф.2, оп.1, д.415, л.56-91.

[45]《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頁1209—1210。

[46]《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

[47]《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冊，頁385。

第五章

八大路線：給國人帶來的希望和思考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一個十分重大的事件。在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頭，八大抓住了歷史主題，改變了許多過去的傳統做法：明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國內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承諾要改進中共的領導方式，加強國家的民主和法制；確定了積極穩妥的經濟建設方針和二五計劃建議指標，提出了一些改進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設想；看到執政黨面前的新考驗，規定必須擴大黨內民主、堅持集體領導，並且明確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應該承認，八大路線的提出表明，作為整體而言，在蘇共二十大路線的影響下，中共領導層並沒有因取得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偉大勝利而狂熱，卻展現出少有的冷靜和理性的探索精神。八大路線給中國提供了一種欣欣向榮的發展前景，也給國人帶來了希望和思考。

在中國，無論在黨史還是國史領域，對於中共八大的研究都是最熱門的課題之一，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二十餘年，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已有數十篇，還有一些專著，可謂成果纍纍。其中對八大歷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應屬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主編的《中共八大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也有兩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這兩書的共同特點是直接引用了大量中央檔案館的檔案（可惜註釋極不規範），比較翔實、全面地描述了八大歷史的整個過程，最具參考價值。本章的論述，沒有提供更多的新史料，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幾個重大問題的歷史過程做進一步的梳理，並着重於分析八大文獻本身，以對八大在中共黨史和共和國歷史中的地位做出比較客觀的把握。

中國學術界和中共本身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條正確的路線，而把此後二十年內中國激進主義的發展道路及其後果，歸結為對八大路線的背離，同時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改革開放與八大連接起來。[1]這種理解，大致說來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作為歷史研究者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為甚麽八大開過不到一年，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擁護的八大路線就被拋棄了呢？歷史存在慣性，那麽在八大路線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傳統」，而恰恰在這些地方為後來的激進主義發展埋下了伏筆？這個問題正在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

[1]1981年6月，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了這樣的評價：「八大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0。

一 八大的籌備和召開

中共中央最早醞釀召開八大，是在1952年，但最終確定下來是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八大的籌備工作由中共七屆五中全會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以中央書記處秘書長的名義具體負責。準備提交八大的主要文件有五個：政治報告、黨章、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早在1955年就成立了三個起草文件的班子，政治報告由劉少奇主持，黨章和修改黨章的報告由鄧小平主持，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和關於建議的報告由周恩來主持。[1]從1955年3月到1956年9月，八大的籌備時間不可謂不長。然而，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國內外形勢發展太快，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出現始料不及，這對八大的籌備產生了重大影響，八大的主題和指導思想因而幾經變動。

1 八大的籌備與主要文件的形成

在為八大準備的諸文件中，由胡喬木主要執筆的黨章和黨章修改報告稿形成較早。1955年10月20日，產生了黨章第一次修改稿，只有條文，「黨綱」部分闕如，在小範圍內徵求意見。1956年4月，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後產生第二次修改稿，補寫了「黨綱」部分。修改稿下發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徵求意見的範圍擴大了。這次修改最重要的內容是提出了實行常任制和增設中央副主席的問題。在4月2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以徵詢意見的口吻提出：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是否可以依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常任代表。他解釋常任制的好處時說：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是黨代表大會。常任代表就是一年開一次會，我們已經十年沒有開代表大會了，有了這個制度就非開不可。是否可以考慮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根據毛澤東、劉少奇的意見，並聽取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的意見後，鄧小平主持起草小組再作修改，加寫了從中央到縣一級黨代表採用「常任制」的條文。但增設副主席問題尚未形諸於文字，仍在醞釀。

5月17日、19日、21日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隨後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各部委黨組發出通知，就是否設立常任制度和中央領導機構設置兩個問題進一步徵求意見。關於中央領導機構設置，提出了兩種方案讓各地黨組織考慮：一種是保持原來性質的書記處（相當於政

治局常委會），設一個副主席；一種是撤消原來的書記處，增設幾個副主席，同時設一個辦事機構（仍叫書記處或用其他名義）。7月30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專門委員會，討論落實中央機構的設置方案，同時研究八大的選舉問題。這個委員會由二十人組成，陳雲為第一召集人，鄧小平為第二召集人，包括了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之外幾乎所有高層重要領導人：彭真、彭德懷、董必武、鄧子恢、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譚震林、黃克誠、譚政、劉瀾濤、林楓、烏蘭夫，頗具權威性。

8月5日，鄧小平將專門委員會提出的方案上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核閱」。這個方案對中央領導機構設置作了重大修改：一是中央副主席由一人改為若干人；二是增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三是另設中央書記處，置於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之下；四是提出在必要時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職。毛澤東對這個方案比較滿意，但在「副主席若干人」之後，又加寫了「和總書記一人」。他已經考慮選出一名總書記，與中央副主席一起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經中央政治局討論確定後，8月17日形成了黨章修改稿，隨後又完成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稿。在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上，除對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人選向與會者作了解釋外，這兩份文件沒有再作大的變動，即付通過。[2]

相比較而言，八大政治報告的形成則經過了多次反覆。最初的報告草稿是陳伯達1955年12月寫出的，劉少奇看後印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人審閱。但這份草稿只有引言和國際問題，其他部分僅列出了標題。[3]此時，無論是執筆人陳伯達，還是主持人劉少奇，思路還極不成熟，在此後長達七個月時間裏再未提交草稿。箇中原因，主要是1956年初以來，國內外形勢發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在國內是1955年下半年以後出現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在國外是1956年初蘇共二十大的召開。

1955年3月最初確定召開八大時，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尚未出現，因此八大的任務自然是繼續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以推動社會主義改造為中心。以後不久，農業合作化掀起高潮，接着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也出現高潮。可以預見，到八大召開前，全國已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主要目標——進入「社會主義」也就提前實現了。於是，對八大必須提出新的任務。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反對右傾保守主義，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導思想，同時要求以此為中心思想準備八大。劉少奇立即召集中央座談會，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並部署八大的準備工作。劉少奇要求大家以「反對保守主義」來「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4]就在全黨準備

以反保守主義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為指導，推動經濟建設「躍進」的時候，蘇共二十大傳來一聲驚雷。

蘇共二十大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共黨內外也引起了極大震動。面對連蘇共自己都承認的一系列錯誤，中共領導人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蘇聯道路並非沒有缺陷，必須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毛澤東說：赫魯曉夫「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5]與此同時，劉少奇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一直在聽取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的匯報，毛澤東受此啟發，也開始做大量的調查研究。結合蘇聯的教訓和中國的具體問題，毛澤東在4月下旬反覆講「十大關係」，一個總的指導思想，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經濟建設的方針，毛澤東還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以及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一些新想法。劉少奇由此認為，「論十大關係」確定了八大政治報告的基調。當年參加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大概在1956年4、5月間，一次劉少奇開會回來，大約是晚上十點多鐘了，打電話找我和陳伯達等去他那裏。劉少奇非常高興。他說：主席作了調查，講了十大關係，十大關係應當成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綱。......隨後，胡喬木按照劉少奇以十大關係為綱要的意見起草了政治報告。」[6]

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問題，以及中國在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高潮後出現的新情況，也引起了中共其他領導人的憂慮和思考。如陳雲對社會主義改造後新問題的觀察和對策，周恩來關於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想法，劉少奇、董必武關於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想法，李維漢關於鞏固和加強人民民主和統一戰線的想法等等，都為八大路線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內容。特別是周恩來提出的在經濟發展中穩步前進的思想，對八大政治報告和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的起草，都產生了深刻影響。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以反對右傾保守主義作為準備八大的指導思想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都是贊同的。但是不久，周恩來等人就察覺到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傾向，提出要穩步前進。為此，周恩來甚至與毛澤東發生了正面爭執。反冒進得到劉少奇和陳雲、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多數財經工作領導人的支持。到1956年年中，經濟工作指導思想已經從反對右傾保守轉向重點反冒進，口號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沒有表示反對。[7]這一指導思想的轉變，不僅改變了當年經濟建設的方針和二五計劃的指標，而且直接影響到八大的準備，並成為八大路線的重要內容。

從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過程可以看出，八大路線的主導思想是毛澤

東提出的，但在當時中共高層比較民主和寬鬆的政治氣氛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八大路線是第一代中共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妥協的產物。

2 預備會議的「三大工程」

8月22日至9月13日召開了中共七屆七中全會，8月30日至9月12日又召開了八大預備會議，為八大作最後準備。這兩個會議在時間上交叉進行，只是與會者的範圍不同。參加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有七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61人，列席的有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42人；參加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的有八大代表946人。[8]最後的準備工作主要有三項內容：一是討論確定八大的主要文件，二是提名並預選新的中央委員會，三是準備大會發言。

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歷時一年多，在此期間，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種會議、約談、會見等130餘次，其中，商談政治報告40次，修改黨章報告33次，二五計劃建議18次。與此同時，還組織各省、市、自治區及軍隊大單位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組進行討論。[9]7月以後，毛澤東本人也以相當大的精力投入到文件的修改中，特別是「自始至終主持了政治報告的討論和修改」。[10]從8月上旬到9月14日這一個多月裏，毛澤東對政治報告進行了「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11]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載錄，關於政治報告的批語和修改有五十二條（處），關於黨章的修改和批語二條，關於修改黨章報告稿的批語一條，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稿的修改和批語四條，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稿的批語三條。[12]

8月22日政治報告初稿提交七中全會討論時，仍然很不成熟，稿子長達九萬字。在全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不滿意地說：政治報告九萬字，要搞七個半鐘頭。他要求「大作修改」，有些地方要重寫，篇幅砍掉三分之一。劉少奇也認為，這個草稿是個「毛稿」，「沒有搞好」。「這個稿子是很多人寫的，不是一個人寫的，因為今天一定要印給大家，所以就編輯一下，湊合攏來，有點應付的味道」。他希望「大家出點力」，「集體創作」。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宣布：「政治局準備公推少奇同志作報告」。[13]

根據毛的意見，七屆七中全會對政治報告提出了重大修改意見，篇幅大幅度壓縮，許多部分「打亂重分」，一些部分重寫。起草工作密鑼緊鼓，到預備會議的第三天，形成政治報告第四個修改稿。此後的修改工作是在胡喬木、陳伯達等主要起草人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主要領導人之間進行的。主要執筆人寫出修改稿，分送毛、劉、周

（部分還送陳雲等其他領導人）審改提出意見，再交起草人改定，打印成稿，送中央領導人。各部分稿子往往是平行作業，交叉進行。直至9月13日，才印出政治報告最後定稿的主要部分，而最後一部分「黨的領導」的印出，已是八大開幕前一天（9月14日）夜裏11點鐘了。關於二五計劃建議和關於建議的報告兩份文件，以及毛澤東在八大的開幕詞，也都是在八大開幕前一天最後定稿付印的。八大文件的形成顯得十分倉促，但也體現了一種集思廣益的民主空氣。從1955年4月算起，政治報告的起草經過了一年零四個月，前後各種修改稿達八十多份，整個報告經過了五次大的修改，其中吸收了很多人的意見。毛澤東對此很滿意。他在9月13日七屆七中全會閉幕會上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甚麼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不講甚麼人，對事不對人。」[14]

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還有一項重要議題，是協商提名和預選中央委員會。八大中央委員會選舉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八大預備會議上完成的，提交給八大的是一份等額候選人名單，八大正式選舉只是分出委員與候補委員，以及按照得票多少排出名次而已。與以往慣例不同的是，這次中央委員會的協商和預選，採取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多次協商和預選的程序。這或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在黨內實行民主選舉的一種嘗試。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一個原則：中央不提名單，由代表自己提，想提甚麼人就提甚麼人。然後由各代表團提出一個名單，中央集合起來，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團團長制定預選名單，發下去，各代表團進行預選，再由政治局集合，制定一個向大會提出的正式候選人名單。[15]名單醞釀和預選工作是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上進行的。最初提出的候選人名單約400人，[16]經過上下反覆醞釀，於9月8日擬定出一份170人名單，其中七屆中委67人，新提名者103人。9月10日，陳雲在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說，擬定這個名單經歷了三個過程：第一次是各代表團送中央政治局的名單。絕大多數代表團提出了兩個名單，一個是各位代表和代表小組提出的名單，一個是代表團領導人綜合斟酌的名單。第二次是中央政治局與代表團正副團長討論的名單，提出了150人、170人、190人、210人名額不等的四個名單。第三次是中央政治局與代表團正副團長一起，在充分討論了四個名單後，最後確定了一個170人的名單。這個名單注意到了黨務工作和群眾工作、省市工作、國家機關工作、軍隊工作、文化工作、婦女工作、民族工作、外交工作等八個方面。9月12日，各代表團進行了第一次預選，170人被提名為八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只是沒有分出委員與候補委員。[17]

這種下上結合、反覆協商的做法確實給人一種新鮮的感覺。[18]不過，選舉的原則還是事先確定的。毛澤東在會上的幾次講話，表達了這樣的意圖：一要照顧黨內資歷，二要顯示公道，三要凸顯黨的團結和寬容的形象。毛澤東面對的主要矛盾，是僧多粥少，不好平衡。因此他不得不劃出一條界限：只選紅軍時期的老幹部，「三八式」幹部一律不進中委。8月30日，毛在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現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培養起來的，這就是所謂「三八式」幹部，他們是我們很重要的工作基礎，沒有他們不行，但是這部分幹部人數很多，如果要安排，這屆中委的名額就要增加到好幾百人，所以這次就不考慮了。[19]9月10日，毛澤東在第二預備會上回答了提名是否公道的問題。他說，有很多同志，論才，論德，論犯錯誤的情況，他們都很好，但是沒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他解釋說，問題是這個名單要擴大，就要擴大到二百多、三百多。他風趣地說，照這樣下去，到革命勝利四十年的時候，可能要搞個兩三千人的中央委員會！那就只開中央委員會會議，不要開代表大會了。毛澤東進一步說，不公平的事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我們力爭求得比較公平一些。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20]李雪峰回憶說：「在一次籌備會上，毛主席就選舉中央委員問題專門指出：這次一些年輕的省委書記沒選上，先讓一讓老同志，讓他們先『過過癮』。實際上，主席講的不僅僅是讓一讓的問題，而是讓大家注意黨內團結的重要性。在後來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一些年輕的省委書記也都補選進中央委員會。」[21]

在討論候選人名單時，毛澤東特意堅持要選兩個人：李立三和王明。這兩個人都曾是黨內「錯誤路線的代表」，區別只在於李立三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並繼續在黨內工作，時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而王明在延安整風後一直心有怨氣，耿耿於懷，建國後便長期住在莫斯科。[22]在8月22日的全會上，毛澤東提名李立三和王明進中央委員會時說：一些代表會有抵觸，但把他們兩位都選上比較有利。一則是「涉及黨內許多人」，他們的思想還有代表性，二則是考慮「黨外的觀感」，讓人「覺得我們不輕易拋棄」犯錯誤的人。在8月30日的預備會上，為了進一步說服代表，毛澤東對李立三、王明作了一個階級分析。毛說，他們代表着黨內一百萬知識分子黨員，而這些知識分子「歸到小資產階級範疇比較合適」。由於「這部分知識分子黨員，前怕龍後怕虎，經常動搖，主觀主義最多，宗派主義不少」，所以，選舉王明路線和李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表示我們對待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這樣比較有利於改造全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在全世界也有影響。[23]這裏所謂黨外的和世界的影響，就是聯繫到斯大林對黨內反對派大開殺戒的

情況，以顯示中共與蘇共的區別。[24]

至於對大會發言的安排，主要的原則就是人要多，面要寬。在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要求發言「不要太長」，要「精彩」、「活潑」、「多樣化」。同主要文件的起草一樣，代表發言在會前也做了專門準備。發言稿都報送大會秘書處審閱，有些還送中央領導人審閱。如彭德懷、李立三、周揚等人的發言稿就曾經毛澤東親自審閱或修改。[25]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中，要求大會發言「對工作有意見，對黨的團結有意見，要有批評，要有豐富的批評。如果我們開一次會議沒有批評，淨講一套歌功頌德，那就沒有生氣，那無非是一個『好』字就行了，還要多講幹甚麼？」[26]毛澤東既需要生動活潑，也需要集思廣益。

「三大工程」是圍繞着八大的一個主題展開的：重點是國家建設，八大的議程安排和主要文獻都凸顯了這一主題。不僅中共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及關於建議的報告是八大三個主報告之一，而且劉少奇政治報告的重點和主要篇幅也是講經濟建設問題。[27]此外，重點講建設這一主題也反映在大會發言的安排上。大會發言的內容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科學、教育、外交、國防、法制、民族、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十分廣泛的領域，而工業受到特別的重視。鄧小平要求，工業方面除了比較系統的發言外，還要組織二十多篇稿子。他說「這樣才能表現出會議是在討論建設這個重點」。[28]從廣義上說，八大討論和決定的所有議題，包括健全國家政治生活，正確處理國際事務，加強執政黨建設等，都是圍繞如何完成工業化這個「巨大任務」展開的。

毛澤東本人對此更是情有獨鍾。8月22日，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毛澤東說，政治報告的「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主要的還是建設」。[29]8月3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進一步說明，大會的目的和宗旨「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鬥」。毛澤東下面一段話，表達了他對達到「強國」目標的渴望和雄心：

> 六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甚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

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30]

3 八大的召開及其特點

中共八大於9月15日召開，歷時十三天。大會場面宏大隆重，表現出一個連續取得勝利的執政黨興盛發達的景象。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1021名，列席會議的候補代表107名。參加大會的還有在京的黨、政、軍、群負責人，各民主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以及來自世界五十六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和勞動黨代表團。[31]最引人注目的是這批遠道而來的客人，雖然從斯大林時期開始，共產黨召開代表大會邀請世界各國黨派代表團出席已成慣例，但在中共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當這些外國人出現在主席台上時，代表們興奮地感到，中國黨已經成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大黨。[32]

儘管會議代表和參加者人數眾多，但在八大召開過程中，只有一天的分組討論，其餘時間都是集中開大會。毛澤東作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與中共七大不同，毛澤東把大會的主要角色讓給了劉少奇等人，這也是開了一個先例。八大期間，毛澤東表露出有逐步退出第一線的考慮。他曾對外國客人說：「這次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其目的是「集中精力思考大事，思考大的理論和戰略問題」。[33]

除了主要報告以外，會議的日程基本上由68個大會發言和49個外賓致詞所佔用。[34]在總計183篇大會發言、書面發言和未刊發言中，包括了中央領導人、地方各級黨委和中央各部委、國家各部委負責人的發言，也有來自基層黨組織負責人或普遍黨員代表的發言。[35]八大大會發言之多，範圍之廣，在歷屆黨代會中絕無僅有。不過，應該特別注意的，不是大會發言的數量，而是其內容。儘管自七大以來，中共的事業可謂一路凱歌行進，但多數發言並沒有像蘇共十九大那樣歌功頌德，而是就各自領域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發表意見，並提出建議，其中也不乏批評。這種務實的基調，是年初以來形成的探索氣氛的繼續，也與毛澤東在會前的招呼有關。這些大會發言不只是對主要報告的展開，而且提出了一些主要文件沒有深入涉及的極為重要的問題，成為大會主要報告的重要補充。因此，這些發言是研究八大歷史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

大會最後一項議程是選舉。根據七屆七中全會確定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八大開幕後進行了第二次預選，97人被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

人，73人被提名為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然後，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舉行正式選舉。與按姓氏筆劃排序的慣例不同，當選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均按得票多少排序。[36]從預選到正式選舉的程序看，如此公開透明，在中共黨內以往的選舉中是少見的。不過，從選舉的原則看，中共依然無法跳出「論資排輩」和「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窠臼。毛澤東提出的「三八式」幹部一般不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原則被代表們所接受。其結果只能是把一批稍有現代知識的幹部摒於領導層之外。在170名正式中委和候補中委中，大多是剛剛脫了軍裝的職業軍人，他們久經戰場洗禮，習慣於服從命令和發號施令，卻缺乏組織經濟建設的經驗和必備知識。不過，這也是中共黨員成份的實際反映。八大時，中共黨員1073萬人，其中工人黨員佔14%，農民黨員佔69.1%，知識分子黨員佔11.7%。[37]中央委員會的這種結構，也就是當時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的基本狀況。在毛澤東看來，這也是不得已的選擇。他在9月10日的講話中無奈地說：「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否領導科學工作、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委員會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毛提出，「要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100萬到150萬高級知識分子。那時中央委員會的成份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38]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也提出了一個任務：「黨必須特別注意培養精通生產技術和其他各種專門業務知識的幹部，因為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力量。」[39]

4 八大選舉的中央領導機構

八大閉幕的第二天（9月28日）召開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還選出了由十七名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董必武為書記，劉瀾濤等五人為副書記。[40]

中央領導層組成的最大變化是增設了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這件事

醞釀已久，早在4月28日有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向黨內打招呼。在七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兩次就這個問題作出說明。8月22日，毛澤東說：主要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工作的有利，準備設幾層屏障。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或者是從飛機上掉下來，或者是一個炸彈下來，把主席打死了，還有副主席，把一個副主席打死了，還有三個副主席，把兩個副主席打死了，還有兩個，把三個打死了，還有一個，統統打死了，還有個總書記，總而言之是有備無患。[41]9月13日，毛澤東講話又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設幾名副主席是劉少奇首先提出來的。毛澤東說：「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二是毛澤東對中央設一線二線的考慮。他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麼一個作用。……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派一個名譽主席。」[42]說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工作便利，但很難說在高饒事件之後，毛澤東就沒有權力制衡的考慮，而劉少奇則可能想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實際上是一種危險處境。

中央政治局委員從七大的十三人增加到十七人，並增選政治局候補委員六人。繼續當選的九名七大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懷（另外四名，任弼時1950年病逝，高崗1954年自殺，康生、張聞天降為候補委員）。新當選的八名政治局委員是鄧小平、林彪、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劉伯承、賀龍、李先念。其中林彪、鄧小平已在七屆五中全會增補為政治局委員。從名單看，政治局的變動主要考慮了兩個因素，一個是在中共取得政權中發揮的作用，如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有七位都進入了政治局（新增五位）。另一個考慮是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如新選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財政部長李先念為政治局委員，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都反映了這種考慮。這種安排是基於中共政治現實的必然選擇，然而，同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缺陷一樣，政治局仍然由革命家組成，其中軍事將領和由軍事將領轉業而來的領導人佔絕對多數，而懂經濟的還是很少，搞科學技術的則根本沒有。這種結構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此後二十餘年中國發展的某些特點。

在中央政治局中，有兩個人的地位下降值得引起注意：一個是彭德懷，一個是康生。彭德懷是七大政治局委員，又攜抗美援朝戰爭的卓越戰功而歸，出任國防部長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然而，在

中央政治局中，卻排在新當選的鄧小平、林彪、羅榮桓、陳毅、李富春之後。鄧一直受毛重視，尚可理解，但林彪建國後長期養病不出，另外三人過去的地位和影響更不及彭。這充分表明毛澤東在那時對彭德懷已經不信任，亦可說明廬山會議時毛澤東為甚麼會因彭的一封私人信件就大發雷霆，並藉此改變初衷。

同樣是從政治局委員滑落為候補委員，張聞天的情況黨內盡人皆知，沒有疑義，但康生不僅降為候補委員，而且排名還在陳伯達之後，這引起了許多猜測和議論。據調查反映，山東、河南、天津、武漢等地機關幹部和民主人士議論最多的是選舉結果。對康生、張聞天這次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感到奇怪」，特別是認為康生的資格很老，過去在黨的領導人中排名緊在陳雲之後，位列第六，而這次不僅降為候補委員，且排名倒數第二，「變化太大了」。[43]康生的地位滑落，明顯地表明他在毛澤東那裏已經失勢。至於為甚麼失勢，麥克法夸爾有一個猜測：「導致他降職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由於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後在共產黨陣營中普遍掀起對秘密警察的反感。」[44]考慮到康生在延安整風期間的所作所為及其給中共幹部留下的印象，這個判斷不無道理。[45]

在新的中央領導人中，有兩個人得到了明顯的擢升，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陳雲。鄧小平地位的上升並不突然。1954年6月，鄧就被任命為中央書記處秘書長。1955年3月全國黨代表會議上鄧便以秘書長的身份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七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被委以負責八大籌備工作的重任。不過即使有了這些鋪墊，鄧在八大中央政治局裏的排名從最後一位上升到第六位，並被挑選作總書記，成為六大常委之一，其地位的顯著上升也是超出常規的。鄧表示對出任總書記一職「有點誠惶誠恐」，自己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不能不就此作特別的推舉，毛說：「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毛讚揚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46]看來毛選擇鄧，一是看重他的才能，二是相信鄧在未來的黨內鬥爭同樣會站在自己一邊。

陳雲的擢升是順理成章的事。1950年6月，「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病重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就決定，陳雲參加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組成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主席團。[47]陳雲是中共最重要的財經專家，自建國以來一直是財經工作的主要決策者，

顯露出經濟管理才能，得到毛的讚譽。不過在崇尚戰功的年代，相比於那些戰功卓著的將帥們，陳雲仍然感到自己出任中央副主席「不順」。為此，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上推舉陳雲說：「至於陳雲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後這幾年，我和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至於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毛還以陳的家庭出身來加強其砝碼，毛說：「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裏工人階級成份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五個人裏頭就有一個。」[48]

[1]1955年4月21日，鄧小平提出了兩個起草委員會名單，5月9日，經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由王稼祥、劉少奇、陳雲、陳伯達、胡喬木、陸定一、鄧小平等七人組成；修改黨章和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由安子文、劉瀾濤、宋任窮、李雪峰、胡喬木、馬明方、楊尚昆、鄧小平、譚震林等九人組成。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正式作出召開八大的決議時，在八大議程中增加了一項，即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後改為「建議」），文件由周恩來組織國家計委的人起草。參見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118—119。

[2]以上關於修改黨章的過程參見《中共八大史》，頁187—19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509—510。

[3]《中共八大史》，頁150—151。

[4]《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8—9。

[5]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6。

[6]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頁511。

[7]詳見本書第三章。

[8]《中共八大史》，頁121、125。

[9]《中共八大史》，頁119—120。

[10]7月6日到14日，毛澤東先後六次召集起草委員會會議，討論政治報告初稿。15日和19日，又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從7月23日起，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先後移住北戴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中，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兩個報告的起草委員會會議，並對政治報告、黨章、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進行仔細推敲和認真修改，還常常單獨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交換意見。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512。

[11]《毛澤東傳（1949—1976）》，頁513。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出版社，1992），頁136—169。

[13]《中共八大史》，頁122—123。

[14]《毛澤東傳（1949—1976）》，頁512—516；《中共八大史》，頁158—168。

[15]《中共八大史》，頁124。

[16]李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歷史片斷回憶〉，《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4期，頁9。

[17]《中共八大史》，頁131、132、135。

[18]大會參加者于光遠在回憶中談到了這種感受。參見于光遠：〈難忘黨的八大〉，《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4期，頁13—14。

[19]《中共八大史》，頁130。

[20]《中共八大史》，頁135。

[21]李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歷史片斷回憶〉，頁9。

[22]1956年8月7日，中共中央曾電告其回國參加八大，還委託李富春訪蘇時看望王明，希望他能回國參加八大。王明稱身體一直不好，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參見閻明復：〈我隨李富春訪問蘇聯〉，《炎黃春秋》，2005年第4期，頁26。9月8日，王明回電劉少奇，稱病請假，明確表示不能回國。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98。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95—97。

[24]毛澤東在一次同波蘭大使的談話中說到，中國領導人對那些犯過錯誤的同志沒有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在八大上選舉王明和李立三進入中央委員會就是例證」。參見基里洛克致拉帕茨基電，1956年12月4日，Dzis, nr.10, 1996r., s.126-128.

[25]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92—193、194、210。

[26]《中共八大史》，頁123。

[27]鄧小平在預備會上說：「這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國家建設，少奇同志報告的中心問題是國家建設。」參見《中共八大史》，頁127。

[28]《中共八大史》，頁123。

[29]《中共八大史》，頁123。

[30]《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88—89。

[31]《人民日報》，1956年9月16日。

[32]此後不久由於中蘇分裂，中共歷次代表大會再無此景觀，遂使八大成了空前絕後的一例。

[3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261—262。

[34]除大會發言外，還有四十五人作書面發言。此外，有七十人準備的發言稿，既沒有在大會發言也沒有作為書面發言刊登，其中包括張聞天、徐向前、賀龍、聶榮臻、葉劍英、陸定一、譚震林等重要人物的發言稿。參見《中共八大史》，頁238。另參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以下簡稱《八大文獻》），目錄頁。

[35]《中共八大史》，頁229；參見《八大文獻》，目錄頁。

[36]詳見《中共八大史》，頁342—347。

[37]《八大文獻》，頁98。

[38]《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02。

[39]《八大文獻》，頁106。

[40]《中共八大史》，頁348—349。

[41]《中共八大史》，頁124—125。

[42]《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11。

[43]《內部參考》，1956年10月10日，頁854—855。

[44]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頁224。

[45]關於中共延安整風的情況，有兩本很值得閱讀的專著：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何方的《黨史筆記》，上、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46]《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11—112。

[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56。

[48]《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12。

二 八大的路線和成果

中共八大之所以引起史學界持久的興趣，主要在於它制定的路線。所謂八大路線，其核心是重新估計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內階級狀況和社會主要矛盾，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工業化建設上來，「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1]從革命轉向建設，這是中共政治路線的一次重大轉變，也是中共對自身從一個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初步認識。

1 政治報告與政治決議「懸案」

八大政治路線的提出，是基於這樣一種政治估計：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包括：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這兩次勝利，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已經被趕走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除個別地區以外也已經消滅了；富農階級正在消滅中；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廣大農民和其他個體勞動者已經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領導階級；知識界已經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國內各民族已經組成為一個團結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更加擴大和鞏固；中國參加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抗美援朝戰爭制止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兇焰，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總之，「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2]

對於這條政治路線，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作了一個更加精到的概括。決議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近百年間，中國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而中國共產黨早就指出，掃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工業化問題。現

在，由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已經基本掃除了。雖然還有鬥爭，但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的前提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我們必須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採取正確的政策，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3]

與劉少奇的政治報告相比，決議新增加的內容，最重要的就是關於主要矛盾的分析。在此之前，中共在分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時，歷來都是講階級矛盾或者民族矛盾（民族鬥爭說到底也是階級鬥爭），而八大決議卻提出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轉變。在中國史學界，人們講到八大的偉大功績時，大多把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分析列在第一位，認為這是八大路線的理論基礎。同時，在研究中爭議比較大的問題，也出現在這裏。

現在看到的材料可以說明，八大政治路線的形成是經過較長時間醞釀的。把工作重點轉到工業化建設上來，正是毛澤東在1955年底1956年初社會主義高潮剛剛出現以後最先提出來的。1956年初中共召開的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國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中國科學技術十二年發展規劃，就是在為實現這一轉變做準備。1956年1月1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在毛澤東看來，「目前我國的政治形勢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改造的最終完成指日可待，而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必然使社會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4]1月30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也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勝負是已經被決定了」。這為社會主義工業的加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5]這樣一種估計在黨內高層有着廣泛的共識，並且在起草八大政治報告過程中日益明確。

7月13日，劉少奇在與羅馬尼亞駐華大使的談話中說：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巨大勝利，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資本家、地主、富農都將進入社會主義，「我們已經在階級鬥爭中取得了全面的

勝利」。[6]7至8月間，劉少奇在為修改政治報告稿起草的一份手稿中，在分析國內階級鬥爭形勢時指出：在中國，由於1955年下半年出現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目前我們的中心任務，就是要充分利用在兩次偉大革命勝利之後所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生產力，特別是要很好地利用業已組織起來、勤勞勇敢的六億中國人民的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來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國經濟落後和文化落後的狀態，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富裕起來。」[7]這是八大政治路線的最初表達。[8]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提及，就是八大沒有宣布過渡時期的結束。[9]關於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3年底毛澤東最後確定的表述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認為，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而完成過渡任務的時間「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10]八大宣布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上完成」，但在八大政治報告、八大決議以及領導人的講話中，都沒有提及過渡時期結束的問題。

其實這並不難理解，問題就出在1956年初國內形勢的急劇變化。原來設想，過渡時期的兩個任務，即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大約會同時完成，甚至認為工業化是關鍵，「是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11]這兩個任務完成，過渡時期即結束。現在，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雖然突然提前完成——是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所有制還沒有成為「唯一的經濟基礎」，而工業化的任務才剛剛開始，自然無法宣布過渡時期結束。不過，關於過渡時期的表述確實需要修正一下，應該更準確，更全面。考慮到這一點，八大通過的黨章確定，所謂過渡時期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任務還是那兩項。[12]所以說，八大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法，與過去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13]

真正引起爭議的是八大決議，特別是其中關於主要矛盾的表述。八大過後不久，毛澤東就對決議中的一些說法表示不滿意。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重提階級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以後，八大決議受到了更多的指責。文化大革命中更把這個決議與所謂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聯繫起來。[14]那麼，八大決議究竟是怎樣起草的？「主要矛盾」的說法是誰首先提出來的？毛澤東最初對決議不滿是甚麼時候提出來的？其異議主要在是指決議的哪些內容？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八大「懸案」。[15]

從檔案文獻看，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是在會議期間臨時動議起草的。直到大會正式會議開幕，沒有任何起草決議的跡象。[16]據參加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胡繩的日記記載，八大正式會議開幕後的第三天，即9月17日，才提出搞一個決議案。[17]決議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9月19日鄧力群、田家英、胡繩等人分頭寫出第一稿，當晚大會主席團進行討論，沒有通過。9月19至22日，毛澤東連續數次約陳伯達和胡喬木「談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的修改問題」。9月23日由胡喬木寫出第二稿，約八千字，分為十個問題。[18]毛澤東看過此稿後，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9月24日修正草案）〉，於9月24日晨5時吩咐楊尚昆，用電話通知各代表團團長和各小組組長，立即閱讀決議草案，並於當天下午2時以前，各個小組開會討論一次，由秘書處將修改意見彙總送交胡喬木，再作修改。[19]24日21時至翌日1時20分，毛澤東召集大會主席團常委和各代表團團長開會，討論修改決議草案問題。在此基礎上，由胡喬木主持再作具體修改。26日改出，即為〈9月26日修正草案〉，又發大會各組討論。當晚，毛澤東主持主席團常委會再次討論、定稿。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決議草案上批道：「即送胡喬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譯。我在第五頁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國家』幾個字」，時間是9月27日晨2時。[20]胡喬木在最後定稿的打印稿上，又作了少量文字修改。[21]當日下午大會一致通過「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22]

搞一個政治決議的主意究竟是誰、因何提出的，現在無從考察。不過，從上述事情發展過程看，決議的起草雖然倉促，但其形成經過了大會主席團（包括主席團常委）研究和大會代表分組討論，並多次修改，絕非草率之作。關鍵的問題是，所謂「主要矛盾」和「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說法到底是如何提出的。

據現在可以看到的檔案，關於主要矛盾的說法，第一次是出現在「9月24日修正草案」中：「在基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後，我們現在面對着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經濟和文化之間的矛盾。我們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同我國各族人民一起，解決這個新的矛盾，使我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變為了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23]胡繩回想說，提出「當前主要矛盾」的，可能是胡喬木。[24]既然決議稿是胡喬木起草的，這樣說是可以理解的。但應注意，在胡起草過程中曾多次與毛談話，因此也很有可能這個說法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在歷史轉折時期，對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重新判斷，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思維方式。這裏有一個間接的證據：據華北代表團9月24日討論政治報告決議草案的記錄，薄一波傳達了毛澤東對決議草稿的意見，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現在

主要是先進與落後。」[25]這裏所謂突出先進與落後的矛盾，意思就是講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鬥爭了。[26]

後來在分組討論中，「先進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經濟和文化之間的矛盾」的提法受到西南代表團的質疑。9月26日提交大會主席團常委會討論的稿子，已經刪掉了這句話，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改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實際之間的矛盾，就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這種落後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27]直到27日凌晨毛澤東批示「付印」的決議「定稿」中，還沒有「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句話。但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出現了這句話。

據胡喬木回憶，這句話為陳伯達所加。[28]陳伯達自己的回憶也印證了這個說法。[29]但據韓鋼查閱原始檔案，在決議最後「定稿」上留下的卻是胡喬木的修改筆跡。[30]看起來，這句話很可能是陳伯達提出後由胡喬木加到決議稿上去的。在決議中加上這句話是否經過了毛澤東的同意？有兩種說法：胡喬木說：「我和陳伯達兩個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後，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31]陳伯達說沒有經過毛澤東過目：「我修改好決議後，已經來不及送毛主席看。原先的稿子他已看過，這時已不好再去打擾他。這樣，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會上宣讀了。」[32]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考證，「毛澤東於27日下午1時10分至1時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陳伯達和胡喬木就是在這個時候將修改後的決議稿送給毛澤東審閱的。」[33]由此可以確定，陳的回憶有誤。儘管事情倉促，毛澤東事先還是知道並且同意關於主要矛盾的這個表述的（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匆忙間他沒有留意這句話），但正是對這句話，毛澤東後來表示不滿。

關於毛澤東如何表示不滿的，也有幾個人的不同回憶。陳伯達在他晚年的口述中回憶說：「（八大）會後葉飛告訴我，宣讀決議的時候，當唸到『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句話時，毛主席說了一句：『這句話不好』。」[34]王光美回憶說，「八大結束之後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少奇說：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十分震驚，只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麼辦？』」[35]鄧力群回憶說：「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後，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的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的比較。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澤東講的這個意見。」[36]這些回憶表明，毛澤東確曾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反覆談過他有不滿意見。但重要的是，這些不同的回憶有一個共同

點，即毛澤東當時表示不滿的，只是表述主要矛盾「實質」的那句話，並沒有對八大關於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的基本判斷提出異議。改變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基本論斷，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的事。即使在1957年10月重提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時，毛澤東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的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37]

到此為止，筆者研究的結論是，所謂八大「懸案」已經解決：第一，這個決議與劉少奇沒有甚麼關係，從頭至尾都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完成的；第二，決議的主旨是講階級矛盾已經不是當前的主要矛盾了，這個結論與毛澤東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第三，關於表述主要矛盾的實質的那段話，毛澤東事先匆匆看過，沒有提出異議；第四，所謂「先進」社會制度與「落後」生產力的矛盾，無非是說生產關係的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生產力還很落後，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這個表述可能不是很嚴謹，但本意不錯。至於毛澤東後來的種種說法，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最後一點，毛澤東對這種表述不滿意，如胡喬木所說，「也包含一點他後來表現出來的另一種傾向，就是覺得生產關係還不夠先進，還可以更先進」。[38]後來毛澤東提倡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概就是這種思想的發展。

2 積極穩妥的經濟建設方針

關於經濟建設，總目標還是工業化，即「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但八大提出，「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39]這個提法把過去「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的口號具體化了，提出了建設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要求，並且提出了「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概念。

為了實現工業化的總目標，八大規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並且提出了一整套方針政策。其中貫穿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必須把各項計劃指標放在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40]這個指導思想在幾個文件中不斷地得到強調。周恩來在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中總結了四條經驗教訓，第一條就是「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41]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完全肯定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二五計劃建議，他指出：「黨中央委員會所建議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發展速度是積極的，同時又是穩妥可靠的。發展速度必須是積極的，以免喪失時機，陷入保守主義的錯誤；又必須是穩妥可靠的，以

免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使人民的負擔過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門互相脫節，使計劃不能完成，造成浪費，那就是冒險主義的錯誤。」[42]

這個方針是基於國內和國外兩方面的經驗提出來的。

首先是中國人自己的經驗和感受。周恩來在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指出：一五計劃期間「我們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如在制定1955年計劃時，由於前兩年農業減產，基本建設規模定得比較小。結果造成財政結餘過多，重要建築材料出現一時的虛假過剩。又沒有健全物資儲備制度，用出口的辦法來解決物資積壓的問題。到了1956年，由於上年度農業豐收，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巨大勝利，基本建設規模又定大了。各部門出現齊頭並進和急於求成的傾向，結果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造成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在處理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這個關係的時候，也曾經部分地犯過錯誤。周恩來承認，「我們計劃工作還缺乏經驗」。他感到，「在我們這樣一個地區廣闊、情況複雜並且經濟上正在劇烈變革的國家裏，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發生重大的錯誤，造成重大的損失」。因此，特別應當保持謹慎，尤其是在編制長期計劃時，「要保留一定的後備力量，使計劃比較可靠」；而在年度計劃中積極發揮潛力，以保證長期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43]

另外也是對蘇聯、東歐國家經驗的借鑑。「以蘇為鑑」是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主題，波蘭、匈牙利等國出現動盪以後，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經驗教訓更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嚴重關注。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蘇聯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這個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發展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毛澤東同志在這幾個月常說，我們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周說，發展重工業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但「過分地束緊褲帶」，人民群眾積極性就不能很好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重工業也還得停下來。周特別提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值得我們引為教訓」。[44]

應該指出，貫穿於二五計劃建議中的指導思想，在八大是取得了共識的。除主要文件外，大會的許多發言，包括李富春、陳雲、薄一波、李先念、鄧子恢等國務院領導人以及許多地方領導人發言，都贊同二五計劃建議中體現的基本精神。整個大會期間，沒有人再提「多、快、好、省」和〈農業四十條〉了。周恩來報告中提到〈農業四十條〉時，也是講它帶來的消極後果。[45]甚至毛澤東本人對此也沒有提出任何異議。[46]

在計劃經濟體制中，積極穩妥的建設方針在本質上就是力求正確處理各種比例關係，使國民經濟在綜合平衡中穩定發展。八大明確地把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作為指導方針，特別是其中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二五計劃建議中作了認真的考慮和安排。如何保持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綜合平衡發展，也是大會發言談到最多的一個問題。李富春發言指出：國民經濟的各方面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方面過分突出和過分落後，都會引起比例關係的失調，妨礙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他提出，必須認真加強綜合平衡、全面安排的工作。[47]薄一波在發言中，總結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增長過快造成各方面失調的教訓，提出應當合理規定基本建設支出與其他方面支出的比例關係，同時合理規定基本建設支出中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交通運輸、商業、文教衛生等方面的投資比例，以及生產性投資與非生產性投資的比例關係。否則，同樣會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失調。[48]鄧子恢從鞏固工農聯盟的政治高度來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他批評有人認為合作化後工農聯盟問題就無足輕重了，農民的利益就可以不加重視了，就可以利用組織起來的便利條件採取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而不必再走群眾路線了。他警告說，這樣工農聯盟「甚至有被破壞的危險」。他提出要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保持工農業發展相適應；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必須正確處理國家與農民的關係，主要是處理國家資金積累與農民消費之間的關係，在農副產品稅收與工業農業產品價格上要有一個正確的比例，在徵用農民土地和調用民工等方面也要照顧農民的利益。[49]一些地方負責人的發言也都強調國民經濟發展必須做到綜合平衡，這是他們幾年來領導財經工作得出的一條共同的經驗。

現在看來，這些發言的願望都是好的，對過去的教訓也有所領悟，提出積極穩妥、綜合平衡的方針更是符合國情的。但是如何貫徹落實這些方針，卻沒有具體的規定和要求。同「十大關係」一樣，八大提出的經濟建設方針都只是一種原則，既要這樣，又要那樣，既要照顧這個，又要照顧那個，到底怎樣才算積極穩妥、綜合平衡，沒有確切的說明。在實際貫徹這些方針時，無論中央和地方，又都無法擺脫兩個既定的前提。第一，優先發展重工業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鐵的規律，這是不能突破的界線，所以中共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提出：「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中心任務仍然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主要標誌。」[50]第二，中國工業化的建設項目是以一五計劃為基礎展開的，二五計劃的許多項目又是一五計劃的繼續，而這些項目絕大多數都屬重工業。這些項目既不能停頓，也不能下馬，像劉少奇批評的，「有些同

志想把重工業發展的速度降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51]在這種前提下，要改變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比例，調整其他各種關係，餘地有限，實際上也很難辦到。

第一，關於發展速度。鑑於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教訓，經周恩來等人努力，八大決定放慢一點建設速度，以體現「既要重工業，又要人民」。周恩來說：「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52]八大確定的二五計劃的主要指標，是經過很大努力壓縮的結果。與年初設想的計劃相比，工農業總產值指標降低了27%，糧食總產量指標降低了21%，棉花總產量降低了46%。原來設想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鋼產量達到3000萬噸，八大把這個指標壓縮為2000萬噸到2500萬噸。[53]然而，這裏所謂的「放慢」，只是與1956年初提出的高指標相比較而言的。從實際情況看，八大的有些指標仍然偏高，如二五期間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6.2%，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加260億斤，大大高於一五期間農業生產預計的增長速度，是不切實的。八大提出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要求也是過急的。會後不到一年，國務院會議就決定消減一些無法完成的指標，撤消部分進口設備合同。[54]正是由於基本觀念沒有轉變，更嚴重的後果是，1958年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大躍進」運動便輕而易舉地發動起來了。

第二，關於積累與消費。國家建設的規模主要決定於積累的規模。然而，如何規定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又是計劃經濟的一個難點。積累過高勢必妨礙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積累過低又要降低工業化的速度。鑑於蘇聯和東歐國家因積累過高、擠壓人民消費而引發社會動盪的教訓，八大關注的重點在於防止高積累的傾向。薄一波甚至提出，正確地解決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是工業化過程中「頭等重要的問題」。通過對一五計劃實踐經驗教訓的分析，薄提出了三組比例概念：在通常情況下，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的比重不低於20%；國民收入中國家預算收入的比重不低於30%；國家預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支出的比重不低於40%。[55]薄一波是八大代表關於經濟問題的發言中唯一把抽象原則量化為具體指數的人。但是，這個比例卻是高於一五計劃的。一方面八大的建議提出，「積累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可以稍高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達到的水平」，具體規定，基本建設投資在財政支出中所佔比重，從一五計劃的35%左右提高到40%左右。[56]另一方面，八大又規定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標：二五期間要使職工的平均工資提高20%到30%，農民的全部收入增長25%到30%。[57]實際上，在繼續維持高積累的情況下，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承諾是難以實現的。這裏的矛盾並沒有得到具體解決。

第三，關於資金分配。在八大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中，保證工農業

能夠獲得較高速度的發展，是分配投資的主要考慮。規定在投資總額中，工業投資所佔比重由「一五」的58.2%提高到60%左右；農業、水利和林業投資所佔比重由「一五」的7.6%提高到10%左右。工業投資中，適當提高輕工業的投資比重。同時要保持運輸、郵電、文化、教育、科學、保健、城市建設和商業等部門投資的適當比例。各行各業投資比重都要提高，那麼出路何在？八大的一個重大考慮，就是在預算中降低國防和行政費用的比重，爭取把這兩項費用所佔比重從「一五」時期的32%左右降到20%左右。[58]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說：「增加建設費用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進一步節減軍政費用。黨中央在1950年已經確定了這個方針，但是由於抗美援朝戰爭的發生，這個方針沒有能夠早日實現。」[59]周恩來後來也談到放慢國防工業的步子，主要是感到國際局勢緩和下來了。[60]這裏便出現了一個問題，一旦國際局勢緊張，原來設想的投資比例必然被打亂。這種情況不久後就擺在中共領導人面前了。

第四，關於工業布局。在一五計劃期間，中國的工業重點是逐步移向內地。這主要出於兩種考慮，一是為了改變七成以上的工業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現象，二是為了防止戰爭破壞。然而，工業重點內移使得沿海的優勢得不到發揮，現有工業基礎的潛力得不到挖掘，其結果影響了經濟發展的整體效益。八大提出，「應當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條件，繼續適當地發展那裏的工業，以幫助內地工業的發展，加速全國的工業化。必須在建設大型企業的同時，有計劃地新建和改建中小型企業」。[61]在這裏，所謂「適當」調整，就是說並不改變工業內移的總方針，而只是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區的有利條件來幫助內地工業發展。所以，周恩來雖然承認「近海地區原有的工業基礎，是我國工業化的出發點」，但仍然指出，「必須在內地有計劃地建設新的工業基地。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不可動搖的方針」。[62]結果是，基本狀況依然如舊。

以如此篇幅來論述八大經濟方針的缺陷，並非否認中共領導人的良好願望和周恩來等人的良苦用心，主要是想探討一下這一方針難以貫徹始終的根本原因，而對這一點，以往的研究略顯不足。當然，對這個問題的全面討論是下面幾章的任務。

3 改進計劃經濟體制的初步設想

最能體現八大在實踐中的探索精神的，應該說是對剛剛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初步檢討，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改進計劃經濟體制的初步設想。這種探索在大會主要文件中有所反映，但大部分內容是體現在大會的發言中。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陳雲作的題為〈關於資本主

義工商業改造高潮以後的新問題〉的發言，他集中地談到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後的體制問題，提出了一個改進計劃經濟體制的總體性設想。[63]

陳雲的發言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八大之前，陳雲已經多次講話提請全黨注意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出現的新問題，如由於改造過急，手工業和服務業合併過多，導致產品質量下降、品種減少，服務不周，造成居民生活不便；農業合作化過快，家庭經營減少，導致部分農副產品生產下降；公私合營和國營企業只顧生產大路貨，不願增加品種，產品貨不對路，等等。1月20日在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陳雲兩次就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農業生產問題發言，率先提出了這些問題。6月18日，陳雲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再次發言談有關私營工商業改造問題。在此期間，陳雲就工商業、手工業改造問題作了多次調查研究。[64]陳雲在八大的發言，集中了他半年多來調查了解的情況和觀察探索的成果。

陳雲把新體制建立後出現的新問題歸結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過去為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而採取的一些措施已經成為不必要，不能繼續沿襲。這種情況包括：一、國營商業對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辦法。這種辦法在過去是必要的，以後對於重要的輕工業產品也仍然要統購統銷，但如果仍舊不加區別地沿用這種辦法，就會使一部分工廠不像原來自銷時那樣關心產品的質量。二、國營批發公司大部分實行自上而下的派貨制度，使商業部門向工廠訂貨的品種規格減少了，難免在一些地方發生積壓或脫銷現象，給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並且造成資源浪費——陳雲把這種現象稱為搞「政治經濟」。三、目前的市場管理辦法限制私商採購和販運，實際上造成農產品、農業副產品由當地供銷合作社和國營商業獨家採購，沒有競爭，農副產品就會減產。

另一種情況是由於形勢發展太快，具體的組織指導工作不能及時跟上，產生了一些暫時的、局部的錯誤。這些錯誤包括：一、手工業過多地實行合併和統一計算盈虧，不利於手工業的經營。一部分手工業產品發生了質量下降、品種減少的現象，部分服務性的手工業合併經營後對居民和手工業者自己都發生了許多不便；二、私營工商業改造中也出現了一些盲目合併現象，產生了同手工業盲目合併類似的問題；三、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對應該由社員家庭經營的副業注意不夠，加上其他方面的影響，使部分農業副產品的生產有些下降。

對上述問題進行總結，陳雲認為下面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資本主義生產「大範圍不合理，但小範圍合理；我們現在是大範圍合理，小範圍不合理」。

為解決「小範圍不合理」的問題，陳雲提出五條改進措施：第一，改變工商企業之間的購銷關係。把商業部門對工廠實行加工訂貨的辦法，改為由工廠購進原料、銷售產品；商業部門除部分重要商品繼續統購統銷外，對品種繁多的日用商品逐步停止統購統銷，改用選購辦法。第二，工業、手工業、農業副產品和商業的很大一部分必須實行分散生產、分散經營，糾正盲目集中生產、集中經營的現象。絕大多數合營工廠不應合併成大廠；服務行業和手工業中要把大合作社改為小合作社，把統一計算盈虧改為各合作小組或各戶自負盈虧；小商小販在合作小組內各自經營的辦法應長期保存；農業方面許多副產品生產應放手讓社員分散經營。第三，在堅持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前提下，對部分農副產品實行國營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和供銷合作社自由收購、自由販運，禁止互相封鎖。第四，價格政策必須有利於生產。不要把物價穩定簡單地等同於「統一物價」或「凍結物價」，應允許價格在一定範圍內暫時漲落。第五，國家計劃管理辦法，應有適當變更，做到「管而不死」。既要管好市場，又不把市場搞死。

陳雲解釋說，採取上述措施的結果，在我國出現的不會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而是適合中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市場。陳雲歸納他的上述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設想：

> 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面，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统一市場裏，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65]

翻閱八大文獻可以看出，經濟體制問題確實是八大討論的一個熱點。除陳雲外，李富春、鄧子恢等國務院領導人和一些地方領導人的發言都涉及到經濟體制問題。原因很簡單，在三大改造高潮後，各級經濟職能部門的負責人普遍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決社會主義改造引發出來的一系列新矛盾。

李富春提出了改進計劃工作體制的問題。他承認在計劃工作中存在「不全面、不準確、不靈活和缺乏遠見」等缺點和錯誤，主要表現為：一、國家計委兼管長期計劃與年度計劃，並一度兼管工業、行政和基本建設，忙於日常事務，缺乏系統調查研究，因而造成計劃下達遲，變化

多，對各地方的特點了解也不夠。二、各部門綜合平衡工作做得欠缺，對中央工業注意多，對地方工業、農業、商業、文教事業注意不夠，在沿海與內地關係上對沿海工業的利用注意不夠；在工資、勞動生產率和生活供應三者關係上出現了偏差；1956年基本建設計劃中物資平衡不夠，引起經濟上和財政上的緊張。三、在體制上，沒有恰當地規定分級管理的範圍，對各地方各部門管得過多過死。

如何改進計劃工作？除了要求系統了解和研究中國經濟情況，加強綜合平衡、全面安排工作，掌握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外，李富春特別提出，要實行分級管理的計劃工作體制。分級管理的原則是既照顧到集中統一，又照顧到因地制宜。凡需要全國統一平衡的各項重要指標，由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綜合平衡，並報國務院批准後列入國家計劃統一下達；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屬於地區平衡或者各部門自行平衡的各項指標，即由各省、市、自治區或各部門自行平衡安排，並報國務院備案。其他許多次要的、種類繁多而無法一一納入國家計劃的指標，由地方或各基層單位自行安排，國家只從大的方面加以籌劃，並從價格、供銷關係上加以調節。他還建議，國家計劃指標可分為指令性指標、可調整指標和參考性指標三種。[66]隨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計劃覆蓋面的擴大，計劃管理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弊端開始顯露。李富春提出分級管理和計劃指標多樣性，是希望通過分權和給計劃體制注入某種靈活性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關於農業合作化體制問題，是代表發言談得最多的問題，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鄧子恢的發言。1955年為了合作化的速度問題，鄧子恢與毛澤東發生了當面爭論，被批判為「右傾」，「小腳女人」。然而，鄧子恢並沒有因此而三緘其口。在大會發言中，鄧子恢警告說，不要以為合作化以後就萬事大吉了。他從兩方面提出了改進合作化體制的意見：一是國家同合作社的關係；一是合作社同社員個人之間的關係。關於前者，鄧子恢主張，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保持合作社生產經營的獨立性，逐步改變現在由國家規定生產指標的制度過渡到只規定各省的調撥指標，各省、縣只規定各社的徵購指標，國家經濟部門則與合作社訂立經濟合同，合同之外可自行安排生產計劃，在徵購任務之外農民可以自由支配，「國家不要樣樣去干涉他們」。關於後者，鄧子恢主張，在分配上要採取「少扣多分」的方針；在生產經營上應採取「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的方針，合作社主要搞好農業生產和大宗副業生產，把利於分散經營的副業和手工業都交給社員去分散經營；允許社員有一定的勞動時間自己支配，去經營家庭副業和自留地，「而不應該去限制他們」；在生產資料的處理方面採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辦法，土地、耕畜和大農具歸集體所有，小農具、小工具和零星樹木和家畜、家禽等都歸社

員私有；在處理社員之間的關係上必須採取「雙方兼顧的政策，既照顧貧農社員的利益，又照顧中農社員的利益」。在合作社的組織領導上必須實行「民主和集中相結合」的原則，實現民主辦法。[67]

鄧子恢的這些意見得到了不少代表的呼應。許多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如湖南的周小舟、四川的李井泉、河北的林鐵、內蒙的烏蘭夫、福建的葉飛、廣西的陳漫遠、新疆的王恩茂、陝西的張德生等人的發言都指出，農業合作化中存在過分集中統一、過分強調一切公有化，社愈大愈好等傾向。周小舟介紹了湖南合作化後農村緊張的情況：合作社對於耕牛、農具等生產資料入社時作價壓得過低，因此引起部分農民不滿，甚至發生了一些糟踏、破壞生產資料的嚴重現象。在經營方面，連零星的家庭副業和分散的手工業，如打草鞋、捉魚、撈蝦、養豬、養雞、理髮、縫衣、編織、擺渡、運輸等等，都統一歸合作社經營。合作社對社員勞動時間卡得過緊，不安排社員經營家庭副業和種菜的時間，也不許他們到社外去勞動，某些社員反映：「入了社一點自由也沒有了」。[68]林鐵說：農業合作化的教訓是急躁情緒、過高指標。合作社不能保證90%的農民增加收入，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生產投資沒有量力而行；二是計工計酬不合理；三是農業增產，副業減產。林鐵還指出，合作社的規模過大，全省建立的聯村、聯鄉的大社佔33.02%，其中五百戶以上至數千戶的佔23%，大社農戶佔總農戶數的60%以上。[69]張德生說：不少農業社不顧條件追求大社、大隊、大組，生產秩序混亂，「派活亂點兵，做活一窩蜂」，只靠命令辦事，不和群眾商量，以致部分社員產生了幹部怎麼說就怎麼辦的消極情緒；只顧生產，不大關心社員的生活和健康，弄得社員既缺少零用錢，又缺少照顧家務和休息娛樂的時間，有的甚至號召社員「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電燈」，造成過分緊張的狀況，以致有人說：「農業社確實好，就是累的人受不了！」[70]還有許多人針對忽視家庭副業生產和社員收入減少的情況，提出了與鄧子恢類似的政策建議。[71]

對於手工業、商業過分集中的問題也提出了批評意見。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局長白如冰指出，手工業改造高潮中「出現了不適當地辦大社、辦多行業的綜合社，盲目地集中生產和統一計算盈虧，以致在有些行業原有的供銷關係被打亂了，產品質量下降了，品種花色減少了。在修理服務行業中，有的地區不適當地撤銷和合併服務點，既造成群眾不便，又使社員收入減少。這些缺點錯誤，應該繼續加以糾正」。他還談到，三大改造後「自由市場已基本消滅」，手工業的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都受到種種限制，不少地區出現停工待料現象。為此，白如冰提出了兩條改進意見：一是在進行經濟改組和技術改造時，必須特別注意保持手工業不同行業的生產經營特點，保持手工業與大工業之間應有的分工，不

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手工業向大工業看齊，變修理業為製造業，或者擠掉手工業複雜多樣的小產品。白如冰主張，對集中生產顯然有毛病的，應堅決地有準備、有步驟地劃為小社、小組，單獨核算；有的戶還應當允許其分散生產，自負盈虧。他認為，「集中生產與分散生產，統一核算盈虧與分別核算盈虧，不僅是組織形式的問題，而且是生產和經營制度上的一項重大變革」。二是在市場方面，呼籲手工業所需原料應當納入地方工業計劃，商業部門要給予便利；各種地方原料和廢品廢料應該允許他們自購自用；手工業大部分產品應當允許其自銷，也可以直接與工礦企業、農業合作社等建立銷售關係。[72]

商業部部長曾山發言指出，日用工業品生產和分配中存在着品種減少，質量下降，質次價高的現象；某些產品供應不及時，花色品種不對路，這裏積壓，那裏脫銷，不能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他認為，這是因為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辦法「帶來了一些消極因素」，使一部分工廠不再關心產品在市場上的銷路，因而不熱心提高質量和增加花色品種。在價格政策上沒有執行優質優價，次質次價，沒有給新產品試製以支持。工廠和商業部門各自都強調計劃性，某些計劃訂得不恰當，訂得過死，無法適應經常變化的市場需要。國營商業部門自上而下的調撥、分配的辦法使基層單位不能根據居民需要組織貨源，以致長期存在商業調配不及時，花色、品種不對路的情況。他主張把日用工業品分為兩類，大宗商品仍然實行統購包銷，花色品種複雜的零星商品商業部門優先向工廠選購，選購剩下商品工廠可委託商業部門代銷，允許工廠根據市場需要變動生產計劃。曾山認為，實行自由選購的辦法，「是商品分配方法上的一個重大變革」。[73]

關於經濟體制問題，在事先準備的大會主要文件中雖有所涉及，但論述不夠。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指出：「在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企業時期所採取的許多關於購銷關係的措施，現在必須改變，代之以適合於目前經濟情況的措施。」「我們應當改進現行的市場管理辦法，取消過嚴過死的限制；並且應當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的一定範圍，允許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74]周恩來的報告也提出：「今後不論在城市居民區或者廣大農村中，都應保持相當數量的小商小販。」與此相適應，「在國家統一市場的領導下，將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自由市場；在一定範圍內，將實行產品的自產自銷；對某些日用工業品，將推行選購辦法；對所有商品，將實行按質分等論價辦法，等等。採取這些措施，不僅不會破壞國家的統一市場，相反地，將會對國家的統一市場起有益的補充作用」。[75]然而，總的來看，這兩個報告對體制改革問題都沒有深入闡述。顯然，大會代表關於改進經濟體制的討論，是八大文件的重要補充，也使八大

路線進一步得到完善。這些發言，特別是陳雲提出的改進計劃經濟體制的總體設想，被大會所接受，成為八大路線中最具思想性和理論價值的一部分。

八大決議吸收了這些意見，提出：

> 為了適應社會的多方面需要，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有一部分產品將不列入國家計劃，而由生產單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場的情況進行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國家對於這一部分產品的生產只從供銷關係上加以調節，或者只規定參考性指標。如果把這一部分產品勉強列入國家計劃，或者把參考性指標當作正式計劃的指標，對於這些產品的生產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於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樣，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是實行集中經營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範圍的分散經營作為補充。在對於公私合營的工商業和合作化了的手工業、小商業、農村副業進行經濟改組的時候，必須根據各行各業的具體情況，正確地解決集中經營或者分散經營的問題。如果把應當分散經營的勉強地合併起來集中經營，那也就不合於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76]

八大關於經濟管理體制的討論，反映了中共對社會主義的一些新認識。不過，從總體上看，這種討論並沒有也不想突破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的模式。除毛澤東外，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在內的中國領導人，都是計劃經濟的崇拜者。他們原本不知計劃經濟為何物，後經蘇聯的直接幫助編制出一五計劃，最後好不容易才把計劃經濟體制建立起來。中共剛剛嚐到計劃經濟的甜頭，當然不會對計劃經濟本身發生根本的懷疑。即使發現了問題，也認為是執行中的錯誤。所提各種意見和建議，只是希望為這種模式注入一些靈活性，使計劃經濟適應中國的情況，以解決經濟生活中已經暴露出來的矛盾。

對於蘇聯式計劃經濟最沒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澤東。計劃經濟要求嚴格的比例和平衡，要求一絲不苟、照章辦事，這與毛澤東不講常規、不拘約束的特質格格不入，更不用說計劃經濟必然帶來的官僚化、科層化及其對基層和群眾活力的限制。毛澤東在講十大關係時，沒有提到計劃和市場的關係，也許並不是疏忽而是有意避開計劃體制問題。不過，毛澤東對計劃經濟的不滿，也不是從制度上反對這種經濟模式，[77]而是對那種一味講求平衡和四平八穩的做法看不慣。所以，毛澤東對計劃經濟體制的衝擊，沒有按照一般的邏輯思維導向對市場的重視。他的思路更注重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更多地發揮地方積極性，同時用群眾運動的方法來突破計劃的平衡和填補資金的缺口，創造奇跡和高速度。這種思路實質上就是用行政命令來指揮經濟，走到極端就是後來大躍進式的「命令經濟」。

還有一點必須看到，計劃經濟的基礎是國家所有制，而在所有制問題上，八大似乎傳遞了矛盾的信號：一方面，提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個體經濟和分散經營作補充，後來甚至提出資本家還可以開工廠；另一方面，又把消滅資本家和個體勞動者私有制殘餘當作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的標誌。[78]有不少研究者認為這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在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的兩種思路，但筆者更傾向於認為，這裏表現出來的矛盾，不過是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罷了：前者是暫時的策略性退卻，而後者是最終必須達到的目標。因此，從當時中共領導人的認識水平來看，八大不可能提出從根本上改革經濟體制的問題。

4 對國家民主和法制的呼籲

從多方面提出改進國家工作的任務，這是八大路線的一個特點。八大政治報告認為，中國實行「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結合」的國家制度已經表現了它的優越性，但並不是說國家制度已經一切都完備了。又特別指出，在許多國家機關中存在着官僚主義現象，「嚴重地妨礙着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進」。因此，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79]圍繞這一任務，八大提出了四個方面的政策：

第一，加強對國家工作的監督。八大提出的監督國家工作的途徑有四個：一是黨對於國家機關的領導和監督。除了各級黨委經常檢查各級政府中黨組織的工作以外，黨委的各個工作部門應當負責建立起對於有關的政府工作部門中黨組織和黨員的經常的監督。二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中央一級政府的監督和地方各級人大對地方各級政府的監督。三是各級政府機關的由上而下的監督和由下而上的監督。四是人民群眾和機關中的下級工作人員對國家機關的監督。八大政治報告特別強調：「必須鼓勵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評和揭露；凡是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的人，必須受到應得的處分。」[80]

第二，適當地調整中央和地方、上級地方與下級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這既是為了克服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也是為了廣泛地發揮地方和下級國家機關的積極性、機動性，「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高漲」。[81]改進國家行政體制，是當年提上國務院議程的一件大事。5月至7月，國務院召開了全國體制會議，檢查中央集權過多的現象，提出了一份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下發徵求意見。周恩來在八大的報告中，對改進國家行政體制作了詳細的說明。報告提出了劃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職權的七項原則，其中包括明確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應有一定的計劃、財政、事業、物資、人事管理權等。這些原則，中心

問題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適當擴大地方的權限。報告要求，這項工作今年準備，明年試辦，到二五期間全面實施。[82]

第三，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八大政治報告在說明中國「完全新式」的政權的性質時指出，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同時又有其他階級、其他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民族資產階級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無產階級專政允許資產階級參加，這與馬克思、列寧的設想不同，與蘇聯的做法也不同。除了考慮到歷史原因，劉少奇還解釋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比較早地掌握了現代的文化，並且掌握了一些現代企業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直到現在，他們仍然是我國具有比較豐富的現代文化知識、擁有比較多的知識分子和專家的一個階級」。因此，希望通過繼續維持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繼續吸納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入政權，團結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與此相適應，八大重申了「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實行這個方針有兩個政治目的：一是利用民主黨派去做團結、改造和利用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工作；一是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83]

第四，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尊重民族自治地區的各項自治權。具體做法是大量培養和選拔少數民族幹部，逐步實現民族自治機關的民族化；繼續團結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宗教界的愛國人士；積極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包括發展工業；克服「大漢族主義」，同時防止和糾正「地方民族主義」等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政策。八大規定：「凡屬少數民族地區尚待進行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必須由少數民族的人民和公眾領袖從容考慮，協商處理，並且堅持用和平的方式進行。」[84]這就是說，對少數民族地區採取與漢族地區相區別的政策，從容處理。

八大關於國家政治建設的另一項內容是呼籲建立和健全國家法制。由於中共歷來以政策治國，從不重視法制，所以八大提出這個問題就特別令人感興趣。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把健全國家的法制規定為「我們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這與蘇共二十大暴露出來的蘇聯破壞法制的嚴峻事實有關，也因為即將展開的大規模建設必須建立起一個有穩定預期的社會秩序。劉少奇解釋說：在革命戰爭時期和全國解放初期，為了肅清殘餘的敵人，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壞反動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據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規定一些臨時的綱領性的法律。在這個時期，鬥爭的主要任務是從反動統治下解放人民，從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下解放社會生產力，鬥爭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眾的直接行動。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

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因此，鬥爭的方法也就必須跟着改變，完備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劉少奇說：「為了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生產的利益，必須使全國每一個人都明瞭並且確信，只要他沒有違反法律，他的公民權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會受到任何機關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國家就必然出來加以干涉。我們的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律，而我們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必須貫徹執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負責和互相制約的制度。」[85]八大決議也指出：「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的法制，鞏固社會主義秩序。」[86]從以政策治國到以法律治國，從依靠「人民群眾的直接行動」到希望建立「完備的法制」，這是中共執政思想轉變的第一次明確表達。他們的認識已經開始接觸到公民權、互相制約等現代社會管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儘管還停留在表面上。

關於對國家法制的呼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的大會發言最值得重視。[87]在中共領導人中，董必武無疑是最具有法制理念的。董必武在發言中強調的重點，是當前建立完備法制的必要性。他說，開國七年來，我們已經有了憲法和許多重要法律、法令和法規。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還缺乏一些急需的較完整的基本法規，如刑法、民法、訴訟法、勞動法、土地使用法等。還有許多法規，如懲治反革命條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懲治貪污條例、農業稅法、工商業稅法和私營企業條例，以及政府有些部門的組織條例等，由於政治、經濟情況的變化，應該修改的還沒有修改，應該重新制定的還沒有重新制定。「現在無論就國家法制建設的需要來說，或者是就客觀的可能性來說，法制都應該逐漸完備起來。法制不完備的現象如果再讓他繼續存在，甚至拖得過久，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除了法制不完備，董必武更多地談到了有法不依的問題。他舉出種種輕視法制的現象。如對於人民代表大會每年會議的次數，憲法和各組織法都有明文規定。可是有些縣、鄉兩級人大，甚至個別省人大都沒有按期開會。不傾聽代表的意見，不按照法律規定的手續撤換代表，限制代表向人大反映群眾呼聲等違法現象時有發生。再如，有些地方黨委存在着黨政不分的現象，黨委往往直接發號施令，代替了一部分地方國家機關的行政工作。還有，經常發現有違法亂紀、侵犯人民群眾民主權利的現象，甚至有的人自命特殊，以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於法制之外。董必武特別指出了執法中的違法問題：有些地方對於違法犯罪的人犯，只注意他是否違法犯罪，而不注意嚴格履行法律手續；有些司法人員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的手續拘捕人犯，限制被告人行使辯護

和上訴的權利；有些監所和勞動改造單位的管理人員虐待犯人等等。

董必武還分析了產生輕視和蔑視法制現象的原因。他指出，就歷史根源說，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前，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舊統治的法制中進行的；奪得全國的政權以後，我們又徹底地摧毀了舊的政權機關和舊的法統。所以仇視舊法制的心理在我們黨內和革命群眾中有極深厚的基礎，這種仇視舊法制的心理「可能引起對一切法制的輕視心理」。全國解放初期，接連發動了幾次全國範圍的群眾運動，「革命的群眾運動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這可能帶來一種副產物，助長人們輕視一切法制的心理」。就社會根源說，我國社會各階級中，小資產階級佔絕對多數，黨員最大一部分也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小資產階級常常表現為「極端的革命狂熱」，「輕視一切法制的心理對小資產階級是容易投合的」。

董必武最後強調，公安、檢察、法院和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依法辦事」，這是加強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環節」。而依法辦事應該從兩方面入手，其一是必須做到有法可依。趕快把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幾種重要的法規制定出來。其二是必須做到有法必依。凡屬已有明文規定的，必須確切地執行，按照規定辦事；司法機關更應該嚴格地遵守。為此，特別要加強對中共黨員的法制思想教育，「黨員應當成為守法的模範」。同時，還必須加強司法機關尤其是檢察機關的組織，加速推行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

董必武的這個發言可以說是中共領導人對於國家法制認識的先驅，特別是他關於革命可能導致「對一切法制的輕視心理」的分析，既深刻又很尖銳。輕視法制是一切革命的副產品，在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說出這個事實，是需要膽識的。可惜，董必武的發言在八大會議上是「一花獨放」。不僅毛澤東在八大籌備和召開期間的所有講話，對於國家法制未置一辭，就是在會議的眾多發言中，也幾乎沒有人談到這個問題，甚至連剛宣布不久的1954年憲法都未見有人提及。的確，對於一個依靠革命取得權力的政黨來說，對於習慣於人治的中共領袖和各級幹部來說，從革命秩序到法制秩序，是一個極其困難的轉變。這就難怪從八大政治報告和決議寫上加強國家法制的口號之後許多年，在中共領導層似乎就沒有人再真心理會這個問題了。

[1]《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17。

[2]《八大文獻》，頁11—72。

[3]《八大文獻》，頁809—820。

[4]《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2。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42。

[6]《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14。

[7]《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16。

[8]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劉少奇的正式報告中，「中心任務」改為「現時的任務」，「使國家和人民都富裕起來」的奮鬥目標，代之以「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參見王雙梅：〈劉少奇與中共八大政治路線的確立〉，《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24—25。

[9]這曾引起人們的疑問，參見黃景芳、湯麗霞：〈試析黨的八大未宣布過渡時期結束的緣由〉，《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頁59—62。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16—317。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700—701。

[12]《八大文獻》，頁821—822。

[13]有研究認為，八大本該宣布而沒有宣布過渡時期的結束，與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認識變化有關，並表現了「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的潛在思想因素」。參見黃景芳、湯麗霞：〈試析黨的八大未宣布過渡時期結束的緣由〉，頁59—62。這種解釋恐怕有些勉強。

[14]1973年8月，中共十大政治報告說，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謬論」是劉少奇和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史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十七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21。

[15]這個問題早在80年代就引起了學者的興趣。近年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有：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韓鋼：〈「八大懸案」釋疑〉，《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周承恩：〈也談「八大」懸案〉，《百年潮》，2003年第5期。石仲泉等主編的《中共八大史》也較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

[16]參見韓鋼：〈「八大懸案」釋疑〉，頁40—41。

[17]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頁65。

[18]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頁65—66；韓鋼：〈「八大懸案」釋疑〉，頁41；王雙梅：〈劉少奇與中共八大政治路線的確立〉，頁25。

[19]韓鋼：〈「八大懸案」釋疑〉，頁4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211。

[20]韓鋼：〈「八大懸案」釋疑〉，頁42；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頁6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211—21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22。

[21]韓鋼：〈「八大懸案」釋疑〉，頁42。

[22]《八大文獻》，頁1100—1101。

[23]《中共八大史》，頁179。

[24]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頁65。

[25]《中共八大史》，頁178。

[26]關於「階級消滅以後社會主義還存在着先進與落後的矛盾」這類說法，早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就提出過，在八大期間和八大之後，毛澤東也曾多次談到。參見1956年5月4日《人民日報》；毛澤東與英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毛澤東與意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27]《中共八大史》，頁181。

[28]胡喬木說：「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時大會已經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537；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410。

[29]陳伯達說：寫上主要矛盾的一段話後，「我又覺得僅只是這樣的提法，有些太籠統，應該有一個概括性的說法。當時會議議程很緊，那天（9月27日）下午就要表決決議，我早晨還在考慮主要矛盾怎麼寫才好，我想起列寧有過一個提法，這個提法後來啟發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參見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3），頁138—139。

[30]韓鋼：〈「八大懸案」釋疑〉，頁42。

[31]《毛澤東傳（1949—1976）》，頁537。

[32]《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139。

[33]《毛澤東傳（1949—1976）》，頁537。

[34]《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139—140。

[35]王光美：〈與君同舟，風雨無悔〉，載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25—26。

[36]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頁537。

[37]《毛澤東傳（1949—1976）》，頁538。

[38]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頁66。毛後來說：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句話是錯誤的，所謂落後的生產力，這是拿來同外國、同將來作比較的。生產關係現在是國有化，將來可能是洲有化、球有化。參見毛澤東在聽取上海等地同志匯報思想工作時的插話，1957年4月。

[39]《八大文獻》，頁29。

[40]關於經濟建設中的主要問題和方針，在八大的幾個主要文件中都有概括和闡述。除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的有關說明，大會通過的二五計劃建議概括為十六條「方針」，周恩來的報告總結了四條經驗教訓和十二個主要問題，而八大決議則概括為十條「經濟政策」。參見《八大文獻》，頁29—38、111—151、809—820。

[41]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18。

[42]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27。

[43]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11—228。

[44]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30。

[45]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20。

[4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199。

[47]《八大文獻》，頁452—454。

[48]《八大文獻》，頁228—239。

[49]《八大文獻》，頁358—364。

[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60。

[51]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28。

[52]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33。

[53]詳見第三章。八大規定：1962年工農業總產值2205億元，比1957年計劃數字增長75%，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一倍左右，農業總產值增長35%左右。1962年國民收入比1957年增加50%，鋼產量達到1050—1200萬噸，煤產量1.9—2.1億噸，糧食5000億斤左右，棉花4800萬擔左右，二五計劃基建總投資比一五增長一倍左右。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頁338—366。

[54]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四卷，1991（未刊），頁257。

[5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07。

[5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頁360。

[57]《八大文獻》，頁145、146。

[58]《建國以來重要文献選編》，第九冊，頁359—360。

[59]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27。

[60]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頁236—237。

[61]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29—230。

[62]《八大文獻》，頁129。

[63]《八大文獻》，頁326—336。以下凡引此文不再註明出處。

[64]參見陳雲：《陳雲文選（1949—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80—339；《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289—329。

[65]《八大文獻》，頁326—336。

[66]《八大文獻》，頁447—456。195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增設國家經濟委員會，負責年度計劃；國家計委負責長期計劃。

[67]《八大文獻》，頁352—364。

[68]《八大文獻》，頁733—738。

[69]《八大文獻》，頁204—210。

[70]《八大文獻》，頁291—296。

[71]如周小舟提出五點意見：一是將那些不利於統一經營而適宜於家庭和個人經營的東西，劃歸社員自由經營；二是對自留地要適當放寬一些；三是對勞動力的調配要經常保持平衡，使農忙季節能集中使用，農閒季節能各得其所，都有出路；四是對勞動力的使用要合理，不能過分地增加勞動強度，對婦女和體弱的社員尤其要注意照顧；五是對定額管理要因地因社因時制宜，充分適應農村的自然條件和習慣差異。李井泉說：適宜於農民農閒時經營的個體分散副業生產，在相當長時間內，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由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代替。陳漫遠說：家庭副業與集體經濟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應當注意到社和社員在經營上合理分工，利於集體經營的副業由社統一經營，利於分散經營的由社員家庭復員自經營。參見《八大文獻》，頁733—738、165—171、646—650。

[72]《八大文獻》，頁579—584。

[73]《八大文獻》，頁639—645。

[74]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37。

[75]《八大文獻》，頁140—139。

[76]《八大文獻》，頁813—814。

[77]毛在1955年曾充滿激情地寫道：「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03。

[78]大會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繼續採取正確的方法，把資本家所有制的殘餘部分改變為全民所有制，把個體勞動者所有制的殘餘部分改變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徹底消滅剝削制度，並且杜絕產生剝削制度的根源。」參見《八大文獻》，頁822。

[79]《八大文獻》，頁49。

[80]《八大文獻》，頁49—50。

[81]《八大文獻》，頁50—51。

[82]《八大文獻》，頁141—142

[83]《八大文獻》，頁46—48。

[84]《八大文獻》，頁51—52。

[85]《八大文獻》，頁53—54。

[86]《八大文獻》，頁817。

[87]《八大文獻》，頁253—264。以下凡引此文不再註明出處。

三 黨內民主和個人崇拜問題

八大路線還有一個完全屬於黨內問題的重要內容，就是分析了執政黨地位變化及其面臨的考驗，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任務。特別是確定了發展黨內民主的方針，明確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並且在制度上作了某種努力。

1 執政黨面臨的主要危險

八大明確地向全黨提出，由於中共的地位和任務以及自身的組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執政黨面臨着新的危險，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出現。毛澤東在開幕詞中首先提出：目前黨內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1]毛澤東始終擔心政權得而復失的問題，前些年考慮的是外部顛覆和反革命復辟的危險，現在政權已經鞏固，注意力便開始轉向來自執政黨內部的危險。

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重點談了主觀主義的問題。他在回顧中共歷史經驗以後說：「克服思想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是保證黨的工作順利發展、避免重大錯誤的根本關鍵。」他認為，「主觀主義的錯誤在目前我們許多幹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嚴重地存在着，使我們的工作受到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主要由於兩方面原因：一是面對着新的條件和新的任務，必須解決許多比過去更為複雜的和不熟悉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覺悟水平，不努力學習新的知識，鑽研新的業務，而滿足於對勝利的一片讚揚，主觀主義的錯誤就必然會發展起來。一是有大批新黨員入黨。中共黨員數量七大時為120萬人，八大時增加到1073萬人。六成以上的黨員是1949年以後新入黨的。這些新黨員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訓練，很容易成為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市場。鑑於此，劉少奇提出的主要對策是「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努力來提高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首先是高級幹部必須系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其次是加強對廣大新黨員的教育，以及加強黨的理論工作和調查研究工作。[2]

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強調的是官僚主義的危險。他指出，中共「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於領導地位」，而「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

發展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他列舉了官僚主義的三種主要表現：一、不少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眾，不重視調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實情況，在執行中央和上級指示時，不同下級和群眾商量，不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只是機械地盲目地搬運。不少領導人陷入了事務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泥坑，更嚴重的是有些人對於群眾要求迫切解決的問題抱着一種無動於衷的冷淡態度。二、官僚主義表現在一些幹部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甚至有些品質惡劣的人，還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他們濫用權力，做種種違法亂紀的壞事。三、官僚主義傾向比較普遍的表現是命令主義。不少黨的機關和幹部在作出決議、指示以前，既不同群眾商量，執行時又不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圖一切依靠命令行事。這種命令主義在基層表現突出，但「往往是同上級領導機關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分不開的」。鑑於克服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時期的鬥爭」，鄧小平提出，除了加強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實行對黨組織和黨員的嚴格監督。他說：「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於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無論黨內的監督和黨外的監督，「其關鍵都在於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3]

鑑於這兩個報告強調的重點不同，國外有學者認為，這反映了「以毛、鄧為一方和以劉少奇為另一方的不同觀點」。[4]其實這裏的區別僅在於兩個報告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劉的報告從黨的領導角度，提出了這些錯誤在思想上的根源問題，所以強調加強思想教育以克服主觀主義；[5]鄧的報告從黨的建設角度，提出了這些錯誤在工作中的表現問題，所以強調加強黨內外的監督以克服官僚主義。就中共的黨內生活而言，領導人之間即使有甚麼分歧意見，也不會像西方那樣有意地表現在公開的文件中。何況，政治報告着重於反對主觀主義，恰恰是毛澤東的主張。在8月30日召開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說：「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那個東西我今天不講，只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毛澤東不只一次指出，斯大林所以犯錯誤，主要是他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犯了主觀主義錯誤。在這次講話中他又說：「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我們看到的批評斯大林錯誤的許多文章，就是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或者很少提到這個問題。斯大林為甚麼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6]政治報告正是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意思起草的。毛澤東後來解釋說：「在這次劉少奇同志的報告中，雖

然沒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對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作了說明，主要原因是認識不符合實際，其他原因是次要的。」[7]

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後來被稱為「三害」，並構成執政危險的主要內容。八大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奠定了日後開展黨內整風運動的思想基礎。

2 關於群眾路線和黨外監督

如何防止黨組織和黨員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如何克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錯誤？鄧小平從黨群關係和黨外監督兩方面提出了對策。

在黨同群眾關係方面，主要強調實行群眾路線。對於中共來說，群眾路線並不是新東西，但鄧小平指出，由於黨成了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而脫離群眾可能產生的危害也大大地增加了。因而，宣傳和執行群眾路線「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鄧小平把群眾路線的意義概括為兩方面：一是強調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從這個觀點出發，確認了黨沒有超乎人民群眾之上的權力，沒有向人民群眾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沒有在人民群眾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一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鄧小平指出，僅有為人民服務的願望，而不實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仍然不能真正地解決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仍然會把工作做壞，使群眾受到重大的損失。因此，群眾路線「本身就要求黨的領導保持謙虛和謹慎的態度。驕傲，專橫，魯莽，自作聰明，不同群眾商量，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為了自己的威信而堅持錯誤，是同黨的群眾路線根本不相容的」。為了保證群眾路線能夠貫徹執行，除了黨章作出有關規定外，鄧小平還提出了五條具體措施：必須着重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讓領導人有足夠的時間深入群眾，而不是坐在辦公室裏；健全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加強黨和國家的監察工作；定期整頓工作作風。[8]

鄧小平特別提出，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必須與黨外人士密切合作。他強調：「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鬥爭，具有重大的意義。」他批評黨內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領導人不願意同黨外人士合作，實質上是一種「非常有害的宗派主義傾向」。他指出，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合作是長期的，這一個方針是早已確定了的。這種合作中間會有鬥爭，「但是問題不在這裏，而在於這些黨外的民主人士，能夠對於我們黨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能夠發現我們工作中的一些我們所沒有發現的錯誤和缺點，能夠對於我們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幫助。」「我們的任務就是繼續擴大同黨外人士的合作，使他們在我們的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和在國家各方面

的事務中，發生更大的作用。」[9]

對於一個執政黨如何保證統治地位、提高執政能力的問題，如果說劉少奇側重於黨內思想教育，加強共產黨員自身的修養，那麼鄧小平更加注重的是利用執政黨以外的力量，對其進行制約和監督。為了共同的目標，這兩者自然都是需要的，但就現代社會的合理結構和平衡發展而言，後者似乎更加重要。不過，關於黨外監督問題，八大的主要缺陷是只談到原則和意義，卻沒有提出一套如何具體實施的方案和措施，而在一黨獨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對其監督沒有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證，這種監督就只能停留在口頭上和文件中。

3 實行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崇拜

在黨內關係方面，八大提出要發展黨內民主，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

在中共的概念中，民主從來都是相對的，而且只是一種手段。因此，八大所謂的民主，指的是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這裏，民主與集中始終是一對矛盾，長期來看，其內在邏輯總是趨向於集中制。只有當「過分的」集中制嚴重地損害了黨組織的活力時，黨內民主問題才會被提出來。中共八大提出發展黨內民主，有兩個背景，一個是國內背景，一個是國際背景。

從國內來說，自建國以來，中共一再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集權，如取消大區制，調「封疆大吏」進京等。這種做法與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一致的。然而，「過分的中央集權」也帶來了一個後果，就是對地方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削弱，並且造成鄧小平所列舉的種種官僚主義現象。這種情況引起了下級組織的不滿，更與毛澤東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目標相衝突。因此，與行政分權的改革相適應，中共八大在黨的中央組織和地方組織之間也進行了適當的職權劃分。新黨章增加了三項規定：一、凡屬全國性質的問題和需要在全國範圍內作統一決定的問題，應當由中央組織處理，以利於黨的集中統一；二、凡屬地方性質的問題和需要由地方決定的問題，應當由地方組織處理，以利於因地制宜；三、上級地方組織和下級地方組織的職權，也應當根據同一原則作適當的劃分。黨章還規定，對於黨的政策，在作出決議前允許討論並提出建議；下級組織對於不符合本地區、本部門實際情況的決議，有請求改變的權利。[10]這些規定的主旨，在於發揮下級黨組織和黨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當然，適當分權的規定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全國已經實現了集中統一，中央的權威無庸置疑，這樣做並不擔心重新出現分散主義。

八大提出發展黨內民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國際背景，就是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問題。蘇共二十大以後，各國黨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斯大林的錯誤為甚麼會發生和發展？潛在的問題更在於，各國黨會不會重犯斯大林的錯誤？事實上，自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開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就力圖對此作出回答。中共八大更試圖從思想上和制度上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八大首先肯定並且接受了蘇共二十大的思想，提出了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鄧小平指出：「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鄧小平還說：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為了實行集體領導，鄧小平提出：一切提到會議上的問題，都必須經過討論，允許提出異議。如果在討論中發現重大的意見分歧，而這種分歧並不屬於需要立即解決的緊急問題，就應該適當地延長討論，並且進行個人商談，以便求得大多數的真正同意，而不應該倉促地進行表決，或者生硬地做出結論。在黨組織進行選舉的時候，候選人名單也應該在選舉人中間進行必要的醞釀和討論。他說：「只有這樣，黨內的民主生活才能獲得真實的保證。」當然，發展黨內民主最終是為了更好的集中。鄧小平說：「一切發展黨內民主的措施都不是為了削弱黨的必需的集中，而是為了給它以強大的生氣勃勃的基礎。」[11]劉少奇說得更明白：擴大黨內民主生活決不是減弱而恰恰是加強了「黨的集中制」。[12]

發展黨內民主，還反映在對黨內鬥爭方針和黨員權利方面的新規定。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報告中都強調必須正確開展黨內批評和鬥爭，其基本原則是區別「黨內的是非問題」與「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蛻化分子和其他分子的問題」的界限。對於前者執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於後者，堅決清除出黨，如高崗、饒漱石。八大強調的重點是前一種情況。[13]因此，在規定黨員義務的同時，八大在保障黨員民主權利方面增加了一些新內容：一是把發揮創造性作為黨員的一項權利，以利於黨員獨立思考，改變墨守成規的作風，促進黨內民主的高漲；二是規定黨組織對黨員做出處分或鑑定時，黨員本人有權參加會議；三是規定黨員對黨的決議有保留意見和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意見的權利；四是規定黨員有在黨的會議上或在黨的報刊上參加黨的政策的討論的權利，有在黨的會議上批評任何工作人員的權利，等等。[14]

為了發展黨內民主，八大還在制度上進行了改革，主要是實行黨的全國和省、縣代表大會的常任制。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省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縣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二年。這三級代

表大會一律每年開會一次。相應地取消原有的黨的各級代表會議制度。目的是保證黨的各級代表大會能夠定期召集並充分發揮作用。鄧小平承認，從中共七大以後，十一年不開黨代表大會，是不正常的，[15]「這是我們黨的民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的缺點」。雖然這些年召集了大量的幹部會議，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黨的代表會議以致代表大會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召集這些會議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會，不能彌補不經常召集代表大會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缺憾」。鄧小平對這項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認為這是「一項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16]可惜，常任制並沒有堅持下去，除1958年召開過八大二次會議外，這項制度就再沒有真正實行過，而中共九大直到十三年後才召開。

4 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

中共八大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在所有大會文件和發言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從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寫着：「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17]然而，在八大黨章中卻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18]此外，在劉少奇的報告、鄧小平的報告和八大決議中都沒有出現「毛澤東思想」一詞，甚至所有的大會代表發言也不約而同地都不提「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學習八大文件時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新黨章為甚麼未提毛澤東思想？為甚麼沒有講中國的個人崇拜問題？現在黨章不提毛澤東思想，是否是反對個人崇拜？[19]國外研究者也因此對毛澤東的地位作出了種種猜測。他們認為，新黨章根本沒有提到毛澤東思想，而是強調集體領導，這「進一步證實毛大權旁落」。「對毛澤東威信的真正打擊是從新黨章中刪節了兩處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他們還猜測，「劉少奇可能的確試圖減少毛澤東的作用」，甚至斷定「把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從新黨章中刪去的提議，最初來自彭德懷」。[20]不過，中國史學界的研究否定了這些判斷和推測。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而且這個決定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提議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後，毛澤東多次將送他審閱的文件中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刪去，或改為別的說法。[21]從目前披露的眾多史料看，這個過程基本上是清楚的。

最早在1948年，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打電報向毛澤東請示，要把

「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並提出在教員和學員中，「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給吳回電說：「那樣說法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甚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甚麼『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裏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22]

1949年1月，毛澤東在修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時指出：將草案中的「毛澤東思想」，一律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強調不要把他與馬、恩、列、斯並列，說如果平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套，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這樣不好，我們請他們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23]

1952年9月25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送審的國慶社論提綱草稿作了兩處修改：將「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將「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着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着無限勝利的信心」，同時批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字與馬列主義並提，並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24]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用語的地方一律刪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澤東親筆刪改的。[25]195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應將這些字刪去。」5月24日，毛澤東在軍委報送的內務條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8月14日，毛澤東又將中共中央給中國駐越南顧問團的電報稿中「毛澤東思想」字樣刪去。[26]

這樣，由於毛澤東本人一再反對，中共中央終於作出了正式決定並通知全黨。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起草了一個〈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通知〉說：「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通知〉特別說明：「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通知稿時加了一句：「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

作』等字樣。」[27]這個決定的精神並沒有限制在黨內傳達，12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座談會上向與會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28]

上述情況足以說明，那時不提「毛澤東思想」的確是毛澤東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書記處也有明確指示，並廣泛告知黨內外（只是沒有傳達到基層）。所以，在研究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時，追究起草文件時是否專門做過決定，是否有人建議或者是誰「最初提議」，都已經沒有意義了，而且這一切都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黨內高層早已達成共識。問題是毛澤東為甚麼會產生這個想法，並且一再強調不能提「毛澤東思想」？

胡喬木解釋說：「這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後，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態度，而中國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於這樣的考慮，不僅『歷史決議』將毛澤東思想提法刪去，並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29]胡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

1948年下半年，在社會主義陣營裏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蘇南衝突，共產黨情報局10月會議決定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逐出教門。斯大林決心與鐵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張和在巴爾幹獨立門戶的「民族主義傾向」。與此同時，針對東歐各黨「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和主張，蘇共在共產黨情報局開展了一場圍剿「狹隘民族主義」的鬥爭。[30]毛澤東對此極為關注。當時，國共之間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已經開始，中共絕對需要蘇聯的全力支持和幫助。[31]所以，共產黨情報局對南共和民族主義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專門作出關於南共的決議，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的基本觀點，因而陷入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11月1日，劉少奇撰寫〈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32]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提出對宣傳毛澤東思想降溫的，其目的和考慮是不言而喻的。

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仍然不同意使用「毛澤東思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顧及蘇聯反對個人崇拜的舉動在中國黨內的影響。如本書第二章所說，斯大林死後不久，蘇聯報刊就開始從理論上談個人在歷史上

的作用並提到個人崇拜問題，同年7月起，開始公開批判和反對黨的宣傳中的個人崇拜，並且向中共通報貝利亞事件時談到了斯大林的問題。1953年12月25日中國駐蘇使館向中宣部報送了兩個材料，介紹了蘇聯報刊和宣傳中批判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情況，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1954年第3、4期刊載了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張聞天又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報送了一份題為〈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的材料。4月28日毛澤東批示劉少奇：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為內部文件印發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在京有關人員。[33]這年12月中宣部發出的那個關於如何解釋毛澤東思想的通知，不能說與這個背景沒有關係。

蘇共二十大以後，特別是在7月《人民日報》公布了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以後，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更加成為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大量登載了社會各界的各種議論。人們不僅為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錯誤感到震驚和不理解，而且已經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中國黨內有沒有個人崇拜？[34]一時間，世界各國共產黨都在減少對自己領導人的宣傳，以避斯大林個人崇拜之嫌。[35]在這樣的氛圍下，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高層領導人自然都不能再重新提「毛澤東思想」。於是，就導致了在八大文件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

當然，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絲毫不能說明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和表述有任何懷疑，更不用說毛澤東地位的下降。從毛澤東歷次談到這個問題的說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強調的只是不宜在公開場合使用「毛澤東思想」這種提法，而並非認為這種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國後，從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戰爭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勝利，這使毛澤東在黨內外的威望和影響空前提升。人們更加折服於他的雄才大略，沒有人會懷疑其領導的英明，更不用說會有誰對毛的地位提出挑戰。這從八大對個人崇拜問題的處理上也可以看出。蘇共二十大以後，反對個人崇拜成為各國共產黨的一面旗幟，中共當然不會放棄這面旗幟。然而，八大對這個問題的處理相當微妙。與半年前蘇共二十大的情況不同，反對個人崇拜問題並沒有成為八大的主要話題，眾多大會發言都沒有涉及。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和鄧小平修改黨章的報告都是在肯定蘇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個人崇拜問題的。鄧小平還有意為中共進行了辯護。他說：

> 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

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裏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於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繫，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地執行。[36]

鄧小平報告的基本口徑是：反對個人崇拜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這個問題，而且正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對個人的歌功頌德；領袖是需要熱愛的，這不是個人崇拜。這樣，既接過了反對個人崇拜的旗幟，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委婉地回答了人們對中國是否也有個人崇拜的質疑。但是，八大關於中共黨內不存在個人崇拜的解釋是不符合歷史的。事實上，個人崇拜現象從延安整風時就已經開始了。延安整風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授予了毛澤東獨斷專行的權力，神化了毛澤東的作用。在中共七大會上，不只是劉少奇，包括張聞天、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在內，對毛澤東一片頌揚崇拜的言詞。延安整風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迅速傳遍延安，《東方紅》也是這時傳播開來的。[37]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對於批判個人崇拜，從根本上說就是被動的，不情願的。[38]所以他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才會突然冒出一句：「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着轉。」[39]這句話的含義很耐人琢磨，仔細體味可以感覺到，其實毛澤東是不願反個人崇拜的，特別是不願中國人反個人崇拜。否則，就很難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堪稱世界之最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如何出現的。

中共八大確有許多非凡之舉，就改造共產黨自身而言，在許多方面的主張和動議，甚至超過了蘇共二十大，比如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分析、對經濟發展方針的調整、對改進經濟體制的設想、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等等。所以，這次會議能夠鼓舞人心，激發全黨的熱情和幹勁，使國人看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於歷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領導人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沒有、也不可能對師承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這一

代革命家，都是經過千錘百煉、大浪淘沙的中國社會精英，他們並非沒有改造中國的雄心和能力，關鍵的問題是他們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革命年代，沒有隨着時代的前進而轉變。他們遇到了新問題，但最終只能用老辦法去解決。1956年對於蘇聯、中國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確實抓住了歷史主題，卻沒有從根本上認識這個歷史主題，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很可能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八大剛剛開過一個月，暴風雨就來了——在東歐爆發了令人震驚的波匈事件。

[1]《八大文獻》，頁9。

[2]《八大文獻》，頁62—67。

[3]《八大文獻》，頁74—84。

[4]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頁179—183。

[5]這一點在劉少奇起草政治報告（第三稿）「共產黨」部分時所寫的六千餘字的手稿中看得更清楚，他主要論述的就是：只有做到理論與實際相聯繫，主觀與客觀相符合，才能保證黨的領導不犯錯誤。參見《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頁16—21。

[6]《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89—90。

[7]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頁539。

[8]《八大文獻》，頁82—83。

[9]《八大文獻》，頁83—84。

[10]《八大文獻》，頁86—87。

[11]《八大文獻》，頁89。

[12]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71。

[13]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72。

[14]《八大文獻》，頁103—104。

[15]這種情況並非中共獨有，可以比較的是，蘇共1939年召開十八大，1952年召開十九大，相隔十三年。

[16]《八大文獻》，頁89—91。新黨章中的規定見頁829—836。

[17]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15。

[18]《八大文獻》，頁821。

[19]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29，頁65—95；《內部參考》，1956年10月8日，頁819。

[20]韓素音著，王弄笙等譯：《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340；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頁158—161。

[21]《中共八大史》，頁203；《毛澤東傳（1949—1976）》，頁534—535。

[22]逄先知執筆整理：〈關於毛澤東思想提出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1982年第1期，頁12。

[23]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28—329。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563。

[25]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28。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192、238、304。

[2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623。

[28]《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387。

[29]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29。

[30]詳見沈志華：〈對1948年蘇南衝突起因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頁5—26；〈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頁172—187。

[31]據蘇共中央聯絡部觀察，1947年9月共產黨情報局會議後，中共明顯地表現出對蘇聯的好感，並廣泛地利用會議材料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派的鬥爭。參見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73, л.1-37。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65；《人民日報》，1948年11月7日。

[3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484—485。

[34]詳見本書第二章。

[35]東歐各黨緊跟蘇聯自不待言，連法共和意共都贊成批判個人崇拜的現象。參見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5, л.165,167。甚至朝鮮也逐漸減少了個人崇拜式的宣傳，最先改變的是取消了「金日成萬歲」這個口號。參見《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頁1180—1182。越南勞動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報》則在7月10日發表社論，歡迎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參見《內部參考》，1956年7月11日，頁259。

[36]《八大文獻》，頁91—92。

[37]詳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605—646。

[38]詳細分析見本書第二章。

[3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42。

第六章

多事之秋：波匈事件及中國的作用和反應

蘇共二十大在社會主義國家引起的震動餘波未定，1956年10月又接連在波蘭和匈牙利爆發了更加令人震驚的動盪，國外學者一般稱「十月危機」，中國人習慣稱之為「波匈事件」。波匈事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對1957年中國發展道路的決定性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推動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標誌着中國正在走出亞洲，參與處理歐洲的事務，從而大大加強了其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影響，同時也開始了中共挑戰莫斯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地位的歷程。

90年代初以來，有關波匈事件的各國檔案文獻就已經相繼解密和開放，[1]並不斷被整理後公布於世。就筆者所知，最初是俄國的《歷史檔案》、美國的《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匈牙利的《年鑑》以及波蘭的《今日》和《現代史》等專業刊物陸續零散刊出的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國的有關檔案文獻。[2]俄羅斯總統葉利欽（B.Yeltsin）在1992年11月訪問布達佩斯時，把俄國檔案館中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關文獻115件轉交給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礎上1993年匈牙利先後出版了兩本文件集。[3]作為一次國際學術會議的參考資料，1996年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編輯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內的文獻專集，供各國學者使用。[4]隨後，在俄國、美國、匈牙利又分別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兩本較大篇幅的檔案文獻集，幾乎囊括了有關匈牙利事件已經公布的全部俄國檔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國家檔案。[5]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檔案文獻的基礎上，國際史學界，特別是在冷戰史領域，展開了對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危機的深入研究。[6]可以說，過去被認為是一樁歷史謎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發展進程，以及波蘭、匈牙利，蘇聯乃至西方大國的政策變化而言，除個別細節外，現在已經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遣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對當時中國的反應、對策及其與事件的關係，很少見到專門討論。[7]第二，中國學者幾乎還沒有參加到對這兩件重大歷史事件的學術討論的國際行列中。[8]究其原因，一則是中國有關的檔案文獻長期沒有對公眾開放，二則是波匈事件，特別是匈牙

利事件，對於中國學者來說似乎還有些觀念上的禁區。[9]

但是，無論如何，對這樣一些影響社會主義陣營和中國發展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實真相，作為歷史學家，尤其是中國歷史學家，是責無旁貸的。[10]令人欣喜的是，2006年5月中國外交部檔案館開放了1956—1960年的中國檔案，其中有關波匈事件及相關問題的文件十分豐富，據筆者初步查閱，足有幾百個卷宗。這無疑引起了各國學者的關注，並將大大推進對這些歷史事件與中國關係的研究。[11]

[1]目前歷史學家查閱有關1956年危機的檔案文獻，除了去俄國、匈牙利、波蘭的檔案館外，還可以去布拉格的中央國家檔案館（SUA）和軍事歷史檔案館（VHA），及柏林的前東德共產黨檔案館（SAPMDB）。此外，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收藏了有關這兩次危機的各種文字的檔案文獻。

[2]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No.4, 5, 6； Csaba Békés，"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 Issue 2, 1992,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 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 24 October 1956", CWIHP Bulletin, Issue 5,1995； Leszek Gluchowski,"Khrushchev, Gomulka, and the 'Polish October' ",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Mark Kramer,"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1996/ 1997； A. Werblan, J. Stepien, Rozmowy kierownictwa PZPR z deiegacja KPZR. Nieznane dokumeniy z pazdziemika 1956r., Dzis, nr.4/1995； Andrzej Werblaa, 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 Dziejc Najnowszc, Rocznik X XIX, nr.4/1997。感謝波蘭華沙大學揚·羅文斯基教授為筆者提供了波蘭檔案公布的情況。

[3]見 Janos Rainer, "The Yeltsin Dossier: 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22-24。

[4]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Christian Ostermann ed., 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 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Washingt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6）.

[5]見 Валкое В. К. и др.,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實際上，在研究中可以利用的還有德國、保加利亞和前南斯拉夫的檔案文獻。

[6]相關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特別值得重視的有以下一些：波蔫學者Tony Kem-Welch的論文講述了波蘭危機的起因（"Khrushchev 's 'Secret Speech ' and Polish Politics: The Sowing of 1956",Europe-Asia Studies，Vol.48, No.2,1996）,而 Leszek Gluchowski 的文章則詳細討論了波蘭危機的過程，特別是波蘭內衛部隊的作用（"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 CWIHP Working Paper No.17, 1997），俄國學者В. Л. Мусатов和Л. Я. Пбианский的兩篇論文研究的是匈牙利事件及蘇聯在其中的作用（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ьп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о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1； Н. С. Хрущев, Й.Броз Ъгг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No.2），美國學者 Mark Kramer 的論文專門討論了蘇聯在這兩次危機中的決策過程（"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 — 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 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匈牙利學者的論述集中反映在兩本論文集中〔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 – Forty years on（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7）； Jeno Gyorkei and Mikios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而Csaba Békés的文章（"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WIHP working paper，No.16,1996）和 Johanna Granville 的專著〔The First Domino: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4）〕則重點研究了西方大國對事件的政策及其影響。此外，Granville在另一篇文章（"1956 Reconsidered: 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80, No.4,October 2002）中，還對這兩次事件進行了比較研究。

[7]例如Granville在其300多頁的專著中，提到中國和中國領導人的地方僅有幾處。就筆者所見，研究中國與波匈事件關係的，只有美籍華人學者陳兼（Chen Jian）在「冷戦與中蘇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1997年，北京）提交的一篇論文（"Beijing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後來被修改並擴展為他的一部在西方很有影響的專著〔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中的一章。

[8]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除一些通史類著作對此略有涉及外，主要是一些回憶錄，如在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期間擔任翻譯的師哲的回憶錄（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百年潮》，1997年第2期）、時任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的文章（〈1956年波蘭「十月事件」的回憶〉，《國際問題研究》，1981年第1期）和當時駐波蘭使馆工作人員駱亦粟的文章

（〈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外交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比較集中談到中國對事件的反應和作用的是吳冷西的回憶錄〔《十年論：1956—1966中蘇關係回懷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至於研究著作，涉及波匈問題的有一些論著，如王逸舟的《波蘭危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劉祖熙、劉邦義的《波蘭戦後的三次危機》（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等，其中論述十月事件的內容均比較簡略，且使用的資料已顯陳舊。利用最新解密檔案研究匈牙利事件的唯一學術成果，應屬胡舶的博士論文《冷戰陰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國的應策與互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可惜的是，所有中國人的研究基本上沒有涉及中國問題。

[9]過去中國官方對匈牙利危機的定性是「反革命事件」一個學術，公開出版的史料也僅限於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當時公布的文獻，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编的《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勢力》（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和《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反革命陰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等。其實，早在80年代末匈牙利政府就已經為1956年的事件平反了，詳見Terry Cox，"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in 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1-13，外人又何必為此戰戰兢兢？至於這次事件能否算作「起義」或「革命」，那只是—個學術問題。

[10]筆者去年在寫作本書的基礎上發表了一篇論文〈1956年10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已被譯成英文和波蘭文發表（Social Science in China, Vol.26, No.3, Summer 2005；Polski Przeglad Dyplomatyczny, Dwumiesie cznik Tom.5, nr. 4（26）lipiec-sierpien 2005）。

[11]這批中國外交檔案開放時，本書已經完稿。為了避免遺憾，筆者只得推遲交稿時間，並利用最新史料對本章進行了少量的補充和修訂。更深入的研究，日後自當繼續。

一 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

從性質上講，這兩次事件是在東歐地區同時爆發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危機，也是蘇聯與東歐國家關係的危機，又同樣是蘇聯以社會主義陣營領袖身份予以處理的問題。顯然，這是在歐洲地區發生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問題。那麼，作為社會主義陣管重要成員的中國，在波匈事件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承擔了甚麼角色？發揮了甚麼作用？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也是歷史學家近年來努力研究的課題。

1 危機前中國、蘇聯、東歐的三角關係

從戰後到危機前十餘年的時間裏，蘇聯與東歐的關係有一個複雜而曲折的變化過程。斯大林解決戰後東歐問題依據的是兩個原則：為了保障俄羅斯帝國的安全利益而從內部強化對東歐各國的控制；為了與西方大國合作以求得和平發展的局面而在外表上給予東歐各國一種寬鬆的政治環境。作為這兩項原則的政策體現，戰後初期蘇聯在東歐各國主張組建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反對共產黨一黨執政，避免建立以蘇聯為首的利益集團，而寧願通過簽訂雙邊條約來保證各國政府的親蘇政策，不鼓勵東歐各國共產黨採取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此等等，這就是冷戰態勢形成以前蘇聯與東歐關係的基本框架。斯大林主張的聯合政府政策在法國、意大利等西歐國家的失敗，再加上美、英、法等國在推行馬歇爾計劃中的進逼方針，導致莫斯科迅速轉變了對東歐的策略，作為國際性集團組織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應運而生。[1]在冷戰的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東歐推行兩黨合併，消滅社會民主黨，繼而操縱各國實現共產黨一黨統治，同時在東歐各國黨內以消滅「鐵托分子」為由開展大清洗，對土生土長的各黨領導人大開殺戒，而以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莫斯科派幹部取而代之。此後，蘇聯的軍事顧問和國家安全顧問被大批派往東歐各國。到1952年10月蘇共十九大召開的時候，東歐各執政黨已經完全成為莫斯科的順從奴隸，蘇聯與東歐關係進入冷凍狀態。[2]

斯大林去世以後，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東歐各國對蘇聯在本國代理人的不滿日益強烈地表現出來，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公開批判斯大林後，黨內反對派的力量開始不斷積聚，民眾的反抗情緒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隨着輿論的開放和政治的解凍，要求本國「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聲愈來愈高。這種狀況在波蘭和匈牙利尤為突出，儘管他們之間有着明顯的區別。

早在1955年秋天，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就致函蘇共中央，請求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38年8月16日無理解散波蘭共產黨的決定進行重新審理。12月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並通過了為波蘭共產黨平反的決議，有關聲明也在蘇共二十大期間刊登出來。[3]1956年3月12日第一書記貝魯特（B.Bierut）在莫斯科暴病而亡，使波蘭黨內的親蘇派勢力大大削弱，波蘭許多地方黨組織在討論蘇共二十大報告時，更提出了追查1939年在卡廷發生的槍殺波蘭軍官案件、重新評價1944年華沙起義和蘇聯在波蘭領土大量駐軍與波蘭主權的關係等問題。蘇聯外交官報告說，波蘭的報刊有一種「錯誤地煽動修正主義和反蘇情緒的企圖」。[4]貝魯特的繼承人最初是黨內的中間派代表奧哈布（E.Ochab），由於他繼續推行原來的各項方針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滿。[5]到1956年5月在改革派的壓力下，曾經作為「右傾民族主義分子」被關進監獄的哥穆爾卡（W.Gomulka）復出的問題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不久，黨內高層便在改革問題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奧哈布也逐漸轉向改革派。而6月底爆發的波茲南工人罷工遊行事件及政府的鎮壓措施，進一步引起人們的不滿，並把波蘭改革和獨立發展推上日程。[6]由於波蘭黨內改革派力量強大，又得到全國民眾的一致擁護，莫斯科雖心急如焚，卻感到無從下手。[7]

匈牙利的社會情緒雖然與波蘭大體相同，但由於保守派在領導層佔有絕對優勢，其結局就完全異樣了。身兼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和政府首腦的拉科西被認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去世後受到黨內外的一致指責，莫斯科不得不考慮對其有所制約。1953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兩黨聯席會議上，拉科西、格羅（Gero　Erno）、法爾卡什（Farkas　Mihaly）和雷瓦伊（Revai　Jozsef）等保守派領導人受到嚴厲譴責。會議的結果是拉科西留任黨的第一把手（總書記改為第一書記），而將部長會議主席的職位讓給立志推行改革的納吉·伊姆雷（Nagy　Imre），內務部長法爾卡什和理論家雷瓦伊則退出領導崗位。儘管由於阻力重重，納吉的改革進展緩慢，但匈牙利出現的變化仍然在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中間，播下了希望的種子。正當納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動開始收到效果，並得到黨內改革派和知識分子大力支持的時候，蘇聯最高權力層出現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勢力得以捲土重來。莫斯科一是擔心納吉的改革突破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赫魯曉夫的政治對手馬林科夫反對優先發展重工業言論在匈牙利的實踐；二是擔心匈牙利黨內的嚴重意見分歧破壞政治結構的穩定，而拉科西主張的「整頓匈牙利秩序」則比較符合此時赫魯曉夫的要求。於是，随着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下台，1955年4月納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傾錯誤而失去了權力，八個月後又因拒絕承認錯誤而被開除出黨。

但很快，蘇共二十大再次激發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們不僅呼籲變革，而且強烈要求為受迫害者平反：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認在斯大林對東歐各黨的大清洗中，參與了對持與蘇聯不同政見的拉伊克（Rajk　Laszlo）的政治陷害活動，之後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隨者的信任。特別是在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後，匈牙利黨內外情緒激昂，抗議現行政策的活動有增無減。面對匈牙利官方驚呼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波茲南事件」，莫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決定讓拉科西退休，到蘇聯休養，而讓他的親信格羅接替其黨內職務。然而，與蘇聯領導人的選擇不同，匈牙利黨內改革派和社會知識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雖然在野但並未沉默的改革先鋒納吉。更大的衝突和風暴正在醞釀之中。[8]

顯然，蘇東關係的緊張狀態在客觀上需要外界的調節，那麼中國是否具有參與處理危機的條件呢？對東歐諸國，毛澤東很早就發生了興趣。還在1948年4月26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毛澤東就提出「想到東歐和東南歐進行訪問，以便研究一下他們的人民陣線工作及其他工作」。[9]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在1949年7月4日給聯共（布）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出了「與東歐各民主國家建立關係及通商」的問題。[10]在建國之初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毛澤東反覆表示了他對與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等國迅速建交的迫切心情，儘管當時中國「甚至不知道他們外長的姓名」。[11]毛澤東在1949年10月最初提出的訪蘇計劃中，再次安排要在中蘇條約簽訂後到東歐訪問一個月。[12]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對東歐的訪問始終沒有成行，但他對東歐國家如何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問題的關注卻是十分明顯的。不過，斯大林在世時，對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責任是有明確分工的——蘇聯負責歐洲，中國負責亞洲。[13]毛澤東自然不便跨越雷池一步。況且，東歐國家與中國如何發展關係，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甚至東歐能否與新中國建交、何時建交等問題，都必須經過莫斯科的首肯。[14]在1950年10月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安全因朝鮮戰爭而面臨危機時，毛澤東毅然決定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大大提高了中國在所有東歐國家中的形象和地位。[15]不過，在蘇共二十大之前，中國與東歐國家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沒有超出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的範圍，而在政治上，只是一般性外交往來，對相互間的國內政策談不上有何影響。[16]

蘇共二十大以後，情況有了一些變化。一方面，中國領導人在繼續密切注視着東歐發生的事情，[17]另一方面，中國也愈來愈引起東歐的注意。《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共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和中國國內開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運動，都在東歐各國引起了極大興趣。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東歐各國傳

播以後，一時眾說紛紜，思想極為波動，很多人表示要看看中國黨如何表態。在波蘭各界討論蘇共二十大提出的諸問題時，不少人表示：當今世界上最有權威的共產主義理論家毛澤東尚未對此發表意見，需要聽一聽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才能令人信服。人們在爭論不休時往往說：等着聽毛澤東的見解吧！[18]波蘭人還常以羨慕的口氣對中國留學生說：「你們中國革命是自己搞成功的，又是大國，斯大林不敢命令你們，你們是根據你們的具體情況決定政策的。我們是小國，一切都要聽從別人。」[19]匈黨中央委員、駐蘇大使波爾多茨基（Boldoczki）稱：中共八大提出了許多新的創造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包括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匈黨對此很有興趣，十分重視。匈黨中央書記科瓦奇（I.Kovacs）說，八大文件中很多東西值得匈牙利學習、研究，特別是中國黨成功地把廣泛的民主與堅強的集中領導相結合。應當學習中國黨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又能廣泛團結全國人民各階層的經驗。[20]如果說過去人們讚賞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那麼現在也開始關心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了。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主張向中國學習的基本上是波蘭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們往往拿中國與蘇聯對比。與保加利亞各界對雙百方針所持的保留態度不同，波蘭人總是用讚佩的心情談論這些問題，他們說，中國黨和斯大林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國黨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論是「社會主義愈前進，階級鬥爭愈尖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在波蘭非常流行，受到極大的讚賞，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和幹部中間，簡直是家喻戶曉。[21]匈牙利的知識分子則真誠接受這樣的信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共領導人意圖的真實反映。這在匈牙利社會激起了廣泛的親華熱情和同情心，以至在匈牙利發生危機時，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在布達佩斯街頭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和我們站在一起」。[22]據蘇聯駐匈大使安德羅波夫（Y.Andropov）報告，格羅在解釋「部分匈牙利勞動人民，甚至黨內人士對蘇聯表示冷淡的問題」時說，在許多黨內反對派看來，「似乎是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阻礙了黨和國家的民主制發展，而中國和南斯拉夫這樣的國家就沒有個人崇拜現象」，「所以現在就應該以他們為榜樣，而不是以蘇聯為榜樣」。[23]還有，納吉被迫引退後認真研究了社會主義理論和政策，他在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也特別注意到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並且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解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認為，萬隆會議的五項基本原則「不能僅局限於資本主義世界或者兩大體系之間的鬥爭，必須擴大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間的關係中」。[24]這與中共後來在處理波蘭危機時的主張不謀而合。[25]

看起來，東歐各國，特別是那裏的改革派是可以接受中國了，問題是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指揮的蘇聯的態度。

自赫魯曉夫執政以後，中蘇關係進入了蜜月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8年初。[26]儘管蘇共二十大的做法令毛澤東有些擔憂，但絲毫沒有影響中蘇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恰恰相反，赫魯曉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長期以來壓在中共和所有共產黨頭上的這塊大石頭（或曰「蓋子」），正是毛澤東求之不得的。波匈事件發生一年後，毛澤東對蘇聯大使尤金說：「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一個經常壓抑我們和妨礙我們正確理解許多問題的蓋子。是誰為我們揭去了這個盖子？是誰使我們大家更容易正確地理解個人崇拜的問題？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27]對於蘇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毛澤東在內心是赞同的，如果仔細品味毛澤東在1956年3至10月對內對外的講話，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固然，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和平過渡的提法以及批判斯大林的方式等問題上，中共確有不同看法，這些情況莫斯科通過外交渠道也已經有所了解。[28]過去人們把這些分歧看得很重，似乎這就是中蘇分裂的起點。[29]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蘇論戰時期雙方互相指責的過激言論的影響。其實，任何盟國關係中都會有分歧和矛盾，而且時時都存在，但這並不意味着聯盟就要分裂。況且，後來導致中蘇反目的根本原因與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並沒有甚麼關係。[30]

實際上，毛澤東當時強調的主要還是以前斯大林在中國問題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和現在中蘇之間的團結合作。4月6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訪華，毛澤東明確告訴他：「我們一致的地方遠遠超過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團結對敵。」[31]5月2日毛澤東在接見尤金時，雖然原則上肯定斯大林在多數重大問題上執行了正確路線，但談得最多的還是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些錯誤「可以寫一本書」了，只是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對共同事業不利」。毛澤東在談話結束時再次着重強調了二十大決議的重要性和尖銳批評斯大林的及時性，並感慨地說，二十大「結束了對他（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在「我們可以徹底討論所有的問題了」。最後，毛澤東又高興地總結說：「我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32]

從蘇聯方面來說，《人民日報》的編輯部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真理報》轉載後引起普通讀者極大興趣，「一般的反應都很好。最普遍的反應，是認為這篇文章有說服力，寫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問題說清楚了」。而官方則「準備把全文重新翻譯一次，與蘇共的文件一起編入一個供全黨學習的小冊子」。[33]此後，中國的

意見愈來愈受到蘇共中央的重視。同時，斯大林故鄉格魯吉亞的騷亂和黨內討論時表現出來的強烈反叛情緒，也使蘇聯領導人確實感到「捅了婁子」。[34]1956年6月30日，蘇共中央作出《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其中的說法已經十分接近中共的觀點——「非斯大林化」的進程開始慢慢剎車了。[35]年底，中共〈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在《真理報》全文發表，「蘇聯對這篇文章很滿意」，當天的報紙被一搶而空。[36]莫斯科的廣播電台選出最有名的播音員廣播，並數次播放錄音，以示重視。[37]不僅如此，蘇聯駐華使館還在1956年度總結報告中建議蘇共中央派黨務工作人員去中國，了解中國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情況，理由是「中共積累了豐富的黨政建設和群眾工作經驗。根據本國的歷史和民族特點，中共在解決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和方針。中共黨組織的許多方面值得認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後在黨的建設和思想工作方面所採取的措施」。於是，1957年6月，蘇共中央決定派出一個由十五至二十人組成的代表團到中共訪問學習。[38]蘇共派人到兄弟國家學習黨的建設的經驗，這還是頭一次，足見中共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回憶說，在波匈事件的危機關頭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國共產黨協商」。[39]

2 波蘭危機：中共第一次當面指責蘇聯

關於中國是否參與處理波蘭十月危機的問題，過去流傳着一種說法，似乎是中國阻止了蘇聯對波蘭的武裝干涉。按照新華社在事後報告的情況，當時「波蘭人眾口一詞的說法」是：「如無中國黨的勸阻，波蘭事件的演變將比匈牙利慘得多。」[40]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報道的標題就是：「蘇聯在波蘭的克制是由於中國的關係——毛澤東第一個向哥穆爾卡發出賀電」。[41]後來也有波蘭研究者認為，中國對蘇聯干涉波蘭持反對態度是「蘇聯代表團在會談最後階段轉變立場和意外妥協的原因」。[42]那麼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按照事件的發展過程，這裏涉及三個問題。第一，蘇波兩黨在華沙會談期間（19—20日），赫魯曉夫關於停止蘇聯部隊向華沙進軍的命令是如何作出的；第二，蘇聯代表團回到莫斯科以後（20—23日），關於放棄對波蘭進行干涉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後（23—31日），為調解蘇波關係、保證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做了哪些工作。

波茲南的罷工和遊行先是遭到鎮壓，[43]隨後又被蘇聯定性為由帝國主義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44]這在波蘭黨內外引起了強烈的抵制和不滿。在緊張而驚慌的氣氛下，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了二屆七中全

會。人們把希望寄託在改革派身上，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提出應為哥穆爾卡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甚至邀請他參加全會。[45]這一切很快就實現了，10月12日哥穆爾卡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講話。[46]哥穆爾卡的頭腦十分清醒，他在講話中除批評過去的經濟政策、提出重新評估波茲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質外，還特別強調必須使波蘇關係正常化，因為他充分意識到同蘇聯關係惡化的危險性。[47]儘管如此，由於改革派在政治局裏已佔有明顯優勢，黨內外推進改革和排斥蘇聯影響的情緒不斷高漲。在15—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出決定，將於19日召開八中全會，改組黨的最高領導層，擬定推舉哥穆爾卡出任中央第一書記，而在新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與蘇聯有密切聯繫的人，特別是包括仍保留蘇聯國籍的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K.Rokossowski）元帥。[48]波黨內部的保守派和親蘇勢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蘇聯使館，說波蘭當局正在走上反蘇道路，一方面準備發動政變，並草擬了約七百人的拘捕名單。但是，政變計劃被科馬爾（W.Komar）將軍[49]指揮的內衛部隊和組織起來的華沙市民挫敗，而蘇聯大使波諾馬連科（A.Ponomarenko）轉達的赫魯曉夫的堅決請求——要波蘭黨政治局全體成員與哥穆爾卡一起去莫斯科討論局勢，也遭到波蘭方面的拒絕，理由是八中全會即將開幕。[50]

10月18日，波諾馬連科又通知波蘭人說，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計劃於19日晨抵達華沙，並要求推遲八中全會的開幕日期，均遭到拒絕。哥穆爾卡後來向周恩來講述的情況與此相同，只是補充了一個情況：在蘇聯的壓力下，為避免局勢惡化和複雜化，波蘭黨中央政治局最後同意蘇聯代表團來波，並決定前往機場迎接。同一天，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作出兩個決定：（一）決定派遣蘇共代表團去波蘭；（二）將此事通告各兄弟黨。俄國檔案顯示，通告全文如下：「最近在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層就評價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國內的形勢，以及在進一步採取與此有關的措施方面出現了尖銳分歧。這些分歧涉及到黨和國家的內外政策和黨的領導班子組成的根本問題。由於波蘭局勢對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對蘇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層出現的局勢引起我們的嚴重不安。考慮到這一局勢的嚴重性，蘇共中央認為派遣由赫魯曉夫同志、卡岡諾維奇同志、米高揚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組成的代表圈去波蘭是必要的。」顯然，與中國的一些回憶史料完全不同，蘇共在通報中只提到代表團去波蘭的必要性，而根本沒提準備武裝干涉的想法，儘管莫斯科已經決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團會議後，國防部長朱可夫（G.Zhukov）下達了命令，要求蘇聯在波蘭及其邊境附近的駐軍做好軍事準備。[51]俄國國防部的檔案材料證明，10月19日，波羅的海軍區和第7空降師108傘兵近衛團已經完成了戰鬥準備，54架里-2和45架伊

爾-12飛機正待命出發。[52]

10月19日早晨7時，蘇聯代表團的飛機到達華沙，隨行的還有華沙條約部隊總司令科涅夫（I.Konev）、參謀長安東諾夫（A.Antonov）和一大批高級軍官。哥穆爾卡與波蘭領導人趕到機場迎接時，遭到了赫魯曉夫氣勢洶洶的指責和呵斥。經過短暫的爭吵，波蘭人拒絕了赫魯曉夫關於延期召開中央全會的要求。雙方隨後來到代表團下榻的貝凡德爾宮繼續會談。在激烈的爭論中，赫魯曉夫明確說要對波蘭進行「強制性干預」，哥穆爾卡則冷靜地表示，如果蘇方繼續進行威脅，就會中止會談。因當時波黨所有中央委員正在另一幢大樓的會議廳等待全會開始，蘇聯代表團被迫同意波蘭領導人先去主持全會開幕式。10點鐘大會正式開幕，首先通過了政治局關於增選哥穆爾卡等四人為中央委員的決定，政治局還建議由哥穆爾卡擔任第一書記。然後，奧哈布簡單通報了蘇共代表團來波的消息，並建議為繼續同蘇聯代表團進行會談而休會。大會僅進行了半個小時。此後在貝凡德爾宮進行的波蘇兩黨會談，氣氛稍許平和了一些。米高揚闡述了蘇聯代表團的看法，強調指出蘇聯在民主德國領土擁有武裝力量，因而對八中全會後可能在波蘭發生的變化並造成蘇聯同這些部隊聯繫困難甚至中斷的局面表示擔憂。米高揚表示蘇聯方面絕對不能容忍出現這種情況，莫洛托夫則表現出更為強硬的立場。波蘭方面解釋說，八中全會後所推行的政策和變革只會密切波蘭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加強而不是削弱波蘭與蘇聯的關係。儘管如此，蘇共代表團還是強烈要求除增補哥穆爾卡外，波黨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變動。這一要求得到羅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爾卡等人拒絕。

此時，波蘭內務部開始不斷得到蘇軍從西面和北面向華沙前進的消息，並做好了迎擊的準備。不過，波蘭人一時無法判斷蘇聯的舉動是已經決心進行武裝干涉，還是想以此施加壓力，迫使波蘭讓步。在這種微妙的時刻，任何莽撞的決定都只會引起更加複雜和危險的結果。哥穆爾卡沒有採取行動，只是向蘇方提出了抗議。赫魯曉夫謊稱是以前布置的軍事演習，並答應立即停止。會談繼續進行，除了波蘭領導層的人事問題，又在波蘇關係中一些具體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由於遲遲無法取得一致意見，下午6時，奧哈布返回全會，向中央委員們作了簡要匯報，並建議因需要連夜與蘇聯代表圈進行會談，全會推遲到第二天上午再開。晚飯後雙邊會談繼續進行。這時，並未停止前進的蘇聯部隊還在緩緩向華沙迫近，而為數不多的波蘭武裝力量部隊根據羅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開始在華沙周圍集結。此前，羅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魯曉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話，他將隨時聽候莫斯科的吩咐。與此同時，得到軍隊行動消息的華沙工人、學生紛紛集會，並遊行

示威，強烈譴責蘇聯干涉波蘭內政，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貫徹民主化。[53]蘇聯使館及時向赫魯曉夫報告了這個情況，並斷言在華沙即將爆發一場真正的叛亂，示威遊行具有危險性和反蘇性質，局勢驟然緊張起來。

關於蘇聯和波蘭軍隊正向華沙逼近的消息不斷傳到會場。晚9時，感到受騙的哥穆爾卡向赫魯曉夫提出強烈抗議，堅決要求蘇聯立即停止部隊調動，否則將通過電台向波蘭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時又責問羅科索夫斯基波蘭軍隊向華沙移動的目的何在。隨後，哥穆爾卡斷然中止了會談，等待蘇聯人盡快作出決定。其實，波蘭改革派領導人早就對危急的形勢有所估計，特別是在18日晚得知蘇聯代表團執意要來華沙時，就已經考慮到蘇軍可能進行武裝干涉，並有了軍事準備。華沙軍區採取了預防性措施：成立了兩個司令部——軍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務是監督蘇聯部隊的調動並及時向政治局報告，波蘭的海軍和空軍也制定了反擊蘇軍的作戰計劃。內衛部隊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況下逮捕蘇聯代表團。一些工廠和學校也建立起糾察隊和自衛隊，並得到了武器裝備。[54]此時，必須作出選擇的赫魯曉夫得到了兩個情報，第一，通往華沙的道路已被波蘭內衛部隊阻斷，除非進行戰鬥，否則蘇軍無法前進；第二，羅科索夫斯基已經失去了對波蘭部分軍隊的控制，一旦發生軍事衝突，部隊可能拒絕執行他的命令。於是，赫魯曉夫一方面命令蘇聯坦克部隊停止前進，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決定接受哥穆爾卡擔任第一書記。恢後會談後，赫魯曉夫表示可以退讓，但如果波蘭企圖退出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蘇聯將不得不進行干涉。哥穆爾卡則再次向蘇聯代表團保證，他們的擔憂是毫無根據的，「波蘭需要蘇聯的友誼甚於蘇聯需要波蘭的友誼」，波黨中央全會的決議將會使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同時，哥穆爾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波蘇之間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赫魯曉夫終於相信了哥穆爾卡充滿誠意的保證，雙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舉行會談，解決雙邊關係問題。會談到20日清晨結束，蘇聯的「軍事演習」也停止了。蘇聯代表團離開華沙時，機場上的告別儀式是在正常氣氛中舉行的。[55]

以上情況說明，赫魯曉夫決定暫時停止在華沙的軍事行動有兩個原因，一是對形勢的判斷使蘇聯人意識到採取軍事行動可能會擴大為一場戰爭，二是波蘭黨的行為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並沒有要擺脫蘇聯的意圖。顯然，後者更為重要——華沙畢竟沒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線。新華社後來從波蘭方面獲取的信息證明，蘇聯倉促做出的武裝干涉的決定，確實是受了錯誤情報的誤導：「據可靠方面說」，就是因為保守派「向蘇聯大使提供了錯誤情報，說波蘭發生了反革命政變，所以蘇聯當時才採取了最緊急的措施，包括軍隊的集結和調動。但當赫魯曉夫等同

志到華沙談判後，才弄清楚不是那麼回事」。[56]此外還可以斷定，中國的因素在這裏沒有起甚麼作用，因為赫魯曉夫和哥穆爾卡此時並不知道中共的態度，甚至中共也還沒有得到蘇聯將使用武力進行干涉的消息。[57]

當華沙劍拔弩張時，北京似乎還很平靜。關於19日蘇聯是否通知中國準備在波蘭使用武力的問題很重要，這涉及到毛澤東是否出面阻止蘇軍調動以及中國的反應是否對蘇聯決定停止在華沙的軍事行動產生了影響。因此，有必要對中國史料中的不同說法做出判斷。

據說，10月18日尤金大使接到莫斯科轉來的給中共中央的通知後，緊急約見毛澤東，但毛澤東沒有立即見他。[58]19日，尤金向劉少奇遞交了蘇共中央的來信。據劉少奇的翻譯師哲回憶，尤金說：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發生了嚴重分歧，並準備召開八中全會，改組政治局，要把羅科索夫斯基等人開除出政治局。蘇共中央認為，這些政策關係到蘇聯、東歐的根本利益，懷疑波蘭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入西方集團的危險。尤金通知說，蘇共中央代表團已經去了波蘭。師哲還特別指出：尤金沒有告訴中共領導人，蘇聯此時已出動了軍隊，對華沙形成了包圍態勢。[59]師哲是直接當事人，而且這個說法與上述俄國的檔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斷，事實上中國當時並不知道蘇聯已經準備武裝干涉波蘭。

另一種說法是駱亦粟和吳冷西提供的，據他們回憶，尤金19日明確告訴中共，蘇聯「準備調動軍隊來解決問題」。吳冷西說：2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決定向蘇聯提出警告。晚7時，毛澤東接見尤金說：「我們收到蘇共中央徵求意見的通知，說你們要出兵干涉波蘭。我們政治局今天下午開會討論了此事，我們堅決反對你們這樣做。請你馬上把我們的意見打電話告訴赫魯曉夫：如果蘇聯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你們，並公開聲明譴責你們武裝干涉波蘭。」吳還回憶說，22日毛澤東聽到蘇聯已經撤軍的消息時又說，這主要是在波蘭遇到了堅強抵抗，但中國黨的表態對此也有一定影響。[60]由於吳冷西當時列席政治局會議，所以他的說法在中國廣為流傳。[61]但在筆者看來，此言疑點頗多。首先，說中國收到了蘇共中央關於出兵干涉波蘭的通知，這與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決議及目前看到的通知內容不符——那裏根本沒提出兵的事。其次，說尤金明確告訴中共蘇聯準備調動軍隊解決問題，與邏輯不符——尤金不可能違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將軍事調動的機密告訴中國人。最後，如果毛澤東沒有得到蘇聯出兵的準確消息，怎麼可能劈頭蓋臉地指責蘇聯領導人呢？那麼，毛澤東是否從別的渠道得知了蘇聯出兵華沙的消息呢？據最近開放的中國外交部檔案，中國使館19日發出的電報確曾說過：「駐德蘇軍將開進波蘭，西里西亞地區蘇境

蘇軍亦向波邊境集中」，但聲明這只是「謠傳」。況且，中國外交部收到這個有關「謠傳」的電報已經是20日17時20分，而譯出電文則是在21日清晨。[62]看來，毛澤東既沒有事先得到蘇聯出兵的計劃，當時也根本不了解華沙發生的情況，他怎麼可能指責蘇聯人呢？劉少奇在11月10日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回顧了事情的經過：19日尤金向他通報了波蘭的情況，中共沒有發表甚麼意見。21日又來通知，並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去莫斯科。毛澤東在21日和22日連續兩次接見尤金，勸說蘇聯要讓步，應平等合作。[63]無論如何可以確定，赫魯曉夫在19日夜間決定停止在波蘭的軍事行動時，還不知道中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別說赫魯曉夫和哥穆爾卡，就是中國駐波使館，當時都不知道毛澤東對波蘭形勢的看法。對於波蘭問題，中共中央作出的判斷是有變化的。當時中國主要有兩個信息來源，一個是大使館，一個是新華社，但二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前者強調問題的核心是波蘭的反蘇和脫離社會主義的情緒，後者認為主要問題在於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對於波茲南事件，王炳南大使認為起因於工人對待遇不滿，但騷亂是「挑撥分子」所為。[64]隨後，《人民日報》7月12日發表了題為〈警惕帝國主義的陰謀和國內反革命活動〉的社論。但到10月12日，新華社記者的報道就對波蘭的局勢發展開始持樂觀看法，認為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波蘭出現了「如狂風般的空前廣泛、空前熱烈而又空前深刻的全民性的政治、思想大討論」，目前波蘭全國上下「都在積極設法採取措施改正錯誤和缺點。大多數人們並未失掉信心，人們仍然堅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雖然在這場大討論中有過一些偏差，而且目前也存着一些矯枉過正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但其主要結果是積極的，正確的」。[65]中國使館人員無法像新華社記者那樣活躍在民間和街頭，因此消息就閉塞得多，而王炳南大使與波諾馬連科私交甚篤，對波蘭局勢的看法也深受其影響，所報波蘭情況，基本上都是蘇聯人的觀點。[66]新華社記者謝文清在10月22日發回的密電中寫到：「我個人認為，蘇共代表團的到達，華沙的調集軍隊之舉是不夠明智的，引起人民強烈的不滿。在華沙到處可聽到這種不滿的言論。」而大使館在這封電報上加了按語說：「這篇報道只代表謝文清同志個人的意見，和使館的看法有基本差別」。[67]莫斯科當然更希望早些了解中國的立場。

赫魯曉夫一行回國後對波蘭的局勢仍然放心不下，接連召開會議討論。10月2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工作記錄顯示，蘇聯領導人希望「結束波蘭目前的局面」，條件是羅科索夫斯基繼續留在波蘭。會議研究了在波蘭的軍事演習問題（但從記錄看不出討論結果），還決定準備從波蘭召回蘇聯顧問的文件，並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處理波蘭問題。記錄還顯示，這時莫斯科已經意識到駐波蘭使館在對奧哈布和哥穆爾卡進行評

價時「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為慎重起見，會議最後決定邀請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代表來莫斯科進行商議，並擬派一位中央委員會代表專門去中國通報情況。[68]

在21日的主席團會議上，儘管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布爾加寧還在猶豫，但赫魯曉夫已經傾向於對波蘭讓步，他提出：「鑑於形勢，應該放棄武力干涉。應表現出耐性。」這個意見得到多數人贊同。會議擬定並通過了給波黨中央的信，同意撤消隸屬於波蘭安全部門的蘇聯顧問機構，召回在波蘭軍隊中的蘇聯顧問。會議再次提出，「召開一次有民主德國、中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領導人參加的會議是必要的」，時間確定在23日，並通過了給各黨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鑑於波蘭的形勢，我們希望交換意見」，還說要派一架專機來接中國代表團。[69]會議當天，赫魯曉夫與哥穆爾卡通了電話，他在談話中強調，「沒有任何障礙能夠阻止把蘇聯與波蘭之間黨和國家的相互關係建立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所闡述的原則的基礎上」。[70]顯然，在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前，蘇聯對波蘭的基本政策已確定，所需要的幫助是如何處理與波蘭關係的善後工作以及穩定社會主義陣營的局勢。[71]後來的情況表明，正是在這些問題上，中共代表團發揮了重要作用。

接到蘇聯的邀請信後，毛澤東在21日晚上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波蘭局勢和蘇共中央的來信。會議決定派遣代表團赴蘇，其任務主要是從中做調解工作，勸他們協商一致，達成協議；方針是着重批評蘇共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勸說波蘭黨顧全大局；方式是分別與波蘇兩方會談，而不搞三方會談。[72]會後，毛澤東連夜接見尤金，告訴了中共中央的決定。22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繼續討論波蘭問題。會議結束後，毛再次約見尤金，對他說：看來波蘭還不像馬上要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加入西方集團。他們要改組政治局似乎是堅決的。對於這種情況，蘇聯方面到底採取甚麼方針？無非一種是軟的辦法，一種是硬的辦法。所謂硬的辦法就是派軍隊，把他壓下來，比如武裝干涉；軟的辦法是勸告他。勸他，他不聽，剩下一個就是讓步。他要改組政治局，就讓他改組，承認哥穆爾卡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礎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獨立要平等嗎？就讓他獨立，跟他講平等。這樣，就可以爭取波蘭留在社會主義陣營和華沙條約組織裏。[73]這時毛澤東才開始對波蘭問題表態。23日外交部致電王炳南，要求他只管收集材料，及時報告國內，「不要人云亦云」。25日電更直接指出，使館對波蘭局勢的看法是不正確的，而肯定了謝文清的意見。[74]由此看出，劉少奇訪蘇的目的主要是批評蘇聯的大國主義和老子黨作風，同時保證波蘭留在社會主義陣營。

與此同時，中共也向波蘭方面表明了對波蘭國內政策的傾向性態度。據出席中共八大的波蘭輕工業部長米契斯瓦夫·馬熱茨（Mieczyslaw Marzec）回憶，10月1日代表團團長奧哈布因國內形勢緊張提前回國，其他成員在中國南方和西部參觀了三周。當代表團回國的飛機將要起飛時，發動機突然熄火，馬熱茨等人被帶到機場貴賓接待室，等候他們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和朱德。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對馬熱茨說：「我們請您向波蘭黨領導人轉達我們的敬意及對你們進行改革的欽佩之意。我們要強調的是，我們完全支持波蘭共產黨人為糾正錯誤所作的自主努力，並祝願你們在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中取得成就。」劉少奇接着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將向蘇共通報中國對波蘭改革的態度，波蘭完全可以指望中共的支持。最後，劉少奇還表示中國將向波蘭提供三千萬美元的無償貸款。馬熱茨回國匯報後，波蘭領導人對此十分感激。[75]

赫魯曉夫似乎已經感覺到中國人將在波蘇之間起到重要的溝通和調解作用。10月2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10月24日11時集體同中國人會晤。[76]然而，未等集體會見，赫魯曉夫便搶先單獨趕到機場等候。中國代表團於23日午後抵達莫斯科伏努科夫機場，赫魯曉夫一路陪同劉少奇來到賓館，並不斷訴說蘇聯在對波關係中的委屈，希望中國黨給他出主意，並表態支持他。談到處理波蘭危機時，赫魯曉夫做了自我批評。據師哲回憶，赫魯曉夫介紹說，他們最初對波蘭事件有一些無端懷疑，認為波蘭要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因此採取了粗暴的辦法，調動了軍隊。但蘇共代表團到華沙後，同波蘭領導人談了一天，經過激烈的爭論，發現自己的懷疑是沒有根據的，所以改變了方針，準備承認波蘭新領導人。不過，赫魯曉夫強調，蘇聯對波蘭不大好講話，波蘭同志對你們比較信任，對你們好，希望中國同志能夠勸勸他們，那樣對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都有好處。劉少奇，鄧小平當即表態說：我們支持你們。[77]

據俄國檔案記載，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時，劉少奇首先聲明，「蘇共中央對波蘭採取的措施是正確的。基本的一條是，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心，不能有幾個中心」。同時也指出，「缺點是有的，應該糾正。有時是強加於人」。劉少奇還批評了過去斯大林對待日本共產黨的錯誤態度。最後，劉少奇表示，保證與蘇聯團結一致。赫魯曉夫則表示同意劉少奇的觀點。[78]會議記錄非常簡單，以致有些詞句的確切含義還無法確定。對此，參加會議的師哲的回憶，可以幫助對檔案文獻進行解讀：在長達兩個小時的發言中，劉少奇首先轉達了中共中央對波蘭事件的意見，表示同意蘇共中央對波蘭採取的方針，接着分析了危機爆發的原因。劉少奇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有一個處理相互關係要依據甚麽原則的問題。大國的黨，較老的黨，最先

取得政權的黨，理所當然應多承擔義務，做出較好的榜樣。蘇聯長期以來誠心誠意地幫助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波蘭、匈牙利和中國在內，而且幫助很大。但是關係還是搞不好，波蘭還是發生這樣的事情，匈牙利也發生這樣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盡善盡美，是不是其中還有一些缺點或者還有一些錯誤。請蘇聯同志考慮：蘇聯在斯大林時期，是不是犯有大國沙文主義、大民族主義的錯誤，致使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不正常的狀態。這也是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劉少奇說，有不少蘇聯同志處理許多國家事務時有缺點，有錯誤。有些國際會議不是採取認真協商的方式，甚至於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有時也有協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當天就要通過決議，人家沒有時間考慮。事先既沒有個別談話，又不作集體商談，只有強加於人，就是要別人聽你們的話，不聽，你們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聯、世界婦聯，世界青聯、世界和平運動中，都有這種情況。必須學會同兄弟黨、兄弟國家間協商、合作、協同動作：只想到自己，只考慮自己而不考慮別人的做法，是極其嚴重的錯誤，會給我們的共同事業帶來極大的害處和惡果。劉少奇最後說，無論國際形勢有怎樣的變化，或者我們之間有甚麼不同的意見，我們保證中共會跟蘇共站在一起。國際共運的中心只能是你們。但是，有不同的意見，我們應該講清楚。兩黨的團結是壓倒一切的大原則、大方向。如果我們兩黨的關係破裂了，帝國主義就要大加利用，大肆進攻。我們正是從這個大局出發，才在會議上舉手同意你們的決議。赫魯曉夫當場表示：兩黨關係不能再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否則，時間久了是一定會破裂的。劉少奇笑着說：不會的，就是有再大的問題，我們也還是站在一起的。因為這是決定世界形勢的問題。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利益，我們需要站在一起，這是壓倒一切的大原則、大道理，其他的爭論都是小問題。最後赫魯曉夫發表講話，表示完全同意劉少奇所提出的意見。[79]劉少奇回國後向中共中央報告說，在這次發言中，「批評了他們在國際關係中間特別是在對兄弟黨的關係中間的大國主義、大民族主義的傾向，並且指出了他們在一些具體事情上的一些缺點錯誤。我們算是比較坦率地這麼講一次。」[80]顯然，通過波蘭事件批評蘇聯，並要求蘇共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是中共代表團的主要目的。

會談期間，中國駐波蘭使館派人到莫斯科向劉少奇匯報情況。據參加匯報的駱亦粟回憶，劉少奇在聽取匯報時說：中央決定，這次只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批評多了，怕他們接受不了。還說：蘇聯同志不懂得這個道理，對東歐各國的事情，管得愈多包袱揹得愈重，人家離得愈遠，放開些，反而團結得緊些。鄧小平着重詢問了八中全會後波黨政治局人員的變動情況，特別對哥穆爾卡和羅科索夫斯基問得很仔細。他

指示：「要多做蘇波雙方的團結工作，但對一方講的話，要準備讓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讓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講，別看他們現在吵架，要想到將來他們有好起來的時候。」[81]這表明，中國當時對波蘇關係是有清醒認識的，對直接介入波蘭問題還是存有戒心的。

關於危機發生後中共如何做波蘭黨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吳冷西回憶錄中講的情況：中國代表團發回的電報說，在與哥穆爾卡、奧哈布等人的會談中，劉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們反對蘇聯干涉波蘭黨事務，同時也勸他們以大局為重，改善波蘇關係，加強與蘇聯的合作，度量要大一點，不要計較蘇聯過去對波蘭的許多錯誤做法，要以和為貴，向前看。中國黨希望波蘭與蘇聯搞好關係，因為波蘭是東歐最大的國家，與蘇聯關係的好壞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關係甚大，相信波蘭同志會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處理好波蘇關係。哥穆爾卡代表波蘭黨一再感謝中國黨的支持，並說波蘭黨和波蘭人民忘不了中國黨的支持，並表示要努力改善與蘇聯黨的關係，加強波蘇兩黨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劉少奇後來匯報說，我們在莫斯科時在蘇波兩黨之間進行調解，分別與兩黨代表團談了幾次，貫徹中央調解、勸和的方針，是取得了成功的。後來蘇波雙方談得比較好，蘇波之間不至於發生大的衝突了。[82]

儘管這條回憶史料已經被一些研究者使用，[83]但其真實性頗令人懷疑。據筆者考察，在劉少奇訪蘇期間，哥穆爾卡和波蘭代表團根本就沒有到莫斯科來。證據如下：10月2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工作記錄中有這樣一條記載：哥穆爾卡請求於11月8日進行會晤，此其一。[84]據師哲和駱亦粟（二人均在莫斯科）回憶，26日中蘇會談時，赫魯曉夫通報了他與哥穆爾卡通電話的內容，並請求劉少奇到華沙去幫助蘇聯做哥穆爾卡的工作，此其二。29日雙方會談時，赫魯曉夫再次通報了他與哥穆爾卡通話的內容，此其三。[85]在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確定，將與哥穆爾卡在布列斯特地區舉行會晤，討論匈牙利問題，此其四。[86]實際上，以哥穆爾卡為首的波蘭黨政代表團是11月15至18日訪問蘇聯的。[87]因此，10月23至31日哥穆爾卡根本就不在莫斯科，劉少奇與哥穆爾卡的談話以及中波代表團會談從何說起？

從檔案文獻看，中共對於波蘭黨確實也有擔憂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問題的核心是波蘭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立場，這首先表現在對羅科索夫斯基問題的處理方式。由於羅科索夫斯基是蘇聯控制波蘭的象徵，因此波蘭黨在將其排除出政治局後，還要進一步解除他的國防部長職務。這個消息不僅令蘇聯人不滿，也使中國人覺得有些過分。[88]劉少奇在10月26日參加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時表示，這個問題很關鍵，哥穆爾卡走得太遠了，不應對打擊過自己的人搞報復。為此，赫魯曉夫

才提出請劉少奇親自到華沙去幫助蘇聯做工作。[89]由於擔心劉少奇來華沙是為莫斯科當說客，向波蘭施加壓力，哥穆爾卡婉言拒絕了中國的請求。[90]於是，同波蘭人的接觸只能換一個方式進行。或許正是因為劉少奇無法在莫斯科與波蘭黨溝通，為了進一步讓哥穆爾卡了解中國的立場，毛澤東決定親自出面。

10月27日凌晨2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北京緊急會見波蘭大使基里洛克（S.Kiryluk），談話進行了三個小時。毛澤東在詳細了解波蘭局勢及哥穆爾卡的個人情況後，首先批評了蘇聯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殘餘，並表示支持波蘭黨的綱領和路線，還特別稱讚哥穆爾卡24日在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以及波蘭黨的「高度智慧」。同時，毛澤東也指出，中波兩黨必須聯合起來，盡最大努力說服蘇聯同志，但波蘭也必須表現出寬容態度，「我們不能容許敵人利用我們陣營內出現的裂痕」。此外，毛澤東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即對波蘭要求蘇聯軍隊撤出波蘭領土的主張感到擔憂。毛澤東認為，「撤軍問題的性質要廣泛、深刻得多」，因為社會主義陣營中其他一些國家也可能仿效波蘭提出同樣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國。如果出現類似局面，「這將意味着對社會主義陣營構成嚴重危險」。[91]中國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蘭人，他們最終對一些棘手的問題作出了決斷。得到北京發來的消息後，波蘭統一工人黨在28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致信感謝中國同志，並擬在波蘇會談結束後邀請中國代表團訪波；宣布羅科索夫斯基休假，臨時指派波杰羅夫斯基（Bordzilowski）擔任國防部長；通知中國，波蘭從未打算要求蘇聯從波蘭領土撤軍。[92]

然而，尚未接到波蘭的信件，毛澤東對處理問題的方式已經開始改變，其原因顯然是對當時動亂的匈牙利局勢有所好轉作出了過於樂觀的判斷。據師哲和駱亦粟回憶，10月29日，赫魯曉夫、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到別墅來看望中共代表團。他們說，最近波蘭、匈牙利都要求蘇聯軍隊從他們國家退出，而這個問題涉及到整個華沙條約，如果其他國家也要求退出，那麼整個華沙條約組織就垮了，這只會對帝國主義有利。劉少奇也明確表示：蘇軍最好不要退出，還是要保持華沙條約。他還談到要保護羅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問題。這時北京來了電話，劉少奇接完電話後向蘇聯人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希望蘇聯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一律平等，更加放開些，駐軍也應該撤離，讓這些國家獨立自主。赫魯曉夫等人對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劉少奇說，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陣營。你們放手，給他們獨立平等，他們會更靠近你們，會更擁護蘇聯。經過討論和說服工作，赫魯曉夫最後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對的，我們應該拿出勇氣，把我們同這些國家的關係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這時劉少奇

提出了一個建議：蘇方是否可以公開聲明不干涉別國內政，相互平等，經濟、組織等問題由各國自己決定。談話一直進行到夜裏兩點。赫魯曉夫最終還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議，表示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個宣言。於是，雙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進行了安排。[93]到30日晚8時完成宣言草案。[94]随後，赫魯曉夫返回主席國會議。討論中，赫魯曉夫表示放棄在羅科索夫斯基問題上的意見，讓波蘭人自己做主。會議通過了經中蘇雙方討論過的宣言草案，題目是〈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友誼和合作的基礎〉。[95]

至此，在劉少奇看來，波蘭問題算是解決了。不過，最後通過發表宣言解決問題的時機和方式卻給處理匈牙利危機帶來了麻煩。

3 匈牙利危機：毛澤東提出的主導性意見

與波蘭事件相比，蘇聯在最初處理匈牙利危機時（10月23至24日），反應非常迅速，決策也非常果斷。這裏的問題是：第一，蘇聯出兵鎮壓布達佩斯騷亂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第二，中國當時是否知道莫斯科的這個決策；第三，中國對蘇聯這次軍事行動持何種態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時，蘇聯和匈牙利黨能夠及時選擇像納吉或卡達爾（Kadar Janos）這樣的改革派人物出來主政，匈牙利的危機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極力舉薦的格羅，而格羅的思想路線與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結果使匈牙利的動亂局面沒有絲毫減弱，反而更加劇烈。[96]格羅執政後的舉動令人頗感失望，他竟然到蘇聯休假長達兩個月。回國後不久又帶領主要中央領導人去訪問南斯拉夫，直到22日夜晚才匆匆趕回國。[97]而手足無措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被迫作出的一個又一個讓步，總是比情緒激昂的群眾運動和輿論要求晚半拍，以至危機步步逼近。

10月6日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舉行了重新安葬儀式，前往送葬的隊伍多達二十萬人。這是人們第一次走上街頭表示對現政權的不滿，也是民眾感到自己有力量對抗當局的重要的心理界線。特別是當新聞影片中出現了納吉參加送葬的特寫鏡頭時，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反響。[98]10月14日《自由人民報》刊載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一項決議：為納吉恢復黨籍。儘管決議稱纳吉仍是犯有錯誤的，但同時刊登的納吉給黨中央的信件卻使人感到錯誤不在納吉，而在黨的路線和政策。[99]這時，格羅已經預感到，「過些時候大概不得不讓納吉進入黨的領導——中央委員會，也許還要進入政治局，因為在這方面的壓力非常大。而納吉一旦進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勢的

主宰者』。」[100]

從16日開始，布達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爾茨、塞格德、佩奇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學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們拒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拒絕斯大林式的治國方法，堅持按民主原則改革政治體制。學生的口號愈來愈響亮，要求愈來愈激烈，而且得到了黨內改革派和城市多數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聞工作者協會代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證批評自由和給予新聞工作者以豁免權。大會特別提出贊成中國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致電匈黨政治局祝賀恢復納吉的黨籍。[101]

10月22日在建築工程大學一次有幾千人參加的學生集會上，成立了匈牙利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會，並提出了十六條要求，其中包括：立即從匈牙利撤出全部蘇聯軍隊，通過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選舉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基層、中層和中央機構領導人，在納吉領導下進行政府改組，罷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時代犯有罪行的領導人，審判拉科西，在多黨制基礎上進行全民選舉，制定工人最低生活標準，平等對待單幹戶農民，釋放無辜的被捕者並為他們恢復名譽等。[102]此時，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和學生這三股力量已經聚合在一起了。

學生們的綱領沒有提出任何進行根本經濟變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進程度上卻超過了以往幾個月以「裴多菲俱樂部」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精英和黨內改革派提出的口號。[103]為了表達和宣傳自己的綱領，學生們提出在第二天下午2時30分舉行遊行示威，並得到了共青團中央的支持。剛剛回國的格羅等人擔心局勢失控，於10月23日12時53分由內務部通過廣播電台宣布了禁止遊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憤而不得不在集會前幾分鐘取消禁令。當天的所有報紙都刊登了聲援波蘭人抵制蘇聯的文章，以及各種群眾倡議和通告，輿論明顯地傾向於民眾。於是，參加遊行的人數逐漸增加，成份也發生了變化。下班之後，布達佩斯市區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加入了遊行行列，工人們也從市郊的工業區湧進城裏。遊行的規模愈來愈擴大，喊出的口號愈來愈激進，憤怒的人群開始行動起來——象徵着蘇聯統治的斯大林銅像被吊車和鋼索拉倒了，人們拖着被切割下來的斯大林頭像在街上奔跑，情緒十分激奮。白天的和平遊行到晚上變成了難以控制的騷亂。[104]正當人們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時，格羅在晚上8時發表了廣播講話。令人群失望和激憤的是，格羅一口咬定這次運動是「敵對勢力」企圖「顛覆工人階級政權」和「破壞秩序」，是「民族主義的宣傳和挑釁活動」。這不啻火上澆油，人們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試圖衝進廣播電台大樓，宣讀遊行示威者的綱領性要求，結果與國家安全部隊發生了衝突。晚上9時以後，衝突過程中第一次出現了傷亡（誰開第一槍的問題至今沒有可靠的證

據）。這時，抗議行動開始帶有武裝暴動的性質了，遊行示威者從派來增援守衛大樓的部隊以及民防倉庫和地段警察局那裏搶奪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時分，匈黨中央下令實行戒嚴，鎮壓開始了。[105]

鑑於布達佩斯不穩定的形勢，蘇聯駐匈牙利的華約部隊——特別軍早就制定了應急預案。1956年7月，華約部隊參謀長安東諾夫到達布達佩斯檢查部隊情況。隨後，駐軍參謀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幫助下制定了一份「特別軍參加在匈牙利領土內恢復秩序」的絕密計劃，代號為「波浪」。該計劃包括一項特別指令，規定了在必要時蘇聯軍必須佔領和守衛的目標，蘇軍與匈牙利國家保安機構及人民軍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裝備數量。隨着局勢發展，10月6日至19日，安德羅波夫與特別軍負責人多次舉行會晤，研究部署和準備工作。21日特別軍領導人又檢查了各部隊出動前的準備狀況，同時在蘇聯邊界也採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勢失控的安全措施。[106]由於10月中旬安德羅波夫和特別軍軍長拉先科（P.Lashchenko）分別給蘇共中央和總參謀部發來關於匈牙利形勢的緊急報告，10月2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已經考慮派米高揚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隊以利戰備的問題了。特別軍參謀長馬拉申科（Y.Malashenko）於10月22日夜晚抵達布達佩斯，以親自掌握局勢的變化。[107]蘇聯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和蘇軍副總參謀長馬利寧（M.Malinyin）也於23日趕到匈牙利。[108]相反，匈牙利軍隊的舉措卻顯得猶豫不決。國防部長巴塔（Bata Istvan）19日下達了部隊進入戰備狀態的命令，同時批准了為應付布達佩斯出現社會動亂而制定的計劃，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備狀態，以致在布達佩斯發生武裝暴亂當晚，很多軍官都不知是否應當執行鎮壓的命令。[109]顯然，實行鎮壓的任務只能靠蘇軍來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動蘇聯軍隊進行鎮壓的是蘇聯駐匈軍事總顧問吉洪諾夫（M.Tikhonov）和大使安德羅波夫。匈牙利國防部上校米克羅什·蘇奇（Miklos Szucs）在回憶錄中說，10月23日下午5時，吉洪諾夫當着國防部眾多官員的面與在莫斯科的安東諾夫通了電話，要求准許命令特別軍在必要時進入布達佩斯。得到批准後，吉洪諾夫隨即命令特別軍處於待命狀態，並向在場的匈牙利軍官宣布，部隊將於午夜後某一時刻抵達布達佩斯。[110]另據馬拉申科回憶，同樣在下午5時，安德羅波夫通過軍用電話向拉先科通報了布達佩斯的局勢，並詢問他能否派部隊幫助維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說，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隊的事情，況且沒有蘇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命令，他的部隊是不能調動的。然而不到一個小時，特別軍便接到了蘇聯武裝力量司令部的命令——準備戰鬥。[111]還有材料說，喀爾巴阡軍區的第128步兵近衛師於19時45分，而駐匈特別軍於20時接到了緊急待命的命令。[112]無論

如何，在匈牙利正式向蘇聯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宮對處理危機的措施作出決定之前，蘇聯軍隊已經做好了戰鬥準備。[113]

23日夜晚，蘇聯和匈牙利領導人都在緊張地研究應對危機的辦法。

據俄國檔案記載，在23日22至23時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首先由朱可夫通報了匈牙利的局勢，然後赫魯曉夫提議向布達佩斯派出蘇聯軍隊，布爾加寧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揚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沒有納吉就無法控制局勢，而對蘇聯來說，這是代價最小的辦法。如果蘇聯軍隊開進去，就會自找麻煩。可以先採取政治手段試試，不行再派軍隊去。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朱可夫、蘇斯洛夫認為，匈牙利局勢已經動盪不安，與波蘭的情況不同，所以必須出兵並宣布全國實行戒嚴和宵禁。其他主席團成員別爾烏辛、薩布羅夫、謝皮洛夫、基里琴科（A.Kirichenko）隨聲附和。會議還決定派主席團成員米高揚、蘇斯洛夫及蘇軍副總參謀長馬利寧和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去布達佩斯。赫魯曉夫最後說，可以吸收納吉參與政治活動，但暫時不擔任政府首腦。[114]正在莫斯科「休養」的拉科西也被邀請來參加會議。據拉科西回憶，晚10點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團會議現場，赫魯曉夫介紹了布達佩斯的情況後問道，在這種局勢下是否需要蘇聯軍隊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猶豫地回答：「絕對需要，而且必須立即干涉。」於是赫魯曉夫接通了布達佩斯的電話，在簡短交談中，格羅扼要地介紹說形勢很複雜。赫魯曉夫告訴他，在同反革命的鬥爭中，蘇聯願意給予任何的軍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請求。此外還通知說，米高揚將連夜趕赴布達佩斯並轉告蘇聯的決定，在此之前不要採取任何重要舉動。[115]

匈牙利領導人當晚集聚在格羅房間裏，神經更為緊張，顯得有些手足無措。格羅對他的廣播講話所引起的劇烈反應感到非常吃驚，為了平息民憤，不得不提議請納吉出來組建新政府，在場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納吉被請到黨中央大廈，並毫無條件地同意出任部長會議主席。22時22分，廣播電台播發了一條消息：立即召開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全會。這次緊急召開的只有三分之一成員參加的中央全會，到24日凌晨才結束，會議一致通過由納吉取代赫格居斯（Hegedus Andras）擔任部長會議主席。此外，大家還一致同意格羅的建議，馬上給赫魯曉夫通電話，請求蘇聯出兵鎮壓剛剛出現的暴亂，因為匈牙利的軍隊已經靠不住了——除國家安全部隊外，正規軍被禁止開槍，除非他們自身遭受攻擊，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戰士」一邊。於是，會議決定邀請蘇聯軍隊，並發布戒嚴令。[116]然而，在此之前，蘇軍已經開始行動了。[117]

10月23日23時，蘇聯國防部根據政府的決定向駐匈特別軍、喀爾巴阡軍區步兵軍、部署在羅馬尼亞的獨立機械化集團軍發出了戰鬥警報，

這些部隊共計5個師31550人，擁有1130輛坦克和自行火炮，615門火炮和迫擊炮，185門高射炮，380輛裝甲運兵車，3930輛汽車。同時進入戰鬥準備的還有4個空軍師，共計殲擊機159架，轟炸機122架。各部隊的任務是：特別軍主力進入布達佩斯，佔領該市重要設施並恢復那裏的秩序，同時以部分兵力在奧匈邊境擔任掩護；喀爾巴阡軍區步兵軍負責佔領匈牙利東部各大城市；獨立機械化集團軍進入匈牙利南部地區。各部隊隨即展開行動：喀爾巴阡軍區步兵軍在10月23日夜已越過蘇匈邊界，特別軍於當地時間24日2時至4時進入布達佩斯並佔領了該市重要設施，獨立機械化集團軍主力於4時15分至6時20分進入匈牙利領土。殲擊機部隊起飛掩護陸軍行動，森炸機部隊則在機場待命。[118]

從匈牙利局勢驟然惡化到蘇聯軍隊進入布達佩斯和佔領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後不足十二個小時，在此期間，中國沒有作出任何反應。根據俄國的檔案記載和師哲的回憶錄，23日下午劉少奇到達莫斯科，在其住所與赫魯曉夫談話時，格羅來電話說，因國內離不開，無法到莫斯科來開會。赫魯曉夫答應他可以不來。過了一會兒，朱可夫來電話說，布達佩斯的群眾已走上街頭，並衝進黨政機關大樓。警察拒絕為大樓提供保護，而國防軍派去維持秩序的部隊被群眾繳了械。因此匈牙利國防部長給他打電話，要求蘇聯派軍隊給予援助。朱可夫推說這是政治問題，應在兩個黨中央之間解決。又過了約一個小時，朱可夫第二次來電話。當時赫魯曉夫表示，出兵問題主席團要討論，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請求的話，可以考慮。放下電話後，赫魯曉夫對劉少奇說：匈牙利目前的局勢你們完全不知道，現在也來不及徵求你們的意見了，明天主席團開會，請你們參加。說完就走了。24日上午劉少奇出席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赫魯曉夫在會上介紹了匈牙利的情況，稱蘇軍已經出動，進入了布達佩斯，社會秩序已基本上恢復。只有幾個據點沒有拿下來，其他問題都已解決了。人民歡迎蘇聯紅軍，歡迎蘇聯的坦克。他希望中國同志理解，這是完全必要的步驟。赫魯曉夫還強調，波蘭是黨內問題，是正確與錯誤的問題，而匈牙利已出現了反革命的徵兆。因此對匈牙利問題的處理不能跟波蘭一樣，希望中國同志了解。[119]看來，赫魯曉夫只是向中國代表團解釋了一下出兵的原因，並不需要中國人對此作出評論。[120]俄國的檔案文獻和師哲的回憶也都沒有記述劉少奇對匈牙利問題及蘇聯出兵的反應。劉少奇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報告說，赫魯曉夫走後他與毛澤東通了電話，因不了解情況，決定先不表態。[121]

10月23日晚8時和9時，中國駐匈使館發回兩個電報，未加評論地講述了布達佩斯遊行的情況和格羅的廣播演說。此後便沒有進一步消息了。24日下午4時外交部連續發出三封電報，要求駐匈牙利和其他東歐國家使館迅速報告匈政治局勢（特別是納吉的問題），「報告時切忌主

觀片面和人云亦云」，並要求駐匈使館立即派一名了解情況的參贊和匈文翻譯趕往莫斯科（自然是向劉少奇匯報）。[122]但也沒有收到回覆，其原因是通訊中斷。由於中國使館沒有電台和直線國際電話，平時與國內的一切通訊都要經市內郵電局進行。由於出現動亂，從23日午夜起一切國際電訊、電話全部切斷，使館的報告發不出去，國內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25日下午才恢復電訊（電話仍不通）。所以，24日上午使館報告遊行當夜已經「演變成反革命暴動」以及實行戒嚴和蘇軍出動的電報，外交部直到北京時間26日凌晨才收到。[123]據使館人員回憶，一則外交部指示「多聽少說，不輕易表態」，二則情況不明，也不便發言，所以，儘管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對中國的態度都非常友好，但中國使館對匈牙利的內部事務從不發表意見。從布達佩斯發生騷動一開始，中國大使館的鐵門就緊閉起來，拒絕與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聯繫，即使是那些以前來往密切的朋友。作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員，這些人希望在中國使館得到庇護，但郝德青通過門衛婉轉地請他們去蘇聯使館。在危機過程中，出於安全的考慮，中國使館人員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體辦公，只能通過收聽廣播和收集街頭傳單、小報來了解情況。[124]

除10月27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反革命分子利用學生和平遊行製造武裝暴亂，匈政府邀請蘇聯駐軍幫助恢復秩序的消息外，直到10月30日之前，中國政府和領導人沒有對匈牙利危機作出任何表態，至少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檔案文獻和已經出版的論著都沒有提到這一點。[125]這大概與匈牙利局勢發生了變化有關。27日中國使館報告，「反革命武裝力量已基本肅清」。28日又報告，納吉當日下午發表聲明，命令全面停火，宣布重組政府。「納吉聲明後，槍炮聲已漸平息」，恢復秩序有望。[126]到28日晚上，當蘇斯洛夫從布達佩斯返回並匯報了最新情況後，蘇聯領導人的傾向性意見是宣布支持卡達爾和納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羅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納吉的宣言，同意從布達佩斯和其他佔領地區撤軍。[127]同一天，駐匈蘇軍司令部下令制定蘇軍撤出布達佩斯而由匈牙利軍隊接管的計劃。按照後來制定的計劃，接替的部隊應於10月29日20時至30日6時進入陣地。[128]《人民日報》在28和29日兩天的報道讓人感到暴風雨即將過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亂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亂者放下了武器；暴亂分子請求談判，布達佩斯暫時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設法恢復和平生活；已經實行暫時停火，正在進行談判等。或許正是如此，毛澤東覺得華沙條約的存在已經不重要了，從而決定支持波、匈等國要求蘇軍撤退的主張。

沒有人會想到，兩天後風雲突變，更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從天而降。但這次蘇聯軍隊要對付的已經不是街頭「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軍

隊和武裝起來的市民了。

如果說蘇聯第一次出兵決策完全是獨自做出的話，那麼在蘇聯第二次出兵的決策過程中，中國領導人的意見則發揮了微妙影響和引導作用。在這個問題上，中蘇領導人在後來的政治論戰中各執一詞：中國方面強調在處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議蘇共中央不要從匈牙利撤走軍隊，要利用部隊鎮壓反革命叛亂」，否則就要「犯歷史的錯誤，給國際工人運動帶來損失」，蘇聯方面承認當時中共確曾對蘇共中央提出勸告，但勸告的內容與現在所說完全不同。[129]那麼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問題的大致脈絡是可以說清楚的。蘇軍撤出布達佩斯後突然又殺了一個回馬槍，在外人看來很難理解，以致美國駐蘇大使波倫（C.Bohlen）認為：「納吉於28日晚上發表的關於蘇軍從布達佩斯撤退的聲明似乎無非是一項得到蘇聯默契的、旨在促使起義者停火的詭計。」[130]甚至蘇聯軍人後來都認為，「這一切都是為了掩蓋軍事行動，使蘇軍能夠對匈牙利進行突然襲擊」。[131]但事實並非如此。從29日到31日，蘇聯在決策時由於內部意見分歧，一直搖擺不定，猶豫不決，而中國的主張則是前後不一，先要求蘇聯撤軍，後又主張出兵鎮壓。不過無論進退，中國的態度都非常堅定。正是這些看來不容更改的意見，對蘇聯處理危機的方式和結果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面對已經狂熱的人群，遲到的政府改組和讓步措施不僅沒有起到安撫作用，反而被一些激進的鬧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勢更加複雜了。10月29日莫斯科接到謝羅夫的報告：八千多關押在監獄中的犯人被釋放，並從看守人員那裏奪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們被煽動起強烈的反共情緒，有些共產黨員遭到槍殺；在德布勒森市，黨委已經轉入地下，並要求得到軍隊的支持；很多國家安全機構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國家安全人員受到圍攻和襲擊。[132]當日晚又收到米高揚和蘇斯洛夫的電報，說「群眾已經失控」，「反共分子變得愈來愈無恥」，布達佩斯市兩個區黨委會以及黨的機關報編輯部和印刷廠已被市民佔領。[133]當蘇共中央得到這些消息時，赫魯曉夫正在與劉少奇商談如何徹底解決蘇聯與東歐國家的關係問題。如前所說，會談期間劉少奇通報了毛澤東的意見，要求蘇聯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對東歐進一步放開。會談到29日深夜，蘇聯終於同意連夜起草一個平等關係宣言，並決定於第二天討論通過。[134]赫魯曉夫的回憶與中方材料大體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個匈牙利問題。據赫魯曉夫回憶，會談進行了一個通宵，討論了匈牙利事件的進程並研究了各種方案。赫魯曉夫通報了布達佩斯傳來的消息，中蘇雙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礎上反覆考慮應該採取甚麼措施，一會兒主張出兵，一會兒又決定放棄。正在這時毛澤東關於「進一步放開」的意見

來了，於是作出決定，在匈牙利放棄使用武力，讓事態自然發展，而把處理危機的希望寄託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135]

30日，布達佩斯的局勢進一步惡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揚的報告：「黨的領導機關感到束手無策，黨組織正在解體。流氓分子橫行霸道，強佔區黨委，殺害共產黨員。組建黨的糾察隊的工作進展緩慢，工廠停工，居民閒坐在家，鐵路停止運行，無賴大學生和其他叛亂分子改變策略，表現十分猖獗。」廣播電台已經被佔領，「叛亂分子發表聲明，只有在蘇軍撤出布達佩斯後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軍隊採取觀望立場」，「有可能與叛亂分子聯合」。米高揚建議，「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繼續在蘇聯領土上集結部隊」，「如果形勢進一步惡化，到那時當然就得從整體上重新考慮全部問題」。他最後表示，「尚未形成對局勢的最終看法」，但認為「科涅夫同志須立即前來匈牙利」。[136]是日14時，匈牙利部長會議主席團作出決議：在匈牙利結束一黨制。14時28分納吉發表廣播講話宣布了這個決議，並呼籲蘇聯軍隊立即撤離布達佩斯。納吉還聲明：政府將立即開始與蘇聯政府就蘇軍從匈牙利領土撤出事宜舉行談判；政府承認在革命過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機關。[137]按照28日的計劃，蘇聯軍隊於16時停止戰鬥，並開始從布達佩斯撤出。[138]中國使館也感到形勢惡化，使館人員和留學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甚至開始處理內部文件，做撤離的準備。[139]

然而，此時在莫斯科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卻把精力集中在討論剛剛按中共意見起草的平等關係宣言草案上。顯然是受此影響，會議在匈牙利問題上也傾向於採取妥協的立場。根據討論記錄，30日的會議剛開始研究米高揚和謝羅夫報告的匈牙利局勢時，赫魯曉夫進入會場，通報了昨晚與劉少奇會談的情況。赫魯曉夫說，考慮到蘇軍駐在國的意見，建議今天通過中共提議的宣言草案，而從人民民主國家撤軍的問題將在華沙條約國會議上討論。所有政治局成員一致表示同意。在隨後的討論中，布爾加寧雖然抱怨「中國同志對我們與人民民主國家的關係的認識是不正確的」，但還是同意了準備給匈牙利的呼籲書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議，立即開始關於從匈牙利撤軍的談判，至於華沙條約問題，與其他國家一起討論。關於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建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係，莫洛托夫認為，國家關係和黨際關係應在不同的基礎上。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的看法與莫洛托夫一致。但謝皮洛夫認為：「目前事件發生的過程，暴露了在我們與人民民主國家的關係方面存在着危機。反蘇的情緒在擴大。應該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還提出，應「堅持不干涉的原則」，經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後準備撤軍。朱可夫贊同撤軍，並承認處理匈牙利危機在軍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訓的，在民主德國和波蘭的駐軍問題更加嚴重，繼續堅持下去還不

知道會導致甚麼後果。福爾采娃（Y.Furtseva）和薩布羅夫也贊成通過宣言。赫魯曉夫最後總結說，大家意見一致，首先應發表宣言。随後，主席團討論了宣言草案。[140]傍晚時分，蘇方將宣言草稿送給劉少奇看，其內容基本上就是劉少奇講的話，甚至有的詞句都一樣。晚8時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團再度出席蘇共主席團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這個宣言。[141]顯然，中共關於發表平等宣言的建議，儘管原先是針對波蘭問題提出的，卻導致了30日蘇聯對匈牙利採取和平方針的決策。由此可以判斷，29至30日蘇聯決定放棄對匈牙利進行武裝干涉；對此，中共的影響是有決定性作用的。[142]

直到這時，中蘇兩方都還沒有提出對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問題。此後幾小時內，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雙方的說法卻完全不同。

按照赫魯曉夫在1957年6月中央全會和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中的說法，30日凌晨赫魯曉夫離開劉少奇回家時，作出的決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後看到匈牙利局勢惡化的新情報，經召開主席團會議討論，一致決定再次出兵干涉。因為已經與中國達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協議，現在又突然改變做法，所以在31日晚劉少奇回國前，赫魯曉夫帶領整個主席團趕到機場，與劉少奇等舉行會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劉少奇對此完全贊同，說這也是中國方面的考慮。[143]這就是說，再次出兵的決定完全是蘇聯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說法完全相反，按照吳冷西和師哲的回憶：10月30日上午，蘇方將米高揚關於匈牙利局勢惡化的報告送給劉少奇看。由於信息不通，[144]中共代表團看了這個報告後深感意外，整整討論了一天。經研究提出了兩種辦法，一是蘇軍撤出布達佩斯，二是蘇軍採取鎮壓行動。由於兩種辦法各有利弊，大家討論了一天也沒有結果。因此，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連夜召集政治局會議研究，經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匈牙利事件的性質不同，蘇聯想在波蘭動用軍隊是錯誤的，但對匈牙利必須幫助。毛澤東要求趕緊起草電報，告訴劉鄧代表中央鄭重向蘇共中央提出，中共不贊成從匈牙利撤兵，建議蘇軍仍然留在匈牙利。同時，毛在電話裏告訴劉少奇，可以把兩種辦法都向蘇聯提出，跟他們商量。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為好。當夜，應中共代表團要求，中蘇領導人舉行了緊急會議。劉少奇在發言時明確表示，對匈牙利的局勢，是不是還有挽救的機會？不要就這樣放棄了，放棄了可能要犯錯誤。鄧小平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在敵人手裏。蘇軍部隊應當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中共的意見很清楚，匈牙利的問題不同於波蘭問題，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了，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但赫魯曉夫表示非常為難，他說，出兵就意味着要對匈牙利實行全

面佔領，那樣我們就變成征服者了。我們已經考慮過，大家都認為這樣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張退讓。鑑於蘇方已有一致意見，中共代表團不好再說甚麼了。第二天（31日）晚上，劉少奇接到蘇方電話，要求代表團成員提前一個小時到達飛機場，同蘇方再度會談。赫魯曉夫一見面就告訴劉少奇，經過主席團一整天的討論，有了新的決定，準備在匈牙利採取進攻的方針。劉少奇表示贊同，又提醒說，蘇聯出兵的前提條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請，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眾的擁護。[145]

對比俄國檔案中關於30日和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的討論記錄，可以對上述說法做出是非評判。根據30日會議的第49號記錄，大約在夜晚（即主席團剛剛決定放棄對匈牙利進行武裝干涉和通過平等關係宣言），尤金報告了與中國代表團會談的情況。中國人對匈牙利局勢表示憂慮，提出：「匈牙利是否會脫離我們的陣營？納吉是怎樣一個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時候，赫魯曉夫和劉少奇進入會場。會議記錄表明，劉少奇轉達了中共中央的意見：「軍隊應該留在匈牙利和布達佩斯」。而對赫魯曉夫隨後發言的記錄是：「兩條途徑。軍事途徑——佔領。和平途徑——撤軍，進行談判。」莫洛托夫的講話似乎是傾向中國的意見：「政治局勢已經明確。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過渡性的政府。」[146]這說明30日夜間中共已經表明了新的立場，而蘇共還在猶豫。

31日的會議記錄顯示，蘇聯領導人已經明確了態度。赫魯曉夫對匈牙利局勢的意見是：必須重新考慮對匈牙利事件的評價問題，蘇聯軍隊不能從匈牙利和布達佩斯撤出，必須採取堅決的行動來恢復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們撤出匈牙利，就會使美國、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受到鼓舞。他們會認為我們軟弱並進攻我們。」接着，赫魯曉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後再把匈牙利送給西方，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赫魯曉夫還提出再次武裝干涉的具體辦法，如成立以卡達爾為首的臨時革命政府，由明尼赫（Munnich Ferenc）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國防部長和內務部長（如果納吉同意可以任部長會議副主席），以及與鐵托會談，向中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通報信息等。主席團一致同意赫魯曉夫的主張和提議。參加會議的匈牙利前領導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羅也表示贊同。[147]以後蘇聯對事情的處理大體就是按照赫魯曉夫的以上安排進行的。

顯然，檔案文獻的記載證明師哲的回憶是準確的。這個過程表明，對蘇聯第二次出兵決策起關鍵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澤東對匈牙利危機態度的轉變，更準確地說，是對納吉政府態度的轉變。儘管目前還無法看到在危機期間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對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變化，但是如果仔細閱讀《人民日報》的報道就可以發現，實際上，中國

官方的觀點從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時，就稱之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遊行及其製造的「武裝暴亂」，所不同的只是對匈政府行為的評論。在11月2日之前的報道對納吉政府比較客觀，言辭中還有表示支持的意思，從11月3日開始變調，不斷批評和指責納吉政府的做法。[148]由於受到過去宣傳的影響，人們大多以為蘇聯出兵是因為納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並向聯合國求援。實際上，納吉因阻止蘇軍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11月1日晚上，而此時蘇聯早已決定對匈牙利實行軍事佔領了。[149]至少在11月4日卡達爾新政府在蘇聯坦克護衛下進入布達佩斯之前，蘇聯對納吉的態度主要是認為他軟弱，無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還考慮讓他參加由莫斯科組織的新政府，而中國的估計則要嚴重得多。[150]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把納吉及其政府推向深淵的決定性一步，是毛澤東首先邁出的，而在危機的關頭，納吉恰恰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11月1日晚10時，納吉緊急召見中國大使郝德青，談話進行了兩個小時。納吉首先指出：「這次事件是一個悲劇，是黨過去所犯的嚴重錯誤引起的」。「和平示威運動表示了人們的不滿」，但被稱為反革命暴動，結果激化了矛盾，而蘇聯出兵干涉又使事件「趨向極端惡化」。「當然，在這種嚴重情況下，反革命法西斯分子進行了活動，但只是極少數」。匈政府已無數次地提請蘇聯當局注意，並整天與米高揚和蘇斯洛夫談判。「他們對事件的估計和論斷與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談到問題的焦點，納吉說：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表示願意談判，並指出蘇軍繼續駐留會使情況更惡化。但事情並不是如此發展的，根據飛機偵察，「從昨天下午起一直到現在的情況說明蘇軍不但沒有開始撤退，反而增援兩個新的坦克師」。這違反了「匈牙利政府與米高揚談判所獲得的協議」，也「違反蘇聯政府聲明」。納吉激動地說：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避免不堪設想的悲劇發生。「我們是共產黨人，政府內閣半數是共產黨人，部長會議主席是共產黨人，都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但現在情況嚴重到如此地步，到底是甚麼原因把我們拖到這種地步」。「我們別無他法，只有把這一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立即退出華沙條約，宣布中立」。納吉指出，現在蘇軍坦克部隊離布達佩斯只有六十公里，全國機場已被蘇聯坦克部隊佔領，這是有計劃的軍事進攻。納吉最後深情地表示：如果蘇軍撤退，我們可以立即收回向聯合國提出的控訴。「情況萬分嚴重，請大使轉告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求中國政府干預此事，幫助解決蘇軍撤退問題」。[151]納吉萬萬沒想到，毛澤東此時已經作出了與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決定。

當然，影響莫斯科決定第二次出兵的還有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國的態度，例如10月27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Dulles）在

達拉斯發表演說時稱，美國並不把蘇聯的衛星國當作潛在的軍事盟友。第二天，美國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又把杜勒斯的話重述了一遍。10月29日，美國大使波倫還特意請蘇聯領導人注意這種說法，甚至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10月31日的電視講話中又重述了一遍。[152]這無異於告訴莫斯科，美國不會出面干涉匈牙利問題。此外，與匈牙利危機同時爆發的蘇伊士危機，一方面如赫魯曉夫所說，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東失去控制後又在東歐丟掉一塊陣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決心——西方在集中精力處理中東危機時已經無暇顧及東歐的事情了。[153]此外，莫斯科盟友的立場也並非不重要。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在10月30日給蘇共中央的信中指出，與匈牙利黨和政府的立場不同，意大利共產黨仍堅持「把暴動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將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動的方向發展」。[154]同日蘇共中央還接到報告說，保加利亞駐蘇大使格拉西莫夫（Glashimov）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銳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許多行動是不正確的和敵視蘇聯的，關於蘇聯軍隊必須撤出匈牙利的聲明則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155]還有學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對其他東歐國家，特別是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產生的破壞性影響，使克格勃非常擔心：這一騷動如果不盡快平息，將會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連鎖反應。[156]不過，就影響蘇聯二次出兵匈牙利的決定而言，與毛澤東態度的轉變相比，所有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

11月1至2日，就在赫魯曉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穿梭游說的時候，[157]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佔匈牙利的「旋風」戰役計劃，並得到主席團會議的批准。[158]米高揚回到莫斯科以後堅決反對馬上採取軍事行動，他在主席團會議上提出「在目前的條件下，最好是支持現存的政府」，「目前不要與（匈牙利）軍隊鬧翻」，「再等十至十五天」，「局勢一旦穩定下來，事情就會向最好的方面發展」。但是所有與會者都表示反對，布爾加寧和卡岡諾維奇還特別強調：「中國人已經表明了我們不能撤軍的意見」。會議決定維持31日的決議，對匈牙利實行佔領。米高揚最後提出，「還有三天考慮的時間，同志們可以出出主意」，應該繼續與納吉政府保持接觸。[159]但是，一切都晚了。11月3日下午，在布達佩斯的五十多名中國留學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館避難。[160]當晚24時，由科涅夫元帥指揮的十二個師、總兵力達十萬人的駐匈蘇軍已經全部完成了戰鬥準備。莫斯科時間11月4日晨6時，口令「霹靂」下達後，全面佔領匈牙利的「旋風」戰役開始了。[161]

波匈事件實際上是東歐國家長期以來積累的與蘇聯的矛盾和對斯大林模式不滿的總爆發，而打開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應該說，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便逐步走上了希望變革的道路，這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要求。國內的社會壓力和國際的緊張局勢交

織在一起，使幾乎所有的蘇聯領導人都看到了改變現狀的緊迫性。在斯大林彌留之際召開的蘇聯最高機構聯席會議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變動，充分說明了蘇聯未來領導人想要擺脫斯大林陰影的心態。貝利亞在內務部實行的改革和針對柏林暴動提出的退讓政策，馬林科夫提出的加強農業發展的方針和對烏克蘭問題的處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決朝鮮戰爭的新方案等等，都表明改革或改變斯大林的「既定方針」已經在各個方面悄悄興起。儘管由於黨內繼承權鬥爭接連不斷，使某些改革措施沒有展開，但當這種鬥爭趨於平靜以後，克里姆林宮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經是當務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認識，這就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必然出現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要求。然而，保守勢力的存在，以及赫魯曉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變，文化素養不高，缺乏政治經驗）造成了這次改革的盲目性、隨意性、急躁性和不徹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處理斯大林問題的不慎重、欠穩妥的方式。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在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起強烈反響，一方面推動了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和匈牙利的改革進程，一方面也在共產黨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滿和動盪。[162]

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在處理東歐問題時便陷入了一種二律背反的兩難境地。推行政治和經濟改革的路線，必然要求蘇聯在東歐國家解放和起用過去受到打擊和壓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陣營步調一致。但是，所有這些東歐國家的新領導人同時又代表了一股反對和擺脫蘇聯控制的力量——這也是社會和民眾的呼聲，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主義陣營鬆散，構成對蘇聯安全的威脅。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就是蘇聯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和鬥爭，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變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為首的保守力量之間在政治路線上各有主張，而在保障國家安全方面卻是利益一致的。儘管赫魯曉夫和米高揚傾向於和平解決匈牙利危機，但面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安全受到的威脅，他們也無法承擔黨內分裂的風險。所有這些因素就造成了蘇聯處理波蘭和匈牙利危機時表現出來的猶豫不決、前後矛盾的狀況，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幫助。

恰如毛澤東所說，對於蘇共二十大，中國既支持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這個「蓋子」，又擔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會主義陣營的動盪甚至瓦解。由此出發，在處理波匈危機時，中共始終堅持了兩個原則：一方面是借批評斯大林的東風，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黨行獨立平等的原則，聯合東歐國家一起掃除蘇聯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作風——對波蘭危機的處理特別突出地表現了這個原則。在這裏，與其說是中國幫助蘇聯解決了波蘭問題，不如說是中國借波蘭危機迫使蘇聯承認以前的錯誤並發表了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平等宣言。[163]另一個方面是調和

蘇東關係，強調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團結和穩定，堅決排斥和打擊一切有可能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措施和傾向——對匈牙利危機的處理最明顯地表現出這個原則。實際上，中共不僅在匈牙利危機的最後關頭表示了強硬的態度，就是在處理波蘭問題時也有這種擔心。[164]不少國外學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甚麼中國不贊成蘇軍進入波蘭，卻要求赫魯曉夫改變原先的決定，出兵匈牙利？[165]其答案就在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波蘭反對的是蘇聯的大國主義，而匈牙利反對的是社會主義。毛澤東對前者舉雙手贊成，對後者則無論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過這裏需要補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對波蘭局勢的判斷失誤一樣，北京後來對匈牙利局勢發展的判斷也是錯誤的。納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處理危機時缺乏遠見，舉措失當，但從來就沒有背叛社會主義，至於後來脫離華沙條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蘇聯武裝干涉的做法逼出來的。

如果說到中國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響，那麼可以認為，放棄武裝干涉波蘭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決定，幾乎完全是蘇聯自主做出的，而在決定從布達佩斯撤軍和再次武裝佔領匈牙利的問題上，中國的意見起了主導作用。不過，筆者更注意的，不是在具體處理危機的過程中蘇聯是否聽從了中國的建議或主張，而是提出這樣一個結論：恰恰是中國所強調的兩個處理危機的原則在莫斯科的決策中得到了最終體現。與其說中國幫助蘇聯解決了危機，不如說毛澤東通過處理危機達到了自己的目標——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國主義，又保持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正是因為如此，波匈事件後中國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中的影響才會進一步擴大，聲望才會顯著提高。1957年1月周恩來在蘇聯、波蘭和匈牙利之間的穿梭外交，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1月16日中匈兩國政府代表團會談時，匈方為緩解緊張局勢希望由中國出面提出建議，並促成匈波、匈南雙邊會談。[166]波黨中央則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國，專門考察中國黨和群眾的關係，學習中共的「群眾路線」，甚至波蘭軍隊在其建設中也開始採用中國軍隊的經驗。[167]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贊同有些學者提出的這樣一種看法：在處理1956年秋天的危機中，赫魯曉夫最關鍵的行動之一，是將中國帶進了歐洲。[168]開始介入東歐事務，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聲望已經邁上了一個新台階，而莫斯科在共產黨世界的領導權則開始遇到了來自北京的挑戰。

[1]筆者對這一觀點的論證，詳見沈志華：〈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論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東歐中亞研究》，1996年第6期；〈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和結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有關戰後初期蘇聯與東歐各國關係以及共產黨情報局的俄國檔案文獻已大量譯成中文，可參考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七、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2]有關資料除可以參見俄國學者近年發表的極其豐富的研究成果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國不久前出版的專題檔案文獻集：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 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2,1949-1953,Докумешы,Москва:РОССНЭН,2002。

[3]Фурсенко А.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906.

[4]АВПРФ ф.0122, оп.40-1956г, п.336, д.10, л.31-32；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1995, с.222-224.

[5]3月15日，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來到華沙，並參加了波蘭統一工人黨六中全會。有材料說，奧哈布由於其在黨內的中間立場而倍受蘇共中央的青睞，儘管赫魯曉夫本人有自己的考慮。但重要的是，經過激烈爭論，波黨中央書記處決定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付印交與各級黨組織討論。參見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дамя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223。

[6]〔波〕揚·普塔辛斯基著，于欣等譯：《哥穆爾卡的改革探索》（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頁27—28　；〔英〕本·福凱斯著，張金鑑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北京：中央编譯出版社，1998），頁135—137。對於當時波蘭的社會狀況，新華社記者在內部曾有一篇非常詳細和生動的報道，參見新華社编：《內部參考》，1956年 6 月 1 日，頁 585—597。

[7]有關波蘭危機形成的原因，特別是黨內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勢力（纳托派）鬥爭的詳細情況，可參見Tony Kemp-Welch,"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A.Werblan,"Czy Chinczycy uratowali Gomulke? ",Polityka,26 X 1991r.。筆者請陳世澤先生翻譯了Werblan的波蘭文論文，才得以了解其內容，謹在此表示感謝。

[8]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гш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ш // Новая и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г., No.1, с.4-6； 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лешт-Москва: год 1956-й //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242-248； Вомо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28-30, 35-40, 85-87； Гибшшский Н. С. Хрущгв // Новаяи новейшяя история, 1999, No.2, с.12.

[9]APRF, f.39, op.1, d.31, 45-46。轉引自 Odd Arne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99-300.

[10]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11]АВПРФ, ф.07, оп.22, п.36, д.220, л.48-51；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32-33.

[12]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ы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No.1-3, с.89.

[13]劉少奇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49年7月27日；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с.78-79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12。

[14]АВПРФ, ф.07, оп.22а, п.13, д.198, л.1-2.

[15]中國駐華沙使館報告了波蘭人聽到中國出兵的消息後無比興奮的狀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083-03，頁2—3），作為中國首批駐蘇聯的外交官，榮植先生也曾向筆者講述過同樣的情況。

[16]參見裴堅章主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44—77。

[17]供中共高級幹部閱覽的《內部參考》在這一時期連續不斷地大量刊登對東歐的報道，就是一個證明。

[18]《內部參考》，1956年3月5日，頁17—19。另據新華社記者報道，在波蘭有人因不了解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的幾個論點而未能通過哲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考試。參見《內部參考》，1956年6月28日，頁719—720。

[19]《內部參考》，1956年6月1日，頁588。

[20]《內部參考》，1956年10月8日，頁820—822。

[21]《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頁1209—1210；1957年5月7日，頁26—77。筆者2004年4月17日採訪駱亦粟記錄，駱當時在中國駐波蘭使館工作。

[22]Janos Ra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No.43, Jul.-Sep. 1970, 122.

[23]АПРФ, ф.3, оп.64, д.484, л.64-75,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03-304.

[24]Imre Nagy, On Communism, 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1957）, 20-23.

[25]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在8月的一份講話稿中也提出了這個觀點。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633—635。中共正式提出這個看法，是在1956年10月30日與蘇共中央會談時，並於11月1日見報。

[26]參見筆者在《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一書中的相關論述。

[27]АПРФ, ф.3, оп.65, д.589, л.173-179.

[28]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09, л.108； оп.49, д.128, л.36,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и тд.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ы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Х Х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с.27-28.

[29]直到現在還有人堅持認為「中蘇論戰始發於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理論的提出」。參見高正禮：〈中蘇論戦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112。

[30]筆者對這個觀點的詳細論述參見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372—444。

[31]吳冷西：《十年論戦》，頁31。

[32]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10, д.9, л.124-130.

[33]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01。不久，《真理報》出版社確實在對該文進行準確校對後印成了小冊子，發行二十萬冊。參見1956年7月6日《人民日報》。

[34]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詳見Пылесосов А. Х Х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Свободая мысдь, 2000г., No.8, с.82；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61-62, 65； Аймермахер и т.д. Доклад, с.27-28.

[35]決議原文和有關的評論詳見РГАНИ,ф.3,оп.14,д.39,л.1,30-34, Аймермахер и т.д. Доклад, с.352-368,33,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 с.203. 1957年10月29日毛澤東對尤金說：「我們對於你們解決斯大林問題的做法有過不一致。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分歧變得很小了。」АПРФ,ф.3, оп.65, д.589. л.173-179.

[36]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141-02，頁119—120。

[37]榮植：〈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新年宴會〉，載外交部外交史编輯室编：《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二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頁19—20。

[38]ЦХСД, ф.5, оп.49, д.41, р.8862, л.16-17.

[39]赫魯曉夫著，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599—600。

[40]《內部參考》，1957年10月18日，頁3—13。

[41]《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7日，頁1283—1284。

[42]Andrzej Werblan, "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Dzis, nr.10/1996, c.123-124.該文是筆者請陳世澤譯自波蘭《今日》雜誌，謹在此表示感謝。

[43]據中國駐波使館的報告，實行鎮壓的是波蘭軍隊，波蘭外交部6月29日通報，在鎮壓中38人死亡，270人受傷。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141-01，頁22—25、31—33。7月17日波蘭首席檢察官Marian Rybicki透露，死亡的實際人數是53人，這包括了在醫院死亡的人數。1981年在波蘭出版的《波茲南危機》一書提供了一個新數字——73人死亡。參見Granville, "Reaction to Events of 1956",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8,No.2,2003,264-265。

[44]Правда, 4 Июля 1956г.新華社發回的報道也稱為「波茲南反革命暴亂」，並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帝國主義代理人，武裝間諜和反動組織」的陰謀，只是作為次要原因提到「波蘭黨和政府有較嚴重的困難和缺點」。參見《內部參考》，1956年7月28日，頁591—604。

[45]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225-226；普塔辛斯基：《哥穆爾卡的改革探索》，頁29。

[46]這與奧哈布轉向支持改革有直接關係，與匈牙利的情況完全不同，他是自願讓位給哥穆爾卡的。奧哈布後來接受採訪時說：「我根本沒有為保持自己的地位而焦慮。」參見Teresa Toranska,Them:Stalin's Polish Puppet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7）,78.轉引自Johanna 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 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16, No.2, Spring 2002,534-535.

[47]《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七卷，頁22—24。

[48]羅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華沙，後加入蘇聯國籍。衛國戰爭中成為蘇聯的著名將領，因解放波蘭有功獲波蘭元帥銜。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蘭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回到波蘭後仍然保留着蘇聯國籍，後來又兼任華沙條約部隊副總司令。因此在波蘭人眼中，羅科索夫斯基是蘇聯對波蘭實行統治的象徵。詳見 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63-70；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 No.1, с.109-110.

[49]科馬爾是哥穆爾卡的親密戰友，1952年被捕，1956年4月恢復政治名譽，8月出任內衛部隊總司令。

[50]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頁142—143；Оредг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шика, с.227； Gluchowski,Kbrushchev, 38-39.

[51]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228-229；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 548-549； Jeno Gyorkei and Miklos Horvath,"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Gyorkei and Horvath cd., Soviet Military,9；《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七卷，頁26—27、 55—82。不過，哥穆爾卡說他當時就表示同意赫魯曉夫來華沙，恐不是實情。因為蘇聯代表團的飛機是在華沙上空盤旋了兩個小時後獲准降落的，哥穆爾卡等人這時才趕到機場「歡迎」。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62-03，頁26—28。此外，吳冷西的回憶說，蘇聯調動軍隊的命令是17日下達的，參見《十年論戦》，頁34—40，這顯然也是錯誤的。

[52]TsAMORF, f.32, op.701/291, d.15,131,238.轉引自 A. 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Gyorkei and Horvath ed.,Soviet Military, 132. Kirov 引用這條史料是要說明匈牙利的緊張局勢，但在筆者看來，這是要對付波蘭的，因為當時匈牙利的局勢尚不足以讓莫斯科作出這樣的決定。

[53]王炳南：〈1956年波蘭「十月事件」的回憶〉，頁38；《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2日，頁1075—1076。

[54]ЦХСД, ф.5, оп.49, д.5, л.102-103,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И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232-233.

[55]以上關於蘇波會談的描述，除特別註明外，均根據波蘭的檔案文獻。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七卷，頁28—40、55—63。赫魯曉夫的回憶與此基本吻合。參見赫魯曉夫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323—326。還可參見：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4-51； 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549；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я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шка, с.230-232.

[56]《內部參考》，1957年10月18日，頁3—13；1956年10月23日，頁1135—1136。

[57]筆者2004年4月17日對駱亦粟進行訪談時得知，23日劉少奇、鄧小平到莫斯科後，中國駐波蘭使館參贊余湛來匯報波蘭情況（駱隨同余到莫斯科匯報），其中說到：19日晚華沙街頭出現了「我們有毛澤東的支持」的大標語。鄧小平說，這個提法不好。以筆者的理解，這個標語不過是表明了當時波蘭人對中國的期望和信任。

[58]駱亦粟：〈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頁40。此事目前尚未得到文獻證明。

[59]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採用了這個說法（頁601—602）。

[60]吳冷西：《十年論戰》，頁34—44；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10—13；駱亦粟：〈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駱還說，毛澤東把中共的答覆也告訴了波蘭大使基里洛克。在訪談時駱告訴筆者，他當時在華沙，對於國內發生的情況他是聽說的。

[61]甚至一些很有影響的論著也引用了這種說法，如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金沖及主

编：《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04；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146-147.

[62]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62-03，頁15—17。第二天蘇聯大使解釋說，所謂蘇軍調動，是波蘭人造謠，其實「只是幾個士兵在各處散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141-02，頁77—78。

[63]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關於劉的這個講話，正式發表的部分內容見《黨的文獻》，1988年第5期；中央檔案館编：《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上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

[64]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61-04，頁20—21。

[65]《內部參考》，1956年10月12日，頁941—963。

[66]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441-01，頁31—33；109-01441-02，頁76、77—78。筆者採訪駱亦粟記錄。

[67]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61-03，頁33—34；《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3日，頁11—6。

[68]ЦХСД, ф.3,оп.12,д.1005,л.49，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41—42。

[69]ЦХСД, ф.3, оп.11, д.1006, л.1-3；оп.14, д.67, л.129；оп.14, д.67, л.1,4,5.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43—48。

[70]АВПРФ ф.0122, оп.40,1956г,п.336,д.10,л.108,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я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шка, с.230-232.

[71]劉少奇也回顧說：中共代表團23日晚到達莫斯科時，蘇聯的態度已經轉變，形勢已經緩和了。參見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這裏尚待解決的只是羅科索夫斯基的去留問題。但Gluchowski認為，直到23日蘇聯似乎仍然沒有放棄武裝干涉，理由是據波蘭材料，那時蘇軍還在向華沙前進。參見"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65.這個說法與俄國檔案關於21—23日情況的記載相矛盾，而「波蘭材料」究竟是甚麼，是否可靠，都需要進一步拿出證據。

[72]吳冷西：《十年論戰》，頁44—45。

[73]《毛澤東傳（1949—1976）》，頁602—603；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2。這個講話內容可以證明，吳回憶的毛澤東20日與尤金的談話，在內容上也是值得懷疑的。

[74]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62-02，頁8、10。

[75]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c.128-130.

[76]ЦХСД, ф.3, оп.l2, д.1006, л.5, 5об，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49。

[77]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3；《劉少奇傳》，頁804；《毛澤東傳（1949—1976）》，頁603。

[78]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2，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七卷，頁52—53。

[79]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3—14。另參見駱亦粟：〈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頁42—43。

[80]轉引自《劉少奇傳》，頁805。

[81]駱亦粟：〈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頁41—42。

[82]吳冷西：《十年論戰》，頁45—46、56—58。

[83]如見仲潮浩：〈毛澤東三次見哥穆爾卡〉，《中共黨史資料》，總第83期，頁162—163。

[84]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5, 5об.關於這個問題，諾沃提尼的另一個記錄是：「哥穆爾卡同志告訴蘇共中央他將接受邀請並在11月11日後抵達」。見CWIHP Bulletin Issue 5,53.

[85]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5；駱亦粟：〈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頁42—43。駱在回答筆者的提問時肯定地講，那時波蘭代表團沒有來莫斯科，如果有這方面的會談，一定會要他做翻譯。另據波蘭報載，哥穆爾卡出席了10月27日開幕的波軍高級

指揮員和政治軍官全國會議。

[86]ЦХСД, ф.3, оп.12,д.1005,д.15-18об,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79-484.參見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頁28。

[87]會談情況詳見劉祖熙、劉邦義：《波蘭戰後的三次危機〉，頁100—102。

[88]就在9月中共八大期間，王炳南還對奧哈布說，羅科索夫斯基過去兩次來到中國，「在中國人民中威信很高」，並表示歡迎他在任何時候訪華。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141-01，頁58—61。

[89]ЦХСД,ф.3, оп.12, д.1005, л.53，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54；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5；骆亦粟：〈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頁42—43。

[90]據駱回憶，這個情況是後來劉少奇自己說的（筆者採訪駱亦粟記錄）。劉少奇的回顧也證實了這一情況。參見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11月2日赫魯曉夫與鐵托會談時，也提到他曾勸說劉少奇去華沙，但中國人一直沒有得到簽證，毛澤東為此很生氣。參見韋利科·米丘諾維奇著，達洲等譯：《莫斯科的歲月》（北京：三聯書店，1980），頁179。

[91]基里洛克致哥穆爾卡電，1956年10月27日，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c.124-126.

[92]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81-82.

[93]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5—16；駱亦粟：〈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頁43。

[94]八届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

[95]АПРФ, ф.3, оп.64, д.484, л.25，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317；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6-14,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57-463.公開發表的宣言文本見1956年10月31日的《真理報》和《消息報》，以及1956年11月1日《人民日報》。

[96]有許多歷史文獻反映了莫斯科在挑選拉科西繼承人時的考慮及決策過程，詳見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139,152-157,172,173, 176-182.

[97]《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6日、25日。

[98]〔匈〕山多爾·科帕奇著，龔新康譯：《匈牙利悲劇》（北京：群眾出版社，1982），頁119；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194；《內部參考》，1956年11月28日，頁664；筆者2004年6月8日採訪夏道生記錄。夏當時任中國駐匈牙利使館隨員。

[99]詳見《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7日。

[100]АПРФ, ф.3, оп.64, д.484, л.64-75,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00-306.

[101]《內部參考》，1956年11月28日，頁673； Цутшш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257。

[102]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16-318； 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 134-135.

[103]與以往宣傳留給人們的印象不同，裴多菲俱樂部不是由學生組成的機構，而只是一些激進知識分子鬆散地組織起來的辯論團體。在10月23日危機爆發以後，俱樂部的工作實際上已經完全停止了。關於裴多菲俱樂部的專題研究，參見Andrds B.Hegedus, "The Petofi Circle: The Forum of Reform in 1956",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 108-133.

[104]俄國檔案證實，蘇聯大使館有兩位工作人員（其中一位是三秘克留奇科夫）是遊行的目擊者，他們認為，白天的示威遊行組織得很好，並且是可以控制的。參見Мусатое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10.

[105]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21-323,349-356；Мусатое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10；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258-260； Gyorkei and Horvath,"Additional Data", Gyorkei and Horvath ed.,Soviet Military,15-19,26-27；筆者對夏道生的採訪。

[106]TsAMORF,f.32, op.701/291,d.15,131,238.轉引自 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132.

[107]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00-309,315-316； Y. I.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 Memoirs of an Eyewitness",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 221； Gyorkei and Horvath, "Additional Data", Gyorkei and Horvith ed., Soviet Military, 7-8.

[108]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258-260.

[109]АВПРФ ф.059а, оп.4, п.6, д.5, л.88-96,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37-343； Gyorkei and Horvith, "Additional Data",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y 25-26.

[110]Miklos Szucs, I was Colonel Miklos Szucs in 1956 with the General Staff（Budapest: Szabad Tér Publishing House, 1989）, 60-62.轉引自 Gyorkei and Horvath ed.,12-14.

[111]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 222-223.

[112]Gyorkei and Horvath,"Additional Data",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 10-11.

[113]根據布拉格的檔案記載，赫魯曉夫本人在10月24日向東歐國家領導人介紹說，23日（傍晚）格羅曾與他通電話，說因匈牙利局勢惡化不能去莫斯科參加關於波蘭問題的會議，但沒有提出軍事援助的請求。因此，當過後不久朱可夫報告格羅曾向蘇聯駐匈使館武官試探給予援助的可能性時，被拒絕了。參見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CWIHP Bulletin, Issue 5,1995,54；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261.

[114]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4-4об,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56-359.

[115]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 No.l, с.48-49, 79-80.

[116]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著，陳之驪等譯:《赫格居斯回憶錄——一個思想陰影下的生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頁286—298；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49-352； 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 535-538.

[117]據赫格居斯回憶，在討論邀請俄國軍隊的問題時，會場很亂，納吉疲憊地坐在沙發裏，沒有明確表態。決定通過後，格羅和安德羅波夫認為納吉已經同意了，並千方百計要他在後來起草的邀請信上簽字。但納吉始終拖延沒有簽字，直到10月26日，在莫斯科的催逼下，由已經不再擔任政府首腦的赫格居斯勉強簽了字。參見《赫格居斯回憶錄》，頁286—298。

[118]АПРФ, ф.3,оп.64,д.484,л.85-87, 88-89，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279—281；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368-369.

[119]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5, л.52，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52—53；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3—14。劉少奇的報告證實了這一情況。參見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

[120]對來到莫斯科的東德、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赫魯曉夫甚至連解釋也沒有，在10月24日晚上，赫魯曉夫只是向這些東歐國家代表通報了處理波蘭和匈牙利問題的經過。關於這次會議，目前沒有發現俄國檔案，捷克斯洛伐克檔案中的記載全文見CWIHP Bulletin, Issue5,199,53—55.

[121]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

[122]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41-01，頁3—4、5—6、8、9、14。

[123]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41-01，頁7、16，10-11。此後因形勢惡化，通訊再次中斷，中國使館與外交部的聯絡一度只得通過匈牙利外交部和駐華使館進行（109-01041-01，頁23，27）。

[124]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載裴堅章主编：《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二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頁65；筆者對夏道生的採訪。另參見Janos Radvany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43, Jul.-Sep. 1970, 122-123.

[125]據《毛澤東傳》記載：劉少奇23日晚上與蘇共領導人會談時聽到了匈牙利發生暴亂的消息，即打電話報告毛澤東。從24至31日，毛澤東連續召開高層會議討論波匈事件，並與劉少奇保持直接的電話聯繫。但沒有透露具體內容。《毛澤東傳（1949—1976）》，頁604。

[126]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41-01，頁24、36。

[127]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5, л.54-61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39-441.據赫格居斯回憶，納吉於28日11時從蘇聯使館回來後，告訴格羅和赫格居斯，蘇聯人同意改組政府。參見《赫格居斯回憶錄》，頁310。中國使館報告，28日晚蘇聯開始撤離布達佩斯。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41-01，頁54。

[128]Gyorkei and Horvath,"Additional Data ,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 70-71.

[129]CWIHP Bulletin,Issue 10, 1998,172-173； АПРФ, ф.3, оп.65, д.610, л.100-120.

[130]查爾斯·波倫著，劉裘、金胡譯：《歷史的見證（1929—196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頁518。

[131]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 277.

[132]АПРФ, ф.3, оп.64, д.84,л.151-161，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308—311、447-449。

[133]АПРФ, ф.059а, оп.4, оп.6,д.5, л.13-14,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50-451.

[134]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5—16；《毛澤東傳（1949—1976）》，頁604。

[135]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ш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359-360.

[136]АПРФ, ф.059а, оп.64,д.484,л.122-124，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二十七卷，頁312—314。

[137]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70-471.

[138]見《人民日報》，1956年11月1日。關於蘇聯從布達佩斯撤軍的具體情況， 參見Gyorkei and Horvath,"Additional Data"； 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Gyorkei Horvath Soviet Military,71, 244-245。其中說，布達佩斯廣播電台宣布蘇聯政府同意蘇軍撤出布達佩斯是在17時。

[139]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41-01，頁56。

[140]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6-14,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57-463.

[141]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6。

[142]在中蘇兩黨論戰時，中共中央指責「蘇共領導在匈牙利反革命勢力佔據了布達佩斯的緊急關頭，曾經一度準備採取投降主義的政策、企圖把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拋棄给反革命」。參見人民出版社编：《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64。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中國研究者堅持這種說法。顯然，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143]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359-360；趙永穆等譯：《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頁968—971。

[144]中國使館29日和30日報告局勢惡化的電報，外交部直到11月1日才收到。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41-01，頁51，56、57—58。

[145]吳冷西：《十年論戰》，頁51—52；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頁16—17；《毛澤東傳（1949——1976）》，頁604—605；《劉少奇傳》，頁805—806。吳冷西所說的時間與別人不同：劉少奇緊急約見赫魯曉夫不是在30日夜晚，而是在31日。於是，中共代表團離開的時間也不是31日，而是11月1日。參見《十年論戦》，頁51—53；《憶毛主席》，頁14—15，筆者以為，在這裏又是吳的記憶錯誤。

[146]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6-14,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57-463.

[147]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15-18об,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79-484.

[148]見1956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人民日報》。

[149]АПРФ, ф.095а, оп,4, п.6, д.5, л.20-22, Волков и п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522-523.

[150]實際上，從25日晚卡達爾取代格羅擔任黨的第一書記後，直到其突然失蹤，包括請求蘇聯撤軍在內的所有匈牙利政府的決定，都是纳吉與卡達爾共同作出的，他們之間的區別只在於卡達爾到莫斯科後就改變了態度，而纳吉則始終堅持反對蘇聯出兵的立場。參見Huszar Tibor,Kadar Janos Politikai Eletrajza （1912-1956）（Budapest: Szabad Tér Kiado-Kossuth Kiado, 2003）, 301-302.朱丹丹為筆者翻譯了這部很有影響的匈牙利著作——《卡達爾的政治生涯》的片段，謹在此表示感謝。

[151]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41-01，頁90—91、97—101。

[152]Gyorkei and Horvath,"Additional Data", Gyorkei and Horvath ed.,Soviet Military,31-32；時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國的政策〉、《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頁97—111、1122。

[153]關於這兩個危機之間關係的研究見：Terry Cox,"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1-13；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CWIHP Working Paper No.16； Пум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271-273..

[154]АПРФ, ф.3, оп.23, д.200, л.60-62,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76-477.

[155]ЦХСД, ф.3, оп.64, д.485, л.2-3.

[156]Mark Kramer 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370-371；胡舶：《冷戰陰影下的匈牙利事件》，頁118—120。

[157]除哥穆爾卡有些勉強外，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支持蘇聯出兵的決策。詳見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CWIHP Working Paper No.16； Пум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510。關於赫魯曉夫與鐵托在布里俄尼島會談的詳情，參見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172—182；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235.

[158]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30,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512-513.

[159]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19-22,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494-497.

[160]筆者2004年4月17日採訪朱安康記錄，朱於1954至1957年在布達佩斯羅蘭大學文學院留學，1985至1989年任中國駐匈牙利大使。

[161]對蘇聯第一次出兵過程的詳細描述見：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244-266.

[162]詳見本書第二章。

[163]順便說，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中能否真正實現平等原則，是另一個問題。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參見《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一書的結論部分。

[164]事情過去一年以後，劉少奇在與尤金大使會談時說：當時的情況是嚴重的，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如果波蘭同志不能應付這種情況的話，復辟是不可避免的。參見АВПРФ, ф.0100, оп.50, д.5, оп.423, л.48,轉引自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178.

[165]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Baltimore: Penguin Books Inc, 1963）, 54.

[166]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498-499.

[167]筆者對駱亦粟的採訪；謝皮洛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7年1月4日，載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一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戦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頁2810—2813。

[168]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53；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161-162.

二 中共高層對波匈事件的思考和討論

危機過去了，華沙和布達佩斯也逐漸平靜下來。然而，波匈事件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對於社會主義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影響卻遠未消失。1948年蘇南衝突爆發時，社會主義陣營也出現了一次「大地震」，其結果是東歐各國共產黨被迫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1]對於鐵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權力和威望發動一次政治圍殲戰，通過召開共產黨的國際組織會議解決問題。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產黨情報局都已不復存在，莫斯科面對的也不是幾個共產黨領導人，而是成千上萬走上街頭的民眾。如果不願讓步，那麼通過武力（布達佩斯）和武力威脅（華沙）應對危機，似乎就成為蘇聯唯一的選擇。中共領導人並非在原則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對哥穆爾卡的支持僅僅是因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會主義，而當毛澤東認定納吉已經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時，便堅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鎮壓的主張。然而，痛定思痛，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中共和中國領導人不能不思考：導致波匈事件發生的原因和條件在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類似的事件會不會因「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已經倒下而在中國繼續發生？如果在中國真的出現群眾鬧事或社會動盪，執政黨該如何應對？蘇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問題出來後，中共的主要精力在於統一黨內的思想認識，並在此基礎上調整執政方針和路線，通過〈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討論和召開八大，這些目的已經達到。現在突然又冒出一個波匈事件，而且其影響和震動遠遠大於前者。那麼，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經驗、教訓？

1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不同聲音

劉少奇及其率領的代表團從莫斯科回國後，11月10日，中共召開了八屆二中全會。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49人，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市委和軍隊負責人列席147人，共296人，分為9組。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開了6天。[2]

會議首先由劉少奇作關於時局問題的報告。[3]劉的報告講了六個問題：中蘇關於波匈事件協商處理的經過；發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會主義陣營是否鞏固的問題；朝鮮問題；越南問題；中共的方針。

劉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點是「廣大群眾的反蘇運動，是社會主義內部的問題」，接着明確了這兩個事件的不同性質：「波蘭事

件非馬克思主義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領導權。是全國各階層廣大人民的運動，但反革命分子有一個時期在運動中佔優勢」。在詳細介紹了波匈事件的處理經過後，劉少奇對這次「共產主義內部最嚴重的事件」分析了其發生的三個遠因和三個近因。遠因之一，波蘭和匈牙利都是蘇聯解放的，兩國黨都沒有採取群眾路線，在對地主、資產階級鬥爭中，沒有把工人和農民階級組織起來，也沒有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知識分子沒有思想改造；肅反中犯了錯誤，整了好人如卡達爾、哥穆爾卡，真正反革命卻沒肅清；對資產階級進行了沒收，把土地送給農民，但工農缺乏階級覺悟。遠因之二，重工業投資過多，不重視輕工業、農業，人民生活沒有改善，領導人有特權，人民生活苦，群眾不滿，走上馬路。遠因之三，這些國家搞教條主義，照搬蘇聯不靈，便失去信心；蘇聯又干涉其內部事務，有大國沙文主義錯誤，損害了這些國家的民族尊嚴。近因之一，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在這些國家黨員中引起混亂；斯大林垮了，這些國家領導人跟着垮；二十大後控制不住了，煽起反蘇、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波匈事件發生初期，蘇聯處置不恰當，特別是波蘭事件，與情報局壓南斯拉夫差不多。近因之三，南斯拉夫進行煽動。[4]

關於如何以波匈事件為前車之鑑，以免重蹈覆轍，劉少奇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防止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各級領導人員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形成新的「贵族階層」。劉少奇指出：鑑於若干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國家的領導人員有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階層，特殊的「統治階層」。「在帝國主義國家有這種可能，那麼在工人階級執政的國家裏面，就是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面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層？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裏面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裏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們注意了的話，如果我們採取一些辦法的話也不一定產生，是可以避免的。」

關於防止新貴階層出現的措施，劉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須對權力有所限制，對人民實行民主：「國家領導人員的權力應該有一定的限制，甚麼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甚麼事情不准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只能對反革命階級、反動勢力和反革命分子實行專政，對人民群眾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在人民內部只能實行民主。當然，這是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講的大民主、無領導的民主。對於這一點，恐怕有些幹部在觀念上不那麼清楚，一說我們要控制局面，就要實行專政，對群眾也實行專政。對人民群眾不能採取專政的辦法，只能實行民主的、說服的、教育的辦法。」其次，「我們國家領導人員

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這包括縮小工資差別，取消特權——如領導幹部的轎車上街可以不聽交通指揮，領導機關實行食品特供，以及某些警衛措施等。劉少奇說：「這些事情我們不注意，不知不覺地享受了這些特權。人民沒有提出來還不要緊……一鬧起事情來，一上了馬路，這個問題就大了，因此，這些特權原則上應該取消。」接着，還談到了取消幹部終身制的問題，劉少奇認為在這方面可以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他列舉了美國政界要人華盛頓、艾森豪威爾、馬歇爾的例子，又借用毛澤東的話說：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那麼一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我們比那個時候不是更進步了，而是更退步了。最後，劉少奇講到了經濟發展方針的問題，強調說：「我們工業建設的速度要放在一種穩妥可靠的基礎上。甚麼叫穩妥可靠呢？就是群眾不至於上街遊行，不至於鬧事，還比較高興，能保持群眾的那種熱情和積極性。」他贊同陳雲的意見，也主張經濟建設速度寧可「慢一點」，「穩當一點」。[5]

劉少奇的傾向是明顯的，即在共產黨內部找原因，所談的預防措施，重點也是改進執政黨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報告把問題的落腳點鎖定在經濟方針，把波匈事件的教訓與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積累和消費的關係聯繫起來。這個發言具有引導作用。

劉少奇報告之後，周恩來接着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周也是先談波匈事件的教訓，並聯繫經濟建設指出兩點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點，在中國，對周圍兄弟國家也有個別大國主義的做法，對兄弟民族也還有大漢族主義傾向，也產生過領導脫離群眾、不關心群眾利益的事情。周恩來特別指出，中國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着」。第二點，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

講到經濟方針，周恩來特別強調關注人民的當前利益，認為波匈事件的一個教訓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時忽視了人民生活，造成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並提出：「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為了保衛人民的福利和社會主義成果，必須依靠人民。如果不關心人民當前的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所以，這一條經驗也值得我們在建設中經常想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值得我們引為教訓。」

接着談到建設速度問題。周恩來說，中共八大提出建設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設想用三個五年計劃或再多一點時間是恰當的，現在看來，時間可能還要長一點。從放緩工業體系建立速度的設想出發，周恩來又提出，八大建議的經濟指標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都還「只是個建議」，要大家考慮是不是可以修改。周認為：「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不僅八大建議的計劃數字可以修改，〈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可以修改。周恩來由此聯想到「一五計劃」，他的評價是「基本上正確，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並特別說明這是「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討論」的看法。[6]

周恩來還專門講了1956年的冒進問題。他說，從1955年年底反右傾保守開始，經濟領域就颳起冒進之風，1956年勢頭更猛。雖然國務院主管經濟的領導人一再剎車，效果卻不理想。周列舉了一系列數據，說明1956年的計劃「總的說是冒進了一些，就是數目打大了」。財政支出308億元，稅收只有295億元，動用上年結餘10億元；加上19億元農貸資金收不回來，整個財政赤字達20—30億元。又多發貨幣10億元，物資庫存多銷20億元。主要原因在於基本建設投資增長過快，與1955年相比，預算增加了60%—70%。於是，「各方面要求是千軍萬馬，奔騰而來，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接着談到1957年的計劃，周恩來宣布了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的方針：保證重點，適當退卻或適當收縮。周特別提醒說：「總的方面是要收縮下來，不然站不穩，那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等。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幾十萬或幾千萬人站在街上遊行等等。」因此，國務院提出了一個生產控制數字，適當收縮，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設投資，還要減少國防和行政支出，凍結編制、預算以及國防和地方的結餘，注意平衡物資，安排就業，再大力開展一次增產節約運動。[7]

第三個報告的是國務院副總理陳雲。11月11日晚上，陳雲在全會上作關於糧食和主要副食品（豬肉和食油）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全會專門提出糧食、豬肉、食油這樣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是因為當時這些基本生活品供應出現了緊張局面，並引起社會不安。首先是糧食緊張。陳雲報告說，明年糧食將有五十億斤赤字，「明年春天會出亂子，不如現在收縮」。[8]副食品裏豬肉緊張最為突出。1954年6月以後生豬生產下降的勢頭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質量也在下降。陳雲提出，增加生豬生產的方針就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同時採取措施解決飼料問題和適當提高收購價格。緩解其他副食品供應緊張的辦法是：減少豬肉和油脂的出口；增加雞、鴨、鵝、兔子、魚等家禽和魚類的養殖；調整副食品供應季節；去掉副食品供應機構的中間環節；允許分散經營。陳雲還集

中講了他對市場問題的看法，他認為農村自由市場的開放，刺激了農民的生產活動，活躍了城鄉的物資交流，推動了國營和合作社商業機構的改革。儘管開發市場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解決的辦法不是收緊，而是在明確規定的前提下，進一步放開價格和管理。[9]

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的報告，分別從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各個方面觸及到現行體制和政策問題。這種觸及當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是執政以來中共領導人還沒有如此重視制度的改進和經濟政策的調整。波匈事件的前車之鑑和國內政治經濟的某些緊張現實，使他們不能不憂慮在中國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會上，表示出這種憂慮的還不止劉、周、陳。在分組討論中，各地方和部門負責人都反映了不少問題——住房短缺、電力不足、鋼材和生活日用品供應緊張等，還提出了一些克服官僚化和特殊化現象的建議——機關層次和人員應該減少，財務、警衛、用車、看病制度必須改革，幹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對局勢感到擔心，朱德說，「現在看起來問題很大」，東歐國家的經驗值得重視，搞重工業要注意和輕工業的關係。董必武指出，冒進思想不解決，二五計劃還會發生問題。西北組在討論時反映，市場供應矛盾，蘭州衣食供應都緊，如此下去，難免發生波茲南事件。[10]

仔細考察八屆二中全會的發言記錄可以發現，會上也有不同的聲音，這主要體現在毛澤東的插話、講話和總結報告中。

在劉少奇作局勢報告時，毛澤東的插話已經表露出某種不同看法。對於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質的分析，中共中央內部似乎並沒有分歧。劉少奇談到，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之一是真正的反革命沒有肅清；波蘭、匈牙利的學生歡迎西方，不喜歡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沒有思想改造；卡達爾和明尼赫的「許多觀點是社會民主黨的」等等。對於這些看法，毛澤東都是赞同的。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如何處理中共面臨的問題和矛盾時，便顯露出不同的傾向。比如，到少奇談到越南對土改時殺人過多感到「憂慮」，毛澤東插話：「我們殺七十萬人，六億人，千分之一點三。東歐就沒有大張旗鼓殺人。革命嘛！」劉少奇談到積累要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經濟建設要穩當一點，右傾比「左」傾好一些。毛澤東插話：那要看甚麼右。[11]

特別是周恩來、陳雲的報告把吸取東歐國家的教訓主要歸結為實行穩妥的建設方針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時，毛澤東感到有必要站出來扭轉會議的方向了。全會期間，毛澤東召集了一次小組長會議，並發表講話。與周恩來對1956年「大冒了一下」的估計不同，毛肯定「1956年國家的建設事業是有成績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農業、工

業和輕工業生產都有所增長」。毛認為成績是主流，失誤是支流：「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和其他事業開支大部分是正確的，一部分不正確」。此外，對會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毛講話的重心同劉、周、陳的報告也有不同。他說：「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出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的反覆的解釋。」還說：「1956年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業有所增加，人民是高興的。」至於1957年的經濟計劃，毛贊同在某些方面做適當壓縮，但是仍然重申「雖然如此，我們的建設事業還是前進的」。關於壓縮計劃，毛要求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亂子，至於物資不足，則應首先支持必要的，同時注意平衡。他還提出要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發動一個增產節約運動，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的作風。最後，毛澤東還提到了應注意階級矛盾的問題和對民主的理解，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應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教育。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採用大民主，而是採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12]

全會最後一天，11月15日，毛澤東作總結報告。[13]他在這裏更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應該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看法。首先是關於經濟方針，他對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最不滿意的地方就在這裏。開場白講了一段《莊子》的辯證法後，毛澤東指出：「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平衡，矛盾，鬥爭，發展，是絕對的，而平衡，靜止，是相對的。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我們應當告訴幹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14]接下來毛澤東便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針對周關於一五計劃的估計，毛說：「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甚麼大錯，有甚麼根本性質的錯誤」，「至於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為我們缺少經驗」。特別是對周恩來、劉少奇有關冒進的提法，毛告誡道：「要保護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有些人曾經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那個時候有個『促退委員會』。」毛澤東因此建議，把國務院預算報告中「穩妥可靠」的講法改為「充分可靠」。

對糧食、豬肉供應這類民眾生活問題，毛澤東也感到問題很大，要求領導幹部好好把糧食問題研究一下。不過，與劉、周、陳主張盡量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積極態度不同，毛澤東再次強調：「群眾要求辦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群眾解釋清楚，也是可以解釋清楚的。」講了幾

句要抓糧食和副業生產的話後，毛澤東就強調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還指責報紙一年來「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又突然提到鎮壓反革命問題，說：「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台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為了解放生產力，「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這種莫名其妙轉化話題的做法說明，即使談經濟建設，毛也要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問題。

講到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毛澤東重點提出了如下判斷：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已經丟掉，列寧這把「刀子」也丟掉相當多了。就在半個多月前毛澤東還支持波蘭人，現在則認為：哥穆爾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他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因此，毛澤東把波匈事件的教訓歸結為：「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

劉少奇的報告和毛澤東在小組長會上的發言，都提到了「大民主」。這時，毛澤東又用很大篇幅專門談「大民主」和「小民主」問題。波匈事件發生後，基層幹部和知識界人士議論紛紛，很多人認為，蘇聯、東歐的問題，根本原因在於革命勝利後沒有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中國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來。11月初，毛澤東委託他的秘魯兼英文翻譯林克到新華社，找國際部主任王飛、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談蘇共二十大以後的情況和問題，他們提出了議會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分權削權、選舉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問題。李慎之還具體提出，應制定一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在小學和中學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建立憲法法院等，自以為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5]結果呢？毛澤東在講話中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16]

在毛澤東看來，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種制度，無論「大民主」還是「小民主」，都不過是階級鬥爭和政治統治的一種手段，而所謂「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鬥蔣介石、鬥地主階級、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營工商業改造也是大民主。不過，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情況

下，也可以「借用」這種講法，實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毛澤東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贊成大民主，甚至指出，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還要加上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遊行。他告誡黨內：「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應當革掉。」

與劉少奇單純批評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澤東在這裏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一種反對官僚主義的特殊手段，準備在必要時加以利用。不過，毛當時並沒有考慮採用這種方式解決執政黨的官僚化問題，而寧願採取整風這種「小民主」的方式。他強調，「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這裏所謂「武力」，就是指公開衝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後，毛澤東終於不得不用這種方式開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當時，毛澤東以為通過一般的整風就可以克服官僚主義，解決執政黨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

八屆二中全會是波匈事件後中共高層第一次全面討論如何應對東歐國家風波在中國的反響。從以上的發言可以看出，對於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質的分析，黨內沒有分歧，轉到中國問題後，不同的聲音便出來了。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認為主要是解決執政黨本身的問題，毛澤東則強調同時也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必須防止執政黨發生異化這一點上，大家是一致的，不過劉、周集中談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強調加緊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現在如何調整經濟建設方針的問題上。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反覆提出應減緩發展速度，壓縮基建和積累指標，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現東歐式的社會動盪。毛澤東對此很不以為然，儘管沒有針鋒相對地提出不同意見，但他的不滿情緒已經溢於言表。

2〈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波匈事件的餘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針對《真理報》刊登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文章，鐵托發表了一篇演說，在社會主義陣營又掀起一陣風浪。演說地點在普拉的人民軍俱樂部，故稱「普拉演說」。16日，

南斯拉夫《戰鬥報》刊登了演說全文。與蘇共、中共的判斷不同，鐵托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匈牙利發生的危機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並批評匈牙利領導人請外國軍隊來教訓自己的人民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同時認為蘇聯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雖然可能有必要，但卻是「錯誤的」。演說還指責關於南斯拉夫應對匈牙利鬧事和事態擴大承擔責任的說法，鐵托反駁說，把責任推到南斯拉夫身上的觀點來自「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指實他們「把這種斯大林主義的傾向強加在他們人民頭上，甚至別國人民的頭上」。由此，鐵托提出了「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問題。在鐵托看來，儘管蘇共二十大譴責了斯大林，但其認識卻有相當的局限性，實質問題不在斯大林個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這裏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根源就在這裏，這就是需要不斷地堅持地根除的東西，而這也是最難以做到的事。」[17]

「普拉演說」不僅批評了蘇聯及相關國家處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觸及到社會主義的制度問題，因此立刻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強烈反響。蘇聯塔斯社19日發表評述文章，認為鐵托的「普拉演說」同南共聯盟領導機關此前不久的相關說法「格格不入」，是「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勞動人民國際團結的原則相違背的」。文章指責鐵托演說「流露出一種干涉其他共產黨的事務的傾向」，他把共產黨分成「斯大林主義者」和「非斯大林主義者」的黨，在客觀上「只會危害共產主義運動」。蘇共還特別批評了鐵托關於個人崇拜產生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觀點，並將這一觀點與西方「反動宣傳」相提並論。[18]接着，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新德意志報》、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保加利亞《工人事業報》、波蘭《自由論壇》、蒙古《真理報》以及意共、法共的領導人相繼發表文章或報告，譴責鐵托及南共聯盟。[19]

中共領導人同樣特別關注此事。鐵托的演說發表時，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剛剛結束。據吳冷西回憶，從11月25日開始，毛澤東差不多每天都召集政治局常委會，並通知有關部門十餘名負責人參加25、27、28、29日四天的會議，着重議論鐵托的演說。大家認為，鐵托提出反斯大林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誣衊，這是西方分裂共產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的惡毒做法。毛澤東說，所謂斯大林主義，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觀點。所謂斯大林分子，顧名思義，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毛重申了他關於斯大林「三七開」的評價，說斯大林是好人犯錯誤，所以，鐵托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毛提出，我們要徹底把他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現在看來斯大林主義還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為它基本上是對

的，這把刀子不能丟掉。這是我們的資本，跟列寧主義一樣。會議議論到，對待斯大林和犯錯誤的同志，同對待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區別，是一個分清敵我的根本問題。與會者認為，鐵托要把犯錯誤的人趕下台，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是完全錯誤的。[20]

中共領導人關於「普拉演說」的看法，同蘇共中央是基本一致的。與其他共產黨一樣，中共高層也準備發表文章，表明態度。據吳冷西回憶，這件事最早是毛澤東提出來的。11月29日毛講到要寫一篇文章，而且設想文章的題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意思是要團結一切社會主義力量。關於寫作的目的和方法，毛說：當然，對鐵托，對蘇聯，都要有批評，通過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我們的批評要合乎實際，要有分析。

30日，毛澤東將常委會議議論的意見歸納為四個基本論點：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徵的國際現象，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規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辦法解決各自的問題。各國革命都有具體的民族特點，十月革命本身也帶有一些民族特點，沒有民族特點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們的共性，條條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明確加以肯定。有缺點，是難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過分強調專政，但蘇聯的專政基本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民主。說蘇聯是由官僚主義者統治不能說服人。第四，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先要分清敵我，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過去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犯了錯誤，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鐵托。後來蘇聯同志改正了這個錯誤，用對待同志的辦法對待鐵托，改善了蘇南關係。鐵托現在卻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斯大林和其他與他觀點不同的同志，是錯誤的。他把這些同志稱之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擊，是分裂共產主義隊伍，是親痛仇快的。毛提出把文章題目改為〈共產黨宣言〉提出的一個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文章的設想。關於文章題目，毛考慮也可以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個題目「理論性更強一點」，如何確定，待文章寫起來再說。鑑於莫斯科壟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做法（毛的形象說法是蘇聯只想自己開香腸店，不願意中國也開香腸店），毛澤東指出，文章形式上面向國內，實際上是面向世界。接着，毛談了寫這篇文章的要點：

> 一、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然後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列主義的基

本原理要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二、講清甚麼是斯大林主義，為甚麼把共產黨分為斯大林主義和非斯大林主義分子是錯誤的。應明確地講，如果說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

三、講清沙文主義。大國有沙文主義，小國也有沙文主義。大國有大國主義，小國對比自己小的國家也有大國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

四、先要分清敵我，然後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我們整篇文章可以從國際形勢講起，講波蘇關係，匈牙利事件，也講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兩類事件性質根本不同，說明當前的反蘇反共風潮就是一種階級鬥爭，是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要指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採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問題。

五、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要着重指出，斯大林著作還是要學，蘇聯的先進經驗還要學，馬列主義的書還要學，但是不能用教條主義的方法學，可以講中國黨吃過教條主義的虧。別人的情況我們不講，讓人家自己講。我們一貫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修正主義。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觀點，特別是批判斯大林時的一些論點和採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氾濫。要明確提出既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修正主義。

六、文章從團結講起，最後也落腳到團結。沒有理由不團結，沒有理由不克服有害團結的思想混亂。（着重號是筆者加的——毛澤東在這裏第一次把修正主義與蘇共二十大聯繫在一起，而把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劃了等號，並準備公開表露這種觀點。）

文章要點確定之後，毛澤東指定他的兩個秘書胡喬木和田家英以及吳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議分工之後，各寫一部分，最後由胡喬木通改全稿。12日拿出了初稿，題目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21]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論文章初稿，提出修改意見。主要意見是：在正面闡述中，對甚麼是共同道路沒有說清楚，沒有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普拉演說只是我們做這篇文章的由頭，對鐵托所謂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分子的觀點，是要徹底批判的，但是不宜逐條引用他的論點批駁；對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要做進一步的分析；現在教條主義還不少，這一部分應當多費些筆墨；對修正主義要集中分析它的主要論點，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要實行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資產階級專政。會議決定，文章初稿要做較大修改。此後，胡喬木等人修改

了四五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19和20日連續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文章的修改稿。會議提出的問題主要有：對匈牙利事件不宜寫得太細，迴避蘇聯第一次出兵的問題，而明確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確的；蘇共二十大有積極意義，糾正斯大林錯誤是對的，但是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結果造成右傾危險和修正主義思潮氾濫；要分清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肯定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的共同道路。

關於斯大林評價問題是這次會議討論的「集中點」。會議認為，文章應該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當然也指出他的錯誤。關於斯大林的錯誤，會議討論了國際上議論最多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肅反擴大化，一個是大國沙文主義。但「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萬能的，要靠人來運用。運用的人的主觀認識是否正確，關係甚大」。談到蘇聯的錯誤時，毛澤東強調：

> 個人的因素，個人主觀對客觀的認識正確與否，在這裏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對立统一規律，認為矛盾轉化的觀點是錯誤的。要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又要防止修正主義的傾向。赫魯曉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結果別人撿起來打他，帝國主義打他一棍子，無產階級又打他一棍子，還有鐵托和陶里亞蒂又打他兩棍子。這樣在全世界颳起了否定一切，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風潮。所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分子」，是一種誹謗，顛倒了大是大非。（着重號是筆者所加）

文章按照這個思路又修改了兩天，12月22日晚上，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討論後，認為可以拿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23和24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採取分段議論的方式，再次對文章提出修改意見。據吳冷西的記載，主要有以下幾條：第一，對教條主義的批判還要多着些筆墨，同時進一步講透修正主義思潮的要害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資產階級民主」，以此說明匈牙利事件就是對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和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面都沒有搞好。第二，強調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繼續明確「以蘇聯為首」，反對國際共運中的「多中心論」，加強國際團結，共同對付帝國主義。第三，通過這篇文章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必然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心。

毛澤東又講了兩點意見。一是分析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說明如果處理不好，非對抗性矛盾可能發展成為對抗性矛盾，從理論層面解釋波匈事件的起因；一是再次明確指出要為斯大林及其社會主義成就辯護，並強調現在只有中國有資格出來辯護，因為中共在借鑑蘇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經過反覆考慮，毛澤東決定刪去文中有關「和平過渡」問題的一段文字。[22]

據吳冷西講，從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文章最後定稿。毛決定，28日廣播，2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發表時，題目定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再論〉），以表示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的連續性。中共最高層如此重視一篇文章，數度開會，反覆討論，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兩個歷史問題的決議外，在中共歷史上實屬罕見。[23]原因在於，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蘇共二十大以來中共領導人對國際局勢和社會主義理論問題思考的結晶。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中共必須應對蘇共二十大、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鐵托和陶里亞蒂等共產黨領導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輿論媒體各方面提出的問題，從理論上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全面闡述。吳冷西後來總結說：這篇文章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續篇和深化。它回答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爭論最尖銳的問題，包括了對蘇聯、蘇共和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也包括對匈牙利事件、蘇波關係以至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和共產黨、工人黨之間的關係等問題，而且它們還回答了美、英、法等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輿論工具對社會主義的誣衊和攻擊」。[24]

與〈一論〉相比，〈再論〉反映了波匈事件爆發後中共特別是毛澤東思想變化的軌跡。蘇共二十大後不久，中共和毛澤東在議論中雖然也提到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條主義，強調如何避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25]波匈事件及其引發的國際風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轉向，把批判的「主要鋒芒」對準修正主義，奮起「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強調蘇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共同道路」。當然，開創了中國革命道路並且正要繼續開創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毛澤東，並不是要改變自己另闢蹊徑的思路，因為很顯然，即使是強調「共同道路」，毛也沒有忘記反對教條主義。問題是，波匈事件的震動，鐵托「普拉演說」的發表，已經威脅到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國際共運的團結。更為重要的是，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的道路本質上同蘇俄經驗、列寧主義乃至斯大林主義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否定了蘇俄的經驗，否定了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識形態、理論體系和社會制度。因此，在當前的形勢下，同沿襲蘇聯經驗、移植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相比，否定蘇聯道路、拋棄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是更大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問題。儘管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界定，但從中共高層的討論中可以確定，所謂修正主義即否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政策主張。此後，「修正主義」的概念在中國被官方沿用二十餘年，成為著名的政治批判

符號。

〈再論〉一發表，便在社會主議陣營產生了普適反響，很多黨報黨刊立即進行轉載或報道，反應最為強烈的是蘇聯。〈再論〉發表的第三天，蘇聯《真理報》幾乎全文予以轉載。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宮除夕聯歡會上，赫魯曉夫特意走下主席台與中國大使劉曉擁抱、接吻和幹杯，稱讚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還請劉曉與蘇共中央主席團坐在一起。其他蘇聯領導人也紛紛表示讚許。[26]蘇聯民眾對〈再論〉的反應更加熱烈。轉載〈再論〉當天的《真理報》發行了約二千萬份，之後還印發了一百萬冊單行本。文章剛一刊出，蘇聯國內就有許多讀者打電話、寫信給《真理報》編輯部，表示對文章「非常滿意」。有讀者說：「我參加共產黨三十年了，據我評判，這樣的闡明斯大林功過問題深刻地符合我們內心感覺，符合每人的心意。」還有讀者說：「我不能不對中國同志表示感激，他們這樣公正地評論我黨。」一些讀者認為〈再論〉「給目前國際形勢和蘇聯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走的歷史道路以深刻的馬列主義的分析，對所有國家的共產黨都有巨大的意義」。《真理報》總編輯告訴中國記者，「許多宣傳員認為這篇文章是創造性運用馬列主義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問題的典範」。[27]《真理報》轉載文章後，許多蘇聯學生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到中國留學生宿舍表示祝賀，說「這是中國共產黨給世界各國共產黨、各國人民的新年禮物」。他們認為〈再論〉比〈一論〉「更精彩」，深刻地分析了斯大林、鐵托等問題。有些人認為「這篇文章的主要力量，在於從理論上闡明蘇聯經驗，澄清目前各國黨內外的混亂思想」。還有些人認為文章實際上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各國共產黨對某些問題爭論的總結。蘇聯大學生最感興趣的是關於斯大林和鐵托問題的分析，他們完全同意對斯大林問題的分析。有的說，〈再論〉說出了我們人民心裏的話。還有的說，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發生。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學生看出中共和蘇共在斯大林問題上有分歧，但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結論。[28]

從中國駐蘇記者的報道看，蘇聯各方高度評價〈再論〉，主要是因為它充分肯定了蘇聯的基本經驗和斯大林，在對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鐵托演說的問題上，保持了與蘇聯基本一致的立場，在一片反蘇的國際輿論中，這對蘇聯無疑是強有力的支持，正如蘇聯讀者所說，「這對於打擊目前反蘇叫囂很有作用」，「是中蘇鞏固友誼的再一次宣言」。[29]在這場國際共運的風波中，中共處於一種特殊地位，在歷史上受過蘇共和斯大林壓制和懷疑，又對蘇聯和斯大林作過抵制，而現在既堅持蘇聯道路和斯大林主義的基本立場，批判反斯大林主義的「修正主義」，又有分寸地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教條主義，給人的感覺是

立場堅定、態度公允、目光遠大。〈再論〉的發表，提升了中共和中國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聲譽和威信。無怪乎蘇聯有些人在盛讚的同時，表示出對自己領導人的不滿，說赫魯曉夫應該到中國去學習。甚至有蘇聯人說，世界上出現了偉大的列寧繼承者毛澤東，蘇聯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轉到對中國共產黨的崇拜了。[30]

儘管中共領導人贏得了如此讚譽，但他們同波蘭、匈牙利執政者一樣，也需要應對國內的複雜局面和人民大眾的不滿情緒。

[1]詳見沈志華：〈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

[2]八屆二中全會記錄：第一次會議，1956年11月10日。會議通知299人，有3人缺席。這裏及以下所引會議其他記錄，均為與會者個人記錄，而非官方正式記錄稿。需要說明的是，會議的報告和發言，除毛澤東11月15日講話經整理全文發表外，其餘都只節選了部分內容刊出，或完全沒有發表。

[3]全會原定議題是討論1957年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和財政預算，發生波匈事件後，增加了有關時局的議題。參見《毛澤來傳（1949—1976）》，頁606。

[4]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

[5]《共和國五十年：珍贵檔案》，上冊，頁515—518。

[6]以上引言見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29—238。

[7]以上引言見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周恩來報告，1956年11月10日。

[8]八屆二中全會記錄：陳雲報告，1956年11月11日。

[9]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4—26。

[10]八屆二中全會簡報和小組發言記錄，1956年11月。

[11]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

[12]八屆二中全會記錄：毛澤東在小組長會上的講話，1956年11月。

[13]以下毛澤東11月15日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13—329。

[14]後來這個平衡與不平衡的觀點被概括成「積極平衡論」，成為發動「大躍進」的一個理論根據。

[15]林克：《林克日記（1955—1964）》（手稿），未刊，頁15；李慎之：〈關於「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頁47—49。

[16]會後，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專門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還特別告訴王，李，毛主席說「這兩個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評他們」。但緊跟着還有一句份量很重的話：「這不僅是幾個人的思想問題，而是一個思潮。」王飛當時對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是有深刻理解的。據他對家人的回憶，聽了毛澤東的講話，他就不再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了。後來吳冷西又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要王飛和李慎之參加中央政治局經常舉行的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學習會，被王婉拒。因為從那時起，他已經對毛澤東的「英明偉大」產生懷疑，並且感到「非常失望」。參見李慎之：〈關於「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頁49—50；筆者對王飛之子王啟星的電話採訪記錄，2006年1月。

[17]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關的評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頁15—37。

[18]見《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關的評論》，頁39—40。

[19]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12月11日。

[20]於195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一系列會議的情況，由於當時沒有正式的會議記錄，而列席會議的吳冷西做了詳細筆記，這成為有關會議情況的唯一史料。據說，《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的有關敘述，主要也是源於吳的回憶錄。此處及以下關於政治局會議的討論過程和內容，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頁62—82。

[21]關於文章起草和初稿討論的過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撰述是：30日毛澤東提議由胡喬木負責起草文章，兩天後，即12月2日，胡就拿出了初稿。當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陳雲、陸定一、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等人討論。10日提交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607—608。這與吳冷西的回憶差距很大。由於無法看到原始材料，筆者也就無從對此作出是非判斷。所幸對於討論的內容，兩本著作的描述沒有區別，因此不影響讀者對實質問題的理解。

[22]此時中共對於蘇共二十大的路線主要有兩點不同看法，即斯大林問題和「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作出這個決定，大概是想在這篇文章中集中解決前者。大約一年後，中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提出了「和平過渡」問題。詳見本書第十章。

[23]1992年出版的《胡喬木文集》第一卷收入了這篇文章。《百年潮》2005年第6期刊登署名「史其」的文章，認為胡喬木對文章寫作做過重大的貢獻，編者有理由將此文收入《胡喬木文集》，不過應在註释中說明寫作過程為好。筆者認為，將這篇文章收入《胡喬木文集》的理由並不充分。這篇文章不僅不應算作胡喬木的個人作品，甚至也不應當作胡喬木的職務作品，而實實在在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集體作品。

[24]吳冷西：《十年論戦》，頁82。

[2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267。

[26]《內部參考》，1957年1月5日，頁117。

[27]《內部參考》，1957年1月10日，頁193—194。

[28]《內部參考》，1957年1月4日，頁51—52。

[29]《內部參考》，1957年1月10日，頁193—194；1月4日，頁51—52。

[30]《內部參考》，1957年1月4日，頁52。

三 波匈事件在中國社會引起的反響

波匈事件對中國社會的震動絲毫不亞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執政黨在認真討論，整個社會也在積極思考。就中國社會而言，對波匈事件作出強烈反響的主要是基層黨政幹部、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生）、民主黨派和私營工商業者，不過，這些人只有言論而無行動。相反，一般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雖然對東歐事變沒有表現出興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對切身利益的關注使得他們中許多人採取了與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類似的舉動——退社、罷工、罷課、請願和遊行。這確實給執政的中共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

1 社會反應及「少數人鬧事」

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到波蘭、匈牙利的國內危機，再到鐵托的「普拉演說」，一連串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風波，在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人民當中同樣引起了極大反響，特別是基層幹部、知識界和民主黨派，對事件的反應最為敏感，產生的疑問也最多。

人們對波蘭、匈牙利發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會主義國家竟然也會發生暴動和示威遊行，並且提出了許多疑問：匈牙利的暴動如果是反動的，為甚麼有許多群眾參加？如果是合理的、正義的，為甚麼政府又要鎮壓，蘇聯軍隊也出來了？開始報上說是暴亂，後來又說是革命，到底革命對象是誰？納吉說要保衛革命的果實，是指匈牙利建國以後的果實，還是指這次事件的革命果實？事件中建立的聯合政府代表甚麼勢力？為甚麼納吉在講話中只提自由、獨立，連社會主義也不提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在內閣中只有兩個席位，怎樣能夠保證在政權機構中執行黨的政策、路線？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國去波蘭是否妥當？匈牙利請求蘇軍幫助平息叛亂是否合適？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們提出要求獨立、主權是甚麼意思，難道蘇聯妨害了他們的主權和獨立？他們提出要求蘇軍退出波蘭、匈牙利，是否會使華沙條約組織陷於癱瘓？[1]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時，人們對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質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釋。一種看法認為，匈牙利的黨已經被資產階級篡奪了，建立了十幾年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被顛覆了。山西省幹部學校哲學自修班的學員，都是十三級以上的中高級幹部。在討論中很多人說，這是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後果，全怪赫魯曉夫說話不注意，惹下一大堆麻煩。山西

省政協副主席冀貢泉認為，匈、波事件很嚴重，發生的原因就是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打擊得太厲害。但更多的人則認為事件源於蘇聯對外政策的錯誤。蘇聯政府發表關於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宣言後，一些機關幹部認為，如果蘇聯早一些檢討和改正過去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錯誤做法，今天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了。有些人認為蘇聯的宣言是被迫發表的，「已經陷入被動才承認錯誤」。還有些人認為蘇聯宣言的自我批評精神不夠，過去在蘇匈關係中有哪些問題處理得不妥當，在宣言中沒有說出來。對於蘇軍在布達佩斯出兵鎮壓的行動，有人認為有干涉內政之嫌，給帝國主義以藉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緒。清華大學有教授說，波匈事件是革命輸出造成的後果，並說蘇聯軍隊駐在這些國家也可能軍紀不好，就像在中國東北時那樣，強姦婦女，搬走機器，惹人討厭。還有教授認為，赫魯曉夫在波蘭八中全會期間匆匆到華沙去是干涉內政。上海一些幹部、職工、工商界人士對蘇聯出兵匈牙利的問題爭論很大，認為蘇聯出兵「很笨」，是「走錯了一着棋，很被動」；出兵「不符合華沙條約規定，因為華沙條約是對付外來侵略，不是對付內亂的」，「蘇聯出兵是把小國當作自己的支部一樣」。[2]

無論把事件起因歸結為蘇共二十大還是蘇聯的對外政策，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為甚麼被視為具有無比優越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經深入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層面。上海一些職工、幹部、工商界人士就認為，波匈共產黨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脫離群眾的錯誤，不關心群眾生活，結果「官逼民反」。還有人認為是黨內不團結，同中國的高饒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說：「天天誇社會主義，誇了半天鬧成這樣。」[3]

最敏感的議論是，人們從一系列國際事件聯想到了中國。儘管不少人認為中國黨處理問題穩妥，對於斯大林問題比較慎重，馬列主義水平比較高，但還是有許多人看到了國內存在同樣的問題。如民主建國會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員胥以恒認為，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發生，證明黨和政府工作上有缺點，這應該成為中國的前車之鑑。[4]與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學氣象系四年級學生胡伯威的批評則尖銳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956年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報》，指責中國報紙對所發生的國際事件封鎖消息，他說：「報紙應該尊重自己的讀者，將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飾地反映出給讀者。」「一個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建築在對事物的真實情況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實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國，「只有報紙來提供這種自由」。他嚴厲地指責《人民日報》關於波茲南暴動及波匈事件的報道「粉飾現狀」，報喜不報憂，「欺人太甚」，「令人作嘔」。信中表達了一個善於思考而又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大學生對民主和自由的看法：

我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主張的不是為自由而自由，為民主而民主。我也不願意用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的原則來衡量和批判我們的事情。但是我堅決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發揚，人權和人的尊嚴得到真正的（不是口頭上的）重視，黨的宣傳工作忠實地遵從這些原則，才能把人民群眾，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這才對社會主義有極大的好處，人民群眾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會變得聰明，成熟，有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熱愛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來防止和消滅種種可能發生的弊病，消滅騎在群眾頭上的官僚主義和腐朽傾向。」[5]

中共執政以後，新聞輿論作為「黨的喉舌」只能聽命於中央，《人民日報》的宣傳方針並不取決於報社，而來自中共中央。來信批評《人民日報》，實際上就是批評執政黨。更為深刻的是，來信提出的「人權」和「人的尊嚴」，與中共的政治理念根本不合。在中共看來，「人權」、「人的尊嚴」這些東西，都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概念，與「民主」、「自由」一樣，都是欺騙人民的。胡伯威的來信已經超出當時中國意識形態所能容忍的程度。然而，還有更為極端的言論。比如，在北京鋼鐵學院的食堂等幾個地方，就出現了粉筆寫的標語：「反對目前社會制度」，「我們要民主自由」，「中國人民處於悲慘的情況中，青年們行動起來吧」，「支持匈波人民的鬥爭」。[6]

事實上，知識界和工商界對中共現行政策的不滿情緒，在此之前已經有所表露，東歐的動盪不過更加強化和刺激了這種情緒。還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各部門收到的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來信就大量增加。據中央機關十六個部門和知識分子十人小組辦公室不完全統計，至1956年5月底止，共收到來信5200件，普遍反映對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不滿。[7]工商界很多人則對中共給資本家代理人和小資本家定為資本家成份的政策有意見。無錫市資本家代理人普遍說，資本家已經固定五厘利息，企業基本上由國家管理，我們在國家領導下工作，靠勞動，拿工薪，再戴資產階級的帽子，實在冤枉，紛紛要求獻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資本家半年定息只有五元錢，最少的僅一角七分，卻為此戴上了資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聯副秘書長康永仁說：「摘除這些人的資產階級帽子，對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是有好處的。」[8]

如果說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還僅僅是對中共某些具體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見和建議，那麽在波匈事件前後中國社會的不安定局面，則主要表現為農民退社、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繼續蔓延，甚至日趨嚴重。

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央報告：數月來，特別是全省大部分農業社轉為高級社，並進入秋收和準備年終分配以來，各地不斷發生社員鬧

退社的嚴重情況。據不完全統計，退社農民已達7萬餘戶，已經垮掉的社有102個，正在鬧退社的還有12.7萬餘戶。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與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陝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電話聯繫，秋收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退社戶一般佔社員總戶數的1%，多者達5%。正在要求退社的農戶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寧波專區，想退社的佔20%左右。另據新華社內部報道，江蘇、山東、貴州等省，退社的情況還要嚴重，有的地區比例高達10%，甚至很多黨員都「要求單幹」。遼寧、湖北都是農業豐收省份，但同樣發生了社員退社的現象。就連新疆、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也出現了大規模農民退社的情況。[9]

關於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退社單幹的情況，來自瀋陽的報道說，據省手工業管理局9月29日統計，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員有524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全市九成多的獨立手工業者都參加了合作社，但高潮過後就出現了社員要求退社的跡象。這種情況在目前供不應求的縫紉、製鞋兩個行業中最嚴重。另據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的粗略統計，從2月以來，已經批准退社的小業主有535人。有一個五金聯社，退社的小業主涉及到五十個基層單位，共計398人。[10] 《內部參考》還報道了大量工人罷工請願的情況。如內蒙古森林工業管理局所屬的單位，從6月到9月已經發生了6起工人罷工請願的事件，參加者少則數十人，多則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發生了60多築路民工集體向市人民委員會請願的事情。波匈事件發生以後，情況更加嚴重。到12月上旬，上海輕紡工業已有53個合營工廠1834人因工資和福利問題先後發生罷工，怠工，請願和其他鬧事事件。其中罷工的有10個廠，116人；怠工的有3個廠，60人；請願的有2個廠，29人；在廠內鬧事，包圍公方代表，準備罷工、請願的有38個廠，1629人。[11]

此外，學生罷課、請願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機械工業部所屬兩個技術工人學校，四百多學生開始罷課，要求轉學和分配工作，參加者很快增加到八百多人。罷課者集體到中共四川省委和市勞動局請願，毆打干涉他們罷課的同學，随意破壞公共財物，甚至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還有三百多人在成都遊行示威，向中級法院請願、控告。至10月底記者發稿時，學校已陷入嚴重混亂狀態之中。12月下旬，陝西省少數學校的學生也發動集體簽名，強硬要求用罷課或絕食等辦法對學校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表示抗議。[12]

動亂局面在波匈事件後確有擴大的趨勢。按照1957年3月中國官方的說法：「在最近半年內，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遊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13]儘管從目前看到的史料，還不能說中國發生的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國際風波的影響，但就各地鬧

事的緣由而論，與波蘭和匈牙利出現的危機確有相同或相似的特點，即都反映了人民大眾對執政者的強烈不滿情緒，而這種情緒長期受到壓抑，一旦爆發，便成烈火之勢。

在中國農村，社員退社主要由於合作化以後農業社生產管理統得很死，社員生產的自由不多；農業社幹部作風粗暴，打罵社員；農業社分配不合理，農民入社後的生活不僅沒有提高，反有下降。據新華社記者在湖北了解的情況，社員退社有以下幾點原因：合作化以後收入減少；在社裏做活累，沒有休假天，沒有零用錢，不自由；合作社幹部作風惡劣、不民主；按勞付酬、入社生產資料處理、社員幹部補助工分等政策性問題沒有處理好。[14]在城鎮，手工業者退社則是因為手工業合作社經營管理過分集中，難以適應手工業生產特點，遠不如個體生產靈活方便，而且內部制度不健全，尤其分配不合理，入社手工業工人收入減少。中共瀋陽市委地方工業部工作人員談到這個問題時說：「退社的現象還有發展的趨勢。根據目前情況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合作社內部還沒有搞好，管理混亂，工資尚未評定，社員工資迄今仍是預借；另一方面，由於手工業產品供不應求，未入社的少數單幹戶收入多、利潤高，影響了社員的情緒。」[15]《人民日報》記者在上海了解到，手工業者退社，主要是參加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小業主經濟收入比入社前大為減少，且目前自由市場生意活躍，有利可圖，因此對合作社給他們的固定薪水不感興趣。[16]至於工人和學生的罷工、罷課、請願、遊行，基本上也都是因為工作條件、生活待遇問題沒有解決好，或者是出於對基層管理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滿和反抗。

綜觀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個別的和局部的「瑣事」，就每個具體事件看，規模並不大，程度也不算嚴重，與波茲南和匈牙利發生的事件無法相比，所以當時被毛澤東稱為「少數人鬧事」。但是，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區和人群，卻有着大體相同的起因。綜合起來看，問題的存在是帶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困惑、不滿、騷動，中國社會底層的各種騷亂，與波匈事件的震動和反響交織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構成了一種雖不過分緊張：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確實有些擔憂了。

2 中共採取的讓步和安撫措施

各地發生的「鬧事」和社會問題，中共在召開八大時已經有所察覺。這一點，在中共八大的各項報告及大會發言中均可看到。[17]對於前述一些地方黨委的報告，中共中央也及時作了批示和轉發。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新疆區黨委和福建省委的報告，要求

各地參照這兩個報告，貫徹中央關於整頓幹部思想作風、克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的精神。[18]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實際上也是要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的。

二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又批轉了一些地方報告，並發出一些相關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指示，要求各農業合作社在當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對包工包產不合理、勞動報酬定額不夠準確的問題加以清理，在實行超產獎勵、減產處罰的制度時，採取多獎少罰的原則；對入社生產資料作價不合理的問題，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員應該交納的股份基金計算清楚，欠交的應該盡力補交，多餘的應該分期償還；對農業社幹部的報酬，應該根據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合作社章程規定，對於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適當的調整。[19]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河北省委、廣東省委的報告，在批示中告誡各地黨委，「急急忙忙」讓富裕中農入社「本來是不策略的」，因此讓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農退社「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對堅持退社的手工業者和其他行業從業人員，可以允許他們退出，不必勉強把他們留在社內。批示還注意到合作社內困難戶的問題，要求從公益金中給予適當補助，必要時可暫時給以土地報酬。[20]時近年末，中共顯然希望通過調整年終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開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糧、請願風潮，緩和農村基層的矛盾。

在解決農村問題的同時，中共還着手解決城鎮手工業合作社社員退社問題。1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手工業合作社社員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場放開後，個體手工業營業「突然興旺起來」，這對合作社社員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後，手工業社員收入減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評某些合作社組織，「沒有認真執行黨和政府關於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積累，後工資福利，把積累額定得過高，致使社員收入下降；在生產上不顧客觀條件，把不該集中的也集中起來，甚至高度集中，社員的積極性不能發揮，業務不能開展，給群眾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業主的使用上，沒有量才錄用，或者給以適當安排；在技術手段上，追求機械化、工廠化，把公積金定得過高，處處向現代化工廠看齊。文章提出要對手工業合作社工作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在檢查中發現積累比例偏高的，要適當降低；不該集中而又已集中起來的，要迅速分開；對小業主和輔助勞動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調整；工資不合理的，應當適當調整；管理機構龐大的要精簡；對其他不合理的經營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業生產的特點加以改變」。[21]

與退社現象相聯繫，1956年下半年，城市經濟生活出現一個新現象：一些原私營工商業戶開起了「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個體手

工業生產也日趨活躍。9月份上海市手工業個體戶為1661戶，從業人員5000多人；10月份就發展到2885戶，從業人員8100多人。廣州市9月份一個月內，個體手工業從業人員增加1100多人。武漢市合作化後，個體手工業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將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島、鄭州、成都和廣西等省市，個體戶和從業人員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認為，這種情形的產生，是因為八大後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自由市場，直接刺激了個體手工業的發展，使原私營工商業「死灰復燃」。有些幹部擔心「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又要氾濫了」，這樣下去會妨礙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22]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看法和態度卻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澤東與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批評了中共內部「左」的空氣：「我們一些同志對資產階級只批評不鼓勵，不認識資產階級這幾年有很大的進步，對資產階級應該採取又批評又鼓勵的方針。」毛承認，公私關係上的問題是「我們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級，只能怪上面」，還說：「資產階級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個別的，整個階級不能說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現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營了，沒有對抗了，合營前已經沒有對抗。民建、工商聯、民主黨派同我們是合作的，看不到對抗。」說到「地下工廠」時，毛指出：目前中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但自由市場和地下工廠能夠發展起來，這說明「社會有需要」。應該「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僱工」。毛澤東以製衣業為例，主張私營工廠與合作社競爭，並把這叫做「新經濟政策」。「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23]第二天，毛澤東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談話，肯定「公私合營以來，工商界有很大進步」，「我們感覺熟悉了，更加靠攏了」。還說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對與會者提出的許多問題，毛說對他幫助很大，而且承諾政府會和他們商量，協商一個辦法，凡是能夠解決的總要解決。[24]

12月17日，劉少奇在一次會議上也說：各地地下工廠不少，天津就有二百多。有些資本主義或小生產者，有甚麼不好呢？這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29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二次會議上，副委員長黃炎培發言提出私人開廠的問題時，劉少奇又說：「有一些資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萬元、幾百萬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這麼多錢，如果他們要蓋工廠，是否可以准許他們蓋呢？可以的。」「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有這麼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

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25]劉少奇的話同毛澤東的談話如出一轍，甚至比毛更放開。一個細小卻涉及實質的差異是，毛認為自由市場的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劉則強調私人工廠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過在當時，這樣的差異還沒有影響到中共領導人對私人開廠的看法。12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開表明對個體戶的態度。社論肯定手工業個體戶的發展「一方面滿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場的商品供應；另一方面又擴大了城市的就業人數」，「這是對國家有利無害的事情」。[26]

三個月前，中共八大剛剛宣布「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現在又說「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沒收」，給人的印象是頗為放開的。這氣魄多少有些像鄧小平在80年代的改革開放了。

緩解社會緊張，平息各地「鬧事」，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解決國民生活問題。1955年起，由於過分偏重國家基本建設，日用品生產受到擠壓，加上各地爭搶高速度，導致物價上漲，商品供應緊張。以大城市上海為例，「由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所帶來的生產建設高潮，特別是發展農業四十條綱要草案提出以後，全國農業的生產勁頭很大，紛紛購置各種生產資料和文教衛生用品，帶動整個工業生產的發展，對上海市場提出了大量需要，原來上海認為積壓的一些商品，很快訂購一空，成為緊張商品」。當時國營商業部門曾想了不少辦法開闢貨源，滿足生產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費品供應也跟着緊張起來。8、9月間，全國範圍內在提高工資基礎上的工資改革陸續結束，增加工資後的社會購買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費品市場。再加上全行業公私合營後，資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這一時期發放，更增加了對消費品市場的衝擊。呢絨、絨線、針織品、傢俱等供不應求，部分高級消費品如自行車、無線電、手錶、鑽戒等，也暢銷起來。工業消費品市場，十分活躍和緊張。副食品的供應也很緊張，特別是豬肉來源較緊，減少了供應量，居民發生排隊搶購的現象。[27]

面對壓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調整國家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在安排計劃時強調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第四十一次全體會議。[28]陳雲在會上提出「在照顧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條件下來搞建設」的觀點，他主張「保證必需的民生，有餘再搞建設」，還提出要找出一個「民生和建設正確關係的標準」。[29]雖然很難說這是要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作為權宜之計，國民生活也已經被國務院擺在了基礎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將更多的財力用於國民生活。八屆二中全會前，各地上報匯總的基本建設投資指標為243億元，二中全會決定調低到135億

元。陳雲對這個指標仍有疑慮，於是在12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1957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時提出，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再削減。[30]會後，國家經委經過仔細計算，果然認為基本建設投資還可以削減。12月27日、30日，陳雲兩次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主張將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削減到114億元，還說「不要怕別人說機會主義」。顯然是針對波匈事件的餘波，陳雲意味深長地指出，這樣做「可以避免犯東歐國家的錯誤」。[31]

為了解決企業職工提出的問題，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工人階級問題十人小組，由劉少奇主管。12月17日，劉少奇召集十人小組和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負責人開會，座談勞動調配、工業基礎、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等問題。劉在會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問題，如工廠用人可以考慮採取「勞動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業基地，要研究輕重工業的配合問題」；企業管理可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管理委員會，「它又是領導，又是監督，主要是監督，是權力和監督機關」，並且不無擔憂地指出，這些問題「不解決要出亂子」。劉少奇還告訴與會者，中央要「全面討論」工人問題，要求各種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能解決的應作出決定加以解決，不能解決的要有交代。[32]

做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後，中共中央統戰部即在內部系統開始了一次檢查工作。從民主黨派、知識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僅對中共各級統戰部門存有意見，而且對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內部處理黨派、知識分子和工商界關係意見頗多。於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進一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重點轉移到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和部隊，主要檢查這些單位中的中共黨員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關係。中共承認，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在黨派關係上，我們的許多同志不承認或者不尊重民主黨派的獨立、平等地位，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或者加以歧視和排斥；在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內部共產黨員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關係上，很多黨外人士有職無權，想積極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關係上，許多同志不尊重少數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權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單位「一邊檢查，一邊解決檢查中發現的問題」。[33]

總的說來，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以後，對各地「鬧事」和社會實際問題，中共和政府的主旨顯然是調整原有政策，採取了某種「讓步」的姿態。但是，還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後的社會思想動態。對此，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則看得比較嚴重。

3 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睿記會議。關於這次會議，除了已經發表的毛澤東兩次講話外，迄今未見到任何其他文獻，會議討論的情況也不得而知。毛的講話一次是在會議開始的18日，另一次是在會議結束的27日。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宣布，這次會議的議題主要有三個：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經濟問題。其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思想動向問題。[34]

毛澤東在1月18日的講話似乎非常嚴厲，他一開頭便指出：「現在，黨內的思想動向，社會上的思想動向，出現了很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些問題首先出現在黨內，如爭名奪利、貪圖享受思想在黨內的發展，一些領導幹部對農業合作化優越性的懷疑態度，以及反映富裕中農思想的單幹風有所抬頭。接着，毛澤東分析了學校裏學生鬧事的背景，一是學生中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富裕中農家庭者佔80%，一是受國際事件影響，「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毛特別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隨後，毛澤東便用主要篇幅專門講國際風潮對黨內和國內的影響。從尖刻的言詞可以看出，對於那些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颳，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子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着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不過，毛澤東很有信心地說，中共的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無非是少數人這裏鬧一下，那裏鬧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沒有甚麼可怕」。他們無非是要推翻共產黨，結果就暴露出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對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甚麼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最後提出：「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

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

1月27日的講話，毛澤東重點談了「鬧事」問題。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毛澤東用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分析，認為鬧事就是對立面的鬥爭：地主、資本家鬧事是因為他們心懷階級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議論紛紛是因為他們都講唯心論，大學生鬧事是因為他們大多數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至於在工人和農民中間發生的少數人鬧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領導上存在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是「工作方法不對頭」；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壞分子的存在」。由於對立面的鬥爭是永遠存在的，「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對於「鬧事」的態度，毛澤東主張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準備和積極的態度，這是一種「領導藝術」。他引匈牙利為鑑說：「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便成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鬧得對的，就承認錯誤，並且改正，鬧得不對的，就駁回去。既「不能步步後退，毫無原則，甚麼要求都答應」，也「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不能學段祺瑞」。應該耐心地做大多數鬧事者的分化、引導和教育工作，而「對於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至於那些沒有行動，只有言論的人，毛澤東再次提出「唱對台戲」的辦法，言詞同樣是尖刻的：

>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通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毛澤東最後提出：「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學問，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看，現在的階級鬥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

毛澤東的這番講話，已經蘊含了他後來發動反右派運動的思想基

礎。不過，當時中共急需解決的問題還不在這裏。從波匈事件後中共召開的幾次會議和應對國內局面採取的方針可以看出，作為執政黨，中共在進入社會主義以後繼續鞏固政權時，面對着三個問題：第一，中共各級領導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這是引起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第二，普通民眾對執政黨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由於中共政策方針的偏差可能有進一步激化的趨勢。不過，工農大眾不會反對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會隨着執政黨自身的作風改變和政策調整而得到解決；第三，黨內外知識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業者）的奇談怪論，這些言論本質上是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但由於建國以來階級鬥爭搞得比較徹底，所以他們的力量和影響都有限，不會鬧出大亂子。顯然，要避免中國社會出現波蘭和匈牙利那樣的危機，首先必須解決的是前兩個問題。於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思考，毛澤東提出了他的著名學說——「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也就是發動整風運動的指導思想。

[1]《內部參考》，1956年11月5日，頁127；11月2日，頁61。

[2]《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日，頁3—9；11月5日，頁127—128；11月6日，頁167—168。

[3]《內部參考》，1956年11月6日，頁167—168；11月5日，頁129。

[4]《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日，頁5。

[5]《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0日，頁295—298。筆者2000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期間，有幸結識了已年過六旬的胡伯威先生，並聽他講述了當年的情況。

[6]《內部參考》，1956年11月5日，頁129。

[7]雲南省檔案館，7-1-804/1-4。有關情況詳見本書第一章。

[8]《內部參考》，1956年9月24日，頁621—622。

[9]《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業编》，上冊，頁622、643、649、655；《內部參考》，1956年10月19日，頁1086—1087；10月24日，頁1178—1179；10月30日，頁1337—1338；11月6日，頁178—179；11月21日，499-502；12月29日，頁671—672。

[10]《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6日，頁1258；10月31日，頁1547—1549。

[11]《內部參考》，1956年9月24日，頁615—616；11月15日，頁367—368；12月17日，頁342—343。

[12]《內部參考》，1956年10月30日，頁1328—1331；12月26日，頁561—564。

[1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154。

[14]《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頁1178—1179。

[15]《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6日，頁1258。

[16]《內部參考》，1956年10月31日，頁1547—1549。

[17]詳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及本書第五章。

[18]參見《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冊，頁622、630。

[1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编》，第九冊，頁413—421。

[20]《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冊，頁640，648。

[21]《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4日。

[22]《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0日。

[23]《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67—170。

[24]《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74—177。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82，383。

[26]《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0日。

[27]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頁429—430。

[28]此時周恩來出訪，由陳雲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

[29]陳雲：《陳雲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34—135。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065。

[31]陳雲：《陳雲文集》，第三卷，頁141，143。

[32]《劉少奇年譜（1989—1969）》，下卷，頁381—382。

[33]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546。

[34]《毛澤東傳（1949—1976）》，頁615。以下所引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參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30—362；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9，頁1—4。

第七章

發動整風：毛澤東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在共和國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國人關注的就是整風反右運動。儘管受到書刊檢查的嚴格限制，相關的學術論文和專著以及當事人的回憶錄還是不斷湧現。[1]有一種比較流行的意見認為：「整風和反右實際上是一回事」，發動整風就是為了反右，而且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設計了「引蛇出洞」的策略。[2]但筆者的研究結果顯示，毛澤東確實設想並發動過一次整風運動。就打擊的對象和運動的方式而言，整風和反右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而且，整風本身在不同的階段，其內容差別也是十分明顯的。毛澤東最初提出整風，是希望通過「和風細雨」的方式打擊共產黨內脫離人民大眾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接着想要借助黨外知識界的力量完成這一任務。後來轉入反右派運動，卻變成以「急風暴雨」的方式打擊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社會上一切對執政黨不滿的言論和行動，而運動後期的整風，則是在整個社會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黨內整風轉為全民整風。其中只有一點是貫徹始終的，即所有這些運動的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以往的研究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反右運動的外在表現及其社會後果，而對整風與反右的關係及轉化過程缺乏深入的探討。本書用三章的篇幅講述整風和反右運動，重點在於討論這個變化的過程是怎樣發生的，為甚麼會發生，從而說明毛澤東及中國領導人在1957年思考和關注的核心問題。本章旨在說明整風運動的緣起。

[1]比較重要的著作如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海外出版物有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以及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國外學者的譯著最值得注意的是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比較重要的回憶錄有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牛漢和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韋君宜的〈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百年潮》，1998年第2期；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徐鑄成：《親歷一九五七》（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2]最有代表性的論述，見李慎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載《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114—15、124—125；章立凡：〈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1957〉，《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頁45等。

一 毛澤東決心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出現的動亂，使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已經取得勝利的政權還有喪失的可能。這種危險的國際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和國外的反動勢力，他們企圖鼓動和利用國內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產黨政權；國內根源則在於人民大眾對執政黨脫離群眾的作風和某些方針政策的不滿和對立情緒。至於在中國，毛澤東和中共認為，經過鎮反、肅反，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會出現與國外反動勢力結合的危險。今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克服執政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問題。於是，毛澤東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決定以此作為指導思想，採用民主的方式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1 黨內整風的最初倡議

眾所周知，毛澤東公開提出開展整風運動的建議是在1956年底。其實，在此前幾個月，中共便已經考慮通過整風方式來解決執政黨面臨的難題。早在蘇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問題以後，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的思想混亂，中共就感到有必要在黨內開展以學習理論為主要形式的整風運動了。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一個通知中提出：

> 整風運動（指延安整風——引者）是我國「五四」運動以來的一次最偉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運動。整風運動反對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重新確立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個運動使我們的黨變成為政治上成熟了的黨。
>
> 為了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進行得更好和更有效，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黨相當於縣委書記一級以上幹部中，在高、中級黨校學員中，在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機關的研究人員中，在高等學校畢業班學生中，根據〈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五篇文章，進行報告和學習。這個工作，可以在現在趁〈改造我們的學習〉發表十五周年的時候即行局部開始，分期分批進行，到1957年7月結束。[1]

儘管這裏還沒有直接提出開展整風運動，但將要在黨內進行整風的意圖是明顯的，形式是加強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內容是批判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很快又加上了官僚主義。[2]

這一階段，新華社在《內部參考》中陸續披露出黨內工作作風的嚴重問題。如湖北省襄陽專區在夏收預分中「發現許多農業社幹部有嚴重的貪污行為」。長春市企業領導機關「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平時只顧完成生產任務，不關心工人疾苦，妨礙了職工的積極性。內蒙昭盟地區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僅據八個旗縣的材料，一年多來就發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預審及監所管理違法亂紀事件32起，非法搜查與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中方法不當而造成的嚴重事件13起。由於幹部在工作中強迫命令的做法和無視百姓生活的錯誤，浙江省寧波地區連續發生「群眾自殺事件」，僅慈溪縣就有91起，寧海縣有78起，涉及的鄉鎮達60%—85%，而且「自殺者絕大部分是勞動人民」。[3]這不能不引起執政者的密切關注。

八大召開前，毛澤東在第一次預備會議上就提出：「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4]在第二次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又針對蘇共的教訓指出：

> 我們應該避免而且可以避免走那麼多彎曲道路，主觀主義這個東西可以更多地肅清，宗派主義也可以更少一點。我們這個黨，在最近若干年以來，就中央來說，就高級幹部來說，是個宗派主義比較少的黨，也是主觀主義比較少的黨。你說主觀主義有那麼多，你就不能解釋，為甚麼革命搞勝利了，現在搞建設又有了成績。你說宗派主義有那麼多，那為甚麼我們沒有陷於孤立？在革命時期沒有陷於孤立，在建設時期也沒有陷於孤立。可見我們的主觀主義不是那麼多，宗派主義也比較少。但是我們還是有主觀主義，還是有宗派主義，包括中央發布的文件中間也有。……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5]

在9月15日八大開幕式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從1942年整風運動以來，「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已經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還有嚴重的缺點。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6]

在此前後，報紙上開始報道各地開展整風運動的消息。如陝西、西安、青島、黃岡等地黨的機關開始學習整風文件，「山西省全面展開整風運動」。[7]中共河南省委召開了全省縣委書記以上幹部會議檢查和總結工作，「揭發和批判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等缺點和錯誤」，並確定今冬明春要組織全省幹部通過系統學習文件，「提高思想認識的基礎上，整頓和提高幹部的思想作風」。[8]劉少奇甚至向印度共產黨代表團「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整風經驗」。[9]

這裏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最初提出的整風方式主要是加強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而且是在黨的內部進行，這與後來開展的邀請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的整風運動是有重大區別的。[10]第二，之所以選擇「學習文件」和「思想教育」的方式進行整風，是因為在毛澤東看來，中共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與蘇共相比，雖然也有，但是並不多。不過，毛澤東很快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2 準備開展整風運動

1956年10月連續發生的波蘭和匈牙利的動亂，給中共敲響了警鐘。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國重演，這是八屆二中全會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就在這次全會的最後一天，11月15日，毛澤東作總結報告時指出：「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鄭重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至於方法，毛澤東指出，「上半年發通告，下半年整風，中間隔幾個月」，「預先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這是一種小民主的方法」。毛還強調，「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11]

可以看出，毛澤東要在黨內整風的決心更堅定了，至於整風的方法，已經不僅是「學習文件」了，而是增加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內容，只是強調要通過「小民主」、「和風細雨」。箇中的原因，大概如國外研究者注意到的，「全會公報的用詞表明」，開展整風只是毛澤東「個人的呼籲而不是官方的指示」。[12]可以印證這種判斷的是，胡喬木11月23日在社會主義學院講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時，反覆講到反對官僚主義和實行民主化，卻對整風隻字未提。[13]也就是說，中共中央此時

尚未就開展整風運動問題形成一致意見，更沒有作出決議。這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毛澤東在三個月後再次提出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張時，把啟動日期推遲了半年。

從當時黨內幹部的一般理解看，這次提出的整風，仍然是一次思想教育運動。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在傳達全會文件時講到，中央的意思就是在這次整風中，一定要搞徹底，不是颳一陣風，不是搞突擊式的運動，不要來個突然襲擊，不要損傷元氣。也就是說，不是採取暴風驟雨的大民主的做法，而是用微風細雨的小民主的做法，事先充分做好思想準備，以達到提高幹部思想覺悟水平，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目的。[14]甚至幾個月後，康生在作報告時仍然認為：「二中全會主席提出準備開展整風運動」，「這是一個新的學習運動，通過這個運動，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15]

在1957年1月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在講到黨內和社會上的思想動向及少數人鬧事問題時，重點談的是如何防止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在中國的重演。講到要讓民主人士「唱對台戲」，對有些人要「後發制人」，甚至提到是不是有人想復辟？[16]於是如前所說，有不少人認為，從這時起，毛澤東已經在考慮發動反右派運動，而且開始設計「引蛇出洞」的策略。筆者以為，這種理解過於簡單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澤東看到了對中共政權可能造成威脅的三種情況，即黨內外知識界的「奇談怪論」、群眾鬧事和黨員幹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擔心和關注的是後兩者。儘管談到有人（特別點名是民主人士）可能會反對中共政權時言辭尖刻，但那畢竟只是極個別的情況，因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而所謂「後發制人」的策略，則是毛澤東在處理這類問題時的一般方法和思維邏輯。從長期的發展看，人民內部矛盾將成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執政黨的工作中心應該轉入如何正確處理大量出現的新問題——群眾不滿情緒引發的社會動亂和幹部的官僚主義、腐化墮落，況且後者往往是造成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

情況確實如此。據新華社的報道，當時中國社會大量出現的罷工、罷課、退社和遊行請願等現象，究其根源都在於執政黨本身的錯誤和問題。[17]特別是波匈事件以後，關於中共幹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報告驟然增加。如「江蘇省少數基層幹部作風惡劣、橫行霸道」，「內蒙古農村幹部強迫命令非常嚴重」，「滄縣專區部分農村基層黨員幹部的命令主義傾向」，「河北省各地基層司法機構中存在的問題」，湛江市部分機關和幹部「官僚主義十分嚴重」，江蘇省少數機關「強佔民房嚴重損害群眾利益」，蘭州市一些部門的黨員負責幹部「官僚主義很嚴重」，河北省縣級以上機關、企業部門「機構龐大，人浮於事」，天津國營工

廠「幹部的命令主義、懲辦主義作風嚴重」。[18]進入1957年後，情況更加嚴重。新華社福州1月12日訊，中共莆田縣委召開三級擴大幹部會，與會的504名區、鄉主要幹部中，70%左右都有強迫命令、貪污腐化的情況，致使黨群關係十分緊張。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也暴露得更多。江蘇省震澤縣沒有一個統戰對象，卻設有統戰部；江都縣沒有山林地區，但卻設有林業科；淮陰專區有些縣沒有工廠，也成立了工會，還要收會費。浙江省吳興縣部分鄉幹部強迫命令作風嚴重，已經發展到違法亂紀的程度：如鄉幹部捆綁、吊打群眾，私設監牢和公堂，任意關押村民，甚至遊街。[19]還有報道說，湖北省部分農村幹部中存在較嚴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闊氣、比排場；怕下鄉、怕進落後社、怕進山、怕勞動。[20]

毛澤東不得不把注意力再次轉向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大量的人民內部問題。

[1]中央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1956年6月17日，載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頁1153—1154。

[2]參見彭真：〈克服官僚主義作風〉，1956年8月16日，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6）》（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652。

[3]《內部參考》，1956年5月30日，頁557；7月3日，頁19—20；9月13日，頁320—323；9月17日，頁450—452。

[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93—304。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01—102；《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頁5—8。

[6]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7—10。

[7]《人民日報》，1956年9月1日、10日、12日、16日。

[8]《人民日報》，1956年11月5日。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75。

[10]有很多人認為整風是從1956年9月中共八大開始醞釀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604；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449），恐怕是沒有看到兩者之間的差別。

[1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13—329；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612—613。

[12]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頁276。公報的用詞是「毛澤東同志號召」「採取整風方法，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作鬥爭」。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11月16日。

[13]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77—91。

[14]陶鑄傳達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結論（記錄稿），1956年11月15日。

[15]康生在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3日，雲南省檔案館，7-1-867，頁28—33。

[16]詳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30—362。原記錄稿見吉林省檔案館，

1-13/1-1957.69，頁1—4。

[17]詳見本書第六章。

[18]《內部參考》，1956年10月31日，頁1349—1350；11月13日，頁331—332；11月28日，頁683—685、685—687；12月7日，頁136—138、138—140；12月11日，頁215；12月12日，頁239—240；12月25日，頁521—522、頁527—528；12月27日，頁598—599。

[19]《內部參考》，1957年1月12日，頁227—228；1月22日，頁425；2月22日，頁325；2月26日，頁381。

[20]《內部參考》，1957年3月14日，頁251—253。

二 開展黨內整風運動的指導思想

1957年2至3月，毛澤東在兩次重要會議上發表講話，再次提出要開展整風運動，並反覆論述了開展黨內整風運動的指導思想，即如何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毛澤東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通過擴大民主，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改變黨的作風，化解社會矛盾。這兩個講話，尤其是第二次講話，在黨內外引起了熱烈反響，有人贊同，有人反對，有人歡喜，有人憂慮。但無論如何，毛澤東是決心按照自己的思路嘗試一下。

1 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講話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了一個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試圖用「兩類矛盾」這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哲學語言，解釋國內發生的種種問題，並給執政黨提供指導性方針。[1]毛本人說，他這個講話所談的問題已經「在心裏積累了很久」。[2]

所謂「兩類矛盾」，是指「敵我矛盾」（第一類）和「人民內部矛盾」（第二類）。僅就這兩個概念而言，毛的講話不是首創。[3]不過，從波匈事件之後，毛就開始頻繁地使用這些概念，如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在12月4日致黃炎培的信中，毛澤東已經勾勒出他關於「兩類矛盾」的基本觀點：「社會總是充滿着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4]儘管如此，要在大會上全面闡述這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毛澤東還是格外認真地做了準備。[5]

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中共高層幹部，還有許多黨外人士，總計一千八百多人。講話一開始，毛澤東就開宗明義地說，他要講的是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指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類性質不同的問題。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兩類問題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專政就是解決敵我之間矛盾的」，而「這個專政制度，不適用人民內部的範圍」，在人民內

部則是「民主問題」。

轉到民主問題，毛澤東說：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出來後，有些人很高興，也想「來一個大民主」，他們的所謂大民主就是幾十萬人到街上去。但是，從古以來，所謂大民主，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都是對付敵對階級的。有一些同志和黨外朋友對這個問題搞不清楚，另外有少數人是有敵對情緒的，他們希望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一下。接着，毛澤東批評說，有些人幼稚，以為我們的民主太少了，歐洲的民主好，人民代表大會不如西方議會，主張兩黨制，他們要有兩個通訊社，唱對台戲，還有人主張取消專政，說民主才是目的。毛解釋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歸根結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有人說外國的自由很多，我們的自由很少。實際上，「沒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階級的自由、具體的自由」。

顯然，毛澤東對民主和自由的理解仍然沒有離開階級鬥爭的軌道，而這些話自然主要是說給那些呼籲大民主的少數人聽的。這時，講話還沒有進入主題。

主題是執政黨應該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說：思想問題、人民內部問題，不能採取粗暴的方法來解決。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思想方法，解決精神世界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這是錯誤的。用行政命令壓制的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這是沒有立場的，是有害的。凡屬思想方面的問題，應該用討論的辦法、辯論的辦法、批評的辦法、教育的辦法、說服的辦法來解決，使人家信服你。毛澤東以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為例警告說：「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由第一類矛盾轉變為第二類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爭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方法，就可能成為對抗的矛盾，那就變成第一類矛盾了。」在此，毛澤東批評了蘇聯的做法：「斯大林很長時期內把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比如不滿意政府，不滿意共產黨，批評政府，批評共產黨，這是兩種人，有敵人的批評，也有人民的批評，應該加以分別。斯大林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差不多是不加分別的。只能講好話，不能講壞話，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批評；如果批評，就懷疑是敵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險，就有殺頭的危險。」毛也批評了匈牙利：因為過去根本沒有肅反，反革命分子殺得很少，所以才出亂子。至於中國，毛澤東雖然承認在肅反中也曾混淆過兩類矛盾，但和別的國家比較起來，我們做得還是比較好的，沒有蘇聯那麼「左」，也沒有匈牙利那麼右。

正是因為通過鎮反和肅反正確處理了敵我矛盾，毛澤東認為匈牙利

事件不會在中國重演。他非常自信地說：匈牙利事件後，人們說中國局面很穩固，外國人的看法是如此，我們也有這樣的感覺。總之，國內「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在這個前提下，毛澤東開始談論人民內部的種種問題。諸如對合作化的評價問題，資本家的思想改造問題，青年學生的政治學習問題，以及關於工商業者安排、失業人員就業、中小學畢業生升學的問題。

既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各種不同矛盾，就必須予以解決，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採取與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考慮到這兩個方針自1956年春天提出來以後黨內存在的疑慮，毛澤東首先強調，百花齊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爭鳴就是也可以講唯心論，但是這沒有甚麼要緊的，對毒草和錯誤言論批評就是了。比如「中宣部有個幹部叫鍾惦棐，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得一塌糊塗，絕對的壞，否定一切。現在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6]

不過，毛澤東着重要談的是對雙百方針表示懷疑和反對的意見。1957年1月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軍隊文化幹部陳其通、馬寒冰、陳亞丁、魯勒的來信〈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該文認為，在過去的一年，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愈來愈少人提倡了；有些人利用批判「公式化、概念化」為藉口，反對藝術應為政治服務、藝術要有高度思想性、藝術應作為教育廣大人民的武器。毛澤東敏銳地指出，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實際上是懷疑雙百方針，似乎實行這個方針，就沒有大作品和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了。毛澤東明確地說：「我現在表示我的態度：我不贊成那篇文章，那一篇文章是錯誤的。」[7]想到蘇聯對雙百方針的懷疑態度，毛澤東更生氣地指出，《真理報》不登陸定一的文章，就喜歡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捷克和波蘭也刊登了，「氣味相投」，「教條主義就喜歡教條主義」。毛澤東還提到了青年作家王蒙那篇批評官僚主義的小說，尤其對於那些圍攻王蒙的批評意見表示不滿。從這些事情中，毛澤東得出一個印象：「我們許多幹部中間，實際上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不是我這話說得過了一點？我說高級幹部中十個有九個不贊成，或者半不贊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認為這方針是正確的是少數。」

關於執政黨普遍關心的「少數人鬧事」問題，毛澤東首先指出，事物都有兩重性，同匈牙利事件和批評斯大林一樣，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這許多事，又好又不好。至於鬧事的原因，無非是領導和群眾兩個方面，但首先是領導的責任。所以，講到如何處理罷工、罷課，遊

行請願這類事件，毛澤東提出的第一條就是克服官僚主義，當然「拿刀子殺人得到公安局坐班房」。

毛澤東這洋洋灑灑四個小時的講話，既批判了教條主義，也批判了機會主義，既提倡百花齊放，也強調鏟除毒草，可以說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考，似乎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到3月1日下午作總結報告，毛澤東在回答分組討論和大會發言提出的一些問題時，就顯得有比較強的針對性了。[8]

有人提出，馬列主義能不能批評？可不可以將馬列主義規定為指導思想？毛回答，共產黨的思想就是馬列主義，而人民民主制度就是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思想。問題是如何領導和指導？並非要一切人都進共產黨，都相信共產黨的道理，都講唯物主義世界觀，強迫人相信馬列主義世界觀也是不能的。馬列主義是不怕批評的，如怕批評，就不是真理，如果一批就倒，那就不是馬列主義了。

有人問，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毛肯定地說，可以批評。老幹部一批評就倒，那就應該倒。怕批評的人就是有弱點，有弱點就要批評。老幹部、新幹部都有弱點，都要批評；政府有缺點也應該批評。批評得當，當然好，批評不當，也沒有甚麼，言者無罪。人民內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評權；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還有人問，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究竟有多長？毛說，「長期」就是共產黨有多長，它就有多長，共產黨的壽命有多久，它就有多久。至於如何監督，毛說，主要通過批評和建議來監督，批評、建議有各種機會，今天開會就是個機會。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改進工作。批評是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的主要的方法。

有人提出，說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但又說可以罷工罷課，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毛答，大民主就是群眾運動，階級鬥爭。過去我們好些做法是這樣，如肅反、土改。現在社會改變了，遺留的問題主要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說這個「小」不夠，再來一個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風細雨比較好。毛解釋說，現在我講的是有些機關、工廠、學校、合作社連那樣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沒有，就只有官僚主義，這樣就逼出一個大民主，所以出來罷工罷課了。憲法沒有罷工的條文是不好的，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在全國範圍內提倡罷工罷課。我們是提倡用批評的方法解決問題。只有對那些個別的、嚴重的、頑固的官僚主義，才用罷工罷課來解決，首先還是反官僚主義。

講到百花齊放，毛提出要擴大《參考消息》的發行，過去是二千份，現在擴大為三十萬份，要把帝國主義罵我們的和他們發生的亂子，

作為內部刊物印出來，讓我們見見世面。毛甚至表示贊成出版蔣介石全集。

從這些問答中可以看出，聽眾的思想還是比較保守，而毛的講話則顯得比較輕鬆和開放得多。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告訴與會者，他的講話還要補充，不準備全文發表，免得引起全國性罷工罷課，給地方官員帶來麻煩。[9]顯然是感到言猶未盡，毛澤東接着說，最近要召開宣傳工作、報紙工作會議，他還要講一次話。

2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講話

中共黨內對毛澤東的主張，特別是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存在着疑慮和異議。北京市委承認，對於中央提出的這些方針，直到最高國務會議前，「沒有進行過系統的討論，黨內幹部包括我們在內，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很不深刻的，並且還有許多糊塗思想，許多同志對這一方針實際上是不贊成或不完全贊成的，相當一部分同志包括市委有的負責同志對陳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有同感」。[10]這種情緒是有目共睹的，就連黨外人士也看得很明白。被邀參加宣傳工作會議的著名翻譯家傅雷認為：「主要是因為『百家爭鳴』不開展，教條主義頑抗，故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過話後，立即由中宣部電召全國各省市委宣傳文教領導及黨內外高教、科學、文藝、新聞出版的代表人士來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11]3月5日，中宣部長陸定一發表文章盛讚40年代的整風運動，最後點明中共要「安排一次全黨範圍的新的整風運動」，紀念延安整風運動的「目的就在於說明這一點」。[12]

宣傳工作會議從3月6日開到13日。與以往不同，這次宣傳會議邀請了科學、教育、文藝、新聞、出版各界160多名非黨人士參加，比例達全體與會者的五分之一。[13]會議的議題是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研究思想動向和意識形態問題。程序是先聽毛澤東的講話錄音，然後分組討論，最後是毛澤東講話。不過，會議期間毛澤東並沒有閒着，他連續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了幾次小範圍的座談會，一邊聽匯報，一邊談意見，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想法。

3月6日晚上，毛澤東召集九省市黨委宣傳部、文教部部長座談會。針對黨內的疑慮，毛澤東首先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問題是很多，黨內思想也很混亂，但是不要怕，要放手，有好處。毛澤東同意當前的思想鬥爭都可以概括為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說法，但強調必須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毛說，百花齊放，資產階級思想的出現會多起來，但並非都是資產階級思想，並非一無可取，

扣帽子會把人嚇倒。許多資產階級思想暴露出來是好事，我們才得到機會去進行教育。問題是我們現在有些文章沒有說服力，企圖壓服，壓是壓不服的。「我們如何對付不正確思想？要有方法，不要急躁，不要簡單，應該研究方法。」「現在是轉變時期，大變化時期，在觀念形態上一定要有所表現的，但99%或還要多一點是能夠教育過來的。」「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當然在放之中任何錯誤的東西都應該批評。現在放夠了嗎？鳴夠了嗎？不夠的。人家還在猜我們的意圖，認為我們是『誘敵深入』，因此必須再放。現在開宣傳會議，大家同意這方針，要很好研究方法。（一）黨員不忙於寫文章，讓黨外先寫，當然要領導。（二）黨員也應當寫，但必須是要有說服力的，有研究的，有分析的，而不是形而上學、教條主義的方法。」「我們應該採取幫助人家改正錯誤的態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態度。」[14]

3月7日晚上，毛澤東又召集了文教廳局長座談會，談了下面一些問題：教學計劃、教科書都是全國一致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問題？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還有私立中學？私立中學還是可以辦的，辦了之後政府不要去接收。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要加強學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傳部長、一位教育廳長親自抓這項工作。中學應當有政治課。黨委應當指導青年的思想，指導教師的思想。要責成省委、地委、縣委書記管思想工作，管報紙、學校、文學藝術和廣播。[15]

3月8日晚上召集的是文藝界人士座談會，邀請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趙丹等著名作家和演員參加。座談中，老舍提出了能不能寫悲劇的問題，對那些有官僚主義的人，能不能把他寫失敗、寫死。毛澤東肯定地答覆：對官僚主義當然應當批評，有個電影《光榮屬於誰》，裏面那個鐵路局長是官僚主義，結果局長還照樣當——這樣的幹部應該撤職！這樣寫，就叫做不徹底，反官僚主義應該徹底。談到文學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批評官僚主義，毛澤東說：「恐怕要來大民主才行！」接着，毛談起了整風打算：「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還沒有展開。中央委員會要開一次會，發一個指示，今年準備，明年開始，這也要醞釀一個時期。決議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來。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哪種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還不一致。要整風，那時就好批評了。」討論文藝政策時，毛澤東又一次提到王蒙：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多長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着幫助他嘛！談到電影，毛澤東對趙丹說：《武訓傳》曾受到批評，那沒有甚麼，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提起戲

劇，毛說：對一些傳統劇目過去我們禁了幾年，別人有些反感，現在放開了，也可以批評，但批評要說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戲，看看也可以。[16]

3月10日下午召集的新聞出版界座談會，氣氛顯得更加活躍。徐鑄成回憶說：「我們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門口等候，聽到康生逐一介紹，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着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多翻翻其他報紙。』對於主席的讚賞，我心中湧起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17]

這次座談一問一答，討論十分熱烈。說到上海1872年創辦的《申報》解放後就停刊的情況，毛說：取消沒有道理，人家是出了幾十年的老報紙了嘛！得知《申報》已經改做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毛又說：改了就不好辦，如果把它改回來，又好像是復辟了，但是這問題得好好研究一下。說到思想動態，毛澤東說，目前思想偏向有兩種：一種是陳其通、馬寒冰他們幾個那一類的教條主義；一種是鍾惦棐那一類的右傾機會主義。毛指出：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條主義，我就看不下去，簡直強迫受訓。鍾惦棐這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聽說要撤鍾惦棐的職，毛說，我看也不必撤。電影的問題本來就很多，老演員、老導演一肚子氣，應該讓他們發泄發泄。

有人提到出版界有一句「怪話」：「心中有領導，編報無自由，讀者不愛看；心中無領導，編報就自由，讀者就愛看」，並指出這個說法有原則性錯誤。毛不以為然說：這也要具體分析。報紙是要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馬克思主義是按情況辦事的，情況就包括客觀效果。群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麼高明吧！使編報的人感到不自由，編出來的報紙群眾不愛看，這個領導一定是教條主義的領導。

談到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問題時，大家認為沒有幾條準則，很難掌握尺度。毛澤東說，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在文學、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這時，毛澤東又一次透露：整風運動明年正式開始，今年先發一個指示，讓大家有個準備，有一個非正式時期。在這個時期，你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自己檢查出來，把它改了，以後就不追究。

談到辦報，毛澤東承認，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歷史也很短，全國性辦報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有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不過是一個小指頭。我們拿手好

戲是打仗、專政，文藝有一點，人也不多。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半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至於具體的科學技術，比如地質學，共產黨是不懂的。

有人建議：現在問題很多，是否可以專門開一次會議來討論總結一下？毛澤東說：這次只是提出問題，過一會還要開會討論。接着毛講了一些他思考已久的話：「現在我們國內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人民內部矛盾突出，於是就有一股風，說批評多了，說人民鬧事，惶惶不可終日；另外有些人，又覺得不過癮。有人要收，有人要放。中央的方針到底怎樣，大家都要來摸底，其實中央也沒有甚麼另外的底，方針就是那麼一個，不過有了些新問題。」罷課罷工都沒有甚麼了不得，「問題湊起來，就顯得嚴重。這樣的事情，今後還有。人民內部，絕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有許多民主黨派，還有無黨無派民主人士。現在是社會大變動，思想混亂就是反映了這個大變動，不反映出來倒是不可理解的。官僚主義是鬧事的直接原因，因為官僚主義，又不肯改，群眾就會鬧事。」[18]

關於這次座談，徐鑄成還有一段回憶值得一提：

> 毛主席最後問道：「各位在開展『雙百』方針中，還有甚麼具體困難沒有？」我說：「我們《文匯報》在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後，立即遭到有組織的圍攻（指當時任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張春橋鼓動的圍攻）。我理解『雙百』方針在政治上的意義，是高價徵求批評，讓人暢所欲言。現在一圍攻，別人就把話縮回去了。有正面或反面的意見，也不敢盡量發表了。」毛主席回答說：「你的意見很好。這樣罷，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寫個小結。這樣，批評、反批評、小結。正、反、合，這是辯證法嘛。你的意見怎麼樣？」我說，主席考慮得很周到，我完全贊成。[19]

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中宣部辦公室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對於編入其中的三十三個問題，作了二十二條批註，很能反映他的思考。關於「不少科學家認為黨不能領導科學工作」，毛批：有一半對。關於「目前文藝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傾向很嚴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又確實有些抬頭，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險」，毛批：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險，而應按具體問題處理。對於「報刊上是否允許發表和黨不同的主張？就是說黨的政策和黨、政府的工作方針能否在報刊上爭鳴？」「中央政府各部有些措施不當，在沒有經過中央和地方政府商妥以前，地方報紙能否批評？」「報紙的黨性和人民性應該如何統一？如何理解？」毛均批註：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對於「經典著作是不許懷疑的」的說法，毛批：不許懷疑嗎？對於「黨的政策是否允許懷疑？對黨的政策的懷疑的意見是否允許爭論？」毛批：為甚麼不允許爭論呢？對於「黨員在理論上懷疑或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個別原理是

否允許？如果根本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理論，可否留在黨內？」毛批：前者是肯定的，後者是否定的。關於「如何克服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學中的教條主義？」毛批：就是允許批評、爭論。關於「黨章規定，學校黨組織具有領導和監督行政機構和群眾組織的職能」，毛批：此點值得重新研究。[20]毛澤東在後來的一系列講話中，發揮或發展了上述批註中的想法。

3月12日下午，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毛澤東到會發表講話，講了七個問題，可以看作是對前幾天討論的眾多問題的總結。歸納起來要點如下：一、中國正處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這個變動比過去更加深刻。全國各個階級相互關係都發生變化，所以各種不同思想都有所反映，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個大變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新制度要經過好幾年才能鞏固。二、知識分子中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有敵對情緒的只是極少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愛國主義者，擁護社會主義，其中許多人對馬克思主義不習慣，有懷疑，所以對知識分子要進行思想改造，但不能強迫他們接受馬列主義。三、有些人好像講階級鬥爭為主就舒服一點，講人民內部矛盾為主就不大舒服，不那麼過癮了。八大作了結論，人民內部矛盾突出了，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都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四、關於放和收，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贊成收，就是要放。有些人怕亂，亂也好，亂才有辦法，亂然後治。中國不會出現匈牙利事件，就是出了也不怕。大民主不許可，小民主又沒有，連小小民主都沒有，那就非逼上梁山不可。五、共產黨準備整風，中央決定今年準備，明年普遍展開，黨外人士可以自願參加。主要整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整風的方法和延安時一樣，就是學習文件，自我批評，也可以批評，用小民主，和風細雨。最後，毛澤東肯定，這次會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是有益處的，開得很好。他說：我們有兩種會，一是黨內的會議，一是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會議，這次會議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來開，是第三種會，是好的形式。[21]黨內整風邀請黨外人士參加，這個說法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來的。

或許是受到與黨外人士輕鬆談話時的樂觀情緒影響，或許是受到黨內外聯合召開會議的新形式的啟發，這時毛澤東感到共產黨整風需要來自黨外的幫助和推動。不過，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對於他所倡導的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氛圍中的整風運動，黨內外的反應卻截然相反。

3 根本對立的黨內外反應

可以想到，對毛澤東講話反應最熱烈的是知識界和民主人士。

徐鑄成回憶了3月8日在政協禮堂聽到毛澤東最高國務會議講話錄音後的感受：「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國內形勢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等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從錄音裏聽到他在講話時，不時引起哄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馬寅初等同志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22]章伯鈞聽了毛的講話後也是「興奮異常」，立即在民盟以個人名義進行了傳達，民盟還印發了講話記錄稿。章對「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評價甚高，認為「老毛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雖是矛盾論的延續，但有其創造性。這個概念還是一把時代的鑰匙，運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方式」。儲安平看到講話的傳達稿後也異常興奮，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23]

章詒和對此有一段精妙的評述：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和章儲二人一樣，他們的內心渴望着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而毛澤東的講話，則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渴望和需要。[24]確實如此，上述幾位名人都是在聽到毛澤東那番激動人心的講話後，決心投入整風運動的，但又都在後來的反右中被打成「大右派」。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此時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究竟是真心實意，還是預設圈套？這裏不妨再聽聽當事人的感受。當時參加會議的作家舒蕪認為，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說：「我為甚麼有這樣一個的判斷呢？就是因為我親自聽了他的講話。一個人假也不能假到那個程度吧，何況是毛澤東。這種感覺只有到了現場才會有。」[25]

傅雷當年在給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覺和理解講得更加具體：

>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彷彿一批評機關缺點，便會煽動群眾；報紙上愈來愈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問題，2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

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地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26]

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之後，3月6日至20日，全國政協召開二屆三次會議，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黨派也先後召開會議。與會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間接聽過毛澤東的講話，反應極為熱烈。與會者眾口一詞，表示擁護毛的講話。[27]人們談論最多的就是「雙百方針」：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稱讚這一政策可以「保證我國學術的正常發展」。[28]民盟副主席羅隆基認為，這是「掃除黨與非黨間隔膜，加強團結的對症良方」，「不僅可以減少鬱積，消除隔膜，並且是是非愈辯愈明，真理愈爭愈顯，百川異流，總是同歸於海」。[29]

毛的講話傳達下去之後，反響更大。3月25日開始，中共北京市委召開了為期八天的宣傳工作會議，一千四百多人參加，包括二百九十多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會議期間還分別召開了教育界、文藝界、醫務界、體育界等五個座談會，徵求意見。與會者頌揚毛的講話提出了調整人民內部矛盾關係的極為重要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中國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大發展」。歷史學家陳垣說，毛主席講人民內部矛盾時，常常「反求諸己」，在知識分子本身來說，也要有「反求諸己」的精神。青年作家王蒙也認為參加這次會議是「勝讀十年書」，對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課題。在貫徹「雙百方針」方面，人們批評北京市「放」得不夠。如有人把不是毒草的作品也當成毒草，壓制了鳴放。也有人怕「放」出毒草使群眾中毒，怕造成思想混亂，不好領導。藝人演員對文化工作提出意見，反映上級領導過多干預作品創作，抱怨「搞老的不對，搞新的不行」，在劇團工作上「重公輕私，重大輕小」。高校教師則認為，一些黨員和黨外知識分子還是有隔膜，表面上客客氣氣，思想上見面不夠，互相「敬而遠之」；有些單位黨組織發揚民主不夠，重大事情和黨外人士商量不夠，民主黨派的作用發揮得也不夠。[30]

從3月中旬開始，上海各界陸續傳達和討論了毛的講話。人們的普遍反映是：毛主席這個關於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又一個重要發展，它把我們的思想水平又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聽了這個講話以後，對目前國內生活中的許多矛盾現象，都得到正確的解答了，眼界打開了，對今後的事業也更加充滿了信心。「好些過去不肯說話或不多說話的人，這次都解除顧慮，滔滔地暢所欲言。好些座談會上都有激烈的爭論。」其中，黨與知

識分子的關係，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毛主席這次的講話給上海知識分子以很大振奮，大家「分析了過去產生某些粗暴作法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把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對自己人錯用了對付敵人的方法」。許多知識分子在會上都表明了今後應當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的心願，「要教育人民，自己就首先得受教育，向群眾、向實際學習」。上海作家協會小說組討論中嚴格地批評了教條主義。有人說，上海的教條主義勢力很強，贊成大膽放的10%也不到。如果不打垮教條主義，「放」、「鳴」是有困難的。《新民晚報》一位黨外人士說：過去有個朋友把百家爭鳴比作捕鼠機，老鼠看見肉，伸出頭來，就被捕鼠機扣住。在未到北京開會前，他也同意這個看法，現在他是信服百家爭鳴了。上海電影製片廠編輯處人士對工農兵的方向提出看法：「是否只有工農兵題材才有香花？」有人說，「過去我們所以接受教條主義，因為自己頭腦中也有教條主義。」戲劇界有些人主張放，但認為同時必須加強領導：「放不是說不要社會主義，而是『放』出來讓大家認識。領導幹部不能決定那個要那個不要，但也不能不管。如何加強領導是個大問題。」工商界爭論最熱烈的一個問題，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的性質問題。聽了毛的報告以後，工商界許多人感到「心定了」。有些人對提出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還是思想不通，認為這樣打擊了資本家的積極性。但更多的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不要改造的只是少數，主要是放鬆改造，原因是主觀上因定息七年而有『篤定』思想，客觀上是民建和工商聯工作沒有搞好」。總之，這種討論已成為「上海知識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給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氣」。[31]

其他各地也都紛紛進行了討論，如山西省宣傳工作會議到會682人，包括黨外人士92人。大家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傳達後，「激起了強烈的思想反響」，「一致感受到受了莫大的啟發、教育和鼓舞，眼界擴大了，思想開朗了」。會議「展開了熱烈的毫無拘束的討論」，「有人反映自己憋在肚裏多年的話都倒出來了，有人反映自己思想上是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彎」。[32]正像社會學家費孝通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所說：「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33]

當然，從毛澤東講話的理論邏輯來看，也可以找出後來轉向反右運動的痕跡。儘管從1月到3月，他的講話一次比一次開放，但始終堅持了一條底線：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能被質疑的。對於他所視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異己力量，毛一直保持着警覺，幾次講話若隱若現。即使是「雙百方針」，按毛講話的邏輯，「百家」最終只是「兩家」，到底還是在階級鬥爭的框架內。多少年以後，徐鑄成才明白：「毛主席一天到大會講話，說百家爭鳴，歸根到底是兩家：

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我和出席大會的大多數代表一樣，頭腦發熱，沒有體會出他老人家的深意。」[34]不過，這個解釋只能說明從整風轉向反右的思想和理論基礎，並不能證明毛澤東此時已經在設置陷阱。

1957年初毛澤東的講話，究竟是誠心希望聽到黨外的批評意見，還是懷有不可告人的陰謀？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不是在人們的感覺，而是要搞清一個問題，即毛澤東此時提出整風的目的何在，是要打擊黨內的「三害」，還是要批判黨外的錯誤或反動言論？從前引（當然不是後來修改的）毛澤東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看，答案顯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擔心的主要也是黨的隊伍脫離群眾，腐化墮落，而他的主張正是在黨內遇到了重重阻力。

對同樣的講話，地位不同，感受自然各異。全國作協黨組副書記郭小川聽過毛澤東的講話錄音後，在3月9日的日記中寫到：「毛主席明明說要『教育小資產階級』，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大王國，而有人卻完全無視這一點，似乎現在的問題就是反官僚主義的問題了。」[35]黨內幹部聆聽毛教導時的心態和情緒，由此可見一斑。 《人民日報》曾報道，在九三學社舉行的兩次座談會上，許多著名學者專家認為：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一次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以後，已經引起了黨內外知識分子、幹部和群眾的普遍重視，許多人已經敢於起來大膽地爭鳴。但是，在貫徹執行黨中央的這些方針上，仍然存在着許許多多的障礙，而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來自黨內和領導機關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36]這種看法符合事實，因為大多數黨員幹部對毛澤東的講話抱着懷疑的態度。

在3月25日召開的北京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很多幹部對毛澤東的講話表現出憂慮和懷疑。講到「雙百方針」，「大家都贊成放，但仔細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種種顧慮」，他們「怕天下大亂；怕以後工作不好做，不好領導；怕放了毒草，群眾會中毒」。有人說：「百花齊放，放就是收，放了緊接着要收。」有人說：「收是絕對的，放是相對的。」不少人直截了當地提出：「毛主席說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這篇文章，卻看不出有甚麼不好。」[37]

湖北省委的報告說，毛澤東的講話傳達以後，在許多單位的幹部中「還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和顧慮」，「有些黨的幹部（包括一部分領導幹部）大吃一驚，他們懷疑人民內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們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認為人民群眾鬧事要「由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負主要責任，是不公平」。對於在基層單位放手發揚民主和執行雙百方針顧慮重重，怕「放」出錯誤的東西來難以收場，說「放」也可以的，但是

「要首先解決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38]

甘肅省委報告，絕大多數人對中央的方針「都程度不同地表示贊成」，「一般說來，黨外比黨內接受的快，情緒高」，黨內也受到「很大震動」。但是部分幹部，特別是黨員幹部，「在思想上還有程度不同的懷疑和顧慮、甚至抵觸情緒」。在高級幹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數人「是原則上通了，也認為中央的方針、政策完全正確，表示擁護。但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與本單位和自己有直接關係的具體問題時，就不通了」。還有極少數人「抱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認為「革命幾十年都沒叫人監督，現在革命勝利了反倒要叫人監督了，真想不通」。「黨外人士、知識分子現在更囂張了，不把他們整下去總不甘心」。[39]

山西省委的報告更加具體：毛澤東的講話在各級幹部中傳達後，「爭辯之多，是空前的」。「多數人表示擁護，但對若干原則問題抱有懷疑和抵觸情緒」，他們提出，如此強調擴大民主「是否會助長極端民主化？」「現在已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再要擴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認為「鬧事沒好人，好人不鬧事」，「不承認鬧事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也有個別人「公開表示懷疑和反對」，他們提出「這次毛主席報告的精神是否右傾了」，認為「毛主席的報告替民主人士、知識分子、資本家和過去的地主、富農說的話太多了，而替勞動人民說的話太少了」。「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於剝削家庭，他們畢業後都將當幹部，難道毛主席就不怕重複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嗎？究竟還要不要專政？誰專誰的政呢？這真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40]

就筆者看到的資料，上述情況，在黑龍江、廣西、四川、廣東、浙江等省委的報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41]

在農村基層幹部中，懷疑、抵觸和反對的情緒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質問：「這個報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傳達錯了。」有人說：「過去聽了傳達毛主席關於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裏，今天聽這個報告實在聽不進去」，甚至認為「毛主席這個報告太右傾了」。大多數基層幹部都不同意把這個報告再向下傳達或貫徹。關於兩類矛盾，有的支部書記說：合理提意見的是內部矛盾，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敵我矛盾。還有人認為，成份好的人鬧事是內部矛盾，富農和政治上有問題的人鬧事就是敵我矛盾。對於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對農民能用，對富農、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對貧農能用，對富裕農民不能用；對先進地區能用，對落後地區不能用。至於雙百方針，認為城市可以實行，但農村不能貫徹。由於感到「黨給群眾撐腰，不給幹部

留臉」，不少基層黨員幹部工作消極，想躺倒不幹，甚至有的提出退黨。[42]

所有這些材料，無論是來自上層還是基層，無論是黨內報告還是新聞報道，反映的情況都是一致的。面對如此難堪的局面，毛澤東感到，必須親自出馬，再次進行動員。

[1]以下所引毛澤東的講話，如無特別註明，均出自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2月27日。這個講話在正式發表前經過了重大改動，而修改的過程恰恰是從整風轉向反右的過程。

[2]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紀要（記錄稿），1957年3月10日。

[3]據筆者所見文獻，劉少奇在1951年就有「敵對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提法。見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92—99。

[4]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514。

[5]毛澤東不僅準備了書面提綱，甚至還在一次只有三十七人參加的小規模會議上進行了試講。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頁310—315；《毛澤東傳（1949—1976）》，頁620。

[6]鍾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幹部，後調任《文藝報》編委兼藝術部主任。他以「文藝報評論員」的名義，在《文藝報》1956年第23號發表文章〈電影的鑼鼓〉，又以「朱煮竹」的筆名，在1957年1月4日的《文匯報》發表文章〈為了前進〉，批評電影創作中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7]毛澤東近乎憤怒的表態是事出有因的。《人民日報》刊登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後，一直沒有表態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毛澤東擔心「有人會以為他們的文章代表了中央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談談的必要」〔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紀要（記錄稿），1957年3月10日。不過，在正式發表的文本中沒有這句話。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49—255〕。於是在1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期間就談到這篇文章說：「這幾個同志對黨是忠心耿耿的，為了黨的事業的；但文章則不堪領教。」〔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要點（陶鑄記錄稿），1957年1月〕但是傳達下去時，毛的話只有前半句，沒有後半句〔毛澤東同文藝界的談話（記錄稿）：1957年3月8日〕。費孝通也談過誤傳毛澤東對該文評論的情況（《光明日報》，1957年5月31日）。

[8]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日。

[9]據胡喬木後來說，毛當時不想發表講話的原因是「怕別的國家接受不了」。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3—24。

[10]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傳達和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情況向中央的報告，1957年5月4日，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245—251。

[11]傅雷致傅聰信，1957年3月17日，載《傅雷家書》（北京：三聯書店，1994），頁157。

[12]《人民日報》，1957年3月5日。

[13]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630—631。

[14]毛澤東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稿），1957年3月6日。

[15]《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44—248。

[16]毛澤東同文藝界的談話（記錄稿），1957年3月8日。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49—255。

[17]徐鑄成：《親歷一九五七》，頁20。

[18]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紀要（記錄稿），1957年3月10日。參見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57—1992）》（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頁10—16。

[19]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頁262—264。

[2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06—418。

[21]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這篇講話最早收入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公開發表，後又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據編輯者註釋：「發表以前毛澤東作了重要修改，加上了一些原講話中沒有的內容，主要是：強調階級鬥爭和政治戰線思想戰線上的革命，對於知識分子隊伍及其思想狀況所作的過於嚴重的估計，提出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82。

[22]徐鑄成：《親歷一九五七》，頁17—18；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頁262—263。不過，徐說在錄音中聽到劉少奇插話，這裏有誤。劉少奇這年2月18日至4月14曰去南方幾省調查，沒有參加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講話時，劉不在場。

[23]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12、42。

[24]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42。

[25]轉引自謝泳：《雜書過眼錄》（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頁262—263。

[26]傅雷致傅聰信，1957年3月18日，載《傅雷家書》，頁158。

[27]詳見《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7號，頁30—49。

[28]《人民日報》，1957年3月16日。

[29]《人民日報》，1957年3月23日。

[30]《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0號，頁22—24。

[31]《人民日報》，1957年4月16日。

[32]《人民日報》，1957年4月25日。

[33]《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

[34]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頁265。

[35]郭曉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1957年日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51。

[36]《人民日報》，1957年5月1日。

[37]《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頁162—169。

[38]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頁3—5。

[39]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頁15—18。

[40]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頁19—21。

[41]《內部參考》，1957年4月28日，頁9—11；5月17日，頁3—5。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頁10—12、12—15、18—21。

[42]《內部參考》，1957年5月21日，頁7—9；5月25日，頁20—22。

三 毛澤東南巡講話和整風再動員

仔細品味，毛澤東的兩次講話其實提供了兩個新的信息：一是對黨內多數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不滿，他們沒有意識到共產黨執政遇到了新問題，對中央提出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方針有強烈的懷疑和抵觸情緒；二是大力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試圖通過整風運動解決黨內的思想和作風問題。這兩者之間有着密切聯繫，相輔相成。為了促進整風運動的開展，毛澤東需要同時進行兩方面的工作，既要說服黨內幹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又要鼓勵黨外人士解除顧慮，敢於向執政黨提出意見和建議。在毛澤東看來，只有通過這種新式整風運動，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推動社會主義前進。不過，黨內也有另一種看法，認為整風主要還是學習理論和思想教育，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關鍵在於具體政策的調整。

1 黨內對整風運動的不同理解

如何理解毛澤東再次提出的整風運動很重要，特別是對於已有延安整風經驗的共產黨幹部來說更是如此。為了安撫黨內幹部，「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恐慌」，康生在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這次整風只是學習：「主席說，要準備新的整風運動，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和理論學習運動。」康生特別指示，傳達中央精神時要向黨內外講清楚，延安整風運動有整風學習和肅反，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但在時間上交叉了，於是有人「談虎變色」，以為又要搞大民主了。[1]強調整風是「解決黨內也就是人民內部問題」當然不錯，但是在毛澤東明確表示希望黨外人士參加，鼓勵他們對共產黨提意見後，仍舊把整風看作僅僅是「思想教育」和「理論學習」運動，似乎是沒有理解毛澤東講話中的深層含義。

還有一種說法也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新式整風運動。既然說整風運動是一年以後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發的一個通知就把正在開展的「學習八大文件，檢查思想作風」的工作與將要開始的整風運動斷然區別開來。通知明確說：「這次檢查雖然是以整風精神進行，但不等於就是一個整風運動」，而只是「整風的思想準備」。[2]在他們看來，整風並非當務之急，到底怎麼搞，目前還提不上議事日程。

其實，毛澤東在1957年3月提出開門整風的想法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有鋪墊的，此前兩個月內中共中央連續批轉下發的幾個文件的內容和

時機，可以說明這一點。

1956年10月26日，浙江省委統戰部在報告中建議，「必須加強黨內統一戰線思想政策的教育」，「把黨的統戰機構建立和健全起來」，以求通過「廣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在黨內克服輕視黨外人士作用，不善於團結非黨幹部，不善於與黨外人士共事的宗派主義表現」，並有重點地檢查黨的統戰工作的執行情況。12月1日浙江省委同意並批轉了這個報告。1957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發了這兩個文件。[3]

1月12日，青海省委發出「關於團結和尊重黨外幹部的指示」，批評了黨外人士長期有職無權、黨內黨外不能一視同仁的現象，指出「這是團結黨外幹部方面一個嚴重的錯誤」。中共中央2月20日轉發了這一文件。[4]

1月17日，中央統戰部報告了民主建國會二中全會的情況，稱讚這次會議「抓住了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後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問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開展也比較認真深入」。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估價問題，章乃器在發言中強調資產階級的「進步內因」，否認還有兩面性，指責過去對資產階級的批判「矯枉過正」。這些言論受到多數與會者的批評，不過，統戰部的報告認為：「章乃器這些言論和批評本身也具有消極、積極的兩面性，他的批評和言論的主要部分帶有原則的錯誤，對進一步教育改造資產階級分子是不利的。但他也確實抓住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偏差，特別是他敢於代表資產階級公開地、尖銳地提出批評和鬥爭，使我們能夠更深刻地認識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及時地察覺資產階級的動向，這對我們是完全有利的。對章乃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和勇於同我們唱對台戲的積極性，不僅不應打擊，而且應當加以重視。對章的錯誤和毛病，則必須進行適當的批判。」報告還總結了在民主黨派內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自由爭辯說理分析」的經驗。中共中央2月5日向各地轉發了這個報告。[5]

2月25日，中共中央還批發了中央統戰部兩個半月前上報的「關於繼續發揮工商業聯合會的作用的意見」。統戰部認為，在反映工商業者的意見和要求，對黨和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以及組織和推動資產階級分子進行自我改造和參加社會主義競賽方面，「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工商聯仍然需要存在，並且需要進一步發揮它的積極而有效的作用」。文件提出，對於工商聯機關幹部的「政治待遇和物質待遇應該同國家幹部一視同仁，不應有所歧視」，擔任工商聯秘書長的黨員幹部，「一般可以撤回」，而與工商界人士關係不好的黨員幹部，「應該堅決撤回」。[6]

這些文件（可能還有更多）表明，到1957年初，中共中央已經不是

一般地號召「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而且開始考慮如何具體地發揮黨外人士的作用了，其中也包括在整風中利用民主黨派的問題。不過，這大概主要反映毛澤東本人的思路。對於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如何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毛澤東比較關注的是「思想動向」，主張首先通過整風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解決問題，而多數領導人更關注的是調整方針政策，着重於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解決影響執政黨面臨的具體問題。劉少奇在這一時期的言行，反映了後一種情況。

1957年春天，劉少奇也特別關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他認為，「人民內部鬧事是個新問題，我們不想好辦法，將來要吃大虧」。[7]劉少奇還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從2月18日到4月14日，他先後視察了保定、石家莊、欒城、邯鄲、新鄉、鄭州、許昌、武漢、長沙、株洲、衡陽、廣州，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臨行前，劉向隨行人員說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鬧事問題。劉說：「群眾怪我們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敵我矛盾。」因此，「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策，勢必發生像波匈事件那樣的情況」。他主張「不要把提意見、告狀看作鬧事」，認為「群眾多說話是民主積極性的表現」，「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官僚主義是好事，不是壞事」。劉的調查範圍包括學校、合作社、工礦企業，涉及農業、工業、商業、教育、城市生活等各個方面，他多次同大中小學學生、教員，農村合作社社員、幹部，工礦企業職工、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以及地方黨政幹部座談。值得注意的是，與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不同，劉此行對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幾乎沒有涉及。[8]

社會分配是農民、工人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劉少奇對此特別關注，並提出：「所有制解決了，生產關係的問題出在分配上，表現得很尖銳複雜，我們要十分注意研究分配問題。」在劉看來，「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講清道理，人民是不會鬧事的」。[9]在河南新鄉，劉少奇聽取地委負責人匯報農業生產合作社情況，對該地實行包工包產到隊、固定三年不變、超產獎勵的辦法十分讚賞，肯定這是農村生產關係的一種調整。劉說：所有制確定以後，「基本不變，但不是生產關係中的一切都不變，時時會有些變動，主要在分配制度上變」。[10]在湖南省幹部會議上，劉少奇說：「社會主義下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了，分配問題就大量地、突出地產生出來了」，應該「公平合理地分配人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要很好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工人與農民的消費比例、國家預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投資比例、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等全社會

中的分配問題。」[11]

農業、手工業改造後，生產經營單位普遍過大，也是農業社和手工業社社員產生不滿的原因之一。劉少奇同新鄉地委負責人談話時說：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村普遍建立大社，導致農民不滿。劉承認大社辦多了，社太大了與落後的生產力不適合：「生產力只是那麽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特別是分配單位小一點好，太大了則生產關係超過了生產力。」劉還談到勞動方式，認為「社員勞動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體化了不行」，可以「實行分組分戶小包工，分給社員的農活只要求他幾天完成，隨便他甚麽時候上地，有個勞動自由。有很多小活適於個人勞動，不能完全否定個體勞動。和工業一樣，農業也可以實行個人負責制」。在河南許昌地區，部分農業社實行牲畜集中餵養後，出現了瘦弱死亡的現象，劉少奇同當地負責人談話，提出還是「分散餵養」，「分散餵養並不觸動集體所有制，是個經營方法問題」。在河北保定，劉少奇對一搞農業社就實行集體餵養不以為然，明確提出農業社要放棄集體餵養牲畜的方式。還說，分散餵養並不是倒退，因為所有制還是集體的，只是經營管理方式改變一下。[12]

商業、服務業過於集中經營，給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緊張，是引發市民不滿的重要原因。劉少奇在聽取地方匯報後，主張實行國家、集體、個體幾個方面經營。在長沙，劉少奇提出：市政建設的大項目，如自來水、電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國家投資；那些零零星星的項目，如市民住宅、理髮館、商店、電影院等，應該發動群眾，可以由群眾自己辦。在株洲，劉少奇同市委書記談話時指出，隨着城市人口的增長，吃菜問題必將成為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個突出的問題，要把蔬菜生產當成大事來抓。在廣州，劉對國營商業的經營作風提出批評：「國營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私商小販做生意能賺錢，國營商業為甚麽就不行？」他要求國營商業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販學習，採取一些靈活的辦法，如下鄉採購，晚間營業，搞好對市民的蔬菜供應等等。劉很看重自由市場的作用，認為自由市場對國家有利，可以暴露國營商業的缺點，補充其不足，方便人民。儘管只是從完善計劃的角度估量自由市場的地位，認為國家計劃不到的地方，自由市場鑽了空子，就可以發現問題，逐漸把計劃工作做得周到一些，但畢竟是承認了自由市場存在的合理性，承認了經濟生活組織的「多樣性」。[13]

工礦企業的職工住房緊張，也是各地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劉少奇視察株洲湘江機器廠時，專門談到了解決職工住房的問題。他說，我們國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資大，職工住房問題，國家只能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解決。今後，集體宿舍還是應該由工廠解決，家屬宿舍工廠不能再蓋了。凡是青年職工要結婚的，都要他們參加房屋合作社，自己

蓋房子。工人自己蓋的房子，一輩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屬於自己所有，將來如果調動的話，還可以出賣、出典、出租，本錢可以撈回來。[14]

中小學的辦學、中小學生升學和就業，是劉少奇此行關注的又一個問題。他聽取湖南省領導人匯報教育工作後，對地方禁止群眾自己辦學很不以為然，要求放手讓群眾辦學。劉提出，在農村是社員辦學，而不是合作社辦學；在工廠是工人辦學，而不是工廠辦學。他還說：「現在除了國家辦學校以外，還可以集體辦學、互助辦學，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職業者辦私塾。」在廣州，劉少奇也提出，辦學有幾種辦法，第一是國家辦學，要搞得正規一些；第二是合作辦學、集體辦學，城鄉都可以辦，可以叫教育合作社；第三是私人辦學、個體辦學。在同長沙市中學生代表進行座談時，劉少奇着重談了他們最為關心的升學和就業問題。他承認上年教育工作有缺點和錯誤，其中一個錯誤就是「多招了一部分學生」，「給工作帶來了困難」。劉說，由於我國各種條件的限制，現在還沒有可能實行普及中學教育，至於高等教育本來就不屬於普及範圍，因此，小學和中學畢業生都要有很大部分轉入生產。劉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和青年組織對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採取負責的態度，分別情況，作好統籌安排。劉說的「統籌安排」，除了再辦一些小學、中學，組織學生自學的辦法外，還有就業的途徑。除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學生，城市裏的服務行業和手工業需要增加一部分學徒和職工外，劉少奇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生的主要方向。事實上，學生們許多嚮往城市而不願意去農村，劉少奇在座談會上反覆闡述從事農業生產的前景和意義，力圖說服學生安心農村和農業。[15]

在劉少奇調查研究的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在積極制定和頒布各種旨在解決社會生產和生活問題的政策和規定。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陳雲出任組長，成員有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和黃克誠。第二天，陳雲便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職工生活方面若干問題的指示〉。14日陳雲又出席全國農村自由市場會議並講話，提出要對市場物資供應緊張暴露出來的矛盾加以研究並找出辦法。[16]

1月29日，《人民日報》專門發表社論，在肯定社會主義改造中採取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時，指出由於對市場管理過嚴過死，也帶來一些副作用，強調開放農村自由市場的好處已經看得很明顯，它對於活躍城鄉物資交流、刺激農業生產、改善國營和供銷社商業的經營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動和刺激作用。[17]

2月6日上午，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辦公會議，要求制定若干主要農

產品的比價，解決好收購和零售差價過大的問題，適當改變偏遠地區某些農產品收購價偏低的現象。當天下午，陳雲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1957年面臨巨大就業壓力，需研究解決辦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數必要外，職工到六十歲應該退休，女職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約五十五歲）。會議還討論了發展養豬生產的問題。[18]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大幅度提高生豬收購價格，要求各地農村貫徹執行生豬「私有、私養、公助」的方針，並在供應飼料和收購價格上合理兼顧社員個人利益和合作社集體利益，以改變生豬生產下降的趨勢。按照國務院的通知，這次調價，生豬收購價格全國平均提高13.89%，豬肉零售價格全國平均提高8.42%。[19]

2月7日，陳雲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特別講到不能把人民鬧事「看成反革命」，對人民鬧事問題的處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對的，都應滿足；不對的，要批評；有困難的暫時解決不了的，要講清楚，說老實話；除現行反革命外以外，一律不抓、不開除。[20]

3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農業社堅持民主辦社的方針，按時公開財政收支，包括產品分配、銀行存款、國家預購款、國家的貸款及用途、生產資料和用具的購置、幹部的補貼、社員的預支、國家的救濟款等，決定社隊問題要同群眾商量，例如生產的布置、農業技術的改進、耕作制度的改變、新種子的採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設、經營管理等，幹部要參加生產。[21]

3月18日，陳雲召集國務院第五辦公室人員開會，討論關於耕畜問題的指示稿。第二天，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指示，允許合作社將小型役畜轉給社員私有、私養、私用，或幾戶社員夥有、夥養、夥用，滿足社員家庭副業生產和日常生活對畜力的需要；同時適當調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購價格，以刺激農民養牛的積極性。[22]

3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有關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農業合作社上年度收入分配沒有結算清楚的，應該抓緊時間、迅速結算清楚；併社和轉高級社的工作應該停止；過大的社可以根據本地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多數社員的意見，採取簡便方式進行必要和適當的調整。[23]

3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承認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遊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的發生，「首先是由於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特別是由於領導者的官僚主義」，指出防止這類事件發生的根本辦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對於類似事件的處理，文件規定：（1）允許群眾這樣做，而不是禁止群眾這樣做；（2）群眾既然要鬧，就應該讓他們鬧夠，不要強迫中止，但是必須勸告群眾不可採取違法行為（如打人、關人、破壞公共財物

等），如果發生，應該採取適當方式加以制止；（3）對群眾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應該同群眾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樣對待；（4）在事件平息後，應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眾覺悟。文件特別要求，「對行為極端惡劣、引起公憤的官僚主義分子，應該給予應得的懲戒」。[24]

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透露中央準備在年內召開中央會議，專門討論工人階級的幾個有關問題，即關於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的問題；關於職工生活問題；關於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和教育問題；關於企業中黨、工會、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問題。通知要求「全黨動手」進行準備，中共中央有關各部委、全國總工會黨組、青年團中央、全國婦聯黨組、國務院有關各部委黨組和各地黨委，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寫出有情況、有分析、有具體意見的綜合報告，或者關於某一兩個方面問題的報告。[25]

所有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決策層，對於當時出現的普遍的社會現象——這些現象反映的基本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關注點是不同的，解決問題的主張也是各有側重。同樣是處理「少數人鬧事」，同樣是整頓黨風，毛澤東顯然更傾向於開展思想教育運動，從意識形態方面下手，而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則比較重視調整政策，強調解決人民當前利益、處理好人民生活問題。這一點，從上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發言就已經可以看出。[26]不過，這並不說明中共高層存在原則性分歧。國外有研究者認為，自1956年下半年以來，劉少奇便與毛澤東有嚴重分歧，並抵制毛澤東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這個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測和推論得出的，而缺乏文獻的依據。[27]仔細研究劉少奇這一時期的言論可以看出，其實他對兩類矛盾問題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澤東一樣，劉少奇也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內部問題，群眾鬧事的主要根源在於黨內的官僚主義，而且還有過全面而精闢的論述。[28]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並不在這裏，而在於解決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點。當然，對於毛澤東提出的整風運動，劉和其他領導人都不可能在原則上表示反對。但是，劉少奇一直強調整風是一次學習運動，批判和自我批評也限於黨內的和風細雨方式。筆者逐一查閱了劉少奇此期的講話和報告，發現幾乎沒有一處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更不用說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了。甚至到5月7日整風運動已經全面開展起來以後，劉少奇在高級黨校的談話中仍然認為，整風就是「聯繫個人思想問題，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同時也要「進行同志間的互相幫助和互相批評」。劉嚴厲地批評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但強調採取「妥協性的辦法」處理，還特別指

出，「凡是黨內的矛盾，都是非對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撥離間、破壞黨的活動，也可以把這種矛盾搞成對抗性的」。[29]毛澤東明明說，這次整風是解決黨群關係，解決黨與非黨之間的矛盾，並且邀請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起整風，劉少奇卻在這裏強調「同志間」的批評，「黨內」的矛盾。毫無疑問，劉少奇的這種態度和觀點代表了當時黨內多數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的心聲，而恰恰這一點，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2 毛澤東在南方的整風再動員

毛澤東好像有個習慣，只要心情不快或辦事不順，就往南方跑。不過，與劉少奇走的京廣線不同，毛澤東這次選擇了津浦線。3月16日，政協會議還未結束、各民主黨派會議正在召開時，毛澤東通知說，他要離開北京了。臨行前，毛澤東審閱並批准了〈中央關於傳達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指示〉，其中講到：在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時候，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是用說服的方法，用自由辯論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識分子進行長期的、耐心的、細緻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促進我國的科學文藝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迅速地繁榮起來。指示還特別點明：「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開會，這不但對於密切黨員與非黨員的團結有好處，對於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討論和研究問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也是很有好處的。「各省（市）應該同樣召開宣傳工作會議，並且像中央召開的這次宣傳工作會議一樣，吸收黨外的教育、文藝、科學、技術、新聞、出版界人士參加」，會議「應當充分發揚民主，特別要讓黨外人士講出內心的話」。[30]

從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澤東先後到了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處，都要召開座談會，對當地黨員幹部發表講話，走一路，講一路，毛自己說他「變成了一個游說先生」。[31]這次沿途演講，實際上成了全黨整風的思想發動。[32]

在天津，毛澤東重點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他說，對這個問題意見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覺得這個方針可以，贊成；有些同志看樣子還可以，但是心裏總是有那麼一點不舒服：「百花齊放」，那麼多花，恐怕有不好的東西放出來了，怎麼得了啊！「百家爭鳴」，咱們共產黨只算一家，九十九家包圍我們，怎麼得了啊！毛澤東指出，在這百家裏頭，按其性質分類，就是兩家，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小資產階級在基本點上同資產階級是一家，在共產黨這一家裏也有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和教條主義。科學的問題，思想的問題，精神的問題，只能說服，不能壓服。最後談到整風，毛澤東說，整風沒有

甚麼可怕，我們在延安搞過，不同肅反聯繫起來就沒有可怕的。就是學習和檢查，對錯誤嚴重的同志要幫助他改正，但不用開大會鬥爭的方法。今年準備試行，明年再正式開始，黨內這麼做，黨外自願參加。[33]

毛澤東在濟南講的主題是「思想問題」。毛說，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後，人民內部矛盾就發展起來，解決思想問題，正確的方針不是收起來，而是還要放，現在還放得不夠，不是把它壓下去，而是不要壓。共產黨的目的是解放全人類，手裏掌握着真理，是最不怕批評的。共產黨政府有工人、農民作基礎，有馬克思主義指導，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那一套東西。共產黨有時候還要借黨外的力量幫個忙，叫做內外加攻，把官僚主義這些東西吹掉一些。談到整風，毛澤東說：「我們要爭取黨外人士，要爭取知識分子，先要把自己的作坊整頓一下。」與民主人士合作，「不是他們跟我們合作不合作的問題，而是我們跟他們合作不合作的問題」。對於舊知識分子，「我們一步也離不開他們，離開他們就沒有人教書，沒有人當工程師，沒有人研究科學」，「所以要好好跟他們團結」。「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34]

在南京，毛澤東主要講「思想工作問題」。他說，過去一百多年，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階級鬥爭。現在是處在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作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後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由此講到知識分子問題，毛說：中國的幾百萬知識分子，「不管他怎樣動搖，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們人民的財產，是人民的教員」。「這七年，這幾百萬知識分子還有進步，應該肯定這一點。」接着又講到民主黨派，毛說，「民主黨派都是知識分子」，所以提出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這些方針應該堅持下去。「如果我們身上有官僚主義，有缺點，首先讓黨內批評，然後黨外批評，批評我們的缺點，把我們的官僚主義改一改，把缺點改一改，不就好了嗎？會不會倒呢？不會倒的。」對於民主黨派，毛澤東主張「要同他們講真心話」，「不要黨內一套，黨外一套」。「關於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講，黨內是這樣講，跟黨外也是這樣講。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比如講罷工、罷課、遊行示威，暴露我們官僚主義的這樣一些材料，可以印發給他們看。他們平時看不到，這樣一來，反比較好。有時可以開兩個黨共同的會議，黨內黨外同時參加。」參加宣傳工作會議的黨外人士佔五分之一，「你們如果開的時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讓他們佔五分之二」。[35]

到了上海，毛澤東還是談兩類矛盾和雙百方針問題。毛說，人民鬧

事這樣的問題，會經常不斷地發生。凡是有官僚主義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鬧事。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這類事情，應該看作正常現象，並且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毛澤東又說到知識分子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你說他不擁護共產黨也難說，還有些擁護，但有時要分「你們我們」，「你們共產黨」。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爭取他們」，「分步驟地爭取他們，改變他們的世界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毛說，現在有兩種意見，一種還是想「放」，一種是想「收」。中央認為「收」不好，還是「放」比較好，適合更多數人，爭取大多數中間分子，爭取這些知識分子，讓他們說話。毛澤東再次談到整風時說，「中央還沒有做出正式決定，準備這樣做。今年準備，明年、後年兩年實行，以三年時間」，「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用適當的方法加以批評」。整風只會增加共產黨的威信，「共產黨跟民主黨派比較，誰怕批評？現在這些民主黨派、黨外知識分子，好像躍躍欲試，那麼試試看吧，究竟誰怕批評？哪一個本錢大？哪一個經得住考驗？」共產黨要民主黨派進步，首先自己就得進步，共產黨把作風整頓好了，取得了主動，黨外人士就會自願參加，進行「自我批評」和整風。他們中的左派和中間派會來參加，右派恐怕就不幹。現在問題是，在相當多的地方「黨內黨外隔一層」，「溝太深」，應該「把溝填起來」。最後，毛澤東強調，批評共產黨的缺點，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擴大民主是為了加強民主集中制，這是原則。但是還要有靈活性，不能碰到罷工罷課，碰到錯誤的言論，就拿「破壞黨的領導」當擋箭牌。這樣，「我們國家的文學、藝術、科學就可能希望繁榮、發展起來」，「我們的希望就可能達到」。[36]

此行最後一站是杭州。4月4日至6日，毛澤東在這裏召集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負責人座談，聽取他們有關思想動態的匯報。毛澤東一邊聽匯報，一邊插話，對一些議論發表了很有針對性的看法。其主要內容如下：

>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少數人說，共產黨放長線釣大魚，要看看市委的態度。
>
> 毛澤東：要讓人家批評，一點不生氣，然後去分析。現在知識分子像驚弓之鳥，怕得厲害，他們要看一看，他們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後也還是要看的。我們黨內同志也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條，過去一些犯錯誤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經過七大到八大，做了許多具體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麼多「老虎」，後來百分之八十都降下來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貪污了，太多了嘛。一個人搞百把塊錢，一世就完了。「五反」開始也到處是壞人，後來五類一分，打擊面就小了。總之，共產黨的政策要讓大家來考驗，領導者也要受被領導

者考驗。

石西民：黨內有一些幹部說，現在搞百家爭鳴不是時候。有的認為百家爭鳴與千百倍地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傳達要求先黨內後黨外，一下推開感到難辦。

毛澤東：八大已做了結論，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時候。黨與非黨之間有堵牆，牆不拆，如何爭取群眾？甚麼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為了爭取群眾嘛。不考慮爭取群眾，談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現在黨與非黨之間有條溝，而且很深。我並不是說黨與非黨不要有界限，應該有條線，混起來不好，但不應該變成鴻溝，脫離群眾。黨內黨外一起來好，這樣快，就把許多人推上政治鬥爭舞台，不然兩三年也不得解決。現在黨外傳達很快，黨內反而遲，報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評《人民日報》，是甚麼人的報紙？

石西民：有人提出報上開展百家爭鳴要有五個條件：必須有領導，有選擇，有準備，有說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

毛澤東：這麼多條件，叫我也難辦。領導要有，搞方向就叫領導了，但不要干涉過多。有領導是肯定的，但毛病一點不出，難。有選擇，也會選錯的，準備它有錯。有準備是對的，也不能準備得那樣周到。有說服力很對，這條比較具體。有利，看怎樣講，甚麼叫有利？百花齊放有利，還是一家獨放有利？這幾個條件都很難辦，但是不要教條主義。

石西民：有人說電影要「力爭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認為這個口號不妥當。

毛澤東：毒草怎麼能夠避免？我們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難得分辨香花毒草。人們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現的，誰會說自己是毒草？其實，毒草也不那麼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這是中間人物佔多數的緣故。對片面性問題，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較多的人使用辯證法，比較能全面一些看問題，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黨內黨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問題，黨內講的都向他們講，缺點也向他們講。我們講了自己，這樣就好講他們的缺點了。人總有懂得與不懂得的矛盾，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與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與做不好的矛盾，永遠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講，已經比較完整了，你們上海還提出這麼多批評嘛。話也難講啊！你們在省裏，不要認為講一下，人家就舉雙手。哪有這樣簡單！

李彬（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有的幹部聽了傳達後說，現在事情難辦了，不好好學習幹不下去了。

毛澤東：不能靠歷史吃飯，不能靠威勢吃飯。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這一點要進行廣泛的教育，幹部靠資格、靠勢力是很危險的。

李彬：現在民主黨派在學校中發展成員很積極。機關中有的黨外副廳長想參加共產黨，民主黨派拉得緊，自己不願參加，叫老婆參加應付應付。

毛澤東：知識分子應吸收一批進黨內來訓練。爭取三分之一的知識分子入黨，已加入民主黨派的也可以跨黨。只有民主黨派的主要骨幹應勸他不進黨。知識分子入黨條件不能太高。現在指定譚震林、陸定一、安子文三人負責，最近開一個會，總結一下知識分子入黨的經驗，定出發展要求。這裏有個政策問題。如不爭取一批人入黨，將來無人去做爭取知識分子的工作，對我們黨團結大多數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工作的總方針不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爭取知識分子的政策，是開放的政策，而組織上是關門的，這不行，不協調。當然，也要穩步地吸收他們參加。

李彬：高等學校裏傳達了主席報告以後，有的黨外教授反映，想向院裏黨員領導幹部提一下意見，好改變一下過去有些距離的情況。

毛澤東：要改善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與知識分子不能共事，這是甚麼作風？不與知識分子接近是宗派主義的作風。主要原因不是他們，是我們，是第一書記。第一書記不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種文章，要看哲學、歷史、經濟、文學、邏輯、藝術方面的文章，自己這方面的知識要逐步增長起來，興趣要養成。……

劉子見（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揚州地委政法部長說，不久以前泰興有人鬧事，捕了六個人，開始準備分別判處半年到兩年徒刑，現在看判得不當。

毛澤東：我的講話有這麼大的影響！你講的這個材料很好，看來還是要講一講。一聽到鬧事，就想到敵人，就實行專政。階級鬥爭搞慣了，將對付反革命的辦法用到鬧事的人民身上。過去在革命的時候，我們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勢力要民主。現在我們勝利了，自己掌握政權，很容易強調專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劉子見：有些人聽了人民內部有矛盾以後大吃一驚。

毛澤東：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是講過了嗎？為甚麼要大吃一驚呀？貧農、下中農、中農、富農不是有矛盾嗎？

劉子見：總的看來，目前幹部中「左」的情緒是主要的。

毛澤東：「左」的傾向是歷史上留下來的影響。因為過去幾十年來都是搞階級鬥爭嘛。

劉子見：民主黨派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很滿意，認為這樣加重了自己的責任。只是覺得共產黨對他們提意見少，成了單方面的監督了。

毛澤東：對民主黨派要講真話，對民主人士要更積極一點。

要說的就說，有缺點就讓他們提出來。這樣比若即若離好。當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願意當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聽到的聽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職無權。所以我說黨與非黨要有一條線，不要有一條溝，要打通它。……

劉子見：在學習主席講話中，有人反映，八大決議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社會制度同落後生產力的矛盾，現在又講人民內部的矛盾，對這幾種矛盾的關係，不知怎樣才是完整的認識？

毛澤東：八大決議關於先進生產關係與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說法，是犯了個錯誤，理論上是不正確的。有的同志說，所謂落後的生產力是與外國比較的，是與將來比較的。……這樣比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這個錯誤如何糾正，請大家想辦法。

……

呂志先（浙江省委宣傳部長）：黨外的人士聽了主席的報告之後都很興奮。

毛澤東：黨外興奮，黨內呢？

呂志先：我們準備五月開宣傳工作會議。

毛澤東：有沒有黨外人士參加？縣裏來不來人？（對陸定一）我們的宣傳工作會議為甚麼不報道？有黨內外人士都參加的會議為甚麼不報道？最高國務會議一聲不響，宣傳工作會議還不響。《人民日報》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聲不響。

呂志先：我們檢討過去對陳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澤東：陳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黨內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所以，我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志的想法抵觸嘛。

呂志先：我們思想上總想極力避免毒草。

毛澤東：這是不可能的。

柯慶施：毒草和錯誤的東西，批評不批評？

毛澤東：你們不是已經批評了嗎？毒草要讓它放出來，批評要有說服力，看清楚了就駁，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呂志先：黨外人士對我們的肅反有意見。

毛澤東：領導要經得起考驗。現在黨外情緒高，黨內大概會先低後高。任何一個方針、政策，都不是哪個人一講就行的，靈不靈，要經過考驗。到解決了一些問題，取得了經驗，看到這個方針靈了，情緒才能高起來。……

江華（浙江省委書記）：黨外人士問，從最低幹部到最高領袖，最高國策，能不能批評？

毛澤東：憲法有規定嘛，讓他們批評嘛。六億人口中所有有缺點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評。講對了就接受。講得不對，如果沒有害處就算了。

許彧青（福建省委宣傳部長）：報社組長以下要求「放」，編委會有顧慮。

毛澤東：我的講話還是有群眾嘛，組長以下還是主張「放」嘛。

許彧青：報紙工作，群眾的要求與黨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澤東：怕人家批評怎麼能辦好報紙？人家提提意見有甚麼不好？文教、報紙、刊物、戲劇，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經常教。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報紙、學校、戲劇，各地無人管，這種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你們（書記）管的太少了。

許彧青：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批評我們的大學有三個缺點：（一）行政機構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領導機關工作的辦法來領導學校；（三）黨員幹部水平不高，黨員的優越性在大學裏看不出來。

毛澤東：是嘛，在大學裏我們就是沒有優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學的人調出來。要真正配備一個隊伍，包括中學在內。我們有些同志靠擺架子，不擺又沒有辦法。沒學問，要做官，就要擺架子，嚇唬人。大學中原來去的幹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備隊伍，辦法是把教授吸收入黨，重新配備隊伍。現在要早做準備，多吸收些教授入黨，不然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葉飛（福建省委書記）：大家對主席的報告反映很好，都覺得啟發很大，但許多問題一接觸實際就又不通了。如對人民鬧事讓他鬧夠，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澤東：對於黨外黨內人的意見都不能採取一下頂回去的辦法，要採取分析的態度，不然會犯錯誤。有人說，趙超構的《新民晚報》是黃色報紙，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說是黃色報紙，我看還不錯嘛。有人說我們不能領導科學，也不能一下子頂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一裝，人家就說你水平不高，進步不快了。自己不講人家還是要講的，自己主動講不是更好。相當多的黨外話是對的，他們講話是考慮過的。有的講得不對，是不了解情況。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決不可一下子頂回去了。如果採取一下子頂回去，就會處於被動。[37]

這次南方之行對毛澤東的觸動很大，並引起了他的新的思考。對他的講話，黨內外的反響完全不同。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反應積極，雖然對鳴放還有顧慮，但普遍表示擁護和贊同。而在黨內，從各地匯報的情況看，大多數幹部還是對雙百方針的提出是否正確、是否適時有懷疑，

不敢放、不願放、不想放。黨外傳播迅速，黨內傳達遲緩，黨外報紙反應強烈，黨內報紙一聲不響。這種反差表明，黨內的思想認識已經跟不上形勢的變化，甚至落在民主黨派的後面。對於這種狀況，毛澤東十分不滿。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澤東下決心，提前發動全黨整風，並且通過黨外力量促進黨內整風。

3 中共中央決定提前開展整風

最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就是，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長時間對雙百方針沒有進行主動宣傳，報道也很少。特別是1月7日發表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後，一直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甚至毛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對這篇文章提出批評後，也遲遲沒有動靜，直到4月4日才在第七版發表了一篇通訊〈陳其通等「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發表以後〉，內容只是各地關於此文的報道情況和讀者來稿來信。關於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的這兩次會議，《人民日報》的報道異常簡單。最高國務會議開完後，《人民日報》刊登了來自新華社的一條不足二百字的消息，還是安排在一篇關於經濟問題的社論後面，位置不顯要，而提到毛的講話只有一個題目。至於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報上連個消息都沒有發。[38]毛澤東在杭州座談會就是為此質問了陸定一。

回到北京後，毛澤東怒氣未消，決定對《人民日報》「動手術」。4月9日晚上，毛把胡喬木找來談話，嚴厲批評《人民日報》總編輯兼社長鄧拓說：《人民日報》違反了黨中央的政策方針，為甚麼三令五申後，至今三月有餘一直避不表態。《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但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上，一直不聲不響，完全沒有領導，領導權被別人拿去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黨外很活躍，黨外報紙或青年報紙很活躍，唯獨黨的報紙保持沉默，有異己傾向，己是馬克思主義之己。新華社不知怎樣？是否報道了這方面的消息，誰領導。我早說過，鄧拓要走路，到別的地方，現在沒有其他辦法，只好讓人走路。[39]

胡喬木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第二天一早，《人民日報》便登出了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當天看過報紙後，就把中共中央分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召集到中南海自己的住處，還特意請來了社論的執筆王若水。毛澤東一上來就大發雷霆：

> 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以後，《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

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

鄧拓趕緊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對這件事沒有抓緊。毛緊追不捨：

　　中央甚麼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甚麼不發社論？消息也只有兩行。為甚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會議不發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有黨外人士參加，為甚麼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面前丟臉。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目前不能發表，但可以根據講話的意思寫文章。對黨的政策的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

毛澤東詢問了10日社論的寫作過程後，仍然怒氣未消地說：「寫文章要聯繫當前政治，這篇社論和那篇〈教育者必須受教育〉的社論，都沒有提到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好像世界上沒有發生這回事。中央開的很多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參加了會回去不寫文章，這是白坐板凳。以後誰寫文章，讓誰來開會。」又轉向幾個報社負責人說：「是不是鄧拓會團結人，你們的意見都那麼一致？幾個副總編輯像鐵板一塊，不敢批評他，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有意見可以爭論嘛，為甚麼不和鄧拓爭論？要民主集中，但內部可以爭吵，拍桌子。你們只要不到馬路上去鬧，甚麼意見都可以講。」突然，毛澤東對着鄧拓冒出一句：「我看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鄧拓似乎有些不服氣，說：「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漢元帝，不過我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難以勝任。希望主席考慮撤掉我的職務。我幾次誠心誠意地提出過這個請求……」毛澤東粗暴地打斷他：「我就不相信你那個誠心誠意！你只知道汽車出、汽車進，養尊處優。你不能佔着茅坑不拉屎。」看到氣氛驟然緊張起來，分管《人民日報》的胡喬木出來解釋說：《人民日報》曾經搞了個計劃，組織過幾篇文章，我因為沒有把握，壓下來了。這事不能全怪報社，我也有責任。

這時，毛把話題轉向了知識分子問題，說：「現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究竟是甚麼？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的。爭鳴，就是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要接近黨外知識分子，了解他們。要跟非黨知識分子交朋友。我願意同民主人士、中間派談，比如李鼎銘。黨員的黨話太多。近來我在找黨外的教授、工程師談。」還說：「現在，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相當緊張，知識分子魂魄不

安。黨內也緊張。還要繼續緊嗎？我主張鬆，這樣他們就靠攏我們了，有利於改造。不能緊，愈緊他們就和我們的距離愈遠。過去太緊，現在要鬆一點，使他們靠攏我們一點。」「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愛國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許他們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的政策是『放』，還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這一點。」最後，毛澤東又批評黨報不如非黨報紙：「《光明日報》接連發表幾篇文章，都是討論當前重要政治情況的。這些情況《人民日報》編輯部也應該討論。」「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報》，覺得那個報紙還是嚴肅的，沒有甚麼黃色的東西。有些東西還硬了些，不敢放開講。《光明日報》有幾個副刊也還好。」毛還給幾家報紙排了隊：「《文匯報》，《中國青年報》，《新民晚報》或者《大公報》，《光明日報》，最後是《人民日報》和各地黨報，這樣一個名次。」[40]

關於胡喬木壓下《人民日報》宣傳計劃一事，王若水後來的回憶證實，《人民日報》確曾寫過一份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宣傳計劃送上去，被胡喬木壓下了。[41]至於沒有發表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那是毛本人當時的意見。在會議結束時他就說過，講話還要補充，不準備全文發表。胡喬木回憶說，在會後他曾整理過一個毛講話的稿子，毛澤東當時也說先放一放，於是只發了一條短消息。[42]後來毛也沒有指示要寫文章宣傳兩個會議和他的講話，《人民日報》自然不會有所動作。所以，指責《人民日報》「抵觸」中央方針、同中央「唱反調」，有些言過其實。不過，黨報4月10日以前很少宣傳毛澤東提出的新方針，[43]而這恰恰反映了黨內多數幹部的情緒，卻是明顯的事實，不是一句「對這個問題重視不夠」可以解釋的。[44]

盛怒之下，毛澤東大概忘記了自己過去的指示，鄧拓對此也只能以黨內關於報刊宣傳的規定來搪塞。毛澤東遷怒於《人民日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時的感受使然。黨內多數幹部對他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冷漠處之，毛澤東看在眼裏，急在心上，本來就有一肚子火，看見《文匯報》、《新民晚報》及《光明日報》這些非黨報紙接連發表文章，贊同鳴放，針砭時弊，感覺到「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積鬱的不滿才爆發出來。胡喬木回憶說：毛澤東「到上海以後，一看《文匯報》、《新民晚報》搞得很熱火，《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按兵不動，他就火了，就說要搞大鳴大放」。[45]

回到北京後，毛澤東立即着手進一步推動整風，一連氣親筆起草了幾個中央文件。

4月9日，他審閱和修改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主要內容

是：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一次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1957年進行準備工作，並在適當範圍內試行，1958年全面開展，大約在二至三年時間內完成。這個決定（草案）原來是準備在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後下發的，所以題為「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毛澤東審閱時，改變了題目，並要彭真與周恩來商量後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毛澤東還特別加了一句：「此件以早發出為有利」，同時又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試行這一決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過，這個決定（草案）和通知後來都沒有下發。[46]其原因大概在於通知中確定的整風開始時間——1958年，已經不能滿足毛澤東的要求了。

4月17至19日，毛澤東連續三次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開會。[47]會議的內容目前尚無史料說明，但很可能就是討論整風問題，因為4月19日這天，毛澤東又親筆擬了一個黨內指示，發給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黨組，要求檢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指示說：

>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各地正在討論。請將黨內黨外贊成反對兩方面的意見，你們自己的意見，你們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地縣兩級態度如何，你們委員會和書記處或黨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討論了這個問題；第一書記和中央一級黨員部長或副部長（指黨外人士當部長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將這個極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認真抓起來了，還是依然委託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過去那樣不大去動腦筋；第一書記和各書記和各黨員部長或副部長將報紙刊物和學校管起來沒有，看過報紙刊物上有關這類問題的文章沒有，重要社論在發表之前你們看過沒有，動筆修改過沒有，黨和黨外人士（主要是知識界）間的不正常的緊張氣氛是否有了一些緩和，你們對人民鬧事採取了甚麼態度；黨內某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採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眾路線，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於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你們向學校和工廠工人做過講演沒有，做過幾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項問題，請即寫成報告在接此電報以後十五天內用電報發來。北京各部門的報告，用書面送來。[48]

按照中共習慣的做法，一個決定下發之前通常是要先做調查研究，了解下情的，而毛澤東的這個指示，調查如此廣泛、詳細，要求如此嚴厲、急迫，可見毛澤東急於打開黨內局面的心情和決心。目前沒有資料顯示這幾天中共高層的活動，不過，從周恩來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要開始整風的想法已經得到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認同。周說：「正確地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首先要把

共產黨搞通」，「為着要把共產黨首先弄通，所以我們主張從現在開始，自上而下地進行整風。整風主要是三個口號，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宗派主義。」[49]不等各地、各部門的匯報到手，毛澤東已經開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整風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見彭真，談了對整風指示稿的修改意見。[50]4月27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這一文件。[51]同日，毛澤東還親筆起草了一個關於整風和幹部參加勞動的文件，作為吹風，發至基層黨委。文件指出：「正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重大問題的公開討論中，這個討論可能延長幾個月。黨的整風指示，日內即可發出，即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發揚正確的思想作風，糾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的思想作風。」[52]

4月28日，毛澤東又對整風指示稿作了修改，並批示：「準備五月上旬或中旬公開發表。」[53]29日晚，毛澤東再次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專門討論有關開展整風運動的問題。[54]與此同時，毛澤東繼續關注並鼓勵黨外的鳴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毛澤東很滿意，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並為該文重新擬了一個題目〈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按語說：「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幹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55]

中共中央辦公廳於30日發出關於整風的指示文件，緊接着又第二次發出修改稿，只作了幾處文字改動。[56]文件首先批評黨的許多幹部，「在一個新的劇烈的偉大的變革中」，「並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這種新情況和黨的新任務」。同時，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有必要「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澤東兩個講話傳達以後，「引起了黨內黨外的熱烈討論，就我們黨來說，實際上，這就是整風運動的開始」。文件強調：「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開會應該只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對於在整風運動中檢查出來犯了錯誤的人，不論錯誤大小，除嚴重違法亂紀者外，一概不給以組織上的處分。」文件最後還特別指出：「非黨員

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57]

儘管在文件中沒有明確表露開門整風的意圖，而只是提出歡迎非黨人士參加整風，但毛澤東實際上已經開始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的當天，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議題就是整風運動。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主要領導人和二十六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這次講話，毛澤東顯得情緒激昂，比前幾次更加放得開，重點在於鼓勵非黨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

> ——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
>
> ——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處都是矛盾，都在唱對台戲，但是就不肯承認或者混淆兩種矛盾。要承認它，然後分析它，找出解決辦法。現在報紙天天在討論矛盾問題，有人擔心人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三個月了，政府並未被推翻，而且越討論，越發展，人民政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類。攻就趁此機會，只要找出證據，就能站住腳，幾年甚至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內就可以解決。人們並沒有提議要打破你的飯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關係。把矛盾從各方面分一下類，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藝、科學等。衛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找出辦法，要黨內外一起來，以往開小會不靈，要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和宣傳會議一樣的大會，黨內外一道開會，兩種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學作用，成了另一種東西，就靈了。各省、市都要開。報上登一下，就可能打破沉悶的空氣。
>
> ——整風會影響黨外。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最近兩個月就是這個方式，就是整風的辦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風。已經整了兩個月。
>
> ——統戰工作中的矛盾，幾年不得解決，如有職無權等，過去很難解決，現在可以解決了，過去不好解決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過去是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應是大家有職有權有責。同共產黨一道混，民主人士確是不好當，很有點惱火，不好辦事。現在黨內外應改變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
>
>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農

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甚麼辦法和意見都到那裏去講，人家贊成的就作，不贊成的就不作。這個問題要研究。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

——現在不要搞唯物辯證法，要搞政治關係，搞三個主義。不要進到世界觀、思想方法裏頭去，以免把政治關係沖淡，唯物辯證法以後再搞。這個問題會影響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我們不能企圖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辯證法，馬列主義世界觀。

——有相當大的一部黨員不信社會主義，他們搞社會主義是隨大流捲進來的。我就不相信民主黨派都信社會主義，有一大部分人不相信社會主義，但也不願公開講，共產黨、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和農民中一部分，工人中一部分（工人也成份複雜，由500萬發展到1200萬，人心不齊），對社會主義成不成功，共產黨行不行，還要看一看。社會上還有相當一部人，上了賊船（共產主義之船）沒有辦法，會不會翻船要靠天。這是很自然的。

——有人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就只會搞階級鬥爭，共產黨有術無學，這說對了一半。說我們有術無學，要看是甚麼學，比如階級鬥爭是一門大學問，不能說我們沒有。這是經過多少年犯錯誤作檢討學來的。階級鬥爭，以後還會有的，如同帝國主義戰爭，同資本主義國家辦外交，都是階級鬥爭性質的。現在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界科學，不懂怎麼辦？我在1949年的文章中就說過了：我們熟習的東西快要閒起來了，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不懂就不懂，不要裝懂。要老老實實地學，可能要同過去學習階級鬥爭一樣，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北京是個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產黨的負責人每年要有四個月在外，八個月在北京。你們也可以這樣做。中央機關的特點，一是空，二是全面，缺點就是空，一離開北京就舒服了。

——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瑞士有七人委員會，總統是輪流當的。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採取逐步脫身政策。不贊成也沒辦法，不能強加於人。如贊成，要透點消息出去，否則老百姓不了解。[58]

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以前的歷次言論，這番講話更具鼓動性和影響力。不過，積極起來響應的還是在黨外，而不是黨內。因此，運動開展起來以後，雖然說是共產黨整風，但真正積極參與其中的卻大都是知識界的非黨人士。

5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59]一場轟轟烈烈的全黨整風運動開始了。如上所述，毛澤東決心對執政黨發動一次整風運動的思維邏輯是：經過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是不多了，舊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大多數雖然還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擁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他們對政權已經沒有威脅，而思想改造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黨內，在執政黨本身；只要通過整風，改變執政黨的作風和形象，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政權就會鞏固，就會發展。然而，一旦這個邏輯的前提發生變化，他的估計和自信受到打擊，所謂整風就必然會轉向另外一場鬥爭。

[1]雲南省檔案館，7-1-867，頁28—33。

[2]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39，頁19—22。

[3]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93，頁1—2。

[4]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93，頁14。

[5]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93，頁7—9。

[6]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93，頁22—23。

[7]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頁119。

[8]《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86—40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12—823。

[9]《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87。

[10]《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88。

[11]《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91—392。

[12]《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88、389、39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28—329。

[13]《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90—391、393、395；《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頁345—346。

[14]《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92；《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頁342—344。

[15]《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90、391、394；《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頁330—331；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77—294。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61—362。

[17]《人民日報》，1957年1月29日社論。

[18]《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66—367。

[19]《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7號，頁75—77、87。

[20]《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68—369。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128—130。

[22]《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73—374；《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8號，頁76—78。

[23]《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8號，頁70—73。

[2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154—163。

[2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166—173。

[26]詳見本書第六章。

[27]參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頁295、323—327、366—368。例如，作者突出地指出，對於整風的目的，毛澤東強調的是批判官僚主義，而劉少奇始終把主觀主義擺在第一位。但作者沒有注意到，劉少奇3月24日在湖南省幹部會議上就說過：「人民內部矛盾，歸根到底表現為人民群眾與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矛盾。」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392。5月7日在高級黨校的講話中，也是重點批評了官僚主義。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251。

[28]參見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95—309。

[2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250—251、258。

[3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396—39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131—134。

[31]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省、安徽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0日。

[32]《毛澤東傳（1949—1976）》，頁642。

[33]毛澤東在天津市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7日。

[34]毛澤東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內容發表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84—285。

[35]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省、安徽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0日。部分內容發表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85—287。

[36]毛澤東在上海市黨員幹部會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1日。

[37]《毛澤東傳（1949—1976）》，頁654—661。參見毛澤東在聽取上海、安徽、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市委負責人匯報時的插話（記錄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38]《人民日報》，1957年3月3日；《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7號。

[39]林克：《林克日記（1955—1964）》（手稿），未刊，頁30—31。

[40]毛澤東同《人民日報》負責人等談話記錄，1957年4月10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頁664—667。參見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頁319—327。

[41]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頁267。

[42]參見《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64。王若水也回憶說：文革結束後，胡喬木在一次會上說，毛在離京之前告訴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暫時不要宣傳。參見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頁267。

[43]直到4月10日，《人民日報》才發表了一篇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對此似乎並不滿意，幾天後他看到《大公報》的社論〈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裏〉，感慨地寫道：可惜《人民日報》缺乏這樣一篇文章。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23。

[44]此話出自當時在《人民日報》負責版面安排的編輯李莊之口。參見李莊：《難得清醒》（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頁263。新華社有關最高國務會議消息稿的版面安排，就是李莊決定的。

[45]《胡喬木談中共黨史》，頁64。

[4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21—422。

[47]《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77。

[48]11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32—433。中央關於檢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執行情況的指示，1957年4月19日，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1—2張。

[49]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71。

[50]《毛澤東傳（1949—1976）》，頁670。

[51]《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78。

[52]《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294—295。

[5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51—452。

[5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06—607；《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79。

[5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53—454。根據毛澤東的建議，5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

[56]陝西省檔案館，123-43-1，頁11—16、17—19。

[57]《人民日報》，1957年5月1日。

[58]毛澤東約集各民主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記錄，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4月30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670—673；劉延東主編：《當代中國的民主黨派》（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頁281—282。關於毛澤東4月30日談話，有些著作說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講的。如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31；《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384。筆者看到的記錄稿未寫明地點，只說是「約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談話記錄」，後經向中央文獻研究室專家查詢，確定《毛澤東傳（1949—1976）》所說無誤——是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5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註解說「根據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報》刊印」（見該書頁226），有誤。

第八章

引蛇出洞：黨內整風轉為反右派運動

如果承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確實是針對執政黨內部問題的，那麼在反右運動研究中，留給人們的最大懸念就是：整風運動為甚麼會轉向反右運動？這個轉變是甚麼時候發生的？哪些因素導致毛澤東改變了他以前的估計和判斷？或者可以歸結為一個人們常提的問題：毛澤東為甚麼和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關於這個問題，研究者們眾說紛紜，各種解釋不勝枚舉。[1]筆者的考察將沿着兩條線索展開：一是黨內外事態發展的過程，一是毛澤東思想變化的過程。從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全黨整風的指示，到6月8日《人民日報》發出反擊的號令，前後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各大城市、各個階層、黨內黨外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且錯綜複雜。好在當時的公開性較強，史料也豐富，所以對這個過程不難考察。困難的是摸清毛澤東的思想脈絡，他在這段時間及以後的講話、報告、指示、文章雖然很多，但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有的文過飾非，有的強詞奪理，令人眼花繚亂，不知到底哪些是他的真實想法。因此，除了仔細考察這些文獻，筆者還重點利用了兩個史料。一個是毛澤東秘書林克的日記手稿，那裏記載了不少毛澤東的私下談話；一個是毛澤東修改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詳細經過和具體內容。[2]這是觀察毛澤東此時思想變化的兩個極其重要史料，也可以此為參照系來理解中共中央文件和他的其他論述。一則，就真實性而言，毛對他身邊人員透露的心聲大概比他的公開講話更可靠。二則，毛澤東本人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看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修改時反反覆覆，字斟句酌，不厭其煩，而這個過程恰恰與整風向反右轉變的過程同步。所以，毛澤東對局勢估計、對問題認識的變化，應該比較真實地反映在這些史料中。

[1]例如轉變的原因，有的認為是迫於黨內反對派的壓力，有的認為是擔心經濟建設受到影響，有的認為極少數知識界和黨外人士想要推翻共產黨。至於決定轉變的時間，有說是6月6日六教授召開會議時，有說是5月19日北大發生風波時，還有說是5月15日寫作黨內指示時，甚至有人認為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時就已經決定發動反右了。如此等等。

[2]參見施肇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重要理論觀點的修改始末〉（以下簡稱〈修改始末〉），《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誕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形成過程〉（以下簡稱〈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4、5、6期。這方面的研究還可參見雍濤：《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一 變化：毛澤東在開門整風中的警覺

毛澤東所以倡導開門整風，是出於他當時對知識分子（含民主黨派）[1]的這樣一些認識：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以後，國家建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多數不接受馬克思主義，對他們必須長期改造，但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因此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給他們一定的民主和自由；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任務是解決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方法就是整風，因受到黨員幹部的抵觸而需要知識分子給以幫助。於是，就出現了在貫徹雙百方針的氛圍中進行開門整風的背景，其方式就是在會議上和報紙上「大鳴大放」，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由原來設想的「和風細雨」變成了「急風暴雨」，由原來設定的「小民主」變成了「大民主」。這一切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一手造成的，儘管他的本意或許並不在此。

1 毛澤東廣泛邀請非黨人士提意見

在毛澤東看來，廣泛徵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對這次整風能否取得成效關係甚大。他有意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黨整風的指示登報前一天發表的長篇講話，對於黨內是吹風，對於黨外則是動員。

為了配合中共中央指示，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為甚麼要整風？〉。社論講到了整風的目的、原因、條件，這與毛澤東的論述和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精神並沒有原則性的區別。[2]但是，社論沒有提到雙百方針，沒有提到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則是明顯地忽視了毛澤東4月30日講話的意圖和精神。無論這樣做是有意還是無意，社論的發表迎合了多數黨內幹部的心理，並立即在地方上有所反應。5月3日雲南省辦公廳發出整風通知說，「省委醞釀的精神」是：第一，肯定要學習，在這個重大關頭，「一定要跟着搞」。第二，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不要勁頭一來了，就搞個大民主轟一下」。所謂有步驟，就是5至6月只能傳達中央精神，「至於認真地從思想上系統地檢查，看來要到7月」。[3]面對如此狀況，聯繫4月10日批評《人民日報》時的心態，可以想見毛澤東是不會滿意的。

5月4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毛首先肯定開門整風已成事實，且效果良好，應該繼續。又說：「大多數的批評是說得中肯的，對於加強團結，改善工作，極為有益。即使是錯誤的批評，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於我們在將來幫

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接着指出了整風正式開始以後的做法：

> 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好，他們暫時（至少幾個月內）不要表示態度，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於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他們同意此種做法。只要我黨整風成功，我黨就會取得完全的主動，那時就可以推動社會各界整風了（這裏首先指知識界）。此點請你們注意。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此點也請你們注意。[4]

無疑，這個指示最清楚地表明，整風將來也要在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推動，但第一階段只是在共產黨內部進行；方式已經不是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是邀請黨外人士「提意見，作批評」；這些安排都是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協商的結果。有一種看法認為，這個文件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在逐步形成，理由是毛澤東在此提到「暴露」一些人的面貌，以利於「將來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5]其實，這是毛澤東的一貫做法，錯誤思想沒有暴露，如何對它進行改造？應該注意的是這裏的提法：「即使是錯誤的批評……」。毛的主旨是強調「大多數的批評是說得中肯的」，是「極為有益」的。因為對這種已經出現的形式感到滿意，毛澤東才正式在黨內指示中提出，並希望繼續下去。實際情況確實如此。

還在中共中央整風運動指示發表之前，社會上非黨人士在座談會和報刊上已經發表了不少意見。4月10日《人民日報》編輯部在天津邀請十位教授座談，主要討論高等院校的教學和研究問題。各教授紛紛呼籲社會科學的教學和研究要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錢榮堃說，「左」的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都阻礙了「百家爭鳴」政策的貫徹，但是後一種傾向畢竟是少數，「大量存在的還是『左』的教條主義」。鮑覺民說：「過去這幾年，特別是1952年以後，大家寫文章說話的確都有些顧慮。」原因之一，就是用粗暴的簡單的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他是學經濟地理的，成天「提心吊膽」地怕被扣上「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帽子。王贛愚說，由於學習蘇聯取消了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這種做法是否妥當，今天值得重新考慮。比如社會學這一門，範圍就很廣，科系取消後，好多專家沒有人管，如人口學、民族學、社會思想都沒有人專門研究。外國出版的政治學的書籍相當多，過去都用『反動』一句話來否定。有些書是有關資產階級革命的研究，也被認為是反動的。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情況、政治制度、國際關係、國際法等等本來都是政治學系的主要課程，但現在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教授們特別提出了馬列主義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關係問題。李

建勳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若不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又恐招致思想混亂。」他以為「應以馬列主義為爭鳴的武器，而不應定為指導標準」。滕維藻認為，大家都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問題主要是如何領導。滕談起自身感受：「我過去固然也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這一點，但遇到具體問題，在思想上仍不免有些混亂。現在我們明確認識到：百家爭鳴只會幫助而不會妨礙馬克思主義的領導。百家爭鳴方針不僅要在科學研究中貫徹，在教學中也要貫徹。在政治理論課中，當然要求觀點一致，不能任意亂講，但也不能過分強調一致，否則就會妨礙爭鳴。」雷海宗發言，批評馬克思主義還停留在恩格斯逝世時的1895年。他認為，1895年以後，列寧、斯大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從了解整理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經驗、建立新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4月21、22日兩天的《人民日報》連載了座談會的發言，頗為醒目。[6]

4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上海市委最近接連舉行科學家座談會。與會的科學家認為，首先要排除的是教條主義和粗暴態度。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科學家說：「巴甫洛夫是一位偉大的生理學家，但巴甫洛夫學說不等於全部生理學。我們無疑要認真學習巴甫洛夫的學說，但我們也應當學習其他生理學方面的見解。可是，過去不是這樣，過去在討論的時候，總是首先想到『我的話是否符合於巴甫洛夫學說？』雖然沒有公開的壓力，但確有那麼一種氣氛，使你非這樣說不可。這種教條主義的氣氛，束縛了人的思想，非常不利於科學的自由研究。」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談家楨說：「我們知道自然科學本身並無階級性，主要是看它掌握在誰的手裏。可是有人卻硬給各科自然科學戴上政治帽子，把米丘林學說說成是無產階級生物學，把摩爾根學派說成為資產階級生物學，弄得大家糊裏糊塗。」最令科學家感到激憤的是對待科學研究工作的粗暴行為。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冼，以前寫過一本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書，因為一個讀者寫信說這本書「有毒素」，書店就不再銷售了。上海財經學院一位教授寫的書，因受到中國人民大學一讀者批評，結果出版社不但收回，不再銷售，而且還要作者退回稿費。朱冼說得很激動：「你要一棒子打死，我不甘心死，就不寫東西。」[7]《人民日報》還在4月份專門開闢兩個專欄：「科學家談黨對自然科學的領導」和「筆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刊登知識界人士的文章。

4月26日《光明日報》報道了上海鳴放的情況，標題是〈激動中的上海知識界〉。按語說：全國大陸解放，是政治上的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是思想上的春天；毛主席關於人民內部矛

盾的講話，在思想的春天裏，是陣陣春風。報道說：「在中共上海市委召集的座談會上，在民主黨派的座談會上，在高教、科學研究單位的小組會上，教授們、科學家們敞開了胸懷，過去在任何場合下保持緘默的，過去公開不談私下竊語的，都率直的發表了意見。至於一向是敢說敢叫的，更加沒有保留，在同一個會議上，有人一次、再次、三次的搶着發言，不暢不止。有的會議從上午開到下午，甚至有開了十多個鐘頭的。……這種現象不能不說人們是深深地被關係到學術昌盛的『放』和『鳴』所吸引住了。」有教授接受採訪時生動地比喻說：「到黨召開的會議上來告狀，這正如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媽媽面前所做的那樣，這是極為自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位教授激動地說：「對這樣提意見的人，按照過去有些人的辦法，會說他是反領導，反黨，反革命。其實，是誰在違背黨的政策呢？是誰在違背黨的領導呢？應該是用這些政治的大帽子來扣在別人的頭上掩飾自己的缺點的人。」不過，據與會者反映，也有些人還是顧慮重重。如財經學院副院長、民盟盟員李炳煥在座談會上說：「要爭鳴，就要清除大家的思想障礙。現在人們有四怕：怕『釣魚』，怕匯報，怕檢討，怕講話。」其中「怕釣魚」的顧慮比較普遍，認為「放」是把你心裏的話「釣」出來，等到有機會整你一下。[8]

4月30日和5月1日，郭沫若邀請科學家座談科學工作中的問題。科學家們首先直言不諱地批評了科學院的官僚主義。植物學家胡先驌說，他對領導有甚麼意見總願意提出來，可是許多意見提了以後根本沒有甚麼反應。哲學教授馮友蘭的話說得很重：「科學院的官僚主義不算第一，也可以算第二。」歷史學教授翦伯贊批評科學工作中的官僚主義是用「搞運動的方法來搞科學，並且只停留在喊口號的狀態」。科學家們還批評了科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胡先驌舉例說，學習「進化論」，因為討論的結果不符合某一學派的觀點，就說對學習沒有領導好；有人對蘇聯李森科學說表示了不同意見，就要「檢討」。經濟學家巫寶山談了經濟學界的問題，他說經濟學界在學術上的討論很少，大家有甚麼意見都不願說。有的學校開課講凱恩斯的經濟學，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批判。座談會上，科學家還談到了黨與非黨之間有隔膜的問題。翦伯贊說：「宗派主義的確好像一堵牆立於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目前牆是矮了一些，但是還沒有成一條線。要把牆拆除，得雙方動手，共產黨員要先動手。」翦還坦言：「問題在於許多舊知識分子還受到歧視，黨對他們的信任還不夠。」巫寶山說經濟學界的宗派主義也很嚴重：「在經濟學中，有着一堵牆，不是低牆，而是兩邊聽不見聲音的牆，它把新舊經濟學家劃分得很清楚。」[9]

毛澤東5月4日的指示下達後，中共更是主動組織各種座談會，特別是非黨人士座談會，給黨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見。5月6日和7日，中共中

央統戰部在清華大學召集座談會，研究高校裏中共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關係問題。一位民主黨派成員提了十六個字的建議：「門戶開放，權利平等，力競公擇，是存非去。」還有民主黨派人士說要「放心」和「放手」。過去，學校的一些重大問題，都是徵求過民主黨派成員的意見的，但是民主黨派成員只參加「施工」，沒有參加「設計」，只參加「演出」，沒有參加「排練」。座談會上還提出，黨和非黨的關係，是獨立、平等的關係，還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不少人認為，民主黨派除接受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外，在其他方面都是與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平等的。如何發揮民主黨派組織的作用？有人認為必須首先加強民主黨派成員的自我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得好，才能使自己的組織在理論上和思想水平上，同共產黨處於平等的地位，發揮的作用才會更大。也有人認為，要加強組織的作用，就必須加強領導的作用，希望民主黨派的領導機構能夠隨時對自己的成員提出具體要求。還有人認為，民主黨派成員應該更多地參加各種行政組織和群眾組織，以便在更多方面發揮作用，體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權利和義務。主持座談會的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他發表的意見顯得頗為開明。李說各民主黨派要求發揮更多的作用，這次清華大學調查中提出的「從設計到施工、檢查」的問題，是這個願望的表現，「這是對的，應該肯定。」李指責一些中共黨員對民主黨派的作用「還沒有正確的估計」，要求重視民主黨派，在政治上信任他們，在思想、學術上允許爭、放，解除某些壓力，克服中共黨內的宗派主義，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去掉中共黨員與民主黨派成員之間的「鴻溝」。李維漢甚至說：「校務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可以同黨委的意見不一致。共產黨可以在校務委員會上提出方案，民主黨派也可以提出方案，個人也可以提出。」[10]

5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作家座談會，二十多位作家參加。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魏文伯主持，康生參加了座談會。除了批評文藝作品少、文藝創作概念化和公式化之外，座談會批評得最厲害的就是宗派主義問題。作家巴金有個長篇發言，批評上海市委對文藝工作不重視，對文藝工作沒有認真研究，沒有討論，「常常匆匆作出決定，甚至發出粗暴的批評」，例如《解放日報》公開指責《文藝月報》沒有轉載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是犯了很大的政治錯誤」（其實《人民文學》也未轉載）。結果導致《文藝月報》的銷路從二十多萬份跌到二三萬份。王若望接着巴金的話說，這件事說明「牆內有牆」，黨內也有宗派主義。如對這種現象不滿意，就被看作是這些人的「同夥」。作家柯靈頗有同感：「這就是作家的團結問題、黨群關係問題，在這上面黨員應負更多的責任。例如，有一位黨員作家說這樣的話：『誰知道你們在國民黨統治區幹些甚麼！』……這種態度，正如《人民文學》社論裏

所講的：沾染上了國民黨作風。」[11]

這一階段的鳴放言論，基本上是針對基層單位的，所批評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也都是具體工作中的表現，而且完全沒有超出毛澤東歷次講話指出的範圍，也沒有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因此，對於中共高層領導人來說，是可以接受和容忍的。偶爾有些像雷海宗談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這樣顯然屬「出格」的言論，也是作為學術問題，允許各抒己見，平等爭論。《人民日報》轉載時不過是在編者按中指出：「雷海宗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又在雷海宗言論之後作編者註，稱雷所說「違反了事實」，指出列寧「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共黨人也「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得到了新的發展」。4月28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同是座談會參加者季陶達教授的文章，反駁了雷海宗的觀點。同時，也刊登了雷海宗的進一步解釋和說明性文章。[12]氣氛顯得十分平和。毛澤東是否都看到這些言論，無從知曉，不過總體上看來，他對此期的鳴放言論是滿意的。

毛澤東的秘書林克在日記中記錄了毛對這些言論的一些反映。4月24日談到馮友蘭、賀麟的文章[13]時，毛說：教條主義學問不多，未摸清舊知識分子的底，而舊知識分子被壓迫了一下，他們讀了一些馬列主義，摸清了我們的底。因此，現在應該壓一下教條主義，埋頭幾年學些學問，糾正教條主義，將來主要還靠他們。現在舊知識分子尾巴翹起來了，但最後教條主義糾正了，用說服辦法來說服舊知識分子。現在舊知識分子威風了，教條主義抬不起頭，會不會亂，不會亂，因為群眾有鑑別力。這裏，毛澤東指的顯然是學術思想爭論方面的問題，他很放心。5月6日的日記是關於政治問題的談話。針對當時社會有關「釣魚」的說法，毛澤東說：「釣魚，有人很怕，說百家爭鳴是為了釣魚。這看如何理解，百家爭鳴是方法還是目的？為了認識真理，那麼也可以說是釣魚，不過是釣兩條魚，而不是一條魚，一條是馬克思主義的魚，一條是非馬克思主義之魚，不僅是釣魚，而且是撒網。」[14]毛在這裏有些戲言，不過講的還是兩種世界觀方面明辨是非的問題，而不是政治運動的策略。

與整風再動員的同時，4月24日，毛澤東開始修改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從這一天起，「只要沒有重大活動，毛澤東就到游泳池專心致志的做這個工作」。根據胡喬木整理的記錄稿，經過半個月，到5月7日毛澤東改出「自修稿第一次稿」。其中與整風直接有關的補充內容如下：

——增加了關於民主和自由相互關係的論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並且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我們的社會裏，

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着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把另一個側面給否定掉。」

——「關於資本家的改造」，主要加了這樣一個觀點：我國私營工商業改造「所以做得這樣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密切相關的」。

——「關於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補充了三個內容。一是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最近幾年中有了很大的進步。二是強調團結知識分子，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進步。「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離開這些知識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進。」三是提倡勤儉建國。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原來講話論述比較充分，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補充的重要內容有：「我們提出讓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並且互相監督，只許做好事，不許做壞事，這有甚麼不好呢？無論是共產黨，或者是民主黨派，監督它們的首先是人民。再則，政黨的黨員又監督政黨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加上一條，各個政黨互相監督，這樣豈不是更有益處嗎？監督的方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是百花齊放、百花爭鳴的方法，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法，是解決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關於如何處理罷工、罷課等事件」，保留了原講話處理鬧事的四條原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義，使之不鬧；二、要鬧，就讓他鬧；三、讓他鬧夠；四、對鬧事的頭子不開除。又加了一句：「應該把群眾鬧事看作在特殊情況下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手段。」

5月8日毛澤東又接連改出兩稿（自修稿第二次稿和第三次稿），補充的相關內容主要有：

——談到不能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地方，補充了一段：「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產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為着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許多時候就行不通。何況政府與人民之間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間已經發生矛盾，不去調查研究矛盾的情況，討論解決的方法，單靠行政命令，會有甚麼效力呢？至於人們精神世界的問題，例如藝術、科學、哲學、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採用強制方法了。」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加重了對前幾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

肯定，又強調了對知識分子繼續進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對鬧事問題作了更周全的分析：「我們必須相信，我們的人民是很守紀律的，是很講道理的，他們決不無故鬧事。鬧事的只是極少數無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們。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家裏，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調整社會秩序，懲罰官僚主義。我們社會裏也有少數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對於這種人，我並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嚴格的懲治。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是違反群眾意願的。」

——在談到民主與專政的關係以後，加了這樣一段：「我們的專政，叫做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着過去的剝削者、壓迫者實行專政。所謂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在論述了只是有具體的民主和自由以後，補充了一段：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有些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在論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時，補充了兩段話：一段是關於這個方針提出的過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不是突然提出來的，醞釀了好幾年。互相監督，早已是事實，已有七年了，不過從現在起應當做得更好些。長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記得在1949年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含有長期共存這個意思的話，以後也說過。到去年，階級鬥爭基本結束，這個口號就可以明確地提出來了。」另一段是講為甚麼要讓資產階級政黨與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寫得很長，經過後來的修改，只保留了幾句話：「一個人或一個黨，耳邊如果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主要監督我們的是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並不是民主黨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還保留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話：「共產力量很大，怕的是沒有人講閒話，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後來再次修改時被刪去。）

5月9日和10日毛澤東再改出一稿，作為「草稿第一稿」，送劉少奇等人，並批示：「請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見，交陳伯達同志彙總修改。」[15]從上述增加的內容看，除對群眾鬧事的問題稍顯慎重外，對於知識分子、民主黨派、雙百方針等問題，都是更加強調和重視了，言詞上也顯得更加放得開。這與5月4日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說明毛澤東對這一階段整風運動的進展持肯定態度。

2 民主黨派座談會與知識界的鳴放

當毛澤東再次把注意力轉向正在熱熱鬧鬧開展的整風運動時，一個座談會引起了他的興趣，這就是中共中央委託統戰部邀集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16]這個座談會不僅規格高，與會者多為民主黨派領導人、著名無黨派人士和工商界代表人物，而且時間長，從5月8日至6月3日，持續二十七天。會上所談，最集中地代表了知識界、工商界和黨外人士的意見，其影響超過了社會上其他任何會議和活動。《人民日報》幾乎逐日對座談會進行跟蹤報道，刊發與會者發言，統戰部也隨時整理情況上報。

5月4日，李維漢約集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談話，並告知：統戰部準備在下周內舉行幾次座談會，邀集各民主黨派的主席、副主席、秘書長等負責人參加。會談內容，一是就各民主黨派在今年初舉行的全國性會議中提出的問題，着重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問題進行討論；二是希望各民主黨派對統戰部多提意見，幫助黨進行整風運動。李維漢希望非中共人士「不要講場面話，最好打開窗子說亮話」，並再次申明中共的意圖：各民主黨派目前不要單獨搞整風，主要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因為現在各民主黨派正在推動「百家爭鳴」，假若整個社會搞整風，就會打亂步驟，這樣對國家不利。李還建議，民主黨派如果要發指示，僅可根據中共整風指示的原則，講明自由參加各人所在單位中共組織的整風，也可隨時自由退出。這樣做，是因為這次整風的方法與過去不同，主要是用和風細雨的方法進行自我批評、自我教育。民主黨派沒有整風經驗，可以從中共這裏吸取經驗，將來再說。[17]

5月8日，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開始。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副部長平杰三先就召開座談會的目的、近年來檢查中共統戰工作的狀況以及當前黨派關係的一些問題作了說明，希望與會者多發表一些批評意見。在這次會上發言的，有民盟副主席章伯鈞、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民建副主任章乃器等。民盟副主席羅隆基在章伯鈞發言後，作了簡短的補充發言。[18]

章伯鈞主要是介紹民盟中央常委擴大會座談的意見。關於民主黨派成員發揮作用，章說：「有人說：幾年來，有些民主黨派的成員在國家事務中確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他們是有能力的，但是沒有條件。」他列舉選拔留學生、學校留助教、提拔等情況，說明非黨幹部受到了歧視。作為交通部長，章說：「現在，在非黨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實際上是黨組決定一切，都要黨組負責。既然要黨組負責，就不能不要權，這是形成非黨人士有職無權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國家機關中黨組和行政領導的職權要弄清楚，各機關的工作應由法定實行集體領導的

行政機構來決定。」談到對統戰部的意見，章不客氣地說：「民盟中有人認為：黨中央對統戰工作從理論、政策到貫徹執行和宣傳教育都重視得不夠。有人認為：民盟中央『帶病延年』，對長期共存方針無獨立見解，也無具體辦法，這點也是統戰部對我們的『病』幫助不夠，即互相監督不夠，統戰部也應該檢查。」《文匯報》對章發言的報道還有一段：「互相監督要有關開言論之路，這就要有園地、要有地方出版。」他建議「允許知識分子組織出版合作社，由國家貸款扶持」。[19]

章伯鈞第一個發言，就提出了一個異常敏感的問題：按照他的邏輯，要解決非黨幹部有職有權的問題，就必須改變黨組負責制。這大概就是最先引起毛澤東注意的言論——他竟把矛頭指向了黨的領導。章的發言得到與會者的呼應，儘管用語緩和了一些。許德珩灰心地說：九三學社帶病是帶病了，是否延年，還是個問題。「現在我們呼籲統戰部幫助，也就是帶了病，請統戰部給藥吃。」許還建議恢復雙周座談會，解決「一道牆」、「一道溝」的問題。陳銘樞把學校中的黨、團、工會比作「一條鞭」，說學校的領導多半是靠這「一條鞭」進行工作。陳認為，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今後應該更多地依靠教師和學生，學校中的黨委制，也應該從多方面考慮。機關中的黨組同學校中的黨委制有很大區別，黨組今後仍然應該存在，但在今後的工作中應該注意，對於一些有關方針、政策性的問題，要同黨外的負責幹部共同商量。陳也建議恢復雙周座談會。[20]

糧食部長章乃器認為，要解決有職有權問題，必須克服宗派主義思想，這樣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現在有一些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有人批評了黨，明明提的意見是對的，黨員也不承認。有人提的意見儘管是符合黨的政策的，但是只要黨員負責同志一搖頭，非黨員要堅持意見也是很困難的。」不過，章乃器申明：「我是有職有權的。在糧食部裏，黨組和我的關係是正常的，黨組管思想政治領導，我管行政領導，黨組和我有了分歧意見，要能說服我，我才同意。」說到這裏，章來了一句轉折：「但是我這個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現在，可以說，經過鬥爭達到了團結的目的。」

作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章乃器還談到了資本家的改造問題。他對4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工商業者要繼續改造，積極工作〉提出了批評：「文章中說工商界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這不只是教條主義，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義和神秘主義。照道教的說法，脫胎是脫凡胎，換骨是換仙骨。現在工商界已經過了五關（戰爭關、土地改革關、抗美援朝關、五反關、社會主義關），就是說，脫胎換骨的改造，也已經改造過了，如果還要脫胎換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無窮的憂慮，如何能不消極自卑？」在資本家改造的問題上，毛澤東屢次公開表明過態度，章

乃器的觀點也曾在民建內部會議上受到批評。[21]在這裏公開發表反對改造的言論，章乃器有意無意地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

座談會5月9日下午接着進行，發言的有民建副主任胡子昂、致公黨主席陳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侖、農工民主黨副主席黃琪翔、民建副秘書長譚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閔剛侯等。胡子昂繼續批評宗派主義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來以後，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需要更加緊密，但實際上不是緊密而是相對的疏遠了。「許多地方黨群關係尚有距離，表現為『敬而不親，親而不密』。有人說，黨與非黨的關係中間，好像有一堵牆，一道門檻，這堵牆、這道門檻雖然不一定很厚、很高，但是，不應該存在。」

陳其尤提出了肅反和法治的問題。他說，機關中民主黨派的成員肅反時有被捕的，但是民主黨派根本就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為甚麼而被捕。例如，科學院有一位致公黨成員被捕幾個月，致公黨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決定開除其黨籍。可是，不久以後，他又出來了，而且恢復工作。至於為甚麼被捕，又為甚麼釋放，致公黨根本不知道。陳質問：是不是因為不信任？還是因為把民主黨派當作一個與它的組織成員不相關的機關？陳其尤指出，無論甚麼理由，都是不恰當的，「因為這不是甚麼保密問題，而是是否守法的問題」。他還建議，國家的民法、刑法應該及早制定並切實遵行。波匈事件以後，毛澤東多次提到，正是由於中共搞了鎮反和肅反，才沒有「天下大亂」之憂。但實際上，肅反問題已成為中共的一塊心病，只是希望私下醫治而已。[22]這次在報紙上曝光，無異於揭開了中共的傷疤。

王昆侖談的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政權機關的作用問題。王舉全國人大的情況為例說，人大常委會了解情況少，具體討論少，個別接觸少。由於常務委員對國家情況不了解，常委會在討論議案時，往往是臨時討論，討論起來有困難。對於有人批評民主黨派的做客思想，王認為應該具體分析，要「看是不是把我們放在主人位置」。雖然人大在當時只是「橡皮圖章」，但畢竟代表着最高權力，民主黨派要求在這裏坐上「主人」的位置，自然在心理上對中共造成了威脅。

在5月10日第三天座談會上發言的有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陳銘樞，民盟副主席羅隆基、史良，中央常委楚圖南、曾昭掄，民進副主席王紹鏊等，民革副主席張治中因病未能出席，作了書面發言。這次座談提出的大多是建設性意見。

邵力子提了三個問題：民革聯繫的社會人士的生活和就業問題、黨政關係問題、互相監督問題，其中黨政關係問題最引人注意。他對黨組領導制表示肯定，但批評了「以黨代政」的現象：「黨在政府部門的領

導，最好是通過黨組。一切重大問題，黨組決定後，交由黨員去運用，使能貫徹執行。如果直接由黨發號施令，就會差一些。」還說：「在過去，黨中央有時同國務院聯合發布指示，當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後可否考慮分別發布指示，國務院向各政府部門，黨中央向黨的系統。」邵特別指出，縣以下領導機關「以黨代政」現象嚴重，縣長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縣委權力極大。縣人民委員會部門的工作同樣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縣委決定。

羅隆基從民主黨派的作用談到了黨政關係。他說，現在各民主黨派都參加了政權，但是過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問題，往往是在領導黨內討論以後才拿出來協商。羅希望今後這類問題要在黨內討論的同時，也交民主黨派去討論，並由有關方面事前提供情況和材料。他舉例說：「今天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科學規劃時，中共中央宣傳部有人參加會議，周總理說，各民主黨派負責宣傳工作的人也應該參加。」羅隆基建議黨政分工要明確：「現在，黨決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過行政而從黨的系統向下布置，只能使擔任行政工作的民主黨派成員感到有職無權。」談到中共與民主黨派之間的平等、獨立、自由，羅說應該創造一些條件，現在有些制度、規章有礙於平等、獨立、自由和民主黨派作用的發揮。

對於羅隆基的發言，《光明日報》、《文匯報》的摘引和報道與《人民日報》有較大差別，對毛澤東的刺激可能更大：「現在，強調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以及組織獨立、政治自由、地位平等，這就需要條件，而發展對象是重要條件，我們在發展對象上有很大困難。長期共存的條件之二，是民主黨派要起作用，但民主黨派怎樣才能有名有實，要做的工作又從何而來，在確定重大政策時起甚麼作用，都尚待解決。我們對很多情況不了解，現在是聯合政權，需要民主黨派起作用，就應該讓我們知道多一些情況。重大事件如過去的抗美援朝，和現在的解放台灣問題，共產黨早和我們商量，我們就能多提意見，起的作用就大些。」羅隆基還談到高等學校的「黨委治校」題，他說，「黨委治校」這一提法，是與中國政治制度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各民主黨派連政權工作都參加了，也可以參加學校管理。應該讓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發揮作用。民建是以企業為基地發揮它的組織作用，其他黨派也應該在學校起作用。[23]

羅隆基發言剛結束，史良就表示要和他「爭鳴一番」。她認為民主黨派能不能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並不在於民主黨派成員人數的多少，而在於民主黨派是否能在社會上發揮作用。史良談自己的體驗說，不參加共產黨，黨也是信任的，並不發生所謂對黨外人士就不信任的問題，也沒有感到在黨的領導下不能發揮作用。王紹鏊的發言對此有所呼應，他說：「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牆，不是一方壘起來的。光共產黨整風，牆

拆不幹淨。」

曾昭掄認為，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需有相應的制度措施保證，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後，某些制度還沒有改變，不能適應新的情況。「領導黨對國家重大問題先討論，是沒人反對的；不過，民主黨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較早一些參加討論，早了解些情況？」曾昭掄不僅提到了肅反，還批評了「三反」，他說：「三反和肅反鬥爭，成績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於有一些缺點，發生了不少副作用。三反鬥爭中的副作用，到現在五年了還沒有完全消除掉。政府是不是想辦法加以消除，這會有利於統戰工作的。」

5月11日發言的人較多，話題集中在制度問題上。民革副主席熊克武說，有職有權有責，這是職責劃分和有關制度建立的問題，應該確立合理地分工負責的制度。熊克武也談到了法制和肅反、三反的問題，他說：由於目前法制不完備，政策方針的宣傳不夠深入，不但人民群眾對某些事務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領導人有時也免不了表現出無所適從。民建中央委員千家駒指出：幾年來，黨中央和統戰部一再強調民主人士有職有權有責，雖不能說沒有改進，但為甚麼問題仍然存在？「除去統一戰線工作的政策思想沒有貫徹以外，還有制度問題，就是沒有好的制度來保證民主人士有職有權，來制約黨員的大權獨攬。」事實上，現在黨委或黨組代替行政。千家駒提出：「黨的系統應該是一條粗線，但是行政系統不應當是虛線。黨委或黨組應該通過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他也談到「三反」、思想改造、肅反運動，說鬥錯了的人應該向他解釋清楚，這不是算老賬。民盟中央常委黃藥眠說，當前最重要的缺點是黨與非黨的關係搞得很不好。他批評道，部分黨員恃功自傲，有特權思想，不甚讀書，靠黨吃飯，口談馬列主義，而不肯刻苦鑽研。解決這些問題，黃認為中共黨內要加強對統戰政策的宣傳和學習，「同時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應訂出一套制度和辦法加以保證」。

5月13日繼續開會，農工黨中央執行局委員嚴信民首先發言，他的言詞更加尖銳：「看起來，現在民主黨派同共產黨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離事實上的真正的平等還遙遠得很，因為事實上平等的條件還不存在，還沒有物質基礎。平等的權利是宣布了，民主黨派卻沒有資格去享受這權利。」嚴信民對「物質基礎」的解釋是：「總的說來，共產黨是強大進步的，民主黨派是弱小落後的，在這種情況下談平等是很困難的。」這個發言給人的感覺是，民主黨派正在要求與共產黨「平起平坐」。聽到這樣的言論，毛澤東的心情大概不會平靜了。

農工黨中央執行局委員李伯球認為，有職無權的問題，一般說來，是因為黨員中存在宗派主義思想，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有些共產黨員的

特權思想。他說，許多黨員「機械的用階級鬥爭的原則，來掩護他的特權思想；靠着黨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眾中崇高的威信來行使自己的特權。這樣問題就嚴重了」。無黨派人士張奚若發言講的是「三大毛病」，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來源。他說：有些黨員認為「天下是咱家打的」，於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們認為：給你一碗飯吃，給你官做就夠了，一切不過是為了團結，並不是你真正有甚麼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辦法辦，正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張的總結是：許多黨員居功而自大；知識水平低，經驗不夠，舊經驗不能用；任務又多又緊，沒有辦法。結果就只好靠三大主義辦事了。「先拿教條主義武裝起來，再拿行政命令執行教條，拿宗派主義保護教條。」這些說法同毛澤東對黨內的批評沒有多大差別，但言語中透着一種對共產黨員的輕蔑和厭惡，讓人聽了很不舒服。

在5月15日座談會上，無黨派民主人士馬寅初首先發言說：「目前有些批評不夠實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現象。」馬寅初以他在北大的工作為例，肯定學校黨委制是有好處的，並表示不贊成恢復校務委員會的建議。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提出了不同觀點，說他同意實行校務委員會，取消學校中的黨委制，但機關中的黨組與學校中的黨委制性質不同，不贊成取消機關中的黨組。民革中央秘書長梅龔彬介紹了民革幹部對統戰工作的意見。他說：「現在民主人士還沒有做到從『彩排』到『演出』、從『設計』到『施工』都能參加。」同邵力子的意見一樣，他認為中共中央同國務院發布聯合指示，縣以下「以黨代政」，這些做法都是不盡妥當的。梅龔彬介紹，關於民主人士的安排，有人分析有三種情況：有職無權；有名無實；無名無實。在他看來，有職無權現象在目前機關學校中極為普遍，而在民革方面嚴重的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以及「名」「實」皆無的問題。

無黨派民主人士張奚若發言講了「四種偏差」，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張奚若解釋說：好大喜功分兩方面，

一種是形體之大，以為近代的東西都必須大，許多建築很堂皇，但是並不太合用。另一種是組織之大，就是龐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費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組織規模大才過癮。急功近利的一種表現就是強調速成，不但對有形的東西如此，對無形的東西，尤其對高深的學問，也是如此。歷史是有繼承性的，但許多人忽視了歷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條。他們把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都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們認為，新的來了，舊的不能不打倒。其實，我們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而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和新社會都很少了解。當然，將來要比現在好，但不能說將來任何事情都是發展的，將來有的發展，有的停滯，有的後退，有的消滅，而發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機械的等速度的

發展。因此，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都是不對的。張奚若這四句話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並耿耿於懷，後來被多次當作批判的靶子。

5月16日是第一階段座談會的最後一天。民革中央常委黃紹竑首先聲明，他的發言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如果有人懷疑黨的領導權問題，那就與憲法的規定違背了」。黃認為，問題在於領導方法，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大、政府，而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例如，「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24]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黨和政府共同發布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指示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黃紹竑特別講到人大和政協的工作，建議人大常委、政協常委應該是專業專職。「有人說：黨派的領導人不能不兼，如果這樣說法的話，毛主席要兼多少職務呢？我以為在兩個常委內，各黨都有一定的員額就得了，何必限於那幾個領導人呢？」他講到，由於兼職人員過多，人大常委和法制委員會開會，「到會人數往往僅到達法定人數的邊緣，其中，我估計了一下，共產黨員缺額的比較多，儘管是因為兼職多、工作忙，但是，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來看，是會令人引起不重視的感覺的，是不是有人覺得問題已經在黨內決定了，常委會不過是形式的通過而已」。說到立法問題，黃說：「我們的立法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如果這些法規完備了，不但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問題可以解決，黨政的關係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黃還批評了中共評判工作的一個習慣性說法：「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的一種公式，這樣會意味着強調成績掩蓋錯誤，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就司法方面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全國範圍內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就國家經濟建設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不知要造成多少億元國家的財政損失，而人民間接的損失也是很可觀的。

談到黨政關係，無黨派民主人士陳叔通也質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下發指示的做法，他說：「當然，國家是由黨領導的，黨可以抉擇方針政策問題。但國務院是最高行政機關，我以為，有關行政方面的問題應由國務院發指示。因為聯合發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種印象：黨和政府一道發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國務院單獨發就不重要，這樣，就無異削弱了國務院的權力。」致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發言指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共事關係搞得好不好，黨與非黨兩方面都有責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責備賢者」的精神，黨員應該負主要責任。他批評有些機關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黨外人士的職權，讓民主人士參加了黨組

會議，但實際上還是不尊重人家的職權；在科學機關作領導工作的黨員，自己不懂科學，又不虛心學習，尤其不好的是不懂還要裝懂；有些黨員把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一律當成自己的下級，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也不給以應有的禮貌。嚴特別說到，「人事部門管得太多，黨外領導人對人事工作是無權過問的。人事部門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學術」。他希望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國家計量條例等，能夠盡快制定。民盟中央副秘書長葉篤義認為，過去幾年，民主黨派起了一定的帶頭、號召作用，但是，在對於制定國家的方針政策上，作用不大。希望「今後各民主黨派的中央和省一級組織，在制定國家的政策方針方面，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此，葉篤義建議改變民主黨派的組織形式。民盟、民進、農工民主黨和九三學社，都是團結不同方面的知識分子的黨派，工作對象互相交叉，因此發生「爭人」的現象，從團結五百萬知識分子着眼，他建議解散這四個黨派，另組一個知識分子的政黨。這個建議提出了一個更讓執政黨頭疼的問題，現在民主黨派不僅要求長期共存，而且試圖重新組織一個規模和影響都更大的聯合黨派了！

這裏大段摘引座談會的發言，是因為正是這些言論使毛澤東感到一種危險。儘管會上有不同的聲音，但發言內容愈來愈尖銳、會場情緒愈來愈激烈的趨勢，也是很明顯的。與此同時，引起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注意的還有社會上的鳴放言論。

各單位、各地方議論最多的還是黨群關係、黨政關係和黨與非黨的關係。關於高校領導體制問題，葉篤義在5月初清華大學座談會上發言，十分贊成改變高等學校的黨委負責制，他認為，過去黨委會管理太多，如果說黨與非黨有堵牆的來源，主觀上有些關係未處好是一個原因，但是不是有了黨的組織，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堵牆呢？葉提出，學校中不需要有黨派的組織活動，還建議全國政協成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處理知識分子的問題。[25]

在5月6日、7日、9日北京大學舉行的黨內外主要幹部會議上，許多教授認為，黨群關係不夠正常是目前學校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首先表現在依靠誰來辦學校的問題上。楊人楩教授說，1952年以來，提出依靠積極分子來辦好學校。但是這些積極分子到底是起了橋樑作用呢，還是使領導和群眾更疏遠呢？值得懷疑。將所有的人分為積極、中間、落後三類，只會發生不好的後果。有些積極分子，善於體會領導的意圖，實際上是思想上的懶漢。傅鷹教授說，他對「思想改造」這幾個字最反感。一聽到這幾個字，就聯想到清河農場的勞動改造。王鐵崖教授認為，現在是學校機關化、衙門化。用行政方法來領導教學和科學研究，已經形成一種風氣，人們不是以學術地位來衡量一個教授的學識才能，而是以甚麼主任甚麼長來表示一個人的學識才能，甚至在報上也出現了「某某

教授升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26]

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員、中南財經學院院長馬哲民批評說，中共不少領導人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儼然是「天生的聖人」。馬還沉痛地訴說：在武漢地區的高級知識分子，「感到內心確確實實有苦水，有牢騷，這是事實。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特別是在肅反運動的時候，使用極端粗暴的辦法對待他們，把鬥爭、禁閉等辦法施諸於他們身上，對於他們的人權都不重視。在這些運動中，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對於思想、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不加區別，打擊和鬥爭面太廣，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真把他們搞得太苦了，太傷心了」，「他們做人的起碼的自尊心都被毀滅了」。[27]

5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章乃器的文章〈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章指出，斯大林「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這句名言，就是「牆」和「溝」的一種思想基礎。儘管承認在毛主席的教導下中共黨員「絕大多數是樸素的、謙虛的」，他還是提出，黨在檢查大國主義和大漢族主義之外，也應檢查一下大黨主義，情況可能是很嚴重的。[28]

5月14日清華大學黨委邀請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舉行座談，幫助黨組織進行整風。張任教授說，有職無權可以這樣來比喻，參加施工的多，參加設計的少。例如送到國外去深造的名單，不是由教研室主任簽名推薦的，而是由上面提出來的，充分發揮各教研室成員的積極性，需要使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有職有權，不僅讓他們參加施工，而且也要他們多多參加設計。副教授方崇智列舉黨對高級知識分子不信任的種種表現，如外賓來清華參觀時，學校不許教授們用外文直接和外賓交談；教授們給蘇聯專家送禮物時，一定要經過系秘書；高等教育部曾再三聲明，教授不能與外國直接聯繫等。[29]

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員沈志遠5月16日在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言，題目是〈黨和政府不應管得太多太死〉。他說：「高等學校的黨委制，過去也可能起過好作用，但是現在在某些學校裏形成了以黨代政，非黨校長無權，校務委員會形同虛設，在系裏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的反常現象。為了改正過去的高等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我以為可以考慮學校黨委制的改變問題。」為了消除出版壟斷的弊端，沈建議放寬對出版事業的管理。他說：「今後出版事業應當向社會開放，允許志同道合的人開辦像同人出版社，同人雜誌社，書刊出版發行合作社之類的機構，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針措施，負起監督檢查之責，其他事情是少管為好，何況你事實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麼多呢。」沈志遠最後說：「不但要清除寄生在黨和政府機體上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

觀主義的三種歪風，而且還要把滋長這三種歪風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30]

鳴放中反映最強烈的還有肅反問題。據《零訊》[31]刊載的材料，早在4月的民革二中全會期間，邵力子就站出來強烈批評肅反運動，他說「要搞肅反由公安部搞，不要搞運動，群眾運動偏差大」。又說「在未判罪之前，都應作無罪看待，無罪關人是不對的」。還聲明：「今天我願意大聲疾呼：肅反肯定有偏差有錯誤，而且偏差、錯誤是很大很大的。逼口供，疲勞訊問，亂鬥一陣，這叫『大膽懷疑』！自殺了多少人，冤枉了多少人！」龍雲說「逮捕民革成員前，不通知民革組織是不尊重民革組織，互相監督也要互相尊重」。上海市各界民主人士對肅反的反映有三點：一、認為肅反工作有偏差，殺人太多。二、希望今後肅反不要採取「大民主」（發動群眾）的方式。三、認為共產黨說話不算數，解放時宣布「既往不究」，後來卻大究特究。《宣教動態》[32]的材料反映，北京師範大學民主人士也對肅反不滿。教授劉世楷說：思想改造、肅反運動太粗暴，我不贊成搞群眾運動。肅反應讓公安局去調查逮捕，怎樣能讓大家亂鬥？副教授何茲全說：肅反以後，好些人有話不敢說，怕抓住小辮子，將來算總賬，說明黨群關係有問題。我們系裏有五人被鬥，結果沒有一人是反革命，使人覺得不是反革命也可以鬥。[33]

在5月初湖南省宣傳工作會議上，大學教授和非黨人士提出，高等學校肅反工作的遺留問題沒有及時得到處理，很多人思想不安。有人認為在肅反中摘掉了政治問題的帽子，又戴上思想問題的帽子，不能令人心服。許多人認為目前高級知識分子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需要妥善處理那些在肅反運動中傷了心的同志的問題」。[34]遼寧省委組織部5月16日匯報了該省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在鳴放中對肅反運動的各種議論。旅大工學院有教授（黃炎培的兒子）說：「肅反運動在作法上粗暴，違反憲法，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因此說不上甚麼成績、是否必要的問題，問題在於以法治國，還是以黨治國。」有人說：「共產黨發動群眾批鬥肅反對象、組織鬥爭就是違法的。」還有人說：「肅反是一次有組織有領導的大規模的違反憲法運動。」這些言論對黨內幹部影響很大，如撫順煤校領導幹部說：「人家講的對是對，但我們不違法又有甚麼辦法。」還有個別領導幹部也私下承認「肅反運動就是犯了沒有劃清敵我界限的錯誤」。有些積極分子說：「現在看來，跟着共產黨搞肅反是搞錯了」，「當時就不應該鬥爭」。[35]

在鳴放中最積極的報紙要算民盟的《光明日報》。經章伯鈞同意，《光明日報》從5月4日開始，分別在上海等九個城市，邀請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舉行座談會，給中共提意見。為此，儲安平不僅親赴

上海，還寫了一個意見，提出「應當適當地估計被邀請的人士，平時是否意見較多及是否勇於發言」。此外，儲安平還發出百餘封組稿信，恭請大家在《光明日報》發表「對國家事務的各種意見」，並要求「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願意寫的問題」，要「結合互相監督的方針發言」。這個百名文人座談會足足開了二十天。會上發言踴躍，鋒芒畢露。儲安平覺得共產黨的「風」如要「整」好，當聽取這樣的意見；《光明日報》如要辦好，當刊登這樣的發言。所以，他認為九大城市的鳴放座談會是成功的典範，章伯鈞也極為欣賞。在座談會上，一些人從法制的角度對肅反發表的意見，被儲安平認為是最具建設性的意見，也是最有價值的新聞。他說：「這些發言才是政治問題的通論，只有登這些通論，才能把《光明日報》辦成知識分子論壇。」[36]

在民主黨派中，民盟最活躍，不僅開放言論，參政意識也很強烈。5月13日民盟中央作出決議，決定成立四個工作組，分別對「高等院校黨委負責制」、「科學規劃」、「有職有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四個專題進行研究，調查情況，分析問題，提出建議，以切實幫助中共搞好整風。各工作組成立後，分別邀請了有關人士座談討論。千家駒主持了「如何展開學術界的『百家爭鳴』問題」座談會，曾昭掄主持了「關於科學體制問題」座談會和「關於當前學制問題的討論」座談會，黃藥眠主持了「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問題」座談會。座談會的意見和建議後來還整理成〈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體制的建議（草案初稿）〉。[37]

有研究著作認為，5月上半月，「在報紙上發表的一些發言和報道、評論，愈來愈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似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發生了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於黨委（黨組）領導負責制；似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發生危機，快要混不下去了。」[38]這個論斷有些言過其實。筆者以上所引言論，有意挑選了言詞比較激烈和尖銳的那一部分，即使如此，也看不出其中有共產黨「快要混不下去」的意思。這一階段的鳴放者基本上都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中有地位、有影響的非黨人士和知識分子，至少毛澤東注意的是這些人。所有他們的言論，都是在毛澤東的熱情鼓動和中共的誠心請求下鳴放出來的，真可以說是「千呼萬喚始出來」。仔細分析這些言論，大都是針砭時弊、切中要害的，縱使有一些錯誤或不敬，也是出於善意，可謂秉筆直書，光明磊落，況且有些說法，比如改變高校黨委領導制，填平黨與非黨之間的深溝，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唱對台戲等等，本來就是毛澤東的語言，或受之啟發的聯想。然而，就是這樣一些言論，就在這短短的幾天當中，毛澤東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頭，他要改

變整風運動的方向了。

3 毛澤東感到事情開始發生變化

毛澤東究竟是甚麼時候開始警覺的？到底哪些言論讓他感到不安了？

關於毛澤東開始警覺的時間，一般研究者都認為是5月中旬。這個說法應該可以接受，但是過於籠統，因為就是在這幾天當中，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究竟怎麼變的，決不是一個「5月中旬」可以解釋的。況且，很多論著提出這種說法的依據是靠不住的。

人們最常引用的是李維漢的回憶。李維漢說：

> 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5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甚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決定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着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39]

李維漢的這段記憶很不準確。統戰部的報告對毛澤東有很大影響，這應該是事實。[40]但是第一，目前所有（內部和公開）的資料都不能證明在5月15日前的座談會上有誰發表過「輪流坐莊」、「海德公園」之類的言論。像這樣刺激的言詞大概不會逃過記者的眼睛，而當時統戰部對各種報道又均未有刪改。[41]第二，從座談會一開始《人民日報》就作了詳細報道，而不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匯報後才開始的。第三，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在1956年民盟工作會議，而不是在1957年座談會上。[42]

至於「外行領導內行」的說法，更是早在整風運動之前就有，如前所述，毛澤東曾多次提及，並認為有一半道理。

李維漢所說的毛澤東5月15日「寫出」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正是他和其他許多人判斷毛澤東決定開始反右的時間的依據，甚至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發出了反擊右派的信號」。[43]這裏也有很大問題。這篇文章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刊載時，所署時間確是5月15日，但編者有題註稱：文章最初的題目是〈走向反面（未定

稿）〉，署名「本報評論員」。審閱第一次清樣稿時，毛澤東改題為〈事情正在起變化〉，在清樣上方寫了「內部文件，注意保存」的字樣，並且在題下寫了「（此文可刊登黨刊，但不公開發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寫的）」，署名改為「中央政治研究室」，同時對清樣作了少量文字修改。這次修改和批註的時間是6月11日。6月12日，該文印發黨內。在閱看已經印發的這篇文章時，毛刪去了原來的題下說明，改署名為「毛澤東」，改時間為「5月15日」，並在「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後面加寫了如下文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44]如此看來，第一，此文應是5月中旬起草，6月11日定稿的，所以人們看到的文字反映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毛澤東5月中旬的想法，而是反右運動開始以後的想法。第二，此文原是毛澤東準備為《人民日報》寫的評論員文章，後來才改作黨內文件，所以其用意可能會有很大不同。因此，這篇文章根本就不能作為判斷5月中旬毛澤東有何想法的依據。[45]

至於哪些言論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很多研究者和當事人的推斷都是：「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等，認為毛澤東受到這些言論的刺激，才決心反右的。[46]不錯，這些說法可能最令毛澤東惱怒和反感，後來也成為反右派運動集中批判的靶子。但是，在中共中央發出準備反右和「引蛇出洞」的指示之前，上述言論還都沒有發表，因此不可能成為引發毛澤東改變主意的依據。

李維漢有一個說法很有理：「中央當時發動這一場鬥爭，有一個醞釀和發動的過程。」[47]筆者將能夠找到的有關文獻、史料按時間順序排隊進行分析，希望能看清毛澤東這段時間思想變化的軌跡。

首先是5月12日林克的日記，這則史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可以說明毛澤東思想變化的最早的證據，故極為重要。這一天的日記如下：

> 毛主席在同我談話時說，目前全國已經爭鳴和齊放起來，知識界爭得最響。民主黨派不那麼響，工商界最先神氣，章乃器、羅隆基、章伯鈞、陳銘樞等人發言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爭名奪利的本質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1956年算起可以說是一種典型。有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來到，各種蛇也開始動起來了。民主黨派某些人及資產階級某些人的鳴放，並不增加他們長期存在、共同監督的資本，相反某些言論會使它〔他〕們在群眾中喪失威信，這樣就不是長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張奚若談得好，己不正焉〔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
> 毛主席還談到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問題。他說，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但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

是看問題有左的片面性，他們克服了片面性會大進一步。他們所以寧左勿右，他們是要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人則比較危險。

毛主席進一步談到爭鳴和齊放的限度是甚麼？限度就是不能火燒房子。批評應該：（1）有利於人民民主專政：（2）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3）有利於黨的領導。而共產黨的領導是有決定性的。

毛主席在談到新聞自由問題時說：新聞就是要控制，新聞應該服從國家的經濟的基礎，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為無政府主義的經濟服務。例如：1956年上半年農業合作化時，只能宣傳發展合作化的方針，不能存在（宣傳？）削減農業合作化的方針。黨內存在兩條方針就會為工作造成損失。……〔此處幾句字跡不清〕更不允許煽動性報道。

目前有三方面情況不報道或加以控制：（1）肅反案件；（2）物價；（3）外交政策。

關於反社會主義言論，可以多登一些，這有利於我們。[48]

由此可以判斷，這時毛澤東已經發現鳴放中有問題了，雖然不是多嚴重，但主要有兩個「危險」傾向：「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有所表露」。核查被點名的這幾個人當時的言論，引起毛澤東注意的應該是章伯鈞、章乃器關於改變機關黨組制和要職要權的言論，陳銘樞和羅隆基改變學校黨委制的言論，以及羅隆基要求給予民主黨派「平等、獨立、自由」的言論。於是，毛澤東提出了鳴放的三個「限度」，核心是黨的領導。還有，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各種蛇」開始動了，又說「反社會主義言論，可以多登一些」，表明他這時就產生了「引蛇出洞」的念頭。再有，對新聞報道提出三個禁區，說明毛澤東對局勢的發展開始有些擔心了。也有一點疑問：張奚若講民主黨派先要正己方能正人是在5月13日（14日《人民日報》刊出），毛如何在12日就引證呢？或許張以前也說過這話，或許林習慣第二天追記日記？這倒不是很重要，但有一點毫無疑問，毛澤東這時肯定還沒有看到張奚若5月15日關於「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發言，否則就不會以讚許的口氣提到他了。

感到問題的不止毛澤東一人。5月12日接見東歐客人時，周恩來談到：最近我們搞整風運動，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內部有矛盾，並且大力揭露矛盾，加以克服。我們鼓勵黨外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我們提意見。其中少數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應該全部接受；大多數意見是有正確的部分，同時也有不正確的部分，我們應該接受他們的正確部分，對不正確部分也不忙於做解釋，日後慢慢地講清楚；另外，還有極少數人是對我們懷有敵意的。現在要讓大家「放」，讓大家「鳴」，黨員與黨外人士間的隔閡也要清除。[49]不過，應該如何對付「極少數人」的敵意，只

能聽毛澤東的決定。

5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兩篇文章表示一切如常。一篇是讀者來信〈不能強迫非黨同志參加整風〉，一篇是《解放日報》5月9日社論〈好得很，還是糟得很？〉，批評黨內幹部對大鳴大放的錯誤認識。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談職工鬧事〉指出：「凡是鬧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義比較嚴重的地方；職工不能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正常方法去解決問題的時候，才被迫走鬧事這條路。」至少到這時，毛澤東還沒有作出新的決定。從各方的文獻材料看，政治局10日開會通過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文件後，直到13日，毛澤東沒有召集過會議。還有，13日陳雲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電報，其中指出：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方面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普遍存在，要求「各地各部門應在整風運動中發動群眾予以揭露，組織力量，抓住重點，進行系統地檢查、糾正」。[50]從電報的口氣和內容看，也絲毫沒有脫離中共中央整風指示的框架。

14日發生了變化，但不是在白天。這一天毛澤東要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閱讀5月10日《解放日報》，該報第二版以〈大膽揭露矛盾，幫助黨內整風〉為題，整版刊登了上海二十二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的發言摘要。毛澤東寫了批語：「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又批示：「請你們注意看上海解放日報，南京新華日報，上海文匯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集中看人民內部矛盾和我黨整風消息，這是天下第一大事。」[51]有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在這裏是要提醒人們注意運動出現的危險傾向。[52]這個解讀恐怕有些偏頗。仔細翻閱這份《解放日報》可以發現，報上所載言論雖然數量很多（整整一版），但涉及的都是具體單位、具體個人和具體問題。[53]同《人民日報》刊登的民主黨派座談會發言相比，上海中小學教師們所提意見要溫和得多，而沒有涉及政治制度、幹部人事制度、經濟方針、歷次運動遺留問題等。如果毛澤東要提醒中共領導人注意極少數人的錯誤言論，完全可以指出民主黨派座談會的發言，正如他本人注意到的那樣，而不必拿出上海教師座談會為例。筆者認為，毛澤東要求劉少奇等人「過細」地看這張報紙，其用意還是在於說明發動整風的必要性，說明黨內問題的嚴重性。或許毛澤東想以此為自己積極發動整風運動辯護，至少可以感到，毛澤東在意識到危險傾向開始出現的同時，仍然認為執政黨本身的官僚作風和腐敗墮落也是危及政權的重要因素。

5月14日晚上9時至次日凌晨1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李維漢、康生、陸定一。[54]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承〉。[55]指示分兩部

分，內容是：

>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道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道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
> 但是，在報道中，有三類言論必須加以領導和控制，即：（一）對於市場物價容易發生影響的消息和言論；（二）違背國家外交政策，易為帝國主義挑撥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論，其中包括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消息和言論；（三）涉及個別肅反案件具體事實的消息和言論。
>
> 以上各點，請即召集黨報負責同志加以布置，至要。[56]

解讀這個文件應該看到：第一，中共高層領導這時已經一致認識到，整風運動中暴露出一些「右傾分子」和「反共分子」；第二，應對這一現象的措施是讓他們繼續暴露，在報道時不作任何刪節。這與毛澤東12日私下談話的思路相同，「引」蛇出動的策略尚未形成，但呼之欲出；第三，使用「右傾分子」和「反共分子」這兩個概念說明，在未來的鬥爭中，還是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屬人民內部矛盾，後者屬敵我矛盾；第四，對輿論的領導和控制還是限於毛澤東12日談話指出的三個方面，只是順序調整一下：物價、外交、肅反，顯然是有些擔心出現社會動亂。

在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進一步解釋了中央的指示，強調說：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放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57]這個講話貫徹了14日指示的精神，但使用的是「右派」這個概念，說明此時還是把這些人作為人民內部問題的。

5月16日晚9時至次日凌晨1時20分，毛澤東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人員增加了吳冷西，會議也沒有記錄。[58]當天，毛澤東又親筆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發至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中央直屬

部委首長，各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指示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說：

> 自從展開人民內部矛盾的黨內外公開討論以來，異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詳細情況，我們過去幾乎完全不知道。現在如實地揭露出來，很好。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牆，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凌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幹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歷低，學問少，不向資歷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搬〔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無論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態度十分惡劣，已為多數群眾所不信任的同志應當迅速調動工作，以黨外資歷深信譽好的人員充任，或以勝任的黨員充任，以利團結黨內外，改進工作。[59]

這裏仍然強調了提出整風運動的宗旨，言語之間透出一種急迫的心情。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最後提到了幹部調動的問題，這與動員時所說重在思想教育，不做組織處理的原則就有差別了。顯然，毛澤東急於看到轉變黨內作風、密切黨群關係、恢復黨的威信的結果，是為了按照原來的部署：結束黨內整風後，進行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其他各界的整風。對於這一階段的鳴放言論，毛澤東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就連傅鷹那樣言辭激烈的「鳴放」，都認為「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傅鷹在北大一個小型座談會發言時，情緒激昂，口無遮攔，非常引人注目。中宣部派往北大蹲點的龔育之當時聽了發言後，即認為「內容尖銳」，「十分重要」，且「因為傅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且有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故堅持整理出全文刊登在《宣教動態》（1957年第51期）上。[60]可以斷定，如果不是毛澤東的金口玉言，博鷹這個發言在反右時必定被作為典型的右派言論。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指示中特意對這樣一個「代表人物」點名保護，一則說明他當時還是有意保護大多數鳴放者的——他們畢竟是在他的鼓動下站出來給黨提意見的，二則說明他當時對哪些人屬「右傾分子」或「右派」是心中有數的——因為他們的言行超越了他一貫堅持的政治界線。

16日指示的第二部分正是針對這些人的：

> 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

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這一點，五月十四日我們已告訴你們了。為了研究問題，請你們多看幾種報紙。有些地方例如上海黨外批評相當緊張，應當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爭取勝利。[61]

與14日指示相比，這段文字顯得明確而嚴厲。說這些「右翼分子」或「右派」具有「反動面目」，「帶有反共情緒」，又說他們「企圖」把運動「引導到錯誤方向去」，表明毛澤東更加深了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不僅是「不要反駁」、「不加粉飾」、不要「刪節」，而且還要「放手讓他們發表」，表明運動進行到這時，中共高層開始醞釀反擊「右派」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也已露出端倪。李維漢說工商界座談會開始時（5月15日），「中央要反右的方針在我腦子裏已經清楚了」，[62]同樣證實了這一點。

就在這一天，行動開始了。到5月16日，統戰部召集的民主黨派座談會已經開了7次，共36人發言。按照統戰部原來有個打算，這時應該結束座談會了。5月12日統戰部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時就說，座談會「再繼續兩三天即可結束」，並準備採取以下幾項措施結束會議：一恢復以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基礎的座談會，討論國內時事政治問題、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問題和國際問題；二、根據民主黨派的要求成立一個有關黨派事務問題討論會，由各黨派和統戰部負責人組成，研究各黨派之間的相關的問題和需要統戰部幫助解決的具體問題；三、將座談會上提出的問題整理為兩類，分別交給上述兩個座談會處理。同時採取個別交談、中層座談會等辦法繼續聽取意見；四、對座談會提出的各種批評和意見，統戰部準備分為三類，分別供中央考慮、由中央統戰部處理和交有關部門考慮。統戰部還考慮，「對錯誤意見，在這次會上不作答覆，往後再處理」；「對於統戰部的批評，聲明在整風到適當段落時，向大家報告」。[63]這些安排，分明就是要進入下一階段工作——處理這些鳴放意見了。然而，幾天後情況就變了。李維漢在16日會議結束時宣布：休會幾天，成立一個小組，把與會者談的問題加以排隊，準備以後繼續開會。李肯定座談會「對全國整風運動起了推動作用」，座談會還接受全國政協秘書長邢西萍的建議，推定全國政協副主席章伯鈞向政協常委會報告。[64]在此前一天，統戰部又聯合國務院第八辦公室[65]邀集工商界召開座談會。

這一切表明，是民主黨派座談會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時間應在5月12日。14日中共中央統一了思想，並決定讓右派繼續暴露。從16日開始，整風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式實施了。

[1]毛澤東認為「民主黨派都是知識分子」。參見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省、安徽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0日。

[2]麥克法夸爾認為社論與中央指示有「嚴重分歧」，理由是它有意貶低批評官僚主義和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報告的意義。參見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頁327—328。這種估計多少有些牽強，其實在當時毛本人提到「三害」時，「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排列也是經常調換的。此外，社論在講述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的歷史淵源時，也沒有忘記突出其新的理論發展。

[3]雲南省檔案館，2-1-2745，頁1—2。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96—297。

[5]如見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514；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99—100。

[6]《人民日報》，1957年4月21、22日。

[7]《人民日報》，1957年4月23日。

[8]《光明日報》，1957年4月26日。

[9]《人民日報》，1957年5月1日。

[10]《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

[11]《解放日報》，1957年5月8日。

[12]《人民日報》，1957年4月22、28日。

[13]兩篇文章均見當天《人民日報》。

[14]林克：《林克日記（1955—1964）》（手稿），未刊，頁34—35、36。

[15]以上修改文稿的內容，均見逄先知、李捷：〈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頁21—25。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685。

[17]轉引自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99—100。

[18]以下座談會發言，如無特別註釋，均引自1957年5月9、10、11、12、14、16、17日《人民日報》。

[19]《文匯報》，1957年5月9日。

[20]雙周座談會是第一屆全國政協設立的，是各黨派共商國事的一種形式，第二屆全國政協期間無形中斷。這次座談會因不少人提議恢復，李維漢同意各民主黨派推舉代表共商有關實施及具體問題。座談會推舉的代表有邵力子、羅隆基、譚志清、許廣平、黃琪翔、嚴希純、茅以升，召集人是羅隆基。5月12日，統戰部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表示同意恢復雙周座談會，並提出了具體組織辦法，即大體上由各民主黨派推出一至五位代表參加，中共方面推出五人參加；民主黨派大體是主席、副主席，中共方面擬議為董必武、彭真、康生、李維漢、徐冰。參見《人民日報》，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致彭真同志核轉中央書記處，1957年5月12日。以羅隆基為首的九人小組6月3日提交了他們起草的雙周座談會章程草案。參見《光明日報》，1957年6月2日。後來因展開反右派運動、統戰部的建議未能實施。

[21]見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93，頁7—9。

[22]到1956年底，中共已經認識到肅反中有許多「左」的偏向，不僅「打擊面過寬」，而且採取了一些「非法手段」。參見中央十人小組關於肅反運動的當前情況和1957年的工作向中央的報告，1956年12月7日，陝西省檔案館，123-40-1，頁134—146。對此，毛澤東在國務會議上提出，在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主持下，由黨外人士「對肅反工作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參見中央十人小組關於準備迎接全面檢查內部肅反工作的通知，1957年3月9日，陝西省檔案館，123-40-1，頁178—181。此事沒有公開，但中共確想盡快糾正肅反中一些錯誤做法。

[23]《光明日報》、《文匯報》，1957年5月11日。

[24]「五人小組」是中共黨內主管「肅清反革命運動」的機構。最早是1955年5月設立的中

共中央處理「胡風反革命案五人小組」，組長為陸定一，副組長為羅瑞卿：同年7月，這個小組擴大為十人小組。緊接着，各地方各部門乃至部分單位都設立了「五人小組」。

[25]《光明日報》，1957年5月8日；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101—102。

[26]《人民日報》，1957年5月10日。

[27]《光明日報》，1957年5月8日。

[28]《人民日報》，1957年5月14日。

[29]《人民日報》，1957年5月15日。

[30]《解放日報》，1957年5月17日。

[31]《零訊》是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一種不定期內部刊物，主要反映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知識界的動向，專送中共高層參閱。

[32]《宣教動態》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內部刊物，專門反映意識形態領域、文教系統的動向，只送中共高層領導人和中共中央有關部門。

[33]陝西省檔案館，123-40-47，頁35—43。

[34]《內部參考》，1957年5月9日，頁19—20。

[35]陝西省檔案館，123-40-47，頁31—33。

[36]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52。

[37]前者發表於6月9日《光明日報》，後者於6月17日分送有關方面徵求意見。在反右鬥爭中，這兩個文件都成了「章羅聯盟」的「綱領性文件」。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87—88；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283—285。

[38]《毛澤東傳（1949—1976）》，頁690。

[39]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33—834。

[40]根據毛的秘書陳伯達回憶，統戰部在一份報告認為，座談會發言中有一部分是很錯誤的。這個報告對毛主席有較大的影響。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148—150。

[41]統戰部當時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稱，新華社和報紙關於座談會內容的報道未經統戰部審稿。參見中央統戰部給中央書記處的書面報告，1957年5月12日。

[42]《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5號，頁100。據吳晗的發言，羅隆基說的是「今天的矛盾是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的矛盾」，與李維漢的回憶略有不同。羅隆基後來在報紙上公開檢討5月10日座談會的發言時，確實提到了這句話，但他說明那是在民盟工作會議講的話。參見《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有研究者認為，聽了李維漢的匯報後，正是羅隆基這句話刺痛了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毛澤東，他才決定開始「收綱」的。參見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頁50。這裏的誤判顯然是因為作者沒有仔細看報。

[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82。

[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475—476。此文首次發表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5]順便說一句，很多論著在研究毛澤東如何決定進行反右的問題時，都非常看重此文。但筆者的考察結果認為，對於所要回答的問題而言，與其他相關的文獻和史料比較，這篇文章的研究價值最低。理由：此文是毛澤東後來修改的，如果研究者不知道修改的內容和過程，那麼在這裏可以看到的，充其量是毛澤東知對知識分子估計過高、對局勢判斷失誤後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心情及文過飾非的手法。況且，文中所述內容，在其他文獻裏也大多講過了。

[46]如見李新：〈反右親歷記〉，載蕭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15—17；林克等：《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5—46。

[47]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33。

[48]林克：《林克日記》（手稿），頁37—39。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77），頁42。

[50]《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1。該文件5月19日發出，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274—275。

[5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68。

[52]《毛澤東傳（1949—1976）》，頁689—690。

[53]《解放日報》，1957年5月10日。

[54]《毛澤東傳（1949—1976）》，頁690—691。

[55]儘管會議沒有留下記錄《毛澤東傳（1949—1976）》，頁690—691），但鄧小平在兩天後的一次談話中說到，該指示是政治局會議作出的。參見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講話（摘抄本），1957年5月16日。

[56]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二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18。

[57]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講話（摘抄本），1957年5月16日。

[58]《毛澤東傳（1949—1976）》，頁690—691。

[5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77—478。

[60]龔育之：〈毛澤東和傅鷹〉，《百年潮》，1997年第1期。文中轉引了傅鷹的大部分發言內容。

[6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78。

[6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34。

[63]中共中央統戰部致彭真同志核轉中央書記處，1957年5月12日。

[64]《人民日報》，1957年5月17日。

[65]國務院第八辦公室為國務院辦事機構，1954年11月設立，職能是協助國務院總理分管對私人工商業改造的事務，並代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 陰謀：在「引蛇出洞」策略下的事態發展

面對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矛盾，特別是波匈事件前後中國社會發生的種種問題，毛澤東的設想是，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執政黨內，在於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那麼就必須開展一場黨內整風運動，並給整個社會一定範圍內的民主和自由，號召黨外人士提意見和建議，同時調整各項政策方針。這樣，既可以克服執政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又可以平息群眾的怨氣和不滿，調和社會關係。然後，在比較寬鬆和諧的環境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投入經濟建設的熱潮。當然，毛澤東和中共對於國內的「敵對力量」並非毫無警惕，但是他們並不擔心會出大事，毛澤東斷定在中國「像匈牙利那樣的七級颱風颳不起來」。畢竟，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

然而，在具有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看來，中共建立起來的「先進的社會制度」，與他們理念中的民主和自由相差甚遠。於是，在相信毛主席和共產黨的前提下，他們針對黨派關係、黨政關係、立法和執法問題、幹部人事制度等有關國家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深層問題發表了許多意見，尤其是對中共執政以來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政治運動和農業合作化、手工業改造、私營工商業改造、建設中的冒進等經濟政策提出了質疑，這就大大超出了中共和毛澤東預設的「解決作風問題」的界限。毛澤東這時隱約感覺到，這些言論（不是某句話或幾句話）已經形成了一種情緒、一種空氣、一種傾向，可能危及到中共的領導地位。所以，必須予以反擊。儘管此時尚未決定何時反擊，如何反擊，但「引蛇出洞」或欲擒故縱的策略已經確定下來。

1 毛澤東親自策劃的「陽謀」

對於反右派運動的策略，毛澤東不承認是陰謀。他後來在報紙上公開講：

> 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甚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甚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

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1]

毛澤東的話有一點是完全違背事實的，即中共中央的這個指示是在5月14日和16日而不是在5月8日或此前發出的。毛澤東這樣說的目的，就是要讓人們以為中共中央（或他本人）早已料到民主黨派座談會上會有「右派言論」，是有意讓他們這樣鳴放的。如此，一方面把座談會上令他感到不悅的人物說成是「牛鬼蛇神」，把那些「帶有反共情緒」的發言定性為「毒草」就順理成章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一切都是在他的預料之中的，以阻塞黨內（特別是蘇共）對他鼓吹大鳴大放的「不慎行動」的質疑。至於說在提出雙百方針時就已「安民告示」，更是強詞奪理——只要把他一年來的講話都翻出來看看，就一目了然了。毛澤東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在知識分子面前掩蓋他言而無信的政治權術，更主要的是在國內外的共產黨面前掩蓋他對中國社會和局勢的判斷「失誤」。正因為如此，他在5月中旬後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右運動中，其熱情和關注程度，比發動整風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5月上半月，真正實行開門整風的主要還在中央，也就是統戰部召開的引人注目的座談會，絕大多數單位和地方都行動緩慢。所以，在中央開始轉向的時候，各地的整風運動才剛剛開始。比如雲南省，就是在5月14日這一天，成立了以謝富治為書記的十二人整風領導小組。[2]謝富治在當天的整風運動動員報告中，講述的完全是中共中央整風指示的精神：強調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重重矛盾，首先必須認清黨的責任，把黨風整頓好；處理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論是哪方面的錯誤和缺點，責任主要是在我們這一邊」；「工人、農民、學生中間鬧事，固然有種種的原因，但是主要是我們的官僚主義，不了解情況，不傾聽群眾的意見」。[3]5月16日，雲南省委研究整風問題的精神傳達到基層，仍然是宣講中央整風指示，只是態度比較慎重。省委要求「各地注意保持頭腦清醒，不要輕易發動群眾搞反領導上官僚主義的運動，以免陷於被動」。按照省委的安排，「目前整風只在省委、地市委中開展，整風的重點只是縣以上幹部」，其他人主要是學習文件，「正面體會」。[4]

即使在北京，情況也是如此。直到5月16日，北京市委才發出了整風計劃的通知。北京的安排是，學習文件全面開展，工作和思想作風檢查分批進行。在學習和討論文件的同時，開始有計劃地分別找黨內幹部和黨外人士開座談會，廣泛地徵求意見，廣開言路，充分發揚民主，放手鼓勵批評，解除各種顧慮。檢查的方式，既要嚴肅認真，又要和風細雨，凡是有不同意見的，就要展開爭論，應當允許進行反批評和申辯，對於一些帶原則性的問題，在討論以後應當作出結論，同時允許保留不同的意見。「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5]

這些部署顯然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晚了一拍，但正好趕上新的安排。整個「陽謀」就是從中共中央接連發出兩道密令後開始的。一方面在社會上大力宣傳，公開鼓勵和號召黨外人士參加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一方面在黨內迅速分級傳達中央的新精神，以便安定人心，做好反擊的準備。

5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歡迎非黨同志幫助我們整風〉，評論指出：「在整風運動期間，我們所要求於非黨同志的，是大膽尖銳毫無保留地揭發我們各方面的缺點和錯誤，幫助黨員進行整風。」「目前，許多中央機關以及一部分地方黨組織，都正在邀請各方面的非黨同志舉行各種座談會，傾聽他們對黨的批評。」「黨組織可以更廣泛地運用這種形式。部可以召開座談會，局、司、處、科也可以召開座談會；可以邀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高級知識分子、擔任領導工作的非黨同志進行座談，也可以邀請機關中一般的非黨幹部進行座談；座談會的規模可大可小，不用會議形式而用個別的訪問談心也可以聽到很多對黨的意見。」總而言之就是採取各種方式讓黨外人士說話。

5月1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社論〈繼續爭鳴，結合整風〉，社論說：「我們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這就應該讓各個方面人們的各種不同的意見都講出來，大家推心置腹，暢所欲言。這樣才算真正地實現了『百家爭鳴』，同時幫助了我們黨的整風運動。」「我們希望在繼續爭鳴，結合整風的過程中，黨內外的意見能夠進一步溝通，彼此推心置腹，親密無間。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應該繼續鼓勵人們大膽地爭鳴，配合我們黨內的整風，隨時揭發和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隨時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有些用語是直接摘自中央16日指示的，不過只引用了前半部分，而且主要是說給黨外人士聽的。

中共中央14日和16日指示如何傳達的情況，目前尚無文獻資料可以說明，但筆者看到的兩個回憶史料說明，文件的傳達非常迅速，範圍也比較廣泛。

時任《人民日報》四川記者站負責人紀希晨證實：5月17日晚10點多，《人民日報》編輯部電通知：「今天下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劉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時期，全黨開展整風，北京、上海動得早，開始鳴放，但全國還沒鳴放起來，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全國各省市都要開展鳴放，幫黨整風。各民主黨派，黨內黨外，甚麼話都可以講，就是罵共產黨的話也要讓他們放出來，記者要按原話寫。各記者站都要發整風鳴放稿件。你們四川明天就要發條消息來，沒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廳、統戰部看看，舊材料也可以發來」。第二天，四川省

委書記李井泉召集常委擴大會議，聽了記者站匯報的情況後，決定立即開展鳴放。[6]《人民日報》編輯部這個通知顯然是按照中央的新精神傳達的，只是對記者們不能明說而已。省委召開緊急常委會，當然不只是聽編輯部的電話通知；當場便布置鳴放工作，則說明此前省委必定已經接到中央的指示。

當時負責《文藝學習》編輯部工作的作家黃秋耘證實：5月18日晚在邵荃麟家聊天時，周揚來電要邵去參加緊急會議。邵時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接聽電話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臨走時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又叮囑說：「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7]很明顯，周揚要在緊急會議上傳達的，也是中共中央的新指示，而且，對於整風運動將要轉向，省部級領導人已經心知肚明了。

甚至一些民主黨派領導人也接到了通知。6月1日，民革副主席何香凝在座談會的書面發言，與其說是給中共提意見，不如說是對民主黨派的告誡和責備。何希望各民主黨派誠誠懇懇幫助領導黨，「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意背道而馳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香凝用了很大篇幅講國民黨的右派歷史，然後聯繫到現實說：「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她指責「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裏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裏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8]人們當時或許沒有注意到，自開展整風運動以來，這是「右派」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而此前只有中共中央在內部文件中使用過。

於是，各種「引蛇」和「釣魚」的行動便大規模展開了。根據5月下半月《人民日報》的報道，各部委、各地區、各大學、各學會都紛紛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所有這些座談會，就是要鼓動非黨知識分子站出來講話，給共產黨「提意見」。5月28日北京市委再次布置工作時說得再明確不過了：要求市府各局、市委各部機關立即開始大放大鳴，「黨外普遍徵求群眾意見，黨內討論目前報紙上發表的文章，發揮自由思想」，還特別提出「對於知識分子多的幾個部門要大『放』特『放』」。[9]

在此期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密切關注着鳴放的動態，指示更加具體，要求更加嚴格。5月20日中共中央發給各地黨委的〈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就是一個範例。指示規定各地黨報的報道方針應該是：1、繼續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最好是刊登「那些能夠

充分暴露他們的反動面目的言論（愈反動的愈好）」。但「右翼分子在報上所佔比重應逐步縮小。特別是那種一般性批評和謾罵的東西，更應少登或不登」。2、特別注意刊登中間分子那些比較公道的批評右翼分子的言論，並「應該逐步增多，佔到報紙的主要篇幅」。3、「應該逐漸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論，但暫時不宜過多，特別注意登他們一些有說服力的東西。不要登他們那些沒有說服力和火氣太大的，特別是亂扣帽子的東西。」4、「應該登載關於改進工作的事實報道。」5、「在一個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但要「立即着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予以反駁和批判。此外，在各種會議上，「應該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間分子的發言」，並給予報道。[10]所以，整風運動中被引出的「蛇」和被釣上的「魚」，基本上就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確定了新方針到6月8日宣布全面反擊右派期間冒出的人物和言論。

2 受到鼓勵的社會大鳴大放

實際上，真正的大鳴大放也確實出現在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針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和言論，不僅數量猛然增加，範圍迅速擴大，而且情緒日益激昂，言詞愈加刺激。毛澤東後來對這時的情形有一個概括：少數右派和反動分子一時間鬧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拚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共產黨內部分裂，不久將被推翻。他們的野心極大。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11]又說：「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這些資產階級右派人物「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12]面對如此危險局勢，中共當然要進行毫不留情的全面反擊。

但問題在於，到底是哪些言論引起了毛澤東如此激動和憤怒？這些言論是不是如毛澤東想像的那樣具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企圖？顯然，這裏不是指那些針對各單位具體情況有感而發的批評——這在鳴放言論中佔絕大多數，但毛澤東未必看得上眼；也不是反右運動開展後揭發或檢討出來的「罪行」——這些材料大都遠離事實，且是毛澤東在6月8日以前看不到的。需要分析的，當然主要還是民主黨派和知識界上層人物的

言論，這些言論都是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通過公開的報紙和內部的報告可以看到的。為便於理解毛澤東的反應和思想變化，以下重點選擇了內容比較敏感、用詞比較激烈的言論，材料大體按毛澤東指出的問題歸類，然後按發表的時間敘述。目的是讓後人知道，1957年受到全面圍剿和批判的，究竟是一些甚麼言論。[13]

關於國家體制：要求實行民主，依法治國

天津市工商聯副秘書長田玉璞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談會上說，從我們那裏的實際情況看來，人民委員會開會是「形式主義，只是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對政策方針進行仔細研究，要討論的事情黨內都先討論了」。[14]章伯鈞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國務院管得太多，「交通部的負責幹部相當強，有的已經成為內行，有的雖然沒有成為內行也成了半內行。他們懂業務，能做事，有信心。應該讓部的權力更大些，能夠獨立來負責」。應該考慮改變「國務院對部的領導制度和方式」。[15]

在5月16至18日召開的首都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人們普遍提出了新聞自由、民主辦報的要求。楊重野說：「新華社一花獨放，也是使記者思想遲鈍之一因。首長們怕麻煩，常說新華社發稿，你們不用搞了。記者們遇到幾次這樣的例子，還寫甚麼新聞？新華社在新聞報道上是有其作用的，但一花獨放，會影響記者寫新聞。」顧執中說：「新聞社只有兩家（新華社、中國新聞社），其實是包辦，應該本着鳴放的精神，在這個問題上也放。」周正也主張「民主辦社」，辦通訊社，要有更多的通訊社出現。「這也可說是爭取新聞自由。新聞自由過去被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三座山壓住，還沒有真正鳴放。我還有個意見：中央宣傳部還沒有談談新聞界的問題。紅燈亮了，綠燈還沒有亮。中央宣傳部要明確地表示一下態度，大家才能很好地鳴放。」[16]陳銘德提出了兩個建議，一是建議增辦非黨報紙，二是建議首都辦一個晚報。他說：全國非黨報紙只有五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把報紙當作「百花齊放」的園地，那麼園地多了，就能開放更多的花朵，如果把報紙當作「百家爭鳴」的講壇，講壇多了，就能辯明一些是非。[17]這三天的會議，一天比一天更熱烈，到會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在最後一天的座談會上，鄧季惺主張多辦同仁報紙。她說，應該把同仁報紙變成報紙的民主黨派，這樣可以和黨報競賽，可以減少報道中的主觀片面性。[18]

5月22日羅隆基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提出了著名的所謂「平反委員會」的建議。《人民日報》當時報道羅是這樣說的：有人提出要黨提出保證，在他們對黨進行批評以後，不致在將來受到打擊報復。他認為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但他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

案，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甚麼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還主張，「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因為他認為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着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為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19]

在5月27日的政治法律學會座談會上，蘭州大學副教授吳文翰發言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中國法學界具有「招魂」的重大作用，因為中國法學界老的一輩被一棍子打死了，新的一輩被教條主義迷住了竅，所以都需要「招魂」。吳認為，現在有一部分領導幹部有法律的虛無主義思想，忽視憲法，認為以黨代政是當然的，黨的命令高於法令，黨員個人的言語自認是「金科玉律」。這都是違反法制的。中國人民大學講師吳家麟說，人民代表大會制是優越的，比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有無比的優越，但我們在運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有毛病，甚至有嚴重的毛病。領導幹部在對制度的運用中存在不少問題。以黨代政就牽涉到政治制度問題。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形式主義偏向，沒有常務機關，也沒有常設委員會，在閉會期間不能監督政府工作，沒有真正起權力機關的作用。吳家麟說，中央最高領導機關法制觀念也不強，甚至還有不遵守法制的現象，應該堅決糾正，否則上行下效，貽害無窮。他舉例說，195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撤銷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決議，而憲法第二十七條第十一款規定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劃分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又如1955年7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授權常務委員會制定部分性質的法律，而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20]

在29日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國務院參事楊玉清認為行政法方面的組織法和條例，有的還沒有訂立，訂立的也漏洞很大，等於沒有。關於黨政關係，楊說，憲法規定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黨的領導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是可以的，問題是這樣做好不好。黨還是應該通過黨員來保證實現黨的政策。他說，黨政不分中央是根，問題在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21]民革中央常委劉文輝談到保護公民權利問題：「憲法已經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權和損害賠償權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行使。如果能從多方面想辦法來保護公民權利，將大大有助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22]

作家蕭乾在報紙上提出了言論自由的問題：「准不准許說不對的

話，是對任何民主憲法的嚴重考驗。」[23]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王造時也提出：要進一步建立民主法制秩序，我們第一便須重視憲法，奉行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應該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此外，我們需要制定各種重要的法典，如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作為我們共同生活的準繩。否則國家幹部無法可依，一般人民無法可守，權利與義務搞個不清楚，犯罪不犯罪沒有明確的界線，人治主義便要抬頭，社會就不容易納入軌道。”[24]

在6月5日民革中央領導小組擴大會上，譚惕吾針對領導體制提出了四個問題。第一是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具體建議：主席辦公室應該擴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機構要充實、要發揮它的作用，共產黨員到這個權力機關來監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產黨內各個部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裏的各種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內可以設黨組，吸收非黨人士參加工作。第二是黨的政策應該如何體現。黨直接指揮黨員，會把國家搞亂。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制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制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第三個是黨遵守憲法和國家制度的問題。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內。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槓桿作用的，但在有些地方這三者是在一個黨委領導之下，這是不好的。第四個問題，是怎樣使共產黨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也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黨。[25]

關於共產黨的領導：要求限制黨的權力，改變黨的作風

5月18日陳銘樞致信毛澤東，對他表示要辭去國家主席的想法大為稱讚，說「此一偉舉，不僅打破個人崇拜，樹立世界高潔宏大的風範，對於百千萬黨與非黨幹部亦能使其發揚蹈厲，知所警惕」。接着又以「規諫」之言指出毛澤東有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的毛病。最後又補充說：「連日在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聽了各界人士的發言，均接觸到兩個中心問題：一為黨的領導與國家政權的結合問題；一為幹部政策問題。從全國範圍所揭出的問題看來，實應有所改進。但事關國體與政體，且某些措施已成定型，改弦匪易，應當明確，此項改進屬於國家的形式問題，不應有絲毫影響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26]

5月19日新華社記者報道：在廣州市民主黨派座談會上，民革中委、省參事室副主任羅翼群說，共產黨有優越感，往往以特殊階級自居，民主人士有自卑心，不敢同共產黨員交朋友、暢談心事，於是隔閡

愈來愈深，團結就難搞得好了。他說，有人說共產黨是主人，民主黨派是客人，甚至還說民主黨派是「僕從」。我看說「僕從」是過分了一些，不過共產黨絕不應該認為自己樣樣都高人一等。這樣就會有危機了。農工民主黨廣東省副主任委員雲應霖認為，真正發揮互相監督作用的關鍵，就是一定去掉只向共產黨歌功頌德的這種社會上的壞空氣。[27]

在5月20日北京師範大學民盟支部召開的教授座談會上，陶大鏞提出，在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教授應有決定權，學術委員會不一定遵照黨委意見執行。朱啟賢說：我們的最高綱領是校長由學術委員會選舉。鍾敬文說：我同意不一定要黨委領導。毛禮銳建議：系主任讓大家輪流做。羅志甫說：黨團匯報制度是否必要，值得考慮。胡明主張成立教授協會。張禾瑞、陳友松、董渭川、白壽彝等人都「基本上贊成民主辦校」。[28]關於這次會議情況，《內部參考》根據師大黨委電話匯報所做的報道更具傾向性：大家一致主張「民主辦校」，實際上就是「教授治校」。具體主張是如下：（一）取消黨委制。黨委作本份的工作（如思想工作等），對學校工作只能提出建議，不能發號施令，黨員靠模範行動影響群眾。（二）成立「學術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校長由學術委員會選舉產生，報國務院；或由國務院任命，但學術委員會有權撤換。（三）取消現有的人事制度。人事任免由學術委員會決定。人事部門只能是辦事機構，沒有決定權。（四）取消黨團的匯報制度。匯報制度已成為升官發財的捷徑，「搞情報」的人都不懂業務。要搞情報，就派公安局的人來。會上對以上主張沒有反對意見。[29]

章伯鈞在5月21日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發言談到黨委治校問題時說：「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黨是可以從政治上領導科學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這種制度有缺點，發生了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缺點。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聽取教授和學生的意見。」接着，章便提出了後來被反覆批判的「政治設計院」：「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30]

在5月24日天津市中學教師座談會上，第三女子中學的民盟盟員黃心平說，既然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現在國內階級鬥爭基本結束，黨的領導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點？他主張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應該退出學

校。他認為，現在既然容許民主黨派存在，各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產主義，同時各個黨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為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為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31]

5月25日在清華大學的座談會上，徐璋本教授說，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因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條主義。他說，任何一個學者一個學說都不能把一切好的東西都包括進去。我們要文化發展，光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不夠的，一定還要廢除以一種學說來指導一切的限制。[32]

5月26日的《北京日報》報道了中國人民大學24日召開教師座談會的情況，其中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琦的發言格外引人注意。報道說：「他認為『今天的黨群關係比起1949年差了十萬八千里』，他說『群眾為甚麼對我們（黨和政府）起惡感呢？因為我們做的事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好。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產黨』。他甚至提出，現在共產黨工作做得好沒話說，做不好，群眾就可能打倒共產黨，殺共產黨的頭，可能推翻他。」[33]第二天在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周報》再次登出他的發言，特別把《北京日報》中沒有打引號的那句話加上了引號——成了葛佩琦的原話。葛當即向學校領導人指出「這段話不是我說的，歪曲了我發言的原意」，並要求更正。校方答應更正，但並未實行。[34]幾天後，《人民日報》再次報道人大座談會時，這段話被改為：「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35]後來，這段話就被作為右派「殺氣騰騰」、「猖狂進攻」的腳註了。

在5月28日科學院學部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歷史學家呂振羽建議，科學院的院務委員會應逐漸擔負和進行學術領導，使之與院務行政會議區別開，以便行政領導和學術領導的關係、院部與學部的關係、行政工作與科學研究工作的關係等逐漸明確起來而步入常軌。學部委員黃鳴龍也建議，科學院的領導應以科學研究人員為主體，由研究員輪流擔任院

長和所長。[36]

楊玉清在5月31日的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座談會上發言說，這次整風運動就是「下轎」運動。有些共產黨員坐轎子，脫離群眾。八年來培養的是甚麼人呢？培養的是抬轎子的人。至今還有人不願下轎子，那些抬轎的人也還不願放轎桿。他強調說：「一切發源於北京，亂搞就從北京亂搞起。」首先在北京的上級幹部要下轎，不但要下轎，有的還要下台。楊還說，文人的筆桿天然是反現狀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現狀的，從古以來好文章都是反現狀的。[37]

最著名的就是儲安平6月1日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的發言，他首先指出，「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的關鍵在於「『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在列舉了一系列現象之後，儲提出：「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接着他又把矛頭指向毛本人：

> 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38]　《內部參考》關於6月1日座談會的報道說：廣州市的許多高等學校教授都主張取消黨委制。華南農學院教授、民盟盟員林孔湘說：「今天我們在高等學校要爭取領導權。中共組織要和民主黨派組織一樣只起監督、幫助和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他說，中共在高等學校裏是沒有力量來貫徹自己所制定的方針政策的，因為中共直到現在還沒有熟悉高等學校業務的黨員。他又說，不是「內行」的學員就不要讓他當院長、所長。如果不管他懂不懂業務也派他去當領導，就會使一些人錯誤地以為共產黨打天下是為了爭地位。中山大學教授、民盟盟員林楚君認為，黨委制取消後，可以由學校的校務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和校長個人負責制來代替它。黨可以通過參加校務委員會的黨員來起作用，這樣是加強了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它。[39]　《北京日報》6月6日報道：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教師座談會上，工業經濟系講師王德周呼籲「黨已經到了面臨危機的時候了！」他認為現在黨員有兩多兩少，多了特權思想和優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他說：「老百姓與黨的距離是遠的。

這次整風收不到效果是很危險的。」「老百姓開始對中央不信賴了，有些事比國民黨時候更壞。」還說，現在黨內有百分之九十幾的黨員鬧宗派，甚至「無惡不作」。他認為，「鬧事要架機槍，這是可以的，麻煩的是怕機關槍倒過來打。」王德周還建議由民盟把所有群眾組織起來，幫助黨整風，監視黨整風，以取消特權，取得整風的最好效果。[40]

關於民主黨派：要求擴大權力，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

上述對共產黨提意見的人，基本上都屬民主黨派，很多問題談的是共產黨，其實就涉及到民主黨派了。比如限制共產黨的權力，言外之意自然是擴大民主黨派的權力，雖然不是毛澤東所說的要「平權」的意思，但確想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關於這方面的言論大多隱含在對共產黨的意見中，直接談論民主黨派的意見不多。

在5月22日統戰部座談會上，民進中央常委嚴景耀建議把民盟、民進、九三學社、農工民主黨合併起來。這四個黨派都是做知識分子工作的，常常發生交叉，弄得群眾很難應付，不知加入哪個組織好。合起來，對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大有好處，還可以讓許多人解放出來做別的事。如果能夠合併，可以叫「社會主義同盟」。他還建議說，鑑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和推動作用不夠，應擴大他們視察的範圍、時間、地區，並在中央和各級地方人代會設立各種常設委員會，比如經濟、衛生等委員會，吸收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專家等參加，對各部的工作進行監督。[41]

農工民主黨北京市委5月24日舉行了科學教育界座談會，到會的很多教授表示，在鳴放中還有顧慮：怕挨悶棍，怕挨冷箭。農工民主黨成員、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教師張含清在會上立即表示說：堅決相信共產黨，大膽揭露矛盾。如在座的有人事後遭到報復，農工民主黨要出來替他們撐腰。[42]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要求尊重、信任和自由

這方面的意見很多，比較言重的也有不少，僅選幾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景漢5月30日在該校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說，希望黨對知識分子，特別是經過屢次運動的挑剔而找不到甚麼大毛病的人，應該相信他。應以朋友的態度，而不應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知識分子。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對人生慾望不高，能終生做一個教授，給一定條件進行學術研究，就心滿意足了。他們根本不會造反，連造反的幻想也不可能有。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是很有道理的。黨還有

甚麼不放心的？中國有句民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很可玩味。僅靠左手拿着馬列主義書本，右手拿着蘇聯武器，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43]

北師大副校長傅種孫指出：對知識分子的失策，也許是中共近幾年來最大的失策之一。中共所標榜的知識分子政策與知識分子所感受的幾乎完全相反，知識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會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甚麼孽而遭這麼大的禍殃。……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哪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不寒心？既然處處的知識分子都寒心，那是誰造成的局面呢？我不相信知識分子對中共離心離德而中共能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的。[44]

北京大學教授王力說，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今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再作為一種運動來搞。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也起了不少的副作用。……今天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敵我的對抗性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就用不着沿襲1952年的老辦法。我甚至懷疑1955年的肅反運動連反動言論都『肅』在一起是不是妥當。兩種不同性質的事情同時做去，容易做出偏差來。如果反革命行為和反動思想應該區別開來的話，把反動言論『肅』在一起就是把敵我對抗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混為一談了。在今天『鳴』『放』的過程中，反動言論比1955年更多了，將來要不要再『肅』一次呢？我看是不必要的」。[45]

關於「三反」和肅反問題：嚴重擴大化、破壞法制

對於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業績，批評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政策[46]和經濟建設方針[47]的言論有一些，但不多，這個階段鳴放中批評最集中的就是「三反」和肅反運動。

5月19日，老作家冰心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採訪。她說：「和風細雨這個方針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時為甚麼不提？肅反時為甚麼不提？現在共產黨整自己的黨員了，強調和風細雨了。」冰心說：我有些朋友，在敵偽時期，蔣介石統治時期，坐過牢、受過苦刑。從敵人的監獄出來，他們的腰板更硬了，但肅反運動中，他們無辜地挨了整。這回就像是被抽掉了脊樑骨似的，成了軟體動物，再也直不起來了。這太過火了。許多做法是違反憲法的。她還說：「肅反時候，高等學校裏提出5%的控制數字。如果這個單位只有兩個反革命分子，就要找三個補上；若有二十個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個。這怎麼會不亂！」冰心要

求對此應有一個交代：「士可殺，不可辱。」知識分子受了傷害，是終身不忘的。現在，共產黨員把他們打了一巴掌，揚長而去。他們心上的傷不治癒，整風要他們說真話是不可能的。[48]

5月22日《內部參考》報道，旅大市高等學校教師對肅反運動非常反感。大連工學院講師譚家岱、王必信認為學校在肅反運動中具體做法上是違反憲法，很多人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受到了人身侮辱，被限制了言論自由、行動自由和書信自由，還遭到無理搜查。憲法是最高法律，黨應該帶頭守法，如果黨任意破壞法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根本就沒有保證。還有些人希望公開審理胡風案件。他們對胡風是不是反革命表示懷疑，認為胡風被捕入獄已經兩年，現在沒有下文，是不是搞錯了就想偷偷地下台？[49]5月30日，民革中央常委朱蘊山建議，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應即召開聯席會議，根據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的指示，迅即組織一個臨時檢查機構，會同有關方面分往各地認真檢查。[50]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編印的《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彙編》反映，民眾對肅反、三反等運動的意見非常普遍：

> 不少同志認為中央對肅反、三反的偏差、缺點估計不足，運動中普遍地發生了打擊面過寬、方法粗暴、傷害了感情和團結，是和中央限期限量控制數字的做法分不開的。三反強調銀錢過手必有貪污，打不出虎來就撤職；肅反主觀地提出百分之五的控制數，用大會點名批評的方式推動運動，形成下面「逼、供、信」，中央既未及時糾正左偏，事後又未總結經驗，分清責任。有人懷疑，肅反成績能否說是基本的？三反能否說是偉大的？只看見搞出的反革命、老虎的數字，沒看見死於不白之冤的自殺數字，這是否公允的估計？[51]

關於資產階級改造：希望不被歧視

在5月17日的工商界座談會上，畢鳴岐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愛國的階級」，他們「把自己的企業交出來不是簡單的事，他們的思想鬥爭過程是黨員同志體會不到的，是教條主義者更體會不到的。……這表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偉大的（當然共產黨最偉大）」。他要求共產黨員應該消滅宗派主義情緒和作風，應該正確認識新形勢的具體內容，給民族資產階級以應有的評價。「在參加政權和共事關係中，不要再以求同存異的想法來對待我們。從心裏說，我們不願再當來賓，我們也是主人，我們是在自己的祖國，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最後，畢鳴岐激動地說：「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之一，本身也是民族資本家，我願意在黨的教育下，號召下，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意見和真實要求。我相信我是黨的忠實朋友，我也同樣相信工商業者也同是

黨的忠實朋友。」[52]在5月24日的座談會上，千家駒作了長篇發言。關於資產階級兩面性，千認為全行業合營後，工商業者既是勞動者，又是資本家；有工人階級思想，又有資產階級思想。千說：「應該承認，工人階級的一面正在發展擴大，資產階級的一面不斷縮小以至消滅，最後成為一面性。」[53]在5月31日民建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章乃器再次重申了他關於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的觀點：「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還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關於定息的性質，章乃器以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54]

細細品味這些言論，的確看不出有甚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尤其是與被毛澤東點了名的那幾位的言論相比，除了儲安平的名言，都沒有更過分的地方，充其量也是屬於思想認識或世界觀的問題。[55]毛澤東所以把事情看得比較嚴重，大概就在於這不是幾個人的言論和認識，它已經在知識界和民主黨派的「中間派」中產生了共鳴——毛澤東後來特別看重這個問題，一再強調要爭取人數眾多的「中間派」。這些言論是否真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傳播和影響已經威脅到執政黨的統治地位，至少給人的感覺是這樣。當然，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於此。

3 學運風潮與社會不安定因素

有研究者認為，5月中旬，毛澤東的注意力還集中在如何通過整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北京大學5月19日貼出第一張大字報之後，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56]這個判斷似欠準確。不錯，直到5月底甚至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整風的初衷，但是如前所述，到5月中旬，他關注的重心已經開始移動，只是還沒有作出如何糾正右派「錯誤傾向」的最後決定。不過，北京大學引發的學生運動確實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注意，並且對促使他下決心全面反擊右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校園內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並非在北大，從當時的報道看，是在北京航空學院。但北航17日貼出的大字報及其響應者，談論的都是該校領導的工作作風問題，沒有引起轟動。[57]

5月19日下午，北京大學學生餐廳東門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內容本來很簡單：「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清華有代表，北大有沒有？如果有，是誰？是誰選的？他能不能代表我們的意見？」旋即，在

餐廳東門外牆上，又貼出一張小字報，建議將這面牆作為一個「民主園地」，以供同學們暢所欲言地發表意見，助黨整風之用。接着，餐廳北側又貼出一張大字報，內容已頗具火藥味：「一、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制度；二、取消政治課必修制度；三、取消留學生內定制，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四、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58]

三張大小字報，在校園迅即引起廣泛關注和反響。當天晚上，學校舉行團員大會。校黨委副書記崔雄昆表示，貼大字報不禁止，不過這並不是好方式。崔的話引起許多人不滿。學生之間也開始辯論。據張元勳回憶：「午夜以後，校園內聲籟俱息，可是，在許多宿舍裏，燈光卻是徹夜地亮着；自發的爭論開始在每個宿舍裏展開，大字報也開始在更大的學生群中蓬勃湧現。」第二天，校園大飯廳周圍「『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般貼滿了形形色色的、紅的、綠的或是用舊報紙寫的大字報」，有雜文、短評、短詩、口號、對聯、漫畫，名稱有「民主牆」、「自由園地」、「民主論壇」等等。大字報揭露某些中共黨員的特權思想和宗派主義傾向，批評政治課教學中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認為應當加強校務委員會的作用，有些人主張取消黨委負責制。辯論也在更大範圍裏展開。記者當時報道：「從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圍着大飯廳及附近建築的牆壁在看大字報，就在牆根前或是宿舍裏，教室的過道或是湖邊的草地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辯。自由鳴放的風氣頓時瀰漫全校。」「在大膳廳前的廣場上，就像是海德公園一樣，成千的同學，在傾聽一場接一場的激烈辯論。」據《文匯報》記者報道，有學生統計，截至5月22日晚，已經貼出五百多份大字報。校園內還設立了多處講演台，辯論會也愈來愈多。[59]

5月23日《內部參考》對北大局勢和學生言論進行了長篇綜合報道，並把學生在大字報中提出的建議歸納為十條：一、允許私人創辦報刊、出版社，取消出版的檢查制度，開放禁書。二、實現集會、結社自由，讓現存的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有同等的活動機會，同等競賽機會。三、改選人民代表大會，讓擁護公有制的各種意見在會上充分爭鳴，國家大事的決定要在公開討論中形成。四、嚴格地具體規定共產黨在政治機關中的地位、作用。五、改進選舉制度，讓選舉人自己提名、推薦，候選人名額應超過應選名額，讓選舉人有選舉的餘地。六、要求中宣部撤出紅樓，切實保護文物，學校當局不要不聞不問。七、取消黨委負責制，實權歸校務委員會。八、取消政治課必修制度。九、完全按照參試辦法選拔留學生，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權。十、要求公布全國各地用人部門對畢業生數量質量的要求，畢業生自由應徵，最後由用人部門決定，如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或用人部門找不到人，可用說服動員的方式統一分

配。記者報道：在提出這些「建議」、「要求」的同時，許多學生還對黨委副書記的報告、肅反、黨的政策、「等級」和理論上的一些問題寫了大字報，有些學生辦了油印刊物、集會結社，個別人也乘機興風作浪。如物理系三年級學生何廷福在「向中央進一言」的大字報中提出了兩個問題：一、胡風集團的罪行到底是甚麼？按照法律作了何種解釋？能否說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宗派主義？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在某些人頭上？二、去年反保守是必要的，但也表現出急躁冒進，不根據中國實際和困難片面追求進度。今年在生活上的許多困難都是與此有關的。是不是主觀主義造成了人為的困難？記者認為，在許多大字報中，值得注意的是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貼出的〈一株毒草〉，說馬克思主義從1895年起就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記者的結論是：北京大學整風的形勢在急劇發展中。」[60]

此後，《內部參考》報道，北京大學的「形勢暫趨和緩」，但27日又說：「表面形勢似趨緩和，但事態正醞釀擴大。」這一判斷的根據是：北大學生正在與外校聯絡，「民主運動」已經蔓延。[61]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程海果）5月23日晚在北大學生集會上的發言，不僅在北大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對民主運動在其他各校的開展產生極大影響。林的開場白是：「我今天很激動，到北大吸到了新鮮空氣，而人大是教條主義的大蜂窩，官僚氣太重，北大到底是北大，繼承了五四的傳統。」她的發言主要講的是胡風問題，認為胡風案件是一個錯案，並由此引申說：「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我們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林表示贊同鐵托關於個人崇拜是社會制度的產物的意見，她說：「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法國則不會。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下面的話就很具煽動性了：「北大是放了，高級知識分子是放了，但廣大基層還沒有放，現在揭發的遠不及現實生活中的1%，別看報紙上天天登了很多的問題，可是都是上層民主人士揭發的，這些人年紀大，很世故，他們講的材料很少，不夠我們研究的。我們青年長個腦袋是幹甚麼的呢？難道是讓人家牽着鼻子走的嗎？我們要說話！北大這樣做，是個良好的開端，現在，西北、武漢、南京等地到處學生都動起來了，可就是互不通氣，報上不報道，這是封鎖新聞……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62]

學生之間的串連，再加上非黨報紙《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的報道，[63]一場以大字報為主要形式的鳴放運動逐步在全國主要大學擴展開來。到26日，北航、北師大等三十多所北京高校以及武漢醫學院、武漢體育學院、華中師範學院、復旦大學都出現了不少大字報和黑板報，並組織起自由論壇、民主牆，有的學校學生準備派代表到黨中央請願，有的學校在學生的堅持要求下只得停課鳴放。[64]5月27日《文匯報》在〈北京大學的民主牆〉的標題下，報道了北大學生貼大字報的活動後，上海的部分高等學校學生群起仿效。就在報道刊出的當天早晨，上海第二醫學院便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標題也叫「一株毒草」。同濟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東紡織工學院等也都開始積極準備民主牆，並紛紛貼出大字報。到28日，武漢醫學院有1800多學生已停課三天，南開大學也貼出500張大字報，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學院分院等校則「處於一觸即發之勢」，而北京高校又出現了新情況：「師大、北大、工藝美術學院、礦業院等院校有些學生公開要求撤換領導」；各個學校的「黨員和積極分子被攻擊得很厲害」；「許多學生再三要求停課整風」，他們「在給北京市委的信上責問：為甚麼整黨外狂風暴雨，而整黨內和風細雨」。有留學生甚至「很擔心發生匈牙利十月事件」。[65]

5月29日，以黨團員最多而著稱的中國人民大學「以較北大學生更激烈的姿勢」開始大鳴大放。據學校黨委介紹，在七百多張大字報中，除了反映一些正確的意見外，也出現了一些「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如有人建議：取消政府、機關、工廠中黨的領導；共產黨的經費不能從國家經費中開支；要求資產階級學者來中國講學；允許出版禁書。還有人提出鳴放「要擴大到工人、農民中去，要擴大到全國」。在北京，不少院校學生自動組織起各種委員會，要求請願的學生愈來愈多。[66]

5月30日，因忙於考試，南開大學等少數學校形勢趨於緩和，但林業大學、農業大學、蘭州大學、天津大學等又掀起了大字報風潮。[67]到6月初，南京大學、武漢大學都進入了運動的高潮，並帶動了當地高校的學生風波。[68]武大學生提出了新口號：「維護民主，維護人權，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維護憲法所給予人們的權利」；「爭取民主權利，爭取人類尊嚴」；「理性萬歲！」「民主和自由萬歲！」[69]華東師範大學黨委報告，學生大字報愈來愈多，運動出現了新的趨向：「已有七八個黨員叛了黨」，還有少數團員「帶頭鬧事」，特別是民盟盟員「表現最壞」，「到學生宿舍去散播說共產黨已經恐慌了，我們要大膽地『放』，給共產黨以致命的打擊」。[70]

很明顯，思維敏捷而感情衝動的青年學生，其言論尖銳和大膽的程度，遠遠超出了民主黨派和教授們的意見。後來，共青團中央大學工作

部把大學生的言論為六個方面：即民主、自由、人權、個性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問題，黨的領導問題，分配問題，肅反問題和人事檔案等制度問題，學習蘇聯的問題。其中特別激烈的觀點，除上述所引，還有許多，如：「建國八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憲法上賦予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概無保障。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全體人民，黨即國家，黨即法律。」「解放了，人身自由了，但我們的精神仍然被殘踏着，自尊心受到了破壞。」「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共產黨打的，不能由共產黨一黨獨斷和壟斷，必須各政黨競選。」「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下，使人民代表大會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馬克思主義好比《聖經》，各地黨委書記好比教區主教。」「文王殺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殺了七十萬！簡直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71]上海市整理匯報了類似的材料，言論同樣刺激：「共產黨和過去封建王朝一樣，整個黨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整風主要應整老和尚：整風的根本問題在於黨中央，關鍵要整黨中央。」[72]

毛澤東未必會因為一些「年輕娃娃」的過激言論動怒，但學生風潮的發展趨向確實令人擔憂，特別是學生鳴放時出現的停課、請願、自發組織小團體等行為影響到社會，且與社會動亂融為一體的趨勢，已經構成了對共產黨統治和社會安定的威脅。這種威脅確實存在着。

在知識界和大學生轟轟烈烈地進行大鳴大放時，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也呈現出一種動盪的局面。早在4月19日北京市就提出，今年北京市中、小學畢業生約有三萬人不能升學。問題重大，不能忽視，如果處理不好，就很容易鬧事。報告說：「去年以來到現在，北京市共發生罷工、罷課事件七起，參加人數約四百多人。發生推派小型代表團請願、包圍領導者等類似事件約有六七十起。」4月28日北京市委向中央報告：「今年以來，許多商品價格上漲，或者變相上漲，許多商品又供應不足，引起廣大群眾的憂慮和不滿。現在，群眾心理普遍緊張，不少人懷疑『共產黨穩定物價的政策是否保險』。」[73]這種不滿情緒和不安定因素與大鳴大放的社會氣氛攪在一起，後果可想而知。

5月下旬學校面臨畢業，很多學生因畢業後不能升學或留在城市工作而鬧事。5月22日，《內部參考》刊載了內蒙豐鎮中學應屆初中畢業生鬧事的情況：七百多學生集體罷課，還有一部分人「整隊到大街遊行，演說，呼口號，企圖取得群眾的同情和支持」。[74]湖北醫學院在5月20日至25日期間因要求改善校舍、設備等條件，發生全校性的停課風潮。風潮的矛頭直指中共湖北省委。[75]5月27日，天津第四十七中學部分應屆初中畢業生成立了「秘密組織並串連其他學校」，「印製傳單，

散布錯誤論調，積極拉攏同學，準備遊行」。[76]5月29日，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學生也因此連續給國務院總理和交通部發電報，鬧事的情況有繼續發展的趨勢。[77]陝西地區高等學校在鳴放過程中不斷發生各種風波和鬧事事件，學校領導「處於緊張被動狀態，『四面作戰』，招架不住」，情況嚴重的有西安航空學院、西安建築學院、西安動力學院、交通大學、陝西師範學院等。[78]5月28日至30日，湖北城市建設工程學校學生因校方領導的官僚主義罷課三天。[79]6月1日，瀋陽俄專部分學生因對畢業分配方案不滿罷課。[80]6月2日，因一個學生遭公安局無理拘留，廣州師範專科學校1200個學生自動集會，表示抗議。[81]

到6月初，有些地方的學校風波已經影響到社會。6月1日，武漢大學學生到漢口繁華商業區一帶張貼大字標語，要求「派記者到我們那裏去」，「反對新聞封鎖」等。貼到《湖北日報》社和《長江日報》社門口的標語被撕掉後，引起學生不滿。3日，學生代表四十一人到報社質問、抗議。雙方進行了長時間談判，無果而終。[82]南京發生了同樣的事件，而且鬧到省委。6月1日，南京大學學生把大字報貼到《新華日報》社門前，質問為甚麼不發表南大鳴放的消息，圍觀者達兩千多人。學生與圍觀群眾發生爭執，並展開激烈辯論，直到次日凌晨才散去。由於大字報被撕去，南大學生3日派出代表兩次到省委請願，受到省委書記接見後，事態才平息。[83]

城市工人鬧事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響力的當屬上海。上海市總工會報告：「最近幾個月來，職工罷工鬧事數量有了增加，從今年4月初到5月24日止，共發生大大小的鬧事事件二百多起，涉及工廠企業單位約有240個，參加鬧事的群眾有10000人左右。」特別進入5月以後，鬧事情況日益嚴重「4月份有39件1200餘人，5月份卻有160餘件8200人，4月份一般只是工業系統，5月份逐漸向其他行業蔓延。同時，內容也比以前更為複雜多樣，而較多的是經濟上、政治上算老賬，因此，處理上也感到不很容易、不簡單。」[84]

5月27日《內部參考》以〈目前上海部分工廠企業內部情況很緊張〉為題報道，5月上旬藝徒罷工請願一度「鬧得很兇」，剛剛有所穩定，矛盾又轉向其他各類職工。「部分工廠的職工醞釀『放』、『要求放』的情緒日旺。榆林、徐匯等區職工罷工、集會、準備遊行等事件逐漸增多；普陀等區的部分職工中，也在『冒火』，蠢蠢欲動。」報道說：「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廠裏，群眾自己組織起來鬧事，把共產黨和幹部撇在一邊，幹部要召集他們開會開不起來，連情報也搞不到。」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23日在全市工廠企業黨員幹部大會上說：「這種情況值得所有的廠警惕，如果任其繼續發展下去，上海要大亂。」[85]兩天後又報道說，在知識界鳴放之後，「上海基層工廠的職工要求

『放』的情勢最近已日趨緊張」。最近幾天來新的罷工、集會、準備遊行示威等事件突然增多，一部分工廠則正在「冒煙」、「冒火」，如不及時處理，很可能也要燃燒開來。報道特別指出，儘管沒有在工人中發現政治歷史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鬧事有向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方面發展的趨勢」。[86]

到6月初，情勢更加緊張。6月7日《內部參考》報道：「上海基層單位職工鬧事的情況，最近一周多來繼續擴大並有繼續發展的趨勢。據極不完整的統計：幾乎每天都發生職工鬧事事件，少則七、八起，多則一、二十起；市人民委員會接待室每天要接待好幾十批人民來訪，職工要求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工資、福利方面。」鬧事的形式「一般是罷工、怠工、集會、貼標語、代表或集體請願」，甚至有「打罵或恐嚇殺人」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鬧事的面擴大了。前一時期主要是新公私合營工廠的職工鬧，現在已延及到一部分老合營廠、國營廠、交通運輸工人、搬運工人、過去動員回鄉又倒流回滬的三輪車夫與失業工人、機關幹部，甚至家庭婦女（要求就業）等。」鬧事的工廠在全市企業所佔的比重雖小，但波及面很大，「已開始影響到正常生產，而且目前情勢還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批領導幹部陷於其中」。[87]據上海市工會聯合會統計，1至4月份發生鬧事約有44個工廠，參加鬧事的職工約3200餘人，但在5至6月間，鬧事風潮陡然擴大，涉及548個工廠企業，參加鬧事的職工達31000餘人。[88]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之一，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工人鬧事的情況說明，「無產階級」的不滿情緒已經十分嚴重，更加危險的是，這種情緒正在與知識界和學生界的鳴放匯合。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局勢更加混亂無序，鬧事風潮也發展得更加嚴重，更加迅速。目前尚未發現有關5至6月農村鬧事狀況的綜合統計資料，不過，一些局部地區的情況，也能反映出大體的趨勢。

浙江省的一個農村調查報告曾經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該報告講述了仙居縣農民鬧事的嚴重情況。從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主要是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鬧事後，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台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至19%。被打幹部107人，社幹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戶。報告認為事情發生的原因主要是農村幹部在發展高級社的過程中產生了驕傲和急躁冒進的情緒，結果政策不明，管理混亂，嚴重減產。農民普遍反映：「初級社有優越性，高級社沒有優越性。」[89]

去冬今春，特別是進入5月以後，農村退社鬧事的情況十分嚴重。

山西省自去冬以來發生的「鬧社」事件147起，參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鬧分社的81起，反對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的48起，鬧糧荒的18起。江蘇省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後在江都、泰縣境內發生農民毆打社幹部、要求退社等哄鬧事件，範圍遍及12個區、47個鄉、436個農業社，參加鬧事的群眾近50000人。在最嚴重的三個區，鬧事的農業社竟佔到62%。鬧事者有的要求救濟，有的要求增加口糧，有的是對幹部有意見，其中大部分是富裕農民，其目的主要是要求退社。5月間開始，廣東陸豐縣農村突然爆發了散退社的暴亂事件，全縣幾乎有半數的農民退社，大批的社散夥。據統計，這次事件共有458個社解散，加上其他退社戶，共有40000多戶離開了農業社。全縣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個鄉、366個村的社全部散夥，全縣只剩下26個社基本保持完整。[90]

黨內的狀況也很令人擔憂。大部分黨員幹部對鳴放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觸和不滿情緒，有的公開抵制鳴放，有的態度消極、情緒低落。但也有少數人參與到鳴放運動中，甚至同「右派」站在一起。這兩種情況都是毛澤東不願看到的，因為這反映了同一個問題——黨的號召力和戰鬥力受到嚴重損害。

中共基層黨組織對整風本來就很消極，對大鳴大放更普遍採取了抵制的立場。據報道，廣州市有些基層領導對少數敢於發表意見的黨外人士變相施加壓力，有的甚至進行追查、質問和譏諷。重慶市不少幹部態度蠻橫，有的在公開講：「意見隨你們提，充其量撤我的職。」有的拍胸膛說：「老子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一沒貪污，二沒違法，你們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還有的認為鳴放是「自己討打」，把幹部隊伍「弄得烏天黑地，簡直無臉見人」。《廣西日報》總編輯甚至「破口怒罵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是烏龜王八蛋，說他們想拆散省委」。[91]陝西省委5月25日報告：「整風運動開始以後，有些領導同志由於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看到黨外人士的批評意見，或者聽到下面幹部在學習文件階段剛剛提了一些意見，就張慌失措起來，有的感到不服氣，不高興，甚至拒絕批評，有的悲觀消極，抬不起頭。總而言之，不積極主動地領導群眾開展整風運動，而是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一般幹部中也有很多顧慮。」此外，「從目前各高等學校的情況來看，還有不少黨員和群眾在一起向領導提意見，不分黨內黨外，不管黨內秘密，特別是鬧事的學校，黨團員在學生中，雖然佔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但是，人家一衝就垮了。甚至於黨團組織對黨、團員也失掉了領導和控制的力量。」[92]雲南省也有類似情況，一些不堅定的黨員、團員「相繼動搖、思叛以致倒戈投降」，僅據雲南大學統計，這樣的共青團員佔團員總數的三成。[93]

在5月29日晚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集黨內會議上，各系主任和黨總支書記匯報的情況很有典型意義。一、多數基層幹部抵觸情緒很大，反對繼續搞大鳴大放。教務部部長李培之激動地拍桌子說：「我實在受不住，你看看這些大字報，甚麼亂七八糟，烏煙瘴氣的東西，黨給糟蹋得像甚麼樣子。」副部長李新也是同樣態度，他要求保留意見，甚至表示可以辭職。老黨員何幹之、經濟系主任宋濤擔心這樣發展下去，「很可能要推廣到工廠、農民、市民中去」，這些情緒帶到全國「要出大亂子」。二、廣大黨員思想苦惱，不知所措。很多人匯報，現在各支部不知如何行動，「只能湊合群眾一起貼大字報」。經濟系總支書記方志西說：現在黨員堅持立場的就受到排斥，失掉立場的似乎說成是積極的，這很值得注意。[94]

不知所措的豈止中國人民大學，鞍山市委書記這樣說：我們不知道是應該大膽地「放」，還是按照我們的規定來「放」？總之，市委處於完全「被動的姿態」。廣東省直屬機關和廣州市級機關的領導幹部也感到左右為難。[95]

進入6月以後，隨着鳴放的開展，黨內感到壓力愈來愈大。北京外語學院的黨員苦惱得很，「有些群眾逼他們發言，特別是關於肅反問題，他們不發言，有些群眾就把紙條貼在他們背上，有的把字條硬塞進黨員的口袋裏去，有的寫大字報貼在黨員的宿舍門上」，而「黨組織在運動中已不起作用」。「現在的黨員就像失掉母親的孤兒，像被擊潰了的分散活動的游擊隊員。」中央音樂學院的黨團幹部在鳴放中也完全處於「思想混亂」的狀態。[96]在中央國家機關中出現了兩個極端的情況，一方面，有的黨員幹部一怒之下撕掉了大字報，有的則幹脆「以牙還牙」，也用大字報反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黨員「立場動搖」，有的泄露了肅反時如何整人的「機密」，有的在群眾大會上公開迎合對肅反運動的批評意見。[97]有不少人直接給中央寫信，訴說衷情。如北京大學張錦文給中央書記處寫信，表示反對報紙上誇大人民內部矛盾、單方面發表民主人士的片面意見的現象，對《人民日報》也這樣做，更無法接受。6月8日有一匿名者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前天工業幹校有一黨員老幹部，自己先買了棺材，然後上吊自殺身死，他留給你的遺書，不知你見到了沒有？為甚麼在艱苦的戰爭歲月裏，共產黨老幹部捨不得自殺，而入城後卻發生這樣可憐的事件呢？難道你們能對此無動於衷嗎？」寫信人警告說：「這樣下去，他們會認為共產黨太軟弱可欺了，他們會得寸進尺，就會請你毛主席下台。」[98]

毛澤東本人未必能夠看到這封信，但是，民主黨派和知識界言論的影響，北大學潮及其在全國高校引起的風波，城市和農村出現的動亂跡象以及黨內的不安定因素，這一切匯合起來使毛澤東感到，共產黨的領

導地位正處在某種危險狀態。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6—437。

[2]雲南省檔案館，2-1-2742，頁46—47。

[3]雲南省檔案館，2-1-2741，頁2—14。

[4]雲南省檔案館，2-1-2745，頁5—6。

[5]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6）》（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269—276。

[6]紀希晨：〈在風口上——從反右派到反右傾〉，載季羡林主编：《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352—353。作者記憶的政治局會議時間顯然有誤。

[7]黃秋耘：《風雨年華》，增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頁175—176；黃秋耘：〈中國作協的幾番風雨〉，載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124—135。

[8]《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9]《內部參考》，1957年5月29日，頁5—6。

[10]雲南省檔案館，2-1-2736，頁27—31。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03。

[1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5，492。

[13]為避免斷章取義之嫌，這裏盡量使用當時的報道或報告，而不是後來供批判的材料。但需要指出的是，從5月下旬開始，很多報道和內部報告已經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片面性，儘管比後來批判時要客觀得多。

[14]《人民日報》，1957年5月17日。

[15]《人民日報》，1957年5月20日。

[16]《大公報》，1957年5月17日。

[17]《光明日報》，1957年5月18日。

[18]《人民日報》，1957年5月19日。

[19]《人民日報》，1957年5月23日。

[20]《人民日報》，1957年5月29日。

[21]《人民日報》，1957年5月30日。

[22]《人民日報》，1957年5月31日。

[23]《人民日報》，1957年6月1日。

[24]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內部讀物）（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頁22—23。

[25]《人民日報》，1957年6月6日。

[26]《內部參考》，1957年7月15日，頁3—8。

[27]《人民日報》，1957年5月21日。

[28]《人民日報》，1957年5月26日。還可參見1957年6月4日《光明日報》的報道，內容略有不同。

[29]《內部參考》，1957年5月23日，頁18。

[30]《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

[31]《天津日報》，1957年5月27日。

[32]《人民日報》，1957年5月25日。

[33]《北京日報》，1957年5月26日。

[34]葛佩琦：《葛佩琦回憶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137—138；李新：〈反右親歷記〉，載蕭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頁24—25。

[35]《人民日報》，1957年5月31日

[36]《人民日報》，1957年5月29日。

[37]《人民日報》，1957年6月5日；《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頁10；陝西省檔案館，123-43-472，頁73-97。

[38]《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39]《內部參考》，1957年6月5日，頁42—44。

[40]《北京日報》，1957年6月6日。

[41]《人民日報》，1957年5月23日。

[42]《光明日報》，1957年5月27日。

[43]《人民大學周報》，第150期，轉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頁132。

[44]《師大教學》，第151期，1957年7月6日，轉引自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443—445。

[45]《人民日報》，1957年6月7日。

[46]如全面合營後對私方人員的工作安排沒有做好、定息的規定不合理等等。參見《人民日報》，1957年5月17，18日。

[47]如羅隆基認為從1956年以來的建設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哪個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進。參見《人民日報》，1957年5月23日。

[48]《內部參考》，1957年5月24日，頁24—26。

[49]《內部參考》，1957年5月22日，頁15—16。

[50]《人民日報》，1957年5月31日。

[51]陝西省檔案館，123-43-466，頁1—60。

[52]《人民日報》，1957年5月18日。

[53]《人民日報》，1957年5月25日。

[54]《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55]葛佩琦的發言被有意篡改，不算在內。但是，有人「要殺共產黨」的話，毛澤東肯定是看到了。

[56]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196。

[57]《內部參考》，1957年5月20日，頁3—10。

[58]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頁26—28。張時為北大中文系三年級學生。

[59]《文匯報》，1957年5月27日；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頁29。

[60]《內部參考》，1957年5月23日，頁3—16。

[61]《內部參考》，1957年5月25日，頁3—5；5月27日，頁14—18。關於北大學生到清華串連的所謂「二十九人案」以及學生代表到中南海上訪的具體情況，詳見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頁84—88。

[62]《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頁91—92。

[63]據說，儲安平25日得知北大出現大字報的消息後，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記者趕赴北大採訪，希望能有《光明日報》的獨家新聞。消息見報後儲得意地說：「我們跑到《人民日報》的前面去了。」參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52—53。

[64]《內部參考》，1957年5月25日，頁9—12；5月26日，頁18—22，28—29；5月27日，頁19—21。

[65]《內部參考》，1957年5月28日，頁26—28，6—10，12—13，15—19。

[66]《內部參考》，1957年5月30日，頁3—5，9—12。

[67]《內部參考》，1957年5月31日，頁19—23，12—15；6月5日，頁22—26，31—32。

[68]《內部參考》，1957年6月7日，頁10—13；6月6日，頁3—6。

[69]《內部參考》，1957年6月10日，頁20—23。

[70]《內部參考》，1957年6月6日，頁7—9。

[71]陝西省檔案館，123-43-472，頁1—11。

[72]上海市檔案館，A3-2-232，頁1—30。

[73]《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頁172，228—230。

[74]《內部參考》，1957年5月22日，頁18—19。

[75]《內部參考》，1957年6月4日，頁17—23。

[76]《內部參考》，1957年5月29日，頁13—14。

[77]《內部參考》，1957年5月31日，頁7-10。

[78]《內部參考》，1957年5月29日，頁14—17；陝西省檔案館，123-43-38，頁1—9。

[79]《內部參考》，1957年6月9日，頁32—34。

[80]《內部參考》，1957年6月1日，頁14—15。

[81]《內部參考》，1957年6月4日，頁3—5。

[82]《內部參考》，1957年6月4日，頁3；6月6日，頁3—6；6月7日，頁41—47。

[83]《內部參考》，1957年6月3日，頁7—9；6月4日，頁8—11。

[84]上海市檔案館，C1-1-189，頁1—9。

[85]《內部參考》，1957年5月27日，頁23—25。

[86]《內部參考》，1957年5月29日，頁20—22。

[87]《內部參考》，1957年6月7日，頁3—7。

[88]上海市檔案館，C-1-187，頁1—15、74；《內部參考》，1957年9月28日，頁12—14。

[8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691—697。

[90]《內部參考》，1957年5月31日，頁25—29；6月5日，頁15—17；10月9日，頁3—14。

[91]《內部參考》，1957年5月25日，頁27—28、23—26；5月31日，頁3—7。

[92]陝西省檔案館，123-43-38，頁1—9。

[93]雲南省檔案館，2-1-2743，頁106—113。

[94]《內部參考》，1957年5月30日，頁5—9。

[95]《內部參考》，1957年5月31日，頁10—12；5月30日，頁16-17。

[96]《內部參考》，1957年6月5日，頁32—35；6月7日，頁37—39。

[97]《內部參考》，1957年6月6日，頁26—29。

[98]陝西省檔案館，123-43-466，頁58—59。

三 反擊：毛澤東決心變黨內整風為全面反右

5月中旬發現民主黨派的言論有「危險企圖」和「錯誤傾向」後，毛澤東本來可以採取一種懷柔的應付辦法，像發動整風時那樣召開小範圍座談會，對那些他認為的「右派人物」（不過數人而已）進行規勸或提出警告，請他們並通過他們影響黨外人士，在規定的限度內鳴放，繼續幫助共產黨整風。但這不符合毛澤東那自信自傲和剛愎自用的秉性——他從來不會在壓力面前低頭示弱，而且他的疑心很重，總認為別人的舉動最終可能都是要奪取權力。所以毛澤東決心繼續鼓勵鳴放，甚至「引蛇出洞」。他就是要看一看，經過近八年的宣傳、教育和改造，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面對小小的風浪，究竟是繼續跟着共產黨走，還是會被這幾個社會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黨內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懷疑論者證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英明正確。[1]然而，「引蛇出洞」後二十多天的風雲變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轉而憤怒，毛澤東決心結束黨內整風而開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反右運動。

1 毛澤東感到了真正的威脅

中共採取雙百方針和大鳴大放的做法，確實受到了各種壓力和挑戰，但不是所有這些因素都使毛澤東感到了威脅。比如來自蘇聯和國際共運方面的猜疑和反對，早在1956年春天就已經存在，但毛澤東並未因此停止步伐。[2]從邏輯上講，在整風運動期間出現的反革命活動如反動標語、反動口號以及非組織的暴力行為等，也是對一個政權的威脅。[3]但毛澤東早在發動整風時就說過，這些極少數的反動分子「翻不起大浪」。真正使毛澤東感到威脅的是前文所述的種種現象，特別是當這些現象同時出現的時候。

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件事，即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將在6月3日召開人大會議。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鼓勵結合整風，繼續開展爭鳴。[4]還有，5月18日文化部發布通令，將所有曾禁演的戲曲劇目全部解禁，其中包括1950年到1952年間陸續禁演的二十多個劇目。[5]這些跡象都說明，當時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都沒有感到有甚麼非常現象足以打斷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也就是說，至少到5月18日，毛澤東還沒有決定要採取任何重大措施或舉動。

很多人以為，5月19日的北京大學風潮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第二天，即5月20日中共中央便作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

示〉，從而表明毛澤東決定開始反右。這裏有兩點解釋不通。第一，北大發生學生運動的情況，毛澤東是通過新華社和北京大學黨委反映後才得知，然後又派人去調查的。[6]這至少要兩三天，所以5月20日的指示與北大事件無關。第二，從5月20日指示的內容看，並無改變14日和16日部署的安排。

5月19日和20日連續兩個夜晚，毛澤東召集劉、周、鄧、陳等領導人開會。[7]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分析說：「現在的情況是，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夠。」接着引用16日指示的話說：為了「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漸孤立右派，爭取勝利」，需要「繼續登載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暫時不宜過多」反駁，「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顯然是為了防範「右派」言論的影響，指示要求「不要到外點火，特別不要同時在工廠和學校中發動工人和學生的批評運動」（這也說明北大的情況此時尚未匯報到中央）。指示還用大量篇幅教育黨員要正確對待批評，改變思想作風。最後要求結合5月14日和16日兩電「一併研究執行」。[8]這就說明，5月20日指示不過是對前兩次電報的補充和強調，而沒有作出新的決定。

5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報紙的宣傳報道問題。目前可以看到的會議摘要記錄是：「鬥爭的目的：同黨外人士的鬥爭，是孤立右派，爭取中間派，教育左派，改進作風，克服官僚主義。黨報不要趕時髦。運動結果即勝利的標誌是是否團結了中派，右派面目是否暴露了。」會議認為《文匯報》、《光明日報》刊登民主黨派的言論是「爭取領導，宣揚右派，爭取中間」，並擬定了一批題目，確定了作者和交稿日期。[9]從簡短的記錄文字看，還是「同黨外人士的鬥爭」，目的也還是團結中間派，暴露和孤立右派，並沒有提出反擊右派的問題，不過是準備寫幾篇文章而已。

當天，毛澤東對秘書林克也說到了右派問題：甚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共產黨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都是騙人的，一切都不要相信。他們違背了願意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諾言，他們意圖擺脫共產黨的領導。毛還談到對肅反中一些案件進行複查的程序問題：今後黨組議論時可以先不定死，議一下，交給非黨人士議，然後根據他們的討論，黨組再詳細討論定案後，再交行政會議正式通過。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向林克講解了他的詩詞〈沁園春·雪〉。[10]顯然，毛澤東此時還在對民主黨派違背諾言，向共產黨爭權的意圖耿耿於懷，毛澤東邀請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信他們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他為自己的「上當受騙」而感到憤怒，所以他必須打擊這些「右派人物」。但到目前為止，毛澤東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

重。說到肅反案件複查時，他仍然提出先交給黨外人士議論，甚至還有心情談論自己的舊作。

5月22日仍然沒有變化。劉少奇在這一天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是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問題。這時還沒有提出推遲會期，而劉少奇只是在發言中順帶談到了整風運動和孤立右派的問題。劉繼續強調：我們黨實行整風，很有必要。現在黨外有很多的意見，黨內也有意見。相當嚴重地脫離群眾，不整風，我們黨就會慢慢地毀滅掉。自然也談到了鬥爭策略，劉說：我們國內各條戰線現在都在發生重新改組的問題，各個階級都有左，中、右三派。我們要考慮做中派的工作，使右派孤立起來，辦法就是充分暴露右派。[11]這裏還是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戰鬥部署。

5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報告了整風鳴放的情況和工作部署，周恩來、朱德、陳雲、陸定一、康生也通報了一些情況。劉少奇最後說：小平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12]既然鄧小平傳達的是5月19日和20日毛澤東召集會議時確定的方針，那就是說，這次會議關於整風運動的工作部署仍然沒有超出中央5月中旬指示的框架。鄧小平在報告中說：「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運動可不可怕？現在我們確實有些擔心，比如我們黨校有相當的高級幹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們在那裏很擔心。這個擔心是有理由的。你說共產黨看到那個罵娘的事情心裏不着急呀，我看也難設想，我就有點着急。開始幾天，人心裏面有點急。後來看到那個反動的東西愈多，心裏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擔心是不是會出亂子。總的估計是出不了亂子。」[13]鄧小平如此放心，當然是還不了解正在北京校園裏發生的事情。可以為此判斷提供的另一個證明是，陳雲在會上討論整風問題時指出：業務機關要做到整風、業務兩不誤，上級機關要切實督促，抓好這件事。[14]看來，23日在中共高層還沒有發生特別情況。

第二天，作為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彭真在北京市傳達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具體內容。彭在報告中繼續強調整風，特別是開門整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肯定絕大多數鳴放意見是正確的，「有些人的批評是從右的觀點出發的，是從資產階級觀點出發的，但是右的方面的意見也可以起積極的作用，毒草也可以作肥料，起好的作用，事物總是在矛盾的鬥爭中發展的。」又說：「整風已經開展起來了，但總的還是放手得不夠，對黨外人士發動得不夠。有些大專院校還沒有開展起來，中央有些部還沒有展開，市裏有好些單位還沒有展開。由於有些同志還了不解發動黨外人士對黨展開批評的好處，因此他們就沒有決心去放手發動黨外的批評，不敢放火來燒掉自己的錯誤，特別是當着有些右翼分子、極

少數對黨憤恨的分子，對黨實行惡意攻擊的時候，就更沒有勇氣下這樣的決心。」「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當然不會都是正確的。但是為了鼓勵和開展這種批評，對於一切意見，應該耐心地、冷靜地傾聽，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管是好的壞的，都應該耐心地冷靜地傾聽，這是很難的，但是必須這樣做。就是對於錯誤的、甚至反動的意見，目前也還不要忙着進行批駁，以免阻塞言路。」「現在的批評已不是和風細雨了，的確是狂風暴雨了。因為發動黨外人士、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給你提意見，人家有話就要講，講了以後就要登報，有黨的報也有不是黨的報，這樣大家集中起來批評不就成了狂風暴雨了嗎？」[15]應該說，這個報告反映了5月14日到23日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場和方針，至少彭真本人的理解是這樣。

到此，可以對「引蛇出洞」策略產生後的整風方針進行一下總結了。這裏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鳴放中出現了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的言論和意見，並且對多數中間派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必須堅決回擊和批判這些右派言論。由於這些人物和言論有很大影響，且其反動性暴露得還不徹底，因此應該採取欲擒故縱的策略，讓他們走到極端，走到反面，才利於分化瓦解。但是，第二，這個鬥爭還是在人民內部，還是屬於思想領域，就是說仍然在整風運動的範圍內，只是從黨內跨到了黨外——這是毛澤東原打算在黨內整風結束後進行的工作。因此，整風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都沒有改變，改變的暫時只是策略。然而，在5月底的這幾天，一切都改變了。

筆者注意到，毛澤東沒有參加這兩天的政治局會議（這也可以說明會議沒有新內容），他正在關心的無疑就是北京大學出現的新情況。那幾天，毛澤東不斷派他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和林克去北大了解情況，每天向他匯報。據林克回憶，當時「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憂慮的。他關心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個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我們的政權能不能穩得住，會不會亂？」[16]毛澤東的確對局勢作出了相當嚴重的估計，他認為清華大學的黨組織已經垮掉了，「幾十個支部瓦解了」，而副校長錢偉長就是「納吉」，其「本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且幾乎每一個大一些的學校和工廠的「知識分子中間都有右派」，他們「就是納吉的群眾，是小納吉」。[17]他甚至設想了最壞的情況——打算再上延安。[18]後來毛本人也曾談到當時的心情：「我這個人就是常常有憂愁，特別是去年五月底右派進攻，我就在牀上吃飯，辦公，一天看那些材料，盡是罵我們的。」又說：「右派猖狂進攻時，哪個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點着急。我就是一個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19]毛澤東想出的主意就是一方面繼續共產黨整風，一方面開展一場反擊右派的運動。

在注意整風鳴放的新動向同時，毛澤東又開始修改他在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5月24日改出了徵求意見的第二稿。這次所作的重要修改和補充有：在第五節增加了關於知識分子必須完成世界觀上的根本轉變的一大段論述（後來幾天對這一段內容又作了很大的補充）。在第八節作了兩處重要變動。一處是把「我國雖然基本上結束了階級鬥爭，資產階級還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這句話，修改成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結束，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還是尖銳的，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後來幾天又多次對這段話進行補充修改）另一處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內容。[20]總之，強調思想鬥爭的尖銳性，強調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強調批判修正主義的重要性，是這次最主要的修改。當晚，毛澤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21]

就在25日這一天，劉少奇主持的人大常委會七十次會議討論人大四次會議的會期問題，決定從原定的6月3日推遲到20日召開。[22]官方沒有說明會議推遲的原因。國外學者引用的一個資料說，是因為劉少奇對整風運動出現的學潮和「人民會走上街頭」的狀況表示擔憂。[23]筆者沒有找到相關的文獻證據，但推斷這一定與24日夜晚毛澤東召集的會議有關，而且可以判定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這時的注意力已經被學生運動的發展勢頭所吸引。

也是在25日這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主要領導人一起接見了出席青年團三大的全體代表。第二天的報紙刊登了毛澤東在接見時講的幾句話：「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24]兩天前陸定一也在這次大會上作報告，表示希望青年們要經得起政治上、思想上的風浪的考驗，經得起困難的考驗，在風浪裏站穩共產主義者的立場。[25]陸定一的話可以看作是勸告，而毛澤東的語氣中流露出來的應該是警告，是一種暗示。在黨外人士和高校學生批評「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和高校黨委制意猶未盡之時，在民主黨派和知識界幫助中共整風日趨踴躍之時，在北京大學爆發的民主運動正在向全國推開之時，毛澤東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共是「核心」，號召人們「勇敢地」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還告誡「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這當然不是隨意說的。簡短的幾句話，幾近捅破窗戶紙，反擊右派的意思昭然若揭。參加接見的薄一波後來說，這個講話是「反擊右派的公開動員令」。[26]這樣說也許不大確切——畢竟還沒有宣布開始反右派運動，不過，一場反右派運動的風暴已經濃雲密布、雷聲隱隱了。

這些都說明，這時毛澤東已經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到了真正的威脅。這個感受，體現在他對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稿的修改中。5月25日，毛澤東改出了講話第三稿，並在批語中特別註明：「我百花齊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這就是：一、分析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況，以及共產黨對他們所採取的方針。二、關於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問題，在講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之後，加上了「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把「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改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在講這種鬥爭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後面加上了「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三、增加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四、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增加了兩段話：「這是我們的願望。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今後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當然，各民主黨派對共產黨提意見，作批評，要看那些意見、批評是否合乎上述六個政治標準。如果不合，那就會喪失監督的資格。」[27]第一點講的是策略問題。大概是不想給人留下玩弄權術計謀的印象，後來修改時，這段話又全部刪去了。第二點突出了意識形態以外的階級鬥爭，並提醒「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第三點表明在毛澤東心目中，政治界線已經劃定，可以考慮把右派和右派言論排除在人民內部矛盾之外了。第四點是報復民主黨派的「失信」和「背叛」，今後是否還能長期存在，就看你們是不是繳械投降了。

5月26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周、朱、鄧、陳等人開會，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匯報。[28]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目前未見披露任何資料，不過，第二天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的講話記錄，應該反映了這時毛澤東和中共高層的決定。

從柯慶施的匯報可以看出，中共對國內局勢的估計已經相當嚴重。柯講到，上海文化、出版、發行界「暴露很厲害」。在「放的過程中，最壞的是民盟」，「他們的方針是一放到基層，二撤換幹部，三算政治舊賬」。他們企圖「瓦解我們黨，動員黨員『坦白』秘密」，還把手伸向了工會。在民盟內部則是要改選，啟用那些「我們傷害過的人」。知識分子也「有很大暴露」，過去沒有講話的人，如巴金，都出來講了。王造時、陳銘樞提出搞私法問題，「影響很深」。在柯慶施看來，更嚴重的情況是這種氣氛已經感染了社會。工廠鬧事增多了，牆報很熱鬧，機關、銀行，稅局也在鬧。貿易公司、醫藥批發站、劇團、影界、廣播、大學都在鬧。最令人擔憂的就是黨內的問題：有的黨員把黨外作家

當作後台，有的黨員提出脫黨，還有的把黨內事情告訴黨外人士。王若望就同右派站在一起，說出現納吉也不為怪。（這時劉少奇插話：有些共產黨員和裴多菲俱樂部一個樣子。）「幹部對主席報告開始擁護，第二步有不同意見，第三步抵觸」，認為對右派「現在不整心不甘」。[29]

鄧小平的報告講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考慮和部署。鄧說，整風運動開始的目的是搞黨內的三大主義，因為問題很嚴重，最初用的是內外夾攻的辦法。運動開展以後，絕大多數的意見是正確的，有益的，90%對我們有幫助，「但很顯然有部分右派跟我們爭領導權。這個鬥爭不只是在思想領域，已經擴及政治範圍。有人提出綱領很謹慎的，不是打倒共產黨，而是要我們退出陣地。各地都看得出，以上海、北京為典型。因此中央不能不做鬥爭，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因此，運動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點，改進工作；另一個是團結黨外中間派，孤立右派。黨內外歸結起來一個目的，加強黨的領導。」接着說到運動的方法，鄧指出：關鍵是能不能團結中間派。右派在爭取中間勢力，左派，我們也在爭取中間勢力。我們爭取中間勢力有兩條：一是改正自己的錯誤，二是孤立右派。用右派教育中間派，使中間派知道需要同右派劃清界限。鄧說，現在「右派大體都出來了」，如章伯鈞、章乃器、龍雲等等。鄧指出右派活動現在有兩個傾向，一是「向基層發展」（康生插話：《光明日報》昨天對北大的報道有動員性質），二是「暗地組織活動的跡象明顯了」。談到今後的方針，鄧說：還可以繼續鳴放，主要在機關、大專院校，讓右派進一步暴露出來。黨團隊伍也要考慮整頓。但工廠、中小學不要觸動，關鍵是不能「出大亂子」。最後，鄧談到「中央有個設想」，即「運動下一步我們要建議黨外整風」，「黨外幾百萬知識分子的改造不能放鬆」，還是採取說理的方法。[30]彭真結合北京情況的講話更加具體和明瞭。他明確地說，開始只是整風，現在又加上一個「階級鬥爭」。鬥爭主要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思想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主要在機關和大專院校，工廠和中小學不要搞，不停課，不上街，不下廠，就不會出大問題。[31]

同一天（5月27日），毛澤東對國務會議講話稿的修改，主要是增寫了一大段關於同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影響進行鬥爭的問題。28日又做了一些文字潤色後，毛澤東將徵求意見的第五稿印發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全體領導人。[32]當天，毛澤東也同林克談到他對運動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勢，還應該繼續大放，目的是整黨、爭取中間派、孤立和分化右派。但對右派也是和風細雨的方針。北京大學的情況不會發生大問題，學校教授、副教授的11%是右派，左派39%，中間派50%。講師、助教不在其內。八千學生中，右派只有七十餘人，有

二百人左右支持他們。[33]6月1日，毛澤東又對講話稿作了一次較大改動，其中增加的新提法是：「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而且指出，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向馬克思主義進行鬥爭」的最好助手。[34]

上述材料表明，到5月底6月初，毛澤東要進行反右運動的設想又進了一步：同右派的鬥爭已經不是整風的一部分，而是與共產黨整風並行的一場「階級鬥爭」；這場鬥爭已經不再局限於思想領域，而是有了政治鬥爭的內容；在理論上和口頭上還沒有放棄整風，但是修正主義的危險性已經提到首位，而這些恰恰不在整風的範圍內。還可以看出，中共對國內事態發展的嚴重性也有了進一步認識，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言論——他們的話已大體說完，陣線已基本清楚，右派只是極少數；也不在於學生運動本身——那裏不會發生大問題，因為右派也是少數。最危險的就是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煽動性言論，與波及全國的學運風潮匯合起來，再同時湧向社會，影響到工廠、農村和中小學，其結果將是「天下大亂」，將會真正危及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這時開始擔心：中國「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了。[35]這就是毛決定提前反擊的真正原因。開展一場反右鬥爭的基本方針已經確定，主攻方向也已經明確，餘下的就是何時開始戰鬥，如何開始戰鬥了。

2 尋找階級鬥爭的新突破口

5月27日省市區書記會的召開標誌着新方針的確定，此後就是審時度勢進行落實的問題了。

首先是在黨政機關和民主黨派中鼓勵繼續鳴放。雖然黨內討論時已經意識到危險的存在，但在表面上社會的鳴放浪潮還在繼續。5月29日，民革中央委員會發出了關於積極幫助中共進行整風運動的指示。其中講到：積極幫助整風，「不但有益於共產黨，也是我們對國家應盡的責任」，並要求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熱烈響應中共號召，「消除一切顧慮，實事求是，誠懇坦率，提出批評和建議；各級組織應將所提出的意見反映給中共黨委參考」。[36]《大公報》也在29日發表社論〈工商聯要幫助工商業者鳴放〉，勸告中下層和中心城市的工商業者「解除顧慮，勇敢地鳴放」，並要求「工商聯特別要負起責任，一方面把自己所看到的問題向有關部門提出，一方面要充分發動工商業者把心裏的意見和要求都講出來」。

5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央國家機關黨委要求「更加放手地讓大家暢所欲言」的報道，明確提出：「各單位要拿出具體措施，廣開言路，繼續貫徹大『放』大『鳴』的方針」，同時強調要加強黨對運動

的領導。6月5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人民內部需要經常開展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永不收兵」為題，轉載了南京《新華日報》6月1日的社論〈把整風運動繼續深入開展下去〉。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此時的媒體運作都是在呼應中共「引蛇出洞」的鬥爭策略。

為避免事態繼續惡化，在鼓勵民主黨派、工商界和國家機關繼續鳴放的同時，對於工廠、農村和中小學則是嚴格把關。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江蘇省委關於正確處理農村人民鬧事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認真學習江蘇的經驗，並按照同樣的辦法，「認真地分析一下農村人民鬧事的原因」，「主動地去解決農村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以使防止人民鬧事事件的發生」。[37]6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一）各學校、機關出大字報和學生舉行辯論會、控訴會等新聞，一律不要在報紙上發表，以免影響到中等學校和工廠。（二）凡出大字報的學校和機關應宣布一律不准貼到門外和街上，以免妨礙社會秩序。[38]

這一時期，反擊右派的鬥爭已經在進行各種準備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從6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刊登反駁右派的報道和文章的數量明顯增加。：[39]如〈承認兩面性，才有利於自我改造〉，〈復旦大學沒有取消黨委負責制〉、〈有職有權，親密無間〉、〈黨委治校，還是教授治校？〉、〈誰說公方代表領導不好生產？〉、〈我反對葛佩琦的觀點〉等。[40]毛澤東本人也親自挑選文章。5月29日《新聞日報》刊登了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毛澤東早已把章乃器內定為大右派，看到這篇文章後，第二天便批示胡喬木：此篇似可轉載。[41]還有6月6日《文匯報》刊登的〈知識分子應怎樣對待整風〉一文，毛澤東也在第二天批示胡喬木：此文很好，可以轉載在顯著地位。[42]

除了輿論準備，基層單位黨委也接到了任務。時任北京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的施平回憶說：反右正式開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布置各校抓緊時間，動員鳴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情況後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最後又交待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43]

6月3日統戰部召集的民主黨派座談會進入最後一天，李維漢事先把發言稿送毛、劉、周審閱，並提出要不要提反右。毛澤東審閱發言稿時，加了一句話：座談會上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

的」。周恩來說，關於反右問題，柯慶施在上海已經有所表示，你可以講。[44]同一天，彭真在北京市部分黨員幹部會上發表講話，向基層幹部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新方針。彭指出：當前有兩個鬥爭，一個是黨內的思想整風，另一個就是階級鬥爭，並強調「這一時期主要是」搞階級鬥爭。雖然把這種階級鬥爭歸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但彭真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就在於，右派正在煽動農民、工人和學生。在如此激烈的鬥爭面前，彭真呼籲工人不要再鬧事，而應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45]

另根據黃炎培日記中記述，6月5日夜晚，毛澤東緊急召見他和陳叔通，大概因為這兩位老先生日前曾聯名上書，請求毛不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毛心存感激，不願他們被捲入進去，故提前向他們吹風。毛澤東談到，在鳴放中「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還說章伯鈞與羅隆基已經勾結起來，並希望黃回到民盟去主事。[46]這表明，中共在發動反擊行動前，已經在考慮改組民主黨派的領導班子了。

6月4日毛澤東對林克的講話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對右派的性質又提出了一種新的看法：「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中的右派表現得最猖狂，帶有一種最後掙扎的性質，他們和蔣介石與帝國主義有共同點。」第二，對雙百方針也有了新的解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口號是無產階級性的，如果這個口號執行的結果不能駁倒謬誤，整倒右派，那麼這個口號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這是反動的。」第三，進一步確認右派已經處於孤立狀態：「右派有些衝昏頭腦，以為中間派是屬於他們的，其實是做夢。」[47]說右派是「最後掙扎」，與蔣介石「有共同點」，這顯然就不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了，更不是思想領域的問題了。這種認識為後來的反右鬥爭採取「急風暴雨」的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礎。對雙百方針這種後退一步的說法，一方面是毛澤東為實行雙百方針的失敗尋找的一個台階，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準備放棄或暫時收起這一方針了。對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做出左派已經佔有優勢的判斷，則意味着全面進攻可以開始了。現在只是要尋找一個合適時機。

6月5日晚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彭真和羅瑞卿談整風問題。[48]具體會談內容不詳，但特別召公安部長羅瑞卿覲見，很可能與追查一則「謠言」有關。6月4日《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說，北京大學有一學生寫了一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造謠說黨中央已開始分裂，毛主席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這篇文章油印後在校內外散發，震動很大。陸定一認為事情十分嚴重，於6月5日將《簡報》報送毛澤東，並附信說，右派正在進行大陰謀，值得注意。因此，此次人大可能出現一種激烈鬥爭，包括我們現在還估計不到的東西，例如提出胡風案，對某些同志的人身攻擊，等等。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第二天批

示：「印發在京各中委一閱。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49]就在批示發出的當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

〈指示〉首先通知，6月15日將在報上發表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兩次講話，並要求「各省市一級機關、高等學校及地市一級機關用大放大鳴方法的整風，請即加緊進行」。除了說明大字報的形式「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外，毛澤東強調，「機關學校出大字報的消息，報紙不應登載，以免影響中等學校及工廠」。〈指示〉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擊右派的行動安排：「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毛澤東還提醒說，「暑假將屆，京滬及各地大學生將回家，其中有些人將到處活動，你們應爭取主動，並準備適當應付」。[50]按照毛澤東的這個設想，大約十天以後，也就是他反覆修改的講話稿發表之際，反右運動將全面展開。然而，一個突發事件導致戰鬥提前打響了。

在權力鬥爭中，毛澤東最敏感、最警惕的就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在前引鄧小平27日的報告中就談到民主黨派有「暗地組織活動的跡象」，6月初，這方面的情況開始連續披露。6月5日《內部參考》報道，5月19日王造時曾約人座談，討論恢復抗戰時期的民間組織「救國會」事宜。據反映，王在會上說，毛主席、周總理都關心救國會的恢復問題，在北京徵求「七君子」的意見時，史良、沈鈞儒不贊成，沙千里贊成，章乃器不熱心。會議商談的結果，認為救國會有恢復組織的必要，對於解放台灣、聯繫華僑都有益處。會議決定「積極調查原救國會的幹部、群眾，分別收集名單」。[51]6月6日《內部參考》又披露：最近發現有些機關內民主黨派的組織有不正常的活動。在手工業管理局工作的農工民主黨黨員宋子榮積極做發展工作。他所發展的都是被我們鬥過的人。他們公開地說，我是這個單位民主人士的代表。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手工業管理局要給我地位，給我機會。僑委中國新聞社的民盟組織也積極展開活動，他們說，中國新聞社的黨組織已脫離群眾，不能居於領導地位，我們民盟組織應該起來團結群眾，領導新聞社的工作。[52]

更嚴重的情況出現在早已被毛澤東列入「黑名單」的民盟，這就是著名的「六六六事件」。6月6日上午，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樂部邀集曾昭掄、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教授討論時局問題，葉篤義、閔剛侯、金若年和胡愈之（中共黨員，中途退出）也在場。關於這次聚會，反右運動開始以後，被作為右派陰謀活動的代表作受到批判，所根據的材料是與會者閔剛侯在7月4日《人民日報》上披露的會議討論內容。後來，當事人葉篤義和章伯鈞的女兒

章詒和也曾講到會議情況，所述內容與前者差距較大。[53]章伯鈞和六教授在會上究竟說了甚麼話，目前沒有文獻證據，無從核實，但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與會者都認為由於學生鬧事，大字報上街，共產黨面臨危局；第二，民主黨派此時應該站出來，承擔起收拾局面，平息內亂的責任。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民主黨派此時挺身而出的目的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當事者認為自己是為了幫助共產黨擺脫困境，而當政者認為他們是要乘機推翻共產黨。仔細閱讀和對比所有相關材料，筆者認為，說當時民盟要推翻共產黨，那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猜測，但在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章伯鈞等人確實想通過幫助共產黨渡過難關，從而為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爭得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恰恰這一點是毛澤東和中共最忌諱的，在他們看來，這不是乘人之危嗎？況且毛澤東早就認為在民主黨派中民盟是「最壞的」。

還在6月2日招待法國總理的酒會上，章伯鈞就曾向周恩來表示：武漢交通部學校的學生們要到北京來請願，請把這件事交給他來處理。周恩來當時笑了笑沒有說話，但心裏想章伯鈞「腦袋膨脹得很，熱得很，他覺得共產黨不能維持了」。[54]此時中共已經確定了反擊右派的方針，故周有此態度，但章伯鈞肯定沒有認真體會周恩來的反應。6月6日他再次提議，要史良當晚利用參加國務院會議的機會，向周恩來反映他們的想法——由民盟出面做學生工作，使各校局勢穩定下來，並希望周接見六教授，當面請示機宜。第二天去國務院開會時，史良告訴章伯鈞：「前一天晚上我已和總理談了，可總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這個機會，再和總理談一談。」於是，章伯鈞在會上給周恩來寫了個條子，說眼下的情況嚴重，民盟同志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周恩來看了條子，仍然不置可否。[55]到了這個時候，無論章伯鈞和民盟提出任何建議，都不會有好結果。周恩來的感覺是：他們看到大字報上街，學生請願，工人罷工，農村合作社也有問題，認為就是匈牙利事件了。「他們這樣的相信，這樣的估計，6月6日他們是高興的」。[56]毛澤東對此事的反應體現在他後來寫的文章中：「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6月6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57]

這時的毛澤東感到，防止民主黨派與學生結合，防止學潮湧向社會，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已經刻不容緩，反擊行動必須提前。恰在此時，又發生了「盧郁文事件」，毛澤東及時抓住了這個機會。

盧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員，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助理。他在5月25日和29日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言，批評現在一些人提意見有片面性，只許

自己提意見，不許人家作說明，並與譚惕吾發生爭議。[58]在6月6日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盧郁文宣讀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嚇信。信中說盧郁文「為虎作倀」，「無恥之尤」，並要他「及早回頭」，否則「不會饒恕你的」。匿名信還說，「共產黨如果只認你這班人的話」，「總有一天會走向滅亡」。[59]6月7日上午毛澤東看到報紙上的這條消息，喜出望外，對應約而去的胡喬木和吳冷西說：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甚麼時候抓住甚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甚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60]

於是，反擊右派運動的號令就這樣產生了，一場波及全國、影響數十萬人命運乃至共和國發展方向的反右派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1]有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的自信和對形勢的樂觀估計是長時間「受了自己所辦報紙的蒙蔽」，對黨報的歌功頌德和感恩戴德式的宣傳「信以為真」。參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頁84—85。這確實也是一個方面的原因。

[2]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蘇聯報刊基本不刊登中國開展百花運動和整風運動的消息，只有《真理報》刊登了中共中央整風指示和一篇《人民日報》社論。《文學報》曾極簡單的報道陸定一關於方針的文章，卻全文登了陳其通等人的聲明。《內部參考》，1957年5月24日，頁30—33；6月5日，頁47—48。《新時代》雜誌因發表了一篇講述「百花齊放」的旅行札記而受到蘇共中央書記福爾采娃的當面批評。參見瓦列金·別列什科夫著，薛福歧譯：《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頁395—397。蘇聯大使館甚至認為整風和鳴放運動在客觀上鼓勵了反蘇言論的傳播。參見TsKhSD,f.5.op.49,r.8862.No.41（April-Decemberl957）,105-113；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odd Arne Westa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32-133.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談到這個問題時，也大都採取迴避的態度。參見《內部參考》，1957年5月30日，頁27—41。毛澤東對此情況完全了解。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597—610；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4，頁49—54。

[3]據報道，5月中旬武漢醫學院和昆明師範學院就已經出現了「打倒共匪」、「反對一黨獨裁專政」等十幾條反動標語（《內部參考》，1957年5月25日，頁11；5月27日，頁38—41）。以後在北京、陝西、上海都發現了類似的標語口號（《內部參考》，1957年5月28日，頁15—19；5月29日，頁14—17、20—22）。南京大學還有學生揚言：「要救中國」，殺掉幾百幾千個「壞黨員，是必須的」（《內部參考》，1957年6月7日，頁47—48）。

[4]《人民日報》，1957年5月19日。

[5]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四卷，1991（未刊），頁206。

[6]《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148。

[7]《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3。

[8]《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二冊，頁19—22。

[9]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摘抄本），1957年5月21日；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615。

[10]林克：《林克日記》（手稿），頁40—41。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由人大和政協主持。參見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記錄稿），1957年2月27日。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1996），頁401。

[12]《毛澤東傳（1949—1976）》，頁697；《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403。

[13]《毛澤東傳（1949—1976）》，頁696—697。

[14]《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3。

[15]《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頁277—286。

[16]林克等：《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頁45—46；《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148。

[17]毛澤東與卡達爾談話記錄，1957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4-00054-04，頁2—7。

[18]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19]《毛澤東傳（1949—1976）》，頁696。

[20]逄先知、李捷：〈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頁27。

[21]《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4。

[22]《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403；《人民日報》，1957年5月26日。

[23]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頁345—346。

[24]《人民日報》，1957年5月26日。

[25]《人民日報》，1957年5月23日。

[2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14。

[27]逄先知、李捷：〈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頁27—28；施肇域：〈修改始末〉，《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頁68—69。

[2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7；《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4。

[29]柯慶施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30]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31]彭真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讓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32]逄先知、李捷：〈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頁28。

[33]林克：《林克日記》（手稿），頁42。

[34]逄先知，李捷：〈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頁28。

[3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编》，第十冊，頁285。

[36]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究編：《中國民主黨派史文獻續编（社會主義時期）》（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辨公室，1986），頁54—55。

[37]《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頁686—689；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99，頁17—19。

[38]雲南省檔案館，2-1-2736，頁107。

[39]鄧小平在27日的報告中要求在報紙上「左派的東西逐漸增加一點」。參見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5月27日。

[40]《人民日報》，1957年6月1至7日。

[4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89。6月8日發動反擊的第一天，該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

[4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95。該文後來未見轉載，原因不明。

[43]轉引自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頁202。

[44]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35。

[45]《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编（1957）》，頁306—311。

[46]章立凡：〈風雨沉舟記〉，《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頁48—49。

[47]林克：《林克日記》（手稿），頁44—45。

[4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9。

[4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93；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221—223。

[5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91—492。

[51]《內部參考》，1957年6月5日，頁44—45。

[52]《內部參考》，1957年6月6日，頁26—29。

[53]參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100—101；章詒和：《最後的贵族》，頁12，63—65。

[54]周恩來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1957年7月7日。

[55]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12—13；《往事並不如煙》，頁11；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100—101。

[56]周恩來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1957年7月7日。

[57]《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7。

[58]《人民日報》，1957年5月26日、30日。

[59]《人民日報》，1957年6月7日。據說，公安機關後來偵破此案，將寫信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楊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參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頁149—150。不知確否。

[60]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39—40。

第九章
聚而殲之：階級鬥爭再次成為焦點

從中共的執政綱領看，反右運動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改變了中共八大作出的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的判斷，再次把階級鬥爭作為全黨關注的焦點。而進行階級鬥爭，共產黨的成功經驗就是依靠群眾運動。於是，反右運動就成為發動全國人民開展的一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群眾運動，其矛頭直接指向民主黨派和黨內外的知識分子。顯然，把這一歷史性錯誤的實質僅僅歸結為「擴大化」，既不符合史實，也有違邏輯。因此，很少有人能夠接受這個政治結論。不過，筆者在研究中感到，無論從被劃為右派的人數，還是運動打擊的範圍來說，的確呈現出一種不斷擴大的趨勢。就是說，問題的實質不在所謂「擴大化」，但「擴大化」的現象還是存在的。本章所要分析的，就是這個「擴大化」的過程和原因。

一 全面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與整風相比，反右派運動無論是發動還是展開，都顯得十分順利。箇中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數黨員幹部前一時期感到受壓、委屈，現在黨中央終於站出來為他們撐腰了，於是他們個個奮勇當先，衝鋒在前；另一方面是廣大的工農兵和基層群眾被發動起來了，他們不像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那樣思前想後，顧慮重重，而是黨指向哪裏就堅決打到哪裏，其激進程度甚至往往超出指導者預設的框架。

1 反右群眾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在反右運動開始前的一段日子裏，毛澤東「工作非常緊張，天天開會、談話，了解情況，分析動態，研究對策」。[1]運動開始以後，毛澤東的主要精力則集中到制定鬥爭的方針和策略，他連續起草了一系列文章和文件，還親自動筆為《人民日報》修改了一些文章，用以指導整個運動的方向。

就在反右號令下達的當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在這個文件中，毛澤東向各地黨委交待了他所設想的運動進展時間表，「省市級機關和高等學校大放大鳴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足」，加上組織反擊，「整個過程，做得好，有一個月左右就夠了」。此後「轉入和風細雨的黨內整風」。毛澤東還布置了鬥爭策略，如不讓右派走出本單位，「要預作布置，實行擋駕」；如「街上貼反動標語，動員群眾撕毀」；勸告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鬧事」；「每個黨報均要準備幾十篇文章，從當地高潮開始跌落時起，即陸續發表」；「大字報必須要讓群眾反駁」等等，非常細緻。毛澤東最後指出了開展這次運動的必要性：「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2]

兩天之後，毛澤東又起草了一個關於反右鬥爭步驟和策略的指示，並要求用電報發出。這顯然是他認為需要立即補充或進一步強調的內容：第一，各地情況不同，何時開始反擊，要看當地情況決定，最重要的是「推動左中右三派人物展開爭論」。第二，提前做好放假回鄉的學生的工作，防止煽動農民，「此點甚重要，請即辦」。第三，注意團結工商界人物，他們之間已經開始批判，「我們不要大搞」。第四，要把鬥爭的矛頭對準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學生中的右派和反動分子，重點

是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尤其章伯鈞、羅隆基最壞，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顛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一定要在這次運動中使他們「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3]這兩個指示講的都是具體的方法和策略，可以說是精心指導了。

按照中共中央6月8日的指示，每個黨報均要準備幾十篇文章。在〈這是為甚麼？〉之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6月9日）、〈工人說話了〉（6月10日）、〈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團結起來〉（6月11日）、〈正確地對待善意的批評〉（6月12日）、〈是不是立場問題〉（6月14日）、〈不平常的春天〉（6月22日）、〈再論立場問題〉（6月29日）。在二十二天的時間裏，《人民日報》發表了八篇反右派社論，平均不到三天一篇。這就是鄧小平說過的「火箭炮」。

6月12日，毛澤東決定在黨內印發他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關於這篇文章，毛當時指示「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印發的範圍為「中央一級若干同志」和除新疆、西藏之外的各省市區黨委。至於具體印發數量，毛囑咐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酌定」。[4]最後到底發出多少尚不清楚，至少在筆者查閱的十幾個省市的檔案館中，沒有發現這個文件。可以斷定，當時看過這個文件的人很少。所以，就其作用而言，不僅如前所說，該文不能作為考察毛澤東反右思想如何出現的依據，也無法斷定它對各級領導指揮反右運動究竟產生了多大影響。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毛澤東並非無意印發的這篇文章，確實反映了他此時此刻的心態、情緒和思想。通篇看下來，前半部分是講給黨內聽的，比如強調「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以及對資產階級右派和知識分子的分析，這些與他對國務會議講話稿的修改是一致的。後半部分是說給社會上的右派聽的，反駁他們可能提出的種種責難，看文風筆法，也像是一篇要在報紙上刊登的文章。但全文的主旨就是為他發動整風運動、鼓勵大鳴大放在先，發動反右運動、圍攻民主黨派和知識界在後的「戰略安排」進行辯解。值得注意的只有一點，即整風運動在反右之後還要繼續，其時間視不同地區，從幾個星期至一年不等。[5]後來的反右整風運動正是按照這個設想發展的。

真正對反右群眾運動產生重大影響的，是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兩篇文章。反右運動開展一個星期以後，毛已經不能滿足於只在黨內發文件、下指示了，他需要直接面對廣大群眾。前文已講到毛澤東一直對《人民日報》不滿，反右方針確定後，6月7日毛澤東就提出讓吳冷西接替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運動開展後，毛澤東在6月13日又提出，《北京日報》比《人民日報》編得好，內容豐富，「文字

也較人民日報生動」，並於當天決定撤換鄧拓。[6]第二天，毛澤東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本報編輯部」的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整風動員時毛澤東曾對黨外辦的報紙表示讚賞，並特別青睞《文匯報》和《光明日報》。「事情發生變化」以後，一向重視輿論作用的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過這兩份異常活躍的黨外報紙。6月10日《文匯報》刊出了姚文元的短文〈錄以備考〉，文章對比了幾家報紙對於同一新聞稿在編排上的不同處理形式，指出新聞編排也有政治性，並對《文匯報》的做法提出批評。毛澤東立刻抓住此事，在《人民日報》轉載了姚的文章，同時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的語氣非常緩和，但在一開始就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基本政治方向是資產階級的，其表現就是利用「百家爭鳴」的口號和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7]這篇文章對於在新聞界開展反右鬥爭以及控制輿論陣地的指導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6月14日，毛澤東對國務會議講話稿作了最後一次實質性的修改，值得注意的有三點：一是在第二節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還可能出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二是在第九節談到鬧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義的地方，加了：「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三是在第十二節加上了肯定蘇聯經驗的一段話：「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十分寶貴的。」[8]用意很明確，第一是讓人們在反右派鬥爭中聯想到新的反革命分子已經出現，第二是安撫一下感到受了委屈的基層幹部，以便他們積極投入戰鬥，第三是在他這個講話發表前為把對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態度列為識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之一做個鋪墊。

6月15日民盟四川省委副秘書長趙一明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言，揭露章伯鈞、羅隆基同年4月曾在民盟中央的工作會議上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是平行關係，民主黨派也要參加決策工作。要在中央和地方搞「政治設計院」。毛澤東看到後立即指示彭真查明該發言是否已經發表，「如已發表，請告新華社用新聞形式轉發；如未發表，請商李井泉爭取發表，然後新華社再發表」。[9]毛澤東反右鬥爭的策略之一就是分化民主黨派，並特別注重利用民主黨派內部的左派批判右派，這一指示就是證明。事實上，毛的這個策略在運動中的確得到了充分運用。

6月19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歷時五十五天經過十三次修改[10]的講話在此時公開發表，成為反右派鬥爭又一個重要的綱領性文件。[11]有研究者認為，這些修改不僅保持了原講話的基本精神，而且使之更加豐富和完善。[12]對於一篇思想理論著作的形成而言，這樣說是可以理解的，但

作為歷史研究者，還應該看到，在修改的過程中，毛澤東本人的思想是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的，這種變化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修改中。如前所述，這些變化集中表現為：增加並突出了階級鬥爭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的論述；增加並突出了反對修正主義傾向的論述。如此「豐富和完善」之後，本來是一次動員全黨和黨外人士開展整風運動的講話，現在變成了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展反右運動的文件。陝西省委的領會是準確的，在一份關於向群眾宣傳毛講話的通知中，省委特別要求各級領導注意：對於官僚主義等工作中的問題，「不要開展批評運動」，而應該結合毛澤東的講話，向群眾宣傳「當前反擊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鬥爭形勢」。[13]選擇這個時候公開發表講話，其意義正在於此。此前，按照毛澤東的部署，有十幾天允許各種派別和觀點在報紙上互相爭鳴。此後，劃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已經公布，就只有打擊和批判「右派言論」的「一邊倒」了。這個講話發表後人們當時的感受，可以從「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就毛主席報告進行大討論」的情況看出來。很多師生在討論中提出了疑問，如「整風本來是整共產黨，現在整到民主黨派頭上了」；「共產黨真不講信用，原來是言者無罪，現在是言者有罪了」；「過去是毒草放出來沒關係，現在說有毒草就要拔掉」；「既然有小資產階級政黨存在，為甚麼又要求他們同無產階級政黨有一樣的看法」等等。[14]

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不平常的春天〉，毛澤東在審閱清樣稿時作了修改。毛改寫和加寫的文字有兩段值得注意：一、在對右派「鳴放」「不能不堅決地進行反攻」一句中，加寫了「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一、在談到資產階級右派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時，加寫了「現在已經有了許多事實證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圖的，他們不但是不贊成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贊成反帝反封建的徹底的民主革命」。[15]前者意在指出，在對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反右鬥爭中，必須依靠工農大眾；後者意在剝奪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政治資本，以便於在鬥爭中向他們算歷史舊賬。這兩個方法在運動中也被廣泛使用。

新的戰鬥號令發出一個星期後，整個局勢大為改觀。最初的反右派運動，是在各民主黨派內部進行的。6月8日的中共黨內指示，要求組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左中右的人都參加，正反兩面意見都讓其暴露，派記者予以報道，巧妙地推動左中分子發言、反擊右派。各民主黨派本來從5月下旬開始，就先後分別召開了各種形式的座談會，主要內容是幫助共產黨整風。6月8日的反右派動員令一發出，會議內容自然就轉向了批判右派。民革、民盟、民進、農工黨、全國工商聯、民建、九三學社在一個星期內，分別召開中央小組擴大會議或座談會，集中批判

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等人。[16]同時，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注意組織中左派寫文章的指示，報紙發表了一批民主黨派人士的批判文章。如翦伯贊的〈擁護大放大鳴，反對亂放亂鳴〉（《北京日報》6月9日），馮和法的〈評章乃器對於工商業者改造的幾個論點〉（《大公報》6月14日），高崇民的〈民主黨派必須誠心誠意幫助黨整風〉（《人民日報》6月15日），胡一禾的〈章伯鈞的錯誤思想由來已久〉（《人民日報》6月16日），鄧初民的〈請看章伯鈞的本來面目〉（《人民日報》6月19日），千家駒等人的〈為甚麼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對章乃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批判〉（《人民日報》6月20日），宋慶齡的〈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人民日報》6月21日），何香凝的〈民革需要整風〉（《人民日報》6月22日）等。

6月中旬，在報紙上和各種會議上還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包括給共產黨提意見），雖然愈來愈弱。到6月下旬，就只能聽到一種聲音了，尤其是在公開場合。6月26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新的號令——〈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在右派「開始潰退」的時候，「必須認真地組織群眾，組織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熱打鐵，乘勢追擊。緊緊地抓住已經暴露出的這夥階級敵人，實行內外夾擊，無情地給他們以殲滅性的打擊。我們務必在這場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中粉碎已經暴露出的真正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共的右派的領導骨幹，打斷這個豺狼集團的脊骨」，「切記不要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姑息養奸」。在談到劃分右派時，〈指示〉雖然提出要「實事求是」，但強調的重點是「對於右派的數量，不要估計不足，劃得太少」。「如果把右派劃得過少，勢必把一些堅決的階級敵人當作好人。這是右的，也是危險的」。關於鬥爭的手段，中共中央提出，共產黨員「可以少出面」，「在各民主黨派內部和群眾中，應該聽任並且盡可能組織民主人士和群眾揭發右派的重要反動言行和劣跡。右派有多少醜事，揭露多少，不要加以限制」。[17]

毛澤東這樣做，不僅是針對章羅的頑強抵制，也是衝着很多左派或中派的黨外高層人士的不滿情緒來的。據李維漢回憶，在6月中旬，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紛紛對反右鬥爭擴大化表示不滿。黃炎培認為不能樹敵過多，要把可能拉過來的人拉過來。陳叔通說，不能因對黨提了意見就作為右派，這方面的問題很嚴重。邵力子說，現在有許多問題處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難，失人心很易，甚至表示對民革中央的反右鬥爭要沉默抵抗。史良也不贊成把揭發右派分子的材料都登在報上，擔心這樣做會把運動搞得很大。黨外人士的這些意見，統戰部都向中共中央做過反映，但沒有結果。[18]鬥爭的矛頭必須直接指向民主黨派。於是，按

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從6月18日開始，各民主黨派紛紛開始內部整風。

大批判進行了十天後，6月29日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提出，爭取和團結中間分子，是反右這場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獲得完滿勝利的一個關鍵」，對於極右分子的策略一是必須「打得準，打得狠，將應當揭露的東西，充分揭露」，「來不得溫情主義」。二是必須撤掉他們在各民主黨派中的實際權力，或者先行停職反省。三是還要「暫時保存他們一部分職權或地位，以示留有餘地，給以出路」。原則是，「對這種人實際上是一棍子打死，但形式上還不要一棍子打死。這一點也很重要，否則也將不得人心」。[19]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指示時補充了一些內容：除第一次透露了右派和極右派的人數，即「需要在各種範圍點名批判的」，「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外，在對那些僅有右派言論的人「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採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這段話中，加寫了（對於僅有右派言論）「但並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派加以區別」一句。[20]言外之意，對於「極右派」是可以不採取說理的鬥爭方法和與人為善的態度的，這無疑對運動中普遍出現的一系列過激的鬥爭方式是有引導和鼓勵作用的。更大問題是，按照毛加上的這句話，判斷極右分子的標準就是有右派「行動」，但何為「行動」，沒有界定。貼大字報算不算，上街遊行算不算，上訪請願算不算，自行聚會算不算？當然，如果這個說法只是在黨內上層領導之中流傳，影響還不大，但兩天後就上了報紙——這個標準一旦交給基層領導人和廣大群眾，其結果必然導致群眾鬥爭中的擴大化現象。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這是毛澤東親自寫的又一篇重頭文章。[21]此時離預定的在一個月左右結束反右鬥爭的限期只差一個星期了，看起來毛澤東有些着急。在這篇社論中，毛澤東第一次公開指出，右派分子的大本營是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主帥就是章伯鈞和羅隆基聯盟。所有的陰謀活動，反黨風浪，「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現在大量的史料已經證明，所謂民主黨派有一條「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是虛構出來的，所謂的章羅聯盟更是無稽之談。[22]毛澤東是否真的相信存在一個章羅聯盟，無從考察，但他必須找出這次反共活動的後台，必須讓群眾明確主攻的方向，這是鬥爭的需要。社論關於「陽謀」的說法純屬強詞奪理，前面已經談過，這裏要注意的是，毛澤東再次提到了右派「行動」的問題。他的邏輯是：「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第一次公開地把右派定性為反動派）；「這種人不但有言

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因此，「『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這就是說，只要你有「行動」（具體內容自行掌握），那麼你的言論就有罪。只是因為「人民的國家很鞏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頭面人物。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這就是後來人們理解的「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本來是法律條文的問題，卻非要使用政治概念來解決，這算是一個典型了。這個社論發表以後，群眾運動的火焰就更加高漲了。[23] 運動起來後，統戰部擔心對右派分子「急於處分」不利於「深入反右派鬥爭」，於7月4日報告中央，認為過早處分是把鬥爭「簡單化了」，是「草率收兵的信號」，需要對極右分子「反覆、徹底地進行揭露和批判」，「越是對他們批判和揭露得體無完膚，就越能教育和團結中間分子」。中共中央稱「這個意見很好」，遂向各地轉發了統戰部的報告。[24]

隨着運動的深入，右派分子的人數也迅速增長，不到一個星期就翻了一番。7月2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稱，原說北京有400人，現初查有880人，全國8000人。[25]幾天後，毛澤東7月9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個通知也說：「準確的右派骨幹名單擴大了一倍，全國不是4000人，而是大約有8000人。」北京也不止400人，而是800人。毛澤東對報紙上點名批判的情況不滿意，他在通知中說：「現在的問題是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大約不過佔右派骨幹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幹七百多人，報上點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報上老是這幾個人，讀者也看厭了。因此應當分階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後增到右派骨幹的百分之十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幹，則在所在單位點名批判，不要登報。」毛還具體指出：「報上點名的百分之十，應包括學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內。凡報上點名的必須證據充分，最好還有歷史劣跡、素來不大得人心的人。」此外，毛澤東又提出要把批判範圍擴大到學術方面和科學界：「哲學社會科學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學術方面的猖狂進攻，開始舉行反攻了。北京此種反攻應當擴大，各地應當響應。自然科學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學術方面的猖狂進攻，只要有準確的事實，也應當組織反擊。」[26]此後，不僅報上點名批判的範圍迅速擴大，右派人數也猛然增加。遼寧省十個市7月初揪出右派只有85人，指示下達後不到十天，「據不完全統計，已達553人」。省機關的右派分子也從4人增加到55人，還有147人「有較多右派言論」。[27]同時，反右派鬥爭的矛頭也迅速擴展到社會科學、新聞、教育、文藝、科技等社會各界。此時，運動已經全面進入高潮。

2 青島會議與批判溫情主義

根據各省市自治區整風領導辦公室的電話匯報，6月底到7月初，全國各地的反右運動陸續進入高潮。按照各地黨委的安排部署，除江蘇、雲南的運動可能延長到7月20日以後，其他多數地區（陝西、山西、湖北、湖南、天津、四川、河南、黑龍江等），都計劃在7月中旬結束或基本結束反右。[28]毛澤東7月8日在中蘇友好大廈向上海各界一千多人發表講話時也說，運動的發展比最初的估計延長了一些，「鬥爭還要個把月」，「7月是反右派緊張的一個月」，「右派還要挖，不能鬆勁，還是急風暴雨」。「到了8月，可以和風細雨了，因為沒有多少東西可挖了。」[29]這就是說，「急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到8月就可以結束了。然而，青島會議以後，「急風暴雨」非但沒有停下來，反而愈演愈烈，轉成了「七級颱風」。

就運動最初確定的反擊右派、孤立右派和使他們「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的目標而言，到7月中旬，反右鬥爭已經取得勝利。從6月8日至7月20日《文匯報》刊登的揭發批判大右派的文章，以10篇以上者排隊的情況是：章伯鈞（20）、羅隆基（19）、王造時（15）、陳仁炳（14）、徐鑄成（14）、楊兆龍（13）、浦熙修（11）、徐仲年（10）。[30]在此期間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也成反擊右派的群眾大會。這次會議的大會發言共有290篇，其中專門討論政府工作和各項建設的有40來篇，只佔大會發言總數的13.8%，其餘全部都是批判右派的。至於小組討論，幾乎就聽不到別的聲音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議事，「一直充滿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革命精神」，除了政府工作報告等幾個正式議程外，差不多成了一場從法律意義上說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政治批判。上有毛澤東的御批欽點，下有工農大眾的圍追堵截，再加上眾叛親離，在這一個多月轟轟烈烈的群眾批判運動中，除自殺者，大概沒有一個右派不「低頭認罪」的。在那些「大鯊魚」中，章伯鈞比較聰明，6月13日便第一個送上降表：「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的錯誤」。[31]章乃器也許是最後一個認輸的，直到7月9日才開始「承認錯誤」。[32]無論如何，到7月15日人大會議結束前，幾乎所有右派的頭面人物都被迫作了口頭或書面的自我檢討，如費孝通（向人民伏罪）、黃琪翔（請求人民的寬恕）、龍雲（思想檢討）、葉篤義（揭露羅隆基的本來面貌並檢討我自己的錯誤）、畢鳴岐（我是一個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儲安平（向人民投降）、章伯鈞（向人民低頭認罪）、羅隆基（我的初步交待）、章乃器（我的檢討）、黃紹竑（我的錯誤和罪行的檢討）、陳銘樞（自我檢討）、譚惕吾（我為甚麼犯了嚴重的錯誤）、張雲川（我恨自己是一個右派）、馬哲民（我要從新做人）、黃藥眠（我的檢討）等。針對這些檢討，7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反右派鬥爭的一次偉大勝利〉的社論。[33]那麼，是甚麼原因導致反

右運動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繼續蔓延和氾濫呢？這需要從中共中央的思考和群眾運動的特點兩方面來觀察。

青島會議是毛澤東決定召開的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目的是總結前一段反右鬥爭的經驗，部署下一步的運動。會議從7月17日開始，分兩個階段進行，到7月30日結束。前一階段中心是討論反右和整風問題，特別是17日和18日兩天的會議，所談內容大體指出了以後運動的目標、範圍、進度和策略。歸納毛澤東、鄧小平、彭真、陸定一、李維漢幾人的談話，其中主要的結果，第一是決定運動的範圍和規模都要擴大，以前主要在中央機關、民主黨派、大專院校，以後要擴展到各行各業。「黨、團、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工商聯、學校、文藝界、經濟事業機關、合作社都要整」。「工人、農民中不要提反右派的口號，但工廠、農村也是有右派的」。在學術方面，「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文藝學是重點，必須批判費孝通、馬寅初之流的中國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觀點」。「哲學、歷史學的鬥爭要慢慢來」。第二，運動的目標不只是打倒幾個大右派，關鍵是要把民主黨派、高等學校、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奪過來，如毛所說：「科學技術界、新聞、文藝、出版、體育衛生界，都有左中右，我們不佔領領導陣地，就搞不成社會主義。總之，要搞意識形態，要搞知識分子。」第三，今後運動分兩個方面，一是對右派分子還要深挖狠打，採取「剝筍政策」。毛說：「北京打出一千五，全國要打出十個北京來」，「這是新式肅反」。二是抓緊整風和改造思想，這是一個長期任務，以後要經常搞。第四，關於對右派的處理。毛澤東首先確定了性質：右派實際上就是反動派，不叫反動派，主要是為了分化敵人。對於右派的上層人物，要重新安排職務，比如章伯鈞，撤掉「五官」，只留一個政協常委。「經過反右派一定要換掉一大批」全國和各地的人大代表。其他人員，如毛所說，勞動改造、勞動教養可以擴大，利用這個辦法，清洗國家機器。除了少數知名人士外，把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反革命搞得厲害的地方，要鎮壓，肅反不徹底的，要殺一些人，少殺不是不殺，殺少數人是完全必要的。第五，運動的時間，包括整風大體再搞一年。[34]

第一階段會議期間，毛澤東還找了一些省市書記談話，然後歸納各次談話要點，寫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毛澤東很重視這篇文章，前後修改十一稿，原定發至地委一級，後改為印發「縣委及其他相當於縣委一級的黨組織和幹部閱讀」。[35]他曾說：「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確的。青島會議是個補充，沒有這個補充是不行的。」[36]如前所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經過毛澤東數次修改，到發表時已經從黨內整風的動員文件變成了反右運動的動員文件，不過，那畢竟是反右開始前幾個月的講話，怎麼修改也

無法把全部基調轉過來，況且反右已經開展月餘，毛澤東的思想又有了一些發展變化。所以，毛說的補充，當然是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中增加了他對反右問題的新認識。其中主要論點包括：

第一，強化了社會主義時期的敵我矛盾。「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這就把社會主義時期的敵我矛盾問題凸顯出來，他所論述的「總題目」也就變成了「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正確地處理敵我矛盾」。其結果，不僅為後來（八屆三中全會）改變八大政治路線確立了理論前提，而且把數十萬人（所謂右派）打入了政治地獄，把數百萬人（右派家屬及同情者）推向了社會的對立面。

第二，提出了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大概可以看作是他後來提出的「繼續革命」理論的初步表述。

第三，提出了性質不同的兩類整風。「民主黨派，教育界，新聞界，科技界，文藝界，衛生界，工商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各階層、手工業工人和其他城鄉勞動者，都應當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城鄉獨立勞動者），特別是富裕中農，也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基本隊伍，則是整頓作風的問題。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社會範疇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我們應分別對待」。把思想改造和整頓作風從性質上區別開，也就混淆了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的界線，又要「分別對待」，自然就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開放了綠燈。

最後，關於運動的部署，毛澤東提出，反右鬥爭雖然已經取得勝利，「但是還需要幾個月深入挖掘的時間，取得全勝，決不可以草率收兵」。此外，「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以後一年一次」。運動的方式：大辯論，這是「全民性的」；大字報，「除商店的門市部、農村（區鄉）、小學、軍隊的營和連隊以外，都可以用」。運動分為四個階段進行，即大鳴大放階段，反擊右派階段，着重整改階段和學習反省階段。

會議間隔期間，7月23日鄧小平召開了一次書記處會議，按照毛澤東這篇文章的思想和要求，對工作進行具體安排和部署：明確右派問題是「敵我性質」；強調「運動要展開，每單位各行各業要展開，農村、

工廠也搞，方法不同」；分別起草有關農村整風和工廠整風的指示；地、縣一級整風，首先批判右派，然後轉入以思想教育為主的整風；右派處理先不急，但要積極準備，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37]

根據青島會議的精神，7月26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上指出，現在看來，整風運動不能限於黨、團內部和中央、省兩級，必須普及，工農商學兵黨政七方面都要展開，揭露反社會主義言論，反擊右派，大家都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遲過不如早過。[38]8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提出的新任務有：深入揭發右派分子的鬥爭，一方面向地縣兩級（在城市是向區級和大工礦基層）展開，一方面必須在中央一級和省市自治區一級各單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考慮到右派分子將逐步增多的情況，對極右分子登報批判的比例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這一點必須堅持，不要猶豫。」同時，對於「黨內團內右派分子，只要是同黨外團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必須一視同仁，一律批判。該登報的，即應登報」。[39]在上層繼續深入挖掘的同時，把鬥爭擴大到基層和黨內，這就是青島會議對反右運動提出的新任務。而完成新任務的前提，就是批判和克服「溫情主義」。

「溫情主義」這個概念是中共中央6月29日的指示提出來的，[40]青島會議以後一段時間（大約兩個月），批判和克服溫情主義成為反右運動中最流行的口號。這個問題首先是針對有很多人，甚至包括部分黨內幹部同情或贊同右派言論而提出的。從反右運動一開始，這種情況就不斷地反映上來。

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就是一個典型，他認為通過鳴放把右派引出來再批判的做法不可取，只要黨的作風改變了，就沒有右派出來鬧事了。雖經廈門市委第一書記張維茲、福建省委書記伍洪祥和省委第一書記葉飛親自談話，仍然「同情右派」，對運動「不積極，不熱忱」。6月11日九三學社南京分社召開座談會，與會者三十多人，基本上都不贊同最近《人民日報》三篇社論的觀點，認為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說法有毛病，但也有道理。陳銘樞的發言有片面的，但也有對的地方，用意也是好的。甚至在運動開展十幾天後，在北京各高校（人民大學除外），大部分師生還對反擊右派表現出「不感興趣和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有人說「反擊右派是小題大做」，「搞得太過火了」，「整風本來是整共產黨，現在整到民主黨派頭上了」。還有人說：「共產黨真不講信用，原來是言者無罪，現在是言者有罪了，本來無足輕重，但偏要大驚小怪。」普遍認為共產黨沒有「政治風度」。[41]

到青島會議前，這種情緒和看法開始在黨內有所反映。6月下旬各地給中央的電話匯報可以表明這些情況。湖北省委提出兩個看法：一、右派問題是思想問題，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應與反革命分子分開（這個解釋由各級領導內部掌握）。二、不要把有反動言論的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的學生劃成右派。甘肅省委說，黨內的問題「主要是對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認識不夠」，有的為右派打掩護，有的認為「我們發動人家批評我們，現在人家起來了，我們又進行報復」。河北省「許多幹部對反右派的鬥爭有抵觸情緒，有的說整風未完又肅反了，有的說還沒有改進工作，就又進行反批評了」。在湖南省，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存在着嚴重的右傾思想」，如認為反擊右派不符合「言者無罪」的精神，是「自打嘴巴」；儲安平只說了個「黨天下」就整人家，「是否對民主黨派要求太高了」。中央高級黨校6月29日向中央報告：「普通班、短訓班都有個別同志認為章伯鈞、儲安平只說了一兩句話就批評，似乎有些過份，副總理分一個給民主人士當也未嘗不可。」[42]中共上海市委6月底報告，一些幹部「對某些右派言論表示同情」，如說儲安平的談話是有根據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葛佩琦的發言也「有可取之處，只不過在情緒上有點激昂」；孫大雨只是「思想彆扭，對黨不滿」，不應視為右派。還有人為陳仁炳、王造時、章乃器辯護。不少黨團員對《人民日報》等發表的社論和批判文章有看法，認為「正面文章多，反面意見少」，顯得「氣魄不夠大」。對葛佩琦的批評「斷章取義」，對孫大雨的發言使用的標題「太刺眼」。[43]

針對這種情況，7月7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新華日報》的一篇社論〈反擊右派不能溫情主義〉。社論提出，溫情主義的主要根源就是「對反右派鬥爭的性質和嚴重性估計不足」；反右鬥爭「屬於階級鬥爭範圍」，對於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陰謀必須「打死」。7月8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鬥爭正在開始深入〉，嚴厲批評抱有溫情主義傾向的人。青島會議期間，全國各地便響起一片批判溫情主義的呼聲。[44]會後各省市立即貫徹了這一精神。如雲南省委召開幹部會指出，運動「目前主要地是反對溫情主義」，要「反覆向黨內外強調要把鬥爭堅決到底」。[45]天津市委傳達鄧小平的報告後，要求各單位進行一次批判溫情主義的檢查，從而使「運動前進了一步」。安徽省各地、市直屬機關組織各單位「學習有關文件，聯繫實際，克服溫情主義，發動群眾進一步揭發」右派分子。民主黨派也跟得很緊。民盟天津市委會7月28日召開擴大會議，宣布成立整風領導小組，制定出行動計劃，並開始對盟內右派分子王大川展開鬥爭，「這種情況表明天津民盟領導層開始改變在反右派鬥爭中一度表現的優柔寡斷、溫情主義、按兵不動的右傾傾向」。[46]

青島會議的精神傳達下來，在批判和克服溫情主義的呼喊中，各地紛紛重新部署鬥爭，發現的右派分子也愈來愈多。截至8月10日前後，安徽省各地、市直屬機關參加整風的552單位中，幾乎有一半未發現右派分子。對此，省委已決心「克服溫情主義」，「整理和認真地分析放鳴中的小組記錄和大字報，作進一步的發掘」。江西省最初挖出的右派分子只佔參加運動總人數的1.1%，針對這一情況，省委要求各單位注意：按照中央的指示，「要使鬥爭普遍地深入下去」，不得輕易轉入整風；即使轉入整風，還「應注意繼續挖掘漏網的右派分子」。[47]遼寧省7月初統計時，僅85人，7月中旬就達500多人，到8月2日統計，全省已發現37個反黨小集團、1035個右派分子，其中極右分子155人。而且，「目前各地正在繼續深入追挖中」。[48]北京更厲害，到8月7日，全市發現右派分子7511人，其中極右分子1257人，在不同範圍受到重點批判的，就有3529人。這還不夠，市委在報告中表示，這只是高等學校、文藝界、新聞界、工商界上層和少數機關的情況，「其他方面都不充分，需要繼續擴大和深入」[49]河南省自8月初傳達貫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以後，「反擊右派的鬥爭出現了新的高潮」。截止9月初，全省已挖出右派分子2271人（7月下旬為925人），右派小集團151個（7月下旬41個），黨、團員右派分子596人（7月底229人）。[50]就連偏遠的雲南省也不甘落後。省委報告，僅昆明和個舊兩市，6月底揪出右派356人，至8月10日已增加到676人。「這幾天鬥爭很緊張，右派分子的數目不斷增加」。[51]

在此期間，反右運動已經深入到黨內。據中共中央1957年9月2日的一個指示，到這時已經發現黨內「右派分子」約三千餘人。中共中央認為，「從黨內發現出這些右派分子，是這次反右派鬥爭的很大成績」。同時指出對黨內右派分子的鬥爭存在着比較嚴重的「溫情主義」，往往是「姑息遷就」，對一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是「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還特別說到，「黨內右派分子有着『共產黨員』的招牌，有較多的政治資本，因而也就容易欺騙、蒙蔽和影響群眾。同時，他們又和黨外的右派分子相呼應，相配合，從堡壘內部向黨進攻，因而對黨的危害就更加嚴重。這種黨內右派分子，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的危害就愈大」，因此要求決不能對黨內右派「有所寬容」，「決不應該漏掉真正的黨內右派」。[52]9月11日，《人民日報》又專門發表了社論〈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從此，反對黨內右派分子的鬥爭加大了力度。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高層幹部因其「右派錯誤」、「地方主義錯誤」或「民族主義錯誤」，被劃作「右派分子」、「反黨分子」，甚至被打成「右派集團」、「反黨集團」。[53]

鬥爭的持續深入，上靠領導指揮，下靠發動群眾，這是中共進行一

般政治運動的經驗，反右鬥爭自然也不例外。

3 群眾反右鬥爭面面觀

群眾運動的最大特點就是對其結果的不可知性，反右鬥爭的擴大化，特別是在鬥爭方法和手段方面出現的種種問題，固然同中央要求克服溫情主義的指導思想有直接關係，但與鬥爭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本身也是分不開的。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一個通知指出，「此次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場鬥爭中，「必須反對草率收兵，也必須防止採取一些簡單的不適當的鬥爭辦法」。[54]

其實，還在青島會議之前，各地鬥爭簡單化和擴大化的現象就已經出現，並報告中央。如黑龍江省委7月9日電話匯報，運動中「方法粗暴簡單，不能以理服人」，批判右派時「講不出道理」，只是「喊口號、扣帽子」。[55]中共重慶市委報告，運動中「群眾情緒急躁，接連發生毆打、侮辱鬥爭對象的事件」，「鬥爭方式簡單粗暴，論據不足，駁不倒對方」的現象，「鬥爭方式的簡單化最為普遍」。[56]中共上海市委也報告：「鬥爭方法上，已有不同程度的粗暴苗頭。如外語學校已發生四起自殺、逃跑事件，復旦也是大會較多，喊口號，不許右派分子坐下，不許抽煙等等。」[57]在7月11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也曾談到在運動中「發生了簡單粗暴情況」和「把右派擴大化」的趨勢，並要求給各地打招呼。[58]

7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專門發出了一個〈關於反右派鬥爭中不斷發生簡單粗暴現象的通報〉，指出這樣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根本不合乎我們反擊右派的政策」。[59]在中共中央下達的文件中，更屢屢指出要謹慎從事，實事求是，防止簡單輕率的做法。毛澤東在8月1日的指示中還提醒下面：「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地勉強去找右派。」「要準確地鑑定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以免氾濫無歸，陷入被動，喪失同情。」還說：「反右鬥爭，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毛甚至想到「地縣兩級、城市區級及工廠基層的領導人經驗較少，有些人鑑別水平不高」，所以要求上級對他們「必須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準」。[60]但是，群眾運動的特點就是混亂、過激、各行其是、雜亂無章。再加上「革命」二字，就更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了。同以往歷次運動一樣，反右運動所造成的後果未必就是毛澤東原來設想的那樣，但是他所使用的群眾鬥爭的方法就必然導致如此的結果。反右運動中出現的種種批判方式和鬥爭手段，既是

對以前鎮反、「三反」、「五反」和肅反的總結，也是為後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供的「經驗」。

召開鬥爭大會和群眾集會

召開群眾鬥爭大會是中共在歷次運動中最常使用的方法，其聲勢大，威力猛，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北京市委報告，對於一些「有理論、有群眾」的右派代表人物，就必須「長期作戰，攻勢要猛，聲勢要大，鬥爭要狠，要抓住不放，窮追到底，一直把他們攻垮」。如清華大學錢偉長在運動初期滿不在乎，6月19日「還洋洋得意地在自由論壇上講話」。於是，學校組織了各種會議對他連續發動進攻，特別是召開了兩次萬人批判大會，「才把他打敗」。對人民大學的林希翎的鬥爭也是依靠群眾大會的威懾。在「初戰失利」後，學校進行了「充分準備」，甚至經過「預演」，才召開幾千人參加的鬥爭會。林希翎能言善辯，積極分子的發言不斷被她駁倒，主持人只得不斷領着群眾高呼口號。這樣「連續打了三個回合，才把她徹底攻垮」。[61]

運動中還經常召開各界人士或工農群眾集會，以造批判聲勢。如6月14日成都五千名積極分子集會，「號召全市工人團結在黨的周圍，堅決擊退右派分子的進攻」。6月23日長春召開萬名工人大會，批判章伯鈞和章乃器，鞍山組織了12000名職工集會，「痛斥龍雲反蘇的謬論」。此外，保定市也於6月26日召開了萬名工人反右大會，石家莊市在28日由市總工會和廣播電台聯合舉辦了有一萬多工人參加的反右廣播大會。[62]7月1日，為批判廣東省資產階級右派代表人物羅翼群，在他的家鄉興寧縣有五萬群眾（其中農民三萬人）進行集會和示威遊行，「當面痛斥羅翼群下鄉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的罪惡行為」。大會還通過了「興寧縣各界人民控訴聲討右派分子羅翼群」的電文。7月5日，哈爾濱市三萬多工人集會駁斥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還有十幾萬工人收聽了會場的實況廣播。[63]所謂人多勢眾，如此才能體現群眾運動的威力。

進行「逼、供、信」

在群眾鬥爭中，採取各種各樣「逼供信」的粗暴手段是很平常、很常見的事情，即使在國家機關、大專院校和文化藝術等「高雅」單位，也不乏其例。河南就很典型，在省教育廳、水利廳、手工業管理局、工會和鄭州師專等單位，在鬥爭右派分子時，大家「情緒高漲，鬥志旺盛」，批判右派時拍桌子、打板凳、呼口號，還要讓右派分子起立低頭。新鄉地委對右派分子採取「站崗、放哨」等手段，為便於監視，甚至提出右派分子集中居住的辦法。洛陽專署鬥爭右派時，在小組會上就「動手動腳，拉來拉去」，還有人把大字報貼到被批對象身上。信陽地

委直屬機關對右派分子採取疲勞戰術，整夜鬥爭，不讓休息。焦作市有些單位則將「大字報貼在右派分子的宿舍、門口、牆上、蚊帳上、辦公桌上」，甚至在右派分子上街時，「偷偷地在他背上貼條子，以醜化他」。在這方面，安徽省採取的辦法是「分配對象，分工包幹」，即對每個右派都組成一個三至四的「戰鬥小組」，步步跟隨，每日緊逼。[64]重慶市反右鬥爭深入後，不少單位「不許右派分子保留意見，甚麼都硬逼着要他們承認」，遇到「頂牛」就交給群眾，「沿襲鬥地主、惡霸的老辦法」，「接連發生毆打、侮辱鬥爭對象的事件」。[65]

一旦群眾認定的事情，就是追到天邊也要讓你承認。南京師範學院副院長高覺敷在九三學社南京分社的整風會上，經過了大小九次檢查，最後不得不承認他曾組織小集團向黨進攻，其目的「就是想要在高等院校中製造出一個『匈牙利事件』來，恢復資本主義」。[66]江蘇省農工民主黨成員武思光三年來在報刊發表「歌頌黨和社會主義的詩文」四十多篇，只因在省統戰部座談會上對基層黨員中存在宗派主義提出批評，又與章伯鈞等人有舊，便被打成極右分子。批判時逼他交代、認罪，「或無中生有，或畫蛇添足，或捕風捉影，或張冠李戴，雞毛蒜皮之類，都成滔天之罪」。雖經多次交代，仍無法過關。後來在農工黨內的整風會上，他又「提高認識」，進行了一次徹底交代，把「過去所有一切錯誤言行，主動地回憶出來，來一個總清算。其中有不少意見自覺尚無大錯的，也從責己嚴的角度出發，一律加以檢查批判」。結果還是不行，因為檢查「錯誤言行」時，不許說自己動機是好的，只能承認自已從內心就是反黨的。[67]

發動工農大眾參戰

批判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主力軍不在知識界，而在工人和農民中間，對這一點，中共幹部是非常清楚的。反右運動一開始，《人民日報》就發表了社論〈工人說話了〉：「這兩天，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鞍山等地的許多職工紛紛舉行座談會，憤怒地譴責極少數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社論還說：廣大的工人群眾看出來，「在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有一股歪風，這股歪風是向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挑戰的」，因此，「覺悟的工人群眾不能不起而應戰了」。與此相配合，上海工人站出來批判針對盧郁文的匿名信，天津工人則紛紛起來駁斥葛佩琦、儲安平，北京工人質問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代表，瀋陽和鞍山的工人批駁「黨天下」的說法是「扯淡」。[68]武漢郊區群力農業社農民6月10日舉行座談會，談到有人要共產黨「下台」的問題時，社員們憤慨地質問究竟是誰想要偷偷摸摸地「上台」呢？還說：「我們農民決不會容忍任何剝削分子興風作浪、再來統治我們。」河北省青縣塔豐

農業生產合作社八百多農民給《人民日報》來信說，聽到葛佩琦的發言，「社員們大嚷起來，說：『這哪裏是幫助共產黨提意見整風，這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69]

群眾鬥爭的方式各種各樣。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江西省進賢縣鍾陵鄉一批農民給儲安平的公開信，批判他「仇恨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企圖挑撥群眾起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農民說：「從你的發言裏，我們感到你的確是很反動的，我們對你這種行為表示憤怒。」江西省安福縣楓田鄉的社員6月24日晚集會，「駁斥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謬論」，並揭發和批判了羅隆基在「家鄉的反動言行」。[70]對葛佩琦則採取了群眾座談的方式。6月12日，幾位第四建築工程公司職工和北京市民來到人民大學，要求訪問葛佩琦並與之座談。座談會一直開到傍晚，對於葛佩琦所做的解釋，群眾代表不滿意，便說：我們這次來訪就是要弄清是非，「如果今天談不清楚，可以再談一天、二天甚至半個月、一個月，總之要給我們滿意的答覆」。還表示，「必要時可以找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代表，山西、河北的農民來和你辯論」，所有路費都要葛佩琦負責。[71]

工農群眾參與鬥爭之所以比較「有效」，不僅在於人多勢眾，而且往往帶有強制性。如湖北地區中小學反右運動就採取了「借兵」的方式，因為右派教師能說會道，「極為猖狂」，各地黨委就「注意運用工農群眾的力量」，請大批農民參加教師的整風反右，以致「發生多起農民和鄉、社幹部毆打、體罰右派教師事件」。[72]在洛陽市的反右鬥爭會上，「工人群眾自發地」質問和圍攻右派分子，幾百人圍着被鬥對象，搖小旗、呼口號，還不時「發生諷刺漫罵、人身攻擊的現象」。河南省中醫院在鬥爭右派分子周某時，不讓他講話，還有工人在氣憤之下打了他的耳光，會後又通知他參加第二天鄭州市召開的工人大會，受到侮辱和驚嚇的周某當晚服毒自殺。[73]

追究歷史舊賬

這曾是毛澤東親自倡導並非常欣賞的手段。早在6月25日《人民日報》就通過農民來信，揭露儲安平1952年參加土改時對群眾態度惡劣，鬥地主時「縮頭縮尾」。7月3日又刊登文章說，「儲安平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右派」。[74]7月11日上海市委在電話中匯報，為了使反右運動深入下去，決定把「了解右派分子情況的人組織起來」，從「揭發右派分子的歷史罪行或劣跡以至其理論觀點」入手，「進行系統地批判」。中共中央立即轉發全國，認為「很有參考價值」。[75]這個方法被用到幾乎所有民主黨派中有頭有臉的右派身上，列出的歷史舊賬各式各樣，名目繁多。如羅隆基「一貫親美崇蔣仇共」；在土改時「包庇地主」、

「仇恨農民」；還在「三反」時「包庇貪污分子」。章乃器在土改時「袒護地主」。陳銘樞「一貫擁蔣，不得已時接近進步勢力，也是假心假意的」，「一時靠攏胡漢民，一時靠攏蔣介石，一時靠攏汪精衛」，還在1953年為梁漱溟的錯誤言論辯護。張雲川1955年以全國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安徽視察時，「辱罵基層幹部和積極分子」（因為他們「捆綁吊打群眾」），對地主惡霸「受人民管制的苦情表示同情」（給三個人每人加五元錢）。黃紹竑在大革命時期屠殺革命人士，抗日戰爭時期殺害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溫州市委書記張貴卿。[76]

對南開大學教授雷海宗的鬥爭是一個典型例子。對於雷講的馬克思主義停滯了六十年的觀點，起初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認為「只是學術思想問題」，「不能當右派鬥爭」，甚至一些左派人士也先後給學校領導和市委教育部打電話，提出意見。後來市委就着重從歷史問題入手，揭露雷解放前後的反動言行，說明他「不僅學術思想反動，而且一貫忠實於蔣匪統治，仇視蘇聯，反共反人民，終於把這個反動學者的醜惡面目完全剝露出來」。[77]被追究（整風前）歷史舊賬最多的是監察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王翰，部整風領導小組專門為他辦了一個反黨罪證展覽，展出材料八十餘件。[78]

親朋好友的「背叛」

發動群眾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讓被鬥爭者的親朋好友站出來進行揭發、批判，這是攻破敵人心理防線最奏效的手段。在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夫妻、兄弟、父子之間，同學、朋友之間，以及其他親近人之間，出現的人情悲劇（當然首先是政治悲劇）屢見不鮮，反右運動也不例外。曾被毛澤東點名的上海《新聞日報》副總編輯陸詒比較幸運，儘管市委宣傳部希望徐鑄成揭批陸，以「立功贖罪」，但遭到「斷然拒絕」。結果徐本人就沒有逃過劫難。[79]新華社記者戴煌就慘了，在他受到大字報圍攻時，妻子竟也貼出一張大字報，說他要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這不啻火上澆油，使戴煌落入有口難辯的絕境。[80]一般人尚且如此，那些地位高、名聲大的右派陣營主將，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就更逃不過這一關了。

章乃器在6月9日統戰部座談會上提交了一篇書面發言，其中有一段是反駁民建中央委員吳大琨的。吳在6月5日發言指出，章的〈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有六個原則性問題，並一一進行了批駁。章乃器特別氣憤的是，吳歪曲了他在文章談到「抽筋剝皮」時的原意，認為「這不是睜開眼睛撒謊，便是健忘」。[81]其實，章乃器的惱怒不僅是因為吳的「作風不正派」，還因為吳曾得到他的幫助和提攜。章乃器對此耿耿於懷，很久以後碰到吳，還吟詩相贈：「名裂身未敗，家破人不

亡。鋼筋鐵骨在，冷眼對豺狼。」「文革」後章已作古，吳主動提出給他平反，大概也是對年輕時的作為感到懊悔。[82]

史良與章伯鈞同為民盟副主席，不僅工作配合默契，且私交甚篤，民盟中央近人皆知。反右進入高潮時，在6月14日民盟中央小組會議上，史良作長篇發言，其中一段把矛頭直指章伯鈞。不但對章的言論提出嚴厲批評，還揭發了章私下對她講的話，如說盧郁文是小丑，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史良的講話可能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但確給章伯鈞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和情感傷害。事後章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83]揭發章伯鈞的還有他相交三十年的舊友王襄。6月15日，王來京出差期間，受邀到章伯鈞家吃飯。心情苦悶的章伯鈞向多年未見的老友發了一通牢騷，講了許多心裏話。結果第二天王襄就給《人民日報》社打電話，反映了他「與章伯鈞的一席話」的內幕，還要求在報上公開發表。王最後說，他這次揭露章伯鈞的秘密，是為了「表示向黨靠攏」。[84]

最悲慘的是羅隆基，在揭發和批判他的人中有三位是他終身難忘的。第一個是趙文璧，羅隆基對趙頗為信任，專門把他從上海調到北京，安排在森林工業部。在民盟中央第六次擴大整風座談會，趙站出檢舉揭發羅隆基，內容分七大類，共五十二條。一類是羅隆基的近期反動言論，如：「胡風問題搞錯了，得罪了三百萬知識分子，使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社會主義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競爭」；「黨員水平低，是造成經濟建設上特別是基本建設上的損失的主要原因」。一類是羅隆基在森工部的反黨行為，如當部長第一天便講：「在行政單位，是以政為首的，不是以黨為中心的，黨必須服從政」。再一類是關於「無形組織」繼續往來的記錄，均有文字為憑。還有一類是有關羅隆基的個人品質問題，等等。發言後，趙還交出了一批羅以前給他的信件。羅隆基對趙文璧的發言，可謂印象深刻。在幾年後，他對章伯鈞談起反右批判會的情形，總說：「我自己說的話，常常忘了，而有人記性好，多少年的事兒，說出來的時間、地點和當事人，沒半點含糊。」第二個人是民盟主席張瀾的秘書呂光光。羅隆基與張瀾的關係一向不錯，在1947年冬國民黨取締民盟時兩人就有患難之交，後又共同接受中共邀請進入解放區。張瀾患有口吃症，所以對外聯繫和應酬都十分倚重羅隆基。了解到這樣一個歷史情況，在批判羅隆基時，民盟整風領導小組和統戰部便安排張瀾的秘書呂光光出場。而呂的發言，也正是控訴羅隆基「為了實現反共陰謀和政治野心，一貫要挾、劫持、陷害、辱罵張主席的罪行」。控訴之前，呂還特別聲明：「別以為張主席死無對證了」，「作為張主席生前的秘書，有責任就張主席生前告訴過我的事實」，進

行揭發。最令羅隆基傷心的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毛澤東曾在報上點名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構成了「民盟右派系統」。[85]浦與羅不僅是工作關係，她還是與羅「同居」十載的女友。浦熙修在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風會的發言題目就與眾不同——〈羅隆基是隻披着羊皮的狼〉。她的揭發，從羅的家世說到生活和工作，以至兩人的關係，件件往事，無不戳人心肺。整個發言簡直就是一篇絕情宣言，最後一句話是：「讓這所謂的親密的朋友關係丟進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後羅隆基傷感地對人說：「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牀笫之語，也當作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她在新聞界的批鬥會上揭發我的事情，可以講，是條條致命呀！」[86]

在反右運動中，鬥爭方法可謂五花八門，以上列舉種種，只是筆者在史料中所見比較普遍者，其他還有一些，如發動群眾揭發右派分子的個人隱私[87]，各地呈報右派數字相互攀比[88]等等。實際情況表明，無論領導人如何英明指導，只要是群眾運動，總歸會形成混亂局面，鬥爭出現簡單化和擴大化的趨勢也是難以避免的，何況指導思想本身就存在問題。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2003），頁705。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1994），頁284—286。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1992），頁502—504。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475—476。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69—475。

[6]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大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155—15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06。

[7]《建國以來毛澤束文稿》，第六冊，頁508—510。

[8]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观論著作的誕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形成過程〉（以下簡稱〈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頁29—30。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15。6月16日《四川日報》刊登了這一發言。6月18日《人民日報》轉載時略有刪節。

[10]逄先知、李捷：〈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页30。

[11]毛澤東還特別重視此文發表在國外的影響，與以往的做法不同，這篇講話發表前，外交部就把全文交給蘇聯大使館。使館人員花費五個小時用直通電話唸給國內聽，於是《真理報》與《人民日報》在同一天刊登了這個講話。參見蘇聯駐華參贊阿布拉西莫夫談話紀要，1956年6月2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90-23，頁125。

[12]施肇域：〈《關於正確處现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重要理論觀點的修改始末〉，《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頁64。

[13]陝西省檔案館，123-43-22，頁78—81。

[14]《內部參考》，1957年6月22日，頁7—10。蘇聯人的感受從相反的角度說明了同一個問題。蘇聯認為，「文章的發表澄清了許多問題，這是很好的」。過去傳說在這篇講話裏不提階級鬥爭了，現在文章指明了階級鬥爭，我們同意毛主席修正了的文章」。參見蘇聯駐華參贊阿布拉西莫夫談話紀要，1956年6月2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90-23，頁125—126。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19—520。

[16]《人民日報》，1957年6月8—15日。

[17]雲南省檔案館，2-1-2736，頁60—62。

[18]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黨史资料出版社，1986），頁838—839。

[19]雲南省檔案館，2-1-2736，頁71—75。後來在公開場合，毛澤東的說法是：「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但「並不準備把他們拋到黃浦江裏頭去」。因為這些大知識分子「是有用的」。參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55。

[2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28。

[21]以下關於社論的引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手稿》，第六冊，頁529—534。

[22]章詒和說：「章羅關係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參見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271—274。

[23]南京《新華日報》跟得很緊，於7月6日發表社論，題目就是〈反擊右派不能溫情主義〉。第二天，《人民日報》立即予以摘要轉載。

[24]〈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統戰部「關於在民主黨派內部進行反擊右派分子的鬥爭中的意見」的報告〉，1957年7月4日。

[25]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7月2日。

[26]陝西省檔案館，123-43-1，頁56—5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37），發表這個通知時，在題目中略去了「對科學家中的右派分子組織反擊」的字樣。

[27]中共中央辦公廳編印：《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八），1957年7月26日。從6月30日開始，中共中央辦公廳開始編印《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到12月23日發出第43期，每隔4至5天一期，內容包括各地區、各部門有關反右運動的各種情況和問題，以及各省市自治區整風領導辦公室幾乎逐日向中央辦公廳所作的電話匯報。可以說，毛澤東對全國運動的情況是瞭如指掌，中央的文件和指示也正是根據這些匯報制定的。以下所引《匯編》資料均存陝西省檔案館123-43-466-471，不再單註館藏號。

[28]見雲南省檔案館，2-1-2745，頁11—12：《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二）、（四）、（五）。

[29]毛澤東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7月8日。關於這個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40—455）全文發表（文字與記錄稿基本相同）時，注明是7月9日在上海幹部會議的講話。說「幹部會議」沒甚麼錯，因為各界人士中主要都是幹部，但時間肯定錯了。據林克日記記載，這個講話是在7月8日晚。〔林克：《林克日記》（手稿），未刊，頁46。〕《毛澤東傳（1949—1976）》（頁712—713）也說是7月8日。

[30]上海市檔案館，G20-1-134，頁9。

[31]《人民日報》，1957年6月14日。

[32]《人民日報》，1957年7月10日。

[33]詳見《人民日報》，1957年7月14日—18日。

[34]青島會議發言（記錄稿），1957年7月17—20日。

[3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43—553。以下引文不再出註。

[36]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組長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10月7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頁714。這裏說該文是8月3日印發的，但按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页553）的說法，8月1日該文印發後，毛澤東確實又作了少許修改，不過修改稿未再下發。

[37]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第38次）記錄，1957年7月23日。

[38]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四卷，1991（未刊），頁249。

[3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56—557。

[40]雲南省檔案館，2-1-2736，頁71—75。

[41]《內部參考》，1957年6月13日，頁29—30；6月15日，頁8—14；6月22日，頁7—10。

[42]《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一）、（三）。

[43]上海市檔案館，A77-2-404，頁30—33。

[44]參見《人民日報》，1957年7月23—31日。

[45]雲南省檔案館，2-1-2743，頁72—77。

[46]《內部參考》，1957年7月27日，頁4—6；9月5日，頁9—19；7月30日，頁16—18。

[47]《內部參考》，1957年9月5日，頁9—19、3—9。

[48]《內部參考》，1957年8月6日，頁7—9。

[49]雲南省檔案館2-1-2751，頁28—32。

[50]《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二十二）

[51]雲南省檔案館，2-1-2743，頁91—94。

[52]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272—273。

[53]這一鬥爭到1958年更為發展。

[54]雲南省檔案館，2-1-2736，頁113—115。

[55]《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五）。

[56]《內部參考》，1957年7月15日，頁8—9。

[57]雲南省檔案館，2-1-2751，頁24—27。

[58]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第37次）記錄，1957年7月11日。

[59]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351—352。

[6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56—557。

[61]陝西省檔案館，123-43-10，頁48—65；李新：〈反右親歷記〉，載蕭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國編譯出版社，1998），頁23。

[62]《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三）。

[63]《人民日報》，1957年6月16日、24日，7月4日、8日。

[64]《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四）、（六）。

[65]《內部參考》，1957年7月15日，頁8—9。

[66]《人民日報》，1957年8月8日。

[67]《內部參考》，1957年11月14日，頁11—13。

[68]《人民日報》，1957年7月10日。

[69]《人民日報》，1957年6月11日、20日。

[70]《人民日報》，1957年6月18日、7月1日。

[71]《內部參考》，1957年6月13日，頁12—16。

[72]《內部參考》，1958年2月4日，頁3—5。

[73]《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六）。

[74]《人民日報》，1957年6月25日、7月3日。

[75]雲南省檔案館，2-1-2751，頁24—27。

[76]《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6日、8日、9日、18日、21日，8月8日、9日。

[77]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7，頁5—10。

[78]《內部參考》，1957年12月11日，頁8—17。

[79]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410。

[80]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頁60。

[81]《人民日報》，1957年6月6日、10日。毛澤東後來在談到右派抵制改造時曾引吳言為據說：「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參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89。

[82]章立凡：〈風雨沉舟記〉，《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頁52、56。

[83]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7、13—20。史良發言全文見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

[84]《內部參考》，1957年6月25日，頁5—7。

[8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5。

[86]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頁281—284、301—302。趙文璧、呂光光、浦熙修的發言參見《人民日報》，1957年8月11日、13日。

[87]中共中央在一個通知中專門講到：有些地方在運動中採用了「追究右派分子的齷齪的私人生活」的辦法。「這樣從私人生活方面來搞臭一個右派分子，的確也是容易的。但是這樣做法，也妨礙了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更加深入的鬥爭，把群眾的注意力轉移到私人生活方面去。」參見雲南省檔案館，2-1-2736，頁113—115。

[88]原來上海市在報上點名批判的右派分子有30人，接到毛澤東7月9日的指示後，聽說北京已經不是400人，而是800人，市委立即報告中央，「按上海的情況來看」，這個數字「太少了一些」，決定也增加一倍，「現在擬再點名30人，這30人擬分兩批登報，每批15人」。同時，還有「在各單位進行批判的右派分子，全市共約700人」。參見雲南省檔案館，2-1-2751，頁24—27。

二 在反右旗幟下開展的全民整風運動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反右鬥爭取得勝利的單位，隨即轉入整風和改進工作階段。還規定縣以下基層單位，特別是在工廠和農村，重點是整風，不搞反右運動。從原則上講，反右主要是政治問題，要解決的是敵我矛盾，採取方式是「急風暴雨」；整風主要是思想問題，要解決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採取方式是「和風細雨」。然而，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後在全國範圍開始的整風運動，是在反右派鬥爭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反右派鬥爭的旗幟下展開的，反右運動與整風運動交織在一起，實際上並沒有停息，反而更加深入，更加激烈。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全國數十萬右派分子，在反右階段被定性的不到三成，而七成以上的人是在整改階段，即在全民整風運動中，戴上了那頂毀滅其一生的政治帽子。

1 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任務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除中央委員外，中央各部委、省市區黨委主要負責人以及各地委書記和直轄市區委書記也列席會議。所以，這是一次擴大會議（或稱「三級會議」），與會者達426人。儘管會議的大部分時間是討論農業發展綱要和改進管理體制問題，但正如毛澤東會前所說，這次會議「整風是一個綱」。[1]

鄧小平9月23日在會上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是了解反右運動，特別是中共中央對此問題認識的極重要文件。[2]報告對整風反右運動進行了全面總結，並提出了下一步任務，共談了八個問題。鄧小平一開始就指出，「從今年5月開始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現在正擴大為全民的整風運動」。關於運動的一般情況，鄧說，反右鬥爭「已經得到顯著的成效」，即全國第一批參加運動的省市以上機關（包括一些省市的地專機關）、學校、民主黨派共309.1萬人，被揭露出來的右派分子共62460人，佔全體參加運動人數的2.02%。[3]「運動還要進一步深入和展開，不能草率收兵」。不過，凡是在反右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單位，應該及時轉入以整改為主的第三階段。

鄧小平說，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是這次反右派鬥爭的主要範圍」，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知識分子，是現在可以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他們還有政治地位、政治資本和政治影響，而無產階級也需要他們的知識。所以，「右派分子

活動的主要場所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目前，省市以上機關的鬥爭「一般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高等學校反右鬥爭已「基本上勝利結束」，「教育界的主要戰場現在正移向中小學」。在新聞界，黨外主要右派分子已鬥倒。各地新聞單位都在「清查內部的右派」。在科學界、文藝界、在工程技術界、衛生界，「鬥爭也有很大收穫」。各民主黨派的鬥爭也已經取得很大勝利。各民主黨派中央最近都開過全國整風工作會議，應該幫助他們在繼續深入進行中央和省市的鬥爭的同時，把鬥爭積極地、有步驟地「深入到一切基層去」，然後轉入一般整風。通過反右派和整風，根本改變各黨派中央和地方組織的政治面貌，使左派和中左分子切實掌握領導權，右派分子在各黨派內要準備清洗一批，撤掉一批，但有些仍要保留。對知識分子中的右派，總的原則是給出路，「凡是確已悔改的，或是確有真才實學的，仍要使用」。但對社會科學界和自然科學界要分別處理，「對前者要嚴些，後者要寬些」。

對於「正在全國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鄧小平強調，運動的方法「同樣必須是大鳴大放大爭」。同時在運動中，要堅持只動口、不動手的原則，防止和糾正簡單粗暴的做法。在工廠，「有必要在整風中對工人群眾進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一步清查壞人，純潔工人階級隊伍」。在職工中實行大鳴大放，要充分運用大字報的形式。在工人中不提反右派鬥爭的口號，也不戴右派帽子。對於少數民族，只在已經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的地區和人口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並「適當地進行反右派鬥爭」。在軍隊方面，經過反右鬥爭後，應「集中力量進行內部整風，並以幹部為重點」。關於黨團組織，截至9月上旬，共揭發出黨內右派分子5800餘人，團內右派分子14000餘人，分別佔參加運動的黨團員總數的0.58%和1.65%。對這些人「必須同對待黨外右派分子一樣」，黨員一般應開除黨籍，對團員可以鬆一些，更着重於教育。

最後講到改進工作問題，鄧小平承認，「從運動中暴露出的問題，比我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不堅決地改正這些錯誤和缺點，是很危險的」。「反右派鬥爭是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掃清道路的，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用反右派鬥爭來阻塞人民內部的言路，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為了教育廣大群眾，特別是為了解除中間分子的顧慮，反右派鬥爭本身也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說道理、擺事實、以理服人的原則，防止簡單粗暴，竭力避免誇大和片面性；對於中間分子和工人農民的錯誤觀點，要採取耐心說服教育的方法；對於學術上的爭論，尤其要反對輕率和武斷。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也要恰當。必須使反右派鬥爭的結果，有利於而不是不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貫徹執行」。總之，「現在反右派鬥爭還需要深入和展

開，但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而改的工作還只是開始。這是必須特別注意的。」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9月7日，鄧小平又針對大會發言和分組會討論的情況作了總結報告。[4]比較強調的內容有：雖然中央把運動分為四個階段，但鄧解釋說，不要把問題「看得太死」，後兩個階段如果發現新右派，或原有的右派還需要鬥，「當然仍有反右派的任務」。關於右派的標準和處理是討論時提問最多的，鄧說中央不久將提出一個草案。原則是「政治思想上鬥透，處理上則不宜過分」。一部分人送去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對多數人要比較寬大。在工廠和農村劃右派，「可以限於脫離生產的人，以免牽涉到一般勞動人民」。在農村中，「對於富裕中農和單幹戶，除進行政治教育外，還要採取一些經濟措施以限制其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為了限制合作社社員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對於自留地、個人開荒、個人經營副業和農村自由市場活動的範圍要有適當限制。」「對手工業者、小商販、小業主的整風，可由各城市自行安排，必須注意在這次運動中不要漏掉他們。」[5]

毛澤東的最後講話，重點不在整風反右運動，這裏有三點值得提出來。一、「現在的重點是基層的放，基層的改，就是縣、區、鄉三級的鳴放和整改。」（原稿中這裏有一句：「縣以下基層還要反右派」。）二、「整風有兩個任務：一個任務是反右派，包括反資產階級思想；一個任務是整改，整改裏頭也包含兩條路線鬥爭。」三、整風運動搞到明年5月結束。[6]

從上述毛和鄧的報告看，中共中央確認，反右和整風是一次運動的兩個階段，此前以反右為主，此後以整改為主，而且，反右主要在「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含縣以上機關）的範圍內進行，基層單位（特別是工廠和農村）主要是進行思想教育和改進工作。但是，在實際的群眾運動中，這些界線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在三中全會宣布開展的全民整風運動中，使打擊右派的鬥爭陷入了一個更加混亂的局面。

2 反右與全民整風運動

1957年底及以後的運動，雖然名稱還叫「整風」，但是與年初提出整風時的內容有了很大區別。第一，反右派的鬥爭並沒有結束，在有些地區和部門甚至剛剛開始；第二，整風的對象主要不是共產黨的領導幹部，而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整風實際上就是一場對全民的思想教育運動。

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轉入整改階段後，絕

不能把反右派的任務丟掉，對「未鬥完和新發現的右派分子，要繼續進行鬥爭」，「凡是過去在挖掘右派分子時還沒有掃到的地方，也必須予以清查」。中共中央11月10日將報告轉發全國，並指出「凡在反右派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單位，應該及時地轉入以整改為主的第三階段，同時對資產階級進行有系統的批判」；「凡是對右派分子鬥爭不深不透的單位和遺留問題較多的單位，都必須再接再厲，不要鬆動；並且必須作出計劃，定期結束第二階段，以便及時轉入第三階段。」[7]既要繼續清查右派分子，不使漏網，又要盡快轉入整改，在實際操作中，自然就很容易把二者混同起來。

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整風問題的指示〉，就顯得更加矛盾了。由於一場「大躍進」的建設高潮已經在全國掀起，中共中央要求6月底以前「基本結束」整風運動，不必再搞「人人檢討、人人過關」了，只需寫個思想總結（農村除外），並「採用個別交談互相傳閱的方式」即可。說到整風最後階段的任務，雖然首先提出「以揭發和批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為主要內容」，但是又要求「在農村，應當緊密結合生產，進行整黨、整團、整社」，在城市應該把「分散的基層單位、城鎮居民、小商小販的整風統一安排進去」，「不要使這些方面在全民整風運動中漏掉了或者滑過去了」[8]中央的指示尚且如此含糊，到了基層領導幹部那裏，誰還會把整頓幹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風當作主要任務？

工廠企業的反右整風是1957年8月開始試點的，9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企業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9]雖然此前已規定在工人中不劃右派，但是一則，工廠「科室以上幹部和技術人員可以劃右派」，二則工人中還可以劃「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壞分子」，只是不叫右派而已。[10]中共上海市委工業工作部11月13日還專門下達了「關於在工人中劃分壞分子的意見」，提出十種人可以劃為「壞分子」。[11]實際上，在第一批進行整風的工廠中，就劃了不少右派。如合肥礦山機器廠挖出55個右派，佔職工總數的3.5%。[12]在整風第四階段，很多企業搞「補課」，又劃出不少右派。[13]如濟南市副廠長以上企業幹部495人，在後來的「補課」中就揪出右派分子、疑似右派分子和其他反黨分子29人，佔總人數的5.8%。1958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工業部報告：「一般地說，那些沒有進行反右派鬥爭和領導核心中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的企業，整風運動是不應該宣布結束的。」[14]不過，工廠的情況總體說算是好的，工人階級畢竟是領導力量，對待私方人員就不一樣了。

工商界的反右鬥爭是從批判章乃器開始的，到8月已經全面鋪開。據8月5日新華社報道，各地工商界相繼揭露出的右派分子有：北京的劉

一峰、閻少青、吳金萃、張煥堯；上海的汪君良、黃苗夫；天津的畢鳴岐、榮子正；武漢的王一鳴、彭一湖；昆明的楊克成；江蘇的錢孫卿；福州的劉棟業；山東的袁熙鑑、葛蘭生；河北的高振聲；四川的李仲平、康心如；浙江的沈九如、許祖潮；貴州的梅嶺先；湖南的黃英士；安徽的張善瑞、張東野；江西的羅時暘；西安的張士心；瀋陽的王子仁、齊心；青島的黃元吉等。[15]《人民日報》稱之為「公私合營後形成的第二次改造高潮」。[16]

8月28日，中共中央轉發了統戰部〈關於在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要求各地參照執行。統戰部提出，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運動應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工商聯和民建會，「採取自我教育的方式去進行」。對工商界說來，「反右派鬥爭也是整風運動的主要關鍵和決定性步驟」，必須「堅決地大力展開，徹底搞透」；「劃分左，中、右的排隊是反右派鬥爭的基礎工作，首先應當進行這項工作，以便找出敵人，部署力量。」統戰部最後指出：「工商界的整風運動是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和尖銳的階級鬥爭，需要各級黨委充分重視，給以堅強的領導。」[17]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強調，「工商界骨幹分子整風的辦法大體上和各民主黨派相同」；「一定要使工商界所有的人受到教育，不要像過去的某些運動那樣把一部分人（主要是小型工商業者）忘記了」。[18]

到12月中旬，北京市工商界第一批反右鬥爭結束，參加者5500人，已經批准的右派分子共416人，其中工商界骨幹分子210人（佔骨幹分子3000人的7%），一般資本家206人。此外，在民建會、工商聯幹部500人中也揭發出右派分子21人。參加運動的還有公私合營企業私方人員2.2萬餘人，其中管理人員約7000餘人。對於私方管理人員，「擬作為第二批，由市、區舉辦脫產、半脫產的學習班，分兩期集中學習，每期兩個月左右，深入進行反右派鬥爭和整風」。其餘1.5萬餘人則同所在單位職工一起參加鳴放和整改，對其中的小業主着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原則上不進行反右派鬥爭」。[19]上海市工商界6000人於9月下旬起集中在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學校進行整風學習，經過三個月的鳴放和揭發，揪出260多個右派分子。據報道，這些工商業者經過「集中整風，普遍感到在一些根本性質問題上受到了一次極為深刻、生動的教育」。1958年1月30日，第二批兩萬名工商業者，即公私合營工廠、商店的主要私方人員，分別到十八個區的工商界政治學校進行集中學習。根據各區工商界整風工作委員會的規劃，這批工商業者的整風時間約兩個半月。[20]到4月，工商界的整風反右便融入了民主黨派掀起的「向黨交心」運動的高潮。[21]

在城市中，八屆三中全會後全面開始的反右運動主要是在中小學進

行的。早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在中等學校和小學的教職員中開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通知〉。〈通知〉說，全國中等學校和小學校現有教職員二百多萬人，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好人，但是，隊伍很大，社會出身和政治思想情況可能比大專學校還要複雜。所以，反右是必要的。至於運動的方式，城市學校教職員可以採用機關整風的辦法，農村學校教職員可以參加當地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大辯論。為了做到「整風和教學兩不誤」，決定在中小學的整風反右利用寒暑假集中解決。[22]

在反右運動中，中小學也是中共關注的對象，只是前期忙於處理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和大專院校的問題，還無暇顧及。12月11日新華社的一個內部報道很引人注意，該報道的題目是〈中等學校教師的思想改造工作急待加強〉。內容是說，遼寧省教育廳為了加強中學生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在9月初舉辦了「社會主義教育教師訓練班」。在參加培訓五百多名中學政治課教師中，黨員佔52%，團員佔40%。但是，他們的思想卻「極端複雜和混亂」，還有一些「反動觀點」。在全國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的末期，這些以黨團員為主的中學政治教員所提出的六百多條關於國家政策和現狀的意見令人吃驚：「除沒有公開叫喊『要殺共產黨人』以外，幾乎社會上各種右派言論，都在這個小訓練班裏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有的人系統地論證「共產黨是三害的根源，共產黨不能代表六億人民的利益」；有的提出：「學校裏沒有黨支部可以，沒有教師不行」，「大學要黨委可以，中學的黨支部沒有必要」。還有的「反對農業合作化和糧食統銷工作」，更有的「挑撥中蘇友好關係」。雖然經採取「有力措施」進行批判，很多人的錯誤思想已「扭轉過來」，但「也只有40%的人能成為左派」。[23]

針對這一嚴重情況，教育部要求對中小學教師隊伍進行清理整頓。12月12日，教育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用機關下放幹部代替中、小學和業餘學校被清洗及不稱職教職員的請示報告〉。報告說：根據各地學校整風、反右鬥爭揭露出的材料，中、小學和業餘學校教職員的隊伍極為複雜。右派分子佔相當數量，還潛在一些反革命分子，違法亂紀分子。這部分人必須清洗處理。為填補清洗後的空缺，建議從下放幹部中選擇條件適合的人，立即接替教師隊伍中被清洗者的工作，以保證教學工作正常進行，並改變教師陣容。中共中央12月25日同意並批轉了此報告。[24]

長春市中等專業學校投入反右鬥爭比較早，十七所中專學校到年底共挖出右派分子106名，佔參加運動2279名教職員的4.65%（不包括工友）。在那些「充分發動了群眾，反右派鬥爭搞得比較深透」的學校，挖出的右派分子比例要高一些，如長春建築工程學校8.8%，地質學校

7.21%，水電學校5.7%。採用的方法基本還是「引蛇出洞」那一套，也有通過回憶、談心挖掘和揭發右派言論的。[25]一般中小學都是在寒假期間集中進行整風反右的，如北京市在教職工28813人中，揪出歷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1948人，佔總數的6.8%。[26]湖北省11萬多中小學教職員從12月下旬起，利用寒假期間，相繼集中到縣開展整風運動。「根據教師隊伍複雜、敵我矛盾尖銳、運動時間短等特點，省委指示各級黨委在這次運動中以處理敵我矛盾為中心內容。」因右派「氣焰囂張」，各地黨委紛紛請農民參與批判鬥爭，並對為首者實行逮捕。省委「已下最大決心，準備把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各種壞蛋一概從教師隊伍中清洗出去」，估計最少要超過一萬人。[27]

從中共中央批轉的教育部文件看，中小學的整風反右應該是這次運動的一個重點，從結果看，中小學教師中的右派分子也最多。在八大二次會議的第二次講話中，毛澤東透露，「反右派以後」，在「小學教師中」又放出十幾萬右派分子。[28]這裏講的「反右派以後」，顯然是指全國中小學在1958年初寒假期間進行的整風運動，而「小學教師」大概是「中小學教師」的口誤。這就是說，在當時揪出的三十萬右派分子中，中小學教師竟佔了二分之一以上。但是，在現有的史料中，無論是地方檔案，還是內部報告，有關中小學整風反右的材料很少見，在公開報道中，對此則幾乎隻字未提。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也是今後研究必須關注的。

與城市的運動相比，佔中國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村在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則是一片混亂。如果說對於工廠企業的整風，中央還明文規定把重點放在改進工作作風上，那麼在廣大農村，從一開始就把整風運動作為一種解決現實問題的手段。1957年的提法不是整風，而是教育運動。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指示明確提出：「在目前農村中，有必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優越性問題；第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等等。」[29]這個指示發表在8月10日的《人民日報》。同一天，中共中央還專門下達了關於加強農村思想工作為完成今年徵糧購糧任務的指示：「為了保證全國350億斤徵糧和500億斤購糧的任務，全國各地應立即開始，並在秋收之前，在農村中普遍深入地進行一次社會主義的宣傳運動。」[30]《人民日報》更呼籲：「要使每個基層幹部和農民都懂得：是否百分之百地完成糧食統購任務、嚴格地控制糧食銷量和認真地節約糧食消費的問題，實質上也就是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愛國不愛國的問題。[31]這些用語已經使人感到一種壓力，而在農村基層幹部那裏，幹脆就演繹為強制和暴力。

考慮到農村的複雜情況，中共中央未雨綢繆，在8月14日便指示：

「在全國農村中，正開始進行一場社會主義教育的大辯論。各地報紙、刊物、廣播電台等宣傳機關對於農村這個運動的報道，應着重於好的經驗的介紹，正面道理的宣傳（包括對於資本主義思想的駁斥）。在反映農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時，要恰如其分，不要使人感到黑漆一團。省市委、地委、縣委必須注意對於報刊電台這方面宣傳工作的掌握和領導。」[32]下面掌握得當然會更具體、更詳細，如吉林省委規定：「在報道上必須有選擇、有目的，做到恰如其分，不要只是羅列現象、不加分析，不要作客觀主義的反映」，「對於群眾鬧事，一律不作報道」。[33]

儘管在公開的報道中看不到，但在內部報告和通報中，農村運動中粗暴和暴力行為比比皆是。對農民的教育運動開展不久，8月28日中共中央就轉發了山東省委〈關於如何在鄉、社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的緊急通報〉。該通報指出：「現在有的地區在運動一開始，就想逮捕處理一批有破壞活動的地主、富農，想用行政威力來解決問題。」[34]三天後，中共中央又轉發了兩個文件，要求各地領導認真研究，保證「運動獲得健康的發展」。河北省這兩個文件講的是保定地區出現的打人、拉人和亂扣右派帽子的現象。[35]但中央文件並沒有起到太大作用。據中央辦公廳綜合整理的〈十三個省農村整風簡況〉反映，粗暴鬥爭的情況十分嚴重：河北清苑縣被打二百三十多人，還使用了「牲口拉」、「搖煤球」、「裝麻袋」等花樣；四川省一些縣採取打人、罰跪、剝衣服、澆冷水等辦法，劃出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高達10%—19%；陝西咸陽縣鬥爭158人，其中79人遭捆綁吊打；雲南宜良縣鬥爭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殺15人，逃跑8人；廣東三個專區統計，已有45人自殺，90人逃跑。亂戴右派分子帽子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河北邢台縣一個村400多戶，被打成右派的65戶；有的合作社給所有鬥爭對象都扣上了右派帽子。類似的情況，幾乎各省都普遍存在。[36]安徽省的問題比較嚴重，僅據8月中旬不完全統計，就鬥爭和批判了1347人，還逮捕了590人，真正「說理批判」的只有117人。[37]在殘酷無情的鬥爭中，批鬥對象內殺的情況在農村日益嚴重。青海省農業區開展運動12天，就有11人自殺身亡。[38]據不完全統計，河南省到9月10日已發生自殺事件78起，河北省到10月12日發生105起。[39]正如中共中央在一個文件中指出的，大部分農村幹部「習慣於大規模階級鬥爭時期的一套鬥爭方法」，用過去鬥地主、富農的手段進行對農民的教育。[40]農村整風運動全面開始以後，雖經中央一再通報制止，暴力事件仍然不斷發生。由於強烈的不滿和對立情緒，一些地方出現了「少數群眾鬧事」的事件。四川省西充縣自開展運動以來，共發生鬧事1661起，其中72%的鬧事人群在百人以上。[41]

宗教界雖然情況特殊，但也不能逃避整風反右運動。11月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下發〈關於在漢族宗教界進行社教的意見〉提出，在宗教界必須採取慎重的方針，「不提整風，也不提反右派的口號」，通過學習的方法進行教育，使他們接受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但同樣要進行政治排隊，排為右派的統稱反社會主義分子，不戴有右派帽子。教育對象是宗教職業者，重點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僅對那些政治上最反動而在群眾中影響又不大的分子進行公開鬥爭。[42]1958年3月8日，華東五省一市佛教界舉行社會主義教育座談會。會議決定先採取大字報的形式提意見，再進行鳴放和爭辯。於是，代表們紛紛寫出一張張大字報，內容涉及對宗教政策、農業合作化、計劃供應、衛生、交通等各方面的意見。4月12日，會議領導召開內部幹部會議，準備進行反擊。16日作反右的動員報告，並初步確定給十五至十六個人戴上右派帽子，進行大會鬥爭，還有人受到管制。江蘇省宗教事務局根據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發出的〈關於加強思想動態工作，進行上層人物排隊〉的通知，按照四個方面分類，在二十九人中排出右派分子四人，極右分子二人。[43]

在少數民族和華僑中進行的整風反右更是敏感問題，有關這方面的材料也不易發現。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要求運動依據三種不同的情況進行，一是已經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地區：「適當地進行反右派鬥爭」。二是已完成民主改革並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地區：「黨內一般應當進行整風」，黨外「採取適當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三是沒有進行民主改革和某些不需要經過民主革命而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地區：以正面教育為主。原則是把「重心放在黨內」。[44]9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了華僑事務委員會黨組〈關於農村舉行社會主義大辯論中僑區應當注意的幾項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為了今後工作的主動和國外的影響，在大辯論中，應盡可能縮小打擊面，集中打擊極右分子。對有一時的、個別的反動言行但情節不嚴重的僑眷、歸僑，能不戴就盡可能不戴右派帽子，盡可能不進行大會鬥爭。對情節嚴重的極右分子，徹底批判後不登報，對國外也不發消息。對一般有錯誤言論的，主要是教育說服。特別是不應在大辯論中，去追查歸僑、僑眷的僑匯來源及國外關係。會議認為，這是一個政策性的文件，大體可用，送請中共中央討論。[45]從上述規定判斷，在少數民族和華僑中整出的右派大概很少。

可以看出，第一，雖然從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就全國而言開始轉入後期整風，即整改階段，但反右鬥爭並未停止，而是交錯進行；第二，全民整風主要不是整領導幹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風，而是對全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群眾運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旦發動起來，往往發生失控的

局面。「文革」初期是這樣，反右運動也是這樣。八屆三中全會設想整風反右運動在1958年5月1日結束，到1958年4月時發現不行，又推遲了兩個月——到6月底。但6月18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通知：「在本年7月底以前勝利地結束這一次的整風運動」。[46]不僅運動的進程如此，運動的方式亦如此。在這樣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中，出現「違反政策」、「簡單粗暴」和「打擊面過寬」的現象，是很自然的事情。

3 他們是這樣成為右派分子的

隨着運動不斷深入，勝利不斷擴大，右派的人數也在節節攀升。如前文所說，就全國而言，1957年7月青島會議前反右鬥爭取得「偉大勝利」時，揪出的右派分子應該不超過一萬人。到10月八屆三中全會反右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時，大約已有十五萬人。中小學在寒假期間的整風反右中，又增加了十幾萬人。這樣，到1958年4月毛澤東宣布的右派人數已達三十萬人。[47]除農村的整風、整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外，全國的反右整風運動到1958年7月底大體結束，這時共有多少右派分子，目前沒有統計數字。1959年開始給部分右派「摘帽」時，中共中央9月19日〈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透露，在反右鬥爭中，「全國揭發出右派分子約45萬人」。[48]中央統戰部在1980年5月8日的請示報告中指出，反右鬥爭中劃右派分子49萬餘人，「以後又陸續劃了幾批，共計55萬餘人」。[49]這就是說，在1958年4月以後新劃的右派分子還有25萬人之多。這些人究竟是甚麼時候以及怎樣被劃為右派的，現在還說不清楚，只能等待檔案文獻和相關史料的問世。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1957年「夏季攻勢」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數量極其有限（不到右派總數的2%），絕大多數人都是在後來不斷擴大的群眾運動高潮中被捲進去的。青島會議是一個高潮，八屆三中全會又是一個高潮，這兩次會議以後，右派分子的數量分別增長了十幾萬。現在的問題是，除了毛澤東欽定的「極少數」大右派在劫難逃外，那幾十萬人是如何在一場群眾運動中走向深淵的？

大多數黨員幹部和積極分子在鳴放時有抵觸情緒，反擊號令一下達，自然是義無反顧，奮勇戰鬥。據《內部參考》報道，《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上海、天津、重慶、雲南、安徽等地的幹部和黨團員感到「興奮」、「痛快」、「揚眉吐氣」，甚至「鼓掌歡呼」。繼而「開始流露有報復情緒」，有些人「想狠狠把對方整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人「因為對領導提了意見被劃為右派分子」。[50]廣播事業局翻譯陳潤康長期僑居法國，按照規定華僑歸國二年以內者不劃右派，但他超過了一個星期，運動中因「攻擊黨」被打成右派。審查右派材料時，

上級領導和單位領導有一段問答。問：「根據是甚麼？」答：「他攻擊我們黨的官僚主義。」問：「我們黨不是承認有官僚主義才整風的嗎？他攻擊誰呢？」答：「他用資本主義國家虛偽的民主來攻擊我們不民主。」問：「他是怎樣具體攻擊的呢？」答：「他就是反對我這個組長。」[51]還有些人並非在鳴放時得罪了領導，但也難逃厄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有個青年教師，註釋《資本論》出了名，某系領導平時就嫉恨他，這次「借機整人」，非要把他打成右派不可。校黨委討論時，多數人出於「愛才」，認為小青年說幾句怪話不能算反黨，教育一下就行了。但系裏最後硬是找到了他惡毒攻擊黨的「罪證」，終於給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52]

反右運動中的受難者，絕大多數都是「禍從口出」。一向以「敢言」著稱的梁漱溟能逃過反右這一劫，就是因為「一言不發」。對此，很多人頗感詫異。1953年梁與毛澤東當眾頂撞引發一樁大案，當時雖沒有公之於眾，但流傳甚廣。此後李濟深、張瀾曾給毛寫信說情，一直沒有下文，大家都知道梁心裏有不少委屈。因此，到1957春天的「鳴放」一天始，就有《新建設》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先後派出記者採訪梁漱溟，要他發表意見，希望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梁先生出奇地冷靜，一概默然待之。有人說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梁對此一笑置之。[53]梁老先生如此沉得住氣，自然有他的考慮，但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沉默，也不是保持沉默的人都能在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安然無恙。

因為一句話、一項建議或一個批評被打成右派者大有人在。第一機械工業部打字員戴菊英還未到公民的年齡，卻被打成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話——「美國鞋油真好使」。別人批評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頂了幾句，就被說成「態度不好，思想頑固」，於是扣上了右派帽子。人民出版社高級編輯謝和賡在鳴放時貼了一張反對官僚主義的大字報，要求保護古跡牌樓，並將沒收的宅第花園向人民開放，或改為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館，還提出中南海也應對人民開放。這便成了全社右派言論的代表作。老記者朱啟平1951年給《中國建設》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報道曾一度擔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回歸祖國的情況，文中說他「嚮往新中國，寧可放棄美國、法國的高薪聘留」。雜誌發表時改為翁在國外「走投無路」，是共產黨寬宏大量收納了他。鳴放時，朱以此例批評新聞報道有時不夠真實，認為這種修改完全背離了事實，也是對這位愛國老科學家人格的侮辱。結果，就這麼一條批評意見，便被說是「攻擊黨的領導和攻擊黨的新聞政策」，隨即他也成了右派。[54]

即使不說話，也未必能過關。作家協會的楊覺「大鳴大放」時不在

北京，去農村探望回鄉養病的妻子，本來與反右毫無關係，但他去的那個村在與鄰村合成高級社時，經濟上吃了虧，想向上面反映，要求兩個村仍然分開核算。正好楊覺回京，他們就寫了封信請楊順路帶到河北省委。結果這封信轉到了那個高級社社長的手裏，社長遷怒於楊，便給作協寫信，說他煽動分社。當時作協正在為右派人數沒有達到上級要求急得眼紅，發現有人「破壞合作化」，正好算上一個。詩人流沙河不曾對時政有一句非議，只因寫了一首情詩，也成了劃右派的一條「罪狀」。批判他的文章說，詩中使用「接吻」一詞，是「荒淫無恥」，因為「接吻就是資產階級右派行動」。〈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公木（張松如）當時擔任文學講習所所長，平時為人老實，很少說話，也不寫甚麼文章。不知在背地裏跟甚麼人說了幾句甚麼犯禁的話，也被打成右派。[55]類似的還有民盟右派分子潘光旦，也沒有「鳴放」，羅隆基說他是「揭開了蓋子也不說話」的人。[56]

有些人因不想把別人打成右派，結果自己成了右派。某縣衛生局黃局長是當地著名中醫，幼承家訓，篤志好學，很有些知識分子的清高倔強勁。反右以後，衛生局也分到了一個右派指標，而且規定下達的指標非完成不可的，不能打任何折扣。這位黃局長當場就表示異議，說：「反右派又不是工農業生產，怎麼也要規定指標呢？」後來，衛生局真是一個右派也沒有揪出。在縣、科教辦匯報時，教育局、文化局等領導都把右派名單報了上去，黃卻直截了當地說衛生局沒有右派。科教辦主任一聽，怒氣衝衝地說：「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種人，難道你衛生局就獨獨沒有？我看哪，你身為領導幹部，這種對反右鬥爭的消極抵觸情緒，就說明你是個右派！」一錘定音，黃局長就這樣被劃成了右派。[57]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在反右時心有疑慮，反對按照規定的指標劃右派。有關部門通知：對外廣播部門現在二百多人，很多人長期在國外生活，因而要作為重點單位來抓，按照5%的指標規定，起碼要劃十幾個右派。溫當場就表示：「你們也經歷對抗日戰爭時期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切不可忘記過去的教訓。那時新華社、解放日報社70%的同志被打成『特務』，可是後來甄別，除了個別人需要繼續審查外，沒有一個是特務。」後來溫被劃成右派，廣播事業局黨組在結論中說他在運動一開始就「抗拒反右派鬥爭」。[58]

不過，像黃、溫這樣的領導畢竟是少數，在反右運動中，絕大多數單位都按規定的指標完成或超額完成了任務。所以，很多右派都是因為要「達標」而蒙冤的。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且千奇百怪。北京市委宣傳部的鍾鴻是一個溫柔沉靜的姑娘，在鳴放中沒發表過甚麼言論。在確定右派時，他們單位實在找不出來，沒法交代，只好拿她湊數。問到鍾的情況時，匯報人說：「唉，這也算可以了。再沒有別人言論比她更重

的了。」還有陳涌、王蒙，都是在中宣部討論右派名單時，用這種「比較攀扯」法「平衡」成右派分子的。[59]這還算是講點道理的。某縣電影公司只有九人，也攤上了一個名額。大家平時都在一個辦公室，關係也不錯，誰都不好意思提別人的名，最後只好用抓鬮的辦法，誰抓到誰就是右派。還有更離奇的。地理教師周某所在的中學分到兩個右派名額，其中一個已有所屬，是初三語文教師，有海外關係，整風時提了兩條很尖銳的意見，尤其是跟校長的關係不好，就內定為右派了。但還有一個名額沒有着落，沒辦法只好召集全校教師開會討論。知識分子都愛面子，不願當面得罪人，所以討論來討論去，整整一個上午也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這位地理教師早飯多喝了點麵湯，便想出去方便方便。他認為自己政治進步，業務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說甚麼也戴不上這右派的帽子。誰知他剛一走，一個老師靈機一動，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師立即同聲附和，舉手贊成。等周某上廁所回來時，已經成了右派。[60]

也有為了湊數，代人受過的。反右初期，高級黨校也沒有找到一個右派分子。於是劉少奇、鄧小平把楊獻珍等黨委常委找去談話，得知黨校沒有查出右派，劉說：你站在右派的立場，怎麼能查得出右派呢？鄧說：我看你就像個右派。於是，指示高級黨校要重新展開反右派鬥爭。由於受到中央批評，回到學校後楊獻珍就靠邊站了。校領導在一起議論時，雖然認為劉鄧都說楊的立場有問題，「右派」自然非他莫屬，但大家都一直在楊的領導下工作，且楊為人不錯，實在難以下手。最後沒有把楊劃成右派，而讓他的秘書馬鴻模頂替了。楊知道內情，後來待馬一直不薄。[61]這還算過得去，竟有張冠李戴十幾年，當事人還渾然不知的。東北工學院採礦系高錫成在運動中是積極分子，批判右派分子惲某時，支部領導要他準備發言，就把整風辦公室整理的惲某反動言論材料給他看。高隨手抓起鉛筆，在一張表格紙上抄下了惲的17條反動觀點，因只限自己使用，便省掉了頭尾文字。事後，高把抄下的材料往書裏一夾，就忘得一幹二淨了。幾年過去了，高已分配到大冶鐵礦當技術員。1960年10月，他的一個同事偶然在那本書中發現了這份材料，並立即向領導報了案。因筆跡是高的，市公安局未經核實查問，便把他定為「漏網右派」。高錫成就這樣糊裏糊塗被送去勞動教養了。[62]

還有為完成黨交給的任務，自願擔當右派的。李某，共產黨員，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在東江縱隊文工團工作。抗美援朝時加入志願軍，榮立二等功。轉業後來到廣東某縣文化局。李在工作中積極肯幹，事事帶頭，連續四年被評為先進，整風反右期間也是積極分子。文化局長就是他的本家叔叔，自然也談不上得罪領導。反右開始後，上級布置任務，要文化局挖出一個右派分子。可是進行政治排隊時，擺來擺去，

找不到誰可以夠上右派標準。萬般無奈，當局長的本家叔叔只好對李某說：「德仔，你甚麼工作都帶頭，是個老先進，這次評右派，你也帶個頭吧，要不，向上匯報時我臉上不好看。」他低頭一想，覺得也沒甚麼，反正中央說過，右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當一當也無所謂；既然黨組織要自己當右派，就帶這個頭吧。雖然後來給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脫帽右派」的身份一直保持到80年代。[63]受到親屬牽連成為右派者也不在少數。老作家聶紺弩因為胡風案受株連而被隔離審查一年，剛獲得自由就趕鳴放。他婉言拒絕了領導上要他鳴放的「盛情」，甚麼也沒有說。但是他的夫人周穎卻說話，她對肅反提出批評，並認為胡風算不上反革命，結果不但自己成了「特大右派」，而且殃及聶紺弩。聶被指控為周穎發言的「幕後策劃者」。[64]廣播事業局見習編輯錢敏齊是人民大學畢業的研究生，結婚不久丈夫就在外交部被劃為右派，她一氣之下跑到外交部辦公廳又哭又鬧。開始只是對她提出批評，以後算來算去還是被劃成了右派。[65]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對政治向來不感興趣，僅僅因為同情父親，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劉賓雁的姐姐劉放，也因替弟弟鳴不平被劃為極右分子。還有父子右派——地質科學家謝家榮和他的兒子，兄弟右派——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和他的弟弟。最冤的是陳獨秀的孫女陳禎祥。當時北京師範學院黨委開整風動員會，發動全院師生給黨提意見。陳在領導的一再催促下，左思右想後提出，學校圖書資料少，新老師多，教學質量不夠高等。反擊右派後，這些言論竟成了把她定為右派的唯一「罪證」。學校成立了陳禎祥專案組，組織師生開會「幫她提高認識」。對她的批判是：「你與別人不一樣，你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有階級根源、歷史根源的。」「你必須承認事實，你是陳獨秀的孫女，你父親在香港，你反黨是有意識的，你是天生的右派。」[66]

讓人感到可憐的是，大量的右派被定罪，並不是因為他們有甚麼右派言論，而是在他們向黨「交心」或自我檢討時，暴露了自己的一些「錯誤」思想。李維漢在回憶中承認，「自我改造」和「向黨交心」運動在全國普遍開展起來後，「影響很壞」，不少地方又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67]這說的主要是那些黨外人士，其實黨內類似的情況也不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錢辛波就因向黨「交心」成了右派。錢在整風開始前被送到中央高級黨校學習，顯然是把他當作「培養」對象的。在運動中，錢沒有發表過任何鳴放言論，但為了表示對黨的忠誠，他不止一次地向黨組織寫「思想匯報」，講述他與哪些右派分子認識，有過甚麼交往，在思想深處和他們有哪些共同的地方。校領導認為錢的思想匯報比較「深刻」，還曾將這些「自我檢查」作為典型材料發各支部傳閱。1957年末反右運動在黨校基本結束時，康生突然宣布補課三天，繼續反右。結果，錢被補為右派。領導向他宣布的理由很簡單：你有許多

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資產階級報紙《新民報》工作過。就這樣，一個黨的忠實成員被開除了黨籍。[68]

其實，在黨內右派分子中，像錢辛波這樣的忠誠黨員佔絕大多數，甚至有很多人明明是「左派」，卻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一般情況下，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都是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或贊成大民主的人，似也確有一些反對鳴放和雙百方針的人成了右派。例如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江豐，就沒有任何「自由化傾向」。他只是同意陳其通等人的觀點，甚至說「百花齊放在社會上可行，在我們學校內不行；我們校內只容許開一朵花，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些左派言論後來都被奇怪地作為右派言論受到批判。[69]作為陳其通、馬寒冰等人的上級，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沂也是「左派」，並且寫文章支持陳其通，最後被打成右派，開除了黨籍和軍籍。[70]此外，丁玲、陳企霞也屬於這類情況。[71]這些人的厄運，大概與反右運動沒有直接關係，只是趕上了這個特殊時期而已。

以上種種案例，真是光怪陸離，千姿百態。有言論的被打成右派，沒有言論的也可以被打成右派；批評領導的被打成右派，積極跟隨領導的也可以被打成右派；搞自由化、大民主的被打成右派，反對自由化和大民主的也可以被打成右派——條條大道通羅馬！不過，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通過鬥爭，這些右派分子或多或少大都「心甘情願」地承認了自己的罪名，即如舒蕪所言：「你天天聽說你是向黨進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說，處處都說，會上也說，會下也說，報刊上也說，大字報上也說，說法又千變萬化，有些還精闢精彩，慢慢你會覺得自己確實向黨進攻過，確實是右派，至少也會疑疑惑惑，不敢自信。國外有人說這是一種『政治催眠術』，倒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72]這也是中國政治運動的一大特點。

通過群眾運動搞階級鬥爭必然導致擴大化，「三反」、「五反」是這樣，肅反是這樣，反右也是這樣。不過，反右運動又有其特性。以往的運動主要是針對行為，而判斷行為一般是容易找到標準或界線的，問題是這個標準和界線應該由法律判定，而不是掌握在領導人和群眾手中。但反右運動主要針對的是思想和言論，在這裏，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領導人和群眾沒有或不能掌握劃分左中右的標準，而在於對思想和言論，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一個司法意義上的尺度和標準。歷來的「文字獄」都是如此。

諳練階級鬥爭的中共領導人當然知道整頓階級隊伍的重要性，所以從反右運動一開始，就要求各單位對所有人員進行「排隊」，分出左中右。但是按照甚麼標準劃分，中共中央遲遲拿不出一個原則性的意見。

反擊右派的運動開始不久，各級領導就紛紛提出排隊的標準問題。6月17日中共上海局整風辦在電話匯報中就提出，「值得研究的是劃分的具體標準和界限問題」。19日遼寧省反映，認為「排隊中遇到的問題是右派和中間派的分界限不夠清楚」。有的省（如湖北）幹脆自行商定右派的標準。[73]儘管6月19日發表的毛澤東講話規定了判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但那只是一個政治原則，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此後各地匯報中提出的主要問題仍是：「左、中、右派的標準不明確，口徑不一」（河北），「幹部對劃分左、中、右派分子的界線不清」（遼寧），「總之，對甚麼是右派，右派和反革命的界限如何？對右派將來到底如何對待？目前在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是都不明確」（湖北）。[74]

7月11日，中共中央批發了統戰部〈關於劃分左、中、右的標準的建議〉，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照。統戰部的建議還是一個政治標準，雖然根據「兩面性和動搖性的大小」，把中間派又分為「中左、中中、中右三類」，在右派之上再加一個「極右分子」，但除了增加層次，並講了一大堆政治術語外，沒有任何新內容。[75]況且，統戰部剛說，極右分子中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已處於敵我界限的邊緣，毛澤東幾天後就說：「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76]問題反而更複雜了。上海市委書記處按照毛澤東的六條標準，又擬定了七條具體標準，但說來說去還是「挑撥黨群關係」、「幕後陰謀策劃」、「向黨進攻」、「一貫對黨仇恨」等一類似是而非的語言。[77]江西省委整風辦公室則發現「在劃定右派分子工作中對七方面問題的界線混淆不清」，如同意右派某些言論與自己有右派言行並為右派辯護之間的界線；在個別問題上對黨有意見、不滿與對黨有敵對情緒之間的界線；對有缺點的某些黨員或個別領導同志不滿意與仇視、污衊整個組織（包括對黨的方針、政策）之間的界線；自由主義、小廣播、發牢騷與有意識挑拔黨群關係之間的界線等等。不久，省委便自行規定了七條具體標準。廣東省也擬訂了「劃分右派分子的八項標準」，內容與上海的差不多。[78]江蘇省則提出對右派要從五個方面具體考察：一、階級成員和階級出身；二、政治歷史問題；三、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具體表現；四、這次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五、平時的工作、思想表現。[79]其結果無疑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八屆三中全會分組討論時，會議代表紛紛提出了如何劃定右派的問題。如國家機關組對哪些人應該劃為右派以及處理辦法產生了爭論。中央組田家英提出：「請中央考慮是否可以採取一些具體措施，如轉發一些反官僚主義的典型材料，使鬥爭目標更加集中、明確，不致傷害一些同志。」京津組反映，在「開會批准右派時，意見常常不一致」，工作進展很慢，還容易出錯，「主要是由於中右和右派的界限難劃。搞個標

準，很有必要」。中央組第三分組重點討論了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問題。據反映，國家機關各單位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還不夠一致，掌握標準較難。因此，「大家認為須由中央頒發一個統一的標準」。華東組也針對防止擴大化的問題提出，要嚴格掌握劃分右派分子的界線和批准權限，並「建議中央快一點制定出一個右派分子的標準」。[80]

於是，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這次提出的「統一的標準」共有六條，還有應劃為極右分子的四條。這些同以前區別不大，只是更具體、更詳細一些。比較重要的是增加了不應劃為右派的幾種情況：（一）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詞尖銳，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二）有過類似右派的思想，但是並未發表過或散布過，而且已經認為錯誤、自動檢討出來的人，或者偶然講過類似右派的話，現在已經承認錯誤，而在歷史上一貫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三）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或共產黨的領導發表了錯誤的言論，但是並未積極宣傳，事實證明不是出於敵意，經過指正表示願意轉變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四）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參加了右派小集團，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錯誤以後，迅速地站在正確立場，同右派決裂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五）歷史上曾經站在反動立場，現在也沒有顯著的轉變，但是在右派進攻時期並未進行反動活動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六）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劃為右派分子，並且不用鬥爭右派分子的方法來對待他們。[81]如果這個標準早些頒布，如果嚴格按照這個標準執行，相信確會有一些人不必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但實際結果是，仍有幾十萬人被劃為右派。其中的原因，有人認為，在當時強調反對「右傾情緒」的氣氛下，這個標準是很難做到的。[82]也有人認為，由於這個標準「不是按照嚴格的法律程序制定的」，所以「難以精確掌握」。[83]其實，從毛澤東的六條，到統戰部的建議，再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外加各省的具體規定，中共提出的劃分右派的標準不算少了，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對於認識論和世界觀的問題，能夠劃出一個標準嗎？對於思想和言論來說，何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

[1]《毛澤東傳（1949—1976）》，頁717。

[2]這個報告曾刊登在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但作了較多刪節，特別是一些統計數字。筆者在吉林省檔案館看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在會上印發的原文，館藏號：

1-13/1-1957.64，頁22—46。以下所引均出自吉林省檔案館的原文件。

[3]這只是上報的數字，據會上的透「底」的估計，當時全國劃出的右派分子大約十五萬人。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619—620；《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293：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10月13日。

[4]關於大會發言和分組討論的情況，參見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5，頁1—33。

[5]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4，頁1—9；雲南檔案館，2-1-2673，頁26—34。

[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597—610。參見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筆記），1957年10月9日。

[7]雲南省檔案館，2-1-2751，頁33—38。

[8]雲南省檔案館，2-1-3194，頁4—5。6月18日又通知「在本年7月底以前勝利地結束這一次的整風運動」。雲南檔案館，2-1-3194，頁6—7。

[9]《人民日報》，1957年9月13日。

[10]《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二冊，頁273。

[11]上海市檔案館，B255-2-116，頁7—9。甘肅省也下達了類似的文件。參見《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三十九）。

[12]《內部參考》，1957年9月3日，頁5。

[13]在成都會議貴州省委書記周林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整風反右沒有搞好的，要補課。」參見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插話（記錄稿），1958年3月9日—19日。

[14]陝西省檔案館，123-43-4，頁56—57。

[15]《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7號，頁169—170。

[16]《人民日報》，1957年8月8日。

[17]吉林省檔案館，1-5/6-1957.13，頁198—205；雲南檔案館2-1-2738，頁40—44。

[18]《人民日報》，1957年10月19日。

[19]《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頁923—927。

[20]《人民日報》，1958年1月23日、31日。

[21]《人民日報》、1958年4月5日、23日、28日。中央統戰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向黨交心和制定個人改造規劃運動是目前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整風運動的重要形式，是他們整風運動的深入和發展。我們應當從各方面予以指導、支持和幫助，把這一運動推向高潮。」參見雲南省檔案館，2-1-3194，頁59—61。

[22]雲南省檔案館，2-1-2737，頁70—71。

[23]《內部參考》，1957年12月11日，頁17—19。

[2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349。

[25]吉林省檔案館，1-20/4-1958.13，頁14—20。

[26]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8）》（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423—425。

[27]《內部參考》，1958年2月4日，頁3—5。

[28]吉林省檔案館，1/1-14/59，頁8。

[29]中華人民共和國国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700—701；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

[30]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57—1992）》，（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頁47—48。

[31]《人民日報》，1957年8月10日。

[32]陝西省檔案館，123-43-3，頁6。

[33]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39，頁83—84。

[34]《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頁702—705。

[35]雲南省檔案館，2-1-2749，頁49—56。

[36]《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頁713—719；陝西省檔案館，123-43-8，頁117—118。河南、湖南、山西、吉林、內蒙古的情況，參見《內部參考》，1957年9月7日，頁35—36；9月14日，頁3—9。遼寧、江蘇、浙江、北京的情況見《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二十四）、（二十五）。

[37]《內部參考》，1957年9月20日，頁9—14；雲南省檔案館，2-1-2749，頁75—79。

[38]《內部參考》，1957年9月26日，頁9—10。

[39]《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二十六）；《內部參考》，1957年10月14日，頁11—12。

[40]雲南省檔案館，2-1-2749，頁57—64。

[41]詳見陝西省檔案館，123-43-471，頁73—77；123-43-8，頁117—118；雲南省檔案館，2-1-3194，頁63—70、95—100。

[42]雲南省檔案館，2-1-2738，頁55—58。

[43]江蘇省檔案資料3089宗教卷，短期卷第四十、四十七卷；長期卷第二十六卷。轉引自伍小濤：〈反右與江蘇的宗教改造〉，《二十一世紀》，2005年12月號，頁117—118。

[44]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4，頁103—108。

[45]《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272。該報告9月12日由中共中央下發。

[4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597—610。毛澤東與卡達爾談話記錄，1957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204-00054-04，頁2—7；雲南省檔案館。

[47]毛澤東在東湖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4月6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5月17日，吉林省檔案館，1/1-14/59，頁8。

[4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572。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彙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605。有書披露，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2877人。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61。但該書未註明資料來源，故只能參考。

[50]《內部參考》，1957年6月12日，頁9—12、6月14日，頁13—14；6月15日，頁14—15；7月27日，頁4—6。

[51]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頁280—281。

[52]李新：〈反「右派」親歷記〉、《中共黨史資料》，總第67輯，頁40。

[53]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頁243—247。

[54]戴煌：《九死一生》，頁98—106。

[55]韋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百年潮》，1998年第2期，頁26—27、33—34。

[56]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112。

[57]謝日新：〈命運偶記四題〉，載季羡林編：《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471。

[58]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頁279—280。

[59]韋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百年潮》，1998年第2期，頁28—31。

[60]謝日新：〈命運偶記四題〉，載《沒有情節的故事》，頁469—470。

[61]李新：〈反右親歷記〉，載蕭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頁29—31。

[62]《上訪通訊》編輯室：《春風化雨集》，下冊，頁334—335，轉引自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頁136—138。

[63]謝日新：〈命運偶記四題〉，載《沒有情節的故事》，頁468—469。

[64]曹英等編：《共和國洗冤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頁3—4，轉引自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頁103—104。

[65]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頁280—281。

[66]《上訪通訊》編輯室：《春風化雨集》，上冊，頁448—456，轉引自華民：《中國大逆轉》，頁142—143。

[67]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46—847。

[68]錢辛波：〈交心成「右派」〉，載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401—403）。

[69]《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7號，頁190—192。

[70]參見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74—76；《人民日報》，1957年4月22日、5月9日，1958年3月29日。

[71]關於批判丁、陳的情況，詳見中央轉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經過報告，1958年1月9日，雲南省檔案館，2-1-3195，頁28—33。並參見黎之：《文壇風雲錄》，頁109—113；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390—392。

[72]舒蕪：〈歷史需要我們作證〉，載《沒有情節的故事》，頁409。

[73]《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一）。

[74]《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二）、（三）、（五）。

[75]吉林省檔案館，1-5/6-1957.13，頁180—189；雲南省檔案館2-1-2738，頁11—15。

[7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43。

[77]《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六）。

[78]《內部參考》，1957年7月25日，頁3—4；8月7日，頁3—5；9月18日，頁17—20。

[79]《內部參考》，1957年8月9日，頁5—8。

[80]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頁1—22。

[8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613—617。

[8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21—622。

[83]雍濤：《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135—136。

三 階級鬥爭再次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反右派運動說到底是一場以「文字獄」為特徵的階級鬥爭，而且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毛澤東所以非要發起這樣一次運動，確實在於他對1957年初夏的局勢作出了過於嚴重的估計。很多人對當時執政黨的政策和方針表示不滿或反對，確是事實，但是有幾個人想到要推翻共產黨的政權呢？工人農民不過是想讓生活過得更好一些，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充其量也就是要求多一些民主和自由。[1]作為執政黨，這些本來都不是無法處理的事情。毛澤東在此時感到一種威脅，主要是因為他疑心病過重，且頭腦中階級鬥爭的觀念愈來愈強。特別是在波匈事件之後，「無產階級政權」得而復失的情景常常出現在他的腦海裏——這從他的歷次講話可以看得很清楚。於是，「夏季攻勢」出現了，一場慘烈的階級鬥爭爆發了。其情其景，與一年前八大時國內的情緒和氣氛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1 對八大政治路線的徹底背離

前文說過，毛澤東在八大以後曾對政治決議中表述主要矛盾「實質」的那句話表示不滿，但並沒有對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這個基本判斷提出異議。在波匈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談到少數人鬧事、「有人要殺共產黨」的話漸漸多起來，但始終認為在中國這些人「翻不起大浪」。直到1957年春季，毛澤東在一系列講話中仍然堅持認為階級鬥爭已經過去，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大鳴大放以後，毛澤東就開始警覺了，這在前引他起草的各項指示和對國務會議講話稿的不斷修改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毛澤東看來，階級鬥爭實際上還沒有過去，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八大決議是全黨通過的，自己也曾大談特談「人民內部矛盾」，此時重提階級鬥爭顯然不合時宜。所以，毛澤東只是在講到階級鬥爭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時，加了許多限制詞和修飾語，並沒有改變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反右運動開始後，秘書田家英曾向毛提出：看來八大關於矛盾的分析和方針任務的規定是不對的。毛澤東表示：確有問題，但八大的路線、方針是大家一致決定的，現在不宜提，等以後相機提出。[2]

反右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了，他決定在八屆二中全會提出這個問題。會前，9月19日，毛澤東先在頤年堂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在講話中提到了兩類矛盾和主要矛盾問

題，他說：「整個過渡時期，總的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我們過去一個時期，主要是提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沒有提。」「現在看來，兩個矛盾都同時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變了，但人並沒有改造。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八大講目前敵我矛盾基本上解決了，現在看來也對，但只能是在經濟方面的，如從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這樣說了。」這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第一次談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問題，當時就有很多與會者感到不理解。[3]9月23日鄧小平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又提出：「這個運動要解決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的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城鄉各種反革命分子，農村中還在進行破壞活動的地主富農分子，社會上的流氓、阿飛、盜竊犯、兇殺犯、強姦犯、貪污犯、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嚴重違法亂紀的罪犯以及公眾公認為壞人的人，他們同人民的矛盾也是敵我矛盾。除此以外，都是人民內部的矛盾。」[4]這就更引起了人們的思想混亂：究竟如何理解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階級矛盾？

這個問題在全會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華北組在討論時提出：在過渡時期，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現在又把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拿出來了，這與八大決議以及一些整風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希望中央負責同志再解釋一下；整風報告中說：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並沒有結束，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重新尖銳化。有些人認為事實上是這樣的，但理論上怎麼解釋？資產階級已失去了經濟基礎，為甚麼階級鬥爭還能重新尖銳化？中央組有人提出，請三中全會考慮，可否正式更正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實質的提法。河南、江西、湖北分組在甚麼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這個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少數人認為，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多數人認為，雖然目前的重要任務是反右派，但不應把國內政治生活中一個時期的主要問題，作為整個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從思想戰線上可以說主要矛盾是階級鬥爭，但從經濟基礎上看，則不能說階級矛盾是主要的；過渡時期矛盾的性質是按後者而不是按前者決定的。華東組在討論時基本上都贊同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即兩條道路的矛盾的說法，但解釋說，這個矛盾表現在兩個方面：一部分是屬於敵我矛盾，如與右派分子的矛盾；一部分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也有兩種，一種是純人民內部矛盾，一種是資產階級思想與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如與接受改造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矛盾。但從後一部分人思想與無產階級思想之間的矛盾來說，是敵

我矛盾（要改造它），從政治上來說，則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過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當，仍然可以轉化。同時，還應說明，在右派分子未明顯暴露出來以前，人民內部矛盾是突出的；反右派鬥爭以後，人民內部矛盾的分量仍然是較大的。[5]

在後來的討論中，很多人直接提出了不同意見。據10月5日《情況簡報》刊載，外國專家局局長楊放之認為，說過渡時期主要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敵我矛盾，不符合現在的實際情況。因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變以後，人民內部矛盾是多方面的，而敵我矛盾比較簡單。當前主要是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所以反右派鬥爭的性質是很重要的敵我矛盾。但這只是少數的，而大量的、經常的則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因此敵我矛盾不是主要的，八大決議對當前國內矛盾的分析仍是正確的，不能因為這次反右派鬥爭而改變這種估計。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解決了同三大敵人的矛盾，而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改造又解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八大決議對我國當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正確的。但是決議也有缺點，就是對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和兩條道路的鬥爭強調得不夠。從此次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活動中證明，社會主義改造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鬥爭還是十分尖銳的，但不能簡單地說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主要矛盾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教育部副部長陳曾固認為：（1）過渡時期在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至於一時的突出的反右派鬥爭雖是敵我矛盾，但並不能排除人民內部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2）人民內部矛盾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主要矛盾究竟是哪一方面，還不夠明確。在各種各樣的矛盾中，是不是以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作為主要的矛盾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和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是一致的。[6]看起來，否定中共八大的政治決議，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針對這些看法，10月7日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全會各組負責人開會，主要談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他說：有兩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進行了一半，所有制問題解決了，但是上層建築問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意識形態上）還沒有解決。」「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現在看，這也沒有錯。基本上解決，並不是說完全解決。所有制解決了，政治上思想上還沒有解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裕中農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沒有完全看清楚。……那時對階級鬥爭強調得不夠，因為他們表現服服貼貼；現在他們又造反，所以又要強調，青島會議文件是一個補充。」毛勸導說：要使到會同志懂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過渡時期的主要處理。

要肯定這個提法是對的，但報紙上不要發表，不要引起風波。而且現在大講階級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黨內的三個主義都掛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賬上。要集中搞整風，否則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資產階級與富裕中農身上，容易放鬆了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毛澤東着重解釋了階級矛盾和敵我矛盾的不同。他說：「階級矛盾與敵我矛盾有區別。資產階級同我們的矛盾，有對抗的和非對抗的兩面。一般說來，資產階級、富裕農民仍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是非對抗性的，但處理得不好也會轉化成敵我矛盾。階級矛盾，重要的是在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他們的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民中間，他們有的不對抗，有的對抗。」「人民內部矛盾包括着階級矛盾（因為資產階級還有選舉權）。敵我矛盾是階級矛盾，但階級矛盾不一定就是敵我矛盾。……階級矛盾內有敵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最後，毛澤東談到八大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問題。他說：「八大文件上只講所有制、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沒有講人與人的關係，這反映那時的情況。八大決議說，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將來還會有，因此這句話從長遠講也對，但現在看則不適當。」[7]

10月9日毛澤東在閉幕式作總結講話時，又談到了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毛澤東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為了與八大銜接，毛又解釋說：「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但是八大的決議並沒有否定階級鬥爭，並沒有否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別在別的地方講的。……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全國勝利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後頭為甚麼不提了？就是因為事實上在那裏做了，革命已經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了。」又說，那時「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這些講話表明，毛澤東在內心已經拋棄了八大決議，實質上也否定了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那些解釋的話，只是安撫人心和文「過」飾「非」而已。[8]

八屆三中全會沒有直接否定八大決議，但並非毛澤東不想否定，只是需要時間。1957年底和1958年初，毛澤東看到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在黨的會議上的報告後，非常興奮，立即組織討論修改，並指示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這兩篇文章都強調指出：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完全結束；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

鬥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階級鬥爭可以表現為敵我矛盾，但大量的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9]最後，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宣布：「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經驗再一次表明，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但是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10]至此，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被徹底背離，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則成為中共執政的思想綱領。

在八屆三中全會前後，毛澤東對人民內部矛盾學說和階級鬥爭理論最引人注目的補充就是關於敵我矛盾和階級矛盾之間關係的論證。「階級矛盾內有敵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判斷。社會主要矛盾既可以說是階級矛盾，又可以說是人民內部矛盾；使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既可以處理敵我矛盾，又可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更何況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之間、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間還可能隨時轉化，這個沒有說清也說不清的理論叫廣大幹部如何理解，如何把握，如何實踐？顯然，毛澤東的目的之一，是想通過對主要矛盾和階級鬥爭理論的重新闡釋，說明開展反右運動的必要性，並對黨內整風何以突然轉為反右運動這個困惑全黨全民的問題找出理論根據。八屆三中全會是接受了毛的理論，但對於解決實際問題並沒有起到甚麼作用。哪些問題算敵我矛盾，哪些問題算人民內部矛盾，甚麼時候人民內部矛盾就轉化成敵我矛盾了，甚麼時候敵我矛盾又可以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沒有人搞得清楚。但有一點已經肯定了，這一切都是階級矛盾，都在階級鬥爭的範圍內。既然階級矛盾成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那麼運用階級鬥爭的法寶便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了。這就是反右鬥爭的理論成果，也是毛澤東從反右運動中得出的主要結論。

2 對右派分子處理的原則和結果

如果說發動反右運動是階級矛盾轉化理論的第一次實踐，那麼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則第一次體現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一原則。青島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處理右派的原則：一是「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一是「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除了少數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11]鄧小平在7月23日的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對於右派問題，「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再說」，「但要積極做準備工作，統戰、宣

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12]7月2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核批准。[13]8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這個決定。按照〈決定〉的說法，所謂勞動教養，既是「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人民日報》同時發表社論解釋說：「對於這些壞分子，一般地用說服教育的辦法是無效的；採取簡單的懲罰辦法也不行：在機關、團體、企業內部也決不能繼續留用；讓他們另行就業又沒有人願意收留他們。因此，對於這些人，就需要有一個既能改造他們，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辦法。根據人民政府長期的研究和考慮，把他們收容起來，實行勞動教養，就是最適當的也是最好的辦法。」[14]無論「勞動教養」是不是「長期的研究和考慮」的成果，但確是為右派處理問題而出台的，因為毛澤東已經發話：絕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要送去勞動教養。

8月29日，針對四川急於對一些右派分子進行處置的請示，中共中央下發了一個文件，指示各地黨委，「對於右派分子的鬥爭，應是從政治上和思想上進行徹底揭露，把他們搞臭，但還不宜過早地作組織處理，因為這樣做會使鬥爭簡單化，不利運動的深入和開展」。[15]但是，反右鬥爭進展很快，特別是青島會議以後，右派分子的數量迅速增長，對他們進行批鬥以後，究竟如何處理，各單位都不得而知。重慶市反映，全市揪出的右派分子估計將達到五千人，「如何管教和處理這批人是目前急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各單位一般都希望把這些右派分子送勞動教養營管教。但勞動教養營何時成立，能否能容下也是一個問題。對這批人進行處理的政策標準，不少單位還不明確，希望中央早日訂出具體的處理辦法，並希望愈具體愈好。」[16]但中央的處理方案遲遲沒有拿出。直到三個月後，12月2日至16日，第九次全國統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才做出了一些規定。會議討論了統戰部提出的〈關於處理五個方面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則規定〉、〈關於民主黨派處理右派分子的原則規定〉、〈關於幫助民主黨派改組織各級領導機構的意見〉和〈關於人民代表大會、政協各級委員會安排民主人士的通知〉等文件。[17]在此期間，12月8日毛澤東邀請一批上層民主人士商談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12月10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研究了處理右派問題的原則。[18]

作為處理右派分子問題的試點，12月初中宣部、統戰部和北京市委分別向中共中央報送了三個具體方案。

中宣部負責處理的是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界比較著名或重要的右派分子五十九人，分為五類。（一）開除二人：呂班、徐燕蓀。（二）監督勞動十一人：郭維、彭子岡、鍾惦裴、陳企霞、吳祖光、陳

明、李又然、徐懋庸、劉賓雁、劉紹棠、藍鈺。（三）留用察看八人：蔣元椿、李慎之、蕭乾、沙蒙、朱啟平、馮亦代、楊建中（藍翎）、李庚。（四）撤銷全部職務，另行安排工作十人：羅烽、袁毓明、陳模、丁聰、戈陽、張伯駒、曹寶祿、黃苗子、曾彥修、章錫琛。（五）撤銷大部分或者一部分職務，保留一部分職務，降職或者降級二十八人：丁玲、馮雪峰、艾青、楊思仲（陳涌）、舒蕪、孫家琇、江豐、葉恭綽、龐薰琴、彥涵、李宗津、王雪濤、王曼碩、莫樸、王遜、鄭可、新鳳霞、葉盛蘭、李萬春、連闊如、劉雪庵、張權、鍾敬文、穆木天、黃藥眠、徐鑄成、儲安平、浦熙修。[19]

統戰部負責處理民主人士五十人，分為五類。（一）撤銷一部分職務，保留或安排一部分職務，降職、降級、降薪四十六人：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龍雲、陳銘樞、黃紹竑、黃琪翔、譚惕吾、曾昭掄、錢端升、錢偉長、費孝通、李伯球、儲安平、薛愚、林漢達、沈志遠、徐鑄成、畢鳴岐、馬哲民、潘大逵、黃藥眠、吳景超、潘光旦、浦熙修、李宗恩、劉王立明、范予遂、陸佩如、彭文應、王造時、宋雲彬、王毅齋、謝家榮、張軫、葉恭綽、袁翰青、陳達、龔自知、向德、錢孫卿、向達、金寶善、程星齡、傅種孫、韓兆鶚。（二）撤銷一部分職務，開除民主黨派黨籍，保留或安排一部分職務，降職、降級、降薪一人：羅翼群。（三）撤銷一切職務，留用察看一人：顧執中。（四）撤銷一切職務，開除民主黨派黨籍，留用察看一人：陳時偉。（五）撤銷一切職務，開除民主黨派黨籍，依法處理一人：孫大雨。同一類別中也有較大差距，如章伯鈞從三級降至六級，羅隆基從四級降至九級，章乃器最頑固，從四級降至十級。[20]

對於高等學校教師的處理最複雜，以高級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北京市為例，擬分九種辦法處理三十一人。（一）開除三人：樓茂盛、周大覺、曹寶源。（二）監督勞動二人：英若聰、麥百平。（三）留用察看二人：杜恆儉、胡稼胎。（四）撤銷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工作三人：李景漢、朱啟賢、王衍臻。（五）保留教師職務，撤銷全部或大部分其他職務，降級、降薪十二人：錢偉長、費孝通、吳景超、向達、黃藥眠、錢端升、穆木天、李宗恩、金寶善、孟昭英、黃萬里、傅種孫。（六）保留教師職務，撤銷大部分其他職務，不降級二人：李歐、薛愚。（七）免予行政處分一人：鄭立人。（八）按反革命分子逮捕法辦四人：徐璋本、葛佩琦、郎郎天、曹垂訓。（九）按反革命分子開除並判處管制二人：王德周、何挺杰。[21]

根據上述報告，統戰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有關部門、學校、團體協商」後，提出了〈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195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個文件，並說明選擇出來的

這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為各地的「參考標準」。對這些「標兵」分六類進行處理，（一）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四人）：羅海沙、劉漱滄、徐燕蓀、陳時偉。（二）撤銷原有職務，監督勞動（七人）：陳企霞、徐懋庸、鍾惦棐、呂班、彭文應、蕭乾、吳祖光。（三）撤銷原有職務，留用察看，並降低原有待遇（九人）：王翰、李世農、羅翼群、李世軍、馮亦代、吳金萃、李萬春、王恆守、顧執中。（四）撤銷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十七人）：沙文漢、曾彥修、謝雪紅、賈潛、艾青、譚惕吾、陳仁炳、丁聰、彭一湖、王一鳴、李康年、姚順甫、王造時、張雲川、王一帆、儲安平、謝白寒。（五）撤銷一部分或大部分職務，降職、降級、降薪（五十七人）：丁玲、馮雪峰、江豐、龍雲、陳銘樞、黃紹竑、龔自知、張軫、范予遂、章伯鈞、羅隆基、曾昭掄、錢端升、錢偉長、費孝通、韓兆鶚、沈志遠、潘大逵、馬哲民、王毅齊、宋雲彬、黃藥眠、潘光旦、吳景超、費振東、浦熙修、陶大鏞、徐鑄成、劉王立明、龐薰琴、陸詒、陳達、章乃器、畢鳴岐、向德、錢孫卿、潘鍔章、劉一峰、向達、梅汝傲、雷天覺、傅種孫、林漢達、吳文藻、黃琪翔、李伯球、葉恭綽、李宗恩、李士豪、鄧昊明、薛愚、孟昭英、袁翰青、陸侃如、金寶善、謝家榮、董渭川。（六）免予處分（二人）：翟大陸、金芝軒。[22]

對比上述名單可以發現：一、原報送方案有「依法處理」的七人，中央批覆的方案中取消了這一類別。這些人當然還是要法辦的，但列入「標兵」就有違反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原則之嫌，同時也避免「上行下效」、過多使用刑罰。二、原報送方案中沒有「勞動教養」一類，中央批覆的方案中恢復了這類處理辦法，但列入名單的只有四人。主要原因大概是原來考慮對右派分子實行「勞動教養」時，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多人。現在一下子把幾十萬人送去教養，恐勞教營「人滿為患」，只得作罷，保留幾個作為最嚴厲的處罰，以儆效允。[23]三、對大部分列入「標兵」的人的處理結果與原報送方案相同，但在變動處理辦法的人中，只有呂班一人從開除公職降為監督勞動，其餘多數人都「罪加一等」，如陳時偉、彭文應、蕭乾、羅翼群、李萬春、艾青、譚惕吾、丁聰、王造時、儲安平等。由此可知，中央對大右派是沒有手軟的。

195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並下發了關於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定。1958年1月30日該規定經過修改又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下發執行。按照這個規定，處理方針還是「嚴肅和寬大相結合」，但特別提出，對於歷史上有過貢獻和在社會上影響較大的人，以及知識分子中確有真才實學的、特別是從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工作的人，「在處理時也應當比一般人寬些」。對國家給薪人員六類處理辦法的具體規定

是：（一）情節嚴重、態度惡劣的，開除公職，實行勞動教養。（二）情節嚴重、但表示願意悔改，或情節雖十分嚴重、但態度惡劣的，撤銷原有職務，送農村或其他勞動場所實行監督勞動。（三）情況與第二類相似，但由於本人在學術、技術方面尚有專長，工作上對他還有相當需要，或者本人年長體弱，不能從事體力勞動的，撤銷原有職務實行留用察看，並降低原有待遇。在上述第二類和第三類情況下，如本人既不願接受監督勞動，又不願接受留用察看，則應開除公職，令其自謀生活，並由其家庭和所屬居民委員會負責在政治上加以監督。（四）情節較輕的，或情況雖與第一類第二類相似、但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需要加以照顧，撤銷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五）情節較輕、或情況與第一類第二類相似，而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或在學術、技術方面有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慮的，實行降職降級降薪。如原有兼職較多，應撤銷其一部分或大部分職務。（六）情節輕微，確已悔改的，可以作為中右分子處理，免予處分。對大學生中的右派分子按下列辦法處理：（一）一般應開除學籍，但可選擇個別「反面典型」在開除學籍後留校監督勞動。（二）情節較輕，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留校察看，繼續學習。其中情節輕微，並積極參加反右鬥爭的，免予處分。（三）國防、外交等機密性專業中的右派分子，一律開除學籍。其中情節較輕，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令其轉學或轉系。（四）被開除學籍的右派分子，可以回家謀生的，由家庭和所屬居民委員會或生產合作社負責在政治上加以監督；沒有生活出路的，實行勞動教養。[24]

關於高等學校學生中右派分子的處理，中共中央1月19日又重新作出規定：一、開除學籍的，應該限於群眾所痛恨的情節特別惡劣和拒不悔改的極右分子。開除的數目不要多了，應該是極少數。開除學籍後可以實行勞動教養。二、保留學籍，送農村或者其他方面實行勞動察看的，應該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三、留校學習察看和免予處分的，兩類合計，應該佔百分之七十左右。[25]關於中小學教師中右派分子的處理，2月28日中共中央又補充，「小學教師中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原則上應當同其他系統有所不同，就是要使其中的大部分（百分之七十左右）離開學校另行安置」。中學教師中的右派分子「離開學校的比例則可以減到佔右派分子的半數左右」。[26]

上述關於右派分子處理的規定和意見，當年都是由各地區、各單位上級領導者掌握，未曾與被處理者見面。他們能否正確地和準確地按照這些原則辦事，已無從考察。不過，有一個情況很能說明問題。在五十五萬右派之外，還有大量的「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以及無法統計的受株連家屬。他們「雖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處分比右派還嚴重」，其中僅「失去公職」者就有十六萬人。[27]整風時的批評者

現在成了被審判者，而審判者就是原來的被批評者，「遊戲規則」既如此，其後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當然，根本的問題還不在這裏。這些處理意見之間的區別，主要涉及的是被處理者的物質待遇和物質生活，而他們之間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殘，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右派分子後來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列「黑五類」，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他們在精神世界已經淪落到社會最底層，其痛苦和壓力，絕不是改變一下處理方式就能夠解除的。章伯鈞的女兒回憶她的父親說：「劃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裏無法安放，以致那副軀殼對於靈魂似乎都是『異己』的。蹐天跼地，拘手攣腳。肉體的不自由，伴以心靈的不自由。人作為『人』被有形、無形的外在力量所剝奪。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內心生活）留給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拋棄之外，父親一無所有。他看到的是頭頂上的一塊天空，面對的是一個妻子兩個女兒。」[28]

關於反右運動以後中國社會的階級劃分，毛澤東在成都會議和東湖會議曾反覆談過。他認為，「現在中國有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所謂「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中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即「國內的國民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代理人」。這部分人是敵人，毛估計大約有三千萬；還有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這部分人大約有四千萬，其中大多數（九成以上）是中間派。所謂「兩個勞動階級」，一個是工人，一個是農民。就「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形勢」而言，「基本戰役已經過去了」，「三十萬右派搞臭了」，知識分子也被封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他們沒有資本了。不過，「一定要估計反覆。要估計還要出甚麼大問題，如國際出甚麼問題，世界大戰，大災荒，右派可能還會作亂，中間派還會出亂子的」。[29]看來以後也不會安寧了。一場政治運動，增加了幾十萬敵人，又增加了一個剝削階級，哪裏還會有甚麼「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反右派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又一次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群眾運動，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後一次。不過，在中共八大作出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的判斷之後，再次把階級鬥爭作為全黨關注的焦點，並依靠群眾運動取得鬥爭的勝利，反右運動確實為以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樹立了「光輝榜樣」。難怪人們常說：1957年反右運動是1966年「文革」運動的預演。到1958年夏天，反右運動這場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在「大躍進」的鑼鼓喧天中漸漸銷聲匿跡了，代之而起的是在階級鬥爭基礎上發動的經濟運動。不過，發起這次運動的號角不是在中國，而是在莫斯科吹響的。

[1]江蘇師範學院助教王文昌遭到批鬥後，以死表達了這種要求。他在自殺前留下的絕命書中稱：「對整個人類社會不滿，對整個世界感到極端絕望。我要求做自由的人，麵包雖是重要，但民主自由更神聖偉大。」參見《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匯編》（五）。

[2]雍濤：《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頁122。

[3]《毛澤東傳（1949—1976）》，頁717—71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24。

[4]《人民日報》，1957年10月19日。

[5]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5，頁1—5、18—24。另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25—626。

[6]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5，頁52—55。

[7]《毛澤東傳（1949—1976）》，頁718—72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27—629。

[8]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75。在發表的毛澤東這個講話中，談到關於八大決議對主要矛盾的論斷時，編輯者把「這句話說得不夠完善」改為「這種提法是不對的」，可說是理解毛澤東的真諦了。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71—673；《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8日、1958年1月25日。

[1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288。

[1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56；青島會議發言（記錄稿），1957年7月17—20日。

[12]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第38次會議），記錄稿，1957年7月23日。

[13]《人民日報》，1957年7月27日。

[14]《人民日報》，1957年8月4日。

[15]雲南省檔案館，2-1-2736，頁92—94。

[16]《內部參考》，1957年9月10日，頁10—12。

[17]羅廣武編：《民主黨派大事年表》（北京：華文出版社，1998），頁63。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05—106。

[19]云南省檔案館，2-1-2739，頁125—194。

[20]雲南省檔案館，2-1-2739，頁6—63。

[21]云南省檔案館，2-1-2739，頁64—67。

[22]雲南省檔案館，2-1-3197，頁24—27。

[23]「勞動教養」後來成為中國一種特殊懲罰措施，主要用於年齡或行為不夠法律處罰標準的那些人。

[24]雲南省檔案館，2-1-2739，頁2—5；2-1-3195，頁1—3。

[25]雲南省檔案館，2-1-3195，頁10—11。

[26]雲南省檔案館，2-1-3195，頁8—10。

[27]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門〈關於繼續執行中央（1978）55號文件幾個問題的請示〉，1979年9月10日。轉引自華民：《中國大逆轉》，附錄，頁411—412。

[28]章詒和：〈越是崎嶇越平坦〉，載《沒有情節的故事》，頁273。

[29]毛澤東在成都會議講話（記錄稿），1958年3月26日；毛澤東在東湖會議講話（紀要草稿），1958年4月6日。

第十章
東風吹來：毛澤東在莫斯科指點江山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確認已經取得「整風反右」的偉大勝利後，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飛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同時出席14至16日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16至19日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這兩次會議在歷史上簡稱「共產黨莫斯科會議」。幾乎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都派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在報紙上公開亮相的有六十四個國家。[1]會議發表了由十二個執政黨（南斯拉夫除外）簽署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共同簽署的〈和平宣言〉。這是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誕生以來，全世界共產黨人召開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一次盛會，也是空前絕後的一次盛會。[2]會議前，《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展望未來，豪情地宣稱：「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必將退出世界歷史的舞台，社會主義勝利的凱歌必將在全世界響徹雲霄，而這一天的到來已經不會太久了。」[3]

最近披露的檔案和回憶史料表明，召開各國共產黨協商會議，以及在會議上發表一個共同宣言的主張，都是中共提出來的。不僅如此，在會議準備和召開的過程中，毛澤東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獨特的作用和影響，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為這次會議的幕後總導演。[4]如果說中共在波匈事件期間還只是協助蘇共處理東歐問題，那麼在莫斯科會議上，中共已經與蘇共平起平坐，並列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1957年底中蘇之間的同盟關係達到了頂峰，這次會議無疑就是中蘇兩黨緊密配合的經典之作。但是，筆者還注意到，莫斯科會議過後不久，中蘇同盟便出現了裂痕，並很快發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爭論和分歧的，恰恰是對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首先指責對方的，也恰恰是對莫斯科會議路線的背叛。[5]這就是說，莫斯科會議成為中蘇關係發展的歷史轉折點。

[1]實際上出席會議的有六十八個黨，其中四個黨（如美國共產黨）由於在國內所處的特殊環境，沒有公開亮相，也沒有在〈和平宣言〉上簽字。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98—9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编：《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723。

[2]1960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雖有八十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參加，但中共領袖毛澤東沒有出席，且此時中蘇兩黨已經是面和心不和，湊在一起，不過是對內吵架，對外裝裝門面而已，無論如何，這次會議與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不可同日而語。

[3]《人民日報》，1957年11月6日。

[4]關於莫斯科會議及中共在會議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了一些回憶錄外，目前很少看到有專門的研究成果。《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設專節講述了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活動，引用了不少中國檔案，很有史料價值，但主要是毛的一些談話，其他涉及不多。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一書也有一章講莫斯科會議，但重點在分析會議中爭論的問題，而對會議的籌備過程語焉不詳。莫斯科會議究竟是怎樣提出的，如何召開的，至少目前在各國的研究論著中還沒有說清楚。

[5]參見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372—464。

一 中蘇同盟的蜜月及其隱憂

1954年到1957年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時期。就推動雙邊關係而言，在這一時期蘇聯發揮了更為主動的作用，而中國方面的響應也非常積極。如果說在斯大林執政時期中蘇友好關係主要表現為政治和軍事的合作，那麼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中蘇合作則突出地表現為蘇聯對華經濟援助及中共對蘇共的政治支持。

1 蘇聯對華經濟援助

朝鮮戰爭大大提高了毛澤東和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影響，對此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赫魯曉夫在其登上權力寶座的過程中便開始注意調整對華政策，其中最大的貢獻就是在經濟上加強對華援助。

赫魯曉夫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督促蘇聯有關部門盡快確定和落實對中國一五計劃時期的援建項目。在1952年8至9月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斯大林在原則上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要求，答應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具體項目需待蘇方有關部門審查兩個月後再行協商。[1]由於中方提出的項目龐大而繁雜，要求的設計和供貨期限又短，特別是原始資料和基本數據準備不足，以及缺乏外交談判的經驗，以李富春為首的中國代表團與以米高揚為首的蘇聯代表團之間的談判進展十分困難。[2]直到1953年5月15日雙方才簽署了《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決定在1953年至1959年內，援助中國建設和改建91個企業，同時完成1953年4月以前蘇聯援建的51個企業，共為141個企業。李富春後來報告說：「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如果沒有蘇聯的上述幫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規模和速度，同時我們將會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難」。[3]

然而，簽署協定並不等於援助項目的實施，因為還有許多細節沒有落實，蘇方需要對援建項目逐一進行實地考察，[4]特別是中方在協定簽字後又不斷對設計任務書提出一些重大的補充和修改意見，還需要進行各方面的具體談判。[5]按照原定的時間，一五計劃在1953年9月應該已進入實施階段，但中蘇協定的執行還遙遙無期。1954年初，毛澤東下了「軍令狀」，要求國家計委從2月25日起用一個月的時間拿出一五計劃的粗稿。國家計委要求延長時間，毛澤東只給了五天寬限。4月15日，經陳雲整理的計劃初稿交給了毛澤東。[6]

即使到這時，中蘇之間仍有許多具體問題無法確定。1954年4月上旬，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途經莫斯科時會見了赫魯曉夫，請他催促加快援建中國項目的談判步伐。第二天，赫魯曉夫便召見了負責談判的米高揚和科瓦利，詳細詢問了談判進展情況。他「幾乎重新審理了每個工程項目」，並要求提出難以完成這些項目的全部理由。在討論中，儘管科瓦利一再提請注意，對於如此龐大的援建項目，蘇聯本身能力有限，赫魯曉夫卻總是「毫不客氣和毫無根據地拒絕聽取」。科瓦利的印象是，這位第一書記看到的只是外交意義，他決心從政治上解決對蘇聯來說非常複雜、在技術上還沒有解決的經濟問題。最後，赫魯曉夫指示要加快與中國代表團的談判步伐，以便蘇聯領導人盡快審理與中國的各項協議草案。此後，蘇聯各部委的談判態度都發生了極大變化，很多草案得以順利通過，根據米高揚的建議，熟悉中國情況的費德林（Fedorenko）代表外交部參與了有關經濟協議的起草工作。[7]

對於中國方面提出的修改和補充意見，赫魯曉夫的反應也十分積極。1954年7月，中國提出：在蘇聯援華企業的設計工作和設備供應的範圍和期限方面，有一些修正和補充，還請求蘇聯再幫助建設一些新的企業。赫魯曉夫立即給予答覆：「滿足中國政府的請求」。不僅將協定設計工作和設備供應的總值增加了3.5至4億盧布，而且主動建議在目前中國正在建設的一些企業裏，用蘇聯新改進的幾種軍事技術代替原協定的規定。[8]此外，赫魯曉夫為向中國國慶獻厚禮，還多方奔走，四處游說，促成了一批新的援助項目，如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141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新建15個工業企業；向中國提供5.2億盧布的軍事貸款；將中蘇合營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屬公司、大連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蘇聯股份完全轉讓給中國；幫助中國修建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及組織中蒙、中蘇鐵路聯運，以及決定蘇軍提前從旅順海軍基地撤退並無償地將基地歸還給中國等等。[9]

為了幫助中國實現經濟發展計劃，蘇聯從1954年開始大量派遣技術顧問和專家來華工作。據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估計，中國聘請的技術專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兩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還要多些」。[10]筆者曾對來華蘇聯專家的人數做過詳細研究和分析，結論是：從1949年8月劉少奇攜第一批蘇聯專家回國，到1960年8月蘇聯撤退全部專家，十二年中在中國工作的各方面顧問和專家總計約18000人，其中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前約5000人，但其中軍事方面的顧問和專家比例很大（約2000人），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約11000人，1959至1960年只有不足2000人。[11]這個統計分析證明，在華蘇聯專家的人數變化，確實可以看作是中蘇關係的晴雨表。一些具體數字更能說明問題，據蘇方統計，僅在1954至1957年為工業項目來華的蘇聯

專家就有近5000人，其中1954年983人，1955年963人，1956年1936人，1957年952人。[12]據蘇聯外交部的報告，除協議期滿回國者不計，1956年底在華工作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為3113人。[13]另有統計數字顯示，1955年來華技術專家猛然增長（46%），以後兩年又分別遞增80%和62%，1957年人數最多，此後大量減少。[14]顯然，1956年和1957年是蘇聯專家在華人數的最高峰時期。而這一時期，恰恰是中國完成一五計劃最後和最關鍵的時期。

蘇聯向中國提供的科學技術資料及相關幫助也是十分客觀的，根據1954年10月12日簽訂的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1950年至1959年，蘇聯無償地（只收取複印費）向中國提供的科學技術文件共計：整套技術設計文件31440套，基本建設方案3709套，機器和設備草圖12410套，整套技術文件2970套，整套部門技術文件11404套，其中1955至1958年分別為25896套、3359套、9837套、2678套、10022套，均佔總數的70%至90%。[15]此外，1954至1957年蘇聯還向中國提供了4261個教學大綱、4587項工業製品的國家標準，以及按優惠出口價格為中國設計和製造的221個儀器、設施、設備樣品。在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把對社會主義國家科學技術援助總數的一半給予了中國。[16]

正是由於蘇聯的幫助，中國才得以全面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此期間，中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總產值）以每年遞增11.3%的速度發展。以156項重點建設項目為核心，以限額以上的694個（至1957年為992個）建設項目為骨幹的基本建設全面展開。[17]到1957年止，蘇聯和東歐各國幫助建設的項目，全部和部分建成投產的分別為68個和27個。由此形成了中國第一批大型現代化企業，大大增強了中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能力，填補了一批生產技術領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國民經濟的工業技術基礎。一五計劃期間各基礎工業部門（煤炭和化學工業除外）和國防工業新增的生產能力中，有70%至80%是蘇聯援建的，有的行業甚至是100%。而且，蘇聯幫助新建和擴建的都是規模比較大的企業，引進的成套設備在當時也都是比較先進的，有的甚至在蘇聯是最先進的。[18]

如此規模的援助，對於蘇聯當時的經濟實力來說，確實是一個相當沉重的負擔。有俄國學者算過這樣一筆賬：根據俄國檔案記載的數字，蘇聯援華建設項目的出口總值為94億盧布，其中設備出口值84億盧布，技術援助出口值10億。這筆資金約佔1959年蘇聯國民收入的7%，當時在蘇聯可以修建268萬個公寓，在很大程度上為國內城鎮居民解決困擾已久的住房問題。[19]應該說，蘇聯為援助中國經濟發展，付出是巨大的。

對於蘇聯的真誠幫助，中國領導人心中有數。儘管蘇共二十大以後

毛澤東提出了「以蘇為鑑」的問題，但那只是就經濟建設的方式和方法而言，絲毫沒有涉及對中蘇關係的看法。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以後，確實在一些基層幹部和群眾中引起對蘇聯理論和經驗的質疑，甚至有對蘇聯專家不尊重的表現。對此，蘇聯方面也有所察覺。[20]中共中央立即出面糾正這種偏差。中宣部於1956年6月20日召開了一次文教部門負責人會議，中宣部長陸定一在會上強調指出，「學習蘇聯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學」，這是歷史條件決定的；如果在學習蘇聯經驗方面出現問題，「應該歸咎於我們自己的教條主義，而不應把責任完全推到蘇聯同志身上」。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陸定一的報告，要求凡聘有蘇聯專家的單位，「參照中央宣傳部的報告進行一次研究，如有問題應迅速加以解決」。[21]1957年2月25日國務院也向全國批轉了外國專家局的一個報告，強調「向蘇聯學習，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在我們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的時候，決不應當產生任何輕視蘇聯經驗的錯誤思想」。[22]

總之，在1956—1957年，中蘇友好關係並沒有出現甚麼問題，連毛澤東本人也多次向蘇聯人指出這一點。[23]不僅如此，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的親密關係更進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領域的合作發展。

2 毛澤東為赫魯曉夫雪中送炭

1957年的中蘇關係更上了一層樓。如前所述，中共協助蘇聯解決了波蘭和匈牙利危機，這不僅令赫魯曉夫大大鬆了一口氣，而且也對中共產生了感激之情。對於劉少奇的訪問和周恩來的穿梭外交，赫魯曉夫感到「非常滿意」，儘管他對中共的批評有些耿耿於懷。[24]中共中央在4月7日的一個通知中指出：「中國和蘇聯的友好團結，是社會主義國家偉大團結的最重要的因素。繼續不斷地加強中蘇友好，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乃是我國人民最高的國際主義責任。」[25]

然而，東歐的喧鬧剛剛過去，蘇聯國內又爆發了更大的危機，毛澤東再次為赫魯曉夫雪中送炭。

二十大以後，蘇共領導層內部逐步形成了兩個派別集團。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等人構成了赫魯曉夫的反對派，並在主席團內形成多數。而赫魯曉夫周圍聚集了一批年輕的主席團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他的支持者構成了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到1957年夏天，雙方的矛盾因主席團改選日期臨近而開始激化，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否繼續貫徹二十大路線。6月18日，在違背赫魯曉夫意願舉行的主席團會議上，大多數成員堅持要求由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主持會議，而剝奪了本應該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權力。會議對赫魯曉夫

提出了大量指責，並以七比四的票數通過了免去赫魯曉夫第一書記職務的決定。面對這預先策劃的突然打擊，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蘇斯洛夫、米高揚等人採取了拖延戰術。赫魯曉夫在第二天繼續舉行的主席團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從各方面檢討自己，暗中卻布置國防部長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謝羅夫緊急動用軍用運輸機，將一批中央委員運到莫斯科。這些經過專門挑選的約二百名中央委員強烈要求參加主席團會議，並召開中央委員會討論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的改選問題，朱可夫甚至揚言可能會動用武力來迫使主席團就範。面對突變的形勢，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讓步，中央委員會非常全會於6月22日開幕。在持續了八天的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完全掌握了主動權。在十二次全體會議上，有六十人發言，其他出席者均提交了書面發言或聲明，一致譴責莫洛托夫等人的「反黨行為」。會議通過了〈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莫洛托夫棄權），決定把他們開除出中央委員會。[26]

突發事件過後，取得勝利的赫魯曉夫卻遇到了來自全黨的壓力。在蘇共基層討論中央全會決議的過程中，參加者非常踴躍。據統計，僅在俄羅斯聯邦就有371.15萬人參加了黨的秘密會議，佔該共和國黨員和預備黨員總數的84.6%。在會議上發言的有71.35萬人。儘管像一般黨的會議一樣，多數發言者都表態支持中央的決議，但提出疑問和問題者也不在少數。很多黨員和群眾在會議發言中表現出驚慌和懷疑的情緒，他們很難理解所發生的事，很難相信存在着反黨集團。全國很多黨組織都把這看作是最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有的認為赫魯曉夫同莫洛托夫等人一樣應該對鎮壓活動負有責任，烏克蘭就有大規模的鎮壓；有的認為反黨集團的根本問題是妨害了赫魯曉夫為所欲為的特權；有的提出無法理解莫洛托夫會反對他本人和列寧一起締造的黨。很多地方在開會時爭吵激烈，氣氛緊張。有人要求讓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人在廣播或報刊上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有人甚至當場宣布，寧願被關進監獄和開除黨籍，也不同意中央的決議。不少單位的討論已經超出了黨所規定的範圍，如在很多大學，黨員們提出了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必修課程的考試，人們還對社會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出強烈不滿，甚至發生了砸汽車和跳樓自殺的事件。面對如此混亂的局面，有些州黨委不得不建議讓國家安全委員會出面進行干預。[27]

赫魯曉夫的麻煩不只來自國內，繼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後，蘇聯又發生如此驚天動地的事情，引起了各國共產黨的猜疑。儘管東歐各黨都先後在報紙表態擁護，但據中國使館發回國內的報告，「在波蘭的反應一般是冷淡的」，捷黨「多數表示不理解」，「整個保加利亞人也很難理解」，很多人甚至對赫魯曉夫的做法持批評態度。[28]蘇共新領導集

團必須有個明確交代，以取得國際支持，鞏固自己的地位。其中，最令赫魯曉夫擔心的是中共和毛澤東的態度。[29]就在六月全會召開前兩個月，莫洛托夫集團的主要成員伏羅希洛夫以國家元首的名義訪華，儘管只是一次禮節性訪問，[30]卻受到中國特別的禮遇和歡迎。還在伏羅希洛夫到來之前，北京就已經「披上節日盛裝」：從南苑機場到中南海，一路上豎起座座彩牌樓和高大的標語塔，前門箭樓上還懸掛着伏羅希洛夫和毛澤東的巨幅畫像。全國各地紛紛組織報告會、圖片展和電影晚會，宣傳中蘇友誼及蘇聯的輝煌成就。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和各地分會印了大量介紹伏羅希洛夫生平和蘇聯建設成就的小冊子，發給各界群眾。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禮賓司司長王倬如還專程前往伊爾庫茨克迎接貴賓。4月15日伏羅希洛夫到達那天，受到北京近百萬市民的夾道歡迎。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親自前往南苑機場迎接。伏羅希洛夫除在北京與毛澤東等多次舉行會談外，還到東北、上海、杭州、廣州、武漢各地訪問，一路都有中國最高領導人陪同，還受到熱烈的夾道歡迎。[31]

其實中共這樣做並無特別用意，只是為了扭轉中國民眾因波匈事件對蘇聯的不滿情緒。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中央認為：有必要在伏羅希洛夫同志訪華期間及其前後普遍地、大規模地進行關於加強中蘇友好、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宣傳工作，以顯示中蘇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和親密團結，並使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受到一次深刻的國際主義教育。」[32]但赫魯曉夫的感受可完全不一樣，這次接待蘇聯代表團的規模和氣氛遠遠超過他本人1954年的訪華，對此赫魯曉夫不能不感到擔心，他甚至通過費德林對伏羅希洛夫在中國的言行暗中進行監督和限制。[33]赫魯曉夫很清楚，他在莫斯科的舉動需要得到各國黨的支持，特別是中國黨和毛澤東的支持。

六月全會結束後，7月3日，外交部第一副外長巴托里切夫（Batolichev）接見各共產黨國家使節，介紹了中央全會情況。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和蘇聯對外文委主席茹可夫（Zhukov）又分別找到中國使館的陳楚和張映吾參贊，個別通報情況。[34]同時，蘇聯駐華使館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說阿布拉希莫夫（Abulashmov）臨時代辦受蘇共中央委託，要求緊急約見毛澤東，有重要事情轉告。毛澤東當時不在北京，劉少奇在中南海接見了阿布拉希莫夫。聽過情況介紹後，劉少奇表示，像馬林科夫、莫洛托夫這樣一些老同志犯了錯誤，能否採取別的辦法處理，還舉王明當選中共中央委員為例加以說明。最後，劉少奇答應將情況報告毛澤東。[35]當晚，蘇聯電台廣播了會議的決議和新聞公報，《真理報》編輯部在晚11時舉行兄弟黨國家記者的招待會，分發了這些文件。此前，蘇共中央已將相關文件寄給了各黨中

央。[36]

7月4日，《真理報》刊登了會議決議和新聞公報，同時刊出的還有民主德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意大利、法國、奧地利、日本、以色列、朝鮮各國黨支持蘇共中央全會決議的公開表態。[37]但是，包括中共在內的大部分黨，沒有表示自己的立場，這引起了蘇聯的注意。在當天的一次宴會上，《真理報》總編輯問中國記者，中國報紙發表了甚麼。當時中國的反應確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學生的說法很說明問題，他們說：對於蘇共中央的決議，「毛澤東不發表意見，我們也不發表意見；現在只有毛澤東說的才算對的」。[38]其實，中共中央對此事十分重視，7月4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召開會議進行研究。關於討論的內容，目前沒有任何材料，似第二天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傳達了中央的基本方針：從承認事實、分清兩派是非觀點出發，對新的蘇共領導機構只有支持」。[39]不過，此時莫斯科並不知道中共的態度，赫魯曉夫顯得有些焦急，感到必須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直接接觸，於是派米高揚立即飛往中國，聽取毛澤東的意見。

中共對蘇共中央六月全會決議的反應也非常強烈，特別是在中下層幹部當中，討論的熱烈程度絲毫不亞於蘇共黨員。上海市黨內外的普遍反映是：「從蘇共中央決議揭發的事實來看，反黨理由是不足的」，主要是「屬於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很多人認為對黨內分歧這樣處理「會給帝國主義利用」，「帝國主義一定會借這個問題挑撥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甚至中國的右派分子也會「混水摸魚」。天津市委會機關幹部聽到消息後，連夜討論，第二天上班後仍然議論紛紛。許多人對蘇共中央這種做法表示懷疑、驚訝和不滿，有人甚至提出希望中共中央進行干預。山東省級機關黨內外幹部的思想波動也很大，普遍懷疑蘇共決議，認為赫魯曉夫「小題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條反教條，以個人崇拜反個人崇拜」。廣州市幹部為蘇共中央決議可能引起的後果而感到焦慮不安，他們認為莫洛托夫等人是老布爾什維克，革命一輩子，想不到竟落到如此下場！二十次黨代會批判斯大林的結果是在東南歐和全世界引起了大混亂，這次會不會再次引起混亂？[40]

即使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意見後，仍有不少人表示懷疑。安徽省部分幹部對中共中央如此輕易地表態支持赫魯曉夫表示不理解。中共福建省委在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上傳達了中共對蘇共問題的態度後，大家都以沉重的心情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多數人認為，從團結的大局和既成事實的前提出發，應該支持赫魯曉夫，但不能無保留地支持，否則會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不利，也影響中共黨員對中央的看法。還有人認為蘇共新領導集團經驗不足，建議中央設法幫助蘇共解決這個問題。更多的人對此提出疑問：說莫洛托夫等人思想保守容易接受，但他們真的反黨

嗎？赫魯曉夫有沒有修正主義？這是否有宗派情緒？這樣大的事情為甚麼事先不和我黨商量？蘇共中央的決議引起了雲南省廣大幹部的義憤和不滿，省委傳達了中央電話會議上的精神後，許多同志表示思想不通，比較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可以支持蘇共的決議，但應對赫魯曉夫提出批評，可以支持蘇共的對內對外政策，但不應支持對莫洛托夫等人的處理辦法。[41]就連中國使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都認為：「反黨集團事件是蘇共中央使用組織手段處理黨內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實質來看是屬於黨內是非之爭，從公布的材料看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論證該事件有反黨的性質。」蘇共對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嚴重的組織處理是值得考慮的」。「這次事件繼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後第三次嚴重地打擊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的威信。」[42]

但毛澤東有他自己的考慮。7月5日下午7時半至次日凌晨3時半，毛澤東在杭州會見了米高揚，陪同會見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王稼祥、李維漢、胡喬木。會談足足進行了八個小時（中間吃飯四十分鐘），大部分時間是由米高揚介紹蘇共黨內的情況，毛澤東則不時地提問，最後發表了一些看法。

米高揚首先介紹了蘇共黨內兩派的現實分歧：赫魯曉夫主張擴大主席團人員，增加一些年輕委員，而莫洛托夫等人堅決反對，因中央全會臨近所以發難。接着，米高揚講述了斯大林去世後莫洛托夫在國內外一系列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見，其中特別詳細地介紹了在對待斯大林大清洗問題、個人崇拜問題、農業發展問題和對外政策問題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人的錯誤主張，以及他們參與迫害黨內幹部的活動情況。在米高揚講話過程中，毛澤東插話不多。談到莫洛托夫等人的錯誤時，毛澤東說：「這幾個人中間，莫洛托夫給我的印象不好，非常頑固。卡岡諾維奇給我的印象是比較好的。」談到蘇波關係時，毛澤東說：「中心的目標是要把波蘭保持在社會主義陣營裏面」，「對於蘇聯在內政、外交上的措施，我們是滿意的」。

米高揚談話大體結束後，毛澤東發表了幾點意見。關於莫洛托夫等人的錯誤，毛澤東說：「莫洛托夫我們比較清楚，他是守舊的。他們的小集團企圖更換領導，這是不利的。這時候應當加強領導。這不只是蘇聯一個國家的問題。過去我們替你們擔心，現在這樣解決了很好。」「他們是怕兩條：一條是主席團加人，一條是怕追究肅反責任。還有一個思想問題，舊的觀點不願有所變，這是他們犯錯誤的思想基礎。」關於對莫洛托夫等人的處理，毛澤東說：「我們黨內原來也有些同志們想，是不是把他們留在中央委員會裏面更好一些？如果再鬧事，再辦。現在看來你們是不得不這樣決定。現在拿出肅反材料，使大家激憤，但是肅反這樣的問題，主要的是取得教訓，不可太追究個人責任。」毛澤

東還提醒米高揚，要注意團結。關於中共的表態問題，毛澤東說，人們不明瞭內情，許多人不相信他們反黨。「這件事在我們黨內有些震動。我們已經採取了措施。昨天晚上，由劉少奇同志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支持你們的決議，並且用電話通知了各省省委。今天我們中央發了一個電報給你們，已經廣播了。」這時，毛澤東拿出致蘇共中央的電文交給米高揚，並讓閻明復翻譯給他聽。

米高揚聽了這番話，十分滿意，突然冒出一句顯然是討好的話：「朱可夫建議，在中國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的時候，由蘇聯給中國將領發勳章。」[43]據翻譯閻明復觀察，米高揚有些激動，「似乎心裏的千斤重負一下子都卸了下來」。在乘飛機返回北京途中，天氣驟變，飛機顛簸得很厲害，米高揚卻一臉輕鬆地對閻說，他完成了這個使命，即使是死也滿足了。[44]

7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蘇共中央全會的決議，7月6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電報：「我們相信，蘇共中央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這一決議，將有助於蘇聯共產黨的進一步的團結和鞏固。中國共產黨將堅定不渝地和蘇聯共產黨親密地團結在一起。」[45]7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真理報》7月5日社論〈黨的列寧主義的團結一致是不可摧毀的〉，以及各國共產黨支持蘇共中央決議的大量消息。

至此，赫魯曉夫終於鬆了一口氣。7月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聽取米高揚中國之行的情況通報。會議記錄很簡單，但看得出蘇共領導人很得意。米高揚匯報說，開始中共反對採取把莫洛托夫等人開除出中央的嚴厲措施，但最後「中國朋友對中央全會的決議感到滿意」，「認為做得非常好」。主席團會議因此一致認為，米高揚對中國的訪問是「有益的和必要的」。[46]米高揚在一次宴會上向劉曉表示了對中共的感激和欽佩之情，他說，他曾五次來過中國，比較熟悉中國的情況。他首次訪華時，蘇共領導人對中共還不夠了解，但他本人當時已看出中共馬列主義水平和蘇共一樣，只是經濟建設經驗差一些，並就此向蘇共中央作了報告。現在他認為，不論馬列主義和建設經驗，兩黨的水平都是一樣的。中共對蘇共的支持減少了蘇共工作中的困難，並表示目前蘇聯雖不富裕，但將盡力援助各兄弟國家。[47]

從政治觀點（特別是斯大林問題）看，莫洛托夫等人顯然與中共更為接近，而毛澤東卻偏偏選擇了支持赫魯曉夫。這固然有面對既成事實，從大局出發，維護中蘇團結的策略考慮，但也並非完全如此。首先，在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方面，赫魯曉夫的主張更接近中共。周恩來曾列舉蘇聯的工業、農業和國際政策說，「赫魯曉夫主要的基本方面是

對的」。[48]毛澤東也說：「按政策比較起來，還是赫魯曉夫比較好。」[49]其次，毛澤東對這種宮廷政變式的做法十分反感。中國外交部曾向駐外各使館就此問題發通報稱，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儘管在某些問題上的看法也可能有對的地方，但是他們的政治主張及推翻蘇共中央主席團領導的做法總的來說是錯誤的。[50]再者，毛澤東從個人感受出發，對莫洛托夫的印象確實不好。在10月29日與尤金談話時，毛澤東比較詳細地吐露了他的看法。據尤金記錄，毛澤東在長時間回顧了斯大林對待中共及他本人的態度後說，莫洛托夫的路線就是斯大林的路線，他在各個方面對待我們都不比斯大林好些。毛澤東回憶起1950年在莫斯科談判中蘇條約的情況說，那時「實際上更多是同莫洛托夫談，而他的表現常常像一個商人，在同我們討價還價」。毛澤東還談起前蘇聯大使羅申在中國收集情報的事情，認為這種做法不會不經莫洛托夫認可。毛澤東又講了一些其他對莫洛托夫不滿的話後總結說，希望蘇共中央能正確理解我們，中國人對莫洛托夫並沒有任何特殊的好感。儘管毛澤東也建議，考慮到莫洛托夫的威望，希望以後對他不要指名道姓地批評（至於馬林科夫和卡岡諾維奇，作為個人則不值得注意），但接着就強調，中共中央完全贊同蘇共中央六月全會的決議，這「不是因為憐憫莫洛托夫，人們反正以後會忘掉他的，而是考慮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利益」。毛澤東又補充說，中共中央曾幾次討論過蘇共中央內部的局勢，最後「認真負責地一致同意支持中央主席團中和赫魯曉夫同志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51]

看來，毛澤東反對莫洛托夫和支持赫魯曉夫都是真心誠意的。

3 赫魯曉夫對毛澤東投桃報李

赫魯曉夫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表態感激萬分，他後來曾經多次說過：在那個時候，我們很需要中國的聲音。[52]作為報答，赫魯曉夫主動提出增加對中國的援助項目，特別是答應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這就是10月15日簽署的中蘇《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這個協定的簽署表明蘇聯對中國核援助的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也是中蘇同盟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標誌。蘇聯走出這一步，的確是不容易的。

早在建國前夕，中共中央就對核技術表示出興趣。[53]1950年毛澤東訪蘇歸來後更感慨地談到，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54]但由於斯大林對中國實行技術封鎖，[55]再加上戰爭環境，以及國家財力有限等原因，中國政府決定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不列入研製核武器的準備措施。[56]

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時，主動問中方還有甚麼要求，毛澤東趁此機會提出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並希望蘇聯在這方面給予幫助。赫魯曉夫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沒有準備，稍做遲疑後，他勸說毛澤東應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不要搞這個耗費巨資的東西，並表示只要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行了。最後，赫魯曉夫建議，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小型實驗性核反應堆，以進行原子物理的科學研究和培訓技術力量。[57]赫魯曉夫雖然對中國的要求有所猶疑，但比斯大林還是進了一步。核武器與核反應堆的科學原理是一致的，從物理學的角度可以說，原子彈是爆炸的反應堆，而反應堆則是不爆炸的原子彈，所不同的是，反應堆是控制能量緩慢地釋放，用來產生動力，而原子彈則是在瞬間釋放出巨大能量，從而形成爆炸。至少在毛澤東看來，這是中國走向核武器研製的第一步。赫魯曉夫回國後不久，10月23日毛澤東便與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Nehru）興致勃勃地談起原子彈，並有意透露中國「正在開始研究」那個東西。[58]恰在此時，中國地質隊又在廣西找到了鈾礦，引起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59]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處擴大會議上說：「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甚麼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會議通過了代號為02的核武器研製計劃。[60]

固然，加強原子能研究可以成為研製核武器的技術基礎，但要實現這一步跨越卻絕非易事，這不僅需要具有各種特殊的設施、設備和儀器，更需要掌握從鈾分離、提純到核爆炸的一系列專門技術和工藝。美國和蘇聯跨出這一步用了五至七年，以中國當時的工業基礎和工藝技術水平，以及當時西方進行經濟技術封鎖的冷戰環境，要在同等時間裏試製出原子彈，只能依靠蘇聯的幫助。但是，蘇聯提供的核援助雖然規模不小，內容豐富，卻始終保持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範圍內。

蘇聯限制對中國提供核武器的技術，除了對中國不信任以外，還有一個客觀原因：當時蘇聯正熱衷於同英美討論停止核試驗的問題。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長謝皮洛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說，原子武器的試驗性爆炸應當毫不拖延地停止進行，這對於全世界人民來說是很重要的。蘇聯建議，或者美國、蘇聯和英國政府締結一個三邊協定，隨後由其他國家加入這個協定；或者通過上述政府各自發表正式聲明，保證自己不再進行原子武器和熱核子武器試驗。謝皮洛夫還宣布，蘇聯政府認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熱核子武器的試驗和實驗性爆炸的問題，締結蘇聯、美國和英國的三國協定。[61]1957年1月14日，蘇聯又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一份作為防止核擴散手段的片面禁止核試驗的提案。副外長佐林在大會上指出，擁有原子彈和氫彈的國家數量的任何增長都會使局勢複雜化。而蘇聯提案的實際結果是：即使一

個現在尚不擁有原子彈和氫彈的國家已經掌握了這些武器的生產秘密，並已擁有必需的材料，他也不能有效地試驗這些武器。[62]這個方案的提出，必然會影響到蘇聯對中國的核援助方針。

鑑於蘇聯的遲疑態度，中國決定在進行核武器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開始研製其運載工具——導彈。1956年1月12日彭德懷約見蘇聯軍事總顧問彼得魯舍夫斯基（Bidrushevskii）時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同意在中國工業發展速度已經提高的基礎上，加快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並打算研製火箭武器，希望蘇聯提供這方面的圖紙、資料。由於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魯舍夫斯基無法表態。1月20日彭德懷主持軍委第五十七次例行辦公會議，討論研究和製造導彈的問題，並決定向黨中央提出報告。彭德懷說：「目前即使蘇聯不幫助，我們也要自己研究。蘇聯幫助，我們就去學習。」[63]與此同時，解放軍訓練總監部代部長葉劍英、副總參謀長陳賡和剛從美國歸來的導彈專家錢學森也提出了中國自行研製導彈的問題。[64]3月14日，周恩來主持會議，聽取了錢學森關於在中國發展導彈技術的設想。會議決定，成立導彈航空科學研究方面的領導機構——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由聶榮臻任主任。5月10日，聶榮臻提出了〈關於建立中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中央軍委5月26日召開會議對此進行了專題研究，周恩來在會議上指示：導彈研究可以先突破一點，不能等待一切條件具備。立即抽調力量，組織機構，培養人才。[65]但蘇聯對中國提出的援助請求卻左推右擋，閃爍其辭。

1956年8月17日，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應聶榮臻的請求，寫信給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要求蘇聯政府在建立和發展導彈事業方面給中國提供全面的技術援助，並提議中國派政府代表團去蘇聯談判。[66]9月13日蘇共中央覆電稱：考慮到導彈技術的複雜性和中國目前缺乏幹部的情況，建議中國最好先從培養幹部開始，然後根據這方面培養專家的情況，再着手建立科學研究機構和生產企業。蘇共中央決定幫助中國進行導彈人才的培養，將派專家到中國學校去工作和授課。已經指示蘇聯有關機構把導彈專業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以及培養幹部所需要的教具、樣品及其技術說明送給中國。從1957年的新學年開始，蘇聯高等學校將設立小組，可以接受五十名中國留學生，以便培養導彈技術方面的專家。[67]

聶榮臻對此「大失所望」。他認為，培養幹部「當然也需要，但較我們原提要求相距甚遠。按照這個步驟，估計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在我國進行導彈的研究、試製和生產」，「這就大大地推遲了我國掌握導彈（包括無線電子學等新技術）的時間，對鞏固國防和提高我國科學技術水平都不利」。因此建議，在繼續與蘇聯談判的同時，

自力更生，積極籌建。[68]兩天以後，中共中央以聶榮臻代擬的電稿覆電蘇共中央說：為了盡快培養導彈方面的幹部，除了按照蘇共中央來電的意見，中國將在1957年新學年派去五十名留學生外，還打算將一批目前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轉到同導彈技術直接有關的專業去學習。同時，準備在中國幾個主要高等學校增設有關導彈技術的專業，希望蘇聯政府供給教學資料和教具、樣品，並派專家來華幫助進行教學工作。覆電還要求派代表團赴莫斯科進行談判。[69]但蘇方遲遲不予答覆。[70]

由於蘇聯的消極態度，加上第二個五年計劃考慮緊縮投資，迫使中方不得不考慮減少國防建設項目。聶榮臻和三機部部長宋任窮於1957年1月聯名致電在莫斯科訪問的周恩來，提出在原子能工業方面，第二個五年計劃只進行科學研究、地質勘探、生產氧化鈾和金屬鈾、建立一個原子反應堆和一個生產鈈的化工廠，而把製造原子彈的關鍵環節——生產濃縮鈾-235的擴散工廠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再考慮。[71]

直到1957年初，中共協助蘇聯解決了波匈事件的危機後，對於中國政府多次提出擬與蘇方進行談判，以解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究竟對中國的原子彈、導彈和飛機生產給予何種援助的問題，才有了一些結果。[72]1957年3月30日，中蘇代表在莫斯科簽訂了《關於在特種技術方面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援助的議定書》。議定書規定，蘇聯將派遣五名專家到中國，幫助進行教學組織工作，並在有關學校講授有關（火箭）噴氣技術的課程；按照噴氣技術課程制定和提交教育計劃和大綱；蘇聯有關高等學校在1957至1958年教學年度，接收五十名中國大學生；提交兩枚供教學用的P-1導彈樣品及技術說明書。中國政府將償付蘇方給予技術援助的有關費用，並保證承擔保密義務。[73]但這該協定執行得並不順利。

作為執行協定的條件，蘇方又提出很多要求。5月11日蘇聯經濟聯絡總局駐北京副代表加里寧（Galinin）少將會見聶榮臻時，傳達了蘇聯為了在噴氣技術方面幫助中國而需要了解的問題：一、中國在噴氣技術方面的具體方針；二、中國已有多少訓練出來的幹部和以後還可能訓練多少幹部；三、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規模、期限和設備，要求蘇聯援助的性質和範圍；四、中國可用來生產火箭技術的工業潛力，以及生產火箭武器所必需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業保證來源；五、在設計、生產和使用火箭武器時的保密條件和應有的制度。蘇聯方面也希望知道中國方面授權何人在莫斯科就火箭技術問題進行商談。6月18日，外貿部副部長李強再次向蘇聯駐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提出正式請求，阿爾希波夫答應請示政府後給予答覆。6月29日蘇方把皮球踢了回來，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商務參贊處來電稱：蘇方回覆，中方對阿爾希波夫和加里寧今

年5月提出有關火箭的一些問題，至今沒有答覆。蘇方希望以書面形式盡快地答覆他們提出的問題。在蘇方得到對問題的書面答覆後，再考慮邀請中國專家組來蘇具體商談。[74]看起來，隨着美蘇禁止核試驗、限制核擴散談判的深入，蘇聯政府在原子能和平利用與核武器研製之間所劃出的界限，是非常明確的。

正當中蘇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蘇聯發生了六月事件，中共中央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赫魯曉夫渡過了難關。於是，赫魯曉夫投桃報李，立即在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和導彈方面表現出積極性。鑑於原子能工業發展計劃尚未定案，需對1956年的中蘇原子能協定進行修改，7月18日聶榮臻再次寫報告給周恩來，希望政府出面與蘇方交涉。周恩來批示交外交部辦理。[75]令聶榮臻感到意外的是，這一次蘇聯的反應十分迅速，20日阿爾希波夫便答覆願就國防新技術援助事宜約定時間面談。22日聶榮臻來到阿爾希波夫的寓所。在客廳裏，兩個人都顯得很高興。阿爾希波夫對聶榮臻說：「元帥閣下，您上次提出的國防新技術援助的問題，我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權宣布：蘇聯政府同意在適當的時候，由中國派政府代表團去蘇聯談判」，並表示將圓滿答覆中國政府所提出的任何問題。[76]8月6日，周恩來致函布爾加寧明確提出：在原子能工業建成後，中國打算「進一步生產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擲工具，請蘇聯方面給予大力援助，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派一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蘇聯政府進行商談。」[77]這一次蘇聯立即答覆，表示同意。[78]

9月7日，中國談判代表團抵達莫斯科。代表團以聶榮臻、宋任窮、陳賡為首，還聘請了二十一名火箭、原子能、飛機、電子等方面的專家、教授當顧問，共四十多人。談判從9月9日開始，分成軍事、原子、導彈、飛機、無線電等五個組同時進行。中方的組長是陳賡、宋任窮、錢學森、張連奎、王諍，蘇方對應的組長是國防部副部長、中型機械工業部部長、國防工業部副部長、航空工業部副部長和無線電工業部第一副部長。儘管在談判中蘇聯方面還是有一些保留，但總體說來十分友好和熱情，蘇方代表團團長、國家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席別爾烏辛甚至在談判中認為中方提出的有些產品型號性能已經落後了，主動建議提出更新的產品型號。9月14日蘇方提交了協定草案，別爾烏辛對聶榮臻說：這種協定在蘇聯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託的朋友。希望中國政府能早日定案。聶榮臻召集代表團全體成員和顧問開會時說：蘇聯政府這次的確很熱情，很誠懇，很慷慨。中國得到這些援助後，再經過自己的努力，國防物質基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末將躍進到一個新的科學技術水平。[79]消息傳到國內，9月29日上午，周恩來委託彭德懷、李富春召集國防工業負責人會議進行研究。在聽取了宋任

窮和張連奎的匯報後，與會者一致認為，蘇聯提出的援助項目都是中國國防所必需的，因此積極表示贊成，並同意照蘇聯提出的協定簽字，簽訂後再從各方面繼續具體商談。[80]10月5日，周恩來致函劉曉並告聶榮臻：中央同意由聶榮臻代表政府簽訂蘇方所建議的協定。[81]

10月15日，中蘇正式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定共五章二十二條，根據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建立起綜合性原子工業；援助中國的原子彈的研究和生產，並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作為原子彈製造的關鍵環節，向中國出售用於鈾濃縮處理的工業設備，並提供氣體擴散廠初期開工所用的足夠的六氟化鈾；1959年4月前向中國交付兩個連的岸對艦導彈裝備，幫助海軍建立一支導彈部隊；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製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在1961年底前提供導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並派遣技術專家幫助仿製導彈；幫助中國設計試驗原子彈的靶場和培養有關專家等等。[82]鑑於有些工業援助項目的建設規模以及向中國交付設計和設備的期限等在協定中都未作具體規定，1958年9月29日又簽訂了《關於蘇聯為中國原子能工業方面提供技術援助的補充協定》（簡稱《核協定》），其中對每個項目的規模都做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項目設計完成期限和設備供應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確認，多數項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83]《國防新技術協定》和《核協定》是中蘇在核武器研製方面合作的一個里程碑，從此，中國的原子能工業「進入了核工業建設和研製核武器的新階段」。[84]在此之前，蘇聯對中國核工業的援助都非常小心地避開軍事用途，據中國核工業部編研室的工作人員談，在這次協定以前的文件檔案資料中，均未出現過核武器研製的字句。[85]另外，有關核工業方面的蘇聯專家，以前雖然是由軍隊系統負責聘請和管理，但其在華活動，除工作時間外，都是由外國專家局統一安排的。《國防新技術協定》簽字以後，所有涉及尖端技術的蘇聯專家再也沒有參加過外專局統一組織的活動。[86]由此也可以看出，《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確標誌着蘇聯在尖端技術方面對華援助的性質已經改變：蘇聯真正開始向中國提供原子彈和導彈研製方面的技術裝備援助了。[87]中蘇同盟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4 中蘇同盟內部的隱憂

1957年10月，在中蘇關係發展過程中還發生了兩件不大引人注意但並非不重要的事情——朱可夫被撤職和蘇中友協成立。就其結果而言，這兩件事與其說表明了中蘇友好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不如說顯示出赫魯曉夫進一步需要毛澤東的幫助更為貼切。

10月28日《人民日報》透露了一條簡短的消息：據塔斯社莫斯科26

日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解除了朱可夫的蘇聯國防部長職務。朱可夫元帥及其隨行人員是應邀到阿爾巴尼亞訪問後於26日當天回到莫斯科的。[88]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這裏面大有名堂。俄國檔案證實，這的確是赫魯曉夫精心策劃的一次行動。在6月「反黨集團」事件中，朱可夫憑藉其在軍隊中的影響，拯救赫魯曉夫於危難之中。但也正是朱可夫的一句話——「沒有我的命令一輛坦克都不能從原地移動」，令赫魯曉夫對日後朱可夫可能造成的威脅十分擔憂。莫洛托夫等人下台後兩個月，赫魯曉夫就開始了他的秘密計劃。他先派朱可夫到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進行長期訪問，然後在主席團、書記處和部分軍事將領中進行秘密串連，準備攻擊朱可夫的材料。一切就緒後，10月17至19日召開主席團會議，通過了關於改善蘇聯軍隊中黨的政治工作的決議，而朱可夫的「罪行」就是削弱軍隊的政治工作，企圖以軍壓黨。22至23日又召開了國防部和莫斯科軍區黨員積極分子大會，主席團全體成員和軍隊最高指揮官及政工人員都出席了會議。朱可夫對此一無所知，經歷近半個月的外出訪問，26日14時下飛機後，他就趕往克里姆林宮去參加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當朱可夫剛剛匯報完他的巴爾幹之行，會議議程便直接轉為批判朱可夫在軍隊中無視政治工作和黨的領導的錯誤。朱可夫驚魂未定，會議即討論和通過了罷免其國防部長職務的決議。[89]

朱可夫是蘇聯著名將領，在軍中享有崇高威望，作為六月事件中赫魯曉夫的「救星」，他剛剛被選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還榮獲了第四枚蘇聯英雄金質獎章，朱可夫的倒台確實出人意料。很多蘇聯人聽到朱可夫被免去國防部長的職務時，還以為他將就任部長會議主席，取代在六月事件中名譽掃地的布爾加寧。[90]就在四個月前，蘇共領導集團剛發生了一場政治地震，現在又出現一次「宮廷巨變」，赫魯曉夫非常心虛。

為了穩定局面，赫魯曉夫不僅需要得到黨內和國內的擁護，也離不開社會主義各國，首先是中國的支持。這一次赫魯曉夫沒有任何耽擱，10月28日米高揚即向劉曉詳細介紹了主席團會議的情況，指出朱可夫「拒不執行」中央的方針，「堅持首長制，反對在軍隊中建立黨的領導」。[91]毛澤東的反應也很迅速，第二天便召見了尤金，並說：他對蘇共中央關於撤換朱可夫的決定十分滿意，應該直截了當地說，蘇共中央做出了一項十分重要的決定，從而防止了一場軍隊不服從黨中央的巨大危險，一場可能引發重大麻煩的危險。毛還說，他認為，蘇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組織在軍隊中的作用、關於加強軍隊同地方黨的機關的聯繫、關於軍隊徹底而無條件地服從黨和黨中央的決定，意義十分重大。[92]聽到這個消息，赫魯曉夫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蘇中友好協會的成立也有些令人意外。中共自實行向蘇聯「一邊

倒」的政策後，便首先在東北解放區成立了各地的中蘇友好協會，新中國成立後第五天，就在北京隆重召開了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93]中國對中蘇友協非常重視，從國家副主席劉少奇親自擔任總會長，友協發起人有大量中共高層領導人和各界社會名流，以及協會組建過程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個組織在中共高層心目中的作用。中國還出版了俄文版的《人民中國》和中文版的《中蘇友好》雜誌。到1952年11月初，中蘇友協會員人數已經超過青年團、工會、婦聯，成為全中國最大的「群眾團體」。[94]按照常理，蘇聯也應該成立對應的機構，但那時在斯大林的視野中，中國問題在蘇聯的對外關係中並不佔主要地位。赫魯曉夫執政後開始重視對華政策，1954年8月蘇共中央曾作出決議，責成蘇聯文化部「於今年10月1日成立全蘇蘇中友好協會」，並委託由蘇斯洛夫等人組成的委員會「率備並向中央提出組織全蘇蘇中友好協會的提案」，其重點是應考慮協會的以下任務：「系統地向蘇聯人民介紹中國人民的生活；幫助中蘇友好協會廣泛宣傳蘇聯的成就；組織雙方文化和社會代表團的相互交流；幫助蘇聯社會文化組織、學者、國民經濟專家、藝術活動家交流經驗，進行互相幫助以及研究兩國生活和文化的各個方面。」[95]但不知何故，蘇共中央的這個決議沒有得到執行。

1957年10月27日，莫斯科突然傳出消息：「根據蘇聯社會各界人士的發起，為了進一步發展中蘇兩國的偉大友誼，蘇聯將成立蘇中友好協會。」[96]10月29日晚，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大廳舉行了盛大的蘇中友好協會成立大會。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理事會主席波波娃（Popova）擔任大會主席，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安德烈耶夫（Andreev）作「關於蘇聯成立蘇中友好協會」的報告。劉曉大使到會祝賀並發表講話。大會通過了成立協會的決議，選舉以安德烈耶夫為主席、由五十二名著名社會活動家組成的蘇中友好協會理事會。[97]儘管蘇中友協的規格、作用和影響遠遠無法與中蘇友協相比，但赫魯曉夫對此事是很看重的，並希望引起中國領導人的重視。在蘇中友協所辦雜誌《蘇中友好》創刊號出版之際，赫魯曉夫親自寫了致讀者的一封信，並全文刊登在《真理報》上。信上說：「這是一個良好的必要的創舉。我向《蘇中友好》雜誌的讀者致意，並且同蘇聯的一切中國之友一起表示相信，在1958年中蘇中兩國偉大的人民將更堅強地團結，這將使一切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和平擁護者高興，使我們敵人恐懼。」[98]

然而，赫魯曉夫萬萬沒有想到，1958年恰恰是中蘇同盟分裂的起點，而這種隱患在1957年已經開始顯露。

這裏所說的隱患，並非中蘇兩國的政策方針發生了分歧——如前所述，當時中蘇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中沒有分歧；也不是指中蘇兩黨在觀點上有甚麼分歧——如前所述，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的不滿主要集中在

「和平過渡」的口號和對斯大林的評價兩個問題上，而對於前者，中共一直沒有表露出自己的看法，對於後者，蘇共已經愈來愈趨向於接近中共的看法。[99]當然，這裏更不是說在中蘇關係中存在甚麼不平等的障礙。劉少奇和周恩來確曾在莫斯科批評過蘇聯的大國主義和老子黨作風，但那都是針對蘇聯與波蘭關係而言的。在中蘇關係中，赫魯曉夫的確非常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毛澤東也一再表白，他所說的中蘇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都是講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很好，他很滿意。[100]所謂隱患，這裏指的是中共黨內，特別是在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的大部分幹部中，逐步滋生的某種輕視蘇聯、蔑視赫魯曉夫的心態和情緒。

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後，中共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影響和地位明顯提升，大部分蘇聯黨員甚至赫魯曉夫本人都對中共的理論水平和處事經驗佩服不已，讚不絕口。據中國駐蘇使館報告，在1956年11月彭真率領中國人大代表團訪蘇期間，「對蘇聯在政治上起了很大的支持和配合作用，對於蘇聯人民起了很大的鼓勵與教育作用」。《真理報》、《消息報》對代表團的評價很高，稱「代表團在蘇停留的日子是中蘇友好的盛大節日」。代表團的活動大多刊登在蘇聯報紙的頭版，且常配發照片。彭真的講話也大多全文發表，並作頭條新聞刊登。赫魯曉夫還特邀代表團全體成員到克里姆林宮看蘇聯原子彈、氫彈和導彈試驗的秘密電影。使館認為，「蘇方的盛大接待是超過其他任何國家議會代表團的，這就使我國的代表團處於特別重要的地位」。在同代表團的接觸中，蘇聯領導人一致強調指出「中國黨的領導成熟、中國黨的高度馬列主義水平、高度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除感謝中國黨對蘇聯黨的支持外，他們還一再檢討「蘇聯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和錯誤，希望中國同志能坦率地提出意見和批評，並一再強調要向中國黨學習」。赫魯曉夫曾說，他為錯誤而焦急，並急迫地希望改正錯誤，他覺得要向中國黨的謙虛這一點學習。[101]

國務院外國專家局1957年2月10日報告，自從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特別是波匈事件和蘇聯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發表以後，在我國各部門工作的蘇聯專家的工作作風有了顯著改變。他們更加謙虛了，處處表示十分尊重中國同志的意見。他們提出建議比以前更加慎重，並一再聲明，請中國同志按照中國具體情況，研究採納。[102]

特別是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發表以後，受到各共產黨國家的高度讚揚。匈牙利黨的機關報發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的社論，認為毛的講話提出了新的、創造性的觀點，指導着整個工人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社論還着重指出，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在匈牙利有着重大的意義。捷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發表署名的長文

〈中國共產黨在解決新的問題〉，其中指出：及時認識到社會變化的歷史意義，及時認識到在新情況下人民內部矛盾出現的必然性和正確解決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來領導各社會階層前進——這一切都保證了中國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一個強大的、日益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人民論壇報》總編輯卡斯曼（Kasman）說：中國正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毛澤東同志的報告裏，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情況下的應用。[103]據新華社報道，毛澤東的講話剛發表，蘇聯《真理報》便以三個整版篇幅刊載了全文，還準備出版單行本，莫斯科電台也廣播了全文。蘇聯人民，首先是學術界，對毛澤東的演講表現出極大興趣，人們爭先購買當天的《真理報》，以致在報刊零售點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不少大學自發地把這篇演講列為試題之一。蘇聯哲學界普遍認為，「毛澤東同志不但概括了中國經驗，而且概括了蘇聯經驗」，講演是對「馬列主義的新發展」。[104]

與此相對應，蘇聯共產黨以及赫魯曉夫本人在中共幹部心目中的地位卻大大降低。

這種情況最早反映在對待蘇聯專家的態度上。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傳達到基層後，人們對「以蘇為鑑」的理解出現了偏差。在外國專家局1957年2月10日的報告中，列舉了在許多基層單位出現的「對蘇聯專家冷淡、疏遠，不虛心向專家學習，其至傲慢無理的現象」。其表現是：一、某些部門由於沒有積極主動地安排專家的工作，致使專家感到無事可做。如地質部技術司一個季度只給某專家安排了二十天的工作，最近該部專家組長也因沒有及時給他安排季度工作而提出：「如果不需要我們的話，可以辭掉90%的專家。」二機部勞動工資專家也因無事可做希望提前回國。二、某些部門的領導人同專家聯繫不密切，沒有及時向專家介紹業務情況，供給業務資料。如稅務總局1956年第四季度稅收工作的指標已經在《大公報》發表，卻沒有給財政部的專家看。三、某些部門的工作人員對專家表現驕傲自滿情緒，甚至不尊重專家，不願與專家合作進行工作。如建築工程部北京工業設計院總工程師曾傲慢地說：「我們不需要蘇聯專家了，我們需要的東西，專家給不了，專家給的東西，卻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他還說：「我們貫徹百家爭鳴的政策，專家走了，我們就解放了。」[105]

蘇聯專家對此當然是有所體會和反映的。一名在高教部工作的蘇聯專家總結了與中國同事談話的內容，向莫斯科報告說，中國人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如何解釋資本主義的包圍和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問題，還能不能推薦《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作為馬列主義的基礎課本，通過議會鬥爭道路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否與用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有矛

盾，斯大林提出的戰爭不可避免論是否已經過時，蘇聯怎麽評價《人民日報》的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斯大林算不算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除了南斯拉夫問題，他在國際共產義運動中還犯有哪些錯誤？如此等等。[106]更有一些專家流露出強烈的不滿情緒，如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專家對其中國同事說，看來，有的中國同志認為蘇聯的經驗有缺點；北京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專家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針對一篇中國學者的論文指責中國是「勝利衝昏頭腦」，忘記了「國際無產階級」。[107]

波匈事件發生後，人們普遍認為，蘇共的政治水平已經落在中共後邊。如黑龍江省很多黨員幹部對蘇聯領導人不信任，說「蘇聯領袖一點不穩當，搞得亂七八糟，弄得兄弟黨很被動，使社會主義陣營陷於混亂」。還有不少人指責赫魯曉夫「野心勃勃，有個人企圖」，「到處跑，到處講話，把事情搞得愈來愈糟」。有人甚至主張「徹底清算赫魯曉夫的領導路線」。[108]特別是莫洛托夫「反黨集團」事件發生以後，上海部分大專中學師生擔心蘇共會變成機會主義，認為「如果事情發生在我國，不至於像蘇共那樣處理」，有人還提出，事情發生後「為甚麼不來請示一下毛主席」。吉林省、安徽省、成都市廣大幹部則普遍對赫魯曉夫表現出不信任和不滿的情緒，認為他在政治上不成熟，處理問題形而上學，否定一切，簡單粗暴，排除異己。有人要求中共中央應立即表態，提出質疑，並寫信給蘇共提出意見。還有人提出蘇共已經不配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了。[109]

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安心了。據駐蘇使館報告，自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後，在相當一部分留學生中，產生了一些偏激情緒。不少學生失去了繼續在蘇聯學習的信心，要求回國學習和實習的學生增多。[110]

特別是在「大鳴大放」運動中，各種指責蘇聯黨和政府的言論洶湧而出，此起彼伏。如「蘇聯對我國的援助既稱大公無私，那麽貸款就不應當要利息，要了利息就不是無私的援助。」「蘇聯專家是飯桶專家，不解決問題。」「蘇聯是一黨專政，國內民主受到許多限制，斯大林的錯誤，不只是個人崇拜，而是一黨專政。」「蘇聯共產黨和德國國社黨、意大利法西斯黨沒有甚麽區別。」「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蘇聯利用共產主義在各國掀起革命，破壞國際秩序，干涉別國內政。英美的東西應該大膽地學，蘇聯的東西應該批判地學。」如此等等。[111]

在這樣的氣氛中，很多人提出，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應該讓位於中共。這類的言論有：「蘇聯出事都是在領導人身上，而我國沒有，這不是中國比蘇聯好嗎？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對比，好像中國共產黨比蘇聯共產黨成熟一些。中共雖成立只有三十六年，但從1935

年以後就正確了，蘇共成立雖比我們久，但老出問題。」「南斯拉夫對蘇聯發表文章不同意，但中國的文章一出來，鐵托就不叫了，國際工人運動中的混亂現象也澄清了。」「蘇聯馬列主義的發展已落後於中國，為甚麼中國還要說以蘇聯為首呢？」「社會主義陣營不一定要以蘇聯為首，而應以中國為首。」[112]

固然，在實行「領袖外交」的國家裏，社會輿論和公眾情緒不會成為對外政策的基礎，相反，國家的政策卻完全可以導向社會輿論和公眾情緒。建國初期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親美、崇美、恐美情緒，在朝鮮戰爭期間很快就轉變為仇視、鄙視、蔑視美國的心態，足以說明這一點。[113]但這裏有兩點需要指出：第一，1956至1957年中國出現的對蘇聯和蘇共那種反常的社會心態和情緒，多少是受中共領導人影響而形成的，儘管其中有很大錯誤理解的成份；第二，這種心態和情緒後來構成了毛澤東改變對蘇政策和提出「反修防修」理論的社會基礎。不過，當時中國的方針是對蘇友好。1957年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通知指出：「在社會主義各國的關係中，雖然曾經發生過某些缺點和錯誤，但是國際團結合作仍然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社會主義各國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共同的指導思想，因而在原則問題上是有一致的基礎的；即使在某些問題上發生不同意見，也是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同志式的討論和協商，逐步取得一致。並且會進一步改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增進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114]直到年底，中共的主導思想依然是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統一，堅持對蘇友好和鞏固中蘇同盟的方針。所以，上述對蘇聯的看法在反右派鬥爭中大多被作為右派言論受到批判，而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則以一個共產主義運動指導者的姿態全力維護蘇聯的形象。

[1]詳見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九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頁2152—2171。

[2]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С. Хрущев а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89, No.5, c.107-108.　該文作者科瓦利是蘇聯對外貿易部主管對外經濟聯絡的副部長。科瓦利的說法是有根據的，談判拖延的責任的確主要在中方。早在1952年1月，上任不久的駐蘇大使張聞天就致電周恩來和毛澤東，談到與蘇聯談判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商務代表團給國內的請示電報很久得不到答覆，二是我方在談判中多變，委託設計和定貨時又挑三揀四。參閱张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0），頁925。但科瓦利也有記憶的錯誤：周恩來與斯大林的會談是在1952年9月，而不是1953年初。

[3]《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頁9—18；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築業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頁359—364。

[4]科瓦利本人及蘇聯外貿部工程技術管理局局長科雷巴諾夫、副部長郭維爾都曾到中國進行考察。參見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 No.5, c.108。另見〈黨的文獻〉， 1999年第5 期，頁 21—22。

[5]如1954年2月17日國家計劃委员會就向周恩來請示，要求蘇聯政府考慮對洛陽滚珠軸承廠、汽車製造廠等七家企業以及工業區外工程設計等技術援助事項進行適當補充和修改。參見

《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頁18—20。

[6]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451。

[7]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 No.5, с.108-111.

[8]《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頁24—25。後來蘇聯追加的5.2億軍事贷款很可能與此有關。關於1950年代蘇聯對華貸款的詳細情況，參見沈志華：〈對50年代蘇聯援華贷款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

[9]赫魯曉夫的努力過程，詳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頁182—192。蘇聯大規模對華經濟援助就是從此開始的，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經濟史研究沒有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種種原因，人們普遍低估了這一過程的歷史意義。

[10]《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築業卷》，頁390、396、437。

[11]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頁406—408。

[12]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 //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No.65, с.24.

[13]《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一卷，頁2810—2813。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計，此期在華蘇聯專家的人數還要多。1956年6月28日結束的全國外國專家招待工作會議報告說，預計到年底全國將有蘇聯專家3500人，其他國家專家200餘人。參見遼寧省檔案館，ZE1-2-138，頁7—14。

[14]ЦХСД, ф.5, оп.49, д. 142.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бург, 2000, с.60.

[15]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101-102. 以上數字為筆者根據統計表計算所得。1959年的數字是按1958年1月協定計算的。

[16]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16, 24.

[17]轉引內董志凱：〈中共八大對「一五」經濟工作的分析〉，《中共黨史資料》，總第60輯，頁160。

[18]彭敏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89），页55—56、54。

[19]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O.A.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i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0.

[20]詳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頁258—262。

[21]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頁1164。

[22]福建省檔案館，136-9-294，頁4—5。

[23]詳見本書第二章。

[24]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361-363.

[25]福建省檔案館，101-5-982，頁25—29。

[26]以上所述6月蘇共中央主席團和中央全會情況，引自俄國檔案：Ковалева Н. и др. сост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1998，及學者論文：НауловВ.Я.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No.2, с.10-31； 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6, с.3-14.

[27]Пыгжиk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66-67: Отклик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реше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1957.）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Архи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2000, No.1. c.10-20；《內部參考》，1957年7月12日，頁32—33。

[28]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138-01，頁1—9；109-01124-08，頁91—94。

[29]據中國大使劉曉回憶，自蘇共二十大以後，蘇共黨內兩派都頻繁與中國使館接觸，尋求中國黨的理解和支持。參見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50—51。

[30]1956年以後，蘇聯曾多次表示希望毛澤東訪蘇。毛澤東強調，他1949年是作為國家元首去莫斯科的，所以必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回訪一次，他才好再去蘇聯。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頁95。伏羅希洛夫的隨員中沒有一名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和政要，也說明這次訪問沒有任何政治內容。

[31]《人民日報》，1957年4月14日至5月6日。

[32]福建省檔案館，101-5-982，頁25—29。

[33]李丹慧、沈志華2000年11月30日採訪榮植記錄。榮植當時擔任伏羅希洛夫訪華的陪同翻譯。

[34]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49。

[35]閻明復：〈代序〉，載趙永穆等譯：《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頁1—2。

[36]《內部參考》，1957年7月12日，頁31—32。

[37]《人民日報》，1957年7月7日。

[38]《內部參考》，1957年7月12日，頁32。

[39]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192。

[40]上海市檔案館，A77-2-404，頁1—3；《內部參考》，1957年7月4日，頁15—18；7月5日，頁5—6；7月8日，頁76—86。

[41]《內部參考》，1957年7月5日，頁5—6；7月8日，頁76—86。

[42]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49—51。

[43]以上談話內容見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記錄，1957年7月5日。

[44]閻明復：〈代序〉，載趙永穆等譯：《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頁4—5。

[45]《人民日報》，1957年7月6日。

[46]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7, л.59-59об.,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259.

[47]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5。

[48]周恩來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1957年7月7日。

[49]毛澤東在青島會議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7月20日。

[50]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49—51。

[51]《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二卷，頁2863—2868。

[52]吳冷西：《十年論戰》，頁94—95。

[53]楊明偉：〈創建、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頁28。

[54]葉子龍口述，溫衛東整理：《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85—186。

[55]參見ЦХСД, Ф.5, оп.30. д.7, л.18-20, Симонова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6, с.215-216。維克托·烏索夫：〈原子能問題是如何破壞蘇中友誼的？〉，〔俄〕《新聞時報》，2003年8月6日。筆者是在國際互聯網中文網站（http：//www.scol.com.cn）上看到此文的，目前尚未找到原文。另見楊明偉：〈創建、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頁29。

[56]沈志華2001年6—8月採訪王亞志記錄。王亞志在50—60年代曾任彭德懷的參謀和周恩來的軍事秘書。

[57]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72—573；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578。關於建立核反應堆的提議，這兩本書的說法不同，前者說是赫魯曉夫當時主動提出的，毛澤東答應考慮；後者說是毛澤東後來提出的，赫魯曉夫表示同意。關於這次會談的另一種依據蘇聯軍方人士回憶錄的說法是，在赫魯曉夫拒絕中國的要求後，毛澤東堅持中國哪怕擁有一兩枚原子彈也好，並以美國可能會在台海危機中使用原子彈為理由。參見 Viktor M.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12, No.4（December 1999）, 20-21. 目前沒有找到文獻資料，以上所述均為當事人的回憶。

[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67。

[59]J. W.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75-76 ；楊明偉，〈創建、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頁29。

[60]李覺等主編：《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13—14；J. W.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38-39.

[61]《人民日報》，1956年7月18日。

[62]Morton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7）, 118.

[63]《彭德懷年譜》，頁612，沈志華採訪王亞志記錄。

[64]《聶榮臻傳》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544；謝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29。

[65]《聶榮臻傳》，頁544—546。

[66]《聶榮臻傳》，頁569。

[67]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588。

[68]《聶榮臻年譜》，頁591—592；《聶榮臻傳》，頁569、571—572；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2），頁800—801。

[69]《聶榮臻年譜》，頁592—593。

[70]這裏需要提示的是，蘇聯雖然在核武器的技術援助方面表現不積極，但並沒有妨礙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的對華援助。關於中國鈾礦開發的情況可以表明這一點。1955年1月20日中蘇曾簽署議定書，雙方合作開發中國的鈾礦、其產品除滿足中國自己需要外，均由蘇聯收購。參見《當代中國的核工業》，頁20。後來鑑於中國原子能事業的發展，所開採的鈾礦不僅沒有多餘賣給蘇聯，在最初幾年還需要由蘇聯的儲備中補充一部分，1956年7月9日蘇聯主動建議重新簽訂協議，並將繼續提供專家和技術援助。8月17日中國答覆同意。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51-01，頁5—6、9—10。

[71]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編：《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406；《聶榮臻年譜》，頁602。

[72]作爲當事人，聶榮臻就有此感受，參見《聶榮臻回憶錄》，頁803。

[73]《聶榮臻年譜》，頁605。

[74]《聶榮臻年譜》，頁608、612—613。

[75]《聶榮臻年譜》，頁614。

[76]《聶榮臻傳》，頁575；《聶榮臻年譜》，頁615。

[7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7。

[78]關於赫魯曉夫同意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原因，美國哈佛大學的Halperin教授歸納了六點設想，他的分析很值得參考，但是說赫魯曉夫希望中國盡快掌握核武器是為了要在中國部署蘇聯的核武器，並推動中國積極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似乎缺乏根據。參見 Morton Haiperin, "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1957-1960", O. A.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122-123

[79]《聶榮臻傳》，頁575—579；《聶榮臻年譜》，頁619—620。

[80]《聶榮臻年譜》，頁622。

[8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80。

[82]《聶榮臻年譜》，頁623：《當代中國的核工業》，頁43；東方鶴：《張愛萍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728；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172—174；China Builds the Bomb，62。在這次談判中，中方的要求中只有一項沒有得到滿足，即蘇聯拒絕提供有關核動力潛艇的任何技術資料。參見《當代中國的核工業》，頁32。

[83]《當代中國的核工業》，頁21—22。

[84]吳玉崑、馮百川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簡史（1950—1985）》，1987（未刊），頁29。

[85]沈志華採訪王亞志記錄。

[86]沈志華2002年12月22日採訪宣淼記錄。宣淼在50年代長期在外國專家局聘請處任職。

[87]1959年5月聶榮臻在給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說：「根據中蘇1957年10月15日協定，蘇聯供應我國的火箭導彈、原子能等絕密技術資料和樣品陸續到達，現正展開消化資料、研究設計和試製工作。」參見《聶榮臻年譜》，頁671。

[88]《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8日。

[89]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8, л.12-16, 17-19, 23-25,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269-279.關於朱可夫事件的詳細過程，見Наумов В. П. "Дело" маршала Г.К.Жукова. 1957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No.5, с.87-108, 2000, No.6, с.71-91, 2001, No.1, с.79-99。在10月28—29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朱可夫被撤銷了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職務。

[90]韋利科·米丘諾維奇著，達洲等譯：《莫斯科的歲月》（北京：三聯書店，1980），页435。

[91]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90-01，頁2—5

[92]《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二卷，頁2863—2868。

[93]關於中蘇友協的研究，可見余敏玲：〈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響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頁99—139。

[94]《人民日報》，1950年3月27日、1950年10月5日、1951年10月5日、1952年11月5日。

[95]《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九卷，頁2254—2255。

[96]《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8日。

[97]《人民日報》，1957年10月31日。

[98]《人民日報》，1958年1月2日。

[99]對於這兩點，毛澤東在1957年10月29日召見尤金時講得非常清楚，他說，在斯大林問題上我們有過不一致，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分歧變得很小了」，至於在和平過渡問題上的不同看法，我們「甚至在私下談話中也不曾提起這個問題」。參見《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二卷，頁2862—2868。

[100]《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一卷，頁2587—2594、2641—2647，第十二卷，頁3080—3095；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1958年7月22日。

[101]福建檔案館，101-5-819，頁5—6。赫魯曉夫並非當面奉承，在與波蘭領導人會談時，他曾大力讚揚中國對資本家的和平贖買政策，認為這一經驗豐富了社會主義的實踐和理論，「不僅對亞洲，而且對世界其他部分如南美洲也是寶貴的經驗」。參見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87。

[102]福建省檔案館，136-9-294，頁6—10。

[10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595—596。

[104]《內部參考》，1957年6月26日，頁16—17；1957年7月3日，頁15—30。中國外交部檔案館中（109-01714-01，02）保存着近二百頁蘇聯各界人士給毛澤東的信件，其中充滿了讚美和崇拜的言辭。毛當時在蘇聯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105]福建省檔案館，136-9-294，頁6—10。

[106]ЦХСд. ф.5. оп.49. д.408. л.216-222,轉引自Кейпл Д,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н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5. с.340.

[107]《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頁1163—1164。

[108]《內部參考》，1956年11月21日，頁509—510。

[109]《內部參考》，1957年7月4日，頁15—18；7月5日，頁5—6；7月8日，頁76—86。

[110]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41。

[111]上海市檔案館，A2-2-601，頁32—34；《內部參考》，1957年10月25日，頁6—7；10月29日，頁7—10。

[112]《內部參考》，1957年10月25日，頁6—7；10月29日，頁7—10。

[113]關於這方面的檔案文獻，參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抗美援朝運動資料匯編》（北京：知識出版社，1993）。

[114]福建省檔案館，101-5-982，頁25—29。

二 爲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和團結

1 中共主張開會解決問題

在很多人眼裏，召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是蘇聯首先提出的，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黨的支持和響應。[1]邀請書是蘇共發出的，會議是在莫斯科開的，人們便以為蘇共是莫斯科會議的主角，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檔案材料顯示，召開各國共產黨協商會議及在會議上發表共同宣言的主意，都是中共提出的。不僅如此，在會議準備和召開過程中，毛澤東也發揮了極其重要和獨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為這次會議的幕後總導演。

蘇共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方針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也確實「捅了漏子」，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動盪和組織混亂。如何穩定局勢，把社會主義大家庭重新組織起來，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在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陣營的表現形式是1947年成立的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2]後來由於蘇共強迫大家批判南斯拉夫和鐵托，並直接參與和指揮對東歐各黨的清洗，情報局在社會主義各國名聲極壞。到1952年，即在斯大林去世前，情報局的活動就基本上停止了。[3]鑑於情報局濃厚的斯大林色彩，蘇共中央主席團在二十大期間開會決定予以解散，同時討論了國際共運今後的活動問題。米高揚建議成立一些區域性的情報局組織，並繼續出版雜誌或報紙，這個建讓被多數人接受。赫魯曉夫則提出這個組織的名稱可以叫做「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絡委員會」。會議委託赫魯曉夫等人與原情報局成員國代表和中國代表會晤，聽取意見。[4]大會期間蘇共是否與各國黨商談過這個問題，目前沒有看到任何材料，只有南斯拉夫駐蘇大使米丘諾維奇（Michunovich）回憶說，3月29日赫魯曉夫與他談話，介紹了蘇共中央關於建立區域性共產黨組織的設想：國際形勢本身要求為各國共產黨的合作建立四個新的地區性組織，歐洲兩個，亞洲一個，美洲一個。赫魯曉夫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組織起來，聯合行動，還說目前歐洲各黨正在協商，米高揚則到亞洲各國去商談。他還特別提到要去中國，因為「中國人有甚麼想法是十分重要的」。[5]

毛澤東的確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經對情報局一類的國際機構很感興

趣。當1947至1948年中國內戰爆發而中共已經決定與蘇聯結盟時，毛澤東對共產黨情報局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支持，至少在蘇共看來，中共可能有意搞一個「東方共產黨情報局」。[6]1949年春，緬甸、馬來亞、印度支那共產黨給中共中央寫信，建議成立東方各國共產黨情報局。但毛澤東認為中國內戰尚未結束，時機還不成熟，沒有答應。[7]1949年7月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又提出中共參加歐洲情報局的問題。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沒有必要」，但認為東亞各國的情況與中國類似，可以考慮建立「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8]後來由於朝鮮戰爭爆發，此事又耽擱下來。到斯大林去世，特別是1955年中國緊隨蘇聯之後與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時，情報局在歐洲已經無人理睬。在這種情況下，重提建立類似情報局的共產黨組織，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此，蘇共的建議被中共輕易地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揚訪問印度、緬甸後來到北京，他在會談中提出，蘇共中央建議各國聯合出版一個刊物，還提到要成立聯絡局。毛澤東明確表態：不贊成辦刊物和設立機構。毛說，過去情報局搞刊物，結果並不好，第三國際和情報局給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現在搞聯絡局，那麼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也會害怕。毛澤東建議：「有事開會商量」，召集人當然是蘇聯比較好。「你們召集會議我們到，有事開會，無事不開。」[9]顯然，中共也主張各國共產黨應該協調行動，但活動的方式不是建立機構和辦刊物，而是開會解決問題。目前看到的史料沒有顯示蘇共對此作何反應，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當時蘇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亂而面臨窘境，如果沒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聯絡局和創辦新刊物的設想都是無法實現的。

儘管還沒有商量好如何繼續開展活動，但取消情報局卻是大家的共識。4月13日蘇共向各國共產黨發出了關於停止情報局活動的通報。[10]4月18日《真理報》發表公報宣布：由於形勢的變化，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無論就其組成成員來說，還是就其活動內容來說，都已經不適應新的條件了。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中央委員會認為，在1947年成立的情報局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為此，經過相互協商後決定，結束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活動，停止出版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公報還提出，在新的條件下，能夠和應該找出建立各國共產黨之間「聯繫和接觸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報》立即轉載了這條消息。[11]

情報局是解散了，但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與合作還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給東歐一些黨關於解散情報局的信中，蘇共中央提出，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之間接觸和聯繫的方式問題，應該在近期舉行的會晤中得到解決。[12]為此，6月22至26日在莫斯科召開了華沙條約國政治協

商會議，討論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相互接觸的形式問題。[13]6月3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蘇共中央〈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草案。鑑於此前出現的問題，決議對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做了許多限制性解釋，同時提出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之間建立聯繫的必要性：「在新的歷史情況下，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情報局這樣的工人階級國際組織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這決不是說，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的革命的兄弟政黨的國際團結和接觸的必要性已經失去意義。」恰恰相反，現在「各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團結和兄弟般的團結尤其是必要的」。[14]這一點不僅蘇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國共產黨也有這方面的要求。如法共總書記多列士（Thorez）在十四大的報告中表示擁護蘇共的決議，並指出，情報局停止活動後，各國共產黨日益仔細地考慮各自國家的民族特點，但必須加強聯繫，以解決「國際工人運動的方向問題和各共產黨之間的團結問題」。[15]正在蘇共中央緊鑼密鼓地與各國共產黨協商的時候，爆發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來。

風暴過去以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團結和統一顯得更加必要了。毛澤東和中共對波匈事件非常關注，[16]在危機處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響，幫助莫斯科化險為夷，從而進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特別是對歐洲事務的發言權。[17]大概是鑑於莫斯科面臨的尷尬和被動局面，在毛澤東看來，此時召集各國共產黨議事，理應由中共出面了。於是，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幫助蘇聯處理波匈事件善後事宜期間，周恩來便主動再次提出了召開共產黨國家代表會議的問題。不過，這時中共雖然繼續同蘇共「交換了意見」，[18]但私下考慮的會議召集人卻不是莫斯科，而是北京和貝爾格萊德。

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招待會上，周恩來離開自己的座位，特意找到米丘諾維奇，向他介紹了中共關於召開共產黨國家代表會議的想法。周首先提出，應當組織一次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代表會議，目的是改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團結，消除妨礙合作和團結的因素。會議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舉行。周恩來希望知道，鐵托認為召開這樣一次會議是否有益，以及預定的時間是否合適。周提出，如果鐵托同意召開並參加這次會議，他將對南斯拉夫進行正式訪問。眼下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訪問，已經授權他同鐵托商談。米丘諾維奇提出，為了能更確切地向貝爾格萊德報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細節，比如召開這個會議的倡議是誰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參加，會議是否還會舉行。周恩來毫不猶豫地回答：召開這次會議的倡議是中國提出的。又強調：更確切地說，整個這件事起源於毛澤東本人。周解釋說，會議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產黨人之間的新組織，會議也不會做出任何強加於與會者的決

議。雖然不是很堅決，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參加，會議就不會舉行。不過，那樣就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周恩來還說，會上將研究創辦各國共產黨新的報紙的問題，但中共反對這樣的做法。米丘諾維奇對周恩來如此直率的談話非常意外，並感覺到中共對蘇聯以前的做法持批評態度。[19]

此前，周恩來確與正在南斯拉夫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通過電話，要求他臨時拜訪一次鐵托，並指定由伍修權大使親自擔任翻譯。於是，在1月29日的單獨會談中，彭真向鐵托轉達了中共的建議，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發起，召開一次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討論和協調各國黨的活動問題。鐵托表示，關於召開各國黨代表會議的問題很重要，南共中央要專門討論。他個人的意見是進行雙邊或者多邊的會談為好，不贊成召開全世界各國黨的會議。[20]南共的態度令中共進退兩難，因為事前並未向蘇共提到會議召集人的問題，回國途經莫斯科時，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魯曉夫通報說，鐵托原則上同意參加各國共產黨會議。[21]

在莫斯科看來，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員，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這兩家的意見已大體一致，蘇共只能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開會解決問題。[22]為此，2月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召開會議討論。鑑於南共的態度有些勉強，赫魯曉夫在會上提出，通報各國共產黨會議的問題時不要表現出強迫態度和過分熱心，可先進行雙邊會晤。會議認為應同中共商議召開會議的時間問題了，並委託蘇斯洛夫和謝皮洛夫準備給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團批准的給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蘇共同意中共關於舉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建議，認為應該由中共籌備和出面主持這次會議，並希望把有關籌備情況及時通報給蘇共中央。信中還說，對於蘇共領導人來說，會議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進行比較適宜。[23]

莫斯科來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會議的建議，着實令中共吃驚。按說，蘇共並不知道中共曾建議由中南兩黨召集會議的情況，而來信卻說「根據已經獲悉的協議」，應該由中共中央主持會議的籌備工作。對此，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頗感疑惑，並追問緣由。當事人斷定，可能是周恩來在莫斯科與彭真的通話被監聽了。[24]面對如此被動的局面，毛澤東一改原來的設想，答覆蘇共中央說：中共中央不準備籌備和主持這次會議，會議應由蘇共中央籌備召開。但中共中央同時認為，會議應該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召開，建議不要匆忙地開會。[25]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過了四個月，蘇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開會議，並建議在7月

就召開一個秘密會議，同時提出，會議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見，不規定日程，由參加者自己來決定會議的性質和程序。這次不好再推脫了，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開會議，但還是建議為開好這個會，應事先經過商量，可以先提出一個文件草稿，發給各兄弟黨徵求意見。一致的意見就寫上，不一致的就不寫。考慮到這個文件要公諸於世，中共主張會議之前要在共產黨之間充分交換意見。草案要經過討論、修改，一致同意後再開會。中共認為，這樣做可能時間會長一點，麻煩一些，但是，準備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處的。[26]然而，就在會議籌備工作開始進行時，蘇共內部發生了驚心動魄的六月事件。這次事件的結果再次使中共佔據了主動地位，赫魯曉夫對毛澤東也更加言聽計從了。

赫魯曉夫度過難關以後，感到召開一次共產黨會議的事情不能再耽擱了：在接連發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後，不僅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和團結問題迫切需要解決，蘇共新領導集團的地位和路線也必須立即得到大家庭的認可。同時，蘇共在這件事情上也更需要依賴中共的支持。鑑於此前毛澤東曾兩次拒絕蘇聯的邀請，7月5日米高揚在杭州向中共通報蘇共六中全會的情況時，小心翼翼地問：「毛澤東同志甚麼時候去蘇聯？」還有些焦急地說，「這件事我已經問過三次了」。毛澤東答曰：與伏羅希洛夫商議的是11月去，但現在還不能定，因為我們國內的形勢緊張。[27]米高揚回國匯報後，赫魯曉夫對中共公開表態支持自己十分滿意，但對毛澤東模棱兩可的答覆感到擔心。於是，蘇共中央決定通過外交渠道正式詢問中共的意見。7月9日，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阿布拉希莫夫約見劉少奇，轉達了蘇共中央關於盡快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建議。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說：開這樣的會應該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結果，要事先和各兄弟黨商量，搞出一個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來。[28]中共的答覆給赫魯曉夫吃了定心丸，蘇共開始積極進行準備。在莫斯科看來，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黨的意見似乎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波匈事件後蘇南關係有些緊張，為了進一步搞清鐵托的態度，蘇共派專人去南斯拉夫商議。8月1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波諾馬廖夫和安德羅波夫自貝爾格萊德發來電報說，與卡德爾（Kardelj）、蘭科維奇（Rankovic）等人會談的結果是，南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不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也不接受共同宣言，他們的理由是擔心南斯拉夫的國際處境複雜化。[29]蘇共中央主席團於當天召開會議，決定將已經起草好的宣言草案寄發給原共產黨情報局各成員國，其中特別要求駐波蘭大使應親自向哥穆爾卡通報。會議還確定，只要這些黨認為適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絕，也要召開協商會議。[30]很可能也是在此時決定，利用各國黨代表團來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節慶典活動的機會，召開協商會

議。第二天，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便致函毛澤東，正式邀請他赴蘇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同時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和若干其他國家共產黨、工人黨國際會議。信中還說，為了把這個會議開好，蘇共將把準備提交會議通過的文件，交給中共中央徵求意見。[31]對此，毛澤東欣然接受。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黨透露出毛澤東將親自率團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來，這是暗示將在慶典期間召開重要會議，並且希望各黨「也派遣自己的第一號人物來莫斯科」。[32]10月6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商量了訪蘇代表團的問題。[33]

10月22日周恩來向蘇聯使館通報了訪蘇代表團的人員組成和動身日期，[34]但此時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沒有解決，即蘇共起草的宣言草案尚未經過中共認可。直到10月28日，尤金送來赫魯曉夫給毛澤東的私人邀請信，建議在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時候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以及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的代表會議；並把他們起草的會議宣言草案送來徵求意見。蘇聯大使稱，這份宣言草案已事先送給南共中央徵求意見，南共領導人不同意這份文件。中共中央辦公廳將草案翻譯後，分送有關領導人。胡喬木看後認為需要修改，毛澤東又問鄧小平的意見，鄧也認為必須修改。於是，毛澤東指定胡喬木動手修改，並指示，在文字上盡可能保留蘇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問題還是要表明我們黨的觀點。胡用兩天時間對草案做了較大改動，有的部分幾乎重新寫過。經粗略統計，對草案的修改約一百多處，較大的補充有二十餘處，刪節三十餘處。胡喬木所增加的重要內容主要有：和平力量的增長，可以阻止戰爭的爆發，而帝國主義戰爭狂人硬要發動戰爭，則必然會在戰爭中自取滅亡；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於工人階級來說，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毛澤東看過修改稿，並特別欣賞最後一段表述。[35]

10月29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會見了尤金大使。關於這次長達四個小時的會見經過，目前中國和俄國的檔案都已經披露，記錄內容大體一致。毛澤東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認真討論了從蘇共中央收到的關於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見。總的來說，草案需要大量刪減，只保留主要的、原則性的內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們還有一些個別意見，準備到莫斯科同赫魯曉夫詳談。

毛澤東主要談了三點意見。

第一，關於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問題。毛澤東說：「一般說來，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存在着兩種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我們提出這種可能性，表示我們並不提倡戰爭，並不提倡要用暴力來推翻政府。第二種可能性就是如果資產階級要用暴力來鎮壓無產階級，要發動內戰來反對無產階級，那麼無產階級就將被迫以內戰來回答。這樣就使無產階級一隻手爭取和平過渡，另一隻手準備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鎮壓，不致沒有準備而推遲了革命。」「這兩個可能性要同時提出。」中共認為，如何表達這個思想，是一個文字問題，但這個思想一定要在宣言草案中明確地表達出來。

第二，關於對社會民主黨的估價問題。毛澤東說，草案中說，近來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在一系列政治問題上日益接近。我們並不懷疑，應當爭取與社會黨人共同行動，特別是應當把社會黨的普通群眾爭取到共產黨人一邊來。但是，對這個問題的提法應該更一般性，不應當僅僅突出地提出同右翼社會黨人團結的問題，而是要找這樣一種提法，以便能把社會黨人、資產階級民主力量和進步力量都包括進去。

第三，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的問題。毛澤東在回顧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對待中共的錯誤路線的歷史後說，中共中央完全贊同蘇共中央六月全會譴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但是在宣言中是否就不要提他們的名字了，只提反黨集團。毛澤東說，我們提出這項建議並不是因為憐憫莫洛托夫——人們反正以後會忘掉他的，而是考慮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同的利益。

接着，毛澤東談到中共中央與蘇共中央的關係問題。毛澤東說，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日趨接近了。我們對於你們解決斯大林問題的做法有過不同看法。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分歧變得很小了。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是誰讓我們大家更容易地正確理解個人崇拜？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此時尤金插話說，在蘇共二十大的決議及蘇共中央後來的言論中，絲毫也沒有講到要無產階級放棄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武裝鬥爭。二十大決議只是說，在當前歷史條件下，對於若干國家，工人階級用和平方法奪取政權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也就是說，在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已經存在的形勢下，可能為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創造有利的條件，足以迫使資產階級後退，從而避免武裝鬥爭。尤金認為中共對蘇共關於個別國家通過和平道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的評價，顯然是一種誤會。毛澤東對這一看法表示非常贊許。

最後，關於莫斯科會議文件的表現形式，鑑於南斯拉夫，可能還有波蘭，不同意宣言的內容，毛澤東提出了三個方案。第一方案是經過事

先充分討論後決定通過並發表宣言，即使有一、兩個代表團反對，宣言也要通過。毛澤東形象地說：這樣做，「天下不會大亂」。

第二個方案是經事先討論通過一個簡短的宣言式公報，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問題，如要團結和統一行動，爭取和平和反對戰爭，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等等。第三個方案是只由中共和蘇共兩黨發表聲明。如果有人提出為甚麼只有兩個黨發表聲明，可以回答說，這兩個黨是最大的黨。這個方案也要事先討論。毛澤東請尤金盡快將這些意見轉達給赫魯曉夫，以便蘇共中央主席團了解中共代表團將帶着甚麼問題去莫斯科。[36]顯然，毛澤東傾向於第一方案：耐心做工作，搞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文件。

10月30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宣言草案。鑑於需要商議和修改的地方較多，決定毛澤東提前去莫斯科，到那裏起草一個稿子，提交蘇方討論。政治局會議還批准了10月29日政治局常委會議關於代表團的方針的決議。[37]11月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了尤金10月30日電告的毛澤東談話內容。會議作出決議，否定了只搞一個簡短公報的方案，而接受了毛澤東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人不同意，也要發表宣言。會議還認為，如果通過共同宣言，那麼也可以同時搞一個中蘇雙邊聲明。最後，會議要求蘇斯洛夫等人考慮中共的意見進行修改，盡快提交主席團。[38]當天，毛澤東率領一個龐大的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

2 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召開這次共產黨國際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至少有一點是中共和蘇共一致追求的，那就是加強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團結和統一，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大家一致贊成毛澤東的意見，把這次莫斯科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赴蘇代表團的方針是：對蘇共「以保為主，以批為副」，「以鬥爭求團結，協商一致，求同存異」。[39]從後來的結果看，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主要是處理好中共與蘇共的關係，彌合蘇聯與波蘭的關係，調解南斯拉夫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其中對應要解決的三個問題是：一、中蘇之間對和平過渡問題的觀點分歧；二、波蘭不同意「以蘇聯為首」的提法；三、南斯拉夫拒絕參加執政黨會議和在宣言上簽字。這裏的關鍵問題是要起草一個令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宣言，處理的原則就是求同存異。

莫斯科會議的整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件事：起草和通過《莫斯科宣言》。從11月3日中蘇兩黨開始交換意見，到10日基本達成一致，然後又交給各國黨討論，成立起草委員會修改，直到會議的最後一天（19

日）完成定稿，進行報告和簽字。在此期間又決定，分別召開兩個會議，執政黨（南斯拉夫不參加）單獨簽署《莫斯科宣言》，全體共產黨、工人黨另外簽署一個《和平宣言》。各種不同意見的交流，不同看法的爭論，苦口婆心進行說服，想方設法達成妥協，所有這一切求同存異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宣言的過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澤東所說，重要的問題是與大家商量搞出一個會議文件，「開會實際上只是一個形式而已」。[40]但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中共代表團頗費了一番周折。

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的當天，赫魯曉夫登門拜訪。毛澤東說，我提早到來就是為了宣言草案。我們要搞一個好的宣言。我們黨也準備起草一個稿子，供你們考慮。[41]11月3日晚，中蘇兩黨舉行會談，首先討論了起草文件的問題。關於會議是否要通過一個共同宣言的問題，赫魯曉夫說，各國共產黨都同意在會議上通過這樣一個文件，而且哥穆爾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簽字。這自然是符合毛澤東的心意的，他沒有再發表意見。關於蘇方的草稿，赫魯曉夫說，正在根據中共的意見進行修改，比如不要提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澤東表示，從內容上來說，原來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都同意。他建議由中蘇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並指定鄧小平、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參加。毛澤東還提出推遲會議召開的時間，以使宣言的修改時間更加充裕。赫魯曉夫表示同意。會談中，赫魯曉夫再次提出要辦一個指導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刊物，還提到要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毛澤東仍然表示不贊成，他說：「這樣的刊物用處不大，而且也不容易辦好，評論其他國家的情況很難，評價也不容易恰當，過去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在原則上不反對成立組織。我們又考慮，暫時不搞組織，可以使一些國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國主義國家，而是指亞非國家。」毛澤東建議，還是用定期召開會議的方式交換意見，由蘇共作會議召集人。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毛澤東主張他們不在宣言上簽字，宣言中可以提一句：對文件中的各點，十二個執政黨（不含南斯拉夫）必須執行，對資本主義國際的兄弟黨只是作為建議提出。[42]

中共代表團從11月3日晚上即開始修改草稿，由陸定一、胡喬木和陳伯達分頭執筆，鄧小平主持討論修改，毛澤東最後審定，到11月5日完成。同日，蘇共中央也提出一個修改草案。11月6日，中蘇兩黨代表團分別由鄧小平和蘇斯洛夫領頭開始會商。討論的結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團的草稿為基礎，進行修改、補充。[43]

毛澤東來莫斯科的首要任務就是維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溝通與波蘭的關係。毛澤東關注波蘭，不僅是因為十月危機導致蘇波關係緊張，需要中共從中調和，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比較欣

賞哥穆爾卡，認為他既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又敢於反抗蘇聯的大國主義。[44]所以，毛澤東在莫斯科期間三次與哥穆爾卡談話，而且第一個拜訪的也是哥穆爾卡。11月6日毛澤東來到波蘭代表團駐地，這次談話雙方只是初步交流看法。毛澤東先大致介紹了召開會議和起草宣言的準備過程，並強調宣言「只涉及共同問題，不涉及各國內政」，而且必須同大家商量。談到國際形勢問題，哥穆爾卡認為，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後，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固然佔了上風，但還是應該避免局勢緊張化。作為舉例，他指責「在朝鮮進行戰爭的政策是錯誤的」。毛澤東說，發動戰爭是斯大林的錯誤，中國開始不想打，後來擔子落在肩上就必須挑起來。然後毛澤東把話鋒一轉說，那時是「斯大林一人決定事情」，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們組織個團體有事大家商量」。其他還涉及許多問題，如對美國態度，對蘇聯的看法，超英趕美的問題，奪取政權以後革命是否就最終勝利的問題，以及當前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的問題等等。毛澤東和哥穆爾卡都是點到為止，沒有深談。[45]

11月8日中午，中蘇雙方代表再次會商，就宣言草案交換了意見。雙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但和平過渡的問題分歧依然沒有解決，決定各自再行考慮，10日繼續會談。[46]關於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問題，是蘇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蘇共認為，目前國際局勢的特點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制度和平共處，因此出現了和平過渡的新的前景，其中包括兩個含義：一個是指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政權的過程，一個是指取得政權以後進行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這裏發生爭論的是前者。在蘇共最初宣言草案中的說法是：

> 由於國際舞台上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從而為各個國家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開闢了新的前景。工人階級追求通過和平途徑實現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裏，共產黨員力爭通過與社會黨人結盟和爭取議會中牢固大多數，以及深入地開展大規模的非議會的革命性階級鬥爭的途徑，把人民的絕大多數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之下，把資產階級的議會變成真正體現人民意願的，並能夠摧毀反動勢力的抵抗和確保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具。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會給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

經過修改的第二稿，在這一點上基本沒有改動。[47]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須提出兩種可能性，並且應該強調武裝鬥爭的前景。

為了說服蘇共，毛澤東決定主要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工作。11月7至9日，毛澤東分別與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會談一次，與英國共產黨主席波立特（Pollitt）和總書記高蘭（Gollan）會談兩次。毛澤東在談話中反覆指出，在革命道路的問題上，是否堅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則，是否堅持和平過渡和革命戰

爭兩種可能性，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根本區別。必須準備革命的兩手，不宜過分強調和平過渡。這幾個西歐共產黨領導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澤東的看法，同意在宣言上提出兩種可能性。其實，西歐各黨的立場也是有區別的。法共傾向於武裝鬥爭，意共更強調議會鬥爭，多列士和陶里亞蒂為此還在莫斯科吵了起來。英共則認為，在英國下一屆政府可能是工黨上台，這對和平過渡更有利。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談話中沒有過多強調武裝鬥爭問題，而中共提出的兩種可能性的說法，則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折中方案。[48]

11月10日中蘇兩黨會商前，各自分別召開會議研究對策。赫魯曉夫主持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會議決定，11月11日把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準備的大會報告分發給各兄弟共產黨代表團。關於宣言草案，委託蘇斯洛夫等人與中共代表協商，繼續完成宣言文本的制定工作。會議特別指出，關於協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即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問題，要「堅持自己的立場」。[49]中共代表團認為，蘇共的主要顧慮是，如果改變對和平過渡問題的提法，就無法與蘇共二十大的提法銜接，這樣很難向蘇共、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交代。估計到蘇共會堅持自己的立場，為了維護團結，又堅持原則，鄧小平提出，是否可以就和平過渡問題，向蘇共提交一個書面的意見提綱，全面闡述中共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同時，在宣言草案中，照顧到蘇聯的觀點，對和平過渡問題有所闡述。毛澤東同意這個建議，指定陳伯達、胡喬木起草這份意見提綱。[50]在蘇共中央主席團開會的同時，毛澤東主持了中共代表團會議，審議和通過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當日下午，中蘇兩黨起草宣言的小組再次會談。鄧小平首先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雙方經過磋商，終於就全部草案達成一致意見，並決定以蘇共和中共兩個代表團的名義將草案提交各國代表團討論。[51]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宣言草案，授權代表團定稿。1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也聽取並通過了關於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見，確定由起草委員會直接與中共代表商議定稿。在此期間，中蘇兩黨代表團還商定，建議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不列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於14日召開的會議，以免增加他們國內工作的困難。經與各黨交換意見，大家一致同意在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黨代表會議之後，再召開世界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的會議。這個會議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託蘇聯和波蘭黨的代表起草。[52]

至此，中蘇之間一個最大的分歧意見得到解決。與蘇共的草案相比，會議最後通過的宣言，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按照中共的意見，有兩點重要修改：一、在指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沒有

使用「和平過渡」的說法）的同時，還指出了非和平過渡道路，並強調「在每一個國家裏，哪一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具有現實可能性，決定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二、在談到取得議會中穩定的多數時，同時提出應在議會外開展廣泛的群眾鬥爭，摧毀反動勢力的反抗，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必要條件。[53]至於中共的意見提綱，當時只提供給了蘇共，既沒有在大會上公開，也沒有提交給任何其他黨的代表團。直到1963年中蘇大論戰時，這個文件才公布於眾。實際上，中共《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在原則上與宣言的提法沒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兩點：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爭取同社會黨左派和中間派建立統一戰線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會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原則界限。[54]

就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而言，當時中國的外交方針與蘇共的觀點，特別是經過修改的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55]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宣言修改草案的當天，周恩來到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作了一個報告。周說，現在世界上存在着兩個對立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形成，並且不斷強大起來，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定要衰亡下去。這是肯定的、必然的趨勢。因此，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中，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就是敢於在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間實行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通過和平競賽可以使帝國主義一天天削弱下去。我們提出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的政策，但並不怕、也不會疏忽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要警惕戰爭的危險。關於國家的過渡，有兩種基本方法，一種是和平的方式，一種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近四五年來，國際形勢一般地說是趨於和緩的，但是並不排斥在個別問題、個別地區、個別一段時間內會有緊張。[56]

這說明，中共代表團（主要是毛澤東）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堅持不同意見，核心的考慮是強調武裝奪取政權，因為這是中國革命的主要經驗；而蘇聯堅持和平過渡的提法，主要也是為了與蘇共二十大路線銜接。如果在共產黨國際會議上按照蘇聯提法表述這個問題，就等於確認了蘇共二十大的國際意義，說它開闢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那麼中共的革命經驗將置於何地？吳冷西的這個感受是準確的——這才是中蘇分歧的實質。中共代表團表面上爭論的是「和平過渡」的提法，實際上是不願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蘇共二十大。[57]否則就很難理解，為甚麼宣言已經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談到「和平過渡」時提出了兩種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員會上中共代表團還是聲明：「中國黨對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見的，既然許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們就不堅持了」。[58]顯然，毛澤東在此是作了妥協和讓步的。宣言中提出兩種可能性，這是求同；中蘇兩黨分別強調不同的道路，這是存異。但恰恰是這種求同存異的做

法，為以後中蘇論戰埋下了伏筆，中共為此後悔不已。[59]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公開講話和私下會談中，說得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個問題是「以蘇聯為首」。自1956年初以來，接連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和威信受到嚴重打擊。中共意識到，蘇聯不僅是列寧主義的故鄉，也是最早的社會主義國家，且長期擔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首領。因此，加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陣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維護蘇共的威望，堅持「以蘇聯為首」。當然，在毛澤東眼裏，赫魯曉夫政治經驗不足，馬列主義不強，蘇共新領導集團在處理國際共運事務中也捅了不少「漏子」。但至少在目前，無論就國家實力還是國際影響來說，只有繼續把蘇共推上領頭羊的地位，才能保證社會主義陣營的穩定和統一。據楊尚昆1957年初的日記記載，毛澤東談到中蘇關係時講：中蘇之間矛盾不大，主要問題上比過去更靠近些，但還有一些問題。因為歷史習慣不同，他們思想、做事的方法不同，要等候，要做工作。思想不同要談心，有事要商量，要開會。形勢會壓迫他們有所改變，而且已經有些改變了。只能逐步地改變，不要忙，並且幫助他們。繼續這個方針，有意見當面直接講。與蘇是十個指頭中一個指頭不一致。矛盾總是有的，只要大體過得去，求同存異，不同的將來再說。[60]毛澤東在黨內這樣談「以蘇為首」，多少有些居高臨下的姿態，似乎是以一個國際共運指導者的姿態來維護蘇聯的形象。

毛澤東剛到莫斯科，就提出了「以蘇聯為首」的口號，他在機場發表的講話中指出：「以偉大的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保證世界和平的堅強堡壘，是一切不願意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實朋友。」[61]「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種提法，儘管在中國的報紙上一直頻頻出現，但從波匈事件以後，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中已經不大使用了，甚至蘇共本身也在考慮，為緩和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盡量避免提到蘇聯的領導作用，放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種表述。[62]因此，在蘇共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蘇共主席團的建議刪去了所有提及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領導地位的用語。赫魯曉夫回憶說，當時他的考慮是，在批判了斯大林的錯誤後，這類詞句還寫進國際宣言，有可能被理解為試圖恢復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斯大林式的領導方式，是試圖重新確立蘇共對其他兄弟黨的領導權，進而有可能被理解為是試圖改變各國共產黨現在建立在平等合作原則基礎之上的新型相互關係。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裏提到「以蘇聯為首」，蘇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於是，毛澤東解釋說：我們所以堅持以蘇聯為首，是因為只有你們才能夠領頭，你們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又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搞了四十年社會主義。我們中國是當不了頭的。赫魯

曉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蘇為首，毛澤東說，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但在為首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跟你們平起平坐，我們還差得遠。如果以我們兩個為首，我們是負擔不起這個責任的。[63]

對於「以蘇聯為首」的提法，波蘭、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黨在討論宣言時曾明確表示反對，其他很多黨的代表內心也不贊成，只是保持了沉默而已。[64]所以，毛澤東除了勸告蘇共接受這個口號外，還要說服其他各國共產黨。在11月14日代表會議開幕的當天，毛澤東在發言中就專門談「以蘇聯為首」的問題。毛澤東首先講到需要有一個黨為首，他說：「我們這裏這麼多人，這麼多黨，總要有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內部事務說，互相調節，合作互助，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外部情況說，更需要一個首。我們面前有相當強大的帝國主義陣營，它們是有一個首的。如果我們是散的，我們就沒有力量。」毛澤東接着講到為甚麼要以蘇聯為首。他說：「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格。我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也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而「蘇聯共產黨是一個有四十年經驗的黨，它的經驗最完全」。儘管蘇共也犯過一些錯誤，但目前還是它的實力最強，「我們只有一個蘇聯有全副武裝」。蘇聯放了一顆五百公斤的小衛星，已經跑到帝國主義前頭去了。毛澤東問赫魯曉夫，再搞一個五萬公斤的東西拋上去行不行？赫魯曉夫有些猶豫地回答：大家共同努力有可能。毛澤東以命令的口吻說：「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對，主要由你努力。」講到過去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中的不平等現象，毛澤東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錯誤，「應該承認，現在蘇聯同志的作風有很大的改變，並且還會改變，還會進步。」「現在我感覺到有一種平等氣氛。」毛澤東最後總結說：「現在承認以蘇聯為首有必要，承認以蘇聯共產黨為會議召集人有必要。」[65]

在毛澤東講話的這一天，赫魯曉夫安排接見了美國「合眾社」駐莫斯科首席記者夏皮羅（Shapiro）。夏皮羅提出：「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典禮，因此又引起人們談論可能成立新的共產黨國際組織，例如新的共產國際或是共產黨情報局，不知確否？」赫魯曉夫回答：「我們認為，現在沒有必要建立這種組織。共產國際起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積極作用。共產黨情報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共產黨和工人黨現在已經非常鞏固了，已經不需要有某種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了。至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定期舉行會議和會見，我們是不反對的，這種形式對我們有利。」[66]這段對話，無疑是對毛澤東講話的最好腳註。

然而，各方的意見並沒有平息。11月11日宣言草案發給各國代表

後，便收到了不少意見，其中最主要的意見來自波蘭代表團。[67]於是，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宣言起草委員會，討論和修改中蘇兩黨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員會討論了一天，爭論很激烈。主要的反對意見還是來自波蘭代表團，他們提出不宜提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此外，還不同意美帝國主義或美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等一些提法。下午5點半休會，鄧小平立即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些情況。毛澤東決定立即去波蘭代表團住所，同哥穆爾卡當面交換意見。[68]

在會談中，毛澤東與哥穆爾卡先討論了一些枝節問題，並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見，如「美帝國主義統治集團」改為「美國的某些侵略集團」，「復辟資本主義」改為「進行顛覆活動」等。但是在以蘇聯為首的問題上，會談陷入了僵局。哥穆爾卡態度強硬地說，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東西，而目前文件中還有些東西是波蘭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數服從多數，那麼波蘭就不準備參加會議了。毛澤東好言相勸說：大家都作些讓步，這次會議與以往不同，蘇聯黨有了很大進步，讓蘇共當召集人的意見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並不決定任何問題等等。不管毛澤東怎麼勸說，哥穆爾卡堅持反對在原則上確定蘇共為以後各國共產黨會議的召集人。波蘭人後來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個內部決議，委託蘇聯召集會議，但不寫在宣言上。毛澤東不再堅持了，最後表示：我們應該幫助赫魯曉夫等同志，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兄弟，幫助他們，支持他們。[69]從會談記錄看，毛澤東的勸說起到了一定作用，現場翻譯李越然認為，哥穆爾卡接受毛澤東的說法是很勉強的。[70]另一個參加會談者楊尚昆的感覺是，「似有好轉，雙方意見已較為接近，明天可能達成協議」。會談後，毛澤東又連夜約見赫魯曉夫和蘇斯洛夫等人，轉告哥穆爾卡的意見，並討論了第二天會議的問題。[71]

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員會再次開會，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開全體會議，首先由蘇斯洛夫報告了宣言草案的修改情況，然後是毛澤東帶頭發言，表示同意。毛澤東說：「我認為我們的宣言是好的。我們用了一個很好的方法達到目的，這就是協商的方法。堅持了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原則性、靈活性的統一。這麼一種進行協商的氣氛現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後期不可能。」因此，這次會議「我認為有充分的民主」。毛澤東最後斷言：「這個宣言是正確的。它沒有修正主義或者機會主義的因素。」[72]在毛澤東具有影響力的表態之後，各國代表團均發言表示擁護宣言，哥穆爾卡也發了言。會議決定基本通過草案，交起草委會作最後的修正。[73]在後來發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而沒有再提「會議召集人」的問題。這顯然又是雙方妥協的結果。

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反覆強調以蘇聯為首，自然是為了社會主義陣

營的團結，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但是，他的說法，特別是11月18日的即席講演，也給人留下了另外一種印象。第一，每個陣營必須要有一個頭，他用了一句中國的俗話，叫做「蛇無頭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的力量最強，所以「這個頭就是蘇聯」，而中國只是政治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還沒有這個資格；第三，蘇聯當這個頭是需要幫助的，中國還有句成語：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笆籬三個樁。「你赫魯曉夫同志這朵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74]按照這個邏輯，目前以蘇聯為首是因為只有他們可以擔負起這個責任，一旦中國的經濟發展了，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為首的就理當是中國了。在1959年10月中蘇兩黨會談為中印邊界衝突發生激烈爭吵時，赫魯曉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許你們指責我們，不許我們批評你們，說甚麼「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實際上對蘇共中央的觀點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75]赫魯曉夫後來體會到：「如果所有其他黨都承認一個黨可起帶頭的作用，那麼這個頭其實也可以更換，今天一個頭，明天另一個頭。我們認為，中國人在為自己準備條件，將來要擔任這樣的角色。」[76]赫魯曉夫的感覺是不錯的。實際上，當時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已經遠在蘇共之上，多列士甚至對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最近時期，尤其是在斯大林問題產生之後，在我們這方面曾發生一些不太好的情況。中國同志們的文章為大家指出了方向，非常有利。我們黨的鬥爭就是沿着這個方向進行的。」[77]在當時社會主義陣營裏，實際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導者是中共，毛澤東只是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強，因此暫時還不能直接出面承擔起領導責任罷了。[78]不過，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人為首這個原則是需要確定下來的。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還有一個角色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南共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不同尋常，且頗有些微妙。斯大林去世以後，赫魯曉夫主動向鐵托道歉，努力恢復蘇南關係，同時要求各國共產黨積極與南共聯繫。1955年3月中國與南斯拉夫建立外交關係，兩黨也恢復了聯繫。儘管當時毛澤東本人並不信任鐵托和卡德爾，甚至認為南斯拉夫還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79]經過一年的努力，南斯拉夫以勝利者的姿態重新被社會主義國家接納。1956年9月南共派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毛澤東在接見南共代表團的談話中，對斯大林的大國、大黨主義進行了全面批判，並一再稱自己也被斯大林看作是半個鐵托，表現出對南共的極大同情。[80]但是好景不長，蘇南之間因在匈牙利事件中處理納吉問題引發了矛盾，鐵托的普拉演說更令蘇共不滿，雙邊關係再度緊張。[81]中共也出面批評南共，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矛頭明確指向鐵托的普拉演說。對此，蘇聯方面表示極為讚賞。[82]不

過，當時毛澤東還是把南共的錯誤看作是陣營內部的問題，對鐵托既講批評，又講團結。[83]中共認為：「南斯拉夫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兄弟國家。」「我們批評鐵托和卡德爾，目的是要幫助他們糾正錯誤，希望澄清事實和進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們。」[84]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中共很重視南斯拉夫是否派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

儘管1957年6月以後蘇南關係有所緩和，特別是蘇共六中全會後赫魯曉夫對南斯拉夫表現出格外熱情，但鐵托仍堅持不參加社會主義陣營的立場。當10月2日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向南斯拉夫使館通報十月革命節慶典活動及召開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安排時，得到的答覆是，南共將派代表團參加十月革命慶典，但鐵托因病不能前來，而南共是否參加共產黨會議的問題，雙方都沒有提及。[85]不知是有所擔心還是寄以希望，這個情況蘇共沒有向中共通報。後來蘇共只通知中共，南共看過蘇聯起草的會議宣言，並表示不能接受。10月25日中共從蘇聯大使的通報中得知了這一消息，對於南共是否來參加會議非常關切。毛澤東到達莫斯科後，與赫魯曉夫一見面就問鐵托來不來。赫答，我們發了邀請，但是他不來。毛說，要理解他們，斯大林整了人家，情報局把人家趕跑了，肚子裏能沒有氣？並問，鐵托不來，別人來不來？赫答：卡德爾來，他是一個筆桿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說：那好啊，我倒很想會會他，聽聽他有甚麼見解。[86]但赫魯曉夫卻沒有毛澤東這樣的氣量。

以卡德爾、蘭科維奇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團於1957年11月5日抵達莫斯科，蘇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蘇南兩黨舉行了正式會談，氣氛自始至終十分緊張。在會談中，赫魯曉夫一開始就宣布，這次在莫斯科將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並且已商定，即使南斯拉夫人不參加，也要發表一項共同宣言。赫魯曉夫嚴厲地指責南共接受美國的援助，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精神等，認為蘇南關係再次緊張的責任在南斯拉夫。卡德爾堅持南斯拉夫的不結盟政策毫不退讓，他說，南共認為，把世界劃分成集團是人類的不幸，這樣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南共的主張是解散兩極對立的集團，取締作為政治手段的戰爭，各國人民實行積極和平共處，各國人民有權為自己選擇社會發展的道路。至於接受美國的援助，這與當時的冷戰狀況和蘇聯的立場有關係，應當對此承擔責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1948年攻擊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共代表團還表示，無論如何不能簽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將以一切手段捍衛自己的獨立。會談很不愉快，言詞愈來愈尖銳，赫魯曉夫講了一些侮辱性的話，但對結果卻無可奈何。[87]

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魯曉夫試圖再次說服南共代表團，建議他們贊成宣言的實質，而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這個建議

同樣遭到了拒絕。11月12日卡德爾與赫魯曉夫舉行第二次會談。卡德爾解釋了南共代表團不能在宣言上簽字以及不能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原因，但表示可以在報紙上支持宣言中南共所同意的一些觀點。赫魯曉夫似乎已經估計到這次會談的結果，對卡德爾的講話既沒有感到意外，也沒有再發火，只是在講話中繼續指責南斯拉夫的選擇是一種分裂行為。最後，他希望南共再斟酌一下。14日大會開始前，南共代表團在使館召開會議，最後確定了他們在莫斯科的行動；只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全體代表會議，並在各黨都同意簽署的《和平宣言》上簽字。這個決定得到了鐵托的完全支持。對於南斯拉夫的頑固態度，赫魯曉夫顯得有些氣急敗壞，對南共代表團採取了某種抵制行動。由於蘇聯的冷淡態度，許多代表團都有意迴避南共代表團，使他們在莫斯科的處境極為尷尬。同其他代表團的熱鬧活動相比，在米丘諾維奇看來，南共代表團「在列寧山可以說度日如年」。[88]

毛澤東對南共代表團的態度顯然要寬容和輕鬆得多，他不像赫魯曉夫那樣明知不可為而偏要為之，既沒有批評南共的立場，也沒有試圖勸說他們同意共同宣言的觀點。毛澤東似乎早已打定主意不需要南共及西歐幾個黨在宣言上簽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團的態度後，11月9日再次與英共代表團談話時說：「我們向赫魯曉夫同志提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黨不參加簽字，會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們的工作，否則資產階級又要攻擊你們，說你們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國和意大利的黨已經決定不簽字。南斯拉夫的黨也不簽字。宣言只由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簽字。我們現在正在說服波蘭，如果波蘭不願意簽字，我們準備由十一國簽字。」[89]雖然毛澤東在會議期間一直沒有與南共代表團直接接觸，但在最後階段卻表現出十分熱情的態度。

在11月18日的即席發言中，毛澤東在講到團結的問題時，專門提到了南共代表團，他說：「我又高興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在第二個宣言上準備簽字。他們在六十幾個黨的和平宣言上簽字表示一件甚麼事情呢？就是表示團結。他們沒有在十二國宣言上簽字，使十三國缺少了一國。他們說有困難，我們想也可以，我們不能強加於人，南斯拉夫不願意簽字就不簽字好了。將來若干年後，我想他們是可以在另外一個宣言上簽字的。」[90]這段話似乎打動了南共代表團，大會休息時，卡德爾走到毛澤東跟前說，他對中共同志能夠諒解他們很滿意，他很感激毛主席這番講話。[91]對於孤獨的南共代表團來說，這大概是莫斯科會議期間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縷陽光。而這恰恰給了毛澤東進一步向南共闡述自己看法的機會。

就在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卡德爾提出，南共代表團希望對毛澤東進行禮節性拜會。南共對此並沒有抱很大希望，他們以為毛澤東完全很

可能會因為南共代表團沒有簽署宣言而拒絕接見。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劉曉大使迅速給予了答覆，說毛主席很高興立即接見南共代表團，以致米丘諾維奇感覺毛澤東似乎正在等候他們提出拜會的請求。作為東道主，毛澤東非常親切和熱情地與卡德爾等人會談了近兩個小時。更令南共代表團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對他們沒有簽署共同宣言竟沒有表示絲毫的不滿和責備。當卡德爾說明拒絕在宣言上簽字的理由時，毛只是說，這不是甚麼問題。毛澤東還說，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個國家乃至蘇共的領導，但由於「俄國人現在喜歡，而對我們也無害」，因此中共不反對這一點。當卡德爾談到南斯拉夫的發展成就，並列舉了鋼產量數字時，毛高興地說，如果俄國人的鋼產量趕上美國，中國人趕上英國，南斯拉夫人趕上意大利的話，那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92]南共特別注意到，儘管他們沒有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但在中共眼裏，南斯拉夫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在19日蘇共的告別宴會上，毛澤東特意走到米丘諾維奇身邊祝酒，提議為中南友誼幹杯，又對卡德爾開玩笑地說：「你們和我們的區別只是在於，你們長鬍子，我們不長鬍子。」按卡德爾的理解，毛澤東這是在表示「願意使兩國關係正常化」，他頗為深情地對毛澤東說，鐵托同志很希望能夠見到毛主席，希望中南兩黨加強聯繫。[93]毛澤東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會主義陣營，儘管這個願望最終未能成為現實。

當然，莫斯科會議上的分歧和矛盾並不只是上述三個方面，不過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異」的方式處理了。如意共對「在目前條件下，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的說法不滿意，於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對於每一個共產黨說來，哪一種危險在某一時期是主要危險，由它自己判斷。」再如，蘇共堅持還要辦一個共產黨的國際刊物，有些黨不同意，最後達成口頭協議，將來刊物辦起來，只刊登相同意見，不刊登分歧意見，不搞批評和爭論。[94]經過毛澤東的百般努力，確實搞出了一個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達到了求同存異的目的。但是，其效果是很值得懷疑的。實際上《莫斯科宣言》沒有任何約束力，文件雖經大家簽字，但模棱兩可的用語處處可見，既要這樣，又要那樣，既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這就難怪會議之後各黨依然各行其是，而後來發生爭執時，又都援引宣言的觀點來指責對方。仔細品味可以發現，其實莫斯科這一紙宣言，從內容到形式，都真實地反映了中蘇關係的性質、特點和實質，是中蘇同盟關係最典型的寫照。

毛澤東確實非常重視這次會議，雖說是「以蘇聯為首」，但中國人的操心出力一點兒也不少。[95]關於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所起的作用，楊尚昆回國後在一次報告中有如此評價：「在這個會議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決定作用。當然，同蘇聯協商那是沒有問題。但是，許多

問題，許多意見是主席提出來的，經過協商以後，他們接受了。」[96]這個說法是符合實際的，不過還必須看到，毛澤東的有些觀點是別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這些觀點恰恰隱含了未來分歧的基礎。

3 毛澤東即席發言語驚四座

蘇共二十大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由一個具有約束力的機構領導和指揮的歷史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開共產黨國際會議，而這無疑是毛澤東的一個創舉。正因為如此，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成為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

首先在接待規格上中共代表團就顯得與眾不同。赫魯曉夫對毛澤東的到來特別重視，提前兩天就派蘇共中央書記波斯佩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長費德林專程到蘇聯國境第一站伊爾庫茨克去準備接待工作，並且安排了隆重的歡迎儀式。但事前毛澤東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規模歡迎儀式，中途停留時他也不準備走出飛機，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機場發表談話外，沿途不要組織歡迎，因為天氣太冷，他和宋慶齡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車。赫魯曉夫一一照辦，迎接的禮遇規格很高，但儀式很簡樸。[97]抵達莫斯科後，所有來賓都住在莫斯科市郊別墅，只有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的主要成員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宮內（在郊外還有兩處備用別墅）。赫魯曉夫討好地對毛說：這裏「離會議廳很近，有條走廊與會場喬治大廳相通，很方便，而毛澤東本人將「住在沙皇的寢宮裏，我們為您選擇了最好的房間」。為了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赫魯曉夫為毛澤東特製了木板牀，甚至把寢室衛生間的馬桶都改成了蹲式的。[98]

毛澤東在公共場合出現時，立即成為關注的中心。據楊尚昆記載，在十月革命節紀念大會上，毛澤東一出場，全體即起立致敬；毛澤東講話開始和結束時，也是全場起立鼓掌。其餘各兄弟黨代表講話，都是只鼓掌沒有起立。在紅場舉行慶典活動時，遊行隊伍不斷高呼毛澤東的名字，表示致意。遊行結束後，參觀慶典的群眾一哄而上，圍着毛澤東歡呼。據蘇聯同志說，這種情形是前所未有的。[99]

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的發言方式也引起了許多當事人的注意。所有來賓都是事先準備好經本黨中央批准的發言稿，在會上照稿子唸，而將俄文譯稿發給與會者。只有毛澤東，三次發言都是即席講話，這使蘇方會務工作人員感到非常為難。特別是在11月18日大會上，所有發言的人都是站在講台上作報告，只有毛澤東坐在那裏講。[100]

毛澤東離開莫斯科前，蘇共中央主席團特意為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葉卡捷琳娜大廳組織了一次與蘇聯各界著名人士二百多人的會見，蘇共領

導人幾乎全體出席作陪。會見進行了將近兩小時，毛澤東與出席會見的人們進行了親切愉快的談話。[101]這個場景也是其他所有代表團沒有機會遇到的。[102]

不過，最令研究者感興趣，並引起爭議的，是毛澤東在11月18日大會上的長篇即席發言。他在發言中不時講出一些讓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話語，使得聽眾驚詫不已。

毛澤東一開場就提出了一個後來被眾人傳誦的著名論斷：「東風壓倒西風」。毛說：「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圍繞這個命題，毛澤東講了十件大事，從反法西斯戰爭、中國革命、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蘇伊士運河事件，直到解除敘利亞危機、蘇聯衛星上天、英國退出亞洲和非洲、荷蘭退出印尼、法國退出北非。總之，國際形勢已經大為不同了。「我們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烏雲。」[103]在11月8日與英共代表的談話時，毛澤東也講了這十件大事，並得出結論說：「我總有一個印象：社會主義國家走在前邊，資本主義國家落在後邊。我覺得，資本主義國家永遠落在後邊了。」[104]11月17日對中國留學生講話時，毛澤東說得更為簡明：「現在，蘇聯有兩個人造衛星上天，六十四個國家的共產黨開會，又是一個大的轉折點，這是世界上兩個陣營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從今以後，西風壓不倒東風，東風一定要壓倒西風。」[105]

蘇聯的人造衛星上天，這在當時確實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說明蘇聯的科技水平，特別是在導彈發射技術方面，已經走在了美國的前頭。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的聚會，也顯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前古未有的盛況。但是，就此斷定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根本變化，恐怕是過於樂觀了。對於毛澤東的這個論斷，赫魯曉夫在私下交談時，已經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就目前來看，蘇聯在軍事和一些其他科技項目裏是領先的，但美國潛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別是他們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106]哥穆爾卡與毛澤東談話時也提出：「自從蘇聯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後，資本主義國家承認他們是落後了，但假如有人以為他們永遠也不會有這種成就那就看錯了。我想他們早晚也會有像火箭這樣的成就的。」哥穆爾卡指出，問題是在目前情況下究竟應該採取甚麼方針政策。他認為「採取的政策不應使緊張局勢更趨尖銳化」。[107]他哪裏知道，毛澤東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本意就是想強調社會主義不必擔心也不必反對國際局勢的緊張狀態。

毛澤東的另一個驚人之語是關於蘇聯黨內鬥爭的。在講到團結的問題時，毛澤東突然插了一段關於莫洛托夫集團的話：

> 我贊成蘇共中央解決莫洛托夫問題，這是個對立面的鬥爭，事實證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團舉行進攻，乘赫魯曉夫同志到外國去了，措手不及，來一個突然襲擊。但是我們赫魯曉夫同志也不是一個蠢人，他是個聰明人，立即調動了隊伍，舉行反攻，取得勝利。這個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錯誤的路線，一條是比較正確的路線。斯大林死後這四五年，蘇聯的內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這就證明赫魯曉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線比較正確，而反對這樣的路線是錯誤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長的鬥爭歷史，但是這一件事他是作錯了。蘇共黨內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帶着對抗的性質，因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個排斥一個。處理得好，可以不出亂子。處理得不好，有出亂子的危險。[108]

毛澤東的本意是對蘇共中央處理六月事件表態，是支持赫魯曉夫的，自然也有勸告蘇共要懂得團結犯過錯誤的同志的意思。但是，第一，毛澤東在此前曾一再告誡蘇共中央，對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卻在大會上公開指責莫洛托夫，這就很讓人懷疑他的動機。第二，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大會上評論蘇共的黨內鬥爭問題，而且用別人不熟悉的詞彙——「兩條路線鬥爭」把蘇共領導中「兩個不同集團」等同起來——至少通過翻譯後人們是這樣理解的，這就更讓人坐不住了。據米丘諾維奇描述的現場情況是：毛澤東講這段話時，「有幾百人在場的格奧爾基大廳變得死一般的寂靜。米高揚示威性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露出一副決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裏，把目光投向發言者和對稱地坐在蘇聯代表團對面的中國人。……俄國人當中誰也沒有對他說不要這樣做，也沒有人請他坐下。整個大廳都看着這一場面」。[109]這大概是毛澤東絕對沒有想到的結果。說是以蘇聯為首，而毛澤東卻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毫無顧忌地隨意評論蘇共黨內的分歧和矛盾，這能不讓蘇聯人惱火？難怪卡德爾在毛澤東講話時傳給南共代表團成員一張字條，上面寫道：「俄國人同中國人在國際工運中爭當意識形態首領的鬥爭開始了。」[110]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有一處也受到了人們的質疑，即提出中國將在十五年後超過英國的口號。在11月6日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的講演中，赫魯曉夫在列舉了一系列統計數字後說：「在各種最重要的產品產量方面，蘇維埃國家在今後十五年內不僅能趕上，並且能超過目前的美國。自然，在這段時期，美國的經濟也可能有所發展。但是，只要考慮到我國工業發展速度比美國快得多這一點，那麼可以肯定，在極短的歷史時期內，在和平競賽中趕過美國的這一任務是完全現實的，是完全可

以實現的。」[111]聽了赫魯曉夫這番話，毛澤東顯得有些受刺激。當天晚上與哥穆爾卡談話時，毛澤東就試探性地提出：「再過十五年蘇聯能超過美國，中國有可能超過英國。」哥穆爾卡當即直言不諱地回答：「蘇聯能超過美國這點無疑問，但中國能否超過英國這點很難說。」毛澤東仍然堅持說：「如十五年時間太短，則可延長些，先超過英國，然後再超過美國。」[112]

可能是為了取得可靠的依據，在11月8、9日與法共和英共代表團談話時，毛澤東又特意談到經濟問題。當多列士告訴毛法國的鋼產量為1200萬噸時，毛澤東隨口就說：「我們有兩個五年計劃就能超過法國，三個五年計劃超過英國。」在向波立特和高蘭詳細詢問了英國的金融、工業和軍事狀況後，毛澤東肯定地說：「中國在十五年後將超過英國。我們今年的鋼產量是52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後將是1200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後將是2000—2500萬噸，第四個五年計劃之後，也就是十五年之後，將是4000-4500萬噸。英國現在的鋼產量是2000萬噸。你們看，十五年後能增加到多少？頂多3500萬噸吧！」法國人和英國人沒有哥穆爾卡那麼直率，對毛澤東的豪言壯語都是點頭稱讚。[113]

於是，在18日大會的發言中，毛澤東鄭重地宣布：「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說現在英國年產2000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3000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4000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114]格奧爾基大廳裏的聽眾大概沒有多少人把毛澤東這些外行話當真——單單一個鋼產量能說明甚麼問題呢？但是，赫魯曉夫趕超美國的時間表後來遭到蘇聯經濟學家和多數主席團成員的質疑和反對，[115]而毛澤東的這句話卻吹響了1958年中國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的第一聲號角。

在毛澤東18日講話中最引起爭議的是他關於核戰爭及其結果的一番論述。中共代表團回國後，赫魯曉夫在11月27日中國使館一次招待會的致詞中就表示了對毛澤東發言的不滿，他暗示毛澤東有些講話是多餘的。[116]據赫魯曉夫回憶，毛澤東講這段話時，除了宋慶齡發出會意的笑聲外，「整個會場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靜」，會後許多代表的反應都十分強烈。捷共第一書記諾沃提尼說：中國有六億人口準備損失掉三億，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萬人。哥穆爾卡也毫不掩飾地表示了憤慨。[117]參加會議的以色列共產黨總書記舍穆勒·米庫尼斯回憶當時的印象是：毛澤東熱衷的話題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老是翻

來覆去地講。他認為大戰不可避免，對此人們必須隨時做好準備。我甚至敢斗膽地講，他是根據這場大戰來安排生活和思考問題的，儼然是大戰已經開始了。[118]那麼，毛澤東究竟講了一些甚麼話會給人們留下如此印象？

毛澤東的講話當時並未公開發表，直到後來中蘇論戰蘇聯攻擊中國的核政策時，中國政府才在聲明中引用了這段話，而全文是在1992年發表的。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争，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119]

蘇共在論戰中拿出了當時蘇方的速記記錄，根據這個記錄，毛澤東的原話是：

> 是否可以估計一下，未來的戰爭會導致多少人死亡？也許會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億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億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彈的話，我認為這還少說了。當然，這很可怕。但是，即使是損失一半人也不是那麼的糟糕。為甚麼呢？因為不是我們要這麼做，而是他們，是他們將戰爭強加给我們。假如我們打起仗來，那麼就會使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我個人認為，整個人類社會將會遭受這樣的災難，那時人類將會損失一半，也許，一多半。我問過尼赫魯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在這個問題上情緒要比我悲觀得多。我對他說：假如人類的一半被毀滅，那麼還會剩下一半，但是帝國主義將會被全部毀滅，並且整個世界將只有社會主義存在下來，而在半個世紀或者一個世紀裏，人口又會增長，甚至增長一半多。中國還沒有真正展開建設，假如帝國主義者將戰爭強加於我們，那麼我們準備停止搞建設：讓我們先比試一下武力，然後再回過頭來搞建設。

蘇共由此認為：「實質上，這是一條搞軍事衝突，用軍事手段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的方針。」[120]

儘管無法判斷誰更準確地記錄了毛澤東的原話，但對比一下中蘇雙方發表的文件，就發言者所要表達的內容來說，沒有本質的區別。關鍵

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毛澤東的話。這裏除了翻譯上的問題外，[121]恐怕主要是在場的外國聽眾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澤東那種哲人的思維和詩人的語言。[122]其實毛澤東不過是重複了他說過多次的話：原子彈是紙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認真對付。至於談到核戰爭的結果，這裏也不過是「極而言之」，從最壞處考慮問題。毛澤東的話驚嚇了東歐一些小國領導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蘇共在論戰中以此為由指責中國好戰和蓄意挑動核戰爭，無疑是有意歪曲了。蘇共1957年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與毛澤東是一致的。就在毛澤東講話的第二天，《真理報》刊登了11月14日赫魯曉夫接受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夏皮羅的談話記錄。其中有這樣一段對話，記者問：「您認為，如果打起原子戰爭和氫武器戰爭，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來嗎？」赫魯曉夫答：「自然，將會有很大的損失，人類將要經受很多災難，但是人並不會從地面上消失，社會將存在，並且繼續發展。」[123]

毛澤東發言的本意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難理解，問題是他採取即席演說這種隨意的方式，來講一個在歐洲人看來是如此嚴肅和敏感的話題，再加上倉促的翻譯，就難免引起誤解和懷疑。不過，毛澤東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語言來闡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介紹莫斯科會議的情況。毛澤東說，總的來講，這次會議是成功的，十二黨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較滿意。但是還有兩個問題沒有講，一個是和平共處問題，一個是社會黨問題。毛澤東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然是對的，但是蘇共二十大把和平共處作為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就錯了。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共產黨的對外關係的總路線，就不能只限於和平共處。這裏還有支持世界革命的問題，還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問題。[124]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個如何看待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問題。鑑於對核武器的新認識，蘇共二十大提出應通過和平而不是戰爭走向共產主義。[125]

毛澤東一向反對核戰爭將會毀滅人類的看法，他從莫斯科回來後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又重複了關於核戰爭的講話，而且說得更加透徹：「要準備對付大戰，帝國主義有瘋子，扔原子彈。頭一次大戰不過死了一千多萬，第二次大戰死了三千多萬。打原子戰，沒有經驗。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二十七億人，還有九億人，有九億人也好辦事，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換來了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126]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話有一個解釋，他說：蘇共二十大「只講和平不講戰爭，這是很不好的。只講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講戰爭來了怎麼辦。莫斯科宣言解決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講這個」。[127]這就是問題的核心，也是毛澤東沒有說出來的與赫魯曉夫的重大分歧所在。[128]

作為結果，總體來說，中蘇雙方都認為莫斯科會議是非常成功的。會議剛結束，蘇共就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黨員和積極分子學習討論，報刊上連續集中報道了一個多月。[129]1957年12月蘇共中央全會決議「滿意地指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現代國際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則問題的結論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產黨的完全支持，這就證明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一致和團結」。[130]中國國內此時正忙於整風反右，對這次會議無暇組織廣泛的學習討論，但毛澤東回國後便說：「莫斯科會議有很深遠的意義」。[131]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決議也認為：「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會議和所通過的兩個宣言，開闢了現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給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進步的力量以極大的鼓舞。」[132]然而，在這個成功的背後，卻暗藏着一種危機。

這種危機並不在於中蘇之間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在任何一個同盟裏這都是極為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況下，求同存異的確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狀況卻非同一般，中蘇關係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卻面臨着一個由誰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中共的成就和影響如東風勁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蘇共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架勢。而蘇聯也恰在此時恢復了元氣，黨內鬥爭結束以後國內政治趨於穩定，農業連年豐收預示着經濟發展的美好前景，連續兩顆人造衛星上天及核潛艇試航成功則標誌着軍事科技開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133]在這種情況下，當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受到來自北京的挑戰時，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就無論如何也無法再「求同存異」了。

[1]吳冷西：《十年論戰》，頁95；《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4。還有研究著作認為，恢復各國共產黨的聯繫，加強國際共產主義團結的倡議，最早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於1957年提出的。參見羅賓·艾莉森·雷明頓著，上海師大歷史系世界史翻譯組譯：《華沙條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頁146。這顯然更是遠離事實的。

[2]詳見沈志華：〈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頁172—187。

[3]斯大林的最後一次努力是計劃在1951年初再次召開情報局會議，並提議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擔任共產黨情報總書記，但遭到陶里亞蒂的拒絕，設想中的會議也未能舉行。參見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No.4. с.156-161.

[4]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67-69,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2003, с.106-107, 927.

[5]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34—37。

[6]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73. л.1-37.

[7]見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188—189。

[8]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71-73, 232-233；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頁413—414。

[9]毛主席與哥穆爾卡談話記錄，1957年11月6日、11月15日。

[10]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933.

[11]《人民日報》，1956年4月19日。關於情報局解散過程的研究，詳見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4, с.131-152.

[12]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933.

[13]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43, 947.

[14]РГАНИ, ф.3, оп. 14, д.39, л.30-34.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 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2002, с.352-368. 1956年7月2日《真理報》和7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決議。

[15]《人民日報》，1956年7月31日。

[16]據不完全統計，從10月20日到12月底，毛澤東主持中共高層會議達二十六次之多，認真研究了國際局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種種問題。參見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頁9。

[17]詳見本書第六章。

[18]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7。

[19]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267—27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3—14。

[20]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1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3；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7。

[21]關於彭真的通報，當事人的回憶不盡相同：李越然（彭真的翻譯）回憶說，彭真只講了東歐的局勢已經穩定的情況，赫魯曉夫提出重新組織共產黨國際機構的問題，彭真表示會向中共中央報告。參見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北京：外國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頁109。閻明復（周恩來的翻譯）回憶彭真通報的內容是：「鐵托當時表示同意召開這樣的會議，但是要求不規定議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約束性的決定。」參見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7。但無論如何，根據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會議記錄,莫斯科當時從彭真那裏得知的情況是：「鐵托原則上同意參加擬定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參見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99. л.26,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с.911. 依此判斷，彭真當時沒有對赫魯曉夫說實話。

[22]中國外交部報告：波匈事件之後，中國在蘇聯對外關係中的地位顯得更加突出，蘇聯採取了一系列「加強中蘇友好關係的新做法」。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091-01，頁2—7。

[23]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7, л.1-8,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224,990-991.

[24]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0。筆者在中國外交部新解密的檔案中，沒有發現任何有關彭真與鐵托會晤的文件，可見此事極為隱秘。

[25]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7。

[26]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7。

[27]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1—12；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記錄，1957年7月5日。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文獻出版社，1996），頁405。

[29]АПРФ, ф.3, оп.23, д.63, л.64-71,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018.

[30]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8, л.18-19,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274,1018.

[31]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09；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2。

[32]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16。

[3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84。

[34]周恩來與尤金談話記錄，1957年10月22日，中共外交部檔案館，109-00787-18，頁79。

[35]楊尚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3；《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4。閻明復原來回憶說，蘇共草案是10月25日交給中共的，後來的回憶又改為28日。參見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7—8；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3。

[36]《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二卷，頁2863—2868。另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4—727；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9。

[37]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6。楊尚昆回憶說，中方的修改稿當時就譯成俄文交給蘇方了。參見楊尚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頁3。這裏大概是記憶有誤，詳見下文。

[38]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8, л.26-27,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279-280,1021-1022.

[39]吳冷西：《十年論戰》，頁96—97。

[40]毛澤東與哥穆爾卡談話記錄，1957年11月6日。

[41]吳冷西：《十年論戰》，頁97—98。

[42]《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8、733。

[43]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0—11；吳冷西：《十年論戰》，頁97—99。

[44]詳見本書第六章。

[45]毛澤東與哥穆爾卡談話記錄，1957年11月6日。《毛澤東傳（1949—1976）》（頁732）中引述的毛澤東談話還有這樣一段：「這次開會實質上就是成立一個新的國際，但是沒有機構，由各黨的領導人參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經過大家商量，不能強迫接受，每國的黨也並不是其支部。」筆者看到的會談記錄有這個意思，但原話不是這樣講的。

[46]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89；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0—11。

[47]РГАНИ, ф.3, оп.12, д.296, л.18-19.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022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58—60；吳冷西：《十年論戰》，頁97—98。

[48]《毛澤東傳（1949—1976）》，頁733—734；毛澤東與多列士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毛澤東與波立特、高蘭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06—107、133—134。

[49]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8, л.28-28об,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280-281.

[50]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0—11。

[51]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0—11；楊尚昆：《楊尚昆日記》，頁290。

[52]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1；РГАНИ,ф.3, оп.2, д.1008, л.29,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281. 1022.

[53]《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2日。

[54]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96—99。

[55]講到具體問題時，毛澤東並不否認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如在與陶里亞蒂談話時毛澤東就說，意大利資產階級比較弱，所以將來意大利有可能先經過一個過渡階段，第一階段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到第二階段才是無產階級專政。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11—112。

[5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95—96。

[57]為此，中共甚至反對蘇方草案的如下提法：「蘇共二十大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中共八大、法共和意共的代表大會也表示出對馬列主義的忠誠。」中方表示在宣言中無需提到中共八大，各黨代表大會是各黨自己的事，不需要國際會議批准。參見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32。

[58]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39—140。

[59]李丹慧對這個問題有詳細的考察，並撰寫了長篇論文〈最後的努力：中蘇在1960年的鬥爭與調和〉《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以此反觀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很有啟發。

[60]楊尚昆：《楊尚昆日記》，頁278。

[61]《人民日報》，1957年11月3日。

[62]Кулик Б.Г.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42.

[63]赫魯曉夫著，馬貴凡譯：〈《赫魯曉夫回憶錄》選譯（二）〉、《中共黨史資料》，總第71輯，頁192—193；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31—132。據中國駐蘇使館匯報，早在1955年2月，即赫魯曉夫訪華後，在蘇聯就出現了「以蘇中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969-01，頁1。

[64]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31—132。

[6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625—628。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在1956年12月24日的報告中指出，蘇聯正在「積極調整同兄弟國家的關係」，並一再強調，對於蘇聯黨過去工作中「嚴重的缺點和錯誤」，「希望中國同志坦率地提出批評」。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88-01，頁1—8。

[66]《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0日。

[67]楊尚昆：《楊尚昆日記》，頁22；吳冷西：《十年論戰》，頁98—99。

[68]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11—12：楊尚昆：《楊尚昆日記》，頁293。

[69]毛澤東與哥穆爾卡談話記錄，1957年11月15日。

[70]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頁166。

[71]楊尚昆：《楊尚昆日記》，頁293。

[7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28—630。

[73]楊尚昆：《楊尚昆日記》，頁293。哥穆爾卡在17日大會的發言中說，承認蘇聯為首是一個真理，不是人為的，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39。

[7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39—640。

[75]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No.2, с.94-106.

[76]〈《赫魯曉夫回憶錄》選譯（二）〉，《中共黨史資料》總第71輯，页192—193。

[77]毛澤東與多列士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

[78]後來中蘇論戰時，中共中央提出所謂以蘇聯為首，「僅僅意味着蘇共負有更大的責任和義務」。參兒《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頁313。

[79]《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卷，頁2411—2415。

[8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259—262。

[81]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七卷，頁455—468。蘇南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矛盾詳見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ев, И.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No.2, л.10-29.

[82]《內部參考》，1957年1月2日，頁3—4。

[83]就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發表後不久，劉曉在中國使館舉行晚宴，與米丘諾維奇舉行了親切會晤。參見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250—251。

[84]周恩來在1957年1月11日與哥穆爾卡的談話中，特別明確地講到了這一點。參見Andrzej Werblan, Rozmowy Wladysi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 Dzieje Najnowsze. Rocznik XXIX. 1997.4, c.119-144.

[85]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24—423。

[86]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頁161—162：李越然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蘇關係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言。

[87]卡德爾著，李代軍等譯：《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68—170；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43—444。

[88]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45—455。

[89]毛澤東與波立特、高蘭談話記錄，1957年11月19日。

[9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39—640。

[91]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23。

[92]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56；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頁172—176。

[93]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57；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頁172；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23—124。

[94]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35、149—150。1958年1月31日蘇共中央來信徵求中共對出版一個國際性理論刊物的意見，蘇共建議這個雜誌可作為各黨聯合刊物，只進行宣傳和研究馬列主義，交流各黨經驗。2月27日中共回信表示贊同。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97—98。《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於1958至1991年期間，在布拉格用34種語言出版，並在145個國家發行。

[95]有一個細節也可以看出毛對這次會議的重視：毛澤東為這次訪蘇準備的禮品396件，其中僅贈送蘇共中央領導人的禮品就差不多裝了整整一個車皮。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3-00107-01，頁4。

[96]《毛澤東傳（1949—1976）》，頁760。

[97]《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二卷，頁2863—2868；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3-00107-01，頁6：109-01100-01，頁9；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頁153；《毛澤東傳（1949—1976）》，頁727。

[98]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頁158—159；《葉子龍回憶錄》，頁189；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頁19—20。

[99]楊尚昆：《楊尚昆日記》，頁287、288。

[100]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ют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 No.2-3, 1993, c.38-39；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16—126。對此毛澤東的解釋是他害過腦貧血病，站着講話不方便。

[101]《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1日。

[102]毛澤東也有一些要求是赫魯曉夫無法接受的。如在討論中蘇雙方會見的時間安排時，毛澤東提出，會見在淩晨三四點鐘進行。談到團結的問題時，毛澤東希望赫魯曉夫學習中共八大在中央委員會保留王明的做法，也把莫洛托夫選進蘇共中央委員會。這些都令赫魯曉夫十分反感。參見杰留辛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蘇關係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發言；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頁144。

[103]《建国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30—638。

[104]毛澤東與波立特、高蘭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

[105]《毛澤東傳（1949—1976）》，頁757。

[106]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9—10。

[107]毛澤東與哥穆爾卡談話記錄，1957年11月6日。

[10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43。但七年後，即1999年6月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未加任何說明卻刪去了這段話。

[109]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歲月》，頁453—454。

[110]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頁175。

[111]《人民日報》，1957年11月8日。

[112]毛澤東與哥穆爾卡談話記錄，1957年11月6日。

[113]毛澤東與多列士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毛澤東與波立特、高蘭談話記錄，1957

年11月9日。

[1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635。

[115]麥德維杰夫著，蕭慶平等譯：《赫魯曉夫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頁150—151。

[116]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14—215。

[117]赫魯曉夫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394—395。

[118]麥德維杰夫：《赫魯曉夫傳》，頁157—159

[119]《人民日報》，1963年9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35—636。

[120]Правда. 21-22 Сентября 1963г.

[121]見過該講話的俄文速記記錄的俄國學者庫利克說：「這份文件顯然沒有經過文字加工，而且俄文的翻譯水平也很差」。參見Кулик Т. Б.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17.

[122]毛澤東有一些私人談話更叫赫魯曉夫目瞪口呆。如談到未來的戰爭時，毛澤東告訴赫魯曉夫說，如果帝國主義發動進攻，你們不要還擊，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烏拉爾，那時中國會幫助你們。參見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頁395—397。

[123]《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0日。

[124]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50—153。

[125]詳見本書第二章。

[126]吉林省檔案館，1/1-14/59，頁6—8。

[127]吉林省檔案館，1/1-14/126，頁16—35。

[128]有些研究者認為，在莫斯科會議期間中蘇之間已經發生了嚴重分歧，出現了無法調和的矛盾。參見張金發：《中蘇共關係：中國民族主義的背離》（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6），頁85—86。這實在是言過其實了。

[129]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812-01，頁5—17。

[130]北京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編譯：《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中央全會文件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頁272—273。

[131]毛澤東約集各民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談話紀要，1957年12月8日。

[132]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決議（草案），1958年5月23日。

[133]1956—1958年蘇聯農業生產增長數字，參見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匯編》（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頁51—52、137、140。蘇聯第一艘核動力潛艇於1958年12月下水試航的情況，參見Симонова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1996, с.245.

三 毛澤東決心發動經濟大躍進

毛澤東躊躇滿志地回到北京以後，立即開始籌劃實現他在莫斯科的豪言壯語。有關莫斯科會議的文件和消息在中國報紙刊登以後，引起中共幹部和黨員的廣泛興趣。據《內部參考》報道，很多人從宣言的行文用語判斷，這個文件是中國人（毛澤東或陳伯達）起草的，體現了《人民日報》兩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的精神，人們為此感到自豪和鼓舞。[1]這無疑更激發了毛澤東那把中國搞成經濟大國的鬥志。毛澤東說過，他與斯大林打了個平手，對赫魯曉夫還是略佔上風的。但這次從蘇聯回來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十分明顯地感覺到，毛澤東的壓力很大，脾氣也變得急躁了。他曾對葉子龍說：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難道比打敗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還困難嗎？我不相信！[2]

1 莫斯科會議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計劃和安排

當時中國的經濟正在穩步發展。經過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初的反冒進，各方面的基本建設和生產都恢復了正常狀態。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反駁了所謂「1956年全面冒進，1957年全面冒退」的說法，他指出：「我們應該懂得，任何事情都不會是直線發展的。隨着客觀條件的變化，發展速度總會有快有慢，並且常常會出現不平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也是這樣。尤其是像我們這樣人多且窮的國家，由於農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時常發生，要求國民經濟年年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3]

7月1日，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作《關於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和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報告規定1957年工業總產值比1956年增長4.5%，其中，消費資料增長1.1%，生產資料增長8%，鋼產量增長11%，原煤增長10.7%，（由於1956年部分農業原料減產）棉紗、棉布產量分別比上年減少11.7%和14.7%。基本建設投資111億元，比上年實際完成數139.9億元減少20.6%。薄一波後來認為，1957年的綜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較好，經濟發展的比例關係也較為協調。積累佔國民收入使用額的比例，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基建撥款佔財政支出的比例，同當時國家的經濟承受能力是相適應的。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節餘。當年商品貨源顯著大於當年社會購買力，市場繁榮。實踐證明，1957年實行「重點發展，適當收縮」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4]

在這個基礎上，國務院研究並確定了1958年和二五計劃的經濟發展方針。7至8月召開的第五次全國計劃會議研究了1958年國民經濟發展方針和控制數字。會議針對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提出了編制1958年度計劃控制數字的方針，即在肯定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基礎上，貫徹執行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提高農村水利投資比重，增加能夠促進農業生產的工業的投資，以加速農業的發展；積極地發展原材料工業，特別是發展某些特殊的和供應不足的原材料的生產：繼續貫徹執行大中小型企業相結合和充分利用小工業、手工業的政策。會議通過的1958年經濟計劃的控制數字是：工業總產值666.1億元，農業總產值632.9億元，分別比1957年預計增長8%和4.8%；鋼和煤比1957年分別增長16.1%和11.9%；糧和棉分別增長5.1%和7.8%，基建投資確定為116億元，比1957年預計增長8.7%。[5]

8月13至20日，周恩來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了第十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提出了二五計劃的方針政策性問題：總的方針是從六億人口出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在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基礎上，解決農業落後和工業薄弱部分的問題，集中力量擴大再生產。為此應適當降低基建、生產、設計方面的標準，削減非生產性的、消費性的開支；農業發展應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為主，開荒為輔，重點是抓化肥和水利。1962年產糧5000億斤，估計可達到，產棉4800萬擔達不到；工業發展速度要由「一五」時期年增長17.4%降為13.6%，重工業增長率由23%降為15%。工業內部比例關係要調整，加快同農業、輕工業有關的工業部門及原材料工業的發展。周恩來在會上指出，在農業國的窮底子上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時間要拖長些，估計要三四個五年計劃。[6]

為此，國家計委與蘇聯協商了減少和修改蘇聯援建項目的問題，並向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做了報告。報告說，按一五計劃期間簽訂的協議，蘇聯援華建設項目共255項，現在保留181項（一五計劃內建成63項，二五計劃內建設118項），擬撤銷74個項目，其中包括已經雙方同意撤銷的23項，不建的41項，撤回自建的10項。報告認為，通過清理這255個項目，說明一五計劃期間有些項目搞得急了些，國防、機械工業有的規模過大，專業劃分過細。援建項目減少後，二五計劃可減少支出26億盧布，設計費減少1至2億盧布。因此，二五計劃期間應強調自力更生，有些方面可請蘇聯重點援助，但不要全面援助。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分別於9月4日和18日批准了此報告。[7]

2 毛澤東再次提出在經濟建設方針上反右傾

但是，對於這一切安排，毛澤東是非常不滿的。早在周恩來提出反冒進的時候，毛澤東就有不同意見，只是礙於當時的形勢，沒有講出來。[8]現在，反右派的鬥爭已經大獲全勝，毛澤東又開始集中精力考慮經濟建設問題了。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做了總結性發言。這個講話改變了中共八大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論點，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與此同時，毛澤東對經濟工作方針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並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張。他說：

> 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
>
>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比如鋼的產量，我們可不可以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達到兩千萬噸？經過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開小鋼廠。
>
>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那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有沒有可能？請大家研究一下。
>
> 還掃掉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
>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說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要促退，我也沒辦法。但是，從這次會議看，大家都是想促進，沒有哪一篇演說是講促退的。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同盟。[9]

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全民討論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通知，要求在全民中展開一次大辯論，「目的在於認清方向，堅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國」。[10]此後，毛澤東開始準備他的莫斯科之行。

現在可以看出，在莫斯科繼赫魯曉夫宣布要超過美國之後，毛澤東立即提出中國趕超英國的口號，並非心血來潮。其實，早在1955年毛澤東就提出「我們的目的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不過，毛澤

東當時設想的時間是要經過五十年或者七十五年。[11]1957年有所提前，但還是要經過四十至五十年。[12]現在蘇聯提出十五年，中國自然沒有這個實力，因此退而求其次，把趕超的目標改為英國。即使如此，按中國的實際條件，要達到這個目標，也需傾全國之力。為了動員全國民眾投入到經濟建設的高潮中來，毛澤東知道首先必須進行輿論準備，造成一種聲勢。

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社論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符合於客觀規律的。1956年的成績充分反映了這種躍進式發展的正確性。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因為不懂得這個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後農民群眾的偉大的創造性，所以他們認為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13]

據說，這篇社論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定的。[14]毛澤東還從莫斯科給國內打電話，對1956年的反冒進提出了批評，說以後再也不要提反冒進了，搞社會主義就要冒一點。[15]毛澤東非常看重這篇社論，特別是其中的「躍進」一詞。他在1958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再讀這篇社論，並致函與會者說：「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毛澤東特別指出：「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16]其實，「躍進」一詞並非這篇社論的創造。周恩來在1957年6月26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兩次使用了這個詞。[17]但無論如何，把「大躍進」作為調動全國人民積極性的「偉大口號」，並以此命名一場經濟建設的群眾運動，其發明權應屬毛澤東。

毛澤東回國以後，立即向全國宣布了趕超英國的口號。11月25日《人民日報》在提出這個目標時，說得還比較謹慎：「十五年以後，蘇聯將在按人口計算的產量方面超過美國。可以預期，在同一期間，或者稍多一點時間，中國可能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到那個時候，社會主義陣營將在和平競賽中把帝國主義陣營更遠地拋在後面。」[18]12月2日劉少奇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祝詞時，再次宣告了這一目標。[19]

根據這個要求，毛澤東提出重新修改經濟計劃。12月4日，在國家

計委委務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關於二五計劃的指示。毛澤東指出：從1956年冬到今年大半年，多快好省和農業綱要很少有人提了，有的人認為不行了。這就是沒有看到1956年的主流是社會主義改造和生產建設的大高潮、大躍進，雖然執行中有某些缺點，但總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充分可靠」，不能片面地了解為愈少愈好，應該是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條件下的充分可靠。生產與基建在好省的基礎上盡可能愈多愈快愈好。要掀起新的生產建設高潮。十五年後，蘇聯要趕上和超過美國，中國要趕上和超過英國。根據這一目標，在工業方面也應搞出一個像農業四十條那樣的綱要來，作為工業的奮鬥目標。保證重點的方針仍很重要，不能百廢俱興，分散力量。[20]

然而，國務院的動靜並不大，仍然按部就班地安排工作。12月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1958年國家預算草案時，會議認為，1957年預算收支是有成績的，上半年控制得比較緊，下半年該追加的追加、該預支的預支了，這種先緊後鬆的做法，是必要的，應該成為慣例。1958年的國家預算，考慮到十五年後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問題，因此預算收支應該打得積極一些，收支指標定為331—333.66億元，2.59億元的赤字要設法平衡。審議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時，對國家經委提出的幾個指標確定為：糧食產量3920億斤，棉花產量3500萬擔，棉田播種面積為9000萬畝，猪的產量為1.5億頭，棉紗480萬件，基本建設投資定為125.67億元。[21]這些指標都是比較謹慎的。同時，李富春在工會八大作報告時，仍舊強調，在今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還必須貫徹執行從六億人口出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由於中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後，在國民經濟計劃中尤其應當注意做到全面照顧，全面安排。除了解決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發展關係問題外，還必須相應地注意國民經濟其他各個部門之間的關係問題，經濟建設和文教建設之間的關係問題，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和那一部分人民的生活之間的關係問題等等。[22]這些都是毛澤東不愛聽的話，他覺得自己在北京似乎已經難以有所作為。

12月8日毛澤東離開了北京，他認為「北京的空氣沉悶，華東的空氣活躍，想以地方來促北京」。[23]毛澤東到了杭州以後，12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這篇社論是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據他說：在訪蘇前就開始寫了，因為沒有寫完，帶到莫斯科去了。「閒來無事江邊望」，有點閒功夫，就在我們代表團中間先讀一讀。回來又經過斟酌，政治局還有一些同志看過才發表的。多、快、好、省，這是代表中央的，是黨的一個路線，是我們搞建設的一個路線。[24]這篇經過毛澤東反覆思考的文章，主題還是批

判反冒進，批判右傾保守。社論專門有一段提到：

> 在去年秋天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幹部中間颳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颳掉了。有的人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訂得冒進了，行不通；有的人說，1956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全部冒進了，甚至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冒進了，搞錯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等等。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25]

這篇社論再次吹起了向經濟發展方針中的「右傾保守」路線開火的號角，並以此為開端，毛澤東連續在南方召開各種黨內會議，批判反冒進，提倡大躍進。一個轟轟烈烈、震盪全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在1957年底已經呼之欲出。

[1]《內部參考》，1957年11月25日，頁15—16；11月27日，頁7—9；11月29日，頁11—15；上海市檔案館，A77-2-404，頁10—12。

[2]《葉子龍回憶錄》，頁187、213。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311—312。

[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560—561。

[5]《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頁106。

[6]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四卷，1991（未刊），頁257。

[7]《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紀》，第四卷，頁264；《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築業卷》，頁370—373。

[8]詳見本書第三章。

[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597—610。

[10]《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57—1992）》，頁61。

[11]《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500。

[1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63。

[13]《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

[14]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58。

[15]1984年訪問顧卓新談話記錄，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01—402。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254。

[1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306、312。不過，周恩來未敢覬覦這個「偉大口號」發明權。他在看到毛澤東信函後，立即寫信給毛，深刻檢討自己雖然使用了「躍進」一詞，但並未領會其精神實質。參見吉林省檔案館，1/1-14/75，頁9。

[18]《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5日。

[19]《人民日報》，1957年12月3日。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111。

[2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第四卷，頁343。

[2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112。

[2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36。

[24]《毛澤東傳（1949—1976）》，頁766。

[25]《人民日報》，1957年12月12日。

後記

學界同仁看到此書可能會感到奇怪：本人以往的研究方向是蘇聯史和冷戰史，怎麼突然加入了中國現代史的研究隊伍？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如此跳越，確有很大難度，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2000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我與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及學術伉儷金觀濤和劉青峰相識，一見如故，交往甚密。我們經常一起飲酒暢談，討論學術問題，講述人生感悟。一次交談中，他們提到研究所計劃組織編寫一部多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史著作，因感香港史學界無人能為，故託我在大陸尋找作者。既是朋友，我便滿口應承下來。

回到大陸不久，很快聚集了十餘位國內著名的國史研究者。經過幾番議論，大家都認為確實需要對共和國的歷史進行深入和客觀的研究，且史料亦有一定積累，現有港方出資，何樂不為。開始分工時，我只是聯絡人，沒有寫作任務。幾次聚會後，我的責任已盡，本該退出，但大家一致認為我也必須參與討論和寫作，否則這樣一項長期的研究工作，缺乏組織者將難以為繼。此外，我掌握的大量有關中蘇關係的俄國檔案，對這段歷史研究是大有用處的。我在討論中也深深感到，對共和國歷史的深入了解，大大有助於自己的冷戰史，特別是中蘇關係史研究，況且50年代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又是密不可分的，於是便答應下來，確定搞1956—1957年這一段（此期與蘇聯關係更為密切些）。

收集了一年材料後，感到困難重重，儘管檔案文獻和其他資料找到不少，但總覺得不好下手進行疏理，畢竟是缺乏背景知識。但是，「上山容易下山難」，大家都在按照進度向前走，我也只好硬着頭皮啃「骨頭」。好在有一批國史研究高手在身邊，可以隨時請教和求援。我們也算是一個課題組吧，大家經常聚會，交流看法，互通材料，對我的幫助確實很大。說實在話，本書得以完稿，一半在個人努力，一半在大家提攜。在這裏，我特別要感謝中央黨校的韓鋼教授、國防大學的蕭冬連和林蘊暉教授，他們三人對我幫助最大：不斷向我提供材料，經常與我討論問題，甚至幫我調整思路，疏理史料，有些問題沒有他們的努力，靠我個人是無法解決的。

我還要感謝金觀濤、劉青峰、陳方正等香港學界的朋友，他們不僅提供了大量研究和出版經費，而且經常參與討論，提出許多視角獨特、

高屋建瓴的看法，使人受益匪淺。

在這次研究經歷中，我有一點感受，即「跨行業」研究，只要跨度不太大，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加深和拓寬了本來的研究思路，既啟發思想，又開闊眼界。不過，我這樣說，並沒有「改行」的想法。本書完成後，我將繼續蘇聯史和冷戰史研究。

沈志華

2006年6月於北京南郊家中

附錄

大事記

1956年

1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對目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應注意的問題的指示〉、〈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於財產清理估價中若干具體問題的處理原則的指示〉、〈關於對公私合營企業私股推行定息辦法的指示〉。

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的社論。社論對中共中央「多、快、好、省」的方針作了解釋。

1月10日—2月7日第三次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按照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精神，討論了計劃草案，座談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和十五年遠景計劃輪廓。

1月14日—20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加強黨對知識分子和整個科學文化工作的領導及政策調整問題。

1月15日北京各界二十多萬人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慶祝北京市農業、手工業全部合作化，並且第一個實現了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人民日報》為此發表題為〈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論。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1月30日—2月7日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郭沫若作了題為〈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知識分子的使命〉的報告，陳叔通作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告，董必武作了關於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問題的報告，章乃器作了關於提案審查的報告。

2月14日—25日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朱德、鄧小平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參加了大會，朱德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講話並宣讀中共中央賀詞。

2月16日—3月3日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召開了第五次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

3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普遍整頓合作社，開展春耕生產〉的社論。

3月5日毛澤東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手工業工作情況，並指示：個體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底以前只組織二百萬人，速度慢了一點。今年頭兩個月就發展了三百萬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這很好。

3月26日中國、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朝鮮、蒙古人民共和國、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代表在莫斯科締結關於成立聯合核子研究所的協定。

4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題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

4月7日第三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檢查了1955年肅反鬥爭中的審判工作。

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地方工業部黨組〈關於私營工業改造座談會的報告〉。

4月22日—5月1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達賴喇嘛致開幕詞，陳毅副總理宣讀國務院命令，並代表國務院把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印鑑授予籌委會主任達賴喇嘛。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定，藝術問題上的「萬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花爭鳴」，應該成為中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

4月間中共中央轉發商業部黨組〈關於城市私營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幾個問題的報告〉。

5月中共中央轉發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關於深入改造農村私營商業做為供銷業務的報告〉。

5月12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通過〈關於調整國務院所屬組織機構的決議〉，決定設立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技術委員會等機構。

5月12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體制會議。會議對於當前存在着的中央集權過多的現象作了檢查，並提出了〈關於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報告會，宣傳部長陸定一作題為〈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對中共中央的這個方針作了全面的闡述。

6月15日—30日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於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李先念作的〈關於一九五五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和廖魯言作的〈關於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的説明〉。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既要反對保守主義，又要反對急躁冒進〉的社論。

6月25日李維漢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題為〈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言，提出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一個重大方針，再一次宣告，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是共產黨的一條「固定不移」和「永遠不變」的原則。

6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國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的報告。

7月2日—4日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開統一戰線工作和其他有關問題座談會。與會的地方民主黨派負責人討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7月14日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講話。

8月國務院舉行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在公私合營企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關於私營企業在合營時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和〈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事項的決定〉。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七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9月15日—27日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主持大會並致題為〈增強黨內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開幕詞。大會討論和通過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並通過了周恩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聽取了部小平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10月23日—31日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商議處理波匈事件。

10月24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放寬農村市場管理問題的指示〉。

11月10日—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就目前時局，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糧食和主要副食品問題分別作了報告。毛澤東作了總結性發言，號召採

取整風方法，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作鬥爭。

12月8日毛澤東出席全國工商聯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各市代表團負責人座談會。

1957年

1月7日—19日周恩來率政府代表團應邀訪問蘇聯、匈牙利和波蘭，協助處理波匈事件善後事宜。

1月18日，發表了〈中蘇聯合聲明〉。

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組成五人小組，陳雲任組長，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國家的經濟工作。

1月18日—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主要討論了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和經濟問題。27日，毛澤東到會講話。

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

3月6日—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上傳達和討論了毛澤東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着重講了知識分子問題、準備整風問題和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問題。

3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

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4月30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歡迎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

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甚麼要整風〉的社論，並廣泛開展整風運動的宣傳動員，全黨整風運動逐步展開。

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開展批評的指示〉。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

主人士舉行座談會，徵求對黨的工作的意見。

5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各項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

5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

5月15日—6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全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

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

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

5月25日劉少奇主持召開全國人大一屆七十次會議，決定人大四次會議推遲到6月20日召開。

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6月6日—9月17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將整風運動轉為反右派鬥爭。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準備學生回鄉工作和在反擊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對人物應有具體分析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6月18日—7月6日各民主黨派分別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作出開展整風的決定。

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

6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肅反運動的進展情況和當前任務〉的報告、〈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的補充解釋。

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

6月26日—7月15日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聽取和討論

了周恩來〈關於政府工作的報告〉、李先念〈關於國家決算和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和薄一波〈關於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結果和1957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為該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7月17日—21日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着重討論了反右派鬥爭問題。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寫了〈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印發與會者閱讀。

7月25日—8月22日全國計劃會議召開。會議研究了1958年國民經濟發展方針和控制數字。

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反對右派分子的指示〉。

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

8月18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由國家計劃收購（統購）和統一收購的農產品和其他物資不准進入自由市場的規定〉。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中應注意的事項的通知〉。

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在全國中學和師範學校學生中開展一場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

9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問題的指示〉。

9月4日人民解放軍政治部發出指示，要求在武裝力量成員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9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

9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糧食工作會議。由於1956—1957度糧食收支發生七十億斤差額，造成夏秋兩季糧食緊張。

9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企業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

9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

9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指示〉、〈關於做好農業合作社生產管理工作的指示〉和〈關於在農業合作社內部貫徹執行互利政策的指示〉。要求改進合作社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將合

作社的規模縮減到「一村一社」，以及用增加經濟刺激的辦法將上中農挽留在社。

9月20日—10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關於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陳雲作了〈關於改進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和農業增產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10月9日全體會議上指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

10月13日毛澤東召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會議主要討論整風問題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問題。

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

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中等學校和小學的教職員中開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通知〉。

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

11月2日—21日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並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莫斯科會議，會議簽署並發表了〈莫斯科宣言〉。

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高潮〉。

11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國務院關於改進經濟管理體制的文件：〈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於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和〈關於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文件總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業管理、商業管理和財政管理的權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機關和廠礦企業單位。

12月2日—12日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號召全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爭取十五年後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

1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

參考文獻

一 檔案

上海市檔案館

A22-2-515 A77-2-404

A22-2-516 B163-2-279

A22-2-601 C48-1-113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

109-00083-03 109-00828-02

109-00529-01 109-00828-04

109-00637-01 109-00969-01

109-00751-01 109-00971-02

109-00761-04 109-00972-01

109-00762-01 109-01028-04

109-00762-02 109-01035-02

109-00762-03 109-01040-01

109-00762-04 109-01041-01

109-00787-18 109-01044-01

109-00788-01 109-01090-01

109-00790-01 109-01090-23

109-00826-02 109-01091-01

109-01124-08 109-01812-01

109-01138-01 203-00023-01

109-01141-01 203-00023-04

109-01141-02 203-00072-01

109-01141-03 203-00107-01

109-01157-01 204-00054-04

109-01654-02

吉林省檔案館

1/1-14/59 1-11/1-1955.55

1/1-14/68 1-11/1-1955.139

1/1-14/75 1-11/1-1955.161

1/1-14/126 1-12/1-1956.101

1-4/4-1953.15 1-13/1-1956.102

1-5/5-1956.13

陝西省檔案館

123-40-1 123-43-4

123-40-6 123-43-8

123-40-15 123-43-10

123-40-18 123-43-22

123-40-19 123-43-24

123-40-20 123-43-29

123-40-21 123-43-38

123-40-24 123-43-466

123-40-43 123-43-468

123-40-45 123-43-469

123-40-47 123-43-470

123-40-49 123-43-471

123-43-1 123-43-472

123-43-2 123-43-493

123-43-3

雲南省檔案館

2-1-2684 2-1-2954

2-1-2685 2-1-2957

2-1-2688 2-1-3013

2-1-2735 2-1-3194

2-1-2736 2-1-3195

2-1-2737 2-1-3197

2-1-2738 7-1-778

2-1-2739 7-1-804

2-1-2740 7-1-867

2-1-2741 7-1-869

2-1-2742 7-1-949

2-1-2743 7-2-245

2-1-2745 7-2-247

2-1-2749 7-2-273

2-1-2750 7-2-292

2-1-2751 7-2-317

2-1-2753 7-2-359

2-1-2951 7-2-360

2-1-2952

福建省檔案館

101-5-819

101-5-982

136-9-294

遼寧省檔案館

ZE1-2-67

ZE1-2-138

香港大學圖書館縮微膠卷檔案（英文）

MF2524607-0807,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Kong

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ВПРФ）

ф.079, оп.11, л.13, д.5

ф.0100, оп.42, л.288, д.19

ф.0100, оп.43, л.302, д.10

ф.0100, оп.48, л.393, д.9

ф.0100, оп.49, л.410, д.9

ф.3, оп.12, д.1008, л.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АПРФ）

ф.3, оп.23, д.63 ф.45, оп.1, д.329

ф.3, оп.23, д.200 ф.52, оп.1, д.169

ф.3, оп.24, д.489 ф.52, оп.1, д.196

ф.3, оп.65, д.589 ф.52, оп.1, д.498

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73

俄羅斯國家經濟檔案館（РГАЭ）

ф.4372, оп.96, д.693

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ЦХСД），後改為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РГАНИ）

ф.1, оп.2, д.1 ф.4, оп.16, д.42

ф.1, оп.2, д.17 ф.5, оп.28, д.381

ф.1, оп.2, д.18 ф.5, оп.28, д.396

ф.1, оп.2, д.81 ф.5, оп.28, д.407

ф.2, оп.1, д.415 ф.5, оп.28, д.409

ф.3, оп.8, д.388 ф.5, оп.30, д.4

ф.3, оп.8, д.389 ф.5, оп.30, д.7

ф.3, оп.10, д.22 ф.5, оп.30, д.84

ф.3, оп.12, д.1007 ф.5, оп.30, д.163

ф.3, оп.12, д.1008 ф.5, оп.49, д.41

ф.3, оп.14, д.4 ф.5, оп.49, д.128

ф.3, оп.14, д.39 ф.5, оп.49, д.142

ф.3, оп.64, д.485 ф.5, оп.49, д.408

二 文獻

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文獻選載，1956年1—2月，《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

1956年前後毛澤東等同志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的文獻五篇，1956年4月28日至1957年4月6日，《黨的文獻》，1988年第6期

1957年整風運動文獻選載，1957年4月27日至5月16日，《黨的文獻》，1991年第5期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45.8—1957.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上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至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註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至七、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至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199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57—1992）》（北京：學習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文件匯編（1949—196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斯大林文選（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印發：《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考資料（第二輯）》（未刊），1956年1月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國民主黨派史文獻續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印行（未刊），1986年

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翻印：〈陸定一、周揚在全國政協黨組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9月16、17日〉，1957年11月，載美國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匯編·五十年代後期「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歷史資料專輯》，第二十二輯第一分冊，洛杉磯，2002年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抗美援朝運動資料匯編》（北京：知識出版社，1993）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七至二十二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1986）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築業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综合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

中國青年出版社：〈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論文集〉，1957年8月20日，載美國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匯編·五十年代後期「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歷史資料專輯》，第二十二輯第八分冊，洛杉磯，2003年

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內部讀物）（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關於費孝通的「重訪江村」的一些材料〉，1957年8月，載美國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匯編·五十年代後期「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歷史資料專輯》，第二十二輯第二分冊，洛杉磯，2002年

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0日，《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3日，《黨的文獻》，2006年第1期

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毛澤東關於學術自由的幾個文件，1956年2月至1957年4月，《文獻和研究》，1983年第12期

毛澤東聽取第二個五年計劃匯報時的談話紀要，1956年4月18—24日，《黨的文獻》，2004年第1期

北京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編譯：《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中央全會文件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编（1955—1958）》（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

伊薩科夫等：〈反李森科學派鬥爭的史料〉，《斯大林研究》，第二、三，四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編：《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勢力》（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編：《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反革命陰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

有關中共八大的一組文獻，《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1期

朱德在蘇共二十大上的講話，1956年2月25日，《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

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匯編》（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四、六，七，十二、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沈志華編：〈建國前夕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部分俄國檔案〉，《黨的文獻》，2002年第1期、第2期

沈志華編：〈關於朝鮮停戰的俄國檔案選編〉，《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4期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

周恩來：〈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1956年5月3日：《黨的文獻》，1993年第1期

周恩來反冒進文獻五篇，1956年4月10日至6月12日，《黨的文獻》，1988年2期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4）

林克：《林克日記（1955—1964）》（手稿），未刊

建國初期156項建設工程文獻選載，1952年9月至1954年10月，《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

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一至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994）

首都戲曲界聯合整風辦公室編印：《首都戲曲界反右鬥爭資料（第一輯）》，1957年12月，載美國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匯編·五十年代後期「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歷史資料專輯》，第二十二輯第五分冊·洛杉磯，2003年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

國務院關於國家計委〈關於1956年度基本建設和物資平衡問題的補充報告〉的批示，1956年4月14日，《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十一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郭曉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1957年日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陳雲：《陳雲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陳雲：《陳雲文選（1949—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傅雷：《傅雷家書》（北京：三聯書店，1994）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趙永穆等譯：《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

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的一組文稿，1955年12月至1956年9月，《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鄧力群編輯和整理：《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著，中共中央編譯局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文獻三篇，1956年4—5月，《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關於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柯夫達的建議的一組文獻，《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2期

關於反冒進的文獻四篇、1956年4—7月，《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論述選載，1956年1月至1961年1月，《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文獻選載，1954年3月至1956年11月，《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關於蘇聯專家問題的幾則中國檔案，《中共黨史資料》，總第八十二輯

關於蘇聯專家對我國二五計劃草案意見的一組文獻，《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1期

關於蘇聯顧問和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對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計劃草案的意見的研究結果報告，1955年6月9日，《中共黨史資料》，總第七十八輯

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年計劃任務的意見書，

《中共黨史資料》，總第六十九輯

蘇聯顧問對我國五年計劃綱要（初稿）的建議，1954年5月，《中共黨史資料》，總第七十八輯

鐵托：《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關的評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Christian Ostermann, ed., 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 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6）.（關於1956年匈牙利秘史的解密文件）

Csaba Békés, Maicoi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關於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解密文件）

Imre Nagy, On Communism, 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 1957）.（論共產主義）

Andrzej, Werblan "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Dzis, nr. 10, 1996r.（中國與1956年的波蘭危機）

Andrzej, Werblan 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 Dzieje Najnowsze, Rocznik X X IX, nr.4/1997（哥穆爾卡與周恩來1957年會談）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и т.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 X сь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蘇共二十大文件中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報告）

Артизов А. и т.д.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пиалы. Том II, Февпаль 1956-начало 80- хгодов, Москва: МФД, 2003（蘇共中央關於平反的檔案資料）

Волков В. 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蘇聯與1956年匈牙利危機）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1949-1953,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東歐中的蘇聯因素）

Ковалева Н.и т д,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1998（1957年蘇共中央六月全會速記記錄和其他文件）

Козлова В.А., Мироненко С.В., Эдельман О.В. Россия X 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ы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н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й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каталог, март 1953-1991., Москва, 1999（蘇聯檢察院對反蘇鼓動和宣傳案件的司法監督訴訟）

Дедовский А. Две телеф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No.6（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兩封電報）

Ледовский А.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No.2, No.3（米高揚秘密訪華）

Наумов В., 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н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9（貝利亞事件：1953年蘇共中央7月全會速記記錄）

Отклик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реше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1957.）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0, No.1（蘇聯勞動群眾對1957年全會決議的反應）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No.2（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會談記錄）

Рейман М. Рещин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 М. Маленкове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 No.1（蘇共中央關於馬林科夫問題的決議）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蘇共中央主席團文件匯編）

三 著作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鄭州：河南人民

出版社，2001）

山多爾·科帕奇著，龔新康譯：《匈牙利悲劇》（北京：群眾出版社，198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1》，上、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王逸舟：《波蘭危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尼古拉·津科維奇著，郅友昌等譯：《權力與爭鬥》（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本·福凱斯著，張金鑑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石仲泉等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江平主編：《當代中國的統一戰線》，上、下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何力邁、傅華等編著：《智識分子》（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何方：《黨史筆記》（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何曉明：《百年憂患——知識分子命運與中國現代化進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

何蘭階、魯明健主編：《當代中國的審判工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吳玉昆、馮百川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簡史（1950—1985）》，1987（未刊）

李士英主編：《當代中國的檢察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李丹慧主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李輝：《胡風集團案件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

李覺等主編：《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2000）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

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亞·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譯：《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編：《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彼得·弗萊雅著，柳公夏譯：《匈牙利悲劇》（台北：信達出版社，1971）

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拉齊奇著，夏平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事件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東方鶴：《張愛萍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林蘊暉：《中國20世紀全史》，第七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林蘊暉等：《凱歌行進的時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下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姜長斌主編：《斯大林政治評傳（1879—195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

胡宗剛：《不該遺忘的胡先驌》（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

胡舶：《冷戰陰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國的應策與互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1）

夏濟安主編：《匈牙利作家看匈牙利革命》（台北：文學雜誌社，1957）

孫其明：《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國務院辦公廳大事記編寫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記》（送審稿），第一至四卷，1991（未刊）

張金法：《中蘇共關係：中國民族主義的背離》（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6）

張柏春、姚芳、張久春、蔣龍：《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曹英等編：《共和國洗冤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

莫里斯·邁斯納著，張寧、陳銘康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陳其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

陳遠編：《逝去的大學》（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謝生亮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麥德維杰夫著，述弢譯：《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

麥德維杰夫著，蕭慶平等譯：《赫魯曉夫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彭敏主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89）

揚·普塔辛斯基著，于欣等譯：《哥穆爾卡的改革探索》（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

斯圖爾特·施拉姆著，田松年、楊德譯：《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

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第四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費正清著，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著，趙敏善等譯：《赫魯曉夫和他的時代》（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黃瑤、張明哲編：《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楊天石、姚鴻主編：《毛澤東剪影——〈百年潮〉精品系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楊天石、郭宏主編：《人物述往——〈百年潮〉精品系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楊天石、韓鋼主編：《史事探幽——〈百年潮〉精品系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楊天石主編：《文壇與文人——〈百年潮〉精品系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

社，1987）　《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

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雍濤：《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劉克明、金揮主編：《蘇聯政治經濟體制7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劉延東主編：《當代中國的民主黨派》（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

劉祖熙、劉邦義：《波蘭戰後的三次危機》（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

劉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劉國新、劉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長編》，第三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劉國新、賀耀敏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長編》，第四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

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錢臨照、谷羽主編：《中國科學院》，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修訂版（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

謝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卷（北京：當代中國

出版社，1992）

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謝泳：《雜書過眼錄》（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

謝泳：《儲安平與〈觀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韓素音著，王弄笙等譯：《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聶榮臻傳》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魏斐德著，李君如譯：《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羅賓·艾莉森·雷明頓著，上海師大歷史系世界史翻譯組譯：《華沙條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羅銀勝：《顧準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

羅廣武編：《民主黨派大事年表》（北京：華文出版社，1998）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蘇雙碧、王宏志：《文革第一冤案——「三家村」文字獄始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Gyorgy Litvan, ed.,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Reform, Revolt, and Repression, 1953-1963（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6）.（1956年匈牙利革命：改革、動亂和鎮壓）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

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Forty Years On（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7）.（四十年後看1956年的匈牙利）

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Moscow v. Pekin（Baltimore: Pen- guin Books Inc, 1963）.（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

新冷戰）

Johanna Granville, The First Domino: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College Station, 2004）.（匈牙利危機期間的國際決策）

Morton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7）.（中蘇關係與核控制）

Huszar Tibor, Kadar Janos Politikai Eletrajza（1912-1956）（Budapest: Szabad Tёr Kiado- Kossuth Kiado, 2003）.（卡達爾的政治生涯）

Jeno Gyorkei and Miklos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蘇聯對匈牙利的軍事入侵）

Deborah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兄弟擁抱」：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最後遺產）

J. W.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中國製造原子彈）

O. A.,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兄弟擁抱」：中蘇同盟的興衰）

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тоды）,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2000（蘇聯專家與中國軍工企業的建立）

Зуд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戰後蘇聯社會：政治和日常生活）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5（冷戰：新觀點和新文件）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 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1995（冷戰年代的蘇聯對外政策）

Кулик В.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中蘇分裂：原因及後果）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赫魯曉夫的解凍）

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годы: темпы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6（1920—50年代蘇聯的軍事綜合體）

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 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9（1941—1991年的蘇聯歷史教程）

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No.65（中蘇科學技術合作）

四 論文

孔寒冰：〈蘇聯經濟模式是如何在中國確立起來的〉，《俄羅斯研究》，2000年第1期

文嚴：〈「雙百」方針提出和貫徹的歷史考察〉，《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方舟子：〈從「絕不退卻」到「百家爭鳴」——遺傳學痛史〉，《書屋》，2000年第11期

王也揚：〈毛澤東關於「雙百」的思想及其變化〉，《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王文：〈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共黨史資料》，總第六十六輯，1998年

王文滋：〈胡繩晚年論社會主義模式〉，《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王先俊：〈建國初期的社會變遷與黨對思想文化的整合〉，《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

王來悚：〈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3年第3期

王真：〈50年代中期我國對蘇聯建設模式的突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王善中：〈論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黨史研究資料》，2003年第2期

王雙梅：〈劉少奇與中共八大政治路線的確立〉，《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

史唯：〈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

田松年：〈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基本政策〉，《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

石仲泉：〈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前奏曲〉，《黨的文獻》，1988年第6期

伍小濤：〈反右與江蘇的宗教改造〉，《二十一世紀》（香港），2005年12月號

仲潮浩：〈毛澤東三次見哥穆爾卡〉，《中共黨史資料》，總第83期

刑和明：〈1956年中共對蘇聯模式認識的轉變及啟示〉，《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12期

余敏玲：〈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響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灣），第40期，2003

李丹慧：〈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係的演變〉，載李丹慧主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

李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黨的文獻》，1991年第1期

李慎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

李新宇：〈「早春天氣」裏的突圍之夢——五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知識分子話語〉，《黃河》，1998年第5期

沈正樂：〈米高揚「報告」中關於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想質疑〉，《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

沈志華：〈對中蘇同盟經濟背景的歷史考察〉，《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

沈志華：〈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沈志華：〈對50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

究》，2002年第3期

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期

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載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史研究》，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沈志華：〈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汪裕堯執筆：〈關於「論十大關係」的產生、整理和發表〉，《文獻和研究》，1982年第8期

周承恩：〈也談「八大」懸案〉，《百年潮》，2003年第5期

林祥庚：〈劉少奇與多黨合作制度〉，《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林蘊暉：〈20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轉之原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林蘊暉：〈蘇共二十大與毛澤東走自己的路〉，《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1期

林蘊暉：〈起步探索的1956年〉，《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武力：〈論八大對蘇聯工業化模式認識的深化及其歷史局限〉，《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6期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香港），1997年4月號

施肇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重要理論觀點的修改始末〉，《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

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

韋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百年潮》，1998年第2期

夏杏珍：〈「雙百」方針的形成過程〉，《中共黨史資料》，總第五十八輯

時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國的政策〉，《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馬貴凡：〈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

馬嘶：〈中國知識分子的收入變遷〉，《中外書摘》，2003年第12期

高正禮：〈中蘇論戰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

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誕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形成過程〉，《黨的文獻》，2002年第4、5、6期

逄先知執筆整理：〈關於毛澤東思想提出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1982年第1期

張冠軍：〈中共八大前後曾探索黨代會常任制〉，《黨史博覽》，2005年第12期

張柏春、張久春、姚芳：〈中蘇科學技術合作中的技術轉移〉，《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

張秋雲、鄭淑蘭：〈一篇反冒進社論的由來〉，《黨的文獻》，1990年2期

張國星：〈關於右派的人數和性質〉，《黨史博覽》，2005年第6期

郭鐵成：〈應尊重文學史的基本史實——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文藝爭鳴·評論》，2005年第4期

陳夕：〈156項工程與中國工業的現代化〉，《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

陳清泉：〈陸定一推行「雙百」方針始末〉，《炎黃春秋》，2000年第9期

章立凡：〈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1957〉，《二十一世紀》（香港），1997年4月號

黃一兵：〈馬哈伊斯基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左」傾錯誤之緣起〉，《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

黃景芳、湯麗霞：〈試析黨的八大未宣布過渡時期結束的緣由〉，《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楊明偉：〈創建、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黨的文獻》，

1994年第3期

楊鳳城：〈1949—1956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楊鳳城：〈對有關50年代中期「雙百方針」某些問題的歷史反思〉，《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董志凱：〈156項的確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4期

董志凱：〈中共八大對「一五」經濟工作的分析〉，《中共黨史資料》，總第六十輯

董志凱：〈毛澤東在「八大」前後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設想〉，《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1期

裘實編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三種俄文版本〉：《蘇聯問題研究資料》，1987年第2期

廖心文：〈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糾「左」的艱辛路程〉，《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4期

熊華源：〈論周恩來在反冒進中的探索〉，《黨的文獻》，1988年第2期

熊華源：〈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會議——1956年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情況介紹〉，《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

熊華源：〈關於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提出的時間〉，《黨的文獻》，1992年4期

維克托·烏索夫：〈原子能問題是如何破壞蘇中友誼的？〉，《新聞時報》（俄），2003年8月6日。國際互聯綱：www.scol.com.cn

翟志成：〈百花齊放聽新鶯——「抽象繼承法」提出的時機及其失與得〉，《大陸雜誌》（台灣），第95卷第4期，1997

翟志成：〈馮友蘭的抉擇及其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台灣），第20期，2002

聞言實：〈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的調查研究與《論十大關係》的發表〉，《黨的文獻》，2006年第1期

黎漢基：〈金岳霖的思想改造〉，《新史學》（台灣），第13卷第1期，2002

閻明復：〈代序〉，載趙永穆等譯：《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載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

謝泳：〈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四個著名知識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論〉，國際互聯網：www.usc.cuhk.edu.hk

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國際互聯網：www.fortunecity.com

謝泳：〈重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南方文壇》，2002年第6期

謝泳：〈錢鍾書的內心世界〉，國際互聯網：www.sina.com.cn

謝瑩：〈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始末〉，《黨的文獻》，1997年第5期

霞飛：〈姚文元在1957年〉，《黨史博覽》，2005年第9期

韓鋼：〈「八大懸案」釋疑〉，《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蘇利軍：〈西方關於新中國思想改造運動的研究述評〉，《黨史研究資料》，2003年第4期

龔育之：〈周恩來和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共黨史研究》，199S年第2期

Csaba Békés, "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2, 1992,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匈牙利革命的新證據）

Csaba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6, 1996（1956年匈牙利革命與國際政治）

Matthew Evangelista, "Why Keep Such an Army? — 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9, 1997（赫魯曉夫的裁軍）

Leszek Gluchowski, "Khrushchev, Gomulka, and the 'Polish October'", Cold War Project Bulletin, Issue 5, 1995（赫魯曉夫、哥穆爾卡與波蘭十月）

Leszek Gluchowski, "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7, 1997（1956年的

蘇波衝突）

Viktor M.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12, No.4, December 1999（蘇聯對中國的核政策）

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O. A.,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蘇軍事合作）

Johanna 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 "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16, No.2, Spring 2002（華沙和布達佩斯的新檔案）

Johanna Granville, "1956 Reconsidered: 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80, No.4, October 2002（為甚麼是匈牙利而不是波蘭）

Johanna Granville, "Reactions to the Events of 1956",Journal of Contemporary Vol.38 No.2, 2003（對1956年事件的反應）

Morton Halperin, "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 1957-1960", Morton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7）.（中蘇核關係）

Janos Ra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No.43, Jul.-Sep., 1970（匈牙利革命與百花運動）

Jeno Gyorkei and Miklos Horva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Gyorkei and Horvath, Soviet Military（蘇軍軍事佔領的新資料）

Mark Kramer,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 24 October 1956", Cold War Intertmtional Project Issue 5, 1995（1956年的波蘭與匈牙利）

Mark Kramer, "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1996/1997（蘇聯決策與波匈事件）

Mark Kramer, "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1996/1997（關於波匈事件的馬林筆記）

V. Mastn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saw Pact in 1955", N. E., Rosenfeldt B., Jensen and E., Kulavig ed., Mechanisms of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蘇聯與華沙條約的起源）

R. J. Service, "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Soviet Studies, Vol.33, No.2, April 1981（通向二十大的道路）

Y. Smirnov and V. Zubok, "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4, 1994（斯大林死後的核武器）

Tony Kemp-Welch,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 The Spring of 1956", Europe-Asia Studies, Vol.48, No.2, 1996（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與波蘭政治）

A. Werbian, "Czy Chinczycy uratowali Gomulke?", Polityka, 26 X 1991г.（中國人救了哥穆爾卡？）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No.2（關於二十大的新材料）

Аксютин Ю. В., Пыжиков А.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ева Х Х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и, 2002, No.2（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的秘密報告的醞釀準備情況）

Афиани В.Ю., Иванов Н.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уэц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ЦХСД, 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r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蘇聯與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

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ев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эета, 21 Февраля 1996г.（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如何形成的）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созник Комш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 ериал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нстория, 1993, No.4（共產黨情報局是如何解散的）

ГибианскийЛ,Я. Н.С.Хрушев, 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No.2（赫魯曉夫、鐵托與1956年的匈牙利危機）

Зубкова Е.Ю.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 Свобо дная мысль, 1999, No.3, No.4, No.6（蘇共的幹部政策與清洗）

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 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4（斯大林之後領導政策中的個人因素）

Кейпл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 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5（揭開中蘇之間的神話）

Медведев Ж. 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0, No.1（斯大林死之謎）

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1（蘇聯與匈牙利事件的新材料）

Наумов В.П. "Дело" маршала Г.К.Жукова, 1957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 2000, No.5, 2000, No.6, 2001, No.1（1957年的朱可夫事件）

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е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No.2（赫魯曉夫為爭奪個人權力的鬥爭）

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No.5（貝利亞的陰謀是否存在）

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ева на Х Х съезде КПС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No.4（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經過）

Наумов В.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No.4（赫魯曉夫與大規模政治鎮壓運動的犧牲品）

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 1953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No.1（駐東歐國家的莫斯科顧問）

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

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алкг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1995（1956年的波蘭事件和波蘇關係危機）

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No.6（1945—1958年蘇聯領導層的內部政治鬥爭）

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год 1956-й И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1995（1956年的布達佩斯與莫斯科）

Пыжиков Л. В.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0, No.8（蘇共二十大與社會輿論）

Пыжиков А. 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ш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No.4（赫魯曉夫解凍時期的文化政策問題）

Пыжиков А. В.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оттепели"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3, No.6（解凍年代的社會心理因素）

Пыжиков А. В. Советск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евских реформ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No.2（戰後的蘇聯社會與赫魯曉夫改革的出發點）

五 回憶錄和口述史料

于光遠：〈難忘黨的八大〉，《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4期

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王光偉：〈周總理與第一、二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載《懷念周總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王炳南：〈1956年波蘭「十月事件」的回憶〉，《國際問題研

究》，1981年第1期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

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卡德爾著，李代軍等譯：《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

瓦列金·別列什科夫著，薛福歧譯：《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吳冷西：《十年輪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李丹慧、沈志華採訪榮植記錄，2000年11月30日。

李丹慧、沈志華採訪朱庭光記錄，2000年12月1日。

李之璉：〈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載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

李莊：《難得清醒》（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

李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歷史片斷回憶〉，《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4期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李越然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蘇關係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言。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李新：〈反「右派」親歷記〉，《中共黨史資料》，總第六十七輯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下冊（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李銳：〈1958年那條「總路線」形成前後的黨內鬥爭〉，《炎黃春秋》，1996年第8期

李蘊暉：《追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沈志華、李丹慧採訪閻明復記錄，1998年3月。

沈志華、張玥等採訪李越然記錄，2001年10月29日。

沈志華採訪王亞志記錄，2001年6—8月。

沈志華採訪朱安康記錄，2004年4月17日。

沈志華採訪宣淼記錄，2002年12月22日。

沈志華採訪夏道生記錄，2004年6月8日。

沈志華採訪葉桐（Juhasz Otto）記錄，2004年3月26日。

沈志華採訪駱亦粟記錄，2004年4月17日。

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周巍峙：〈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一位創始人〉，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查爾斯·波倫著，劉裘、金胡譯：《歷史的見證（1929—196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范承祚：〈風範長記，教誨長銘——回憶我給毛澤東、周恩來做翻譯的歲月〉，《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

韋利科·米丘諾維奇著，達洲等譯：《莫斯科的歲月》（北京：三聯書店，1980）

韋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風濤〉，《百年潮》，1998年第2期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百年潮》，1997年第2期

徐鑄成：〈陽謀——1957年〉，《新華文摘》，1989年第2期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

徐鑄成：《親歷一九五七》（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載裴堅章主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二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載《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菲·丘耶夫著，劉存寬、薛銜天等譯：《莫洛托夫秘談錄——與莫洛托夫140次談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黃秋耘：《風雨年華》，增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楊尚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

葉子龍口述，溫衛東整理：《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

葉篤義：〈我的右派「罪狀」〉，《百年潮》，1999年第1期

葛佩琦：《葛佩琦回憶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榮植：〈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新年宴會〉，載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二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著，陳之驅等譯：《赫格居斯回憶錄——一個思想陰影下的生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

赫魯曉夫著，馬貴凡譯：《赫魯曉夫回憶錄》選譯（二），《中共黨史資料》，總第七十一輯

赫魯曉夫著，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赫魯曉夫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趙仲元：〈1956年隨朱德參加蘇共二十大〉，《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2期

劉有寬：〈周揚對戲曲改革的貢獻〉，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

劉彥順在「冷戰時期的中國與東歐」國際研討會（北京，2004年3月）發言。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潔泯：〈心曲萬千憶周揚〉，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

鄧力群談有關中共八大到廬山會議期間的一些重大事件，1998年4月16日

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一至五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匯編（未刊），2000

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蕭克、李銳、龔育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閻明復：〈我隨李富春訪問蘇聯〉，《炎黃春秋》，2005年第4期

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

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二）〉，《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1期

駱亦粟：（1956年「波蘭事件」和中國的政策＞，《外交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謝·赫魯曉夫著，郭家申等譯：《導彈與危機——兒子眼中的赫魯曉夫》（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上、中、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2）

龔育之：〈毛澤東和傅鷹〉，《百年潮》，1997年第1期

Arthur W. Chung, Of Rats, Sparrows & Flies....A Life time in China（Stockton：Heritage West Books, 1995）.（在中國的生活）

A. Kirov,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Gyorkei and Horvath, ed., Soviet Military（蘇聯對匈牙利的軍事入侵）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No.1-3（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

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89, No.5（斯大林與周恩來及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的會談）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 Новое Время, No.2-3（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

Хрущев И.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 1997（赫魯曉夫回憶錄選段）

六 報刊

《人民文學》，1957年

《人民日報》，1955—1958年

《大公報》，1957年

《工商界》，1957年

《內部參考》，1955—1958年

《天津日報》，1957年

《文匯報》，1957年

《文藝報》，1956、1957年

《北京日報》，1957年

《光明日報》，1956、1957年

《長江文藝》，1956年

《新華半月刊》，1957年

《解放日報》，1957年

《真理報》（Прáвда），1954、1956、1957、1963年

索引

一畫

一五計劃21，136，137，164，166，168，184，199，202，203，332，335—337，347，428，431，691，692，694，695，768

二畫

丁玲243，244，669，682，684

丁陳反黨集團669

九三學社26，224，226，261，277，483，488，536，537，546，579，623，624，640

二五計劃76，138，148，166，168，170，172，173，186，193—206，271，429，767，768，771

人大一屆三次會議74，182，183，224，273，289，294，339

人大四次會議76，131，600，604，629，766

人造衛星739，757，776

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75，76，224

三畫

三反運動32，38，142，228，277，505，542，563，571，581，582，638，643，670

于光遠73，238

千家駒281，542，550，583，623

大民主和小民主432

大國沙文主義94，117，391，393，395，396，425，442，446

大清洗93，94，99，101，110，294，374，376，401，703

大鳴大放515，525，556，564，568，588，590，594，595，597，615，620，632，649，664，674，723

大躍進143，145，162，336，347，65Z688，765，771—773

工人罷工375，433，448，449，499，615

工商界座談會561，570，582

工商業者改造623

四畫

中共七大315，316，319，320，354，360，561，368，505

中共七屆七中全會204，306，309—311，314，317，318，321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17，159，163，193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313，361，657，679，765

中共八大政治報告121，275，306—308，324，325，348，349，353，676

中共八大路線141，303，304，308，309，322，324，346，348，353

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323，327

中共八屆一中全會318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207，210，211，239，333，390，408，424，430，434，436，451，455，457，466，470，500

中共八屆三中全會326，516，631，647，648，654，655，661，662，672，675，679，680，689，768

中國民主促進會26，261，276，540，546，579，623

中國民主建國會26，261，276，453，486，536，539，541，542，583，623，644，653，654

中國致公黨261，539，545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26，224，261，276，536，539，540，542—544，548，567，572—574，582，609，615，616，623，624

中國農工民主黨261，542，543，623，64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42，220，301

中蘇友好協會130，699，717

五反運動142，228，277，505，538，563，571，581，583，638，670

六六六事件613

反冒進146—148，179，180，184—187，193，195，196，206

—208，210—211，308，766，768，770，771，773

尤金24，37，74，113，119—121，217，380，381，389—391，393，416，705，717，733—736

巴甫洛夫學說528

巴金46，335，478，531，606

引蛇出洞462，468，484，523，526，554，555，561—563，597，602，609，610，656

手工業者退社450

日內瓦會議16，25，63，123，692

毛澤東14—18，20，22—25，27—29，37，42，43，48，49，52—56，64，75，79，80，94，105，111，112，114—117，119—124，126—134，136—167，169—175，177—179，182—184，186—188，191，192，194，195，198—200，204，206，210—215，217—221，225，233，235，237，244—246，248—250，256，260—266，268，269，271—273，278，280，282，286，287，290，291，294，295，298—301，303，305—321，324—331，333，334，342，347，353，355，356，358，359，361—368，376—378，380—382，389—391，393，399—401，408，410，412，415，417—419，421—424，426，430—434，436—441，443，450，451，453，454，457—484，487—494，500—519，522—527，530，532—535，537—539，541—544，546，551—565，568，569，573，579，583，584，590，594，596—608，610—615，618—633，638，643，644，646，648，650，657，661—663，670，671，673—675，677—682，687，689—692，696，697，699—703，705—708，715，717—721，724—741，743—766，768—773

毛澤東思想361—366，441，523，554

王光偉199

王亞南230，510，633

王若望531，606

王飛432

王造時572，606，613，629，635，668，686—688

王蒙258—260，474，478，485，666

王稼祥114，117，318，702，731

五畫

主觀主義116，182，251，313，353—356，451，458，462—468，478，479，482，493，503，504，515，517，518，524，532，543，548，562，570，586，638，652，769

以蘇聯為首322，373，440，723，737，743—748，754，759

北大學潮596

卡岡諾·維奇100，102，204，385，392，405，413，420，697，698，703，705，735，738

卡達爾401，410，416，417，425，430

卡德爾457，732，749—751，753，759

右派人數627，662，664

右派言論560，564，602，605，622，625，628，633，634，655，656，664，668，669，724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261，276

尼赫魯707，762

布爾加寧74，100，312，399，405，413，420，697，709，712，716

民主黨派座談會535，557，561，562，564，574，611

民族主義94，350，364，370，375，395，396，403，438，637

田家英150，154，327，438，672，674

六畫

伊巴露麗109

伏羅希洛夫95，100—102，413，697，699，700，732

全面學習蘇聯130，132，136

全國司法工作會議292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476，484，502，511，513

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484

共同綱領273

共產黨情報局364，365，424，726，728，732，746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45，381，434，437，440，470，536，750

冰心581

匈牙利事件291，299，370，372，395，411，412，415—417，419，425，430，435，438—441，443—446，458，459，471，472，474，482，489，608，615，618，632，640，749

吉洪諾夫404，405

合作化15，18，19，128，134，136，143，147—151，154，156—161，184，185，197，307，334，339，340，342，343，346，450，452，457，472，490，495，555，563，594，655，660，664，678，770

多、快、好，省的方針51，147，148，165，180，182，186，206，333，769，773

安子文20，507

朱可夫385，405，407，408，413，419，697，704，715—717

朱德75，180，306，318，319，321，367，394，429，516，557，601，699

江豐669，683，684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215，219，220，280，285，297—301，308，368，378，379，402，470，473，476，482，488，491，501，502，504，506，512，514，515，524，529，533，550，571，597，611，650

米丘林學派216，238

米高揚92，93，99，100，102，105，106，111，114，120，128，135，140，201，261—263，381，385，386，404—406，411—414，418—421，691—693，697，701—704，716，725，726，732，759

老子黨作風394，719

老舍244，249，254，478

自由市場140，141，341，344—346，429，450，452—454，496—498，650

七畫

何思源62

何香凝567，624

別爾烏辛100，204，406，713

吳之瀚60，61

吳玉章362

吳冷西113，115，235，389，390，397，414，436，438，440，441，559，616，620，743

吳英愷60，61

吳德239

宋任窮711，713

宋振庭31

宋慶齡266，624，755，761

批右傾保守主義38，154—156，174，194，207，245，307，308

批評《人民日報》447，506，512，525

李井泉343，566，621

李四光40，63，73，76

李立三313，314

李先念147，171，179—181，183—185，187，197，306，308，318，319，333，497

李伯球543，683，684

李希凡260

李強693，712

李雪峰312，318

李富春16，48，73，76，138，147，165，168，170—172，179—181，184—186，193—195，197，199—209，220，308，318—320，334，341，342，497，691，709，713，767，772

李慎之15，115，286，432，682

杜威57，220

沈志遠230，276，548，683，684

八畫

兩類矛盾學說470，472，486，490，500，504，675

和平共處16，17，82，83，86，111，123—125，238，379，413，739，742，751，763

和平宣言689，737，741，752

和平過渡81—84，116，123，124，126，380，440，718，734，737，739—743

周小舟343

周勃256

周恩來18—20，25，26，29，39，40，43，48—54，56，58，59，64，71—76，115，117，124，125，139，147，148，152，153，157，158，160，164，165，168—182，184，192，193，195—200，204—212，218，221，235，236，244，246，249，250，264，268，273，284，287，289，291，292，296，305，306，308—310，316，318，319，321，324，332，333，335，337，338，346，347，349，367，385，399，423，427—431，434，516—518，556，557，601，611，612，614，615，633，660，691，692，696，699，702，705，709，711—714，719，729，731，733，734，742，766—768，771，772

周揚20，55，244—246，248，251，254，314，480，567命令主義355，451，464，469，483

季羨林41，46，60，61，63

宗派主義49，51，54—58，72，223，226，242，247，275，313，353，356，357，462—468，478，479，481，482，488，492，493，503，504，507，515，517，518，524，530—532，538，539，543，548，562，570，575，577，583，585，586，640，652

官僚主義32，82，250—252，258—260，272—274，277，288，291，292，348，349，353—358，433，434，437，447，449，450，458，462—469，474，475，478—480，482，483，488，489，493，494，499，501，503，504，515，517，518，

520，524，529，532，534，543，548，556，562，564，570，575，591，594，599，621，622，652，663，664，672

林伯渠318，319

林克290，302，432，524，532，554，600，616

林希翎587，639

林彪318—320

林楓306

林鐵343

波茲南事件376，384，391，429，452

波斯佩洛夫99—103

波蘭十月事件382—400，424—434

知識分子政策14，18，19，23，25，27，37，38，47—49，52—54，59—62，70，447，580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13，14，19，20、26，29—31，37，47—49，55，56，58—61，64—66，72，73，160，169，213，324，339，447

社會主要矛盾322—324，674，688

社會主義改造15，17，18，136，147，149，151—156，164，171，173，188，211，212，223，249，266—268，270，274，288，291，303，307，308，314，322—326，332，338，341，350，430，431，448，452，454，458，463，492，498，518，603，632，660，675，677，739，740，771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219，255—257，669

邵力子276，540，543，548，624

邵荃麟567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213，214，271，273，274，276，282，286，456，531，535，474，508，541，542

阿里斯托夫100，102，103

青島會議628—631，633—635，637，661，662，678，680，681

青島遺傳學座談會236，239，241

非斯大林化85，96，105，111，115，122，123，381

九畫

俞平伯24，43，57，223

冒險主義332

姚文元620

思想改造運動18，24，38，42，43，58，61，215，228，236，547，580

政協二屆二次會議124，171，292，324

柯慶施280，509，606，611

胡先驌57，218，237，238，529，530

胡風18，19，24，43—47，55，57，62，63，223，243，245，246，248，253，254，294，531，582，586，587，612，645，667，671

胡喬木20，48，142，177，180，182，188，191，192，233，235，281，286，305，308，310，318，327—331，364，438，439，467，512，514，516—518，533，602，610，616，702，733，734，738，741

胡適24，43，57，220，223，231

茅以升60，61

茅盾244—246，254，257

十畫

個人崇拜問題95，99，102，103，106，109，118，126，353，359，361，365，366，435，703

修正主義80，141，326，374，502，554，603，604，608，619，622，702，734，739，748，763

哥穆爾卡732，737—739，747，748，757—761

孫大雨258，635，683

徐冰20

徐璋本575，684

徐鑄成279，297—300，478，480，483，487，629，644，

683，688

核武器與核戰爭83，86，707—715，760—763

格羅375，376，379，401，403，406—408，410，416

浦熙修279，280，282，629，644，683，684

秦兆陽254，256

納吉603，606

除四害161

馬利寧404，406

馬林科夫85，90，91，95—98，100，104，140，204，219，253

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黨集團140，698，702，715，722，735

馬哲民230，547，630，683，684

馬寅初42，43，483，543，630

馬寒冰260，479，669

高崗313，319，321，360

十一畫

崑劇《十五貫》219，249

基里琴科406

康生115，218，244，318—320，468，478，491，531，557，601，616，669

張治中295，540

張勁夫73，76

張奚若543，544，554—556

張聞天27，200，318—320，365，368

張際春20，280，300，301

張德生343

掃文盲161，189—191

教條主義61，116，118，125，216—218，223，236，237，239，240，242，252，255，257，278，307，354，365，425，441

—444，446，449，463，464，474，476，477，479，481，482，486，488，502，506，527，528，530，532，538，543，554，571，575，582，583，585，587，608，696

梁思成57，59，60，62

梁漱溟24，43，57，59，60，62，223，272，295，459，643，663

畢鳴岐582，583，629，653，683，688

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470

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519，521

莫洛托夫95，97，98，100—102，140，385，386，392，399，405，413，416，419—421，697—706，715，122，735，738，758

莫斯科宣言689，737，754，764

郭小川252，260，488

郭沫若23，59，60，70，72—74，184，214，216，220，224，228，230，529

陳正人192

陳企霞46，57，243，669，682，684

陳伯達48，160，214，219，306—308，310，318，320，327，329，330，535，602，738，741，771

陳其通473，476，479，488，509，511，513，514，669

陳叔通266，545，6U，624

陳垣25，60，64，485

陳涌253，254，256，666，682

陳雲23，48，135，140，147，152—154，158，169，176，179—182，184，185，192，196—199，207，209，211，244，286，306，308，310，311，318—321，333，338—341，346，347，427，433，434，459，460，497—499，516—518，556，557，601，692，702

陳銘樞536，537，540，543，554，555，573，611，629，634，643，683，684

陳毅20，72，73，75，76，160，244，246，247，306，318—

陸定一44，45，48，54，57，58，187，188，191，215—223，225，231，237，242，298—301，318，473，476，479，488，509，511，512，557，601，604，612，630，696，738

陸詒644，684

陶鑄467

章乃器184，277，459，492，493，536，538，539，547，554，555，583，607，610，611，613，623，624，629，635，639，643，644，653，683，684

章伯鈞19，20，64，184，185，277—279，281，282，483，536，537，550，554、555，562，569，570，575，607，611，613—615，619，621，623，626，629，630，634，639，640，644—646，683，684，687

章羅聯盟626

十二畫

傅作義264，295

傅雷476，484

傅種孫46，580，683，684

傅鷹55，547，559，560

富振聲37

彭真20，48，115，149，181，183，244，293，296，306，318，319，516—518，557，601，602，607，611，612，621，630

彭德懷181，306，314，318—320，362，368，709，713

斯大林16，17，77，79—81，84，85，88—109，111—123，125—129，131—139，142，144—146，175，208，214，217，218，252，253，256，261，263，272，286，290，294—296，300，307，313，315，356，359，364—366，368，373—381，391，395，402，403，420，421，423—425，432，435—443，445，446，458，463，472，474，528，547，587，691，702，703，705—707，717—719，722，723，725—728，735，739，744—746，748—750，758，766

普拉演說434—436，439，441，444，749，750

曾山135，345

曾昭掄242，540—542，550，613，683，684

朝鮮戰爭25，49，84，105，123，377，420，691，723，726，757

肅反運動18，19，24，27，36，37，43—47，57，62，267，292，294，542，544，547—549，571，580，581，596

舒蕪484，670，682

華沙條約組織393，400，422、445

華羅庚40，64

費正清39，45

費孝通19，42，230，487，613，629，630，683，684

賀龍306，318，319

超英趕美739

階級鬥爭理論680

馮友蘭25，42，60—63，485，529，532

黃炎培264，266，295，454，470，549，611，624

黃秋耘567

黃紹竑295，544，629，643，683，684

黃琪翔64，539，629，683，684

黃藥眠253，542，550，613，630，683，684

十三畫

奧哈布374，375，386，392，394，397

新聞改革233

楊獻珍666

溫情主義625，628，633，635—637

經驗主義354，463

葉飛330，343，510，634

葛佩琦576，610，634，635，641，642，684

董必武62，292，306，308，318，319，351，352，353，363，

429

農民退社448，594

農村社會主義大辯論648—661

農業發展綱要49，75，128，148，159—163，166，184，189—191，210，292，307，428，648，769，770，773

雷海宗528，532，643

十四畫

劃分右派及其標準637—646，661—672

對右派的批判和鬥爭628—630，637—646

廖魯言160—163，183，187

熊克武276，542

裴多菲俱樂部402，606

赫格居斯406，410，416

赫魯曉夫22，77，79—81，83，90—95，97—100，102—107，110，112—114，116—120，122，123，326，129，136，142—145，204，217，286，299，307，320，359，368，376，378，380，382—388，390—392，394—400，405—408，412—416，419—423，439，441—445，45只，691—694，696—707，712，715—722，725，726，730—738，740，745—753，756—762，764，765，767，771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286，421

趙文璧645，646

十五畫

劉少奇115，117，120，121，130，138，147，149，151，156，157，164，171，179—183，187，188，195，198，211，217，220，235，236，244，246—249，264，268—270，277，278，293，299，300，304—310，314，316，318，319，321，323，324，326，331，332，335，337，345，347，349，350，354，355，357，359—361，365—367，377，389，390，393—400，407—409，412—416，424—427，429—432，434，456，466，483，493—497，500—501，516，522，535，557，566，600，616，666，694，696，699，700，702，703，717，719，

726，732，734，736，771
劉白羽244，246，248，252，253
劉芝明247，251
劉紹棠256，257，259，682
劉賓雁258，260，668，682
劉曉112，442，704，714，716，718，753
摩爾根學派216，237，238，528
蔣介石44，120，142，242，433，475，581，611，643，766
論十大關係139，141，145，175，186，218，272，290，294，308，333，334，368，696，721
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45，359，381，434，437，440，470，586，722，750
鄧子恢184，185，333，334，341，342—344，406
鄧小平114，115，117，121，182，195，198，268，273，274，290，304—306，314，316，318—321，354—361，366，367，394—396，415，454，516，518，520，557，559，601，606，613，619，627，630，632，635，638，648—650，654，666，675，681，702，733，734，738，741，747，764
鄧拓280，512，513，515，620
鄧初民276，623
翦伯贊214，529，530，623
十六畫
學生民主運動585—588
學生罷課448，449，499
戰爭與和平問題17—18，82—86、722，761—762
整風動員620，668
盧郁文615，641，645
錢偉長242，603，613，639，683，684
錢端升239，242，683，684
錢學森40，64，73，709，713

錢鍾書55

龍雲272，295，548，607，629，639，683，684

十七畫

儲安平276，279，281，282，483，550，577，583，623，629，634，641，642，643，645，683—685

薄一波22，34，73，114，135，138，147，165，175，176，179—181，185，187，191，197，198，205，207，210，290，308，318，319，328，333，334，336，497，604，766

謝皮洛夫104，406，413，708，730

謝富治564

謝羅夫100，404，406，411，413，697

邀請黨外人士整風525—535

擴大《參考消息》發行235，475

十八畫

聶榮臻76，115，306，709—714

薩布羅夫100，102，406，414

雙輪雙鏵犁161，163，172，189—193

十九畫

羅申23，264，377，705

羅科索夫斯基384，386，387，389，39Z396，398—400

羅隆基42，62，68，184，224，228_230，264，277—279，281，282，485，536，540—552，554，555，569，571，611，619，621，623，626，629，642—646，665，683，684

羅瑞卿160，178，184，294，612

譚天榮586

譚政306，318

譚惕吾573，615，629，683—685

譚震林115，160，306，31，8，507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17—119，218，378，424，440，441，463

二十畫及以上

嚴信民542

蘇中友好協會717，718

蘇共二十大77，79—83，85—87，98，104，105，109，111，115—118，120—123，125，126，128，129，136，138—140，145，146，175，201，212，214，236，272，286，294，296，298，303，307，308，350，359，366，368，369，374，376—378，380，420，421，424，425，432，435，438—441，445，458，463，696，718，719，723，725，735，739，741，743，755，763，764

蘇斯洛夫100，104，204，299，405，406，410，412，418，697，717，730，736，738，740，741，747

蘇聯專家21，22，51，61，74，75，132，137，200—202，237，548，693，694，696，715，720，721，723

蘇聯對華經濟援助691

蘇聯模式84，137，442

黨內右派，636，637，649，669

黨內民主91，92，95，303，353，358—360

鐵托120，364，365，374，416，423，434—437，439，441，443，444，457，587，723，725，729，730，732，749，750，752，753



二校：@Jr.

一校：@浅唱﹏繁华、@hpcao @corsairliu @bladeknight @沙鸥 @mayuqian @zsh989 @Jr.

版式：@明客楚山

製作：@Jr.

版本更新记录：

v1.0-20170514

原书信息

ISBN：9789881756237

版次：2008年5月

◎报告勘误信息或查询本书版本更新情况，请访问“JinE（精益）制作组”官方网站（www.jebook.org），如对电子书制作技术有兴趣，欢迎与“JinE（精益）制作组”联系。

◎本电子书制作目的系为学习及交流Ebook制作技术，请下载者在24小时内删除，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图书。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
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
沈志華　著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1956年至1957年被稱為「多事之秋」。作者充分利用十幾個省市的檔案、俄國解密檔案、當時的報刊雜誌、當事人的口述記錄和回憶錄，以及現有的研究成果，對中共中央知識分子會議的目標和結果、蘇共二十大在中國的反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和推行，中共八大的作用和局限，中國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響，整風反右運動的起因、轉變和結局等一系列重大歷史過程，作出翔實的描述和分析。


ISBN 978-988-17274З-5
9 789881 727435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